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Western Sociology of Ethnicity Reader: Studies of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马戎 ◎编



■ 内容简介

从古代传统部族社会到现代公民国家，大多为多族群政治实体，如何理解交织着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语言、宗教差异的多族群国家中的种族—族群关系，始终是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出版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对族群关系发展的理论分析，又有应用实证方法衡量族群关系演变的研究，也出版了一批核心专题的经典研究案例。本书是西方社会学种族—族群关系研究的经典文献汇编，精选了这一专业著名学者发表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读者可对西方族群社会学的概貌、核心理论、主要方法、经典研究案例有一个全面了解。本书特别选择了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研究最新热点的两篇研究报告，分别调查西欧国家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和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在基层的继续延伸。

■ 编者简介

马 戎 1987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长期在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调查。主要研究领域：民族与族群社会学、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教育研究，农村与牧区发展研究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年同心出版社）、《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年民族出版社）、《社会学的应用研究》（2002年华夏出版社）、《民族社会学》（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

ISBN 978-7-301-16292-7



9 787301 162927 >

定价：46.00元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Western Sociology of Ethnicity Reader: Studies of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马 戎 ◎编



C954-43
M143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马戎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ISBN 978 - 7 - 301 - 16292 - 7

I. 西… II. 马… III. 民族社会学 - 西方国家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9450 号

书 名: 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

著作责任者: 马 戎 编

责任编辑: 倪宇洁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301 - 16292 - 7/C · 0547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 版 部 62754962

电 子 邮 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6.75 印张 46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导言	马戎 / 1
关于族群研究	N. 格莱泽 D. P. 莫尼汉 / 23
多元主义	H. 蒂施勒 B. 贝里 / 43
在美国的同化:理论与现实	米尔顿·M. 戈登 / 63
内部殖民主义	M. 赫克特 / 82
同化的性质	米尔顿·M. 戈登 / 91
种族和族群关系理论的探索	米尔顿·M. 戈登 / 107
美国经济活动中的少数族群	G. E. 辛普森 J. M. 英格尔 / 126
族群分层	F. 科普林 C. 格德沙尔德 / 148
劳动力参与中的种族—族群差异:	
一个族群分层的透视	特里塞·A. 苏利万 / 166
美国华人:一百年来的职业变迁	H. 金 F. B. 洛克 / 186
生育率差别与少数群体地位假说:	
回顾与评价	弗兰克·D. 宾 约翰·P. 马库姆 / 207
死亡率的种族和性别差异	
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G. F. 萨顿 / 227
加拿大的族群与迁移	弗兰克·托维托 S. S. 哈里 / 239
一个关于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社会理论	S. 雷伯森 / 257
居住中的族群隔离:	
变迁的模式	阿维利·M. 盖斯特 詹姆斯·A. 卫德 / 269
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阶级基础	
——加拿大之例	A. 达洛奇 W. G. 马斯顿 / 296
族际通婚	G. 辛普森 J. 英格尔 / 315
同化	G. 辛普森 / 337
减少族群冲突的优待政策	D. 霍洛维茨 / 349
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族群关系	斯蒂凡·苏利万 / 372

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德国与荷兰的制度化：
一项比较研究 J. 多米尼克/394

附录 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 马戎/411

导 言

马 戎

欧美各国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许多专业方向,如:人口研究 (Population Study)、城市化研究 (Urban Study)、族群研究 (Ethnicity)、发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y)、家庭研究 (Family Study)、社会分层研究 (Social Stratification)、医学社会学 (Medical Sociology)、法律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w) 等等。社会学在分析人类社会的结构、活动和历史变迁时,经常把社会人群按照某种特性区分出一定的群体,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并因此逐步发展成一定的专题和领域,如以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的特性群体为对象的老年研究、妇女研究、农民研究等等,以种族或族群特性区分的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也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族群社会学在许多西方多族群国家中很受重视,因此也发展得比较快。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种族、族群关系的问题。开始是欧洲移民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冲突,在其领土向西部扩展时不断地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打仗,并因为解放黑奴爆发了南北战争 (马戎,1997a)。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豹党”曾一度十分活跃,城市里的种族冲突空前激烈,“据196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为种族歧视而付出的全部代价约值173亿美元,即国民生产总值的3.2%”(富兰克林,1988:543),当时毛泽东主席为此专门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种族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它对美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为了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现状,分析激化矛盾的各种原因,找到改善种族、族群关系的基本途径,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美国当时执政的约翰逊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大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对美国的种族、族群关系进行深入调查,提出改善种族关系的具体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社会学界很自然地把民族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发展成

为族群社会学这样一个专业方向。

1982年至1987年期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的社会学系读书,根据我的指导教授和潘乃谷老师的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题目选的是“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口迁移”。1985年夏天我回国到赤峰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内蒙古地区由于移民以汉族为主体,本地户以蒙古族为主体,迁移研究必须结合民族关系的研究,所以在我的论文中,蒙汉民族关系成了一个研究重点,而且当地许多矛盾是以民族关系的形式来反映和表现的,所以我选修了关于族群社会学的课程。这些课程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经典文献和关于族群关系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案例。经过这种学习和探索之后,再反过来我国的民族研究,就觉得目前国内的民族研究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感到很有必要将国外研究族群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不足并促进国内学术领域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从大的方面讲,我觉得国外族群社会学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的:

1.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研究比较注重对某个少数民族的单体研究,注重研究其历史、历史人物、风俗习惯、语言、宗教、家族结构等等,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选择该民族“高纯度”的居住区而淘汰掉多族群混住区。同时对于所调查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族群关系的变化,则相对重视不够,在研究对象和领域方面有局限性。西方社会科学把族群放到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与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所以有关族群关系的理论涵盖面很宽。如美国关于本国多族群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社会史。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很注重现实社会问题,所以其研究族群问题的重点放在现时的族群关系上。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在与汉族长期共存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对各民族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脱离开对当时汉族社会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是不可能全面和客观的。

2.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的内容和体系比较单一。而有关解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族群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发生和发展的理论应当是多样化的。理论之所以丰富,是因为世界本身是五彩缤纷的,每一个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生态所供给给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十分不同的,所以每个地方的不同的人种人群及其发展轨迹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找到一种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解释如此复杂的一切。西方在族群理论方面没有统一的模式,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说它是缺点是有关的理论不系统,说它是优点就是这种状况给了研究者们很大的自由度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独立的分析、很大的空间来

进行理论探讨和创新。

3. 我国民族研究在方法方面也相对比较陈旧与保守。由于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实际发展历史和政治形势,从1949年以来我们与国际学术界隔绝了几十年,除与前苏联的学术界曾于50年代有些接触外,与欧美各国的学术界很少进行交流,所以对西方关于民族主义和族群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等等是生疏和不了解的。我们的民族研究基本上还是偏于理论探讨或沿袭传统的民族志和现象描述等方法,对西方的定量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吸收不够。

在我国的民族研究中,有时存在着机械地遵循“社会进化论”的倾向,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作唯一的轨迹。在“民族”的定义上,也往往离不开传统的框架。比如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民族研究中占据比较主导的地位。世界上的民族与族群现象千姿百态,美国与中国、前苏联的情况就很不一样。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实际上已经遭到很多批评,认为它并非很科学。斯大林认为他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是缺一不可的,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他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民族,迁居到美洲的英吉利人“在这个新的地域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斯大林,1913:293),美国的黑人等族群由于没有自己的地域,只能算是“北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这显然不合理。在实践中,他的定义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解释力,如苏联的犹太人也没有自己的地域,而实质上苏联政府是把犹太人当作一个民族来对待,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用于中国,也有很多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如斯大林不承认中国的回族是一个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回回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宗教。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是从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国情中产生与发展出来的,有他一定的道理在里面,但不能简单、机械地去理解和套用。

在我接触到的英文文献里,至少介绍了二十多种不同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Ma Rong, 1987:33—34)。实际上每一项具体的研究,不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具体案例分析,在开章明义之前,总要对族群(Ethnic Groups)设立一个自己的定义,明确在这个研究中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有的研究强调主观意识方面,即自己认为自己是什么;有的研究强调客观方面,即不是自己怎么看自己,而是有一个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标准存在;有的或强调传统文化,或强调宗教,或强调体质……这方面的文献很多,定义也很多。而每种定义都有它一定的道理,而且与各个研究者的研究主题、研究视角相联系。各国民族和族群的形成过程、发展条件很不相同,因而各个民族所产生的民族意识的内涵也会有所不同。所以说,“民族”的定义,可以因时、因地、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变

化,不能完全按照一个民族的定义来解释其他所有民族和族群现象。

由于受政治气候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目前的民族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当“走出去,引进来”,使我们能够开拓出一些新的领域。凡是原来好的、优秀的,都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但确实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自我封闭。世界各地的民族和族群情况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如果我们试图用一种简单化的办法,无论是民族的定义也好,还是民族的社会形态理论也好,用一种一成不变的单一公式去解释、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束缚了我们自己。其实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新的、前人不曾注意或未曾遇到过的情况,需要我们去认知,我们也只有通过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现、发掘、探讨,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不然,定义也是死的,完全无助于我们形成正确的认识,既不能帮助我们去认知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也不能去认知这种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感到十分有必要在国内大学里开设“社会学的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这样一门课。1987年我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第一次试讲“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研究生课程,学生很有兴趣。1992年、1994年和1996年又相继开设,我想通过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把国外关于民族和族群问题研究方面对我们有用的理论、方法和重要的典型案例介绍到国内来,并逐步在我国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内发展为一个新的专业研究方向。

关于“社会学的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我认为主要由六个方面的内容组成。这六个部分是: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二、民族理论和社会的族群关系发展目标;三、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四、族群集团的结构性差异分析;五、族群关系专题研究;六、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和族群关系的演变。(马戎,1997b)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的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课程时,为配合教学而选用的西方参考文献汇集。这些文章的原文都是英文,由我的学生们合作翻译而成。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各大学社会学专业要求研究生阅读的教材,少部分是我根据自己研究和教学的体会从西方研究文献中选取的。它们都与这个专业和我开设课程的大框架密切配合,涵盖了族群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的研究方法。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本书中选用的这些西方研究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觉得有必要在这篇“导言”中以“民族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基本内容为主线,把本书的各个部分与这个主线结合起来作一个介绍。

本书从结构上看共分为 8 个部分：

1.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选用的是格莱泽 (Glazer) 和莫尼汉 (Moynihan) 的“民族与民族研究”、蒂施勒 (Tischler) 和贝里 (Berry) 关于“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篇文章，它们兼顾了上述课程内容的第一部分“对象与方法”和第二部分的“族群理论”部分；

2. 多族群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选用了戈登 (Gordon) 和赫克特 (Hechter) 分别讨论美国和英国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两篇文章，对应课程第二部分的“发展目标”；

3. 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选用了戈登 (Gordon) 的两篇相应的理论性的文章，对应课程的第三部分；

4. 族群集团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构差异。选用了辛普森 (Simpson) 和英格尔 (Yinger) 关于经济结构、科普林 (Kobrin) 和格德沙尔德 (Goldscheider) 关于社会地位结构、苏利万 (Sullivan) 关于劳动就业结构，金 (King) 和洛克 (Locke) 关于职业结构分析的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与课程第四部分相对应；

5. 族群集团在人口方面的差异。选用了宾 (Bean) 和马库姆 (Marcum) 关于各族群生育率的比较研究、萨顿 (Sutton) 关于死亡率的比较研究、托维托 (Trovato) 和哈里 (Halli) 关于迁移情况的比较研究、雷伯森 (Lieberson) 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共四篇文章；

6. 居住格局、通婚与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选用的是盖斯特 (Guest) 和卫德 (Weed) 关于居住格局的研究、达洛奇 (Darroch) 和马斯顿 (Marston) 对于种族居住隔离的个案分析、辛普森 (Simpson) 和英格尔 (Yinger) 关于美国族际通婚的概述、辛普森 (Simpson) 关于族群同化影响因素的综述、霍洛维茨 (Horowitz) 关于政府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共五篇文章，以上两组共 9 篇文章与课程第五部分“族群关系专题研究”相对应；

7.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与族群关系问题。选用了反映近年来前苏联 (图瓦共和国) 与西欧国家 (德国、荷兰) 族群关系发展最新动态的两篇文章，与课程第六部分相对应。

8. 近代历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本书最后是编者撰写的介绍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 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论述。民族主义是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民族与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所开设的课程的总体结构兼顾了中文、英文文献和现实问题研究，这本读本仅仅是英文文献中精选的部分，课程中引用的其他英文参考文献由于其体

裁、重要性等原因并未收入。本书的结构是根据选用的 21 篇译文的内容决定的,但它与课程的整体结构在本质上完全一致。

下面对这一课程的基本结构依照六个方面进行介绍,希望读者能对民族社会学这一专业方向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结合课程整体结构来理解本书选用各篇文章的用意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与其他研究民族和族群关系的学科相比较, 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有许多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学科以民族和族群为研究对象,如民族学、语言学(民族语言)、考古学(民族文明史)、人类学(文化差异与变迁)、人口学(如不同族群地区之间的迁移、族群生育率特征)、历史学(民族史与族群交往史)、政治学(不同族群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政治外交史等)、民俗学(比较不同族群之间文化、宗教的差异)、经济学(如族群经济交往的类型及发展方向)等等,它们都涉及族群研究。但是,民族社会学与这些学科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所不同。比较而言,它有如下 10 个特点:

1. 强调现实而非历史,即主要关注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族群关系问题;
2. 强调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各族群集团自身。
3. 注意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次。人类学往往比较注意一些小的社区或个人,人口学比较注重宏观的人口结构,社会学的民族研究,往上走可以比较宏观,往下走可以比较微观,在研究中更注重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面。
4. 比较注重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政治学偏重政治,经济学偏重经济,民俗学偏重文化,历史学侧重历史,而社会学则希望尽量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地加以考察。
5. 在尽可能综合和忠实地描述的基础上,力图解释族群间种种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6. 注意吸收、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如大量引进社会统计学和计算机的应用,包括各种分析方法,努力在研究中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7. 注重实证研究。从对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入手,从对个案的调查和解剖麻雀入手,搜集尽可能准确的数据资料,以类型归纳和比较研究为手段,在分析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8. 结合政策研究。注重对与民族和族群问题有关的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社会实践效果开展调查研究。

9. 结合区域发展研究。我国有很多民族自治地方,民族的发展与整个地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区域的发展并不等于当地各民族的同步发展。

10. 关注多族群国家或地区在其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

以上这十个方面大致体现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特点。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选有2篇文章,主要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来分析族群问题,重点探讨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的社会理论,并用西方流行的“多元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多族群并存现象和族群关系的实质。

二、民族理论和族群关系发展的社会目标

民族理论的涵盖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和族群的定义,每个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时,都不能不事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民族和族群作一个界定;二是民族和族群意识的产生和传递;三是民族和族群关系。换言之,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人种和人群,我们如何来界定它们?人并非天生而有种族、民族、族群的意识,那么是如何获得这种意识的?有了这种意识,人们又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无论从宏观(群体)上还是微观(个体)的层面上,这三个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民族和族群理论要特别强调的。

欧美社会学研究强调的不是民族或族群的定义,而是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societal goal),即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中,族群关系发展的远景应当如何,政府和社会应如何去达到这一目标。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应当吸收三个方面的理论:

(一) 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族群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学说中关于“人种”、“类”有它们一套说法和看法。它关于非汉族、非中原的其他边缘地区族群和部落的文化,有一套称谓、一套观点。它既有包容的一面即所谓“有教无类”,认为这些种族是可以被中原文化同化进来的,而且对他们采取一种平等的态度;同时对所谓“化外”则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最早的。在华夏文明和中原政权达到它发展巅峰后的很长时期内,周邻的许多民族和国家纷纷前来中原学习中国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

对周边各族各国的态度是与这种地理文化结构分不开的,是一种文化同化的、安抚的而非侵略的政策和策略。因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地域广阔,对中原王朝形不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发动侵略战争,就涉及派驻军队、安抚当地居民等一系列问题,而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得不偿失。因此这种态度与欧美人鄙视“低贱人种”、掠夺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形成这些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在今天并没有全部改变,这些传统对今天的中国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对待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邻国等一系列问题上实际还受这方面传统的影响。所以这种思路和方略应该说还有符合实际的地方,需要研究和吸收。

(二) 欧美各国处理民族关系的社会目标

欧美关于民族和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理论,是西方族群社会学的核心部分。在本书中选用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文献,通过它们,可以对西方族群社会学方面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戈登(M. M. Gordon)关于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戈登是马萨诸塞大学 Amherst 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他于 1964 年出版了一本书《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该书当年即获得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两项大奖。该书重点讨论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认为,美国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o-conformity),它的文化导向以强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心;第二阶段叫“熔炉”主义或政策(Melting-pot);第三阶段叫“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实际上,这三阶段反映出来的是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三个过程或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北美 13 州都是英国殖民地,主要移民来源是英国,而且是受宗教压迫、政治迫害而逃亡的英国人及破产的英国农民。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背景无疑都是英国的,因此,当时就非常注重强化这种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直至 1909 年还有人提出要用行政手段“割断”各移民集团与母国的联系,以此来达到同化移民的目的。所以那时候的官方政策非常明确,即要求所有移民美国的人都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第二阶段。随着欧洲遭受一战前后天灾人祸的巨大冲击,大量来自意大利、德国、北欧各国的移民,甚至还有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争和十月革命,不断涌入美国。人口的成分和比例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先前的政策、要求所有的人都盎格鲁—撒克逊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的

美国,形成许多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种族集团,这使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非常忧虑。恰好在1918年左右,上演了一部戏剧,名字叫“熔炉”(*The Melting Pot*)。该剧描写的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几代人通过婚姻组成的美国家庭中,其成员们的日常行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等方面差异及冲突,经过长期的相互调适,最后竟能够融洽化。这个戏剧其实正是当时美国社会实际情形的一个反映;社会学家们认为这个家庭的演变结果正是预示了美国社会的未来。后来,就借用“熔炉”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政策,意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最后会变成具有美国文化特质的“美国人”。

第三阶段。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并没有像政治家和学者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完满的解决,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也并非在逐渐消失。他们发现,在美国,尤其是在城镇,如纽约的曼哈顿,有“唐人街”(Chinatown),在那里居住的是华人,他们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学校,广场上竖立着孔子像,有自己的报纸、广播电台甚至还有电视台,完全形成一个“亚文化群体”(Sub-cultural group)。“唐人街”旁边有一个“小意大利”,那里居住的都是意大利裔,讲意大利语、社区的人际关系等等仍是意大利式的。尽管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来到美国后,学习使用英语,按照美国联邦宪法和各州法律行事,承认这个社会总体的规范,能够作为这个社会中的守法的公民而存在,但是他们依然保有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后来,一些学者开始认为多元文化是好事,差异的存在能激发出人的创造性,人权的意义就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而且,这使得社会的文化变得丰富多彩,族群交流、共同生活的结果将是产生保留各族文化传统的“多元的美国人”。

在20世纪60年代,戈登在他的书里第一次清楚地把三个阶段划分出来,而且给予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概括,在政界和学术界影响很大。本书选取的即是戈登在他的代表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发表18年后重新撰写的文章《美国的同化:理论与现实》,是他的理论的高度概括。

2. 赫克特(M. Hechter)与他的《内部殖民主义》。

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赫克特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在这本书里,他对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发达的核心地区与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理论,一个是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一个是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

(1) “扩散模式”假设在一个国家中有两个族群,有一方居住在核心地区(core area),在经济上比较发达,在国内政治中处于统治的地位,其权力组织控

制着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主导权；另外一方居住在边缘地区（peripheral area），它在经济上、文化上相对落后。两个集团的政治结构是不一样的。落后的一方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松散的结构，而先进的-一方则有比较完善的各级权力机构，下设很多不同职能的事务部门处理各种专门事务。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国家的发展和族群融合如采用扩散模式，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个地区之间基本没有联系；第二阶段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联系逐渐增加；第三阶段是核心地区的政治机构、商业机构、行政机构逐渐向边缘地区扩散，扩散的过程也就是先进民族控制的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渗透到周围的地区，其结果是两个地区之间和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首先是经济差异消失，并逐步使文化差异失去实际的社会意义。因为比如两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同事于一家商社，拿同样的工资，租住同样的房子，具有一样的消费模式，则他们个体行为上的某些文化差异就失去了根本的社会意义，从而在政治上他们达到融合。政治经济的全面融合，最后导致文化差异失去意义。这一过程的实现，并未使被扩散的地区和族群受损，而使他们达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平等。赫克特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式。

（2）“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是指中央政权采取另一种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统治形式，即原来施诸外部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政策，中央政权也完全有可能把这种方法引入境内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的工业发展，但这些有限的工业可能主要是为核心地区加工原材料的加工业；这些地区也有一定的行政机构扩散，但是中央政权不允许这些机构具备真正的实力，对它施以严格的行政控制，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殖民地式的掠夺与控制。赫克特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认为，在英国的英格兰人和凯尔特人（Celt）人之间就存在这种关系，即英格兰长期以来是用“内部殖民主义”这样一种思路在掠夺和控制着凯尔特人的。族群矛盾仍然存在。这是他对英国现实社会族群关系的理论。

他的这一理论发表后，由于该书按历史进程的时序组织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详尽资料进行论证，所以很多地方都很具说服力，从而引起轰动。此后很多人根据这一理论对拉美、非洲、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研究，从而使这一理论流行起来。本书选用的即是他的这本著作的第一章“导言”，他在这篇“导言”里对自己的理论给予了概括性的介绍，是全书的精华。

（三）前苏联的民族关系理论（包括在 1949 年后受其影响很大的中国）

关于前苏联模式，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区域自治，一是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Conner, 1984）。由于历史原因，自 1917 年十月

革命以后,前苏联政府如何制定其民族政策,如何规划和指导境内民族关系的发展,其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在课程中讲授这一部分时,我选用的主要是我国学者的论著和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文献,所以本书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在应用社会学去研究我国的族群关系、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族群国家在今天应如何制定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时,我们认为我们应注意吸收上述三方面的内容,认真加以总结以利借鉴。本书的第二部分“多族群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选用的戈登和赫克特关于美国和英国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两篇文章,是西方经典理论的代表作。

三、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

要想分析一个多族群的社区中各族群关系的现状,除了一些可描述的感性印象之外,需要找到一些客观的指标来测度它,并把这种现状显示出来,以与其他社区或与过去作比较,即作跨时空的比较。如果没有客观的、可测度的指标,仅凭主观判断,就很难获得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戈登(M. M. Gordon)在他1964年的代表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的第三章“同化的性质”(“The Nature of Assimilation”)中提出七个变量:(1)文化(Acculturation),(2)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Structural Assimilation),(3)通婚(Intermarriage),(4)族群认同意识(Ethnic Identity),(5)偏见(Prejudice),(6)歧视(Discrimination),(7)价值、权力冲突(Value and Power Conflict),这七个变量实际上就等于研究族群关系的七个方面、七个领域。当然每一个变量根据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实际情况还可以分解、可以具体化。这是在民族社会学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指标体系。如在某一多族群国家或是它的一个城市社区,生活着几个不同的族群集团,如他们的生活地位、收入差别很大,按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则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是会不太相同的。就好像在一个社会中有穷人与富人,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优越感。本书第三部分“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中选取了戈登的两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同化的性质”即是该书第三章的节译。

为了读者对这七个变量有进一步的了解,下面根据我们的理解和调查的结果做一些说明。

1. 文化(Culture)。族群集团之间最明显文化差异是语言,如果两个族群在语言上互不相通,显然他们之间的交往会很少,族群关系也会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宗教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族群之间在宗教信仰、礼仪、与宗教相关的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就可能直接影响族群间的日常交往和民族关系。

2. 社会交往或基层社会组织的相互进入(实质性的渗入)。有些组织被美国的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基层社会组织”(primary groups),主要指非正式的以文化、宗教、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带有个人和感情色彩的组织,如教会团体、俱乐部、私人团体等,以区别于工作中的同事、学校同学这类正式机构中的关系。比如一个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念书,拿到学位后留在美国教书多年,他与美国人的交往在语言上没有障碍,他可能也已经加入了基督教,生活方式也美国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美国社会的关系能顺利地往下深入一步,因为他很可能没有实质性地渗入到美国社会。他平时去的是华人的教堂,节日时到他家里去做客的只有当地华人或华人留学生。他那些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共同开会的熟人等等,平常打招呼谈工作,但一到他们儿女婚嫁等带有私人感情色彩的场合,并不会请他去,他始终难以进入白人的“基层社会组织”(或叫做“小圈子”)。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并成为美国公民,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渗入到美国主体社会中去。因此,这一变量所探讨的社会交往,在文化上没有障碍的前提下,就显得更为重要。

3. 通婚(Intermarriage)。假设有两个族群集团,他们的文化能够互通,语言上没有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不绝对排斥,他们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之间没有偏见与歧视,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也不反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通婚。当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则他们的族群关系大致地可以说是比较良好的。

4. 族群认同意识(Ethnic Identity)。所谓族群认同意识,即一个人处于族群关系场景中时,他如何给自己定位。美国有些学者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族群意识,进行大量的访谈,由访谈对象自己讲述其父母的族属、自己各类交往伙伴、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族群观念在一生中变化情况、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等等(Waters, 1990)。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年龄、职业、性别、教育状况、经济收入情况等等的访谈对象的自述材料的分析,看其族群认同意识清晰的程度、强烈的程度或牢固的程度,分析其族群意识是如何产生与变化的。

5. 偏见(Prejudice)。如果一个族群集团对另一个族群集团有相当大程度的偏见,对他们在种族体质、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偏见,对这种偏见的

分析也可以揭示出两个族群集团关系的状况。

6. 歧视(Discrimination)。歧视与偏见不同,偏见仍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歧视更可能表现为现实行为,譬如法律的制定。在加州,由于华裔学生成绩很好,后来加州法律规定:在州立大学,亚裔学生的比例不能超过一定的百分比。这样,种族偏见就变成一种法律意志,变成法律上的立法行为和执法行为。

7. 观念与权力冲突(Value and Power Conflict)。人们的价值观念实际上与文化传统的联系更为密切,权力冲突的要害是一个在各族群集团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Ben-Tovin et al, 1986)。例如美国某镇准备通过一项法案动用公款在镇上建设一个花园。该镇有A、B两个族群,分布在不同的街区。显然,花园的建设不会带来绝对均衡的利益,园址选择可能会对A族而非B族更有利。如果A族在镇议会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定人数、地位之优势,则法案就会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利益需要,通过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决定权取决于它的权力结构。权力分配与一定的族群或党派相联系而形成一定的权力结构,其中各族群所占的份额不相同。在我国,人大代表等等国家权力机构的组成中有一定的民族份额分配,原因和意义即在于此。

以上介绍的是戈登在1964年文章中提出的考察、衡量族群关系的七个变量。根据其他美国社会学家开展的实证研究:外来族群的第一代与美国主体社会的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基本上是在经济方面,移民们要谋职业,求生存,由于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得到好工作、好收入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代出生在美国,从语言、生活习惯甚至包括文化的细部如讲玩笑话等等在文化上与主体社会逐步融合;第三代可能出现较大比例的通婚,并通过通婚在上述七个变量所包含的各个领域里与主体社会融合。这里既有个体的层次,也有群体的层次。这七个方面是测度、分析族群关系的主要领域。

本书第三部分选用戈登的第二篇文章《种族和族群关系理论的探索》,发表在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族群》(Ethnicity)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戈登强调了在族群融合过程中权力和冲突的作用,同时试图提出一个更宏观的分析模型。他首先区分开了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和因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然后把自变量分成三组:生理—社会发展变量(Bio-social Development Variables)、互动过程变量(Interaction Process Variables)、社会变量(Societal Variables);同时把因变量分为四组:同化类型(Type of Assimilation)、整体同化程度(Degree of Total Assimilation)(在这一组内才是他1964年提出的七个变量)、冲突程度(Degree of Conflict)、得到社会报酬的程度(Degree of Access to Societal Rewards)。这个更宏观的理论分析模型可以向我们揭示许多新的分析视角和

理论思路,但是在实证研究中也更加难以测度和计量。

本书的前一个部分偏重西方民族与族群社会学的理论方面,后四个部分偏重研究方法和族群关系的具体研究案例。

四、族群集团间的结构性差异

美国两位社会学家在1975年出版了《族群》(Ethnicity)一书,提出了要研究族群集团的“结构性差异”。同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这就把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社会分层”引入了族群关系研究领域,以用于分析族群集团间的结构性差异。“族群分层”从此成为民族社会学领域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比如几个族群可能在受教育程度上(指群体而非个人)存在着结构性差异,教育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会影响族群成员的职业分布,而职业分布结构的不同又会影响到收入水平结构,并进而影响到该族群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Zanden 1983:170—200),这一系列方面都是结构性差异分析的内容。本书的第四部分“族群集团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构差异”选用了4篇文献,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介绍西方关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美国的人口普查把各个种族和族群区分成黑人(占总人口的11%)、亚裔人、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人、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印第安人等几个族群,研究者可以通过有关的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数据来分析这些族群集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如对黑人开办的银行在全国银行中的比例,黑人律师在全美占律师总数的比例,黑人、波多黎各裔、印第安人、墨西哥裔在全美工程师人数中的比例,黑人在获应届各学科博士学位者中占的比例,以及这些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统计数字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族群集团之间结构差异的大小和变化。辛普森和英格尔(Simpson and Yinger)出版了一部在分析美国族群集团结构差异方面非常重要的著作《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198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5版),介绍了大量详尽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指标,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从这本书借鉴许多东西。本书第三部分从这本书中选取了对美国黑人、白人在行业、职业、收入方面进行比较的章节,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这种结构比较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第四部分另外三篇文章,在研究专题方面各有侧重。科普林和格德沙尔德(F. Kobrin and C. Goldscheider)出版的著作《家庭结构和流动性中的族群因素》(The Ethnic Factor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Mobility)分析以三种宗教(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为背景的不同族群集团的家庭组成和社会流动。本书选取的是该

书的第二章,重点是对各族群集团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社会阶级的自我认定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苏利万(T. A. Sullivan)的文章主要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民族差异。金和洛克(H. King and F. B. Locke)的文章以美国华为对象,重点分析华人职业结构的历史变迁。

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也需要予以关注,因为人口是一个族群集团在宏观方面的重要指标,如年龄结构的特征,性别比例是否失衡;再如生育率、死亡率及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等等,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族群集团间人口结构差异的现状就预示着它们相对处境的未来,而这种相对处境会对族群关系产生影响。本书的第五部分“族群集团在人口方面的差异”,在生育、死亡、迁移这三个人口学的基本研究领域里选取了四篇文章作为代表。

五、族群关系的专题研究

当我们对一个多族群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现状开展调查研究时,必须从一些最关键的专题(key issues)入手。关于这些重要专题的介绍,特别是通过案例来介绍相应的实用测量指标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民族社会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下面简要地介绍六个方面的研究专题:

1. 语言使用。这是关于文化融合方面的一个重要专题,重点在调查分析各个族群相互学习语言的情况。而且相互学习语言的格局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策的变化而在不断调整。

2. 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导致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和文化冲突关系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时,一定要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时间、移民的方式、移民的职业结构、移民的收入跟当地居民的差异等进行研究,这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研究是很有益的。

3. 居住格局。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的一部分。社会交往简单说可以分为学习场所、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居住场所的交往、与朋友的往来等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各族群的居住格局。60年代美国种族冲突一度很尖锐,当时对策之一是逐步为各族群创造平等的社会机会(入学、就业、晋级等),另外一个重要政策便是调整族群居住格局。在许多美国城市中存在着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黑人区与白人区。在对这种居住隔离状况的定量分析中,美国学者提出“分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等计算指标,可通过各街区民族比例与城市总体族群比例的差别计算得出,指数的数值从0到1,表示这座

城市如各街区的族群比例达到总体民族比例的话,有百分之多少的居民需要调整居住的街区(Taeuber, 1980)。所以这个指数直接反映了在居住方面种族、族群隔离的程度,并间接反映了该地区族群关系的状况。因此,为了调整实际的族群关系,可以采用各种行政规定和经济手段,按照理想状况的族群人口比例来调整社区实际的人口比例,调整居住格局。

本书的第六部分选了盖斯特和卫德(A. M. Guest and J. A. Weed)关于克利夫兰、波士顿、西雅图这三个城市族群居住格局历史变迁的研究文章,达洛奇和马斯顿(A. G. Darroch and W. G. Marston)对加拿大多伦多市居住格局的研究文章。这两篇都在努力探讨究竟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族群因素造成北美城市居住区中的族群隔离。

4. 族际通婚。通婚是戈登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七个方面之一。通过对族群集团间通婚的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的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通婚率本身即是测度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指标。在美国关于黑人、白人通婚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总结出一种“上嫁”(Marrying up)模式,来表示黑人、白人通婚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地位高、收入高的黑人男子娶地位低的白人女子。在这种通婚中,白人女子满足于经济地位的提高,黑人男子则可炫耀自己娶了白人。白肤色本身成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东西,白人女子凭借自己的肤色达到了“上嫁”。通婚研究可以反映族群关系的基本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还是矛盾很大,通婚率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增加,哪些人更倾向于通婚,这些人在本族群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或发挥的影响力有多大等等。

本书第六部分的第三篇文章是从辛普森和英格尔(Simpson and Yinger)《种族与文化的少数群体》(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一书第13章中摘选出的“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一节,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种族、族际通婚的水平与结构,还讨论了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对美国各州在种族通婚方面的立法也有详细的介绍。

5. 族群认同意识。族群意识是人们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看待外部世界时,如何把芸芸众生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群体之间的异与同都体现在哪里?异与同在程度上的深浅,如何把自身在这种群体格局予以定位,与哪个群体认同,……这些都是研究民族与族群关系时应予以特别关注的方面。当然,群体的划分有不同的层次,如个体、家庭、家族、地方社区、族

群、民族、国家、人类……各类认同因而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存在不同的意识。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人们的认同意识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或弱化。在研究族群意识时,需要结合场景的变化来确定人们族群意识的内容与程度,分析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刺激因素。

6. 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前面许多地方都谈到影响因素的分析,但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后有必要对这些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进行分类概括和综合比较。一般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六类:

(1) 族群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或称为历史因素。族群之间过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方面是什么情况,会影响现今的族群关系;

(2) 社会制度的异同(社会因素),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与中国旧社会的土地制度就很不一样,对两国的族群关系也有着不同的影响;

(3) 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因素),如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是农业,蒙古族是草原畜牧业,当他们相遇共处时,这种差异在土地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无疑是有着影响的,并进而影响族群关系;

(4) 文化、宗教、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可笼统地称为文化因素),会十分直接地影响日常生活中各族群成员之间的接触与交往;

(5) 个别事件(偶发因素)有时会强烈刺激族群感情,影响族群关系,如针对锡克族的“金庙事件”和甘地总理被刺明显恶化了印度的族群关系;

(6) 政府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政策因素)。这个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出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政策既包括立法(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干部政策(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学校制度等)及处理个案的一些具体政策等。毫无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上述政策将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第六部分的另外两篇文章,都与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密切关联。辛普森(G. E. Simpson)的一篇是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选出的关于“同化”(Assimilation)的词条,在介绍各国族群同化状况时分析了各类影响因素。霍洛维茨(D. L. Horowitz)的文章介绍了各国实行的对特定族群的优惠政策,讨论了这些政策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这些情况对我国读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六、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市场,所有的第一世界国家在这种形势下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有古老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为了应付国际外交活动而吸收了西方的政治和法律观念,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而仿照西方模式发展本国的工业与经济,为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引入现代教育体系,派遣大批学生留学西方,并在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方面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断修订、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断调整,社会组织的不断转型等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的剧烈变革。在这些变革之中,一个多族群国家内的各个族群,由于发展基础、发展条件的不均衡,肯定会有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这就使今天各国的族群关系,与以往在时空上与其他地区、其他社会相对隔绝时期的族群关系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很不一样。而且外国的政治势力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方面也在发挥重大作用,如今天的前南斯拉夫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前苏联各地区民族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是在联盟解体后才逐步暴露出来的,由于我国建国后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许多方面受到前苏联政策的影响,对前苏联各民族问题的演变与发展,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加强有关的研究。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两篇文章,都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关注的民族与族群问题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研究民族关系的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专题和思路。一篇是分析前苏联图瓦共和国 (Tuva) 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与当前的形势,另一篇研究在德国和荷兰的土耳其劳工,分析宗教组织对这些劳工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族与族群社会学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是有自己的体系的,西方社会学的文献仅仅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社会学的各个专业在欧美各国起步较早,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我们在建立中国的民族与族群社会学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现有成果。但是这些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下生长起来的理论、研究方法是不是能够符合我国的国情,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七、结 束 语

我国正面临着改革不断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

一系列涉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利益分配、人员流动、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社会变迁，来调查分析这些变迁对各地区族群关系造成的影响，是中国民族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人口规模、地理分布、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程度也很不相同，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方面也各不相同。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其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贡献力量。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的知识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实际调查，也应当运用这些知识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服务。

假如我们能借助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民族与族群关系研究”（民族社会学）这样一个专业方向，它的意义在于：

1. 扩展民族社会学的地理、社会局限。现在国外的族群社会学不包括中国，不包括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甚至也只是很肤浅地论及前苏联及东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其关注点主要在国内；在欧洲，也主要关注欧洲国家。他们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看作是一个有极大影响力的理论。所以目前国外的族群社会学是有相当的地理、社会局限性的。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如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实践是有巨大影响的，西方学者对此较少注意。另如中国的汉族，在国外其含义是很模糊的，有时候是用 Chinese 来指称汉族，有时又用以指称一种特殊的文化。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中国的汉族，并非一个简单地可以用西方“族群”（Ethnic group）定义来界定的群体，它本身即是一个长期通过农耕技术、农耕文化的传播，包括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经过不断扩张，以文化为核心把其他许多不同的族群同化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共同体。严格地说，不能把汉族放到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同一个层次上来进行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族群融合历史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费孝通教授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章，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当然，今天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发展的条件与历史上族群交往的条件相比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所以，在中国建立民族社会学，它的知识来源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欧美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影响下其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及其民族关系的演变；中国

儒家和历代历朝的族群观及其处理族群关系的具体办法。这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融入我们这门新的专业方向之中，并朝着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民族与族群社会学的方向努力。

2. 方法论上的融会贯通。我们将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努力把各个学科的基本方法都汇集、结合在一起，摈弃各自的门户之见，对一切可用、有用的理念和方法兼容并蓄。在设计一个较大规模的课题时，就可以有意识地把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如第一步先作人口方面的研究，先把几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和所有的政府统计资料作一个宏观的分析，以便摸清调查地区人口的数量、地理分布、城乡结构、收入状况、经济结构等宏观情况；第二步选择有代表性的若干区域作为进行抽样户访调查的地点，设计的户访问卷中可以包括了家庭、婚姻史、迁移史、收入结构、消费状况、固定资产、外出活动、教育状况、生育情况、语言使用、交往情况等内容；第三步选择典型社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寺庙、企业、城市街区）采用人类学方法开展深入的社区调查。然后再用各个调查点上的具体数据和观察感受来解释宏观资料和户访数据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社会学的大规模抽样户访问卷调查需要人类学个案调查来作为补充，通过直接观察、实际感受来理解问卷中的数字。同时，人类学研究中常遇到、常感困惑、也经常被人们提出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你所选择的社区有什么代表性？即使所提供的—户、—村的调查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典型意义？通过抽样调查，再辅以人口普查的宏观数据，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说，我们选择的社区在整个研究地区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其地位与作用是什么？这样也有助于更科学地选点。结合几个学科研究方法的长处，避免单一学科研究方法的不足，取长补短地开展综合性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族群关系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

另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相关系数、多元回归、路径分析、线性对数分析等等，在一些方面其解释力比一般的定性研究要高。虽然在客观过程中存在很多因素，但把它们定量化之后，它们是如何影响族群关系的，完全可以用数学作精确的说明。这些方面可以加强我们对数据的把握，确定我们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加强这些调查数据的解释能力，配之以社区调查获得的感性材料，加深我们的认识。

无论从理论的地域涵盖面上，从理论的伸展上，还是方法的多学科结合上，在我国进行“民族与族群社会学”学科建设有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本读本作为西方经典文献的汇集，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选编，也是学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本读本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是由选修我的这一课程的两个班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1991—1992学年的第二学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89级的李建东、王麦玲,90级的纪秋发、曹建春,91级的丁麒麟、吴晓刚、张时飞、廖荣天、付喜国、梁雪峰、刘京雷、汪曼、马朝东、张弘平共14名研究生选修了我开设的“民族社会学”课程,作为课程作业的一部分,他们分别承担了各篇的翻译工作。1993—1994学年的第二学期,社会学系92级的李勇、俞家栋、彭庆恩、李平、王勇,93级的王宗凡、王荣武、谢桂华、张绍、王俊敏、薄伟康,地理系93级的张永共13名研究生选修了“民族社会学”课程,他们分别承担了各篇译文的校对工作。有3篇后来补充的文章,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95级博士生刘能、蒋力蕴、赵旭东和河北大学进修教师许身建进行翻译和校对的。这本读本今后将作为民族与族群社会学课程的参考教材之一长期使用,我对所有在翻译和校对工作中付出心血和劳动的同学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书的第一版1997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来与国外的文章版权所有者联系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许可权。在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被许多大学用作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并很快脱销,证明还是我国民族和族群研究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所需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初版之后12年以《读本》的形式重印此书,以满足读者的要求,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可惜现在的翻译版权很难再得到,所以也没有考虑近十年来出版的最新文献,但是当初选编此书时即是从最有影响的经典文献中精选的,这些文献至今仍是西方大学族群研究专业的必读内容,所以对我国的研究者和学生来说,依然有其参考价值。

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也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中国在21世纪能否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发展的态势,与我们能否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开阔视野、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来指导我们的民族关系研究,同时也需要以一种开放的胸怀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在思考和处理本国种族和族群问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本《读本》的出版与我前几年编写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相配合,我想是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来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的。

参考文献

(按中文姓氏拼音、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约翰·富兰克林,1988,《美国黑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戎,1989,《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马戎,1993,《导言》,潘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5页。

马戎,1997a,《美国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马戎,1997b,《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98—532页。

斯大林,1912,《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358页。

Connor, W.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an, F. and W. Frisbie, eds. 1978.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lazer, N and D. 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M.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chter, M.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rowitz, 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 Rong, 1987, "Migrant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Rural Inner Mongolia", Ph. D. Dissertation at Brown University.

Taeuber, K. 1980, "Negro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rends and Measurement", Pettigrew, T. F. ed. *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Ben-Tovim, et al, 1986,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Local Struggles for Racial Equality", Rex, J. and D. Mason, eds.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pson, C. E. and J. M. Yinger,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Waters, M. C. 1990, *Ethnic Op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anden, J. W. V. 1983, *American Minority Relations*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关于族群研究¹

N. 格莱泽 (Nathan Glazer)

D. P. 莫尼汉 (Daniel P. Moynihan)

“Ethnicity”(族群)似乎是一个新词汇。在我们所使用的“族群特征”或“族群素质”的意义上,1933年版《牛津英语词典》还没有收进该词,1972年,“Ethnicity”才首次出现在该词典的“增补”部分中,在“增补”部分记录了这一词汇的最早使用者是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他在1953年曾使用过这个词汇。1961年,“Ethnicity”被编进《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第三版)》中,但该词没有被收进1966年兰德姆·豪斯版《英语词典》和1969年版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中。但1973年版的《美国传统词典》收入了该词条,并将其定义为:“1. 属于某一特别族群的状况;2. 族群自尊心。”从某种意义上说,“Ethnicity”的词义仍在变动。上述第一个定义很适合我们的用法,即它表示一种客观状况。然而它的第二个定义表示的则很明确是“自尊”这种主观心态。“Ethnicity”的现在的意义与它过去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如同《牛津大词典》中所注废弃与罕见的用法:“heathendom(异教徒或异教风俗信仰); heathen superstition(异教的迷信)”之间有意义上的差别一样。无论如何,有关词义的变化仍在继续。

所有上述东西都可能促使读者发问:这个“新”词有什么用?由社会学家设定并使之流行的任何一种概念分类都要受到某种程度上属于脱离实际的假定的干扰。“Ethnicity”有什么新的含义吗?或者它只是一种说明旧东西的新方式吗?它在描述世界时是更精确了,还是仅仅调和争端,从而使模糊的东西更加

¹ 本文译自 Nathan Glazer 和 Daniel P. Moynihan 1975 年主编的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的第一章,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同意,谨此致谢。

模糊？它是洞察力的结果还是一种迷惑人的手法？这本书的读者就很可能对这一词汇对于下列各种现象的应用性提出疑问，例如，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之间存在的心理差异；美国的黑人政治；尝试在统一的加拿大人为说法语者寻找一个满意的地方的努力；有限度的然而又是灾难性的比利时佛莱芒人和瓦龙人之间的冲突；苏联急速发展的民族问题；印度的语言问题；中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秘鲁印第安人与混血儿的地位身份问题；以及非洲的部落们被招募组成现代军队所带来的严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似乎到处可见，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一个简单的词汇对研究这些现象有帮助吗？基于它们的本质，把这些不同的现象描述为语言的、民族的、宗教的、部族的、种族的等等问题，会不会更好呢？把古老国家的问题与新生国家的问题分开，把发达国家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分开，把多民族帝国问题与单一民族国家问题分开，会不会更好呢？事实上，古老人类的特征和情感不正是在这些现象中表现出来吗？在这些新的场景中，人类的特征和情感有任何新的变化吗？这些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真正想面对的问题？

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总之，我们的观点认为：一些新的东西已经出现。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新现象提出一定的理论解释，并提供一定的具体说明。这本书是许多人的文章组成，他们并不赞同本书编者的观点。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中做出结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现象非常新，而且我们自己的知识无疑又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并不要求读者最终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确希望打开思路，让人们去思考，这里确实有一种新东西。19世纪早期的人们会读到一种观点，即工业化塑造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对接触到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对社会阶级一直存在并且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谋生方式这样的思想不屑一顾。然而，当他们真正这样做时，他们就会忽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事实。类似地，我们感到如果仅仅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族群问题存在的相似的东西，也就忽视一种新的社会范畴的出现。这种新的社会范畴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就像理解社会阶级本身一样具有意义。因为在当代群体表现和群体冲突的杂乱的形式中，既有带共同性的东西，又有新的东西。在许多国家和许多场合中，那种明显而又迅速增长的强调群体差别和族群身份意义的趋势到现在一直存在；那种坚持从群体特性中衍生出新权利的趋势也一直存在。

尽管各个群体和所处的环境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这种趋势一直很明显），尽管每个群体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有很大不同，我们还是有可能借助他们所共有的东西来探讨这些各种类型的群体要求和群体冲突的案例。理所当然地，每个案

例都出自于与众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且，正如同人类社会当中每件事都具有独一无二性一样，每个案例也必须被当作独特的东西加以对待。同时我们又深信必须对他们的共同因素进行研究。战后在许多国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已经导致了一些共同的社会环境。也许，人们已深感到了一直存在但直到最近才为政治和社会发展所强调的人类需求。仅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使我们进入了一系列的可能的研究范围。

此外，本书导论的另一任务是引进若干篇有关现有社会问题的理论文章，引进 11 篇有关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中这些问题如何具体表现的报道，从而提出本文所关注的当今民族身份、民族要求、民族冲突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深寓于人类需求之中，还是深植于新的社会发展中，还是深植于现代国家的特征中？如此等等。本书导论的目标（也是本书的目标）是有限的：不是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是提出一组不完整的理论；不是提供详尽无遗的资料来源，而是提供一份说明性的材料；它不是最终的裁决，而仅仅是一种提请人们必须研究这些现象的主张。

人们直到最近几年才认识到过去很少把族群关系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在这一时刻，我们的这种主张尽管有一定限度，但并不是不重要。这样，在我们寻找一个恰当的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回顾一些有用的工具书。邓肯·米切尔（G. Duncan Mitchell）的《社会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1968）虽然收进“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词条，但它并没有收进“族群”（ethnic groups）或“族群性”（ethnicity）词条。爱德华·拜伦·路透（Edward Byron Reuter）的出版比较早的《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 York, Dryden Press, 1941 年版）也是如此。乔治·A. 西奥多逊和艾基利斯·G. 西奥多逊夫妇（George A. and Achille G. Theodorson）主编的《现代社会学词典》（*A Moder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9）虽包含了“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但只反映了该词的一种较老的用法（“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然而，我们现在不是愈来愈倾向于把“族群”一词运用于任何一种具有独特文化传统和起源的群体吗？即便这个群体是一个国家中的主要族群。在美国，我们愈来愈倾向于把老美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即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看成是一个族群，用旧称呼“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缩写）来称呼他们，但因其与 Wasp（黄蜂）拼写一样，所以有时候用这个词来开玩笑。

但是，关于“族群”的~~以上定义都不是~~公认为通行用法，甚至在本书中也不

通用(见奥兰多·帕特森 Orlando Patterson 的文章)。在由朱利叶斯·古尔德 (Julius Gould) 和威廉·L·科尔布 (William L. Kolb) 精心编撰的《社会科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中, 梅尔文·杜明 (Melvin Turmin) 采用了更为严格的用法: “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 根据其所展示或据信展示的族群综合特征所要求或被给予的特殊地位。”我们认为, 社会科学家事实上拓宽了“族群”的用法。族群 (ethnic group) 不仅是亚群体和少数民族, 而且泛指所有的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这反映了近几年有关“族群性”(ethnicity) 所采用的较为宽泛的定义。

我们认为, 这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反映了人们对族群的一般理解上的转变。以前, “族群”仅仅被看做是从较早时代幸存下来的群体, 他们在烦扰、宽容的态度中和适度的庆典中被分别对待。现在我们愈来愈感到了“族群”可能是能够更新改造自身的社会生活形式。也许, 那种希望社会中亚群体能够被同化和融进主群体中而忽视族群自身的想法就如同在社会中希望忽视社会阶级一样, 是一种乌托邦, 是一种值得质疑的思路。

这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主张。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么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许多激进甚至自由主义的教条就都错了。为了避免误解, 再重复最后一次: 尽管我们猜想事实是这样, 但我们不宣称它就是真实的。由于我们预期到关于“族群”在社会中的意义, 我们再明确地强调一次: 我们既不欢迎也不为此而哀叹。几年前, 当玛格丽特·富勒 (Margaret Fuller) 宣布她接受宇宙时, 卡莱尔 (Carlyle) 评论说她应该这样。我们认为, 不论这个观点有什么样的意义, 也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的目的。自从首次我们合作写《超越熔炉》^①起 (一项纽约市民族群体研究), 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一点, 至今已有 15 年。在《超越熔炉》所发表的年代, 民族群体在理论上被假定将要消失。

我们认为, 一个新词反映的是新的现实, 新的用法反映的是现实中的变化。这个新词便是“ethnicity”, 新的用法是把处于社会边缘、作为社会少数民族和亚群体的“族群”(ethnic group) 的用法上扩张到社会的主要部分。而那些边际亚群体和少数民族是一些期望被同化、消失, 或作为一个幸存者得以延续的、异己或有麻烦的群体。这种用法和语言可能是富有启发性的, 但还不是一种论证。我们可以考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让人们试图对既定世界中出现的新东西进

^① Nathan Glazer 和 Daniel P.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超越熔炉》),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1963, 1970.

行论证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来的,这个新东西被我们贴上了“Ethnicity”标签。

1. 基于对声誉、尊敬、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经济机会方面的追求,在各民族群体之间以及在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冲突究竟有什么新东西?首先,我们认为这些冲突近来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一直从事着十分宝贵的记载工作。他的记载可以回溯到法国大革命即他称之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增长的时期,他不仅记载这种族裔民族主义的增长而且记载其增长的程度。他在报告中指出,近几年,世界上几乎有半数独立的国家陷入某种程度的民族不和谐的困境中。^①虽然我们没有早期的参照点,但只要我们把一些已知的特别事件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族群冲突愈演愈烈。下述冲突可以作为佐证:加拿大亲英派与亲法派之间的冲突,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比利时佛莱芒人和瓦龙人之间的冲突,巴基斯坦孟加拉人与非孟加拉人之间的冲突,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冲突,塞浦路斯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冲突,苏联犹太人、其他少数族群与大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尼日利亚的伊博人、豪萨人、约鲁巴人之间的冲突。此外,我们还要加上美国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测量了总体的冲突强度,就没有必要去发现每个具体族群冲突已经变得无例外地更加强烈,而且有些冲突似乎达到了顶点(有时甚至是战争和暴力冲突),但自达到顶点之后,一些致力于民族和谐和一致的力量发挥了一些作用(如在尼日利亚和美国)。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巴基斯坦),冲突导致了分裂,然后,也许是随着巴基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后各自国内的族群矛盾的上升,两部分之间的紧张程度降低了。但是,我们认为,还不能断言过去10年或20年中族群冲突比大部分有见识的观察者所预期的要更加激烈。如果族群冲突的原因或起源不是新的,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它们冲突的程度、规模和强度确实达到了新的高度。

2. 大部分冲突群体之间的那些文化、宗教、语言以及政治关系等区分界限仍然能被发现。但是,这些冲突有什么根据被我们合法地贴上一个“族裔”(ethnic)的标签呢?我们认为这样的根据是有的。也许,寻找这些冲突的共同点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过去甚至是今天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预期,拿来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加以对比。在下面的一章里,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求助的是“自由主义的期望”(liberal expectancy),把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

^① Walker Connor, "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7 1 (1973), 1-21

区分开的各种类型的特征，在现代化了的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重要性和显著性，人们越来越强调的是后天的成就而不是上帝赐予的先赋，相同的教育和传播系统将会削平差异，国家统一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在此情况下，群体间先天性差异的意义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自由主义的期望”汇流成“激进主义的期望”，阶级将会成为主要的区分社会人群的界限，它将会抹去早期由于部族、语言、宗教、民族起源不同所形成的分界线；最后，阶级区分在革命后也将会自行消失。所以，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急切地对以民族相关联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过去的遗产（他们正是这样看的）作出反应，认为利益应该在社会行为中指导理性思维的人或驱动他们，而利益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在目前状况下，出现的一个新因素便是：今天的族群如同其他由利益所构成的群体一样在实行有效的利益追求，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追求比其他利益集团的追求更加有效。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各种方式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冲突相比较，我们时常惊异地发现，以族群为基础的各种方式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冲突竟是如此顽固和显著。

我们发现，现时状况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一定程度上，族群是作为一种利益群体而根据利益来加以定义的。过去的宗教冲突例如导致爱尔兰分裂的冲突是基于诸如宗教自由和允许公开活动这类问题之上的，然而今天，它是基于诸如哪个群体应当获得利益、或者掌握整个世俗社会权力这类问题之上的。语言冲突（如在印度）今天很少涉及对语言在公众场合下的使用权问题，而十九世纪的语言冲突很多就是这类斗争，例如，努力使沙皇帝国俄罗斯语化，努力使匈牙利王国马扎尔语化。今天，语言冲突涉及更多的是哪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得到哪一种工作。人们不该作出过于明确的区分，因为，当人们促进一种宗教和语言在公众场合的使用权力时，宗教和语言方面的声誉就介入冲突之中了。当人们提倡一个宗教的信徒们或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们拥有经济或政治特权时，宗教和语言的声誉也就介入到冲突之中。然而，很明显，这些类型冲突的重点已经转变，已从强调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转向强调群体成员更为广泛的利益。

要了解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还相当不容易。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一章中采用戴维·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的一个词，谈到族群的“逆社会化”（desocialization）概念：美国每个族群的文化内涵似乎已经和其他族

群相类似,但是他们对族群的情感认同的重要性依然如旧。^① 这方面,“自由主义的期望”是对的;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已经被现代社会的环境和制度磨灭了;但是,由于每个族群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些族群有区别地被置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位置,结果,族群可能成为追逐群体和个人利益的动员中心。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也许可以冒险作出这种假设:族群冲突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利益冲突的一种形式。^②

我们认为,说明这种发展的相关解释有两个。首先是世界发达经济体系中福利国家的发展以及不发达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在这两类国家中,政府成为经济以及从经济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性的和直接的主宰者。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能或者不能长久地代表那种人数多而又松散聚集的诸如“工人”、“农民”、“白领雇员”这类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这种利益和要求通常过于一般化,而不能使这些群体的成员感到满意。即使政府按其要求做了,其利益的分布也必然是分散的,常常很快消失。例如,工资的全面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把每个人抛回到原来的状况。作为一种有效的策略,维护利益的要求必须是非聚集化的,是为那些规模足够小的群体提出利益要求,这样的要求才能够使对方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同时这样的小群体也能够从这种妥协中得到利益。那些表示要“为工人们做些事情”的英国首相很可能做得并不够,可以肯定地说,他为自己的党做的工作要比为工人做的工作还要少。然而,为苏格兰人做些事情则成了一种越来越有吸引力和越来越现实的政界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可以找到为苏格兰人做些事情的资源,而苏格兰人对这些为他们做的事很容易了解到并把之视为实际利益的取得,这会影响下一届的选举。政界人士能够以这种方式赢得选票。我们这个时代族群关系有个非常显著的特性,族群关系本身极易和民主政治系统牵涉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决定新崛起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机器”中哪部分是最具有进攻性这一方面曾陷入困境:是坚持政府慷慨让步如何分配的问题,还是应当在其中引入民族群体的因素作为一项分配原则。在维护利益要求方面渐渐遇到了有效策略问题)。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族群要求表现得特别敏感。这是到处都能遇到的问题:印度的部长向他的议会保证,“穆斯

^① 在这篇文章里,只有 20 多岁的 Nathan Glazer 认为,美国的族群正在成为幽灵式国家。在他的脑子里有一种类似于 Mon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和 Charles H. Page 等人在其合编的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和控制》,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1954, pp. 158—173) 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美国的族群正在从族群文化走向意识形态。”

^② 这个观点是由《超越熔炉》一书的编者提出来的。

林、基督教徒和其他少数族群”都将享有正当而应得的铁路工作；捷克政府选择一个斯洛伐克领导人；新加坡华人总理选择一个印度裔外交部长，如此等等。^①

把族群问题作为一种反对政府和维护利益的有效策略，由于依靠政府把族群范畴作为分配报酬的基本方式，从而似乎极易给自己造成相反的后果。最富有戏剧性的莫过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所采用的措施，在那时这种措施被一些人宣称为讨厌的和非法的。1964 年的民权法案是对“自由主义期望”的具体化。“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民族血统”等所有这些先赋的范畴都被宣布为“非法”（outlawed）。这些早期的侵犯性词语不再用于对人进行分类，政府尤其要戒除肤色分别。然而，在法律颁布的时限内，为了推行这一法律，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要求得到有关种族、肤色、性别这些分类群体的更为详细的统计材料（职业培训者，幼儿园的孩子，幼儿园教师，大学教职员，重要机构的秘书）。我们的这些统计似乎还没有涉及宗教和族裔起源领域。美国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申请表格则这样说明：“如果你是个少数民族的成员，说出这一点对你的申请将会有利。”这个问题是个模糊问题，无论回答是或否都会导致申请者族群身份的传播开来，又有谁知道哪种回答对于申请者更有利？按照哈佛的意图，天主教徒算是一个少数民族吗？葡萄牙人呢？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和剑桥市，就有一个未被“机会均等办公室”（equal opportunity offices）发现的葡萄牙人社区。战后，政府忙于把种族和宗教的所有参考资料全部从官方表格中清理出去，甚至禁止大学在接受新生时向申请人要求提供照片。这种不希望这些先赋特征被社会机构所了解的期望很快被关于提供这些特征的要求所取代，因为他们的特征不仅要被了解，而且有关统计要被用来检查各种机会的分配是正当的。为了偏态分布不会发生，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族群配额。外表上（公开地）设计用来防止歧视的国家社会政策手段不可避免地超出了有利于那些假定受歧

① 各群体的领导人意识到，迫使政府接受其要求的政治技巧是变化的，他们有时公开讲出他们所关切的事务，正如美联社发自洛杉矶的一则报道所说的：

美国的亚裔人贴出广告：亚裔美国人社区领导人谴责美国劳工部在分配联邦基金时，利用亚裔人缺乏政治经验用政治手腕来排斥他们。

一位华人社区委员会领导人，某小姐这样对记者说。

“我们亚裔人，一直总是一个温和的少数民族。我们总是个温文平和的少数民族，我们总是被看做是受补助的，但是我们得到的总是面包渣。”

这位小姐指的是有关职业援助项目的 314 000 美元联邦基金的分配问题。委员会领导人谴责美国人力区域计划委员会的权力人物把基金全部分配给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群体“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项目计划建议是由专业人员制定的。

并非所有美国的亚裔人都富裕。但是在人口普查结果中，华裔和日裔美国人依照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再出现在美国种族群体排序的顶端。无论如何，亚裔这样的要求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

视群体的利益的正面效果,这类事例已经在不断增加。

法律也开始反映出这种新策略。一个小例子是:1970年的《滥用麻醉剂训导条例》(Drug Abuse Education Act)为来自与病人相似社会、文化、年龄、民族以及种族背景并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了使用权,他们的工作对象是这些治疗项目所要服务的人。换句话说,联邦政府不仅要了解不同类型的滥用麻醉剂的独特的民族模式,而且要把治疗者和病人匹配起来:阿塞拜疆族吸毒者,阿塞拜疆族管理人员。在民间医药的各种变化中,一般认为无论在哪儿发现一种疾病,总有相应的药品存在。不可否认的是,法律为社会服务拨出上百万美元,而这些钱最终又重新回到分配这些钱的人的口袋里。这些分配钱的人可能集中于特定的族群中。这也许是胡说,也许不是。如果政府通过提供特别的治疗方式为一个群体服务,那就可能用把照顾、资助集中在同一个族群或几个族群的方法来对这些族群实现特殊的优惠。

我们一直认为,有两个相关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族群冲突已经成为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利益冲突得以展现的形式。第一个理由涉及人们在对现代国家的资源提出合法性要求时,要遇到族群的有效策略问题(作为民族冲突本身,这主要是内部问题。但是当像在联合国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政策也被讨论时,有时族群要求也在联合国讲台上提出并造成影响)。我们的第二个理由是导致这种族群要求的社会动态并考虑这些族群不平等的事实及其性质。人是不平等的,族群也是不平等的,他们应该不平等还是应当平等,当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人要把世界描述成事实上的样式,他就必须对各地的处于社会阶层系统中不同地位的人进行描述,在这个社会阶层系统中,一个人可能比别人境遇好,也可能比别人境遇差。这是个经验性的事实。这对于由民族身份决定的社会群体,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以及对个人都是普遍适用的。至于不平等的起源,我们可以援引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①他认为,不平等起源于遵从社会准则的程度上的差异。他这样解释个体不平等,我们把他的观点运用于群体不平等。他的观点是:每个社会都要建立规则,这些规则是从社会价值规范的体系中选择出来的。人类在考虑哪些属于可取或不可取的特性上似乎有无穷的独创性。一件美好的东西既可以被认为是丰富的,也可以被认为是贫乏的;可以看成黑暗,也可以视为光明;可以看成是慷慨大方的,也可以看成是一毛不拔的;可以看成是宗教的,也可以看成是无神论的;既

^① Ralf Dahrendorf,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 in Andre Beteille, ed., *Social Inequality* (《社会不平等》),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可以是爱热闹的,也可以是郁郁寡欢的;既可以是乱交的,也可以是贞洁的。然而,一旦有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评判标准被选择决定之后,个人及民族群体在获得所希望的状况的成功程度是不同的。在一个推崇丰满身材的女性的社会里,人们同情体质瘦小的人;在迪奥时代(Age of Dior)和工装裤时代,人们同情胖女孩;在非常尊重白人的罗得西亚,同情那里的黑人;也同情乌干达的白人;同情不丹的那些尼泊尔人,他们结成团伙从事建筑业劳动,当地有土地的农民则藐视他们这种奴性的行为;同情在马来西亚的那些面临着勤劳中国人的竞争的马来人。一位缅甸人在向本书主编之一介绍曼德勒地区时这样评论道:在独立前印度人和中国人已经拥有这里的全部土地了,“你们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搞社会主义吗?”他的意思是要通过此举来驱逐那些追随英国人而来的(异族)定居者。

达伦道夫认为,个人遇到了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规范,而“制裁又被制定了用来加强这些规范”。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好些并获得了奖赏,有些人则受到惩罚。这是一个形成成功者与失败者的群体(阶级)的动态过程,同样这也是群体形成并有助于进一步组织他们的过程。达伦道夫清楚地预见到:“规范选择总是涉及歧视,它不仅歧视那些社会学意义上偶然在道德方面犯罪的人,而且还反对那些可能阻碍他们的管理者去强化已建立价值规范的社会职位。”

这是些什么样的社会职位呢?也许欧洲人首先想到的是社会阶级地位。伊莱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就属于一个社会阶级,处于这种社会阶级地位的人不学习上流英国社会的发音。而只有在教给她这些礼貌用语时,她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花店。但是一个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许多人很可能把这种糟糕的发音与族裔联系起来:这些外来移民的第一和第二代人在讲英语方面有困难,他们的语法和发音模式在以后的几代人中也将长期遗留下去。“Where d'ya worka, John? On the Delaware Lackawan.”类似地,欧洲人可能把财富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倾向于把财富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对一代人以前的纽约贫民窟的儿童来说,“犹太人”就是“富人”,而这种观点至今还保留在贫民窟中。达累斯萨拉姆、新加坡、圣保罗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人们对这种特别强有力的社会事实的认知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为了满足新出现的并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多或少被严格限定的,通常是有组织地从世界的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的流动造成了当代世界中这么多的族群混居的局面。18、19世纪的种植园经济把非洲人和亚洲人移到地球最远的区域。其他经济力量引导大量欧洲移民移向西半球、亚洲和非洲。移民并不是新事物,但移民速度是新事物。北非

同化了汪达尔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迁移到这里已经有许多代了;而法国人19世纪突然到此,却从未被同化,结果在流血的民族内战之后,他们被赶跑了。无数事实表明:当许多族群被突然抛在一起之后,他们就设法互相对付。

这里规则开始起作用了。社会群体内有许多规范,一些个体要比其他个体更善于遵守这些规范,而另一些个体则不精于此道。但在不同族群之间,各群体从社会规范的全部可能性中做出十分不同的选择。一个群体的规范很可能与另一个群体的规范不同。这样,按照自己群体的标准,属于成功的个体,在另一个群体的标准下是失败者。在有一个族群占主导地位的族群混合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群体的规范被看做是普遍的,即不仅仅是该群体的行为与价值规范,而且也是其他族群所必须遵循的规范,这种情况自动地把其他群体放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群体可能发现他们相当擅长于遵从占主导地位群体的规范,甚至比制定这些“法律”的群体更擅长。这种情况随处可见:一些规范被愉快地接受,另一些规范则遭到激烈的反对。非洲人是商人,印度人也是商人。在肯尼亚,印度人明显地比非洲人在商业上成功;因此印度人被驱逐了。犹太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类似的经历,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同样。那么什么样的群体没有这种经历呢?当然,在有些国家中没有哪个群体能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状况下,不同规范之间互相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会使得社会不平静,而且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始终心中有数:哪一种规范会在竞争中成功,而哪一种会失败。

为了建立族群理论,我们提出了这些主张。这些主张遵从于经验性检验,我们相信,下面各章从许多不同的背景中提出了带有启发性的证据。在美国,不论怎样,与这一“理论”相关观点都是由那些天天处理族群问题的人提出的。我们考察过一位“军队机会均等项目”(Army Equal Opportunity Programs)负责人,一位美国陆军上校在一封信中说的一段话,这封信登载在1974年3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后来由美国内务委员会分发:

“作为一名黑人,我不认为,号召采取行为纠正种族不平衡将导致反方向的歧视行为这种说法是公正的,或者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先检验一下种族歧视的含义,在检验之后再使用“反方向的”这个词。请接受一种可操作性定义:种族歧视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在那里,一个群体制定规则,其他群体必须按照这个规则行事。在这个国家里,白人多数群体与少数族群间一直是这样一种关系。此外,在美国维护这种关系的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一直属于白人多数群体。”

海莱因(Herlein)在社会系统中加入了动态因素。达伦道夫写道:不平等

“的作用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延续”。这是因为“不平等总是意味着一个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而获得利益，因此每个社会阶层系统中都会出现对这个原则的抗拒，都会包含这一系统进行镇压的种子。”也许，没有必要断言社会分层的每一个系统都导致对其原则的抗拒。有些分层系统也许没有导致这种抗拒，但我们在20世纪遇到的绝大部分社会分层系统似乎都导致了这种抗拒。这就是说，如同期望的那样，人们提出不同规则系统，斗争出现了。变迁发生了，并非是偶然的情况，这些变迁时常对过去不成功的群体是有利的。他们所擅长的东西被贴上了“好”的标签。这至少是这种斗争的典型目标。

这里，作为一种组织原理，我们再来看看族群的有效策略。不同群体有不同规范。那些不成功的群体如果能够作为一个群体而采取行动，那他们自然有改变既定社会系统的最好的机会。正是因为是作为一个群体，它的斗争才不仅仅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才不仅仅是反对一些其他群体的规范而是要支持业已建立起来的自己的规范。作为一种组织性原则，社会阶级的困难之一，就是在大部分社会阶级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规范冲突。在西方，处于社会分层顶端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对社会底层和中层之间的价值观的不同产生幻想，总是注重社会底层的价值观，但结果时常证明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对于什么是合意的、什么是不合意的看法与社会中层的群体十分相近。然而，族群差别就是差异，至少是被看成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族群差异将会消失。为什么在地球上当一个人可以成为工人时他会希望是个波兰人？但还是有一个或若干理由，人们希望成为波兰人。指出这点主要是说明作为一个波兰人、作为一个锡克教徒或一个混血儿常常连带着明显的有利或不利地位，保持波兰人、锡克教徒或者混血儿的身份正是一种捍卫其利益或克服其不利处境所经常使用的有效手段。

有些个体作出其他选择，他们脱离自己的族群（或者社会群体或者宗教群体）进入其他群体，典型的是进入能提供较大利益的群体。这种同化的过程是相当强有力。在美国很可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过程。美国人越来越“美国化”而越来越非族群化。但是他们在参与这一过程时可能同时也更“族群化”。这是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他们甚至把名字改成“blacks”，以表示其与众不同的新主张）。其他群体也追随他们，与他们并驾齐驱。作为对这种运动的仿效，这也是一种全球各地同时经历着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任何一种仅仅根据局部因素所作的解释都是不会长期令人满意的。有些更重要的现象仍在继续发展，这些现象如此重要，以致达伦道夫近来提到“再封建化”一词，与后天获得的成就相比，同样作为社会分层决定因素的先赋性特

征又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很可能，民族问题仅仅是这种较大发展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而达伦道夫以忧虑的态度让人们关注这一发展这一点，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在这里只是尝试性地进一步提出有关民族现代性的设想。达伦道夫注意到，从洛克到列宁，两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一种善事或恶事的源泉，作为一种或存或废的原则，财产决定了社会的和政治的思想”。然后他继续说道，在像前苏联、南斯拉夫、以色列这些国家的社会里，私人财产一直是被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社会分层（阶级）仍然存在，甚至更复杂。我们还要指出，新的社会分层很大程度上与族群相关。可能情况始终是这样，但是由于人们专注于财产关系方面而忽视了族群关系。一般的，族群关系可被看做财产关系的派生物，或者是前契约时代的残存物。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毫无希望地（或者说显得是没有希望地）斗争着以争取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之间获得一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平等的生活标准；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国内警惕注视着“东方”犹太人之间“社会阶级地位”差异的延续。当华盛顿的乌克兰人在苏联大使馆门前集会抗议，当莫斯科犹太人要求被允许移居以色列时，大俄罗斯人却在前苏联空谈族群平等。这里财产似乎成了派生物，族群似乎成了最基本的分层根源。这是为什么？再说一遍，我们的假设是：族群带入不同的规则，在共同的条件下他们成功的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地位方面就有了群体差异。这种现象在财产关系变弱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很明显，而在财产关系被废除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很明显。这里要谨慎。由于这些问题的量化研究开始提供一些数据，这些资料肯定将会告诉我们，对于全体南斯拉夫人来说，他们具有共同性的方面远远超过不同的方面，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说，克罗地亚人似乎不知道这些“数据”。

总之，共产主义国家对民族问题的关注胜于对其他问题的关注。这很可能是因为民族的现实情况与马列主义的理论十分不相符。在苏联有许多官方认定的民族，每个达到 16 岁的公民必须要选定一个民族成分，他终身都要保持这个身份。带有汉族文化特征的中国人发现自己相当重视少数民族。最近发自北京的一则消息，读起来令人吃惊，就好像是份新政治时代的美国政党报告：

“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人数越来越多。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自治区和云南省自 1969 年中共九大以来已有 143 000 名少数民族成员被吸收入党。他们包括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壮族人、回族人、朝鲜人、哈萨克人、瑶族人和苗族人。新党员大部分是工人、以前的贫下中农或者牧民，还有一些

革命的知识分子。新党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许多少数民族新党员是被解放的奴隶或农奴,或者是以前奴隶和农奴的儿女。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新社会,憎恨旧社会。”

值得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有一颗大星四颗小星,它们代表汉族和四个主要的少数民族。

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宗教、语言、具体文化差异作为依恋和关注的特别焦点,据我们判断,至少在西方衰落了。但是由这些文化特征定义的种种群体通过社会结构被放进不同的社会地位。人们可以说,这些特征的旧基础,即使当它们的文化特性也已经被现代的社会潮流所修正,它们也越来越只表达象征意义,不过,它们仍可被用来作为动员的基础。基于宗教、语言、族裔起源差异所有这些社会现实中的认同形式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在追求规范性时就用新词“Ethnicity”来表示。^①他们所共有的东西是,他们都已成为具体政治目标而进行群体动员的有效焦点。这种以民族为基础的群体动员是对阶级动员和国家动员的重要性的一种挑战。在现代社会,阶级被认为是进行群体利益动员的焦点,它直接与社会的理性特征有关,与产生不同利益的方式有关。国家是可以用来动员群体利益的又一重要焦点。我们并不认为,这些(阶级、国家)不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主要范畴标准,但是我们必须加进“族群”,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利益动员的主要焦点。这个主张对希望强调阶级优先和希望强调国家优先的人来说是十分头痛的。

3. 族群是否超出仅仅作为一种简单的追求利益的手段?我们有必要对把族群看做是促进利益的手段的主张进行修正。族群的确是一种促进利益的手段,但需要坚持的是:它又不仅仅是促进利益的工具。族群成为现代社会中追求利益的一个有效手段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涉及的超出了利益的范围。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所写的那一章里谈到:“族群已经比阶级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它把利益与情感纽带连结起来。”而另一方面,阶级这个“曾经一直被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现已主要成为一种利益了。”

这种超出利益范围的东西是什么?情感纽带的源泉是什么?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在他写的那章中谈到基本群体身份形成的原因。他的分析直接处理了例如身体象征(body image)等各种事件。很明显,语言以及直接被传送、模仿的文化在促使民族与情感和利益的结合上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 -

^① 有关此事如何发生的详细报道和分析,请参见 Michael Hechter, "The Persistence of Regionalism in the British Isles, 1885-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5 (March 1974), 1151-1178。

个快速变迁和身份认同迅速转换的世界上,我们倾向于避开任何一个“原始的”固定的概念,因为它们反对任何理性利益,正是这些基本纽带和联系创造群体。原始概念的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究竟知道有多少从事于初始冲突的群体他们本身恰是最近历史的创造物呢?对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的依恋或者对任何一个群体的强烈依恋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偶然性条件呢?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人们应该抵制那种把人分成固定的各部分或单元的作法,也不应认为在这些单元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和冲突,因为那不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东西。即定群体成员在不同的形势下可能遇到多样化的环境,的确导致了相当不同的结果(见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本书中对牙买加、圭亚那华人的不同命运的分析)。

我们试图解释族群身份的持久、恢复和创造过程的两极分析方法,似乎一直在我们称之为“原始主义者”和“条件主义者”之间摇摆不定。“原始主义者”的观点是:“人们被这样或那样划分为群体,被划分的理由深植于历史和经验之中,统治社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考虑这些东西”;“条件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怀疑任何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划分,我们寻求特别的、直接的环境来解释群体为什么要维持他们的身份认同,探究族群为什么会成为动员的基础,为什么有些情形是和平的而另一些情形则充满了冲突。”

我们一直在这两种立场之间选择我们的立场,这似乎有些不容易。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把族群颂扬为人的基本属性或特征,人的基本属性即使受到压制也总有再起的时候,把族群看做是人的基本属性的立场是宣传家的立场而不是分析者的立场。我们也不把族群贬低为在通往理性社会道路上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东西,在一个理性社会中,所有这些过去的遗产都将与社会和政治行为无关。

作为一种政治观点,作为一种动员原则,我们这个时代的族群问题传播到全世界,伴随而行的是它和其他现象遭遇后所产生的相同的或不同的难以理解的结果。一个共同的词汇被应用到广泛不同的条件下,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结果。例如,在美国,黑人中间首先提出的是要求公民权,然后是要求机会均等,最后是要求一些参与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均等权力。所有这些要求,依照美国独特的历史,是能够被理解的。但令人吃惊的是,黑人的要求和黑人的组织在美国其他族群中找到了反响(拉丁美洲人、美国印第安人、东方人甚至其他白人民族群体)。每个群体的处境是不同的,有些是已经被征服的,有些是从殖民地迁移进来的,有些是从自由国家里来的,有些已经遇到了现实中的偏见和歧视,其他遇到的则仅仅是在这个新国家的诸多不便。被动员起来的族群

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要分别满足个人的愿望:界定个体身份,提出各种组织的形式和特殊要求,也许还通过政治程序对族群差异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区别对待(虽然这仍是最不清楚的)。我们并不断言,存在与每个个体身上的一些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苦恼可以随时被唤起。我们并没有提出族群可能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主人公父母亲的身份,必须要查清这一身份,以免一些难以预料的不幸接踵而来。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许多群体中出现的族群认同的新强度仅仅是模仿黑人的问题,或仅仅是防御性模仿的问题。需要与模仿的某种结合似乎才更接近实际。

黑人运动在国外犹如在国内一样有着令人吃惊的反响。“黑人权力”运动在西印度群岛发展起来,“公民权力”运动在北爱尔兰、“黑豹运动”在以色列形成,一些法裔加拿大人抱怨说他们是“白种黑鬼”。当我们再一次考察那些影响生活在不同场景中的各个群体的现实问题时,只是说我们借用的要超出一个名词-一个术语是没有用处的。在社会问题中,正确的名称、正确的术语不仅仅是专业词汇。名称提示一种状况比较,它可能提出一种类似的政治过程,它可能预示一种行为方案。法裔加拿大人并不需要美国的黑人教育他们说,他们是被征服者,说英语的人统治着他们的国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不需要黑人的榜样,与美国黑人的痛苦相比,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痛苦可追溯到更远的历史年代。以色列东方犹太人也不需要黑人来提醒他们,他们的地位出现了差错。每个案例中都有引起怨恨的理由,但是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通过遍布世界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他民族的榜样起着一种教育作用。

信息的交换很少是单向的。对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民来说,结束英国统治的斗争一直是自身民族塑造的主要源泉。这个源泉无疑由于广泛的创造性而被各种不同地方的案例所采用,同时它又是英国威信的扩大和反英国威信的后果(威信现在主要是转移到了美国)。美国民权运动公开地和明确地采用了20世纪在印度发展起来的一些手段。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当前存在的城市恐怖主义活动,就采取了19世纪爱尔兰人发展出来的一种抵抗模式,这种抵抗模式至今仍存在于爱尔兰(北爱尔兰的民权运动持续了几个月,很快爱尔兰共和军重新活动起来,奥伦治会(the Orangemen)也是如此;原始的斗争继之又起,除为了更方便而使用塑料炸弹外没有什么改变)。在旧金山发布反对越轨革命者的命令的地下组织的“指挥官”们只是在重演1916年都柏林的戏剧。北非人也采用了这种技术,或者他们就会自己发明它。一位意大利人拍了一部电影,名叫《阿尔及尔之战》,很快,旧金山的人们就扮演了《告密者》中的镜头。我们这个时代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暴力,这样斗争方式的交换便开始了。我们相信绑

架是巴勒斯坦人发明的,但是美国黑人、居住在瑞士的克罗地亚工人、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持不同政见者却一直在使用它(我们在这里仅仅举出一些为民族利益采取行动的例子)。

我们注意到了在唤起民族要求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有效策略方面,福利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国际经济发展导致17、18和19世纪规模宏大的劳工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创造了许多个族群国家。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历史上西欧从来没有像战后那样引进那么多外国劳工。一种新的有色人种的人口,如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加入进了英国。瑞士三分之一的劳力,德国八分之一的劳力,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的大量劳力都是由外国劳工组成的。这些移民浪潮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法律规则和条件:有些永久性移民有着所有的公民权,诸如英国的有色人种群体。有些移民是来自邻近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他们在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享有的所有的社会利益。有些人在特定安排下来自于以前的殖民地(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但是许多人(例如德国的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通过许可证进入他们工作的国家,这种许可证至少在理论上不给予任何永久性居留的权利。在其他案例中(如瑞典),政府以平等主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新来者,无论他们是意大利人还是芬兰人,一般说来,在社会利益上都受到同样关注。虽然我们到处都能看见两种不同的冲突方法,但冲突模式还是多种多样。一方面,通行的平等主义哲学主张所有人都应该一视同仁,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同样适用于去那里工作和定居的外国人;另一方面,西欧人已经意识到,来自其他民族群体的新的永久定居者意味着族群冲突。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打算避免它。对大不列颠来说,这已经太迟了,它的有色人种人口是拥有所有公民权的常住居民,他们在重要性上已经远远超出它占总人口2%的比例,并构成了英国的一个政治问题,进一步的移民实际上已被遏制。虽然,法国的北非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有德国的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不是公民,但人们关注他们是否在实际上已成为这些国家的较次要的永久性居民。人们看到了社会公共问题的发展——在有关上学、住房和就业方面的冲突。通过移民而形成多族群欧洲国家的过程,依据这一过程自身的内在逻辑可能被减缓。因为福利国家对它们的公民很慷慨,因此在对待接纳什么人为该国公民的问题上小心翼翼。人们现在正感到近期大批移民的后果,人们想知道欧洲国家的新的族群多样性是否能真正通过大批驱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方法可能是合法的)。不管怎样,这种选择是存在的。

在主要的国家里,几乎只有美国继续大批地接受永久性移民。此外,与过去的移民相比,这些移民有着相当不同的血统。新移民中有许多亚洲人,这些

新移民在空前高的比例上属于有职业专长的中上阶层的人。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小群体获得政治影响的过程（这是至少十分成功的早期两代人已开始的过程）可能因为这些新移民的到来而加速。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很少被涉及，它既没受欢迎也没受挑战，而是被简单地忽略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移民的过程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过程支配美国选民区的族群构成，外交政策对那种族群构成作出反应。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也对其他东西作出反应，但是很可能首先对族群状况的主要事实作出反应。在多族群社会中常常有着互相抵触的族群效忠，我们的历史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例证。而且在近期没有明显和简单地改变外交政策的迹象。当来自朝鲜、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移民要公开宣称它们自己的利益时，我们在未来将会记下更多类似的族群冲突，外交政策也将受到各种不同复杂方式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国务院总是完全忽视这种移民过程。移民政策是外交政策，这个道理对美国国务院来说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想法。然而很多西欧和其他国家可能会成功地保护自己而不受 20 世纪民族风暴的袭击。我们可以肯定，族群风暴将继续冲击合众国。最近《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这样问：“黑人能为非洲做犹太人为以色列做的事吗？”依据作者马丁·韦尔的观点，回答是肯定的，黑人能这样做，而且他们应该这样做。阿拉伯—美国关系行动委员会的观点或者刚成立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协会的观点都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尽管他们可能非常欢迎美国更多地参与泛伊斯兰教运动。全世界也是如此。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减少族裔多元化，很明显美国人是不赞成的，我们可以肯定希腊裔美国人不赞成，在 1974 年夏季塞浦路斯危机突发时，他们的数量、战斗性和在议会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现存的民族国家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避免他们所遇困难的努力中取得成功。二战以来几乎每一个新国家（他们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的国家）都一直存在许多潜伏着的族群冲突，可以说，这些族群冲突转而成为独立后的政治生活中的焦点。旧欧洲国家已经变得更多样化，而且还有新的群体增加，这些国家仍在试图发现，多样化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构造它们的。此外，还有一点（这仍然令人吃惊，很少有人关注），在每个社会都在族群方面变得多样化的世界里，我们自二战以来一直有着一种反对任何对边界进行调整的强烈偏见（无论什么理由）。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20 世纪反对政

治离婚(即脱离)的偏见就像 19 世纪反对配偶离婚的偏见一样强烈。”^①自 1948 年以来,几乎很少有国际边界被变更的,被更改的边界也一直不稳定。

的确,这些政治现实似乎为世界上比大萧条时期更多更激烈的族群冲突提供了条件。再者,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世界大众传播网络把族群不和的征兆和故事迅速地到处传播。

这些理由可以解释族群为什么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焦点。福利国家的兴起,平等主义与追求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国家多样性(异质性)的增加,国际通讯系统的形成等等这些特征并没有把新国家与旧国家分开,或者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分开。这就有理由把民族不仅看作是一种新国家“构建国家”的现象,而且也要看作是一种老国家中的现象。

上述部分很难形成一个理论,来解释在过去 20 年里,为什么族群身份变得更突出了,为什么坚持族群权利变得更强烈了,为什么族群冲突更显著了?的确,我们知道最后一句话可能引起争论。有人说,族群冲突只是阶级冲突在近几十年里在一些场合下采用的一种形式;没有了阶级剥削的原动力,也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会发生。另一些人则说,对族群冲突要进行具体因素的分解分析:诸如殖民冲突,内部殖民的加强,组织追随者的个人志向,时尚与一时的爱好,引证一些从非常严肃到非常琐碎的主张等等。在这个领域里尚没有什么事情已被解决。在这里我们都是初试者。我们认为这本书对有待继续下去的事业来说是一种初始的贡献。

我们希望,此书能够比现在一般流行的书更多地提供一种有关族群(Ethnicity)的更具普遍性的观点:Ethnicity 已经超出了种族、国籍(Nationality)、少数群体的有限分类,它已包括发达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它提出了多样化的理论方法(虽然所有那些对他们自身来说很少能够建成一个框架),并且这些方法将向读者提示:这里有着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不管怎样都还没有被解释,它不仅存在着,而且和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有着密切的、有机的联系。

参考文献

Michael Banton, *Race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① 参见 Eric A. Nod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2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72)。

Wendell Bell and Walter E. Freeman, eds. *Ethnicity and Nation-Building: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4).

Ernest Q. Campbell, ed., *Racial Tens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2).

Cynthia H. Enloe, *Ethnic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Leo Kuper and M. G. Smith, eds., *Pluralism in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hilip Mason, *Patterns of Domina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Eric A. Nordlinger, *Conflict Regul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 Occa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2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72).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A. Shepa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1972).

R. A. 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Theory and A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7); and *Race and Ethnicity: Essay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丁麒麟译, 李勇校)

多元主义

H. 蒂施勒 (Henry L. Tischler)

B. 贝里 (Brewton Berry)

他在这个殖民地里得到同情、理解和鼓励，他在这里遇到了能理解其生活习惯、规范，并与其生活观点、生活经验相同的祖国同胞。在这个殖民地里他有了一个身份，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殖民地的大街小巷、饭馆酒肆、教堂以及慈善团体当中，他得到了别人的回应并有安全感。他感到自己在这个殖民地能生活下去，能出人头地，实现其梦想——而这一切在外面的陌生世界里纯属空想。

——哈维·佐勃 (H. W. Zorbaugh)《黄金海岸与贫民窟》

许多人对提出宗教及族裔多样性的问题感到不快。他们认为提出该问题实属大错特错，因为该问题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他们中的共性。他们一般还允许黑人、印第安人或墨西哥裔人有权表述其民族意识，但他们认为其他少数族群团体这样做是不太适宜的。对近来那些将自身族群传统置诸脑后，并希冀其他人也亦步亦趋者而言，这种想法尤为普遍。^①

多元主义理论

多元主义 (Pluralism) 或在一个社会中有不同的区别开的身份观念的发展，

• 本文原发表在 H. L. Tischler 和 B. Berry 合著的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1985 年第四版, Stratton and Forbes Publishing Com.) 的第 13 章，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版权所有者即两位作者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A. Greely, *Why Can't They Be Like Us*, Ny: E. P. Dutton, 1971, p. 14.

这原是一种哲学理论。这种理论希望能给人们带来他们自认为应该得到的某种社会环境。今天,人们在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却是经常用来描述当今美国社会正在产生的某种状况。然而,他们在使用它时经常忽视了该术语所隐含的这种状况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将在本章中讨论多元主义理论,看看这一理论是如何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变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社会状况。

促成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人物是哈里斯·卡伦 (Horace Kallen)。卡伦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地区,五岁时来到波士顿,成长于传统的犹太家庭。在波士顿公立学校读书时,他体验到了某种普遍发生在移民第二代中的现象,他也开始摒弃其家庭环境、宗教,并产生了一种对美国的不加分辨的渴慕:正如他所写的“对我而言,每个人与他人相比较时自己的身份认同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人’这个词在一个人的个人成长过程中高于其他任何一个词的意义……”^①

卡伦对美国世界的倾慕,最终使其成为哈佛学院的学子。然而,一旦进入了他所认为的美国知识界的圣殿内部,他就体验到了许多震撼。在邻近的居民区工作时,他开始与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接触,注意到了人们对多种民族目标和族群理想的追求。这种现象使他开始反思他以前对美国人所下的定义。

在巴里特·文德尔教授 (Barrett Wendell) 开设的美国文学课程上的经历,加重了他这种困惑。卡伦将文德尔看作典雅的新英格兰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因此,文德尔的关于美国特点之构成的观点对卡伦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德尔认为新教的特质及理想是美国价值结构的核心,新教徒按《旧约》教义塑造自身,他甚至提出,早期清教徒多为犹太后裔。这些观念使卡伦认为他可以做一个属于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而又不被同化的犹太人,这样,再也不会产生在“熔炉”(Melting-pot) 理论框架之下不得不之中择一这种困境了。而过去他为摆脱其犹太背景所做的一切努力如今都显得毫无必要。

卡伦发现可以同时既做个纯粹的犹太人又做个美国人以后,他认识到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少数族群。他认为所有少数族群都应既无羞辱感又无罪恶感地保留其各自的文化。他这样写道:“民主并非要消灭差异,而是要改善和保留差异。”^②

卡伦反对那种认为所有的人都基本相同的观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者也这样看。卡伦和种族主义者都认为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人们之间基本的族群差异不会消失。不同的是,卡伦是以一种宽厚的眼光看待

① J.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NY: Atheneum, 1975, p. 204

② Ibid., pp. 205—207.

这些差异,种族主义者则把这些差异看做不平等竞争者之间冲突的基础;卡伦认为由许多民族组成的美国的运转方式恰似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个共同的旋律,种族主义者则认为和谐的乐曲只能来自种族净化。

文德尔教授也影响了黑人社区中持有文化多元主义观点的另一个主要代言人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他像卡伦一样,反对同化哲学,他之所以反对同化主张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将导致许多个体去轻蔑自己的族群起源与传统。他也强调人们所属于的族群与种族社区的至关重要。白人一直建议黑人通过个体努力遵从整体社会的价值而力争成为人们所接受的个人,杜波依斯则认为个人根本不能促成自身真正的变迁,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获得变迁。

杜波依斯在其文章《种族的保守性》(*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中写道:

基于这种原因,美利坚合众国具有黑人血统的8百万黑人当中的先锋分子不久就会意识到,若他们能积极倡导泛黑人主义,那么他们的命运就不是被白人所同化。也就是说,在美洲首次证明,在现代社会黑人不但能产生杜桑(Toussaint)这样的英雄和圣者,也将是一个有着美好文化希望的民族。他们的命运不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屈辱模仿,而是坚定地沿着黑人理想行进的创举……

我们是这个新民族的第一批果实,是注定将使当代条顿白人相形见绌的明日黑人的先驱。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敏锐节奏在美国形成了其独一无二的美国音乐,独一无二的美国神话故事。在疯狂攫取财富的财阀包围之中,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对热情与幽默的感受。因此,保存体力、知识才能和我们的精神理想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必须通过种族组织、种族团结、种族统一来进行斗争,以实现承认人们之间差异的那种宽厚的人性,同时,坚决反对人们发展机会中的不平等。^①

多元主义与同化主义的比较

我们知道,多元主义是对同化主义和熔炉观念的回应。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它不仅假定少数族群具有权利而且也把少数族群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甚至是需要的参与社会的方式。多元主义理论是要赞颂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反对现存的少数族裔在地位及待遇方面存在的不平等。多元主义使少数族

^① H. Brotz, *Negr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1850—1920*, NY: Basic Books, 1966, pp. 487—489

群能宣称他们可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秩序结构,从而抵御被同化的引力。从同化论者的观点看,少数族群被看成是从属群体,应尽快放弃其自身的内部认同感。多元主义理论则认为少数族群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整体的和谐依赖于各部分的和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多元论思想对那些自身已基本被同化的人最有吸引力。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指出:

对已经占据了很强的社会位置并意识到保持少数族群地位的永久性对自己很有利的那些人而言,文化多元论具有吸引力。多元主义使少数族群代言人有足够的信心把他们自己置于美国社会的核心而非边缘。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对那些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同化的人而言最有吸引力。它本身就是美国熔炉的一个产物。^①

同化理论与多元主义理论之间有许多差异,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对界限的考虑。同化主义者对消除种族界限有兴趣而多元主义者对保持界限有兴趣;同化主义者致力于全体人类同胞情的概念,多元主义则关注特定小社区成员间的地方同胞情;其他差异还有,同化论认为不仅要由多数来进行统治,而且要社会全体去遵从一般性的意旨,多元主义则是将社会少部分人的目标和梦想合法化的支持少数族群权利的理论,与此相应,反对多数族群的统治及鼓励不遵从其统治。多元主义把民主社会看成少数族群互相联合的社会而不是少数族群遵守多数族群统治的社会。

同化论争取个人间平等,多元主义则争取族群间平等。同化论思想认为初级社会单位是个人,个人必须把他们自身看成独立于祖先之外的个体社会存在,必须离开其族群背景而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承认。同化论要求打破传统的联系,而多元主义认为保存小群体是至关重要的,个人依赖于这样的群体并由此决定个人的认同。

由于同化论者与多元主义者之间的不同被归因于他们对个人与群体的看法,在由什么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方面他们也意见迥异。从同化论看,人们是由一系列原则及理想如“美国方式”而团结在一起;多元主义者对人们信仰什么兴趣不大,而关注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共同祖先是誰,他们传统的社会联系是什么,多元主义者更愿意强调以往历史的差异,而不是强调统一的意识形态。^②

^①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NY: Atheneum, 1975, p. 211.

^② Ibid, pp. 232—233.

检验这两种理论的基本观念，显而易见，二者都不那么现实。海姆认为：

同化论误以为在开放社会中族群联系会轻易消失……（实际上）许多人一代代地抵制技术与现代教育的冲击……一旦在美国立脚，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完全消失，似乎也没有一个要这样做，人们并不像同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柔顺。

多元主义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它以为族群之间界限固定不变，甚至与美国生活不相容的群体也会坚持不变……

多元主义鼓励了一个更深一层的幻想：族群一般都有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许多族群是不同区域或部落集体的不稳定联盟，而这一联盟只能在共同敌人之前得到暂时的宝贵团结，在显著的地方差异影响下，一个少数民族团体会由于内部的宗教、阶级、政治原因而分裂。^①

这两种观点也存在其他问题，同化论认为人们在一个新社会遭淘汰必然是他们仍遵从旧族群生活方式的命运。实际上，许多移民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要么很困难要么不彻底，这使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得到美国社会提供的机会。

同化为个人发展而牺牲群体，多元主义则存在不同的问题，它为群体进步牺牲了个人。多元主义争取群体的更高程度的自治及冒险进取，鼓励这些群体成为社会的一个可能具有怀疑、偏狭特征的部分，结果是个人创造力有可能受到阻碍。

当代美国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味道不像早期那样强。如今的多元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异化的产物。如果当一个社会在一些方面被认定存在不足，那么同化的想法似乎就不怎么受欢迎，不怎么具有吸引力了。同化理论意味着移民们要对东道国社会的价值系统全盘接受。今天，多元主义经常是对社会现状的反抗。另外，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对各种差异愈来愈宽容，人们鼓励在群体之间设立与保持界限。登山者、建筑工人、意大利政客都在加强其群体内部的团结。当代美国似乎是用新立异权利理论 (particularism) 代替了旧多元主义。这种新理论鼓励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为了保持团结及相互认同，可以把他们自己看成与社会其他部分有些不同之处。^②

①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 NY: Atheneum, 1975, pp. 233—234.

② Ibid., pp. 228—229.

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歧视的形式

作为解决居住在同一地域中不同民族间冲突的一种方法，多元主义对那些信仰民主及主张宽容者有特殊吸引力。但是与此同时，多元主义的口号也时常被目的迥异的另一些人采用。比如，对那些狂热地支持“隔离而又平等”信条的美国白人而言，其信仰也许是真诚的，但是他们更关心“隔离”而非“平等”。在这信条之下，将近半个世纪，学校、医疗机构、交通、度假地都严格地将白人黑人隔离，对平等却所做不多或无所作为。^① 在南非也是这样，许多白人在捍卫种族隔离的信仰时，强调的不是种族隔离有利于他们对黑人的控制，而是讲他们提倡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安东尼·H·里奇蒙(Anthony H. Richmond)指出了种族隔离在理论及实践上的这种差异^②。他论述道，在对共和国种族问题的理论讨论中，种族隔离的概念强调种族隔离是获得社会自治及减少冲突的一种手段。其提倡者声称对保持黑人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希望黑人“以自己的道路发展”。其提倡者认为，严格的种族隔离能使每个种族保持其生物纯洁性，拥有自己的地域，保持其喜好的习俗，按自己的意愿教育子女，最终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与主权。里奇蒙认为，实际上执行隔离政策的政客们并不支持任何这样的理想，而是把种族隔离看成欧洲人继续统治非洲人、有色人种、亚洲人社会的一种工具。

作为公共政策的多元主义

多元化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理想、一种理论或者其提倡者所希望的种族关系应该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它是在不同形势下予以实施的公共政策，让我们在下面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瑞士人

瑞士是个面积一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小国，面积几乎不到美国一个中等州的

① L. R. Harlan, *Separate and Unequal*,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58.

② Anthony H. Richmond, *The Colour Problem: A Study of Racial Relations*,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55, pp. 81—137.

面积大,人口400万。该国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有高山、深谷、冰川、阳光和不同种族的人民,却没有能将这400万人联结成一个民族的瑞士语。相反,多数瑞士人讲德语或法语变种的瑞士德语,这种语言本身每个州与每个州都不一致。在瑞士,19%的人讲法语,10%的人讲意大利语,近1%的人讲一种古语,即东部拉丁方言。语言的差异是该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写照。在阿尔卑斯山,几乎每个峡谷都保留其独特特色,在习俗、方言、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地区差异。宗教也没有能把这些人联系到一起,因为57%的人是新教徒,41%的人是天主教徒。统计数字所体现的这些语言及宗教差异是拉丁与日耳曼文化斗争的标志。这种冲突深深地源于并至今体现在性情、举止、习俗、幽默感及其他微妙特征方面的差异。简而言之,瑞士由非常不同的族群组成,这些群体之间暗含着激烈的冲突。

实际上,瑞士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战场而存在。该国并未被高山隔离或保护,它被几条大道所穿越,并曾经被每一个征服者所利用,包括从恺撒、汉尼拔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瑞士人经历过多次战争,直到最近,“瑞士人”这个词使多数人想到的不是“挤奶女工”、“约德尔歌手”、“钟表匠”、“旅店主”而是职业战士,且是剽悍善战的战士。瑞士人除了自己国内的冲突外,还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部分战争中充当雇佣兵,今天梵蒂冈的瑞士卫兵,即是他们古代职业的生动写照。

尽管有所有这些多样性,瑞士人却成功地将这些不同族群组成一个国家实体。有人可能会想,这是在服从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事实上,上述任何一条都不会产生瑞士人如今所持有的国家忠诚。相反,19世纪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达成了某种调和,瑞士针对新教和天主教都采用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针对语言的多样性,在宪法中把德、法、意、瑞士东部方言都列为国语,前三种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对外国人而言,这种情况很难理解。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联邦文件均要译成三种官方语言,所有的文本都具有权威性。在政治生活中,根据文化多元主义政府承认每个州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与主权,其自治程度甚至比美国的州所享受的程度还要高。其他政治体制,例如,比例代表制、创制权、公民表决权都是根据保护各个族群的团结与利益而采用的,这并不是说种族主义突然消失而宽容精神突然形成了,毕竟瑞士人也是人,拉丁人与日耳曼人、罗马天主教与加尔文教派之间相互的偏见宿怨很深,但是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学会了求同存异地生活,发展了对国家的共同忠诚。瑞士人的确树立了一个榜样,不同的族群在和谐平等中共同生活并享有高度的国家情感。有个作者力图揭示瑞士人的心灵。他写道:

很难相信,一个国家仅仅因为这种行动会发挥其国家的最大优势而突然改变习俗。即使说瑞士人非常明智,能在恰当时机改正错误,人们仍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明智,而其他国家虽然拥有更多知识,但最终因其种种过失而愚钝不化,最后失败。

然而,瑞士人真把自己看成瑞士人吗?回答这个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瑞士人在某些时候会比其他时候更觉得自己是瑞士人。当他立于高山之巅,俯瞰大地时,他觉得他就是个瑞士人;当他从军入伍,回首往事,把祖国与其他国家做比较时,他觉得他就是个瑞士人……而在其日常生活中,他更觉得自己是个盎格鲁人、诺曼底人或别的什么人。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他也许会觉得与那些和他语言不同的瑞士同胞相比,他更接近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

一个人身上集结了这么多不同层次的忠诚,是不会向某种特定忠诚倾斜太多的。例如,一个讲德语的瑞士人,会同情德国,但仅限于在文化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会很强烈地考虑他的州。但是当作为瑞士人这个问题提出时,他就是个瑞士人,而且他就想做个瑞士人。另外,在各个层次的忠诚之中,他同样忠实于其国家传统。^①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外交官力图确定瑞士人是如何学会将文化差异调和成一个国家统一体的。有一项研究探究这种团结的人口基础。^② 瑞士的各族语言——德、法、意、瑞士东部方言——在宪法上被看成平等的,但实际上在重要性方面并不一致。讲德语的瑞士人在数目上要远远超过讲其他三种语言的人,对此现象的解释在于生育率的差别。法语州要比大多数德语州的人口生育率低,但这种生育率的差别被内部移民所抵消。该国的法语区对讲德语的瑞士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德语区对讲法语的瑞士人的吸引力。此外,移民会被很快同化,特别是当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学校中使用该地区的官方语言时。高山成了意大利语区与瑞士其他地区间的界限,所以意大利语的保存不成问题。对瑞士这种均衡现象进行研究的梅耶(Mayer)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讲德语的瑞士人并未做出努力把其语言强加于全国,这种语言上的平等代表了对现代瑞士最稳定最和谐的一个影响因素,而这种均衡源于语言成为民族与国家的认同象征以

① T. C. Herold, *The Swiss without Halo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35.

② K. Mayer: "Cultural Pluralism and Linguistic Equilibrium in Switzerlan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No. 2 (April 1951): 157—163.

前的那个时代，而人口因素则保持使其不至成为焦点。的确，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被那些为防止语言成为分离与冲突焦点的明智的政治措施而有意加强。信仰文化多元主义理想者应特别关注瑞士人，因为在将族群关系达成这种少有而且困难的融合形式方面，他们是独一无二的。

俄 罗 斯 人

苏维埃俄国是另一个成分复杂的现代国家，并且因为对数目众多的少数民族采用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而著名，这对像苏联这样一个成分复杂的国家而言并不容易。最大的民族是俄罗斯人，占人口约一半，另外超过 100 万人的民族有乌克兰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鞑靼人等。该国共约有 185 个不同民族，将近 147 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当然十分巨大。一个极端是受过教育的、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民族，另一个极端是无文化的、游牧的原始民族。在宗教方面苏联有穆斯林、犹太人及各种基督教徒，更不用说还有不信教和反宗教者了。

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人为了剥削控制该国，很长时间一直在利用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为了转移大众对政府的不满，反犹浪潮一直得到政府的推动，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未曾间断。除犹太人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时成为粗暴的俄罗斯化政策的目标。沙俄政府采取步骤削弱少数民族文化，限制使用其语言，压迫其宗教，这种政策导致在少数民族中文盲、愚昧十分普遍。据估算，1914 年 9 岁以上人口只有 40% 的人识字。沙俄政府提出“聋子村”这个冷酷的说法，将老百姓相互完全隔离。沙皇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用亚美尼亚人来制约格鲁吉亚人，用德意志人抑制列托人，为支持这种政策，政府单单为了使邻近民族产生敌意及妒忌的目的，而对某个民族经常特别优惠。简而言之，沙皇对许多少数民族计划的总体目的就是进行统治。为达到此目标，种族隔离、孤立、强迫同化、大规模的驱逐时时发生。

十月革命使该政策得到扭转，事实上，斯大林本人尤为关注少数民族问题。早在 1913 年他写道：

在高加索地区，相当数量的群体拥有原始文化、特定语言，但是无自己的文字，此外，他们处于转变时期，一边被同化，一边不断发展……

对于明格列尔人、阿希哈兹人、亚兰人、斯万人和列斯吉亚人的问题又将如何呢？他们讲不同语言，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

高加索地区的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将落后民族及人民拉进更高文化的主流才能解决……

一个少数民族不满意，并非因为没有民族联合体，而是因为它没有享受信仰自由、迁移自由等。一旦它得到这些自由，不满自会消失。因此，所有方面的民族平等（语言、学校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因素。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法律，毫无例外地全面禁止所有的民族特权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削弱和限制。^①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一个星期，新政府就公布了由列宁、斯大林签发的《俄罗斯人民权利宣言》，它宣告：

1. 俄罗斯人民的平等与主权；
2. 俄罗斯人民的自决权，以至脱离国家、创建新的独立政府的权力；
3. 废除一切宗教及民族特权；
4. 少数民族在俄罗斯境内自由居住和自由发展。

自1917年起，这些原则在许多场合中得到阐述。苏联高级官员在宣言及讲话中不断重申这些原则，它们被吸收进1918年7月10日宪法，也被写进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斯大林明确指出，每个少数民族应有自己的法庭及政府机构，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并得到帮助以兴办自己的报纸、学校、剧院、俱乐部及其他设施，这些原则均被吸收进了1924年采用的第一部联邦宪法中。此后12年，民族情感得到恢复，甚至到了危及苏维埃统一的程度。最大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开始产生相当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结果斯大林谴责了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傲慢自大的态度。然而，在政府各项政策的鼓励下，其他民族自身也开始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民族精神，并开始歧视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少数民族群，如，居住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奥塞梯人、阿扎尔人是占统治地位的格鲁吉亚人虐待的目标，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也是如此。苏联力求作为一项政策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实践中并不容易达到。虽然如此，1936年宪法修正时，这些原则再次被吸收进去，并包括以下几点：

任何对权力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反过来根据种族或民族而给予公民直接或间接特权，以及提倡种族或民族排斥、仇恨、侮辱，都会受到法律惩处。

^① B J Stern, "Soviet Policy on National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No. 3 (June 1944): 230—231.

苏联朝向建立境内各种族民族的平等所做的这些努力，并不仅限于在口头上，这赢得了全世界自由派的钦佩。

与此同时，苏联少数民族政策也受到了许多谴责，该政策背后的动机也为人们所怀疑。麦克斯·波姆 (Max Boehm) 认为它只是对民族及文化问题的“虚伪解决办法”，并未认真关心少数民族的福利，整个政策只是用来调动这些民族的文盲来反对其上层阶级。有的人把它看成一种保持权力及扩大控制的技巧的权宜产物。

虽有这些文化及民族宽容、自治的宣言，近年来显然苏联根本就不实行该政策。例如，反犹思想仍很严重，“因为犹太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播。犹太人杂志被查封，出版社被关闭，杰出的犹太作家被捕，犹太人在几次清洗中占了超出相应比例的数量。苏联军队、政府中反犹浪潮猖獗，犹太人被从负责岗位上解职，反犹思想还蔓延到城市中产阶级、产业工人上层、大学生甚至共青团组织和共产党本身。一个拉比 (犹太教教士) 把这种苏联官场中的态度描绘成“愈演愈烈、半心半意、敷衍掩饰的反犹主义”，要把犹太人打入苏联社会底层。^①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对苏联实行多元主义和宽容少数民族表示怀疑。罗素是西方的苏联政策支持者，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的朋友。罗素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常提到俄国干预犹太人生活的问题。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开诚布公、直抒胸臆而不怕被误解并当作敌人的程度是检验真正友谊的标准之一。因此，我希望您能欣赏我写这封信的精神——对苏联人民的某种关注而非谴责的精神。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遭受了长期不断的迫害。这种暴行的极端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对上百万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如果说有人在经过深重苦难之后需要理解与同情，那就是欧洲的犹太人。

因此，我希望应允许犹太人在实际生活及法律上享受全面的文化生活、宗教自由及民族权利。

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犹太人被完全剥夺了其民族文化及表述的手段。杰出的知识分子被为人所谴责的非法手段关入监狱或处死。

我是个毕生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无神论者，我以著书和参加运动的方式来反对迷信。尽管如此，我认为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应允许苏联犹太人得到给予其他信仰群体的那种同样的自由。我担忧的是，对其他较小民族补

^① “The New Anti-Semitism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entary* 7, No. 6 (June 1949): 535–545.

懂得越多,关闭犹太人教堂的做法及宗教设施的缺乏就越能损害犹太人对其信仰的追求,我对苏联许多共和国苏维埃刊物文章中对犹太人民所表现的敌意感到不快。^①

其他非犹太少数民族前景也不妙。雅各布·罗宾逊(Jacob Robinson)博士有很多的机会了解情况,他说道:“在某种程度上苏维埃政策是沙俄帝国政策的重现”,并指出:

苏联理论家声称苏联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应该被更正确地称作多语言国家。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苏联政策仍不承认民族传统有其永恒价值,尽管苏联扶植民间土风舞蹈、民间故事,但却削弱民族文学的统一。原则上,苏联所有民族的文化只有其自身形式即语言是民族的,但却是“社会主义内容”。苏联现在广泛使用一个新说法:苏维埃人民,而非苏联人民。^②

因此,似乎很值得怀疑苏联在实际上是否对它的众多民族采用了多元主义的政策。他们提倡的多元主义是朝向同化这一终极目标前进的策略性步骤。正如列宁所说:“为了统一,我们必须分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谈到:

高加索的区域自治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把落后民族引入了共同的文化发展,它有助于小民族摆脱其与外隔绝的外壳,促使他们向前发展,并从而能够从更高级的文化中受益。^③

美国印第安人

可以说多元主义是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0年期间对印第安保留地所采取的政策。历史上,白人对今天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片土地上印第安人的态度体现了种族关系的所有现象。例如,时断时续的冲突,同化与融合,政府采取的大规模驱逐和种族隔离、种族分层的政策。我们也可发现宽容、同情的社会现象以及甚至属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理想。尽管所有这些政策曾风行一时乃至并驾齐驱,我们仍可看到每个特定时期内有一两项政策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

① G. Lawrence, *Three Million Mor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pp. 140—141.

② J. Robinson, "The Soviet Solution of the Minority Problem", in R. M. MacIver ed., *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Antagonisms*, NY: P. Smith, 1951.

③ B. J. Stern, "Soviet Policy on National Minor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No. 3 (June 1944): pp. 230—231.

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①

美洲殖民的最初时期，西班牙人政策不同于居住在里奥·格兰德河以北的英国人、荷兰人及其他西方人的政策。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看成王室及教会的臣民，印第安人被强制归属于强迫劳力的悲惨地位，受到无情剥削。但与此同时，殖民者也致力使印第安人与白人同化和融合，印第安部落从未被西班牙人看做是主权力量，也不采用从他们手中购买土地及其他权利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传教团去传教，“基督教化和开化印第安人”。

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并非有意背离西班牙人的政策，但情况差别太大，由此出现一种新政策。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印第安人还不太多，尚未构成西班牙人所面临的那种危险。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下事实，即非西班牙统治的北美地区的殖民地不是欧洲王室统治的领地，而是私有企业者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所从事的一项商业事业。令这些不断追随而来的企业家们失望的是，殖民地从未给他们多少商业前途，也从未吸收足够的资本对土人进行军事征服，由此产生了一项与各部落做交易的政策，把他们当作是独立的主权力量。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并予以购买，通过谈判签订条约。这个政策自然导致了断断续续的冲突，因为印第安人的土地财产观念与白人大相径庭。此外，条约作为工具需要一定程度发育的社会组织及集权体制，而这在印第安人社会及殖民地几乎就不存在。当然总是有为印第安人的教育及同化而工作的传教士及人道主义者，也有愿意印第安人留在原居住地生活的皮毛商，还有无情的“现实主义者”(realists)，他们提倡灭绝印第安人，且要以疾病、恶习及部落战争来作为辅助工具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主要政策是组织人口迁移或大规模强迫驱逐。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主张是将印第安人移过密西西比河，他认为购买路易斯安那会给印第安人提供土地。门罗总统(Monroe)、亚当斯总统(Adams)坚持认为未经印第安人同意不能将其迁移，但事实上这点很难做到。无论怎样，不管印第安人怎么想，开发者不断把印第安人往西赶，用各种手段强迫他们接受剥夺他们土地的条约，更糟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条约的内容仍未达到，从而给予印第安人深重的痛苦与幻灭。

19世纪中期，发生了政策上的转变，政府决定应将印第安人隔离、孤立起来，在1850年至1880年建立了至今尚存的200多个保留地。这种从消灭、驱逐到隔离的转变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仅在美国内战期间暂时地中断过。事实上，

^① W T Hagan, *American Indians*; D. McNickle, *The Indian Tribes of the United States*, NY: Oxford Univ Press, 1962.

许多印第安部落被迫将土地割让给白人统治者，“保留”小块土地供自己使用。通过一系列法令及法庭判令，印第安人的地位从主权国家变成受监护的民族。1834年，过去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西部划分出来做印第安人的永久居住地，但同年印第安人在这地区的主权即被侵犯，因为该年颁布的联邦刑法的范围扩展到涉及白人（不论是犯罪者还是被侵害者）在印第安人地域内的犯罪。到美国内战前，订立了许多条约剥夺印第安人对某些土地的所有权，战后又从态度敌对的及为南方联盟一方作战的部落手中割取了大块土地作为惩罚。最高法院决定，议会法案比与印第安部落签订的条约更有效力，议会有权废止这些条约。1871年3月3日，最终通过了一项法令，终止了和印第安人交易时条约的使用，终止承认印第安部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此，通过强制使其居住在保留地内及议会通过的特殊法令而把印第安人控制起来。

然而，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种族隔离并不成功。游牧印第安人并不情愿过定居生活，猎人不愿变为农民，自豪独立的武士们也不愿接受被监护的地位及监护人的救济。在做出必要调整使他们对其处境满意之前，为帮助他们过渡，政府公布了救济配额，而这又只会使他们更加贫困。十分明显，种族隔离政策是个失败，那些对印第安人福利真正感兴趣者（还有一些想把印第安人从所剩无几的土地上赶走的人）都提出同化及“美国化”的主张。

19世纪80年代，政策又产生另一种变化：要使印第安人“开化”、同化、“美国化”。这就是说要废除部落组织，压制非基督教及仪式，让他们讲英语，男子剪短发，让他们像白人一样穿衣打扮，脱离其古代习俗，使他们产生白人社会的观念及价值观，使他们成为顽强而有上进心的个人。正如已故印第安事务委员约翰·克列尔（John Collier）先生所说：“弱化、消灭印第安人整体传统成为中心目的。”这种新政策的主要文件是1887年议会通过的《艾尔蒙特将军法案》（*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该法案通过给每个印第安人一块保留地中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从而废除了保留地。该所有权持有25年，这期间不征税，也不许出卖，这以后印第安人才得到收费权及有资格管理自己事务。该法案的发起者相当正确地认为，破坏土地共有权将折断印第安文化的脊骨。该时期内务部长认为“对资产私有权的欣羡和自豪是最有效的开化手段之一”，名字与该法案连在一起的达维斯（Dawes）议员坚持认为这一法案会使印第安人产生自私自利的精神，在议员看来这种精神是白人文明的主要动力。

打破保留地仅是强迫加速印第安人同化计划的一部分。印第安孩子被置于寄宿学校，遵从白人的规范，将他们与印第安文化隔离开。印第安语言被有计划地压制，古老艺术任其萎缩，印第安宗教仪式及传统是不受鼓励的而且经

常是被禁止的。

但是,却未给印第安人提供公民权。在一次大战中,许多无公民权的印第安人被征集入伍。1919年通过一项法律,给予任何一个提出要求的退伍军人以公民权。到1924年,约有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以各种方式成为公民,在该年,议会宣布所有生于美国者皆为公民。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获得投票权,投票权由各州来实行管理。在某些州,根据印第安人不交税而否决了他们应拥有的该项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根据禁止受监护者投票的法令将他们拒之门外。只是在几年前,该州才提出有利于印第安选举权的决议,联邦法院则宣布新墨西哥州对印第安人的限制违宪。如今,美国所有印第安人均可投票。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曾风行一时的强制快速同化政策已被证明是惨败。寄宿学校差不多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家庭体系,对印第安文化的协调攻击也发生了破坏性的作用。经济上印第安人则已几乎被毁灭。1887年,达维斯法案通过时,印第安人拥有一亿四千万英亩土地,面积比加州还大,在45年内,只剩下四千八百万英亩,且其中多是不毛之地或由于过度放牧而退化之地。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表明,只有2%的印第安人年收入超过500美元。死亡率与婴儿死亡率奇高,肺结核与气管炎流行,住房条件简陋,卫生条件缺乏,饮食粗劣。尚未消失的保留地是孩子们在寄宿学校外的唯一避难所,还是不上学者的生存中心。^①简而言之,该政策未能使印第安人完成向美国文化的转变(关于现在美国各主要印第安部落地理分布图从略)。

于是,必须再次改变政策。以往,人们私下认为印第安人是个“消失中的种族”,不用特别为其制定政策,时间会解决问题。但事实上相反,印第安人很顽强,处于会使其他民族灭亡的环境下其人口仍在增长,因此,人们意识到印第安人会和我们相处很长时间。胡佛总统(Herber Hoover)采用了新的文化多元主义及逐步同化政策,革除了印第安事务局中对工作既无知识又无同情心的“该受惩处的政客”,任命了有能力的新官员,从而为新政策打下了基础。但事实上直到下一任罗斯福总统(Roosevelt)时新政策才付诸实施。约翰·库勒(John Collier)成为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会长官,他将新原则概括为:

1. 给予印第安人世俗事务和文化自由与机会;
2. 组织印第安部落管理其自身事务;
3. 对他们做经济上的重新安置。

该政策与《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案》(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条文一起在1934年6月18日通过并付诸实施。该法案内容如下:

^① L. Meriam, *The Problem of Indian Administ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8

1. 禁止对仍属印第安部落占有的土地进行圈占、购买；
2. 禁止个人处置目前属于印第安部落及为部落所购买的土地；
3. 为需要土地的部落购买新土地；
4. 给他们提供信贷以支持其耕作及其他商业、工业企业；
5. 允许过去由于继承而被分开的印第安土地重新联成一体；
6. 鼓励印第安部落之间的组织和联合以便对其资源、事务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管理；
7. 给追求更高教育的印第安学生提供贷款基金；
8. 对印第安人在印第安服务部门中的就业给予优先录取。

该法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非强制性，它要求部落投票决定接受还是反对新法律。大多数部落决定接受，但也有些部落宁愿以其他方式实施。库勒提出了该政策的思想即是“把印第安人看成正常人，能在美国文化框架中做出正常调整，满足其生活而又保持其文化、种族特质精华的简单原则”。因此，印第安人得到鼓励恢复发展其古代艺术及工艺品，使用自己的语言，自由信教，按自己礼节行事，遵守自己的习俗及传统。

这项多元主义的政策遭到多方面攻击。批评者认为该政策目标是“要将印第安人重新印第安化”，要永远保持印第安事务的官僚机构，因而是倒退。对印第安人抱有良好愿望的人则认为该政策“令人迷惑而又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整合及同化的速度越快越好。一位内心对印第安人有兴趣的批评家说：

我用不着再说我对现任政策所做的努力是多么的同情，然而我必须遗憾地说，在今天仍想沿着老路来挽救印第安人的文化及创造力实属不智。在物质方面倒是容易恢复，印第安人自尊也可被恢复，但在他们之中土人文化可平安而富有创造力地存在下去的看法却不符合我关于我们文明本质和可能性的观点。但愿我错了……①

1950年左右，尊重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多元主义官方政策似乎开始转回到同化政策。② 该转变并非产生于对印第安重新组织法案的撤销或否定，而是由

① Alexander Goldenweiser, *Anthropology*, NY: F. S. Crofts & Co., 1937, p. 439.

② J. B. Gittler ed., *Understanding Minority Groups*, NY: John Wiley & Sons, 1956, pp. 33—57; D. Mark, "The Raid on the Reservation", *Harper's Magazine* 212, No. 1270 (March 1956): 48—53; J. Collier, "Letter to General Eisenhower", *The Nation*, 176, No. 5 (10 Jan. 1953): 29—30; Dorothy Bohn, "Liberating the Indians—Euphemism for a Land Grab", *The Nation*, 178, No. 8 (20 Feb. 1954): 150—151; J. Collier, "Back to Dishonor", *The Christian Century* 71, No. 19 (12 May 1954): 578—580; H. E. Fey, "Our National Indian Policy", *The Christian Century* 72, No. 13 (13 March 1955): 395—397.

于高层领导者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种不同的哲学。一种对多元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潮流认为,印第安人只有通过成为美国中产阶级成员才能改变其处境。许多促使政策转变的人内心毫不犹豫地认为,印第安人今后的唯一希望就是完全融入美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生活。他们认为只要印第安人还在保留地孤立地生活,就只能是贫穷、疾病、人口过剩而充满绝望的牺牲品。真诚相信同化主义理论的人也得到这样一些人的支持,这些人的动机是自私自利,渴望插手印第安人所拥有的土地、木材及矿物资源,对他们而言,保存印第安人的文化及社会组织不合其口味。

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印第安文化中独特的东西业已消失,如今仍被看做是印第安文化的东西只是“贫困文化”而已。批评者特别指出民族语言、传统仪式、亲属制度和工艺技术的消失。这种假设认为印第安人像任何一个社会低层群体一样需要帮助进入主流社会(附表中列举了美国各州的印第安人口)。

印第安人自己很少被问到他们有何需求。但在 1961 年 6 月,芝加哥举行了一次由 90 个部落的 450 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通过的纲领包括:

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具有保持其精神的及文化的价值的天赋权利,自由地实施这些价值观对任何人的正常发展都是必需的……

我们认为……印第安人遭受了禁锢、不正常的影响、不正当的压力、产生迷茫、挫折、沮丧的政策。

他们列举了他们的要求与愿望,即:

1. 废除提出终止保留地政策的第 83 届国会通过的 108 号总决议;
2. 经济援助要着眼于在保留地上建立给印第安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及其他活动;
3. 使印第安人参与所有计划;
4. 周转信贷资金;
5. 更好的医疗服务及设施;
6. 改善住房条件;
7. 提供永久巩固的、有收获的土地;
8. 促进教育设施的迅速发展,包括脱产与在岗的职业及专业培训,成人教育及就业指导服务。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较激进的印第安部落认为必须组织成与众不同的独特民族,即使印第安文化已退化,印第安人也只有在其独特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才能改善其民族命运。与此相反,有人提出应放弃传统文化,因为它已不复存在,根本不能用来改善大多数印第安人的命运,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在此关键性时刻,也有人认为印第安残余文化的崩溃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一些印第安代表宣称,若印第安文化完全消失,他们不会成为中产阶级美国人而只会成为一盘散沙,成为在文化上茫然无措的下层阶级。^①这些群体的政治目标是要加强印第安文化的联系,使它们能作为强有力的民族集团,决定在什么基础上及何种程度上去与美国社会接触。

政府的印第安政策就是这样左右摇摆。我们的祖先要消灭印第安人或至少将其驱至内陆,然后尽力同化或隔离他们。近二十年我们要与之共同生活,接受他们,允许其自行其是。通过这些,印第安人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如今,认为同化是必然结果的人得不到什么事实的支持,最可靠的预计是,我们还得与印第安部落、社区和文化共存很长时间。

多元主义作为对种族及民族群体差异的一种调节形式,特别吸引那些信仰民主理想的人,特别符合那些推崇公平竞争、自由、人类个性神圣的人的口味,对那些认为“差别是生活的调味品”、痛惜同质性和标准化潮流的人也颇具魅力。同时,必须承认,多元主义是一个精致而又脆弱的和解形式(*accommodation*),难以企及,只能用于很少情况,它要求很高程度的相互宽容及同情。^②

附表:美国各州印第安人口

州	1950	1960	1970
亚拉巴马	928	1 276	2 443
阿拉斯加	14 089	14 444	16 276
亚利桑那	65 761	83 387	95 812
阿肯色	533	580	2 014
加利福尼亚	19 947	39 014	91 018
科罗拉多	1 567	4 288	8 836
康涅狄格	333	923	2 222
特拉华	0	597	656
哥伦比亚特区	330	587	956
佛罗里达	1 011	2 504	6 677

① M. C. Wax, *Indian America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1, pp. 182-183.

② M.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Y: Oxford Univ. Press, Chapter 8.



(续表)

州	1950	1960	1970
佐治亚	333	749	2 347
夏威夷	?	472	1 126
爱达荷	3 800	5 231	6 687
伊利诺伊	1 443	4 704	11 413
印第安纳	438	948	3 887
衣阿华	1 084	1 708	2 992
堪萨斯	2 381	5 069	8 672
肯塔基	234	391	1 531
路易斯安那	409	3 587	5 294
缅因	1 522	1 879	2 195
马里兰	314	1 538	4 239
马萨诸塞	1 201	2 118	4 475
密执安	7 000	9 701	16 854
明尼苏达	12 533	15 496	23 128
密西西比	2 502	3 119	4 113
密苏里	547	1 723	5 405
蒙大拿	16 606	21 181	27 130
内布拉斯加	3 954	5 545	6 624
内华达	5 025	6 681	7 933
新罕布什尔	74	135	361
新泽西	621	1 699	4 706
新墨西哥	41 901	56 255	72 788
纽约	10 640	16 491	28 355
北卡罗来纳	3 742	38 129	44 406
北达科他	10 766	11 736	14 369
俄亥俄	1 146	1 910	6 654
俄克拉何马	53 769	64 689	98 468
俄勒冈	5 820	8 026	13 510
宾夕法尼亚	1 141	2 122	5 533
罗得岛	385	932	1 390
南卡罗来纳	554	1 098	2 241
南达科他	23 344	25 794	32 365
田纳西	399	638	2 276
得克萨斯	2 736	5 750	17 957
犹他	4 201	6 961	11 273

(续表)

州	1950	1960	1970
佛蒙特	30	57	229
弗吉尼亚	1 056	2 155	4 853
华盛顿	13 816	21 076	32 386
西弗吉尼亚	160	181	751
威斯康星	12 196	14 297	18 924
怀俄明	3 237	4 020	4 980
合计	357 499	523 591	792 730

资料来源：人口统计局，《联邦统计摘要》，(1976)，华盛顿特区，人口统计局，第131页。

(许身建 译，蒋力蕴 校)

在美国的同化：理论与现实

米尔顿·M. 戈登 (Milton M. Gordon) **

一个起初主要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组成的国家,从各种来源吸收了4100万移民及其后裔,并将其熔铸成现代美国人。如何解释美国的这一情况,三种理论或概念模型竞相引人注目。这些理论即盎格鲁一致性(Anglo-Conformity)、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它们在不同时期,也常常同时用于对“发生了什么”(描述模式)和“应该发生什么”(目标模式)的解释。它们在被人们使用时,经常让人难以分辨作者心中所想的是这两种用法中的哪一种。事实上,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史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社会科学家对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理论分析相对缺少密切关注。

其结果是,在这个领域中的争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争论,因为它与偏见、歧视等比较常见的问题,以及多数与少数群体的关系这些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关联——已被外行人、纯文学的代表、哲学家以及各种信仰的辩护士们占了上风。甚至即使从这些人的情况来看,他们对同化理论的关注程度也很低。结果是在美国,改善群际关系的工作是由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专业机构和个人去执行的,他们尽其所能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歧视行为,但他们

* 本文选自 N. Yetman 和 C. Steele 编的 *Majority and Minorit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1982 年第 1 版), 第 224—237 页。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Allyn and Bacon 公司的同意,谨此致谢。

** Milton M. Gordon 是马萨诸塞大学 Amherst 分校的社会学教授。本文最初曾刊登于《代达罗斯》(*Daedalus*), 这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期刊, 刊行于波士顿, 90 卷第 2 号 (1966 年春季), 第 263—285 页。

作者注: 这篇文章的材料以对美国少数民族同化的意义和内涵的大量研究为基础, 本研究为 Russell Sage 基金会所资助并出版有《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纽约, 1964)。

中的大多数人却不能将其努力和一种适当的思想见解联系起来。这样的一种见解将会能够精确地描述美国社会中民族群体方面的现存结构(我用“民族群体”这个术语指任何一种种族、宗教或民族起源集合体),并使我们考虑在可预见的将来,社会的同化和整合目标的形成。人们还记得爱丽丝在去神秘之国的旅途中提出的那个令人入迷的问题:“请您告诉我,从这里向前我应走哪条路?”那只猫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回答她道:“那要取决于你想到哪里去。”

以本文的目的,我们能很简要地讲述美国移民的故事。在革命时期美国白人主要来源于英国人和新教徒,但也已吸收了大量的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稍少一些数量的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瑞士人、南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少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天主教徒数量属中等水平,特别在中部的殖民地是如此,少数犹太人居住在新加入的州。除了跨克派教徒和几个教士团之外,殖民者一般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都报以轻蔑与敌意,他们将印第安人赶出沿海平原,使西部边界成为流血的战场,在那里,为了活命,必须永远保持警惕。

尽管那时黑人占总人口近五分之一,但他们已确定的奴隶地位,与种族和文化偏见结合在一起,使他们不能被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可同化的部分而予以认真考虑。虽然许多源于欧洲的群体起初是作为一块块民族飞地而存在的;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最后在白人中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民族混合(intermixture)。“不同血统的人们”(原文如此),两个美国历史学家关于殖民时期写道:“英国人、爱尔兰人、日耳曼人、胡格诺派教徒、荷兰人、瑞典人——融合和相互通婚,几乎不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异。”^①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其人民大多是英国人,其他民族背景的白人移民或说英语,或主要来自于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的文化与英国相差不大,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白人依据法令排斥非白种人少数民族的福利要求和考虑,因此,可以理解,当时美国的同化问题不会出人意料地变得突出而复杂。

下个世纪及其后 50 年,随着契机的增加,事情的发展驱散了白人的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来自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后不久状况的相对的简单性。为饥饿所驱使的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稍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英国人和其他北欧西欧民族一道)在 19 世纪中叶向美洲的大规模移民(即所谓的“老移民”);黑奴的解放及内战之后所带来的重建问题;把被征服的印第安人连同其残破的文化一块儿置于政府设立的保留地中;东方人的到来,他们起初是为西部金矿的发现

^① Allen Nevins & Henry Steele Commager, *America: The Story of a Free People*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p. 58.

及其他机会所吸引；最后，开始于 19 世纪末最后四分之一时期，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来自南欧和东欧农村和“领地”(“Pales”)的移民潮难以想象地膨胀了——即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所谓的“新移民”)为逃避那个时代的迫害和工业地点调整(industrial dislocations)而来到美国——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借此，我们可以考虑上述同化理论兴起的原因。在对这些理论及其历史起源分别作了必要的、按透视法加以简略的描述之后，我们将建议提出一些分析性的特征以助于理解同化过程的实质，然后重点讨论美国的情况。

盎格鲁一致性(Anglo-Conformity)

“盎格鲁一致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用于涵盖有关同化和迁移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均假定有必要保留(经美国革命所修正过的)英国的体制、英语以及英国取向的文化模式，使之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并成为规范。与此同时，与这一假定相连的是有关的具体态度。这些态度可以在以对种族不信任观念和“北欧日耳曼人”、“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为一极端，以不反对任何来源的移民为一极端之间变动。前一个极端结合了本土主义者的政治计划和排外主义者的移民政策，还有许多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各种立场，如只赞同吸收来自北欧和西欧移民来到美国这块充满混乱和不可思议的土地上(“他们更像我们”)；后一个极端只要求移民们及其后裔按他们期望的那样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模式规范。所以在“盎格鲁一致性”和种族主义态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等号。^①

即使是在比较温和的方面，“盎格鲁一致性”也具有相当清晰的公式，因而很可能在美国成为纵贯整个国家历史有关同化目标的最为盛行的理论。远在殖民时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写下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德国族群的关注，他们学习英语的速度慢，并且建立他们自己的母语出版社^②。其他的先驱者们对来自欧洲的大规模移民群体也有类似记录。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他们不能预见这样的迁移将对后来造就这个民族之伟大所起的作用。他们并不都是不思考并具有偏见的人。宗教解体与政教分离(以至于没有任何宗教团体——无论是

^① 此话是科尔夫妇讲述的。参见 Stewart G. Cole 和 Mildred Wiese Cole, *Minorities and the American Promi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4), 第 6 章。

^② Maurice R. Davie, *World Immig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6), 第 36 页。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宾州的德国人的状况和特征引自于他在 1753 年 5 月 9 日给彼得·科林森的信。见 Jared Sparks,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oston, 1828), Vol. 7, 第 71—73 页。

新英格兰的公理会,还是弗吉尼亚的圣公会,甚至所有的新教徒联合起来——能够要求联邦政府给予特殊的照顾和支持,结果是人们的宗教意识可以自由存在),是他们判定新的国家政策的基本点。乔治·华盛顿在其第一任总统任期内给纽波特市的犹太人公理会写道:“美国政府,不给偏执以制裁,不给迫害以帮助。”

与宗主国英国的政治差异已经用(独立战争的)鲜血写下了,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视其羽翼未丰的国家为欧洲各种文化合并的不偏袒的文化熔炉,或一个新的“各国之国”“(nation of nations)”,也并不把美国看成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和机构形式只作一些重要的政治上的修正,就作为规范。事实上,他们新近赢得的民主和共和的胜利,使他们特别担心这些还不稳定的革命果实会受到欧洲人大量涌人的威胁,这些移民过去的生活经历使之习惯于暴虐专制统治的束缚。因此尽管他们显然将新生的美国想象为那些遭受迫害和压迫的不幸的欧洲人的天堂,但对过于自由的政策的后果会如何,他们仍有特殊的保留。华盛顿在1794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我对移民的政策是,除了一些有用的机械师和特殊类的人员或专业外,没有必要鼓励,同时,移民的政策或其在一个实体中产生的后果(我指的是将他们安置于我们的社会实体中)也应受到置疑。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保留了随之带来的语言、习惯和道德标准(或好或坏)。”^①托马斯·杰斐逊对种族的观点,对奴隶制的态度,显然是自由主义和超越其时代的,他也对大批移民对美国建制的影响有过类似的怀疑,尽管他承认“移民们如果是自己来到美国,就有权获得所有的公民权利”。^②

19世纪前四分之一时间里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确切地说是模棱两可。一方面,为了扩大人口和版图,增强国家的重要性,急需移民们去耕种广阔的草原,去开采矿山,建筑铁路,开挖运河,在不断扩展的工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时期没有联邦立法阻止外国人进入美国,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法律力图阻止的仅仅是那些可能成为社区负担的人,例如罪犯和穷人。另一方面,大量为贫困所迫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到达一个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社会,集体定居在东部城市的贫民窟内,这就引起了罗马教皇潜在的害怕。另外,一个焦虑的根源是大量德国人的涌人,他们定居在中西部的城市和农村,他们不同的

^①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 C. Ford e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 Vol. 12, p. 489.

^②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Virginia, Query 8”; A. E. Bergh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ashington,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7), Vol. 2, p. 121.

语言,隔绝的社区生活,在节欲和遵守安息日方面更加自由的观点,这一切导致了他们与具有清教和福音传教士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对外国的“激进分子”的恐惧,对工人偶尔提出的经济要求的怀疑,于民族主义更是火上浇油。这些恐惧的极端形式引发了19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本土美国人运动和19世纪的“美国”党或“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他们掀起反对天主教的运动,要求更严格的法律来限制获得国籍的程序,要求将外国出生的人排除在政治机构之外。尽管这些运动在政治上获得了部分成功,他们的动乱分裂了国家的社会组织网。尽管造成的这些裂缝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他们没能影响国家的有关迁居和移民的法律政策;而他们的责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有思想的旁观者的可预料到的反应。

涌向西部扩展地区的新来者势如潮水,在1841—1850年期间多达160多万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中,达到250万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内除了“一无所知”党之外,关于“理想的移民调适(immigrant adjustment)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尽管不是唯一的)或许在一封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18年回答巴龙·冯·福斯坦维泽的质询信中总结过了,这一总结如果不是最早的表述,那它也肯定是这种思想最绝妙的表述。亚当斯宣称:“如果他们不喜欢这儿,他们可以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他继续说道:^①

他们(来美国的移民)为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但也是劳作的生活而来——而且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适应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政治或物质特征,及这个国家的善与恶的补偿平衡,那么大西洋总是向他们敞开的,他们可以回到其诞生地和父母之邦去。首先他们必须对此下定决心,否则他们将会对作为美国人的幸福预期感到失望。他们必须抛弃欧洲人的外衣,再也不去恢复它。他们必须向前看他们的子孙的未来,而不是向后回顾他们的祖先;他们必须确信,无论他们自己的感情是什么,他们孩子们的感情将与这个国家的成见联在一起。

内战后的事件造成了美国人自身对待移民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个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扩张而尚未完成西进运动的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源源不断的新人浪潮这一劳动力资源。但是,外来的极端分子所煽动的偶尔爆发的劳工骚动,天主教机构的增长和天主教徒地方政治权力的崛起,移民村落与城市贫

^① *Niles' Weekly Register*, Vol. 18, April 29, 1820, pp. 157—158; Marcus L. Hansen, *The Atlantic Migration, 1607—1860*, pp. 96—97

民窟不断的联系,都唤起了人们熟悉的恐惧。第一部限制移民的选择性法律于1882年通过,且中国移民于同年开始被禁止了。首先被发现的最重大变化是欧洲移民来源的变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南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第一次在移民数目上占多数,在后来的十年内,这些来源的移民占了主流。现在一种新的,或至少迄今未被重视过的调子,来自于本土主义者竖琴上的和弦开始奏响了——这是种族主义者的难听或者说不和谐的和弦。先前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群体的含糊而又浪漫的想法、与一般的种族中心主义、遗传学中的粗糙观点、进化论中有选择的逸闻,来自于引进的人类学中的早期与初始的天真假设相连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教条,即认为由英国人、德国人和其他老移民组成了一个高个的、金发碧眼的“北欧日耳曼人”、“雅利安人”的优秀民族;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构成了肤色较深的阿尔卑斯人或地中海人——两者都是“劣等”人种,他们在美的存在,通过与优等民族的通婚或对美国人口在数量上的补充而威胁到传统的美国种族和文化。这个教条明显的必然结果是排斥所谓的劣等人种。但是如果新种类的移民不能被排斥,那么就必须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德灌输给这些处于蒙昧状态的生灵。因此,一位教育家在1909年写道:^①

这些东欧人和南欧人大大不同于先于他们来到美国的北欧人,他们不识字、驯服、缺乏自立和创造精神,没有盎格鲁一条顿人的法律、政府和秩序观念。他们的到来大规模地冲淡了我们民族的血统,腐蚀了我们的世俗生活……在任何地方这些人往往都倾向于以群体或自成村落的方式定居,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和规则。我们的任务是打破这些群体与聚落的界限,将这些人同化、合并为美利坚民族的一部分。在可能的限度内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正义、法律、秩序、大众政府的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孩子,唤起他们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崇敬,以及对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国家生活中值得遵从的事物的敬重。

“盎格鲁一致性”在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全国。虽然“美国化”在其不同阶段中有许多不同的侧重点,但其本质上是一场有意识发动的运动,意在将移民们的本民族文化及其附属物清除,使他们变成一个个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取向的美国人——所有这些将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用后来的形象说法,它企图实行

^① Ellwood P. Cubberly,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09), pp. 15-16.

的是“高压同化”。它有战前的前提条件,但是却是发生在世界冲突的高潮期间。联邦机构、州政府、各城市和私人组织的负责人一起参加进来,努力劝说移民学习英语、领取申请国籍的文件、购买战争债券,忘掉他们以前的出生地和文化,使自己沉浸于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

在战争及其随后的“红色恐怖”之后,美国化运动的高潮平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联邦法律限制移民。虽然起初被总统否决,后来又被1917年为阻止移民潮的文化考试的失败所挫败,但赞成限制移民的人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登峰造极的是于1929年生效的、以出生国家来决定移民限额比例的著名法案。不管对美国所接收的移民在数量上实行限制的作法有什么价值,这个法案所具有的内容,明显地歧视东欧和南欧国家人,从而在事实上使一个假定制度化了,这个假定是:在这块土地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模式有权占据支配地位。1952年的麦卡兰-瓦特法案(McCarran-Walter Act)仅作些微小修改又重申了这些法律。于是,这些法律就作为盎格鲁-一致性信念的一种法制纪念物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这种理论体系仍在美国有大量的和强有力的支持者。

熔炉理论 (The Melting Pot)

虽然在美国历史经历中,各种形式的“盎格鲁-一致性”或许已经成为最为盛行的同化理论,但自18世纪以来,与之相竞争的一个比较宽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也有其倡导者、拥护者。很清楚,这块处女地大陆上的客观条件,正修正着英国殖民者从其祖国带来的制度。从非英国的祖国如德国、瑞典和法国来的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陌生的环境。那么,不把进化中的美国社会视为作了一些微小修正的英国再版,而是看作一个在文化上和生物学上全新的混合社会,在其中,欧洲的民族和风俗,使用象征性的说法,都毫无歧视地混合于一个正在出现的民族的政治熔炉中,并通过美国的影响和互动之火而熔成一个显然全新的类型,这种看法难道不可能吗?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新社会的构想,它激励着那位18世纪法国出生的作家和农学家J.海克托·圣·约翰·克雷维科(J. 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在定居美国多年之后,出版了《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表明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①他在信中问道:谁是美国人?

^① J. 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 Albert and Charles Boni, 1925; reprinted from the 1st edn., London, 1782), pp. 54—55.

他或是一个欧洲人,或是欧洲人的后裔,那种血统的奇怪混合,你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我能给你找一家,祖父是英国人,他妻子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妇女,而儿子现在的四个儿子的妻子分属不同民族。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将祖先的偏见与习惯抛置脑后,而在他所举行的新的生活方式中重新接受新的观念和规范,并接受他所遵从的政府,他所处的新的等级位置。通过在雄壮的国歌的气氛中他被接受成为一个美国人。这里,来自所有民族的个体都被熔进了一个新的人种,他们的努力以及他们的后代们总有一天会导致这个世界巨大变迁。

一些观察家们把19世纪前四分之三时间里对于移民的门户开放政策解释为反映了一种对美国这个熔炉有效性的深信不疑,即相信“所有的东西都能被吸收,并且所有东西对正在形成的国民性格都能有所贡献。”^①无疑,许多人像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那样,忧郁地看到了那个时代本土主义者的狂热,他们感到,这样的对于民族一致性的要求和仇视移民的力量,表明了美国最好的理想的堕落。1845年爱默生在其日记中写道:^②

我厌恶美国本土党(the Native American Party)的狭隘性。他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这与博爱、宽宏的所有训示显然是矛盾的。因此,当然也有悖于真正的智慧……在所有的生灵中人是最复杂的……而且,通过将金银和其他金属熔化和混合,就像在科林斯神庙中的日炉子里那样,一种新的、珍贵无比的混合物,即科林斯黄铜,就形成了。在这块大陆上也是这样——它是所有民族的避难所——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哥萨克人,所有的欧洲部落——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能量,将构建一个新的种族,一种新的宗教,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文学,它们将如来自于中世纪的熔炉,或更早一点来自于海洋时代和伊特拉斯卡野蛮时代的新欧洲那样充满生机活力。自然界倾向杂交。^③

最终,熔炉的假设找到了其通向历史学知识和经验诠释的捷径。19世纪晚期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刚刚从德国的大学毕业)更倾向于采纳这样

^① Oscar Handlin ed., *Im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 (Englewood, Prentice-Hall, 1959), p. 146.

^② Stuart P. Sherman 在 *Essays and Poems of Emerson* 导言中引用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1), p. 34。

^③ Edward N. Saveth,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European Immigrants, 1875—192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一个观点,即,美国的体制本质上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是条顿人),但其他一些人却不这么肯定。这些人中有一个就是弗里德里克·J·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他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历史学家。不久前他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即在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年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名为《美国历史上边区的意义》。这篇论文被认为是美国学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它的观点,得到特纳后来的写作和教学的支持,渗入美国历史诠释领域并至少影响了一代人。特纳的主要观点是,塑造美国体制和美国民主的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任何一种形式的欧洲传统,也不是来自东海岸城市的约束力,而是来自于边界不断变动而且五彩斑斓的西部地区所产生的经验。除了边界环境所造成的许多影响及其提出的许多挑战之外,它还对加入西进运动的许多民族群体的民族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具有化解作用,这些群体包括18世纪的德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特纳指出:“边区促进了美国人混合民族的形成。在边区这个大熔炉中,移民们被美国化了,摆脱了束缚,融合成一个混合的种族,在这里美国人既非民族,也非其族群特征。这个过程从早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后来,在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谷在西部的角色的文章中,他指出“外来移民潮稳步上涨,以致造就了一种混合的美国人,他们的混杂注定要产生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民族。”^①

迄今为止,赞同熔炉思想的人主要考虑的是仅由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早期大规模移民(旧移民)所产生的多样性,包括那些文化和体质外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差异不大的人们。但爱默生在其“混合”的概念中,却公正地包括进非洲人、波利尼西亚人、哥萨克人,这也是确实的;然而,南欧和东欧国家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必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拥入这个国家的大城市和工业经济中心区的颠沛流离的新来者,是否也能成功地被熔化掉?这个问题仅仅是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内提出的。“边区熔炉”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社会,“城市熔炉”在这方面会与“边区熔炉”声称已经做过的同样有效吗?

一位英国犹太作家,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看到了美国作为欧洲穷人和被压迫者天堂的角色,为之动容,他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为把美国视为熔炉的观点代言,这引起了公众的注意。1908年以色列·张维尔(Israel Zangwill)的戏剧《熔炉》(The Melting Pot)在这个国家上演,获得了风行一时的成功。这部戏贯穿着主人公的梦幻,他是一位来自俄国的年轻犹太移民,一位作曲家,他的目

^①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0), pp. 22—23, p. 190.

标是完成一部宏大的美利坚交响乐，表达他对这个作为天赐熔炉的接收他们的国家之深切感受。在这个熔炉中，人类所有的种族分离将被剥去其原始的仇恨与差别，一起熔进一个群体，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爱上了一个美丽而有教养的非犹太教姑娘。戏剧以交响乐的完成与演奏，以及经过许多周折和来自双方家庭的反对之后，主人公大卫·奎克萨诺（David Quixano）与其所爱的姑娘行即结婚作为结束。在发展过程中，大卫以那个时代的语言，这样来表达他的感受：^①

美国是上帝的坩埚，是所有欧洲民族融合和再造的大熔炉！当我在爱利斯岛上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有五十个群体，五十种语言，五十部历史，五十种血统的憎恶与竞争。但兄弟们，你们不会长久如此，因为你们所接近的，是上帝之火——这些是上帝之火，它对你们的宿怨与血仇毫不介意，德国人和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你们所有的人都被放进这个大坩埚！上帝正在造就着美国人。

这里我们有一个“熔炉”的概念，对于要熔进大坩埚的各种族不允许有例外和限制条件。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非犹太人，甚至黑人和黄种人；他们在张维尔狂想曲的列举中都特别提到了。在美国的大城市中这口埚显然就要沸腾了。

因此，在世纪相交之际，作为移民接受这个国家经验的一种反应，“熔炉思想”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之中。熔炉的比喻，不久将受到一种新的有关群体适应的哲学的挑战，并且总要与受到广泛信奉的“盎格鲁一致性”之间进行竞争。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熔炉理论有意识地讨论美国种族融合这方面情况而继续受到社会的部分关注。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学家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进行了一项关于族际通婚趋势的调查，对那个城市中融合过程的概念作了修改，提出了关于融合过程理论方面的基本限定。在纽黑文市，R. J. R. 肯尼迪（Ruby Jo Reeves Kennedy）^②从一项有关1870年至1940年期间族际通婚的研究中发现，英裔美国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通婚，具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这表示存在着一个新教的“熔炉”；而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

①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New York, Macmillan, 1909), p. 37.

② Ruby Jo Reeves Kennedy, "Single or Triple Melting-Pot? Intermarriage Trends in New Haven, 1870—194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4, 49; 331—339. 亦见 "Single or Triple Melting-Pot? Intermarriage in New Haven, 1870—1950," 同出处, 1952, 58: 56—59.

兰人，则在天主教的“熔炉”内相互通婚；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通婚。换句话说，通婚虽跨越了族群背景的界限，但却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各自局限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个主要的宗教群体之中。因此，肯尼迪夫人声称，纽黑文的情形类似一个“三元熔炉”，而不是一个“一元熔炉”。她认为她的研究表明，“虽然严格的族群内婚制有所放松，但宗教内婚制依然存在，未来的分裂将沿着宗教界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沿着族群界限。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必须抛弃传统的‘一元熔炉’理论，而一种新的概念构想，我们称之为美国同化的‘三元熔炉’理论，将取而代之，以真实地表达美国各民族正在发生的经历。”^①“三元熔炉”的命题后来为神学家威尔·赫尔伯格(Will Herberg)所采用，成为他分析美国社会宗教发展趋势的著作《新教 天主教—犹太教》中所参考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架构^②。但是，“三元熔炉”假设显然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想象中的多元的社会领域。现在我们转向去考察另一种理论的兴起，它就是企图证明这样一种构想。

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

从殖民时代至今，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海岸的几乎所有的非英国移民——他们定居在可怕的野地，荒凉的大草原，或可进入的城市贫民窟里——都建立了许多民族飞地，希望至少能够保留一些本民族的文化模式。这样的发展，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后来受到不断增多的朋友、亲戚、同乡的支持，他们也在这块陌生的上地上寻找熟悉的绿洲；这样的发展，也受到定居者重建一个社会这种愿望的支持，在这个社会中他们能用熟悉的口语进行交流，维持熟悉的组织结构；最后，这样的发展，也符合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以共同面对陌生且常常充满敌意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样一种必要的需求。这对“老”移民和“新”移民都是如此。事实上，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从德国寒冷的政治气候中逃到美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就希望在联邦内建立一个全是德国人的州，甚至更希望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如果在关于奴隶制争吵的影响下，预期的联盟解体一旦发生^③。奥斯卡·哈德林(Oscar Handlin)描绘了19世纪中叶波士顿的爱尔兰人，他们是刚从饥饿和经济衰退的祖国来的难民。

① Kennedy, "Single or Triple Melting-Pot? 1870—1940," p. 332.

②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5).

③ Nathan Glazer,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From National Culture to Ideology," 参见 Mon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and Charles H. Page ed.,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1954), p. 161; Marcus Lee Hansen,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129—140; John A. Hawgood, *The Tragedy of German-American* (New York, Putnam's, 1940).

民。他指出：“由于不能参与社区的一般性社团事务，爱尔兰人感到有必要在社会内部再建立一个社会，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共同行事。因此，在各种接触中这个群体总在社区的其他部分之外行动，同时也开始强烈意识到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①因此，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在其变成一种理论之前已是一个事实——这种理论对于一个整体性国家来说密切相关，并在美国的英语学术圈内被提出讨论过。

最终，德国人（以及后来抵达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文化飞地在范围和重要性方面都衰弱了，因为本土出生的后代进入了公共学校，离开了农场和村庄，作为个人去美国化了的城市中拼搏奋斗，从而普遍接受了规范化的工业文明的影响。德裔美国人社区，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累积情绪的强有力冲击——这种破坏永远不能完全恢复。在美国逐渐出现的泛天主教集团中，爱尔兰人是占支配地位且无所不在的要素，但这些发展只是到了20世纪才表现出来。同时，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内，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开始涌入。这些群体从社会学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边区的封闭、正在扩展的工业经济对一些职业的需求，以及他们自身的贫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留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地区。在不断升级的争论之火中，在由这些新的事件而产生的比较稳定的经验之火中，锻造了一种作为国家哲学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

首次公开对残酷的美国化进行思想反击的，不是来自受到围攻的新来者（他们终究对自身的生存命脉比对研究适应理论更关心），而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分子，在世纪相交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效法其英国前辈“定居”在贫民窟内，去“学着与穷人同甘共苦。”^②不久，这些“社会改革团体”的工作人员，被迫千方百计地去解决移民的生活和适应的现实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从总体来说，社会工作人员创造了一种与新近移民进行接触的方法，即对他们的族群文化传统和新产生的族群组织表示赞同。^③首先，这些工作人员必须与这些常常悲惨而迷茫的新来者的生活及其日常问题保持紧密联系，他们看到，推动加速美国化的那些措施对移民子女的影响效果是多么令人遗憾与不幸。这些移民的子女往往疏离于他们的父母、家庭

^①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rev. edn.), p. 176.

^② 引自 Samuel A. Barnett 的一封信 (1883)。转引自 Arthur C. Holden, *The Settlement Idea*,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 12。

^③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pp. 231-258;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236.

权威的影响受到限制。当他们在美国环境中学习如何解释事物时,他们的父母难道不是这个社会中的那一部分缺乏知识、没有受过教育的“东欧国家人”,“犹太人”,或“肤色浅黑的意大利人”吗?民族“自我憎恨”及其日渐衰落的心理后果是家庭解体和青少年犯罪,而这些并非是事情的反常的结果。甚至于,移民们自己也受到对他们的文化、语言、制度以及自我意识不断攻击的消极影响。当在纯粹的手工劳动能力之外,他们的所知、所感、所梦——换句话说,他们的存在——在美国受到轻视和嘲笑时,他们将如何保持自尊?而且——最残酷的是——连他们自己的孩子对它们也采取了“美国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在对这些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有了些意识之后,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赫尔房中二十年》(*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一书的感人章节中,提到了她是如何在聚居区内创建一个劳动博物馆的。在那里,不同民族的女移民聚集在芝加哥的贫民窟内说明和讲解她们本族的纺织方法,而且这些早期技术和当代工厂生产方法之间的关系也能生动地揭示出来。在美国的这个局部环境中,这些农妇们第一次感到她们也拥有某些有价值而且有趣的技艺——她们也能够提供一些东西——并且当这些妇女的女儿们在阴暗的“缝纫业”血汗工厂中工作一天之后,首次来到赫尔房看看,就开始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母亲们也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拥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且与她们的现代生活是有联系的。简·亚当斯的结论希望“我们美国公民权的建立不应妨碍来自旧时代的这些基础”^①,这个结论作得多么贴切!

移民的文化传统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迁入的国家都有用处,赞同这一点还受到另一个来源的额外支持:即得到那个时代强调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和宽容的知识界思潮的支持,虽然现在这一思潮已经被更加强有力的反对者所压倒。有时教育家和共和主义者偶尔也反对“美国化者”的要求,他们争辩说,移民也有一种古老而体面的文化,这种文化能为美国提供很多东西,而美国的性格和命运还在形成之中,它必须为民族主义和战争灼烧的世界提供一个,不同传统相互协调合作的榜样。1916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诺曼·哈帕古德(Norman Hapgood)以及年轻的文学批评家拉道夫·博奈(Randolph Bourne)曾发表了一些论文和讲话,详细地谈到了这个主题的各个方面。

尽管如此,但是文化多元主义立场的经典论述只是在此一年多之前才作出的。早在1915年,在《国家》杂志中就出现了在“民主和熔炉”题目下的两篇文章,作者是哈里斯·卡伦(Horace Kallen),一位受过哈佛教育的哲学家,他关心

^① Jane Addams, *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p. 258.

将哲学应用于社会事务。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人,他自己的种族背景使他感受到已经暗含在“美国化”或盎格鲁一致性熔炉理论之中的族群融合的现实压力。在这些文章中卡伦坚决不承认将这些理论作为美国生活中实际显示的事物和作为未来理想模型的有用性。相反,美国不同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内相互协调一致的方式,却给他留下了印象,他发现每一个群体都有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宗教、公共制度和祖先文化的倾向。他指出,移民“一直在学习英语,将它作为通行的交流语言,并且参与到国家总体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地理和行政上的统一,而且是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合作,是各民族文化的联盟或联邦。”^①作者争辩道,这些发展远远没有像“美国化者”所声称的那样,违反了美国历史上的政治原则,而实际上它体现了民主理想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个人是与群体联在一起的,对个人的民主推广之也意味着对其群体的民主。

然而,正如卡伦在其论辩中所示,刚才所描述的过程还远未彻底实现。它们受到“美国化”计划、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性的假定,以及促进“种族”融合的错误企图的威胁。因此,美国站在一个文化的十字路口。她或者企图通过强力将一种不自然的即盎格鲁—撒克逊取向的一致性强加给她的人民,或有意识地允许和鼓励其各族群民主地发展,各自强调它们特殊的文化传统。正如卡伦在其文章的结尾所说,如果后者得以贯彻,那么^②:

一种可能是伟大的、真正的民主联邦的轮廓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它的形式将是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它的实质是族群民主,通过事业中的公共制度里的自我实现,通过依据每个类型的人的完善,来达到自愿自主的合作。联邦的通用语言,她的伟大传统的语言,将是英语,但每一个民族将各有其令人激动而随意的生活,有其独特的方言和说话方式,有其自己独特的和传统的审美和思维方式。联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单一的整体,为了体现组成它的各民族的鲜明个性,并在它们之上将其协调组织起来,上述整体提供了基础和背景。因此,“美国文明”也许就意味着“欧洲文明”合作性协调的完善——而欧洲的无用之处、肮脏和忧伤则被摈弃——这是一种在一个整体内部的多样性,是人类的一曲管弦乐。

在后来的十年内,卡伦发表了更多的有关美国多群体生活主题的文章,后

^① Horace M.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 *The Nation*, Feb. 18, 25, 1915; 重印在他的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中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 引文在第 116 页。

^②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p. 124.

来集成一册书^①。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他第一次用“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述他的主张。这些文章反映了他越来越坚决地抵制对移民及其文化的摧残灭绝(这是临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参加者所害怕的),随后的“红色恐惧”、种族优越性主题的规划、继续对新来者剥削,以及三K党的兴起,所有这些都提高了他的这种抵制的强度;同时他也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是针对这些社会病的民主的矫正方法。后来他又发表了其他文章,详细论述或注释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个主题。因此,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教书的大多数人而言,至少45年来,卡伦被认为是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首创者和主要的哲学阐释者。

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已故的路易斯·阿丹米克(Louis Adamic)(他是南斯拉夫移民,后来成了一名美国作家)开始研究美国的多元文化传统以及这些群体在铸就这个国家民族性方面的作用问题。借用沃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话,他将美国说成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a nation of Nations),尽管他的最终目标更接近于熔炉理论,而不是文化多元主义,但他看到,最迫切的任务是让美国人意识到,它应该给所有的族群什么东西,而不是仅仅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确信,非英国背景的移民的儿孙们,必须教导他们自豪于他们祖先民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及其在建设美利坚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否则,他们就不会消除掉他们的民族自卑感以及他声称在他们当中发现的无根的感觉。

因此在20世纪,尤其自二次大战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已作为一个概念进入了群际关系研究专家和民族共同体领导人的词汇和意象之中。考虑到这种新的对多元主义的强调,现在有些作家宁愿说移民的“整合”而不说移民的“同化”^②。但是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社会科学家和群际关系的研究者们都没有密切注意去分析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性质及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相关,它所引发的偏见与歧视问题——而这一点我们在本文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到了。

结论

在剩下的篇章中,我只作几个分析性的注解,并将它们应用于美国历史和现实状况的脉络之中。我这里并不去描述我对美国状况的看法,但我的看法形

①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p. 124.

② 参见 W. D. Borne 等,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瓦那会议的文件和备忘录所作的一项调查) (Paris UNESCO, 1959); William S. Bernard,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油印),为这次会议的论文之一。

成了我力图勾画美国社会同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假设。^①

首先,必须看到“同化”是一个总括性概念,它实际上涵盖了多样化的各个具体的分过程。一种最重要的区分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行为同化(behavioral assimilation)”和“结构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②,前者指吸纳主流社会的文化行为模式(同时,也常常有对吸收移民的国家的文化模式的一些修正)。对文化修正或“行为同化”这个过程有个特殊用语——即“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另一方面,“结构同化”,是指移民及其后裔进入接收社会的社交小集团、组织、机构活动和一般的公民生活中,如果这个过程大规模地发生的话,那么必然产生高通婚率。对另外两个方面也必须作进一步的区分,即一方面是那些一般的公民生活的活动,包括谋生、行使政治职责,参与更大社区的工具性事务;另一方面是那些创造个人友谊模式、频繁家庭互访、公共崇拜、公共娱乐的活动。第一种类型常常产生所谓的“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ships),它们相对来说往往是非个人的、片面的;后一种类型则导致“初级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s),它们是温暖的、亲密的、个人化的。

认识到了这些不同的区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族群的特有经历建立在原先的移民“殖民地”基础之上,但常常延展到后来几代人的生活中,它就是:在民族群体内部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允许和鼓励族群的成员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中将他们全部的初级关系和某些次级关系保持在本群体的范围内。从教派医院中的摇篮到孩子们的游戏群体,中学里的社交小集团,大学中的学生联谊会和宗教中心、人们在其中寻求配偶的约会群体,婚姻伙伴,居住区的邻里,教会所属机构和教会俱乐部,男人和女人们的社交和服务组织,“已婚者”成人小圈子,度假胜地,以及当年龄周期接近完成时为老人准备的休息的养老院,最后是各教派的墓地——在所有接近于人格和自我核心的活动和关系中——族群的成员如果愿意就可以顺着一条道路前进,这条道路会从不使他跨越族群结构网络的界限。

社会阶级差别的存在使情况更加复杂,它们径直穿过族群的界限,就像它们穿越美国白人——新教徒群体一样。当每一个族群在迁入地经历过必需的一段时间,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或者在某种情况下连续数代时,它就会产生

^① 特别参见 Milton M. Gordon, "Social Structure and Goals in Group Relations," 以及 Nathan Glazer,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From National Culture to Ideology," 两篇论文均见 Berger, Abel 和 Page 主编的书中(参见第 73 页注③); S N Eisenstadt, *The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 W D Borsig 等, 同第 77 页注②。

^② Milton G. Gordon, "Social Structure and Goals in Group Relations," p. 151.

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群体,这一群体是一个更大群体的中层阶级(有时也有上层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样的阶级划分进一步限制了初级关系的范围,因为,尽管族群成员之间对其族群传统的载体有一种普遍的相互认同感,但只有在与他自己有共同阶级背景和目标的人的亲密社会关系中他才感到轻松自如。

总之,我的观点是,尽管美国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文化适应”或“行为同化”,但结构同化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子外,还并不广泛^①。例如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路比·乔·列维斯·肯尼迪和威尔·赫伯格的“三元熔炉”的观点,他们认为民族群体往往在三个主要的宗教集团内熔合,对新教和犹太教社区,尤其如此。那些19世纪旧移民的后裔们,是新教徒(许多德国人和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相当程度上已渐渐融入白人新教徒这个“亚社会”中。西班牙裔及葡萄牙裔犹太人,德裔犹太人,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类似地倾向于在其共同生活中聚在一起;将各天主教民族如意大利人、波兰人、法裔加拿大人吸纳进一个迄今为止由爱尔兰人占据主导的社区,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尽管我相信它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完成。种族和准种族群体如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罗黎各人还保留着他们独立的社会的结构。因此,在现代美国生活中所有这些的结果就是多元主义——但它是“三位一体”的,它应被更精确地描绘成“结构多元主义”而不是文化多元主义,尽管后者的有些东西还保留着。

我的第二个例外是关联到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这里没有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我要说明,在美国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世界或亚社会,在它中间,不同民族、宗教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真正的结构混合,已经明显发生了。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讨论这些发展的原因。如果美国的结构同化被宗教和种族界限所阻碍,我们就要问这是为什么。答案在于多数和少数民族群体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互动的方式。如今有句俗话说“单人不成舞”。类似地,没有理由认为白人新教徒会坚持诚心地邀请少数族群成员跳舞。而且少数族群成员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也是各自不一,模棱两可。尤其对宗教少数群体来说,族群共同体内有一种特定的逻辑,因为他们相信宗教意识形态的永恒性,而结构混合将导致族际通婚,有可能使互通婚的家庭之间原有的群体界限消失。下面,让我们逐个考察几种不同类型的少数族群的情况。

对移民而言,由于存在着其显著的数量和社会经济背景,结构同化是不可

^① 参见 Erich Rosenthal, "Acculturation without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0, Vol. 60, pp. 275—288。

能的。他并不想这样,他对自己的社区制度的舒适自在确实需要。对于本土美国人,无论他公开讲出的观点的内涵是什么,都无意于开放他们的初级群体生活,而让这些成群的外来者进入。这种情况在功能上是一种互补的平衡。

移民的第二代则发现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许多人相信他们听到了欢迎他们参加美国白人新教徒的社交小集团、俱乐部、机构的动人呼声。终究,它仅仅是一个学习美国方式的事情,难道不是吗?他们没有成长为美国人吗?他们在文化上与其母亲、“新来者”没有不同吗?或者也许有一个特别渴望的人推想到(像米龙·考夫曼 *(Myron Kaufmann)* 的小说《代我向上帝问好》(*Remember Me to God*)中的犹太人主人公那样,渴望获得有声望的哈佛学生社交生活的俱乐部系统的成员资格)“只要我在效仿常青藤联合会的举止行为方面走完最后几步,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让我加入进去”。但是,很遗憾!尽管布鲁克斯兄弟们有这样的要求,大学生联谊会、城市男人们的俱乐部会所以及乡村俱乐部的大门对移民后裔依然紧闭。那种邀请从来不会真的发生;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用纽斯华·费希曼的话,这是一种“对于美国少数族群的孩子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邀请”^①。这样,受挫者就回归到他们的先辈群体的简朴但能给人以可靠慰藉的社区制度中,在那里他找到了同一代的伙伴们,他们从未内讧过。这些人们当中有些太胆怯但不会越轨走失,其他人则是致力于群体生存的“民族理论家”;还有些人从未真正相信过这种动人召唤的真实性,或者因为太消极而只能沿着熟悉的道路前进。自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参与一项可能在社会学的领域是很好的任务——在族群飞地内建立社会制度和组织,它越来越由第二代的成员来执行,且为社会阶级恰当地分割。

那些一时虚华或自信地大胆表露的人,在可能的条件下,被一种“美国”社会结构的梦幻所引诱,这种社会结构比所有的亚群体内部结构的规模都大一点,在民族上是中性的。这些亚群体不也是美国人吗?但他们发现,使他们沮丧的是,在初级群体层次上,美国社会结构的中性的性质是一个幻影。远处看那是一座准公共大厦,上面飘扬着的是包括美国所有族群的旗帜,但更仔细看,却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即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俱乐部会所,它的运作表现的是对于其会员父母的族群成为前提的期望。在这些条件下,要求将任何参与其活动的邀请去勉强地扩展到其他种族背景的人的愿望,只会变

^① Joshua A. Fishman, "Childhood Indoctrination for Minority-Group Membership and the Quest for Minority-Group Biculturalism in America," 见 Oscar Handlin 编的 *Group Lif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得相当微弱。

对于少数种族人员,甚至连假装的邀请都没有。最突出的例子是黑人,他们多数人被坚决拒之于美国白人的小集团、社交俱乐部和教会之外。结果,通过适当地允许内部的阶级差异,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制度网络、他们自己的“社会世界”。现在保留这种独立的社区生活有许多既得利益,无疑许多黑人在这种生活中心理上是舒适的,尽管他们强烈要求消除在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公共设施方面的歧视。然而,黑人集体孤立的意识形态附属物却并不明显。他们对先辈非洲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泛非洲主义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兴趣,尽管“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者”边缘群体最近已出现在集体系列的另一端。至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或是新教徒,或是天主教徒(绝大多数是前者)。他们孤立的集体性并没有“逻辑的”意识形态原因;多元的社会结构完全是由偏见和歧视的驱动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少数种族自身的意识形态信条所强化的。

于是,结构同化被证明为是使盎格鲁一致性、熔炉理论之船沉没的礁石。在初级关系中有行为同化(或文化同化)而没有大规模的结构混合,这已是美国从多种多样的人群中创立和发展一个民族国家的经验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那种经验的最本质的社会学事实。加强群体间的协调,减少种族偏见和歧视,维护留在民族界限内或越出民族界限外的人的权利,这些战略必须参照“结构多元主义”的背景慎重制定。

(吴晓钢 译, 王 勇 校)

内部殖民主义

M. 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城市是由先于它而存在的组织构成的联合体……我们不应忽视那些在原始时代所存在的、为建立有秩序的社会而必须予以克服的额外的困难。要在五花八门的、自由的、多变的人们中形成社会纽带，殊非易事。为了将人们置于社区规范之中，制定法律使他们服从，以理智取代激情，以公共权利取代个人权利，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某种事物的需要，它比物质力量更强有力、比趣味更可尊崇、比哲学理论更确定、比习俗更易变，这种事物应当无一例外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在那里它是全能的。这种力量即是信仰 (belief)。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社会究竟是怎样才超越了部落制度 (tribalism)？它们怎样包容了新的、在文化上迥异的群体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国家？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通常用于指现代社会中一种强大的、甚至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在较早的历史阶段，人们认为自己是诸如家庭、氏族或社区之类固定群体的成员，而在今天，几乎人人都拥有国籍 (nationality)。在个人所具有的各种社会身份中，国籍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因为，唯有以这个身份的名义，个人才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剥夺他人的生命：例如剥夺不同国籍的人的生命。而只有当敌意存在于被称为国家 (nation) 的社会单位之间，战争才是

• 本文为 M. Hechter 1975 年所著 *Internal Colonialism* 的第一章“导言”中的部分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 3 至 13 页)。翻译这部分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了美国版权所有者即作者 M. Hechter 教授的同意，谨此致谢。

可容许的。内战,或至少有部分参与者隶属同一国家的冲突,是一种很快便失去理智、极少受到称赞的悲剧事件。

在绝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冲突中,普通公民(如应征入伍者)若故意地使用暴力手段,将会受到严厉处罚。没有哪个社会鼓励工人去杀死老板、妻子去杀死丈夫;也没有哪个社会认为某种宗教的信徒以暴力对待信仰不同的人的做法是公平的。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而言,这类行为都是破坏性的,假若这类行为频繁出现,社会秩序便受到了威胁。在这种霍布斯式(Hobbesian)的世界中,社会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国家”概念是用于描述社会,使之作为整体而与其他的社会相区别。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构成的界限,它使社会成员被归入某些群体而不是其他的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乃是表达社会中个人间关系的含义的最佳概念。

然而,关于国家的认识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社会学关于这一问题的经典答案是由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提出的,迪尔凯姆断定:在每一社会秩序的基础,都有一套为社会成员共有的关于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取向或规范,这些共同构成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正是借助集体意识的作用,分离的个人才被社会化,才适应社会生活。集体意识是任何一个群体都具有的、是被宽泛地称之为文化的事物的基础。

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概念是许多社会学理论及研究的核心。坚持一个社会必须拥有集体意识基础,会自然而然地引发对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加以研究的要求。^①在试图理解发展(development)的过程中,不应将集体意识视作社会群体的静态组成部分。它必定是一个变量(variable),它一定有自己在一定意义上对应于社会结构变化的动态变化。这么讲应当是合乎实际的,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稳定的社会单位的大小、范围有了很大变动。这样的事实可为本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在这个发展连续体的一端,原始社会仅只是几个扩大家庭而已,而在另一端,几个发达的工业社会甚至横跨整个大陆。

绝大多数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在初期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文化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有效的科层制管理部门首先在今天的西欧区域内的几个地方出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初在这样几个核心(core)地区出现:西班牙的开斯梯尔(Castile),法国的法兰西(Ile-de-France);英格兰则先是在韦思克思(Wessex),后是在伦敦(London)以及家乡县(Home Counties)。所有这一些小地区的文化,均在不同程度上与那些远离核心的边缘(peripheral)地

^① See Gianfranco Poggi, *Images of Society*, Stanford, 1972, pp. 249-255.

区有所区别^①，区别之处包括语言、亲属关系结构、世袭系统、农业生产类型、居住方式、有无法律系统、宗教信仰，以及通常所说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形成中的国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日益先进的过程，各国的这些“中心”地区的政治影响与控制范围向现代国家的边界扩展。国家的发展可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当地区性独立的文化身份 (separate cultural identities) 开始失去其社会意义，开始变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时，国家的发展便开始了。在此过程中，几个地方的和区域的不同文化被逐步超越了它们之间区别的一个国家文化 (national culture) 所取代，核心及边缘地区的文化必须完全融入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系统，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对这一文化系统有着根本的认同与忠诚。

显而易见的是，边缘文化的同化在一些社会中要比在另一些社会中发展得更彻底。在加拿大、比利时及英国，社会内部长期存在分裂主义政治运动的事实说明，对边缘群体的成功同化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本研究的首要目标即在于对这些条件予以详尽说明。由于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相当有限，因而甚至要精确地说出这些条件的类型——或称之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变量”——也相当困难。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从理论上和思辨方面来讨论国家发展特性的文献，这些文献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在本书中，各种不同的理论探讨被浓缩简化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我知道这种建构模式的方法在历史学界是不受赞同的。传统的历史编纂要求事实先行，而不受模式的人为约束。然而历史著撰本身也要求使用某种知识框架，不论这一框架是明确的还是含蓄的。历史学家关于课题、分析单位及社会行为理论的抉择，构成了选择与组织资料的框架。选择框架应与具体课题相适宜。

本研究力图在总体资料的基础上，解释民族团结及变迁的社会起源。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分析这些资料并非很有意义，因为它们之间有太多的相似性。它们无法用于对特定 (specific) 个人或精英人物的分析，它们也不能用于解释为什么某个特定 (particular) 事件会是那个样子发生。所以，本研究不像一些读者所期望的对于细节给予特殊的重视，它最为关注的乃是说明大规模集聚人群间变动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研究倾向于使用明确的模式而不是模糊的模式，这更迫使研究者对其概念及解释机制作出明确的表述，也使研究者能够从

^① 其他关于核心及边缘的定义参见 N. G. Pounds 和 Sue Bell “Core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54, 1 (1964)，及 Sveri Langholm, “On the Concepts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nos 3-4 (1971)；

通常是含糊不清、逻辑上矛盾的理论探讨中，概括出一系列逻辑上一致的命题。只要资料充足，便可将这些模式用于经验研究。

在某些情形中，这些模式因其不完善而受到批评，有人说只有初入门者才会赞同它。本书中的模式当然无力涵盖社会生活的繁复内容，它们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作出解释，也不试图做到这一点。然而，正如随后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事物给予解释。使用模式的突出优点在于，它们可以被证伪，而描述则只能被修正。此处所用模式还相当简陋，以后会被更好的模式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才得以积累。无疑，这些特定的模式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是毫无魅力的，然而对于既定的研究目标及可利用资料的质量，我认为它们是目前所能建立的最佳模式。

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第一种模式为研究政治发展及现代化的学者所广泛使用，我称之为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这一模式的某些内容的来源是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的著作、现代结构功能学派的著作，以及对传播理论颇为关注的政治学家的著作。

扩散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进化论的特征，它认为国家发展过程包括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化阶段（preindustrial），在这一阶段，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隔绝，核心地区的事件对边缘地区并非毫无影响但程度相当有限，事件的结果也是如此。在一个地区的个体之间发生的事件，极少有来自另一区域的人参与。核心与边缘地区不仅是彼此隔绝，它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方面均存在显著不同。

就经济系统而言，区域差异可能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不同，如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市场规模大小及居住的集聚程度，生活水平以及不同区域的分层特征。文化上的差异可能表现在语言、宗教、工作和闲暇观，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作为这些差异的结果，社会化的情形在核心及边缘地区也不尽相同。最后，政治结构可能同时既存在相对集中的统治形式，又存在松散的组织及政治权威形式。

随着核心及边缘地区的接触日渐频繁，国家发展进入第二阶段。通常的观点是，这一阶段开始于工业化发生之时。扩散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工业化的结果及伴随的“中心—边缘互动”的增加。扩散模型认为“互动将导致共同体的出现”（from interaction will come commonality）。在处于发展状态的核心地区所建

立的社会结构,经过一定的时期会扩散到边缘地区^①。边缘地区的文化形式是在与世界其他部分相隔离的状态中发展,因此与正在现代化的核心地区的接触,会促使它们在追赶后者的过程中变革自身既有的形式。有人提出,在特定的时期,与工业化及核心——边缘地区日益频繁的接触相联系的大规模社会混乱错位将会强化边缘地区的文化分离意识。这是由于边缘地区的个人及群体最初可能会依附于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社会模式,并将其作为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的混乱的避难所,这其实是面对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的消极反应,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

这类“传统”行为将会逐渐消亡,因为人们逐渐地能够意识到工业化生活的新方式可以增加公共福利,他们会越来越满意,而且,最初的地区差别也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减弱。最终,核心和边缘地区将因为构成各民族内部认同前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条件的消亡而在文化上一体化,这些地区将由于工业化的影响而在众多特征上一致起来。民族发展的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阶段是各地区富裕程度的平等,文化差异失去社会意义,政治活动在全国性政党中存在,而且,假如比较幸运,政治活动将是依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在保证能够代表所有重要的群体的情况下进行。

地区特征的总体性变动,反映在个人角色扮演的深刻趋同性中。工业化必然包括了从角色扮演及功能的扩散到出现特殊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等变迁,即工业化引起结构分化,面对面的互动日益为个人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与后天获得的社会身份相比,先天的社会身份的重要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个人从传统的社区约束中解放,发展出“行为中心化”价值(performance-centered value)^②,这些均说明,现代社会系统的功能性需求会导致既存社会结构的崩溃,这种变化的含义之一是工业化使得原先被排斥在外的群体得以进入社会。

这种关于社会变化的模式是乐观主义的,然而它似乎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形。另一种模式在许多方面与它形成对比,我称后者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尽管目前它颇为时髦,内部殖民主义却并非什么新概念,弗·伊·列宁(V. I. Lenin)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一提法的人,他在一项关于国

① A. L. Kroeber:“扩散是一个过程,通常却又并非必然是渐进的过程,文化体系或内容要借之而传播,通过扩散,在一个地区被采纳了的革新或新制度在相邻地区也被采纳,在一些情况下会一个接一个地被遥远地区相继接纳,直至传遍全球”,(“Diffusionism”, in E. R. A. Seligman & Alvin Johnson,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II (1930), reprinted in A. and E. Etzioni,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1964, p. 142)。

② Neil J. Smelser,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1959).

家发展的经验性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概念,^①数年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研究意大利南部地区时使用了相近的概念^②,而在近一阶段,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们使用此概念以描述他们的社会中的美洲印第安(Amerindian)地区的情况。在我写这本书时,这一概念的使用在美国也被广泛接受,无论是在政治宣言或学术杂志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词。但是,无论赞同者抑或反对者,都未赋予我所认为这一概念实际具有的重要性,我希望本书能为此作出贡献。

与那种认为随着核心、边缘地区之间的接触会造成社会结构趋同化的观点大相径庭的是,内部殖民主义模式认为在这些地区之间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在内部殖民主义模型中,核心地区被认为在政治上统治边缘地区,在物质上剥削边缘地区,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不认为工业化将导致民族发展,除非在特定情形下才会如此。

可以对这一模型的特征作一简略的描述。全国领土上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造就了相对先进及相对落后的群体。作为最初相当偶然的优劣格局的结果,权力及资源在两大群体作了不平等的配置。先进群体或说核心地区试图通过一些政策使既有分层体系制度化而稳定并垄断自己的优势地位,它试图规定社会角色的分配,将那些社会地位高的社会角色留给自己的成员,相反,将较落后群体的成员排斥于这类角色外。这一分层体系被称为劳动的文化分工,它促进了两个群体对各自的族群的认同,行为者对自己和其他人依此划分归类,根据规则中的角色期望去行为。那些被认为规定了两个群体的特征的事物——如可见的符号或文化标志——的存在,促进了这种归类行为。在这一阶段中,并不会发生文化同化,因为文化同化不符合核心地区机构的利益。

当核心地区形成多样化工业结构的特征时,边缘地区的发展模式却是依附性的,是对核心地区经济的补充。即使边缘地区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它一般也是专门化的、服务于出口目的。因此边缘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相当敏感。有关投资、信贷、工资的决策通常在核心地区制订。作为经济依附性的结果,边缘地区的富裕程度落后于核心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边缘地区的社会分层乃是建立于可观察到的文化差异之上的。处于劣势的群体可能会断言自己的文化与较先进的核心群体的文化相

① V. I. Len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1956)

② Antonio Gramsci, "The Southern Question", in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1959).

比,至少与其平等甚至还优于后者。这促使它相信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nation),并追求独立。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同化及国家的发展可能会由于边缘群体为摆脱他们自己认定的受剥削状态和争取独立的努力而受挫。

给定相似的初始条件,即边缘、核心地区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两种模式对于由于地区间互动加强而产生的国家发展的后果有不同的预测,扩散模式的预测是地区间经济不平衡程度会降低,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则预测这种不平衡会持续下去甚至加剧;扩散模式提出了边缘地区文化同化的可能性,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则指出,作为对核心地区的统治的反应,边缘地区文化会努力维护自身;最后,扩散模式认为,在社会中所有的地区,功能性政治分解应成为政治行为的重要特征,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则认为,政治分解也是因群体而异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两大群体之间所存在的显著的文化差异性。两种模式的预测截然不同而又各自具有潜在的经验研究的解释力,这在社会科学界实在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局面。

本研究试图在同一历史及地理范畴中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所在,用16—20世纪的不列颠群岛(包括爱尔兰)的发展历程作为评价的依据。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不列颠群岛便开始连续不断地由许多独立的文化群体所居住。到了20世纪,这些岛屿上的大多数居民已自称为英国人,一些早期文化群体如匹克特人(Picts)、弗里西亚人(Frisian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丹尼人(Danes)及诺曼人(Normans),它们的名称及征迹很快便销声匿迹了,所有这些分离的文化群体在历史过程中融为一体,形成不列颠国家。

只有一个称作凯尔特人(Celts)的群体例外,在不列颠群岛的某些地区,迄今仍有许多人宣称自己的文化是“凯尔特文化”而不是“不列颠文化”。在他们宣称独立文化的基础上,这些群体形成了要求中央下放权力、实行自决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自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本研究关注的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急剧社会变迁中,不列颠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地区独立族群身份顽固持续的情形^①,力图阐释联合王国的国家发展进程的相对失败,这种失败不仅表现在1921年南爱尔兰的分裂,也表现在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迄今犹存的支持族群政治的社会基础。何以在先进工业社会的边缘地区迄今存有不同的族群身份(separate ethnic identity),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对国家发展的系统的比较研究未能从国家发展的

^① 海峡岛(the Channel Islands)及曼岛(the Isle of Man)不在分析之列,因为这些地区缺乏相应的可供比较的数据。

初期入手。

这种情形的可能成因有几种。除去自然哲学及政治学的学术传统外,本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发展只是近期才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关注点。有许多学者观察到,由殖民地发展起来的非洲与亚洲社会中,在国家独立、获得主权后,新国家的统治者面临着种种特殊的困难。这些新独立国家起初对于物质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期望很高,然而不久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性问题便变得突出起来。^①

尤其突出的是,由不同族群组成的反殖民联盟迅速瓦解,联盟为日益增长的内部分歧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群体的成员期望控制国家政权及资源的竞争,构成了族群不合的基础,由于这些相互竞争的族群是通过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区分彼此,因而大多数冲突与“文化”问题尤其语言、宗教有关。有关不同地区的这类冲突的个案研究很多,然而如在第二章中详加论证的那样,这些研究由于过多地关注“新”国家,因而其普遍性就相当有限。关键在于这些新独立国家不适于作为民族变迁研究的对象,因为要研究变迁,必然要求在较多的时空点上搜集事例,这一富于启发意义的必要条件证明,那些古老的、更发达的欧洲国家作为研究案例是合适的、富有价值的。

不幸的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人有限,社会科学家极少会乐于放弃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专业优势,转而费尽心力地对欧洲历史作另一种形式的解释,而少数做过这种研究的人多未足够地重视方法论问题^②,结果他们劳动的成果很快便丧失了意义。

搜集那些用以检验国家发展概念的有关事例并非易事,例如仅靠历史学家对大量史实的综合是不够的,大多数历史研究集中于那些对古老国度的核心地区有影响的事件上,因为这些部分是最富变化,也最有吸引力的。

那么,如何才是最佳做法呢?为了指出一些这类缺陷,我努力寻找那些能说明哪个理论模式最适于英国个案的资料来源。鉴于这些模式对总体性地区不平衡情况下的工业化后果做出了不同的预测,我首先寻找有关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人口普查报告很显然是第一步,国会蓝皮书及命令文件中也有丰富的材料。我有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介绍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

① 最近的例子是 Michael F. Lofchie 编写的《民族国家:独立非洲在发展中的限制》(*The State of the Nations·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in Independent Africa*) (Berkeley:1971)。

② Karl W. Deutsch 等主编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1957)。

爱尔兰各作为单独的地区的不同统计时序上的总体资料^①。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以县为单位的有关统计资料。在四个各自独立的文化区域(如将南、北爱尔兰分计,也可是五个),以县为单位可以获得118个单位的人口群体,可以做更复杂的资料分析。

研究中使用的大量定量资料来自1851年至1966年期间的11个时刻在各县搜集到的人口、社会及选举统计资料,这样的数据库在国家发展研究是独一无二的,它为横向分析和纵贯分析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只要有可能,我便试图用二手历史材料补充这些数据。然而,关键在于对检验国家发展的可选择模式来说,这些环境性的数据是否妥当,是个中心问题,这也是本书不断重复的主题。扩散模式及内部殖民主义模式都在很大程度以对个人思想的主观状态的判断作为立论基础,其中扩散模式尤其考虑到了个人规范及价值取向的非连续性变化情况,这些观点已受到颇有道理的非议,指出了在测量的信度及效度上的不足。但是在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的核心,也有关于社会心理过程的假设。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如果用系统分析的术语来讲,即是将其当作黑匣子对待。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事业中,致力于对个人及群体的实际行为的研究是更有效果的事,但在这一领域里搜集可靠的事实会面临众多的困难,要在历史情境中获取这种信息是何等的困难啊!在明确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限制条件的前提下,我试图在环境事实(ecological evidence)基础上推断个体及群体的某些行为。关于环境推导的适当性还存有许多学术争议,然而尽管这些复杂的方法论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我认为这一文献的意义在于,在进行适当的分析时,这些数据产生出其他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重要见解^②,这在历史性的研究尤其如此,以前的社会给后人留下的记录是十分有限的。毋庸讳言,在一个不甚牢靠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解释时,我会慎之又慎。

(汪 曼 谱, 李 平 校)

① Michael Hechter,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British Isl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 1 (1971), pp. 96-117.

② Matti Dogan and Stein Rokkan ed.,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1969).

同化的性质

米尔顿·M. 戈登 (Milton M. Gordon)

俗语中常说：“当人们相遇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① 现代世界中，人们之间在不同的条件下均可发生这种“相遇”：殖民征服、军事占领、国家疆域的改变因而包容各种民族群体、大规模的贸易和传教活动、对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土著人的重新安置以及使东道国 (host country) 民族构成更加复杂的自愿移民等。根据美洲大陆的经验，后两者是具有决定性的。美洲印第安人族群的被迫转移、白人征服者试图按自己的意愿对其进行整合，流向这块土地的超过 4 100 万人的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其他部分，小部分来自亚洲），从人烟稀少仅在沿海有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和国的时代，到目前扩展到整个大陆的国家，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讨论在美国“人们相遇”问题的背景。

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已经用过诸如“同化” (assimilation)、“文化移植”或“文化同化” (acculturation)^② 这些术语来描述民族“相遇”的过程和结果。有时这些术语表示的是同样的事物，有时在其他用法中，它们的意义又并非完全同一，而是彼此交叉（社会学家一般更常用“同化”一词；人类学家则倾向于使用“文化同化”一词，并给予它一个狭窄一些但基本一致的含意）。至于“同化”一词，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含混。进一步说，迫切需要对“同化”的概念进行严格而系统的分析，将其分解成各个包含在这个范畴中的所有可能的相关因素或

* 本篇为 M. M. Gordon 1964 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一书的第二章，翻译并在此书中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一本关于种族和文化接触的论文集用了这个题目。见阿兰·洛克 (Alan Locke) 和本哈德·J. 斯登 (Bernhard J. Stern) 编的《当人们相遇时》(When Peoples Meet) (New York: Hinds, Hayden and Eldridge, 1946 年修订版)。

② 国内也有人把 acculturation 译做“涵化”(编者注)。

变量。在前面部分讨论的基础上,本章即试图进行这样的分析。但首先考察一下社会科学家们用以描述相遇在一起的人群的一些已有概念的定义,将会很有帮助。

对“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的一项有权威性的定义,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任命的一个研究文化适应的分支委员会作出的。它分析和描述了文化人类学领域内的有关这个基本专题的研究,这些分析和描述非常重要。这个特别分支委员会包括杰出的人类学家罗伯特·拉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拉夫·林顿(Ralph Linton)、麦尔维勒·J.赫尔斯科维兹(Melville J. Herskovits)。他们对“文化同化”的定义是:

用以理解如下一些现象:即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①

此处我们注意到,这个术语仅用于界定人们相遇的一个因素或一个维度,即文化行为。两个群体中任何一个的文化都可能发生变迁;或者发生相互交叉的影响,两个群体的文化借此都得以更改。但是该定义对于两个群体社会关系,对于它们的“结构混合”(structural intermingling)的程度和性质(如果说有的话),对于群体的自我认同问题,以及在此情形下可能出现的其他变量都只字未提。

两位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对“同化”(assimilation)所作的一个早期且有影响的定义是:

同化是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与他们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②

^① 罗伯特·拉德斐尔德、拉夫·林顿、麦尔维勒·J.赫尔斯科维兹的《文化同化研究备忘录》(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38卷第1号(1963年2-3月),第149页。人类学对这个术语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麦尔维勒·J.赫尔斯科维兹(Melville J. Herskovits)的《文化同化:对文化接触的研究》(Acculturation: The Study of Cultural Contact), (New York); J. J. Augustin, 1938年;以及拉夫·林顿(Ralph Linton)编的《七个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 in Seven American Indian Tribes), New York·D. Appleton-Century Co. 1940年。

^② 罗伯特·E.帕克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社会学的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年,第735页。

这个定义显然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分支委员会对“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的定义。“分享他们的经历”、“与他们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这两句话,看来提出了社会结构关系的新增的标准。在后来的解释中,他们进一步提出和界定了这种标准:

社会接触激发了互动。同化就是互动的完美的最终产物。在此过程中社会接触的性质是决定性的。如果接触是基层的(primary)关系(即他们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如家庭范围中,以及亲密的、意气相投的小群体中的相互关系),同化会自然地迅速发生。如果接触是次级(secondary contacts)的,则其会促进适应(accommodation),而不会强烈地促进同化。这种接触是外在的和十分疏远的。^①

稍后,帕克(Park),这位美国社会学所造就的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在其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单独撰写的同化(assimilation)的定义中,则倾向于将此术语限定在(具有政治含义的)文化行为中,并暗含次级关系的同化。根据这个定义,同化(在此称“社会同化”)是:

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的人群(peoples),占据共同的地域,获得一种文化一致性(cultural solidarity),这种文化一致性至少足以维持一个民族的存在(a national existence)。这个或这些过程即称之为同化。

他继续补充道:

在美国,一旦一个移民掌握了当地社区的语言和社会仪式,并且不会遇到当地人的偏见而能公平地加入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普遍就认为他被同化了。而一般人的看法则认为,一旦一个移民“在这个国家能活下去”,他就被同化了。此外它还暗含,在所有的日常生活事务中,他能通过个人的价值,既不招人厌恶,亦无须证明自己的种族出身或文化传承,便能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②

这里提出了另一个变量(如果在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之

① 罗伯特·E·帕克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社会学的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年,第736-737页。

② 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社会同化》(Social Assimilation),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埃德温·R·A·塞利蒙(Edwin R. A. Seligman)和埃尔温·约翰逊(Arvin Johnson)编,纽约麦克米兰公司(Macmillan)出版,1930年,第二卷,第281页。

间可作恰当区分的话,实际上是两个)。它表明,只有接收社区(*host community*)对移民没有偏见态度,也没有歧视行为,因而移民可以正常发挥其功能时,同化才会发生。

帕克和伯吉斯还界定了“合并”(*amalgamation*)过程。它是:

一个生物过程。它通过杂交和族际通婚(*interbreeding and intermarriage*)而达到种族融合。而同化则只限于文化融合。(但是这里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然而,这里也指出了合并和同化两个过程间存在的关系:

合并(*amalgamation*)尽管仅限于通过通婚而达到种族特征的交融,但它也自然地促进了同化或社会传统的互补。^①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本社会学词典曾有两处提到有关术语,其中之一对“社会同化”的定义是:

具有不同社会遗产(*heritages*)的人,共同分事情感、传统和忠诚的过程。^②

这里,重点是在文化价值和行为的变迁上。“忠诚”(*loyalties*)这个术语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变量。但它未作更进一步的解释,所以要明确表述作者关于这个变量性质的构想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本词典中,社会同化(*social assimilation*)则被定义为:

不同文化或代表不同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融入一个同质单位(*a homogeneous unit*)的过程。

在与作为生物学过程的体质同化(*bodily assimilation*)作了比较,并提到将导致虽已分化但仍协调一致的细胞单元的复杂性之后,这个定义宣称:

同样,社会同化并不要求对所有单位完全认同。但它要求作出一些修正,诸如排除出身外国的特征等,这样可使所有人都能顺利适应新文化单位的典型结构与功能。……在本质上,同化是一个民族模式(*one nationality pattern*)取代另一个民族模式。一般而言,较弱或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群

^① 罗伯特·E·帕克和欧内斯特·W·伯吉斯(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社会学的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年,第737页。

^② 埃德娃·比恩·利特(Edward Byron Reuter):《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ology*),纽约牛津出版社(Dryden Press),1941年,第84页。

体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这些修正。^①

这个定义有许多含混之处。“融入一个同质单位”意味着什么？它是仅指文化行为，还是也涉及社会中的相互关系？若是后者，又是哪一种社会关系？“新文化单位”的性质是什么？我们注意到后一段话强调“一个民族模式取代另一个民族模式”的总结，似乎又将定义仅集中在文化模式的变迁上。

在最近的文献中，许多社会学家简单地将“同化”等同于“文化适应”，或将其定义为文化适应的一种极端形式。因此布雷顿·贝利(Brewton Berry)认为：

我们所使用的同化(assimilation)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走向拥有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当然，这不仅仅是指那些相对容易接受和获得的文化项目，诸如衣着、刀叉、语言、食物、体育、汽车等，它也指那些无形的东西，如价值观、记忆、情感、主张、态度等。因此，同化是指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s)的融合，它必须与合并(amalgamation)区别开来。合并是指起源不同的种族世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混合。^②

约瑟夫·费彻尔(Joseph Fichter)将同化定义为：

同化是一种社会过程。通过它，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与群体相互接受或履行对方的行为模式。我们常说一个人或一个少数群体被同化进另一个群体或社会，但此处再不能将其理解为一个单向过程。这是一种互动关系。其中尽管有一方对于对方的影响可能会远远大于另一方，但双方的行为是相互的。^③

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定义为“一个人或群体采纳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或者是导向这种采纳行为的过程。”紧接着，他又将“同化”(assimilation)界定为：

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采纳。这种采纳程度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特征可以把这个人或群体与其原先文化联系起来，

① 亨利·帕雷特·法恰尔德(Henry Pratt Fairchild)主编：《社会学词典》(Dictionary of Sociology)，纽约哲学图书馆(Philosophical Library)出版，1944年，第276—277页。

② 布雷顿·贝利(Brewton Berry)：《种族关系》(Race Relations)，波士顿赫登·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出版，1951年，第217页。

③ 约瑟夫·H·费彻尔(Joseph H. Fichter)：《社会学》(Sociolog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29页。

对其原来的文化也不再有任何特别的忠诚。导向这种采纳的过程即是同化。^①

约翰·库柏(John Cuber)将群体竞争及其减弱这个变量,加到其对“同化”的简明定义中:

同化可被定义为文化差异(和竞争)趋向消失的渐进过程。^②

阿诺德·格林(Arnold Green)对同化的讨论引用了帕克和伯吉斯的定义。在其对其进行评价时,他富有洞见地区分开了文化行为和社会结构性参与(social structural participation):

个人和群体可能“获得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但同时却又不能“分享他们的经历”,同时发现自己在“整合进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方面”被无限地拖延着。为什么?因为接收群体的许多记忆、情感和态度是共同的资产(common property)。在美国这包括诸如爱国主义、基督教、尊重私人财产、对神话英雄的崇拜等许多东西,都是赋予全社会的,它们很容易为所有人所接受。而另一方面,“共享经历”和“整合进共同生活”,首先受到接受群体意愿方面的限制,其次受到新来者方面对是否积极参加接受群体社会的意愿程度与要求的限制。

尽管社会参与的障碍常常是由接收群体设置的,但移民群体或其一部分,同样也可能希望设置了这种障碍。^③

在我们看来,关于同化定义方面的这种分化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理解美国经历的同化过程到底是什么的主要关键之一,即存在于对文化行为和社会结构的细致区分之中。当今人们在讨论美国多元社会的性质时,已将这种区分界定为“行为同化”和“结构同化”^④的差别。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种区分。

最近两篇有关移民——本地人互动过程的文章强调了建构文化多元主义

① 阿诺德·罗斯(Arnold M. Rose):《社会学:人类关系研究》(Sociology: The Study of Human Relations),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56年,第557—558页。

② 约翰·库柏(John F. Cuber):《社会学:学科概要》(Sociology: A Synopsis of Principles),纽约,Appleton-Century-Crofts,第三版,1955年,第609页。

③ 阿诺德·格林(Arnold Green):《社会学·现代社会生活分析》(Sociology: An Analysis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纽约,McGraw-Hill Book公司,1952年第一版,第66页。

④ 米尔顿·M·戈登(Milton M. Gordon):《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的目标》(Social Structure and Goals in Group Relations),见莫罗·伯格(Morroe Berger)、西尔诺道·埃尔伯(Theodore Abel)和查理斯·H·佩治(Charles H. Page)编:《现代社会中的自由与控制》(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纽约D. Van Nostrand公司出版,1954年, p. 51。

框架的可能性。它们用“吸纳”(absorption)与“整合”(integration)两个名词指称这种互动过程。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移民的研究,高度关注基本群体(primary groups)、精英分子(elites)、移民和接收社会的本地人之间的结构和心理接触的功用,并在论述移民调适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角色分析^①。他的“制度弥散”(institutional dispersion)的概念,即“在社会制度的不同领域内移民的分散和集中程度”^②,指出了同化过程的另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波利(Borrie)和其他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文件和记录基础上所做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整合”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伯纳德(Bernard)为一次会议^③准备的一篇论文中,其定义和讨论如下:

事情的真相是,美国并没有同化外来者,也没有吸收他们。我们的移民群体(immigrant stock)和所谓的“本土群体”(“native” stock),已经整合到一起。这就是说,每一个因素都通过与其他人的联系而有所改变,却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充满活力的。它在文化(如你愿意,也可称之为文明)混合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改变,而与原先有所不一。只要不落入形而上学的泥坑,我们可以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虽然受到彼此互动的影响,却仍然保持独立,并具有补充作用。

显然,在社会统一体的框架内,整合的概念必须以相信文化分化(cultur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为基础。它承认群体和个体有保持自身与主体社会的不同性的权利,只要这种分化不导致对他人的统治或分裂。^④

既然我们已经回顾了一系列用于描述群体相遇的过程和结果的术语的不

① S. N. 艾森斯塔特(S. Eisenstadt):《对移民的吸纳》(The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伦敦 Routledge 和 Kegan Paul 出版社,1954 年。也见他的《精英和初级群体在以色列新移民吸收过程中的位置》(The Place of Elites and Primary Groups in the Absorpt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Israel),载《美国社会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 57 卷,第 3 号(1951 年 11 月),第 222—231 页;《以色列吸纳新移民的过程》(The Process of Absorption of New Immigrants in Israel),载《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第 5 卷,第 4 号(1952 年 11 月),第 373—395 页;《以色列移民间的沟通过程》(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mong Immigrants in Israel),载《公众意见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第 16 卷,第 1 号(1952 年春季号),第 42—58 页;《移民和移民吸纳的模式分析》(Analysis of Patterns of Immigration and Absorption of Immigration),载《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第 7 卷,第一部分(1953 年 11 月),第 167—180 页。

② 艾森斯塔特:《对移民的吸纳》,第 13 页。

③ W. D. 波利(W. D. Borrie):《移民的文化整合》(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以及 M. Diegues, Jr., J. Isaac, A. H. Neiva, C. A. Price, J. Zubrzycki 等人的个案研究,巴黎 Unesco 出版社,1959 年。

④ 威廉·S·伯纳德(William S. Bernard):《美国移民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巴黎 Unesco 出版社(油印),1956 年,第 2 页。也见 W. D. 波利(W. D. Borrie):《移民的文化整合》(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第 93—94 页。

同意义和用法,已经注意到被程度不同地区分出来的许多变量,那么就让我们着手解决本章开头即提出的任务:仔细分析同化过程,即对主要变量或因素作个别的、详细的说明,并描述其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将部分地以刚才回顾的名称和用法为基础,而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说明将主要以美国为例。

首先,让我们假想一种情况。有一个东道主国家(我们给它一个编造的名字称之为西瓦尼亚)。其人口的所有成员具有相同的种族、宗教、民族出身。除了社会阶级差别之外,其文化行为是相对单一的。与此类似,西瓦尼亚社会的群体和制度即“社会结构”,仅仅在社会阶级的基础上才有所区别和分化。通过迁移,另一群人进入这个国家。这群人与东道主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民族背景和宗教,因而具有不同的文化模式。我们将称之为蒙多维亚人。让我们进一步设想一下,又过了一个世代,这群原属蒙多维亚民族的人(现在主要由出生在西瓦尼亚的第二代人组成),已经完全接受了西瓦尼亚人的文化模式,丧失了对蒙多维亚族群的任何归属感。他们的宗教信仰已变成了西瓦尼亚人的宗教,他们避开主要或完全由蒙多维亚人组成的任何社区组织,在各种阶级层次上进入西瓦尼亚人的社交小群体、俱乐部和机构,并受到热情接纳。他们与西瓦尼亚人自由频繁地通婚,西瓦尼亚人对他们也没有偏见或歧视(一个原因是他们与其余的西瓦尼亚人在文化上和结构上不再有什么差别)。在西瓦尼亚的公众生活中也不再产生族群价值冲突问题——即蒙多维亚人已与东道主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完全同化。注意,在此我们对这样一个目标从社会学角度上看的必要性、可行性或道德正确性并不作判断。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们才作此抽象,建立起一个“理想类型”——这一理想不是在价值意义上最值得追求的,而是代表(同化)概念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被表现于“纯粹的”、没有任何前决条件的形式之中(“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个方法论工具,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立和命名的)。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包括在所讨论过程中的七个主要变量。换句话说,在蒙多维亚人同化到西瓦尼亚社会中去时,发生了七个基本的亚过程(subprocess)。这些亚过程可以进行如下的排列。我们可以说,蒙多维亚人已经:

1. 将他们的文化模式(包括宗教信仰、礼仪习惯)改为西瓦尼亚人的文化模式;
2. 与西瓦尼亚人建立起大规模的基层群体关系,即完全进入西瓦尼亚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网络或社会结构之中;
3. 与西瓦尼亚人通婚,并在血缘上完全混合;
4. 发展了西瓦尼亚群体意识或族群性(sense of peoplehood, or ethnicity),并

取代了原来的蒙多维亚的相应意识；

5. 不再遇到当地人的歧视行为；
6. 不再面临当地人对他们的偏见态度；
7. 当他们提出有关西瓦尼亞公共或世俗生活这类性质的要求，不会引起任何与本土西瓦尼亞人发生价值冲突和权力冲突的问题（如生育控制问题）。

这些步骤或亚过程的每一步，均可被视为同化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或方面。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同化的各种类型。比如，我们可以用“结构同化”来指蒙多维亚人进入西瓦尼亞人的基层群体关系之中；或者用“认同同化”来描述对西瓦尼亞群体意识的接受。对一些特定的同化亚过程，已经存在着特定的用语，我们已经在前面做了介绍。例如文化或行为同化就已经被定义为“文化适应”。下表即列出了同化亚过程或变量的一般名称和特殊名称（若有的话）。

表1 同化变量

亚过程或条件	同化的类型或阶段	特殊名称
把文化模式变为主社会的文化模式	文化或行为同化 cultural or behavioral assimilation	文化同化① acculturation
在基层群体层次上，大规模进入东道主社会的小群体、俱乐部、机构	结构同化 structural assimilation	无
大规模族际通婚	婚姻同化 marital assimilation	合并② amalgamation
发展出完全基于东道主社会的民族意识	认同同化 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	无
族群之间消除偏见	态度接受同化 attitude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	无
族群之间消除歧视	行为接受同化 behavior receptional assimilation	无
族群之间消除价值冲突和权力冲突	公民同化 civic assimilation	无

不仅同化过程主要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很显然，上面区分的各个阶段或亚过程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

① 有关双向的文化影响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考虑。

② 我在此用这个术语，并非断言两个相互通婚和杂交的群体的种族多样性。随着对“种族”含义的越来越深的理解，以及作为一个科学术语的相对性和随意性，这个标准变得不重要了。不管这两个“基因池”(gene pools)多么相似或相异，我们都可以用“合并”或代表两群人的两个“基因池”的混合这些术语。

在刚才的例子中,同化发生在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这些社会和文化为东道国的本地人族群所有,在移民到来之前一直没有竞争者。若是其他例子,当新群体到达时,现实社会中可能已经存在几种亚社会与亚文化,但是其中必然有一种及其生活方式,或者因为最早占领该地,先拥有权力、或在人口数量上占优势,从而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需要用一个术语来代表占支配地位的亚社会,它为其他群体的调适及测量调适的程度提供标准。我们已尝试过“东道主社会”(host society)这个术语,但需要一个更加中性的名称。A. B. 荷林舍德(A. B. Hollingshead)在描述纽黑文(New Haven)的阶级结构中,用“核心群体”(core group)来指称殖民时代的老美国家庭,他们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社区的权力和地位体系在传统上由他们支配,这个城市其他群体阶级体系的主文化模型(master cultural mould)也是由他们提供的。^①乔舒亚·费希曼(Joshua Fishman)也提到过美国生活中的“核心社会”和“核心文化”。这个核心“本质上是由白人新教徒和中产阶级构成的,所有其他成员都被这个核心所吸引。”^②如果美国生活中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视为美国的主体文化,它能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参照物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对于它最好的描述就是新教徒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背景的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而后来进入美国文化、并对其有微弱影响的其他文化,只能暂时摆在一边,同时为了研究的目的中上阶级与中下阶级文化世界的差别也可忽略。

有一点,我特别希望不被误解。我从未暗示说,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对美国文明的贡献很小、微不足道。恰恰相反,有许多美国人,他们的祖先并非来自英国,其传统也非英国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与英国不相近,但他们在工业、商业和专业技术、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绝对超群的,许多个体是极其

① 见奥古斯特·B. 荷林舍德(August B. Hollingshead):《社会分层的趋势:一个个案的研究》(*Trend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Study*),见前引书第686页;A. B. 荷林舍德和弗雷德里克·C. 雷德里奇(Fredrick C. Redlich)合著:《社会阶级和精神病》(*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同前引书,第三、四章。我并不完全清楚,荷林舍德用“核心群体”一词,是仅指上层和中上层的旧美国家庭,还是指整个阶级结构中的美国人。

② 乔舒亚·费希曼(Joshua A. Fishman):《在美国对孩童进行少数群体成员资格灌输及对少数群体双重文化主义的要求》(*Childhood Indoctrination for Minority-Group Membership and the Quest for Minority-Group Biculturalism in America*) (油印)。这篇论文在《美国生活中的民族群体》(*Ethnic Groups in American Life*)一书中经修订,以《对孩童进行少数群体成员资格灌输》(*Childhood Indoctrination for Minority-Group Membership*)的题目发表。见《代达罗斯》(Daedalus):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学刊)1961年春季号。也见杰更·罗施奇(Jürgen Ruesch):《疾病中的社会技术、社会地位和社会变迁》(*Social Techniqu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Change in Illness*),裁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e Kluckhohn)和亨利·A. 莫雷(Henry A. Murray)编:《自然、社会和文化中的人格》(*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纽约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1948年。它有一次用了“核心文化”这个术语指美国中下阶级的文化。

辉煌的。再考虑到这些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群体对美国工农业发展的贡献,对社会人口的大量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20世纪中期美国的伟大是具有各种族、宗教、民族背景的人们共同贡献的结果。^① 尽管如此,我的观点是,除了一些例外,当移民及其子女成为美国人时,他们作为工人、农民、医生、律师、科学家、艺术家等的贡献,是通过文化模式作出的。这些文化模式主要由美国文化所塑造。美国文化是以具有英国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体,其支配地位从殖民时代即已开始,它的文化统治至今在美国也未受严重威胁。人们必须区分文化模式自身的影响及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贡献。对美国移民及其子女而言,他们所发挥的决定性影响是后者的领域。

因此,我赞成费希曼把白人新教徒中产阶级所组成的群体称为“核心社会”,或用我的术语“核心亚社会”(core subsociety);将这个群体的文化模式称为“核心文化”(core culture)或“核心亚文化”(core subculture)。我将使用荷林舍德的术语“核心群体”(core group),指称位于任何社会阶级层次的白人新教徒。

现在,让我们暂时再回到我们所虚构的西瓦尼亚国上,并想象一下造成另外一种有明显不同结果的蒙多维亚族群迁移。在这种情况下,西瓦尼亚人从蒙多维亚人那里接受到许多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就像蒙多维亚人改变了许多他们的习惯以期与西瓦尼亚人的风俗一致一样。这种相互变化基于恰当的修正和相互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渐渐形成。它既不完全是西瓦尼亚人的,也不是蒙多维亚人的,而是两者的混合。这是一种复合文化,是“熔炉”的产物。这个熔炉将两个群体的文化在同一个社会容器中熔化,形成标准一致的新文化产品。当然,这个过程也包括基层和次级群体中彻底的社会混合,以及大规模的族际通婚过程。这个熔炉将两个社会群体在社会和文化上合二为一。

在此我们不想讨论刚才所描绘的过程是否可能。它也是一个“理想类型”,一种不同于我们所能实测的发生的事实的抽象。我认为我们分解的同化过程的七个变量,能够按“熔炉”目标和“适应核心社会和文化”目标来进行测量。这就是说,在设定了“熔炉”目标后,我们就可以问,两个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发生

^① 参见奥斯卡(Oscar)和玛丽·F.哈德林(Mary F. Handlin):《移民的积极贡献》(The Positive Contribution by Immigrants)的第一章《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该书由巴黎 Unesco 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了文化适应并形成一种复合文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混合等等。^①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同化模型，这个模型有七个变量，我们可以应用这些变量，参照两个不同目标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对同化过程进行分析。这两个目标系统是：(1) “适应核心社会和文化”(adaptation to the core society and culture)；(2) “熔炉”(melting pot)。理论上，参照执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目标系统，应用变量分析模型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于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本身的理解还很不充分，所以它很不成熟。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检验这七个变量与文化多元主义概念的关系。对熔炉的概念我们也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现在，让我们在美国选择一个“少数”族群，尝试应用同化模型来进行分析。表2中的范式允许我们紧凑地、有比较地记录和总结大量信息。为清楚起见，我们在此考察四个群体：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黑人与说西班牙语者除外)、波多黎各人。基本的参照目标是“适应核心社会和文化”。在此意义上，表中各条可被视为假设。注脚将对本表作出限定性解释，对每栏标题的定义，读者可参阅表1。

表2 同化范式

(应用于在美国所选择的群体，基本的参照目标：适应核心社会和文化)

群体	同化类型						
	文化的 ^②	结构的	婚姻的	认同的 ^③	态度接受	行为接受	世俗的
黑人	随阶级而变 ^④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犹太人	本质上是	否	本质上否	否	否	部分	大部分

①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D·兰伯特(Richard D. Lambert)教授。他指出，应用我的一系列变量必须参照同化的基本目标。而在我原先的论文大纲中，我只将其用于“适应核心社会和文化”的目标系统。

② 当然也发生了一些双向的文化影响。自从与美国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以来，美国的语言、饮食、娱乐方式、艺术形式、经济技术等已受到非盎格鲁-撒克逊群体文化的某些影响。但是美国文化的影响更大，因而双向影响作用较小。参见乔治·R·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s of Life)，纽约 Doubleday 公司出版，1954 年，也可参阅我们后面章节的讨论。此外，少数民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移民间的文化模式。他们还特别保留了新教以外的宗教。因此我用“本质上是”(Substantially)来表示这种适应程度。

③ 正如我早即指出的，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民族认同可分为几个“层次”(layers)。我并非指美国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将他们自己看作不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只是他们还有一种“深层”的民族意识，即他们是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而不是“白人新教徒”或“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后者才是相应的核心社会的深层民族认同。

④ 尽管很少，在美国黑人中也发现有非洲文化的痕迹。下层黑人生活中残存的奴隶制、内战后的歧视、城乡的贫困，由外力造成的他们与白人中产阶级世界的隔离，这使得他们与美国文化规范相距甚远。另一方面，上中层黑人已适应了美国的核心文化。

(续表)

群体	同化类型						
	文化的	结构的	婚姻的	认同的	态度接受	行为接受	世俗的
天主教徒 (黑人与说西班牙语者除外)	本质上是	部分(随地 区而异)	部分	否	部分	大部分	部分 ^①
波多黎各人	大部分否	否	否	否	否	否	部分

社会学理论有一项任务,即是不仅要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过程或情境中识别出存在的因素和变量,而且也要假定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让我们用这个观点来审视一下这七个同化变量。我们注意到,表2中列举的四个族群,实际上只有波多黎各人被认为并未在文化上被同化。波多黎各人是美国最近的主要移民群体。在黑人(他们是美国最老的少数群体之一)那一栏,我们发现除社会阶级上发生了文化同化外,多数其他变量并未发生同化。这两个并列的事实,为我们理解文化同化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提供了一条线索。这种关系可表述如下:(1)文化同化,或文化适应,可能是少数民族群体移民后发生的第一类同化,(2)即使没有其他任何类型的同化同时或随后发生,少数群体的文化同化或文化适应也有可能,并且这种“只发生文化适应”的状况,可能会无限期继续下去。

如果考察一下流向美国的移民史,这两个命题看起来都会被证实。美国诞生后,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不断扩散到全美。他们起初来自北欧和西欧,随后来自南欧、东欧和东方。他们首先接受了英语和美国人的行为模式。甚至当移民殖民地的创立将他们的成员从“核心社会”美国人广泛的基层关系中隔离出来时,以及甚至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还十分厉害时,也是这样。尽管在移民自身一代内,这种接受只是部分性的,但对美国公共学校培养的、母语是英语的第二代及以后各代,美国文化适应过程的影响已占绝对优势。剩下的是社会阶级流动以及这种流动所要求的某种文化适应问题。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化同化并不保证每一个少数群体都进入白人新教徒的基层群体和机构(即亚社会)。除了从北欧和西欧来的白人新教徒移民(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德国人)外,总的来说,基层水平上的结构混合并未发生。这种成功的文化适应也没

① 此处,“部分”的原因是,天主教徒与大部分其他美国人在诸如生育控制、离婚、人工流产、宗教关系等问题上的价值和权力冲突。

有消除偏见和歧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导致与核心社会的大规模通婚。

关于美国所发生的文化适应过程的速度和程度，我可以得出如下的概括性结论：(1) 如果一个少数群体在空间上被孤立，或被隔离（无论是否自愿）在农村地区，例如美国印第安人仍然居住在他们的“保留地”内，那么文化适应过程也将是十分缓慢的。(2) 不同寻常的明显的歧视（如美国黑人所遭受的），如果一直使大量的少数群体成员被剥夺教育和就业机会，他们因而注定要停留在低等环境中，那么该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就会被无限期拖延。就美国黑人而言，从美国历史的长远观点看，无论如何，这种歧视只会导致文化适应的拖延。稍有好转的是，现在出现了数量明显的黑人中产阶级。

在我们结束对文化适应变量及其关系的特定检验前，最好先区分一下两类文化模式或文化特质，它们可用以表示任何一个族群的特征。有一些方面如宗教信仰和实践、族群价值观、音乐爱好、大众娱乐方式、文学、历史语言、对共同经历的认识，它们是这个群体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也恰恰来自于这种遗产（heritage）。我们称其为本质的（intrinsic）文化特质或模式。其余的诸如服饰、举止、感情表达方式和在英语发音上的小毛病，往往是一个群体适应当地环境的历史上和现实的坎坷过程的产物（也反映了社会阶级的经历和价值）。在真正意义上，它们是外在于该群体族群文化传统的核心的。这些可称之为非本质（extrinsic）文化特质或模式。举例说，来自东欧、南欧的移民信仰天主教和犹太教，这与美国核心社会及其新教徒的宗教归属，在本质文化方面就表现了一种差异。而核心社会的中上层美国人，其情感表达比较含蓄，与之相比，东南欧农民则更加易变，这方面就构成了非本质文化上的差异。再举一个例子，最近从南方迁入各地城市的下层黑人，其与众不同的说话方式或隐语在南北城市都广泛传播。这就是外在环境的产物，而不是黑人文化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它也是一种非本质的文化特质。这种隐语是黑人社会流动和适应核心社会文化的一个很大障碍。但倘若它消失了，黑人自我认定为一个群体、或者黑人的族群历史感与认同感并不会因此而受到重大影响。尽管对本质文化和非本质文化的区分是尝试性的，并且不可能同样地应用到所有的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s）上，但它还是有用的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文化适应过程，特别是在其与偏见与歧视的关系方面。

当我们再次检视同化的一系列变量时，其他几种关系便自己显示了出来。其中一种是结构同化和婚姻同化二者依时间顺序联系十分紧密。这就是说，少数民族群体在基层群体层次上进入核心社会的社交小团体、俱乐部、机构，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当数量的相互通婚。如果族群背景不同的孩子，同属一个游

戏群体,后来又同属一个青少年小团体,在大学中属同一个联谊会;而他们的父母则同属于一个乡村俱乐部,且相互邀请到自己家中吃饭,那么这些孩子们长大后会互相恋爱、结婚,欢愉之中忘却先前的族群出身,这是完全可能的。一些宗教社团或民族群体的领导人,努力想维持自己群体的族群认同。他们在认识到如上的联系之后,就努力增设青年团体、成人俱乐部和公共机构,并常常将其成员的基层关系完全限定在本宗教或本族群内部。^①

作为结构同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婚姻同化如果全面发生,那么少数群体就会在较大的东道主社会或核心社会中丧失其族群认同,于是认同同化便发生了。偏见和歧视便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原先少数群体的后裔最终将变得不可识别。基层群体关系也往往变成一种包括所有群体成员的“内群感”(ingroup feeling)。如果所有的本质和非本质文化特质上的同化都完成了,那么在现在已经分散到社会各个部分的少数族群后裔和核心社会成员之间,就不可能产生关于世俗问题的价值冲突。因此,剩下的几类同化都完成了,就像一系列安排得很好的十柱戏(tenpins)一样,迅速连续地向前滚动。于是,我们暂时可作如下概括:一旦结构同化(或与文化适应同时,或随其后)发生,所有其他类型的同化将自然地随之而生。几乎无需指明,正如我们上面所强调的一样,尽管文化适应并不必然导致结构同化,但结构同化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适应。因而正是结构同化,而非文化适应,才是同化的关键。但这种同化的代价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及其独特价值的消失。

通过这些变量还可表示许多其他重要的假设和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文化适应发生而结构同化并不发生时,“态度接受”同化和“行为接受”同化——即抛弃偏见和歧视——是否会发生。我们的分析模型能否应用到“文化多元主义”上,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对它的讨论,我们摆在后面的章节。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核心群体与少数族群之间在本质文化上的差异还是非本质文化上的差异,哪一个更与偏见和歧视相关。我猜想,至少在我们的时代,非本质文化上的差异比本质文化上的差异更易产生偏见。^② 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并不必

① 可参阅威廉·E·维奇(William E. Vickery)和斯坦沃特·G·考勒(Stewart G. Cole)在《美国学校中的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一书中,所做的对文化特质类型的区分。纽约Harper and Brothers出版社出版,1943年,第43—44页。

② 参看威廉·E·维奇(William E. Vickery)和斯坦沃特·G·考勒(Stewart G. Cole)在《美国学校中的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Schools),第45页。

然导致 20 世纪美国的辛酸刻薄 (bitter acrimony)^①，尤其是当宗教差异发生在本土上出生的、外貌、说话方式、行为举止显然一致的美国中产阶级中。另一方面，贫民窟中的青少年穿着祖特 (Zoot) 服 (若干爵士乐谜及西印度群岛上的人们穿的衣服其上衣及膝，裤子狭窄。——译者注)，养着连鬓胡子；而美国中产阶级则衣着保守，循规蹈矩。这两群人之间在非本质文化特质上的差异，明显地使他们之间产生怀疑和敌意。这不是说，美国族群间本质价值的差异 (尤其是当这些差异已大到影响美国公众生活时) 不会产生权力冲突。但人们必须区分非理性的民族偏见和公众场景中的群体冲突。前者可能被称为守旧意识，后者则是基于相反价值观的冲突，双方往往真挚地各执己见。

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分析模型中的变量^②，因为前面的讨论已说清了它们的潜在用途。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分析框架——一套概念范畴，它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同化过程的复杂性，注意到它变动的多种方向，辨别其中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考察同化理论和美国历史上少数群体的生活时，这种分析工具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吴晓刚 译。俞家栋 校)

① 参看 R. M. 麦基弗 (R. M. MacIver) 的名言：“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的理由，将宗教本身视为引起美国社会日常关系中的表现出来的紧张、分裂的重要因素。”载于《更完美的联盟》(The More Perfect Uni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The Macmillan Co.) 出版，1948 年，第 12 页。

② 客观的歧视行为现象，能否在主观的偏见态度消减或根除之前而被削减或根除，这一问题引起目前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关注群际关系问题人的极大兴趣。这个问题可以借助我们的模型而加以考虑。那么，可以认为“行为接受的同化”会先于“态度接受的同化”吗？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州和市也立法反对歧视。这当然构成了对一个假设的检验。这个假设是“即使偏见依然存在，对歧视的法律限制也可能是成功的，这样的法律限制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偏见”。参见罗伯特·V·默顿 (Robert V. Merton)、《歧视与美国的信条》(Discrimination and the American Creed)；载于 R. M. 麦克爱娃 (R. M. MacIver) 编，《歧视和国家福利》(Discrimination and National Welfare) (纽约 Harper and Brothers 出版社 1949 年出版)；也可参阅阿诺德·M·罗斯 (Arnold M. Rose) 编，《种族偏见与歧视》(Rac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 1951 年版) 一书中的两篇文章：一篇为大卫·W·彼特戈斯奇 (David W. Petergorasky) 的《与种族主义作斗争》(On Combating Racism)，另一篇为阿诺德·M·罗斯 (Arnold M. Rose) 的《法律对偏见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egislation on Prejudice)。还可参阅约翰·P·罗奇 (John P. Roche) 和米尔顿·戈登 (Milton M. Gordon)：《道德能立法吗？(Can Morality Be Legislated?)》，载《纽约时代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55 年 5 月 22 日，重印于米尔顿·L·巴隆 (Milton L. Barron) 编的《美国少数民族》(American Minorities) 一书 (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1957 年版)；国家社区关系咨询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关于重新评定的一份报告《运用法律推进社区关系的发展》(The Uses of Law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munity Relations)，1955 年 6 月。

种族和族群关系理论的探索

米尔顿·M. 戈登 (Milton M. Gordon)

我在 1964 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①一书中, 提出了一个测度同化进程的多维模型, 并用它分析了美国历史上以及当代的同化状况。这个模型明确地提出了七个测量同化的维度或变量: 文化的同化、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方面的同化、态度上彼此接受(无偏见)、行为上彼此接受(无歧视)和公民的同化(无价值观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冲突)。对于这些变量间的关系我还提出了一些假设, 即:(1) 在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接触过程中, 将首先发生文化同化或文化适应;(2) 文化同化甚至可能在其他类型的同化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出现, 而这种“独自发的文化同化”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无限期的;(3) 如果结构同化与文化同化同步或者发生在文化同化之后, 那么所有其他类型的同化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由这一组变量和命题构成的理论模型, 曾被用来分析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盎格鲁一致性”、“熔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 以及美国历史与当代的种族、族群生活的真实状况。结果表明, 尽管历史上确曾发生了民众的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模式为目标的文化同化(虽然有些人的同化并不完全, 形式也不一致), 但同时种族与宗教群体之间以及某种程度上不

* 本文原载于 Nathan Glazer 和 Daniel P. Moynihan 主编的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第 84 至 110 页)。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同意, 谨此致谢。

①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在更早一些的两本著作中, 其中一本可追溯到 1954 年, 我曾就这一模型的文化同化与结构同化进行了区分。参见我的“Social Structure and Goals in Group Relations,”收入 Mor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和 Charles H. Page 编辑的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54), pp. 141-157, 和“Assimilation in America: Theory and Reality,”*Daedalus* (Spring 1961), 263—285。

同国家来的移民群体之间在社会结构中的相互分离依然存在。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亚社会,在其亚社会基层群体关系的确定和组织成员的吸收过程中对族群因素毫不在意。美国20世纪60年代早期种族与族群关系的整体图景——虽然对我来说似乎还不是十分清楚,我将之概括为“结构多元主义”(structural pluralism)。这种分析思路向研究种族或族群的学生说明,在美国并未出现早一代乐观的社会学家所预言的那种情况,即不可避免的同化和“融合”将美国少数群体纳入某种共同的框架中,并进而导致它们的消亡。用格莱泽(Glazer)和莫尼汉(Moynihan)的话说,就是“族群性顽强存在的事实需要人们予以关注、理解和互相合作。”^①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及进入70年代后,美国国内连续发生了一些有关群体之间的事件,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种族与族群冲突也在加剧。在此期间,一些学者如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布莱洛克(Blalock)和谢默霍恩(Schermerhorn)做了大量有关族群与种族关系的比较研究,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探讨。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将自己以前的同化进程理论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重新检验。^{②③} 上面所提到的国内事件主要指“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美国黑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美国主要城市中发生的黑人暴动,黑人为掌握黑人社区公共机构管理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被认为是这些事件发展的结果的新情况,如美籍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甚至“白人民族”的群体认同意识和集体行动的增强等等。

本文要做的调整,首先是要考虑同化分析中权力和冲突这两个概念和关系,这一点在我以前的研究中被相对忽视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轻视了),其次是试图将同化、多元主义、权力等放进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多元因果模型的框架中,以推测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间关系中将发展出来的具体的结局,至于同化范式本身,以及它对美国60年代早期以前的历史经历所作的阐述,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布莱洛克(Blalock)曾经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将权力定义为资源的产物以及对那些资源的动员能力。他还将资源区分为竞争性资源和施压性资源(com-

^①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1963), p. V.

^②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7); H. M. Blalock, Jr.,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7); R. A. 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③ Blalock,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Group Relations*, 第4章。

petitive resources and pressure resources)。这样,就有两种力量:竞争性力量和施压性力量。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界定为:竞争性权力(competitive power)——个人在社会酬赏制度中的竞争能力;施压性权力(pressure power)——影响社会中群众风潮变化趋向的力量。我还发现将施压权力再细分为两个子类型是有益的,它们是:(1) 政治压力(pressure power),狭义而言指通过参与选举和诉讼等途径促使各级立法机关、法院以及政府执行机关采取某种有利于自身的行动的影响力;(2) 分裂性压力(disruptive pressure),包括各种可能割裂正常的社会交往渠道的行为,它是一个连续链:一端是和平的非暴力抗议,另一端是暴力革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会有暴力威胁下的愤怒的对抗以及接二连三的群众暴动等形式。

明确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再来重新考察人们对美国种族和族群关系领域内的社会变迁的方式的理想,这些理想曾盛行于 20 世纪中叶的这个国家的种族平等运动的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中——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也盛行于一切怀有美好愿望的人们中间。这些理想大体如下:由于无论在人口、经济还是政治等方面,白人都占有压倒性支配地位,因而要改善少数种族及族群的处境,就必须通过大众的努力,唤起美国白人的良心,以促成美国人观念中的民主和平等主义信条的实现;通过最高法院诉讼以废除南部各州歧视黑人的法律;争取在北部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立法,以法律形式禁止在雇工、住房方面的歧视;废除对南部黑人选举权的额外法律限制,并鼓励少数群体通过参与选举争取平等权利;要求联邦及地方政府作出有效努力,按照公平帮助所有穷人的原则,消灭贫穷及城市病,那些过去由于世代遭受歧视而地位低下的种族群体应该受到特别关照。

即使是抗议者的和平示威也不表示这些理想在整体上受到了挑战。这些在 60 年代早期成为民权运动一部分的抗议示威,尽管经常引起怀有敌意的白人的暴力反应,但至少就示威者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一般是非暴力手段,他们的目的也只是为获得最高法院早在 1954 年通过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教育法中就已经赋予黑人的权利,或者按照美国人的神圣的民主价值观他们应得的其他权利。

总之,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自由主义者提出目标都包括以下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种族整合;通过适当的政府援助计划,同时将由白人控制的机构向一切种族的人们(这些人在现在和将来都将用统一的标准去对待)开放来增加黑人的竞争性资源。简而言之,他们同时注意了竞争性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利用,宣扬非暴力示威而不再强调分裂,试图以此唤起美国的良心。可以看到,他们

无法避免地将种族关系的进步轨迹交由白人多数的压倒权力来决定。在这样的目标框架之内,持续的结构分离或称结构多元主义依然存在并将无限期存在下去,这可以看做是现存的白人的种族偏见与疏离(虽然有望减弱)和少数种族社区中已经定型的制度结构之间的一种现实的妥协。

当然,以后实际发生的是,不仅结构分离主义增强,而且上文提到的或许可称为“自由主义的期望”(the liberal expectancy)也有了某些发展,如根本未曾料到的黑人权力运动发生,黑人文化民族主义出现,黑人聚居区内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以及好战分子逐渐取代了(虽然并非全部)老一辈自由主义的黑人领袖,他们鼓吹利用分裂作为施压资源。这样,在一种多元主义框架中,与潜在的和已实际发生的冲突相伴随,产生了近乎真正的权力斗争的事实,这表明美国当前的种族关系问题的棘手性,即虽然不是势所难免,但刘易斯·基利安(Lewis Killian)所称的“不可能的革命”^①的爆发却极有可能。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期望”中包含的一些进程也在推进,这样,实际的种族关系变化情况是上述几种方式的混合的结果。要分析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就必须将权力与冲突这两个变量引入同化理论之中。这仅仅是下述观点的另一种表述:“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解释,必须将同化理论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有助于解释种族与族群关系的一般进程。”^②这样,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关于群体之间关系或者种族和族群整体关系的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它不仅要包括社会学变量,也要同时包括心理学变量,它不仅考察权力关系,也考察人类互动中有关的基本社会心理过程。本文下一部分将尽我所能,勾画出这一理论的应有轮廓。

建构一个因果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设定结果变量或者说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从永无休止的人类互动之流中抽取这样一个暂时静态的现象,必然无法至为完美,因为就这个现象来说,它既有“链”(chain)式反应,接受影响,又有“反馈”(feedback)作用,施放影响。但是,这样的尝试是形成任何一种理论的必经步骤。另一件事情也使问题困难化了,即我们所感兴趣的事件结果,通

① Lewis M. Killian,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② 小用说,如我早期模型中所指出的,同化理论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论断,即当两个不同的族群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完全的同化。恰恰相反,在我的模型中提出的多维同化方式,包含了不同的同化子类型,概念上可以彼此区分开来,并且假设了这些子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包含了不同的维度在同化过程中不同的变化速度的可能性,甚或在某些维度上压根就不发生。事实上,这显示了美国社会生活中结构上分离的族群模糊的连续性。对连续链的两端即同化主义或多元主义,我也没有作出完全肯定的判断。不管怎样,它确实提出了这种假设,即在同一社会中族群的分离过程有着它的界限,在此之外,一些非根本性的影响很容易出现。

常不是单个的变量或非因素变量作用的产物,而是由变量的复合——不断变化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作用的结果。这样,在联合变量中,定量测量就不够用了,可能出现的多变的结果必须用定性方法来分类。在定性分析方法中,影响的亚类型依其种类而不是数量指标来被相互区分开。所有这些,在设定群体间关系理论的因变量时都要首先考虑到。^①

我认为,对于种族和族群间关系最有用的因变量,应该是下面四个子变量的组合,这个组合包含有:(1) 同化的类型。如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理论上,每一种类型都可以按照同一尺度或维度,视其在从完全同化到完全的多元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不同位置进行量化。(2) 总体同化的程度。这一变量由同化的每一种子类型的评分共同组合为一个指标构成。理论上,我原先的同化模型中已作出区分的七种同化子类型的评分结果都可以给出。为了研究的目的,经济同化、文化同化和结构同化三种子类型——严格地讲,是四种子类型——文化同化、结构同化、族际通婚和身份认同——都可以单独使用。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各种不同子类型评分中的加权数,但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3) 冲突的程度。这种冲突可能存在于社会中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多族群社会的各族之间。(4) 获得社会酬赏(access to societal rewards)的程度。社会酬赏是一个衡量社会平等程度的维度,它这里指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相比较,在经济、政治、制度等领域内争取获得利益的条件。

为了论述的简洁,我们暂且将这个变量复合体中的每一个连续性变量都分成高、中、低三个层次,以区分出几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情况如对于少数群体A来说,它可能会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化同化、低度的结构同化、中等程度的总体同化、高程度的冲突和低程度的社会酬赏获取;另一种情况如对于少数群体B而言,可能同时表现出高度的文化同化、中等的结构同化、中等的总体同化、低度的冲突和高程度的社会酬赏获取。我认为这种星座式的或纵剖面的类型分析,把握住了特定时期内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本质特征。虽然这种研究策略在精确度量上有一定困难,但它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可以看出,上面我们把冲突变量放在了因变量丛中,那么,我们在因果模式分析中就需要把权力归入自变量丛中以与之对应。

下面就来探讨在种族与群体关系的普遍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自变量。事实上,这里所要做的,是将有关的自变量依其类型作适当分类,在每一个小类别中

^① 参见诸如 Schermerhorn 发展出的分类方法(R. A. 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列出属于它的度量名单并从每个名单中选出一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予以讨论。本文最后部分将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几个假设和问题,以勾勒出这样一种普遍理论的可能的轮廓。

有关的自变量,我想可以分为二大类别:有关人的生理、社会发展方面的变量(bio-social development variables);有关互动过程方面的变量(interaction process variables);社会方面的变量(societal variables)。生理—社会发展变量指人的生物机体自身的因素以及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人的生物机体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因素。这当然只能依靠我们的想象力去最大限度地设想。互动过程变量指成年人互动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的变量指一个社会的集团性结构和社会现象,包括人口、生态、制度、价值、文化以及社会分层的特征。这些都是社会学家的基本关注点,无需再进一步界定。^①

生理—社会发展变量 人的生物机体具有三种层次不同的行动本能,实际上也就是行动的需要:生理需要的满足、认同以及感情或情绪反应。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社会化,从而影响着人的这些需要。社会化使成长中的个体获准在社会的和亚社会的需求之内活动。我认为这一过程极难获得完全的成功,它所产生的紧张和动态活动(dynamics)创造和记录着人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机体产生了一种自我感知(a sense of self)。既然社会是连续的,而且(以我的观点来看)是永远有着价值评判和价值规定的,那么保护自我(protection of self)就不仅在生理和心理意义上,而且至少同样重要的在社会—心理的意义上,成为个体发展和人类互动中最为重要的课题。其他方面的能量:合作与侵犯、利他与利己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一观点对于说明族群间关系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族群观念(sense of ethnicity)(广义上说是人们对同一种族、宗教或国家起源的认同)和自我感知融为一体,成为合二而一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的族群背景不能像阶级背景一样通过社会流动而摆脱,社会规定了他的族群特性必然要伴随他从摇篮直到坟墓。二者合一会引起广泛的甚或普遍的族群优越感的出现,甚至这有可能意味着族群成员会认为对他的族群的伤害就是对他自己的伤害,族群冲突造成的紧张就是对个体的威胁。^② 换句话说,人们保卫他所属的族群的荣誉或利益就是保卫他们自己。

① 当然,在孩子与成人之间也发生互动的过程,这里作出区别只是为了将发展中的阶段与后一个阶段区分开来。

② 参见 Donald L. Noel 有关族群中心主义角色的论文“*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Ethnic Stratification*”, *Social Problems*, 16 (Fall 1968), 157—172。

讨论生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角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天性”(human nature)的概念,以及它与种族、族群间关系理论的潜在的联系问题。事实上,社会学原理从一开始就力图给自己划出一片清楚的领域,以对抗在传统的人类行为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纯粹的生物决定论;后来,又反对颇为流行的一些早期心理学家的“本能”理论,没有例外地断然漠视所谓人的天性问题,明确或含蓄地假定人具有可塑性,人的善与恶基本上都是由他在社会化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造就的;或者如另一些人所说,人的善恶和人的天性是没有关联的。^①

然而,越来越清楚,人的天性是有关联的。既然无论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怎样建构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社会行动者的天性,那我们就必须正视它;一些学者(其中包括我自己)已日益为人类行为中那些超越文化和历史的固有的相似性所吸引,并开始对下述说法表示怀疑:并非生物的永恒性或性格倾向,即被称为“本能”的东西左右着人类行为,而是(比保守的文化决定论者所能承认的原则)更为强大的社会风尚在决定着行动者的普遍行为。正如两位当代人类学家谈到生物学上对“人类社会的基础行为结构”(behavioral infra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ies)的研究,并指出,“关于人类行为的这种观点,……把学习过程中的人看成能动的、探索的、坚决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它表明教师必须按学生的学习方式去教。学生的大脑绝不是一片空白,而是边接受边进行大量的选择与加工。”^②

近年来,至少有两本探讨标准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著作,已经认识到了它们所研究的问题与人类本性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其中一本是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Lenski)的《权力与特权:一种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伦斯基在书中讨论社会分层为什么存在以及在变化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的问题时,把与人和社会有关的一系列假定和“常量”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一套文化、社会和环境变量整合起来^③。假定之一就是:当一个人面临对其自身或对他所属的群体来说意义重大的选择时,

^① 对社会学原理中过分强调文化制约的早期批评是 A. H. Hobbs (The Claims of Sociology, Harrisburg, Pa.: The Stackpole Co., 1951), 尤其注意他的第一章“Personality.”

^② Lionel Tiger and Robin Fox, The Imperial Anima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p. 13, 15.

^③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他首先是自私的。^①这个假定在伦斯基的理论中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因为伦斯基认为对经济剩余价值的不同占有,是社会分层产生的主要动力。

无独有偶,陶斯基(Tausky)在他的主要理论研究——对工作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分析中^②,将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 Taylor)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与“人际关系学派”作了比较。前者是建立在人是自私自利的这种观念之上的;而后者则强调工人具有感情的一面和组织目标中的“自我实现”。而陶斯基自己则选择了“结构主义的观点”(structuralism perspective),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中间论点,但他意识到这种观点“较为接近科学管理理论而不是人际关系理论”。陶斯基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面一个人采纳何种观点,昭示了他对人的天性问题的看法,要么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因而会根本漠视组织的需要,要么就持相反的看法。“我将走我的路”,陶斯基写道,“我保留对人际关系理论的怀疑。我认为,企图证实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并没有成功。至于我怀疑的根据,很简单,只是因为我没有弥漫于人际关系理论著作中的那种对于人的天性的乐观主义。”^③

任何要将人的天性归纳为一个概念,以确立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础的尝试,都不仅必须面对利己—利他这个维度上的问题,而且必须面对人的侵犯性(human aggression)这种关键而且难于克服的现象。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曾为这个问题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并未取得决定性成果。一些人认为人本身是没有侵犯性的,侵犯性行为的产生是制度腐败和社会化失败的结果。而另一些人,继弗洛伊德(Freud)之后,发现侵犯性深藏于人早期的心理发育中,它是与“死亡意志”(death wish)相作用或通过与性(sexuality)相联系而产生的。一些人种学家则认为,具有一种特定的侵犯性本能表明人与其他动物存在相近的进化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假定其他动物物种也存在侵犯性本能)。还有一些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代以前,他们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之上,如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认为人类的侵犯性行为很可能是挫折(frustration)状况下的反应。据我自己的观察,在所有有关人的侵犯性之起源的理论中,最具说服力和最为恰切的,是精神病学家格雷戈

^① 伦斯基确切的表述如下:“于是,当我们调查人类情形时,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即当人必须在他自己的、或他的群体的或和其他群体的利益间作出重要的选择时,他几乎总是选择前者——虽然常常对自己和他人将这一事实掩盖起来。”(*Power and Privilege*, p.30)

^② Curt Tausky, *Work Organizations*(Itasca, Ill., F. E. Peacock Publishers, 1970).

^③ 同上, p. viii.

里·罗克林(Gregory Rochlin)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作的出色论述。^① 或称,罗克林的理论与上面提到的挫折—侵犯理论表面上看很接近,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罗克林把挫折—侵犯机制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来考察,他把它看成有着自己的组织原则的东西。

罗克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的侵犯行为不是本能地产生的,而是源于人不同于动物、有明确的关于自我的心理观念这一事实;对自我的热爱,或者说自恋(narcissism),是最基本的人类感情;对自我的伤害或威胁——这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引发了人的侵犯性反应。概括地说,侵犯是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的自恋感情的普遍性反应。罗克林写道:“自恋,这种对于自我的热爱,既不是隐喻,也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是人类的心理过程,借此,自我的保护得以加强。从婴儿、儿童直到成年人、老年人,这种保护自我的需求可能要耗费我们全部的精力。每当自我受到威胁,我们就充满敌意,我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侵犯就发生了。”^②他还以夸张的笔调写道:

自我保护这一强制性命令的发生者是自爱(self-love)。它使自己陷入对自我形象的永无休止的爱欲之中,不管这种形象是在镜中还是在他眼中。对赞扬、名誉、荣耀的追求与激情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跑,它从我们出生之后不久就附着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的消亡。自爱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位专制暴君,侵犯就像一个奴仆一样对它唯命是从。^③

前面已经提到,人类作用的另一领域是认知(cognition)。尽管在种族和民族偏见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倾向和生活习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以下几方面也不容忽视——这些能力有助于人们破除偏见:发现外部群体中人们之间的差别,避免对其整体性的成见;辨明历史——文化经历与群体行为之间的联系;按照其所属个体的正态或钟形分布(normal or bell-shaped curve)来理解群体;拟想文化多样性的功能价值;預知自由泛滥和恶化的冲突将引起的功能失调的后果。所有这些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都需要运用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非常愿意相信人类一般的或者说平均的智力水平足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中种族主义与群体冲突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使我们在极端自信地作出这一假定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

^① *Man's Aggression: The Defense of the Self* (Boston: Gambit, 1973)

^② 同上,p.1。

^③ 同上,同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 Rochlin 认识到人类的侵犯行为并不总是破坏性的——事实上,它在社会事务中也扮演创造性的角色。不过,引起他更多注意的是侵犯行为破坏性的一面。

我们假定人本质上是自私的、自恋的、永远处于实施侵犯的边缘但在智力上当然并不需要证明这些概念是人类的必然条件。生活中、文学作品中、历史上都可以很快举出无数的有关例证,然而同样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反的例子。我们这里所能明确讨论的是统计频率、集中趋势、较多与较少、大多数还是部分、程度差异,如此等等。此外,如前所述,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化的压力和制度,从人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控制、培育和改变着人,引导他对其同伴表现出合作、利他和社会认为有益的行为,形成同情、关心他人和责任感这些态度,从而使这些态度起到一种同外部制裁一样的内部控制的作用。但即便如此,个体仍有自省能力,如经典心理学文献所认定(在他之中)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自我错觉(self-delusion)、有选择的感知(selective perception)、歇斯底里的抑制(hysterical repression)等,正是这些能力,使“本我”(id)(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在表面上接受社会所肯定的“超我”(superego)的霸权,但同时进行着对“超我”的欺骗。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辩证的。我们用作假定前提的统计结果亦是如此,如何将它们分类,决定着一个人对个体行动者性质的判断,正是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复合互动形成了社会过程。在这个问题(即人的天性问题)上的无根据的乐观,非但无助于探析群体间关系的成因,反而会妨碍对那些真实和持续的过程给予科学地理解;而所有的悲观主义又都会阻碍为缓和种族和族群矛盾而采取的行动,它同样无助于形成科学的判断。我的观点是,人从根本上说是自私的,具有不可抗拒的自恋和自我保护特性,使人时刻准备以侵犯行为(不论怎样定义与界定它)来保卫自我;同时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似乎比先前的看法更为合理一些。可是,我们一旦认定人是自我的勇敢的保卫者和自身利益的警觉的监护者,我前面所做的那个假定(即族群观念 the sense of ethnicity)就与自我之间出现了矛盾,因为族群观念也完全被归因于人的本质的德行。这样,我们将在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论中加入行动者与其伙伴的联系,行动者在经常发生的群体关系的戏剧中,有时是影响关系的原因,有时又是关系发展的结果,而有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

互动过程变量 在那些影响群体间关系的因素中,成见(stereotyping)大概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它的产生源于人们受情感偏爱影响下在认知上的广泛偏差,也源于族群间缺乏地位平等的基层组织的联系;其次是挫折—侵犯机制,这里,挫折极易引起侵犯,而根据具体的接近条件,侵犯行为不仅会针对造成挫折之源、也会施加于无辜的替罪羊;第三是失意感,它源于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即期望增长了,而地位和认知与之并不相称(这一组因素曾很成功地解释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黑人抗议活动与黑人权力运动产生的根源)^①;第四,对通过冲突可能实现目标的机会的计算,这是一种理智或认知的过程,其中虽然不无感情因素的作用,但它主要是对外部约束力量的种类和总量、或者对可能施加限制或惩罚的力量进行的实际的估算;最后,对冲突升级进程的估计,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互动中普遍存在的,——处于冲突中的政党在对方的威胁与报复之中,会趋向于扩大侵犯、惩罚和报复的范围或升级,除非被对方或其他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所压服、消灭,或者为冲突消减机制所缓解,而对于这后一点,我们目前尚所知甚少。^②

成见以及挫折—侵犯的动力问题,在论及群体间关系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引起了相当的重视。^③失意感现象、成功机会估计以及冲突升级这后三个过程,我将在下面详细探讨,尤其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人明显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比较者(*comparer*)。^{④⑤}就是说,他在判断自己的需要及其满足情况时,不是基于绝对的标准——我饿了,我吃了因此我满足了——而是基于与他人的比较——他吃得比我好;或者我吃得比他好。这一机制不仅适用于物质满意度,也适用于对地位一类事物的满足,而这些事物的可能范围就本质而言是无限的。在这一无穷无尽的过程中,参照点不仅仅可以是其他个人,也可以是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实际上,个体与群体的界限很容易相互交错,个体无意中总是将他和他所属的族群的物质处境以及社会地位,与其他族群甚至与社会中其他所有族群成员视作一个统一体来进行比较。

① 参见这方面精彩而又富见地的讨论,James A. Geschwender, "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Social Forces*, 47 (December 1968), 127—135.

② 参见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评论:“国家的本性,用霍布斯的说话,就是冲突,不管它是为了攫取,或者为了安全,或者为了光荣,‘最终都归于灭亡。’当我们注意到社会冲突在未受社会规范控制以及竞争者的精密行为控制时,倾向于延续或者升级,而以同归于尽或者至少是敌对一方的灭亡而告终时,霍布斯的哲学观点是可以翻译成现代社会学的术语的。社会结构总是包含着或者创造出能够正常的规范控制住冲突途径的机制。虽然对于在控制下冲突达到的程度还有着相当大的变化。”*Continu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7, p. 37).

围绕冲突升级有一些在发展的并且有趣的文献,从游戏理论的观点和/或对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分析来研究。参见 Herman Kahn, *On Escalation* (New York: Praeg, 1965);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Amitai Etzioni, *The Hard Way to Peac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③ 关于对此的经典论述,参见 Gordon W. Allport,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1954)。

④ Robert K. Merton, 第8章和第9章对参考群体行为的论述,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Chap. 8 was writ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ice S. Rossi.)

⑤ R. M. MacIver, *Social Causation* (Boston: Gunn and Co. 1942). 尤其是第11章与第12章。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无休止的嫉妒满怀的比较及其中隐含的反抗,没有形成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将社会纽带全盘打碎?我认为答案在于,失意感要转化为冲突还依赖一个方面的因素,其中两个决定着失意程度,另一个则有力地决定着失意感是否会转变成为现实的冲突。下面就来考察这一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决定失意程度的两个因素是有关的比较者个体或群体的价值系统和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酬赏制度的实质与表现。这两种因素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不管实际中的社会酬赏制度是怎样的,既然价值和意识形态关心酬赏的公平分配,它就会影响到人们对酬赏制度的评价。在存在种姓制或等级制的社会中,一个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会安于接受他的处境,将之视为上帝或神灵预先的安排。而在一个阶级开放的社会(*an open class society*)中,人们则坚信如果他勤奋并且充满生机与活力,或者具备必要的教育技能,他就具有向上流动的真实机会。在这两种情形中,由于这类主要的意识形态为所有的政党群体所接受,所以失意感维持在低水平上。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酬赏系统确实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见事例,这种感性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失意感。在群体层次上也可以这么说,一个在种族主义的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族群,接受了这个社会将其族群视为下贱的流行意识观念,无疑这个族群的失意感是低程度的(学者们不禁要问这种接受方式在历史上的实际存在情况,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仅是一种理论模型上的可能性)。或者在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的社会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族群具有实际的和大量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机会不论何种群体的成员都可以争取,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社会的失意感也是较弱的。

然而,如果相关的个体和群体的价值体系没有及时合法地体现在既定的酬赏制度之中,或者如果酬赏制度的不平等表征太明显,那么任何价值的认同,都会被人的需要因缺乏满足而产生的强大压力所摧毁。这样第三种因素——如果该情境中具有的话——就会充当缓和公开冲突的角色,这个因素就是建立在武力或者权力基础之上的外部约束系统。它的目的在于镇压反叛,威慑对制度的实质性攻击,瓦解示威游行等等。用我前面提出的词汇来说,存在着一个付诸行动之前的对于“成功机会的估算”(*calculation of success chances*),它在决定是否应采取实际行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将价值原动力(*value impetus*)与采取行动而不引起约束性惩罚的可能性的判断联系起来,其整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动开始之前的“动态评估”(*dynamic assessment*),30年前麦基弗(Maclver)在他的行动及其原因的分析中对此早有论述。

最近的社会学著作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弱化外部约束力量在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将人类行动者的实际行为大都设想成是对价值、意识形态和情感力量作出的反应。虽然很清楚这些因素确实是引起行为反应的刺激领域里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人类欲望与社会抑制之间的紧张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忽视显而易见的权力约束在制约人的激情方面的重要作用,似乎是错误的。^①我相信,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微观层次上的个体行动,而且适用于宏观层次上的群体行动。诚然,个体和群体有时在极端的压迫之下,会采取暴力的或破坏性的行动,以发泄他们的愤怒、挫折感或者对身受歧视的不平,甚至不考虑任何可以预见的可能的后果,这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假设是,从统计结果看,可以预见的外力的制裁,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竞争中的或潜在冲突中的个人和群体间公开发生暴力的可能。毋庸多言,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陈述,而不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并不表达对在特定环境下为申诉冤情而使用暴力或破坏性手段这种作法喜欢或不喜欢。这里要尝试的是提出一种人类行为发展的过程模型,以不仅适用于种族和族群关系,还适用于人类关系的宏观与微观情境以及其他诸多领域。

如果对立的个人或群体间确实爆发了冲突,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冲突具有扩大的趋势。这一提法承继我们前面关于保护自我那种突出特性的讨论——在那里我们提到民族群体与自我结合起来。对立着的每一个团体都把冲突看作是对自我的生理乃至心理的伤害与威胁,这通常是很正确的。这种伤害所引发的怒火。聚集起来促成了某种类型的反攻,于是处于对立中的其他团体把这看作对他的自我情感的一种攻击。接着,上述的第一个团体又会发起甚至更强大更猛烈的再攻击,这样,冲突就会扩大和升级。如果扩大冲突并非为了消灭对方或同归于尽,就必须引入缓解冲突的机制,这种机制由制度安排组成,并得到社会中解决某类冲突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如依照既定规则(这些规则是由权威或合法权力保障实施的)进行的法律判决、制裁、裁决等;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的内在控制;或者,斗争中的团体中的一个,在面临力量“较量”之时发现获胜机会甚微,甚至冲突持续下去时对自我身心的危害更重,它可能自动退却或投降(当然只是暂时的)。

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处于劣势的族群们,对于它们的不利处境会感到不满,

^① 这些制裁可以是合法的或非法的,最近的一个重要而又极具拓展性的类似的观点评论,参见William J. Goode, "The Place of Force in Huma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 (October 1972), 507—519。

这一点可以理解。如果它们能够在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气候中,通过正当的立法渠道表达它们的要求,以消除歧视与偏见,争取用特别的扶助计划来改变社会中通常存在的经济与政治分配状况,那么,公开的力量冲突与冲突扩大的趋势就可能避免。如果民族关系中的公开权力斗争成了主流,那么这一斗争不断扩大升级的趋势会使未来更为变幻莫测——谁也不会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大、而获得的利益又会有多大。

社会的变量 这一组变量包括:第一,人口方面的因素,如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它们的相对自然增长率,同时还包括少数群体的地域分布是分散或集中,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居住,住在城市的哪个区域等^①。第二,多数和少数群体间价值观念体系的一致或差异程度,对这种一致或差异存在的范围要进行界定,它们在失意现象中的作用也要进行考察。第三,多数和少数群体最初接触时存在的文化上的差异,如语言、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以后的文化同化中会产生一种积累性的影响,研究中我们将之概括为一种因变量。第四,一般人口群体中都存在的种族、宗教和民族群体意识形态的特点,我们尤其关注的是这些观念系统中含有的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观念,以及它们对同化或多元化理想的看法。第五,多数和少数群体间的权力分配及与此相关的因素。竞争性权力、政治权力和破坏性力量的分配状况,势必影响到我们前面选定的因变量的结果。由于力量资源的动员并非在结构的真空状态中进行,而是依赖威胁性的制裁、惩罚和对抗性力量的运用(这是所谓的“权力矢量领域”(the field of power vectors)的构成部分),因而分析变得更为复杂。挫折和现实的需求,为采取通向理想目标的行动提供了动机力量,但是这种行动,正如我已指出的,还含有在认知上对受惩罚可能性所做的估计。

第六,少数民族群体对社会酬赏制度的进入能力的程度(degree of access of societal rewards)(包含有平等—不平等两个维度),它影响着群体的失意感程度,从而影响到社会变迁的动向,而这又决定了任何一既定期内的社会格局。这一变量同时出现在因果链(causal chain)的两端,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这不应引起方法论上的很大不安,因为它仅仅表明了社会过程中各因素间不间断地互动与反作用。

第七,社会的政治性质的问题,它可用民主—专政的尺度或维度来衡量。

^① 参见 Karl E. Taeuber and Alma F. Taeuber, *Negroes in Ci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5); Stanley Lieberson,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n Ethnic Assimilation," *Social Forces* 40 (October 1961) 52—57; and W. Clark Ro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Blacks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Southern Cities: Toward a Causal Model," *Social Problems*, 19 (Winter 1972), 393—407。

这是一个对群体间关系的结局有重要影响的变量。^{①②} 它与权力变量相互作用,决定了多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地位以及它们在行为方面对民族群体关系的影响,即各民族群体对于民族关系的理想,是通过有关的公民群体在立法和公开论坛上争取得到呢,还是由高高在上的一小群统治者决定并贯彻下去,用专制国家中政府控制着的专制权力强制执行。

就“权力分布”变量我讨论了七点,并已指出将权力划分为竞争性的、政治的和破坏性的子类型是有益的。考虑到族群的背景,另一种需要明确指出和再分类的权力的维度,是这个群体的力量(不管它的程度)是完全来自它所在的社会内部(既包括它自己的力量基础,也包括内部的伙伴)呢,还是通过与外部独立的社会存在联盟关系而得以加强?一个特定社会或国家中的许多或大多数族群,会与其他一些主权国家存在语言、宗教、种族或民族起源的由祖先传下来的联系,如果这个祖先的主权国家军力强大,或者与族群所在的东道国有着共同的战略意义或意识形态,那么,后者在它的国内上会淡化或弱化对这个少数族群的歧视。换句话说,在联系紧密的现代社会中,族群关系必须放在国际背景中考察,正如它必须放在国内背景下考察一样(就是说,在实际的国际冲突中,战争的爆发会妨碍或帮助一个特定的少数族群——例如它可能会因为其族群祖先起缘的缘故就被视作“敌人”)。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区分开“内力”与“外力”,前者来源于少数族群自己的力量与内部同盟者二者力量的结合,后者来源于另一个主权国家或一个国际实体(如联合国)对这一少数群体利益状况的友好关注。这样一个国家或实体所具有的实力在运行中可以影响东道国内有关少数族群的事件。

关于社会的变量,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点,是社会中存在着的有关种族和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观念会有所不同。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这种观念可以按平等—不平等的维度来分类。以此标准;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为两种意识形态;主体上是不平等的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体上是平等的或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后一种类型中,还存在三种对当代世界影响甚大的子类型。一是同化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中,社会沿着上面已经明确的同化过程中的多个维度,向同化的最终目标迈进。另两个子类型实质上都是多元主义的结构,由于它们的差异构成了目前许多关于世界上各种多元化境

① Schermerhorn,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第5章,特别是第186—187页。

② 下面所作的区分中的一部分,已由 Daniel Bell 在他的论文“On Meritocracy and Equality”(*The Public Interest*, No. 29 (Fall 1972), 29—68)中富有洞见地讨论过。

况的争论焦点,而且它们各自的实际应用也对群体关系的前途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这里特别将它们区分开来。

第一种我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它的重要特征是: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以便将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或不同民族起源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席之地的统一实体,同时它也禁止应用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ethnic criteria),不管应用这种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特殊照顾的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这些群体中的许多成员,也都会受惠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因为这些立法是为帮助缺乏有效的经济参与的普通大众的,如反贫穷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等。这里,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成员,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方案中合适的资格而受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结构多元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下将作为非官方的现实在公共生活中自发地存在。而且按照文化多元主义的标准,它同时也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暗示的社会规范的普遍化形成推动,而这是合乎少数族群成员的意愿的。这样一个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这种社会模式非常接近于本章前面提到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所含蓄地拟想的模式。

与此相对照的多元主义结构可以称作“团体多元主义”(corporate pluralism),在团体多元主义中,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做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酬赏分配的普遍标准,只在它们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确定的有限范围内才实施。结构的多元主义为官方所鼓励,并且确实成了个人行动的必不可少的背景,在这种结构之下,即使有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仍有加强的趋势。

将平等维度与结构维度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概括出四种与族群关系发展取向有关的社会类型:(1)种族主义社会;(2)同化主义社会;(3)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社会;(4)团体多元主义社会。诚然,实践中几种类型的成分在某一时期可以并存,然而理论上将四种类型彼此区分是需要的。无论多数还是少数群体,它们的意识形态目标以及一个特定时期内特定社会的实际状况,都会对社会下一阶段的种族、族群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应用：几个理论命题

本部分将在适当的限度内，挑选出少数几个在我看来对群体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的重要变量，它们可以构造出一些合理的因果链。以此为起点，我将用这些前面讨论过的变量分析历史上存在过的某些群体间关系的情况。大多数学者都会同意，在过去四百年间，群体间关系的两件最具破坏性和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从美洲殖民时期到美国内战前 400 万非洲裔黑人沦为奴隶；20 世纪纳粹对 600 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对此的探讨将从生物—社会发展变量 (bio-social development variables) 开始（如果人们愿意，可以把生物—社会发展变量看作相对的常量）。人在本质上是自我的自恋性防卫者，为保卫自我时刻准备侵犯，族群意识与自我结合起来，通常表现出族群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在互动过程变量的探讨中，我们曾注意到自我与他人比较中出现的怨恨倾向，注意到冲突升级的倾向，也注意到权力矢量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潜在的调和功能，它引起了一种在特定的行动开始之前对成功机会的估算。这些相对的“特定”条件，可以在我下面所有列出因果链的讨论中假定为“现在”，尽管为了篇幅的缘故，在正式的命题中我不一定再提到它们。

从意识形态观点看，美洲殖民地的民主与相对平等的价值观是适用于白人的，它明显未考虑到黑人。对于黑人，白人中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观点是种族主义，讲到权力，黑人实际上半点也没有。从内部看，黑人在社会与文化层面被分离开来，被警惕地控制在无教育的状态，并且由于被奴役而不能获得军事技能，因为那会使他们一旦有成功的可能就反叛他们的主人。从外部看，他们被抓来的故乡非洲社会，不具备统一组织和军事技术，它不可能对技术先进的白种人形成力量威胁。同时使用黑奴劳动力对南方来说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样，我们可以概括如下：充满种族主义意识的美洲白人殖民者（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只适用于白人），发觉奴役黑人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于是私自加强了对黑人的奴役，当外部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顽固地将黑人人口奴隶化。用命题的语言，这段历史事实可以记述如下：

分布于多数群体中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加上“内部”少数族群力量薄弱，加上“外部”少数族群力量薄弱，再加上通过严重的歧视限制了通过经济手段加强自我地位的可见机会，导致了少数族群（其地位从次等公民直到奴隶）获得社会酬赏的低水平，同时发生极少的冲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的事例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事实的综合:一种特有的种族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也是一个在内部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潜在军事实力上都处于劣势的少数者群体,一个迅速出现的独裁国家,并且没有来自外部的有效的对抗性军事惩罚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侵略波兰之后才爆发的)。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统治者宣扬的种族灭绝观点,鼓吹特别的反闪米特主义,在一个集权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建立绝对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制度,以此赢得支持并威吓任何潜在的对他们灭绝犹太人政策的反对意见。用命题语言可以表述如下:

分布于多数群体中中等程度的种族主义意识,加上薄弱的“内部”少数族群力量,加上微弱的“外部”少数族群力量,加上独裁政府,导致了少数族群获取社会酬赏机会的低水平,按照政府的意志对少数族群激烈而迅速发展的敌视而引发了大规模冲突,但这些冲突会由于驱逐或灭绝的行为结果很快终止。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叙述上的简明,这里对变量进行了选择。在因变量中,重点放在获取社会奖赏的可能性和冲突的程度;在自变量中,重点放在观念、力量(“内力”和“外力”)和民主—专制维度上的社会政治性质上。这里对观念与力量在群体间关系中单独和同时发生的对特定结果的影响作进一步探讨。在我引证作为理论命题的两个例子中,少数群体都拥有很弱的“内力”。在高度歧视的多数族群方面,面临一个将种族主义的意识转化为行动的问题。少数族群显然需要壮大力量,以维持与多数族群力量上的平衡,保护它的正当权利,获得酬赏的平等分配与尊重。由此可知,在一切多元主义的社会中,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在所有的群体中,在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间平等地分配权力。事实上,我提出这个假设并非因为下述原因:一个多元社会——在民主的气氛中运行,具有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伴有轻微的族群优越感,各社会群体具有均等力量——在族群感情迅速而猛烈扩张的情况下,从本质上讲可能不稳固并会富于冲突。就我设想,一个民主和平等的多元社会,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少数群体拥有中等程度的力量——比多数群体的力量要小,这样不至于完全地分裂社会,但又足以施加决定性影响,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受到歧视时“引起麻烦”,在生存与合法的理想受到多数族群暴力攻击的威胁时能够得到“外力”的支持。“外力”——即另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拥有的力量,实际上不会经常地或不分青红皂白运用于每一件、甚至多元社会中潜在的不可避免的日常事务冲突。它可以作为少数族群处在危急关头时的一种“后备”威慑力。而更为常见的,是在非

常重要的特别事务中,它以特殊的外交谈判方式出现。最近的一则事例是,美苏关系的缓和和贸易关系建立,对苏联放松犹太移民限制产生了预期影响。

最后一点,我极力避免陷入任何因果假设之中,到此为止我已经提出多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它既受到了多数群体也受到了少数群体的拥护,并由社会所实践。多元主义的两个类型是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和团体多元主义,二者处于平等的地位。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即使反对极端的和公开的种族主义的战斗能够胜利,政策选择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还是团体多元主义,这个冲突也仍将是数十年内种族和族群关系动态的重要一部分。就普遍利益——所有人的利益——来讲,哪一种类型的结果会更好,我们仍不得而知。没有足够的材料,对它们的研究更少。我个人的推想——仅仅是推想(这里已没有阐明的篇幅了)——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所预设的前景可能好一些。但我也可能会判断错误。历史会写下它的回答。社会学家们将会读到这些结果(人们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地去读)。总之,时间将告诉我们一切。

(王壹玲 译, 彭庆恩 校)

美国经济活动中的少数族群

G. E. 辛普森 (George Eaton Simpson)
J. M. 英格尔 (J. Milton Yinger)

本文探讨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关系中制度化的方面。这些制度化关系体现在经济生活、政治与法律上的进程、家庭结构与族际通婚、宗教制度和教育等诸方面。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少数群体在美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我们不可能在本书的这一部分里论及美国社会中所有的种族与文化意义上的少数群体,我们将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四个处境最为不利的群体上,它们是: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和美国印第安人。

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不仅在狭窄的经济含义上体现其重要性,它还将影响着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群体的制度化结构。一个群体的政治影响、它的家庭模式、它对教育的期望和所获得的成就,甚至它所能达到的健康水平,所有这一切,只有在研究了该群体在整个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之后,才可能被人所理解。与此相似,政治的、家庭的、教育的、宗教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制度化模式也影响着经济状况。

一、农业领域中的黑人

黑人农民的数量在 1920 年间呈增长态势,当时人口普查的数字是 925 000 人。20 年代初期棉花象鼻虫的蔓延引起黑人农民数量的缓慢下降。其后,干旱、经济萧条和 30 年代新政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又使得这一下降趋势进一步增强。到

• 本文选自 G. E. Simpson 和 J. M. Yinger 所著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Plenum Press, 1985) 的第 171 页至 185 页。翻译并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Plenum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40年代初期,黑人农民(农场主、共有者、管理人员、佃农包括分益佃农)的数量已不足700 00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国防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又使得黑人农民的数量减为不到600 000人。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种植业的发展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以至到1978年,只有57 000个由黑人运作的农场。按照70年代末黑人农民的流失率计算,到80年代末仍由黑人运作的农场将不到10 000个。^①

现在,农业劳动者只占全部农业人口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历史的初期,全国人口的80%、黑人人口的90%以上都居住在农村。到1972年,全部农业人口为9 600 000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5%,而其中黑人只占全部农业人口的不到9%,还不抵1960年黑人农业人口总数(200万)的一半。在1970年至1976年期间,全国农业人口减少了140万,或者说减少了14%,而黑人农业人口在这6年内减少得更多,由900 000减至500 000^②。目前黑人在美国600万农村居住者中只占4%的份额。^③

在农业劳动力中,人们往往低估了黑人农民作为自主经营式劳动者的份额,而夸大他们作为工薪劳动者的比重。事实上,在全美170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中,63%的人是自主经营式的,20%受雇于人,靠工薪生活,17%是不用付工资的家庭成员。在黑人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7%、67.5%和5%。^④

仍然滞留在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的黑人,因只拥有规模相对较小并仅有边际价值的上地,构成了美国农业中脆弱的一环。目前,以机械化、农业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由州与联邦政府予以资助)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的农业贷款程序已与大规模农场经营方式不可分离。然而,传统的及现时中的歧视还是使人们对置身于同样的法律体系和贷款制度中的黑人充满了不信任感。这种状况使得一部分黑人农民丧失了通过获取贷款来扩大经营规模的勇气。农民家庭经营管理组织(The 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也未采取措施以改善黑人农民的困境。在1981年,黑人通过该组织的农业贷款程序所获得的贷款只占其发放的农业贷款总额的2.5%。^⑤

总的来看,农村中的黑人人口正在迅速下降,农民对黑人来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职业种类。在过去几十年中,农村黑人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遗留人口中老人和孩子的比例剧增,这对那些仍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

①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February, 1982, p. 176.

② Cleveland Plain Dealer, April 15, 1977.

③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February, 1982, p. 4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3, p. 15.

④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February, 1982, pp. 44-45.

⑤ 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February, 1982, pp. 177-178.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时,他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超出了大多数农业县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①

二、黑人的城市化

最近几年,黑人连续不断地从乡村和非都市化地区涌入都市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且,黑人迁移者从一个都市地区流向另一个都市地区的情况也在增加,并且大部分是从较小的标准都市统计区域迁往较大的标准都市统计区域(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总的来说,这种居住地的变换对迁移者是有利的,因为在大都市化地区的中心城市,从事薪水较高也更受人尊敬的白领阶层职业的黑人男性从数量上来说比较小都市化地区的要多,但从比例上而言,在低收入家庭中生活的黑人的比例在较小的都市化地区相对要低一些。^②

在1960年,在全美10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华盛顿特区是唯一的黑人人口占其全部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到1980年,全美已有9个这样的都市地区,它们是:加里(Gary)、华盛顿、亚特兰大、底特律、纽瓦克(Newark)、伯明翰、新奥尔良、巴尔的摩和里奇蒙德(Richmond)^③。

全美半数以上的黑人居住在南方,由于农村黑人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的,因此,黑人移往城市的潜力依然很大。不过,最近几年涌向城市的黑人数量在下降,并且在这些迁往城市的黑人当中,每5人中就有3人是迁往南方的城市。由于南方农村也开始发展工业,小城镇和县里的就业机会较之南方城市增长得更为迅速。^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口流动趋势是:原先移到北方去的南方黑人目前正返回南方,而在北方出生的黑人也有一部分涌向南方。到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开始时,迁往北方的黑人中每3人就有1人返回家乡;到1974年,大约每2人中就有1人正在返回南方。另外,据估计在奔向南方的黑人人流中,15%—20%的黑人出生于北方,据信这个比例是早几年的比例的三到四倍。^⑤ 1979年,人口普查局报道,黑人由南方迁往北方的传统正在消失,黑人正在离开东北部;在1975年至1978年之间,迁往中西部和南方的黑人与迁出的数量相等,而西部的黑人增加了。^⑥

①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1977, pp. 1 and 22; Reid, 1974, p. 267; Wadley 1974, pp. 279—283.

② Tucker and Reid, 1977, p. 64.

③ Reid, 1982, pp. 7—8.

④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1977, pp. 1,22.

⑤ *Cleveland Plain Dealer*, June 23, 1974, p. A23.

⑥ *Cleveland Plain Dealer*, June 19, 1979, p. 4.

一些有关黑人返回南方的报道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正在返回自己的乡村出生地。而更为详细的研究表明，从北方城市返回的黑人主要还是流入南方的城市化地区。^①

三、黑人劳动者的就业与失业

依种族和性别分类，全美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达到16岁以上并就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如图1所示。^②在1950年，白人男性的就业率为81%，有色人种男性为76%。1970年就业上的种族差异也大体如此。但是1970年以后，男性的就业率开始下降，这种现象在有色人种男性中更为突出。在1981年，成年男子就业上的种族差异达到11个百分点。^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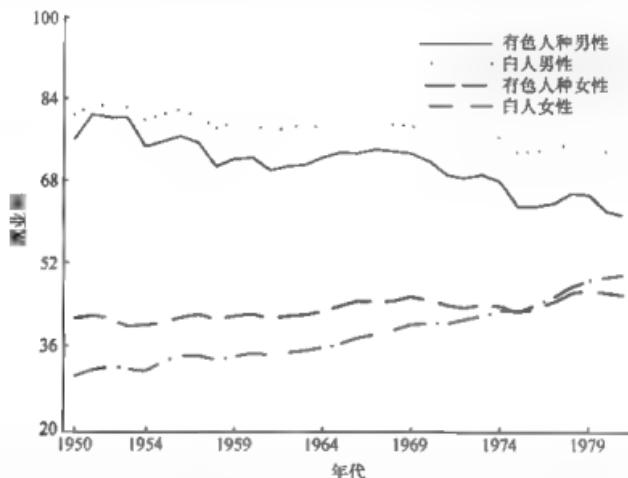


图1 16岁以上就业者占总人口的比例(1950—1981)^④

根据法利(Farley)的研究，白人男性就业率的下降，大约三分之二是因为年龄超过54岁的人就业率很低，这与社会保障的普及和较完善的个人养老金项

① Reid, 1982, p.3; see also the section on Black suburbanization in Chapter 12.

② Farley, 1982, p. B-35.

③ Farley, 1982, p. B-34.

④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78*, Table 3 and 60;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Vol 26, No. 1; Vol. 27, No. 1; Vol. 28, No. 1; and Vol. 29, No. 1.

目有关。年龄超过 54 岁却还在工作的有色人种男性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情况只占其下降总数的三分之一。在 1950 年至 1981 年期间,白人妇女与有色人种妇女的就业量都在增长,不过,白人妇女就业率的增长要快一些。^①

劳动统计署对 25—54 岁的男子所叙述的既无工作也不寻找工作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见表 1。^②该表似乎表明,由于“其他原因”既无工作又不寻找工作的有色人种男子人数比例的上升主要在于黯淡的就业前景。

表 1 25—54 岁男子无工作又不寻找工作的原因 1970 年和 1981 年^③

主要活动	有色人种男子			白人男子		
	1970 年	1981 年	变化	1970 年	1981 年	变化
在业	88%	80%	-8%	94%	91%	-3%
寻找工作	4%	8%	+4%	2%	4%	+2%
上学	1%	1%	—	1%	1%	—
不能工作	3%	3%	—	1%	2%	+1%
操持家务	—	1%	+1%	—	—	—
其他原因	4%	7%	+3%	2%	2%	—
总计	100%	100%		100%	100%	

用以衡量美国各少数民族(种族和文化上的)就业状况的方法之一是劳动力参与比例(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各种族和民族群体在 1970 年时的男女两性劳动力参与比例如表 2 所示。美国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参与比例在男女两方面都是最低的。该表还显示了说西班牙语的群体与亚裔群体在劳动力参与比例上的差别及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④

在有色人种男性的劳动力就业率长期持续下降的同时,白人男性的就业率呈轻微的下降趋势。自 1890 年以来,白人妇女的就业率稳步上升,但有色人种女性的就业率在本世纪前 50 年是下降的,然后又开始回升,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白人妇女的增长速度。人们对劳动就业率上的这些差别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有色人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比白人女性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些事例可对这个问题给予解释,尤其是涉及大学毕业生时更是如此。鉴于 1890 年黑人男性的就业率是 86.6%,而白人男性的就业率是 84%,那么是否现在有

① Farley, 1982, pp. B-38—40

② Farley, 1982, p. B-39

③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Vol. 17, NO. 7, Table A-1; Vol. 22, NO. 7, Table 3.

④ Sullivan, 1978, p. 167.

表 2 10 个种族—族群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力参与比例(1970 年)^①

种族—民族群体	男性	女性
古巴裔	83.7	50.1
日本裔	79.3	49.4
菲律宾裔	79.0	55.2
夏威夷人	77.9	48.5
墨西哥裔	77.4	36.4
朝鲜裔	75.5	41.5
波多黎各人	75.5	35.3
华人	73.2	49.5
黑人	69.8	47.5
印第安人	63.4	31.6
白人*	73.8	38.9

* 包括西班牙裔、葡萄牙裔美国人群体。

色人种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境较白人男性更为不利？一种乐观的解释是，男性就业率的下降起因于下述这些变化：退休年龄的提前，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对丧失劳动能力者福利待遇的改善。而悲观的解释是：居高不降的失业率使人们丧失了重新获得工作的信心，使大量的有色人种从劳动力市场上退缩下来，而且一部分人从合法的劳动市场退出而去从事非法的活动。正如苏利文(Sullivan)^②所言，就业率的下降，无论对将其视为难解之谜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还是就其是个社会痼疾而论，的的确确是个问题。

表 3 显示了 1960 年至 1980 年期间不同种族和性别的劳动就业率。

表 3 按种族和性别统计的劳动就业比例^③(1960—1980 年)

种族与性别	1960	1970	1975	1980
白人	58.8	60.2	61.5	64.2
男性	83.4	80.0	78.7	78.3
女性	36.5	42.6	45.9	51.3
黑人及其他	64.5	61.8	59.3	61.2
男性	83.0	76.5	71.5	70.8
女性	48.2	49.5	49.2	53.4
总计：16 岁以上	59.4	60.4	61.2	63.8

① Teresa A. Sullivan, 1978, p. 167

② Sullivan, 1978, p. 170.

③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 p. 381. 更详细的显示 1981 年 12 月和 1982 年 12 月按性别、年龄、种族分类的劳动力参与比率的图表，见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anuary 1983, pp. 15—16, Table A-4。

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印象是,黑人妇女较黑人男子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尤其在寻找职业时更是如此。其实这种印象是错误的,过去一段时期的事实证明,在劳动力市场上,黑人男子较黑人妇女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白人在这 一点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①

随着黑人妇女就业率的上升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她们在公共部门的就业量也增大了。与此相反,白人妇女却转向私营企业。1970 年,22% 的黑人在业妇女就职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部门,而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白人妇女只占其就业总数的 18%。^②

黑人妇女就业环境中的某些不利因素——种族歧视、个人条件不足(主要指教育)、丈夫微薄的收入、黑人家庭的特殊结构以及城市劳动市场的特点——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抵消她们近来所获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向全日制职业的转移,通过联邦政府资助的就业和培训计划而得以改善的就业机会以及赞助性行动计划的实施。^③

就那些因缺乏教育、技能和经验而使收入受到限制的黑人妇女而言,许多人认为,国家转移支付制度(*transfer system*,包括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食品补贴、医疗服务、住房补贴)对她们家庭的帮助比她们自己努力工作所提供的还要大。要想改变这种体制,劳动市场上的职业就必须变得对妇女更具吸引力。^④

近来的研究显示,非法交易对中心城市的青年男性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曼格姆和塞尼格(*Mangum and Seninger, 1978*)^⑤指出:黑人聚居区的青年人并不缺乏技能,事实上,他们拥有很多为中产阶级社会所极为欣赏的素质:聪明、能言善辩、领导能力、勇敢、精力充沛、擅长人事管理。然而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青年不同,黑人青年——特别是男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足以使他们适应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作。当发现自身难以承担某一职业而感到丧失自尊后,一个在街区中混得颇为自在的青年又会返回到街道上——在那里他的才能得到认可。黑人聚居区中合法的职业大多在一些资本少利润低的制造业和零售商业中,而这些只能给聚居区的年轻人提供某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一些事例似乎表明,穷人愿意工作,但他们的期望往往不切实际。表演家和体育明星受人崇拜,可是能在这些领域出人头地的人毕竟有限。因此,许多贫民区的年轻

① Harwood and Hedge, 1977, pp. 327—328.

② Wallace, 1980, p. 53.

③ Wallace, 1980, p. 99

④ Wallace, 1980, pp. 104—105

⑤ Mangum and Seninger, 1978, pp. 76—78

人转而从事赌博和高赢利的非法活动,如生产和销售毒品、卖淫和拉皮条等。

(一) 黑人的失业现象

图2表明1950年到1981年白人男性和有色人种男性的失业率。1950年,他们的失业率分别为5%和9%,1981年则为6%和13%。1982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达到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10.4%,其中,黑人失业率为20.2%,白人失业率为9.3%,前者相当于后者的2倍。在20岁以上这一年龄段,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失业率分别为19.8%和8.8%,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失业率分别为16.3%和7.6%。在20岁以下这一年龄段,黑人与白人的失业率分别为46.7%和21.7%。^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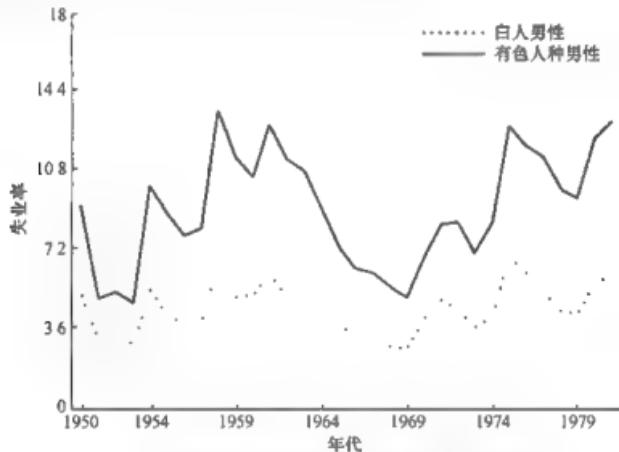


图2 按种族统计的男性失业率(1950—1980)^②

按照劳动统计署的定义,“失业”只包括那些在劳动市场上主动寻找工作的人,不包括那些长期无职可就而离开了劳动力队伍的人以及不再寻找工作的人。1970年以前,数以万计的用完了失业救济金的老年黑人和数目庞大的从未进入过劳动力市场的黑人青年没有被计入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据此,许多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官方的统计数字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状况。另一方面,联邦政

① Resd, 1982 p.27

②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and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78*, Tables 3 and 60;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Vol 26, No. 1; Vol 27, No. 1; Vol. 28, No. 1; and Vol. 29, No. 1.

府的一些人口调查材料也未将一部分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计算进去。估计漏计人统计数字的黑人工人约为3%至15%，因此，处于劳动年龄的黑人男性的失业率可能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

表4表明1978年3月处于各种婚姻状况的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的失业率。^①

表4 按不同婚姻状况统计的妇女失业率(1978年3月)^②

婚姻状况	黑人	白人	比例(黑人/白人)
单身	23.4	8.9	2.63
已婚			
与配偶一起生活	8.1	4.8	1.69
不与配偶一起生活	14.8	8.7	1.70
配偶死亡	8.8	4.3	2.05
离婚	8.1	6.3	1.29
总计	13.6	6.0	2.27

沃勒斯(Wallace, 1980)^③的结论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各类就业和职业培训项目并未对黑人妇女产生应有的效果。黑人妇女的失业率较之白人男子、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的都要高。

根据1979年春季劳动统计署对居民户为期1个月的调查所得的资料，人们可以发现16—21岁的青年当中没有工作的比率是14.1%，而在这个年龄段中黑人青年没工作的比率是28%。同一时期，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研究中心主持的一个长期调查表明，全美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为19.3%，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是38.8%。后者将两个调查结论的差异归因于访谈对象的不同，即访谈对象是青年本人还是居民户的家长。长期调查的结果倾向于驳斥那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即：年轻人的失业率，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年轻人的失业率，之所以这样高是因为这些年轻人不肯接受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在长期调查中，被访的青年人中的大多数，不论他们的肤色是黑是白，都表示他们愿意在快餐服务和洗碟子这类低薪行业就业，许多人甚至表示他们可以在最低工资线以下工作。^④同样也是1979年，由劳动部主持的社会调查表明，黑人高中辍学生的失业率是31.6%，白人高中辍学生的失业率是16.4%。白人高中毕业生的失业

① Wallace 1980, p. 45

②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Marit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March 1978.

③ Wallace 1980, pp. 56—57.

④ Cleveland Plain Dealer, February 29, 1980, p. 113.

率是 8.5%，黑人的是 21.3%。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白人与黑人分别为 4% 和 17.1%。^① 在各类群体中，黑人年轻女性（年龄在 15—19 岁之间）的失业率是最高的，而就业率是最低的。^②

表 5 以性别和年龄为变项，描述了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在 1982 年的失业率。1984 年 9 月，全美的失业率为 7.4%。不同群体失业率的巨大差别依然存在：白人的失业率为 6.4%，拉美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为 10.7%，黑人失业率为 15.1%。

表 5 按性别、年龄、种族统计的失业率（1982 年）^③

	平均值	白人	黑人	拉美裔美国人
男性				
16—65 岁及以上	9.9	8.8	20.1	13.6
16—19 岁	24.4	21.7	48.9	31.2
女性				
16—65 岁及以上	9.4	8.3	17.6	14.1
16—19 岁	21.9	19.0	47.1	28.2

（二）社会变迁的原因与黑人的高失业率问题

不论经济处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黑人特别是黑人青年的高失业率现象，似乎都可以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气候的变化。抛开市场上延续下来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谈，导致黑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其他一些原因可表述如下：

1.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罗斯福新政期间，在存在着黑白分隔的劳动力市场上，黑人常常被用来给白人工人拆台或削弱白人工会。隶属于不同群体的工人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雇主提供的其他一些花费上（如提供住房、疗养休假和职业培训）。比工资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差别。白人更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工会，更勇于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参加罢工。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黑人较之白人是更为理想的受雇者，但同时也威胁到白人在劳资关系中所争取到的成果。新政时期的保护法实质上有助于促使劳动力报酬的平等，无论其种族如何。但是，它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成本，迫使资

① Cleveland Plain Dealer, September 15, 1980, p. 22A.

② Wallace, 1980, pp. 102—103.

③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January 1983, p. 180, Table 51

方转而寻求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在 50 年代及其以后,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机器和其他廉价劳动力群体开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黑人劳动力。^①

2. 工商业连续不断地迁离拥有大量黑人人口的中心城市。
3. 白人妇女一直在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
4. 各种利益群体,如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各类种族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变得愈来愈团结和富于战斗力,这种情况使得黑人在改变自己命运的路途上更加举步维艰。
5. 联邦政府有关就业的计划,对那些急需帮助的人特别是长期失业者来说,仍是一纸空文。
6. 无论在私营企业领域还是公共事业方面,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低就某些不需要特殊技能的职位。^②

四、黑人的职业与收入

(一) 职业变化趋势

1970 年以前,黑人妇女一般愿意寻找需要一定专业技能和有关的服务性职业。尽管 32% 的黑人妇女从事私人服务工作,仍有 29% 的黑人妇女在上述领域就业。从事专业性及有关服务工作以及在公共行政机构就职的黑人妇女,约占其就业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这些机构就业的黑人男性,只占其就业总数的 16%。黑人男性们大量涌向制造业,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就业比例从 1940 年的 14% 上升到 1970 年的 28%,对南方的黑人男子来说,这成了主要的就业方向。在 60 年代期间,南方黑人妇女的就业总量增加了 40 万,黑人男子只增加了 10 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事私人服务工作的黑人妇女人数减少了 20 万,而从事专业及有关服务工作的人数却增加了将近 30 万。^③

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在 70 年代还有许多职业被视为只适合于白人(或黑人)。那些被认为适合于黑人的工作,无论在身份地位还是经济报酬上都要较“适合于白人”的工作低。在目前条件下,人们不能指望黑人和白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就业机会均等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实现。希尔(Hill, 1977)^④指出,只有当

① Bonacich, 1976, pp. 34—51.

②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79, pp. 1, 44.

③ Rhee, 1974, pp. 295—297.

④ Hill, 1977, p. 32.

某些工作处于不景气时期或者白人工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黑人才可能来填补这些空缺的职位。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60年代末在纺织工业部门,白人由于报酬低微转而投入工作环境更清洁、报酬更优厚的其他工业部门,于是,黑人便代替这些白人进入纺织工业;另一个事例发生在电话行业,用美国电话公司副总裁的话来说就是:“电话公司想知道的是,有谁愿意在年薪只有4000—5000美元的条件下来工作。在今日世界上,电话公司的报酬更适合于黑人所期望获得的数额……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因此很清楚……我们需要非白人雇员。”^①

图3表明1950年至1975年期间就业人员职业状况的变化趋势。^②在美国全国普查资料和每月劳动力市场报告中,就业人员被划分成11个类别,对每一类别的工作人员都按其职业声望对其打分,分值从体力劳动者的7分到专业技术人员的75分。该表显示了职业声望的四分位差(quartiles)在白人和有色人中的分布情况,也显示了职业分离指数(index of occupational dissimila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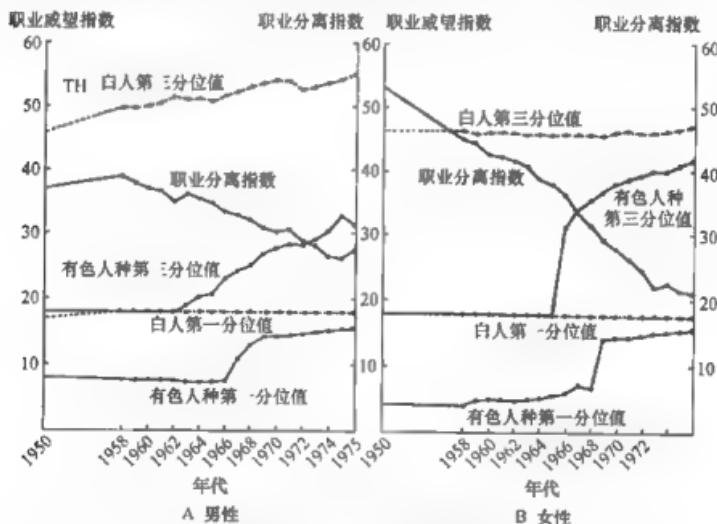


图3 职业声望的第1和第3分位值和职业差异指数(1950—1976)^③

① Hill, 1977, p. 32.

② Reynolds Farley, "Trends in Racial Inequality: Have the Gains of the 1950s Disappeared in the 197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il 1977, p. 197. Based on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Reports, and Reports on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by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③ Farley, 1977b, pp. 196—198.

法利(Farley, 1977)^①对图3所做的评论如下：

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白人第1分位值(First quartile)和第3分位值(third quartile)变动很小,而有色人种的第1分位值和第3分位值都升高。特别是在60年代,当有色人种离开职业声望低的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岗位时,其第1和第3分位值急剧上升,结果是白人男性和有色人种男性职业分布状况愈来愈相似,他们的职业分离指数由1940年的43(图中未显示)下降到1960年的37,在60年代末又下降到31,1975年下降到26。有色人种妇女职业地位的改善程度较之有色人种男性要高得多。在1940年,就业的黑人妇女中约有四分之三从事服务工作和担任办公室工作人员及售货员的职位,截止到1974年,只有10%的人从事家庭女佣工作或农业劳动。

在60—70年代,有色人种在非手工劳动或需一定技艺的工作方面的从业人数增长得比白人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内,黑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足以消除白人与有色人种整体之间在所从事的职业方面的差异。黑人1975年的职业声望平均分还不及白人1940年的数值^②。图4说明了在1970年至1981年期间白人和黑人两性在不同职业上的就业年增长率状况。^③在1980年,黑人占国内劳动力总数的10%,他们在某些行业的数量往往低于其人口比例,如需管理才能和专业知识的特殊职业(6%),技术人员、推销员及行政部门(8%)。而在另一些行业,他们的就业数量又往往高于其人口比例,比如机器操作工、润滑工和体力劳动者总数中的14%,各类服务工作人员的18%是由黑人担当的。^④

(二) 黑人的经济收入

家庭收入通常被用作衡量黑人经济地位的统计指标。表6显示了黑人家庭收入和白人家庭收入在1947年至1975年期间的变化趋势。1947年,白人家庭收入大约是黑人家庭收入的2倍。1975年,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62%,1980年底,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值是白人家庭收入中位值的56%,该数值与有色人种在1960年所达到的水平(57%)还要低1个百分点。^⑤

在该表中,通过黑人与白人的收入分布相互重叠那一部分,即通过收入差

① Farley, 1977b, pp. 196—198.

② Farley, 1977a, p. 198.

③ Farley, 1982, p. B-51.

④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July 1983, p. 11.

⑤ Read, 1982, pp. 2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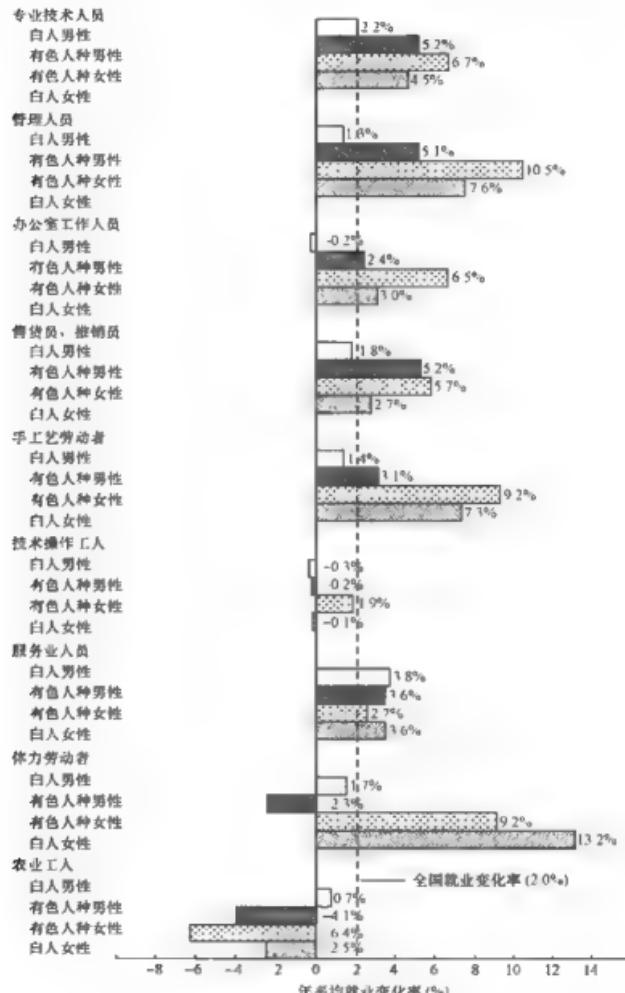


图4 种族—性别群体的职业年平均增长率：(1970—1981)①

①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Vol. 17, No. 7 (Table A-17); Vol. 29, No. 1 (Table 22).

表 6 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的收入变化趋势(1947—1975 年)^①

年份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家庭收入中位值(美元)		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值占白人家庭收入中位值比重	收入差异指数
	黑人	白人		
1947	3 888	7 608	51	38.3
1950	4 178	7 702	54	36.8
1955	5 113	9 271	55	34.7
1960	5 871	10 604	55	31.7
1965	6 812	13 370	55	32.8
1967	7 859	13 273	59	31.0
1968	8 292	13 826	60	29.1
1969	8 807	14 379	61	28.9
1970	8 703	14 188	61	27.3
1971	8 558	14 182	60	28.2
1972	8 831	14 858	59	28.0
1973	8 804	15 254	58	29.3
1974	8 737	14 633	60	27.8
1975	8 779	14 268	62	26.3

差异指数(index of income dissimilarity)，我们可以测量收入的变化趋势，在1947年至1975年期间，收入差异指数值由38.3降至26.3，这说明黑人收入与白人收入的重叠部分逐渐增大。^②收入差异指数值的下降速度，在70年代比60年代要缓慢一些。

表7表明，黑人的社会阶层背景与他们的家庭结构有很强的关系。在1978年，尽管家庭收入不足4 000美元的全美黑人家庭中的80.3%以妇女为户主，家庭收入在4 000—6 999美元之间的黑人家庭中的63.8%是以妇女为户主的，但在家庭收入为16 000—24 999美元和25 000美元以上的全美黑人家庭中，妇女为户主型的家庭只分别占到15.3%和7.7%。^③

①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 60, No. 103, Table 4.

② Farley, 1977b, pp. 198—199.

③ Wilson, 1981, pp. 35—37

表 7 按种族、收入水平、家庭类型、都市区域统计的家庭比例^①(1978 年)

年收入(美元)	所有家庭 (%)	妇女为户主的 家庭(%)	都市中所有 家庭(%)	都市中妇女为 户主家庭(%)
黑人				
<4 000	15.9	80.3	71.1	85.1
4 000—6 999	16.2	63.8	74.7	71.2
7 000—10 999	18.3	46.2	74.8	50.7
11 000—15 999	16.7	28.9	76.3	31.8
16 000—24 999	19.2	15.3	82.7	15.4
>25 000	13.4	7.7	88.5	7.6
白人				
<4 000	4.3	42.1	53.3	50.2
4 000—6 999	4.7	27.6	56.2	33.7
7 000—10 999	12.7	19.5	57.7	21.8
11 000—15 999	16.9	13.4	59.9	16.7
16 000—24 999	28.8	7.2	66.0	8.5
>25 000	29.5	2.9	75.4	3.1

另一种比较不同种族家庭收入差别的方法是把家庭类型作为一个变量。表 8 显示了在 1959、1969、1975 这三年中, 不同类型的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及其变化的平均比率。这些家庭包括所有家庭、核心家庭和妇女为户主型的家庭(表中未包括男户主家庭的数据资料, 这类家庭约占全美家庭总数的 3%)。在 60 年代期间, 黑人核心家庭和妇女为户主型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比白人同类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从 1969 年至 1975 年, 黑人核心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较为缓慢, 但其上升速度仍比白人核心家庭要高。在同一期间, 黑人中妇女为户主型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滞留在原水平, 而同类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则以每处 0.9 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②

^①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23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0).

^② Farley, 1977b, pp. 199—200.

表 8 白人黑人不同类别家庭的收入中位值年平均变化率①
1959, 1969 及 1975 年(按 1975 年美元不变值计算)

	收入中位值(美元)			年平均变化率(%)	
	1959	1969	1975	1959/1969	1969/1975
所有家庭					
黑人	5 837	8 807	8 779	+4.2	-0.1
白人	10 885	14 379	14 268	+2.8	-0.1
收入差距值	-5 048	-5 572	-5 489		
收入比例值	0.54	0.61	0.62		
核心家庭					
黑人	7 314	10 744	11 526	+4.7	+1.2
白人	11 247	15 014	15 125	+2.9	+0.1
收入差距值	-4 537	-4 270	-3 599		
收入比例值	0.60	0.72	0.76		
妇女为户主型家庭					
黑人	3 201	4 897	4 898	+4.3	-0.0
白人	6 535	8 063	7 651	+2.1	-0.9
收入差距值	-3 333	-3 165	-2 753		
收入比例值	0.49	0.61	0.64		

核心家庭和妇女为户主型家庭是黑人家庭中最常见的类型。在 1969 年至 1975 年期间,这类家庭的收入中位值或增长或停留在原水平上。它们和白人同类家庭在购买力上的种族差距日渐缩小。而同样是这段时期,全美所有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值却下降了,和白人家庭在购买力上的种族差距仍保持原水平——大约 5 500 美元,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家庭类型分布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因为,收入最低的家庭——妇女为户主型家庭已在黑人家庭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由原来的 28% 上升到 1975 年的 36%,而核心家庭则由 68% 下降到 60%。因此,家庭收入变化趋势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家庭成员构成这一变量。^②

相对白人家庭来说,黑人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在 70 年代要低于 60 年代。根据联邦普查局的报告,在 1970 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值大约为白人家庭的 60%,但到 1977 年,这个比值下降到 57%。整个 70 年代,虽然分居和离婚对这两个群体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很显然,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这使得他

①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60*, PC(1) 1D, Table 224;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 75, Table 17; No. 103, Tables 1, 3, 4.

② Farley, 1977b, p. 200

们家庭收入的中位值到1977年降到只占白人家庭收入中位值的57%。

由于黑人已婚男子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一系列特殊困难,诸如更易被人解雇、缺乏竞争力、工资增长缓慢等,他们妻子的工作收入开始在家庭收入中变得举足轻重,成为黑人家庭收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黑人已婚妇女的就业率达到58%,是1940年的两倍多。1976年,每3个黑人核心家庭中,就有两个家庭中的妻子外出工作,而在1965年,这个比例是五分之二。^①

在家庭收入中,黑人妻子的收入较之白人妻子的收入,更接近她们丈夫的收入水平。另外,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的收入差距不大,而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的收入差距却十分明显。1976年,黑人已婚妇女从事全日制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为黑人已婚男子在同样条件下收入中位值的73%,而白人已婚妇女的收入仅为白人已婚男子的54%。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1976年黑人妻子的工作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的34%,但在白人家庭中,这个比值仅为26%。^②

如果相对经济地位的含义包括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收入,那么我们发现在这方面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存在着明显差别。白人妇女从社会保险、养老金、年金保险、离婚赡养费等渠道获得的收入比黑人妇女要多一些,而黑人妇女从公共救助和社会福利方面获得的收入又比白人妇女多。不过,不论对哪一方来说,工作收入都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占绝对部分。^③

(三) 黑人个人收入的变化趋势

对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收入变化趋势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并且具有重大意义。下文是对最近的研究所做的总结,这些总结考察了这些变化趋势中的一部分及其结果。

通过对1954—1974年期间男性收入的统计研究,人们企图找出黑人与白人间的不平等减弱的模式以及伴随着黑人收入高低分布的变化而带来的这些模式的相应变化。这项研究^④表明:在北方工业化地区随着黑人收入不平等的缩小,黑人群体内的收入分布却愈来愈不平等,黑人在经济上获得的一些成果,其大部分都被黑人群体中的上等阶层占有。^⑤

通过对建立在1980年普查数据基础上的社会指标的全面研究,法利(Far-

① Wallace, 1980, p. 64.

② Wallace, 1980, pp. 64—65.

③ Wallace, 1980, pp. 65—66.

④ Wallace, 1980, pp. 64—65.

⑤ Villemoz and Winswell, 1978, pp. 1019—1032.

ley, 1982)^①指出,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黑人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就比较均匀地分布于整个黑人群体。这一事实与一种假设恰好相反。该假设认为,黑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大部分被年轻黑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和在政府部门中任职的黑人独享。法利的分析表明,在上述 20 年间,黑人男子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白人男子要快。对黑人妇女来说,她们在教育水平、居住地域、职业类别以及年龄构成上得以改善的速度,至少和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相等。

根据法利的观点^②,1960 年后收入方面种族差别的缩小可以用下述一些相互关联的原因加以解释:(1) 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通过民权组织,黑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都有可能变得更加坚强;(2) 1964 年民权法案、联邦法院关于废除就业中的种族歧视行为的决议以及关于保护黑人和妇女工作权利的条例得以确立和实施;(3) 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黑人妇女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白人妇女?为什么当白人妇女和白人男子间的收入差距不变或略有增加时,黑人妇女和白人男子的收入差距却在缩小?关于这些问题,法利提出三种可能性解释^③:第一,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在工作资历和经验的丰富程度上有差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群体在这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不相同;第二,黑人妇女较之白人妇女更有可能在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也许导致拥有这种经验资本的黑人妇女的收入比白人妇女增长得更快;第三,按照机会平等委员会、各类有关法院决议和各种保护性条文的要求,单单作为一名黑人妇女本身就足以成为今日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受惠者。

无论对哪个性别的白人还是黑人来说,1960—1970 年无疑都是一个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在收入增长率方面却存在着种族差别。在这段时期,黑人的收入水平逐渐赶上来——男子年收入增长率为 1.9%,女子为 3.0%,而同期白人两性年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2%。即便如此,收入水平上的种族差距在 1979 年仍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④。黑人男性的收入只及白人男性收入的八分之五,黑人妇女的收入为白人妇女收入的 94%。

在 70 年代前,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年轻男子在就业机会和职业收入方面都取得明显改善。大公司破天荒地开始主动招聘他们。收入的提高及在起薪上获取的平等使得黑人男性返回大学校园接受继续教育的人数比例超过白人

① Farley, 1982, p. D-30.

② Farley, 1982, pp. D-31—32.

③ Farley, 1982, pp. D-33—34.

④ Farley, 1982, p. C-41.

男子,并且回去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也较白人多。^①

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他们出于就业需要而返回学校接受训练的人不如白人多。尽管最近几年教育层次的提高对人们收入的增加具有更大意义,但是这种按学历支付报酬的做法也产生其他一些效应,因为能够接受继续教育的黑人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的人数十分有限。根据菲舍曼和霍萨尔(Featherman and Hauser)的观点^②,黑人群体要想得到教育带来的好处,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比白人更多的教育。

马斯特(Masters)^③在一项关于黑人与白人收入差别继续存在情况的研究中发现,受教育年限的长度可说明种族收入差距的 10%。他确信,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至少可解释这种差距的 30%,余下的 60% 可归因于生产能力方面(培训质量、缺乏努力等),这些生产能力不像教育年限一样可进行计量。

另一项有关种族不平等的研究^④将焦点集中在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特性(指市场上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是如何对白人群体和黑人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上。提出的一个论点是:收入较高的出口型工业(它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的统计标准化都市区域之外)不仅付给本行业职工较高的报酬,而且通过地区间的竞争还付给本地服务业以高薪,从而间接提高了本地区其他行业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在一项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全日制白领工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两性之间或者在白人男性和少数族群之间,报酬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⑤研究者控制了诸如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以及其他一些与就业有关的变量。平均而言,少数族群男性比白人男性收入要少 1 994 美元;白人女性比白人男性收入要少 3 476 美元;少数族群女性比白人男性收入要少 5 172 美元。

泰勒(Taylor, 1979)^⑥指出,只要雇主对雇员的人员搭配做某些调整,特别是在职业岗位的安置上作些调整,就可在一半的程度上消除今后几代在联邦雇员中存在于种族间或性别间的不平等现象。过去,人们总是按惯例将妇女安置在低收入的办公室职员岗位上,将来自少数族群的人安置在技术性岗位上。所以说,只要某人一进入这种特殊的就业潮流,在他受雇于联邦政府期间,职业安

① Freeman, 1976, p.216.

②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p.365.

③ Masters, 1975, pp.110—111.

④ Parcel, 1979, pp.262—265.

⑤ Taylor, 1979, p.472.

⑥ Taylor, 1979, p.478.

排的内在机制社会按惯例将他安置在固定的岗位了。

此项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单用制度化歧视本身不足以充分解释各个群体间的不平等现象。事实上，制度化歧视意味着各群体是在不平等的起点上面对一系列公平的、一视同仁的标准。例如，大学拒绝录取黑人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未达到录取线；女性收入较男性低，因为她们较少实际工作经验；具有拉美血统的美国人的就业和提升困难重重，因为他们缺乏那些职位所需的学识。尽管这些普遍化的标准的运用在大多数场合是无可非议的——例如，运用能力测试的方式来挑选雇员——但是，这类标准的使用，在雇主做出个人决定时，也常常成为他们进行歧视的借口。^①

泰勒这些研究的一个令人感兴趣之处是，它间接证明了人们重返校园接受职业教育的客观基础。一般说来，少数民族男性所达到的教育层次并不比他们的女性高多少，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白人。但是单在一个少数民族内部，其男性和女性重返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则较单纯的两性群体的差别要大。^②

在女性中，黑人妇女的收入水平逐渐接近白人妇女。从现有的材料看，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间的收入差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以用种族歧视来解释。许多研究表明，相对于仍然存在的种族差别而言，经济中不平等现象的减弱程度是很小的，而且，诱发种族差别的因素依然难以清除。^③

参考文献

Bonacich, Edna. 1976. "Advanced Capitalism and Black/Whi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bruary): 34—51.

Farley, Reynolds. 1977a.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Urbanized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0: An Analysis of Social Class and Racial Differences." *Demography* (November): 497—518.

Farley, Reynolds. 1977b. "Trends in Racial Inequalities: Have the Gains of the 1960s Disappeared in the 197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il): 189—208.

Farley, Reynolds. 1982. *Blacks and Whites: Narrowing the Gap?*.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eatherman, D. L., and Hauser, R. M.,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① Taylor, 1979, p. 478.

② Taylor, 1979, p. 477.

③ Farley, 1977b, p. 206;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pp. 422—42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Policy, 1976, pp. 195—196; Masters 1975.

Freeman, Richard B. 1976. *Black Elite*. New York: McGraw Hill.

Harwood, Edwin. and Hodge, Clair C. 1977 "Jobs and the Negro Family: A Reappraisal" In D. Y. Wilkinson and R. L. Taylor, eds., *The Black Male in America*. Chicago: Nelson-Hall.

Hill, Herbert. 1977. *Black Labor and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Policy, 1976. *Equal Opportunity for Blacks in U. S. Higher Education: An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Mangum, Garth L., and Seninger, Stephen F. 1978. *Coming of Age in the Ghett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sters, Stanley H. 1975. *Black-White Income Differentials: Empirical Stud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onograph Ser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arcel, Toby L. 1979. "Race, Regional Labor Markets and Earn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il): 262—279

Reid, John D. 1974. "Black Urbanization of the South." *Phylon* (September): 260—267.

Reid, John D. 1982. "Black America in the 1980s." *Population Bulletin* (December): 1—39.

Rhee, Jong Mo. 1974.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Black Work Force in the South by Industry." *Phylon* (September): 295—297.

Sullivan, Teresa, 1978, "Racial-Ethnic Difference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F. D. Bean and W. P. Frasbe, ed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Taylor, Ronald L. 1979. "Black Ethnic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thnogen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y): 1401—1423.

Tucker, C. Jack, and Reid, John D "Black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A Look at the Nation's Large Cities." *Phylon* (March): 55—68.

Villemez, Wayne J. and Wiswell, Candace Hinson. 1978. "The Impact of Diminishing Discrimination on the Internal Size Distribution of Black Income: 1954—1974." *Social Force* (June): 1019—1034.

Wadley, Janet K. 1974.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Black Farmer." *Phylon* (September): 276—283.

Wallace, Phyllis A. 1980. *Black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Cambridge: MIT Press.

Wilson, William J. 1981. "Th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1980s: Questions of Race, Class, and Public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rch): 26—41.

U. S. Bureau of Census, 1981.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 (December).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83.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January).

U. 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1982. *The Decline of Black Earnings in America*. (February).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1978. *Marit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族群分层

F. 科普林 (Francis Kobrin)

C. 格德沙尔德 (Calvin Goldscheider)

在所有社会中,个人是分化的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某种“等级体系”中排定位置。在大多数社会中(如果不是所有社会的话),年龄和性别是用以分类和划分层次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样,社会阶级和民族(广义而言)是分化的根源,而且是美国社会中社会分层的决定性根源。社会阶级的影响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至如不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讨论族群问题(ethnicity)将毫无意义。此外,不考虑族群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对美国阶级体系所作的分析也是不完全的。也许社会阶级和族群的交叉分析,为系统全面地理解美国社会分层的本质提供了最有成果的方向 (Gordon, 1964;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Greeley, 1974)。

先前的大多数研究并未直接强调阶级和族群之间相互交叉的复杂情况。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要么认为阶级和族群因素是阶层结构根源的两个互不相关的因素,要么认为族群只是包括在社会阶级中的一个次要类型。在这两种观点中,族群因素的意义较之社会阶级因素都是次要的且暂时的。很清楚,强调一个因素而排斥另一个就割断了二者的联系,而且也不完全。此外,族群和阶级除了部分内容重叠外,族群还有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具有意义的一些方面。事实上,族群社区 (ethnic communities) 内部的变化及其差异同

* 本篇为两位著者所著 *The Ethnic Factor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Mobility* (1978 年由 Ballinger Publishing Co 出版) 一书的第二章。两位作者均为本书编者在美国布朗大学留学期间的老师,特利用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社会经济的阶级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族群间行为和态度方面的广泛差异反映了这些阶级因素。族群的同化、整合和不平等有一部分与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及阶级结构的变化相关。因而,把特定的族群组成要素(如文化的、结构的要素等)单独地拿出来进行分析,就需要对族群与社会阶级的交叉部分作充分的探讨。

本文对族群内部分层的几个层面进行了探索,并特别关注不同族群人口在教育成就、职业地位和社会阶级的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差异。对族群的社会阶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作不同时期的比较,使我们可以探讨社会变迁及社会经济整合的不同模式。对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变迁的分析为理解族群社区变迁的原因提供了基础。

教育成就

对分层的第一层探讨是族群的教育模式。一般认为,教育是影响后来的职业地位、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关键因素。对美国少数民族而言,教育是通向整合和文化同化的一条主要途径。

我们把有关教育成就的资料按性别分别列出。从两个不同的年龄组(45岁及以上组和45岁以下组)的变化中可以推断出每--族群人口教育变迁的原因。教育水平可以分为三类:(1)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高);(2)完整的中学教育(中);(3)没有完成中学教育(低)。

下面分析的重点是不同宗教和天主教族群人口的教育变迁及其差异。先前的研究已经揭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白人与黑人在教育上的差距扩大了,这是白人状况改善的结果。因此,美国种族间的教育差距扩大了。它还揭示存在着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不仅男性的教育水平比女性高,而且男女间的教育差距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稍有缩小。

种族教育差异模式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差异。本章中这些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揭示了各族群人口的教育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而且男女间变化的趋势不同。所有的族群都提高了他们教育成就的水平吗?各族群人口内部,男女教育水平的差距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了吗?各族群人口的教育水平事实上是相互接近了还是距离拉大了?族群之间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在社会整合和变化过程中降低了吗?这些就是下面要着重分析的关键问题。

各族群男性的教育

三个宗教人口群体男性教育成就的总体模式显示出一个清楚的等级排列：犹太教徒水平最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次之（表1）^①。

表1 按民族和年龄分类的男性教育成就

年龄和教育	新教	犹太教	天主教	法裔加拿大裔 天主教徒	爱尔兰裔 天主教徒	意大利裔 天主教徒	葡萄牙裔 天主教徒
两个年龄组合计							
高	22.6	57.1	14.7	5.3	32.3	14.4	9.0
中	36.0	28.6	25.5	24.8	28.5	19.7	26.0
低	41.4	14.3	59.8	69.9	39.2	65.9	64.0
45岁及以上组							
高	19.9	52.9	8.2	5.0	20.0	8.9	3.0
中	25.6	17.6	17.7	15.0	22.9	13.0	16.0
低	54.5	29.4	74.1	80.0	57.1	78.0	80.0
45岁及以下组							
高	26.1	61.1	21.6	5.7	46.7	20.8	15.0
中	49.7	38.9	33.8	35.8	35.0	27.4	36.0
低	24.2	0.0	44.6	58.5	18.3	51.9	48.0

高：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低：未完成中学教育；中：完整的中学教育（指读完高中）。

几乎有 15% 的天主教徒，23% 的新教徒和 57% 的犹太教徒男性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对低等教育的考察则发现，男性天主教徒的 60% 未完成中学教育，而新教徒为 40%，犹太教徒为 14%。

犹太教—新教—天主教群体教育成就等级的整体模式描述了两个年龄组的特征，但着重强调了宗教群体中那些较大年龄组的不同特征。超过半数的 45 岁及以上组的男性犹太教徒至少受到某种大学教育，大约只有 20% 的男性新教徒和 8% 的男性天主教徒获得这种高教育水平。同样，几乎有四分之三的男性高龄天主教徒、三分之二的犹太教徒和大约一半的新教男性高龄教徒没有完成中学教育。

从时间的变化看，三个宗教人口的教育成就水平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天主教群体中获大学教育的人增加很快，从 8% 到 22%，比其他两种宗教群体的

^① 这些发现可同戈尔茨坦 (Goldstein, 1969) 的报告和格里利 (Greeley, 1974) 的报告相比较。

增长都快得多。因此,尽管在宗教人口中对低等教育水平说法不一,天主教徒的教育差距却明显缩小了。获得大学教育的年轻男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差异明显缩小,而二者在低等教育上的差距却扩大了:未完成中学教育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例均有下降,但后者的下降速度较慢。天主教徒获大学教育人数的迅速增加和未完成中学教育者的缓慢下降(相对于新教徒而言)并存,说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中,教育的二重性或两极分化趋势。

年轻天主教徒教育差别的扩大,部分反映了天主教人口内部的族群差异。事实上,检验天主教徒中4个族群人口的资料可以发现,教育水平和模式的历时变化有较大差异,从总体上看,法裔加拿大人、意大利裔和葡萄牙裔美国人的男性天主教徒具有低水平的教育成就(64%—70%的人未能完成中学教育)。男性天主教徒中,爱尔兰裔受教育最高。在低等教育上,非爱尔兰籍的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明显差别,而在高等教育上却存在差距。考察获得大学教育者的比例可以发现,男性中意大利籍比葡萄牙籍受到的教育更好。所有天主教族群的样本中,法裔加拿大人教育等级最低。

天主教族群(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裔美国人及法裔加拿大)总体的教育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受年龄影响。两个年龄组中,爱尔兰裔的教育成就明显较高,意大利裔比葡萄牙裔或法裔加拿大人的教育等级要高。而高年龄组中法裔加拿大人是比葡萄牙裔高的。随时间的变化,法裔加拿大人教育改善很慢,相反,葡萄牙裔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提高三倍,未完成中学教育者则稳步减少。因而,在年轻组中,葡萄牙裔的教育水平在天主教民族中位居第三,超过法裔加拿大人而次于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事实上,年轻的法裔加拿大男子是所有族群中教育程度最低的,其未完成中学教育者高达60%,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则只有6%。

对意大利裔教育模式的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极有意义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男子的比例提高了2倍,达到21%,但未完成中学教育者依然过半。所以在天主教族群中,意大利裔、法裔加拿大人和葡萄牙裔在教育上的不同特征主要体现在意大利裔获得大学教育的比例较高。

这一事实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爱尔兰裔的教育成就水平比早先提到的新教徒一般要高。但高年龄组并非如此。高年龄组中,新教徒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的男子教育差距很小。年轻组中,爱尔兰裔获得大学教育者占47%,未完成中学教育的为18%。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教徒的相应比例各为四分之一。这一发现,连同上文提到的天主教族群教育的异质性,共同说明:对新教和天主教族群间的教育水平进行广泛比较是不适当的。二者间的教育差异远比

天主教人口内部的差异为小。当控制年龄后来比较教育水平,或者从时间的变化上来检验教育变化的模式时,这一结论更显正确。

各族群女性教育

像男子一样,各族群女性的教育差异及变化为理解族群分层和社会结构增加了一个重要角度。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男女两性在教育成就上的差异,反映了各族群人口内部性别不平等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各族群女性的教育成就模式,对于与婚姻及流动相联系的社会过程也有重要意义。表2详细检验了各族群女性教育水平的差异及变化。

表2 按族群和年龄分类的妇女教育成就

年龄和 教育	新教	犹太教	天主教	法裔加拿大 天主教徒	爱尔兰裔 天主教徒	意大利裔 天主教徒	葡萄牙裔 天主教徒
两个年龄组合计							
高	16.5	33.2	5.0	2.9	11.7	4.0	2.9
中	39.3	41.0	34.8	28.3	48.0	30.4	28.4
低	44.2	25.6	60.2	68.8	40.2	65.6	68.6
45岁及以上组							
高	14.7	17.4	1.9	1.1	4.1	0.7	0.0
中	32.5	43.5	20.8	13.6	40.2	14.6	10.5
低	52.8	39.1	77.3	85.2	55.7	84.7	89.5
45岁及以下组							
高	18.7	56.3	7.9	5.1	20.7	7.6	4.7
中	47.2	37.5	48.5	47.1	57.3	47.7	39.1
低	34.1	6.3	43.6	47.8	22.0	44.7	56.3

高:至少受过大学教育;低:未完成中学教育;中:完整的中学教育(指完成高中教育)。

前文提到的不同宗教男子教育差异的一般模式也适用于女性:受到高等教育的犹太妇女比女性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要多。新教与天主教妇女间的教育差异比男子更大——受过大学教育的新教妇女是天主教的3倍多。与新教模式相比,天主教徒中的女性明显地比男子落后。

就整体而言,新教—犹太教徒女性教育成就的明显差异,在年轻组中比高年龄组更引人注目:在45岁以下组中,56%的犹太妇女受到大学教育,而新教妇女还不到20%。若从时间角度探求男女间教育变化模式时,就会有一个重要发现:犹太高年龄男子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多。这意味着,犹太男子显然从相对

较早时期即强调接受某种大学教育。同男子相比,犹太妇女花了更多时间去争取上大学的权利。高年龄女性主要致力于完成中学教育。妇女中未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迅速下降。实际上,年轻的犹太人,不论男女,没有未能完成中学教育的^①。

新教和天主教徒妇女间教育成就(特别是高等教育)上的差异,在年轻组中缩小了。同样有意义的是,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天主教徒女子的比例下降,而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增长了。约有五分之一的高年龄天主教徒女子至少完成了中学教育,而年轻女子则达五分之三,令人感兴趣的是,45岁以下组天主教徒女子的位置已接近早几代(45岁及以上组)犹太妇女。

上文提到,男性天主教徒间存在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女性天主教徒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总体上看,爱尔兰裔女子在教育上明显走在其他天主教族群妇女的前面,意大利裔女子次之,法裔加拿大及葡萄牙裔女子在教育水平上则没有多大差异:她们教育水平都很低,十分之七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3%。爱尔兰裔女子所受的教育比新教的要好,但也只是在年轻组中,这与男性中的模式相似。在两个年龄组的天主教族群的妇女中,爱尔兰裔女子的教育水平均较高。而意大利裔女子只是在年轻组中才比法裔加拿大和葡萄牙裔女子获得较高的教育等级。与男子教育水平的模式不一样的是,法裔加拿大妇女和葡萄牙裔妇女几乎没有整体差异,即使在年轻组中,二者进大学的比例也只有5%,而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则约有一半。

美国天主教妇女中,爱尔兰裔教育水平比其他群体明显要高。但由于意大利裔起始教育水平低,她们在教育上的进步是最大的。比较高年龄组和年轻组即可发现,意大利裔妇女未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已从85%降到45%,至少受过中学教育的比例则从15%上升到55%。

我们所作的最后一种比较,可能与不同族群人口男女间相对教育水平有关。对表1和表2资料的简单比较已经显示,在每一族群和年龄组中,至少受到大学教育的男子比例比女子要高。相反,除高年龄组的新教徒与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年轻组的法裔加拿大人与意大利裔天主教徒之外,妇女的教育等级都是较低的。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

对男子与妇女的教育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必须重视两个一般性问题:第一,对于男女教育相对水平的差异而言,族群差异的规律是什么?第二,男女间教育的

^① 关于其他资料所得出的相同趋势,可参阅戈尔茨坦和格德沙尔德(Goldstein and Goldscheider, 1968)的报告,以及戈尔茨坦1969年的报告。

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不同民族人口的这种变化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回答这些问题,在表3中,我们列出了那些受到大学教育的男女的相对比例。比例值越高,男女间教育水平的相对差距就越大,男子越领先。例如,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不到白人男子的50%。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大学的男女人数都提高了,但这种相对差距却保持不变。检验这些资料可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表3 按族群和年龄分类的男女进大学比例的相对差异^{*}

	两个年龄组合计	45岁及以上组	45岁以下组
全体	49.7	51.8	50.2
新教徒	27.0	26.1	28.4
犹太教徒	41.7	67.1	7.9
天主教徒	66.0	76.8	63.4
法裔加拿大人	45.3	78.0	10.5
爱尔兰裔	63.8	79.5	55.7
意大利裔	72.2	92.1	63.5
葡萄牙裔	69.2	100.0	69.1

1. 从时间的变化看,新教男女间的教育差距呈相对稳定性,且比天主教徒的为小。犹太教男女教育相对差距较大,但在年轻组中明显缩小。

2. 相对于犹太男子而言,犹太女子的教育成就提高了。这主要因为进入大学的女子数激增。从时间的变化看,法裔加拿大男女间教育差距缩小得更快。但与前者很不相同的是,这种缩小不仅因为获得大学教育的女子比例有了较大增长,同时也由于获得大学教育的男子比例相对稳定和减少的缘故。

3. 所有民族群体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都缩小了。但与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的这种差距依然较大。而且与犹太教徒相比,新教徒的差距在扩大。就高年龄组而言,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男女教育成就的差距比天主教人口内部的要大;年轻组中,除法裔加拿大人之外,情况也是一样。因此,宗教在男女角色分化(至少就教育而言)上所起的作用,比宗教群体内部的族群差异可能更重要。

* 这种相对差异的计算方法:用获得大学教育的男子比例,减去获得大学教育的女子比例后,所得的差再除以获得大学教育的男子比例。即:

$$\text{相对差异} = \frac{\text{男子} - \text{女子}}{\text{男子}} \quad \text{或} \quad \frac{M - F}{M}.$$

职业地位

我们将要探讨的族群分层的第二个主要层次与职业地位(occupational status)相关。与教育成就(它相对集中于生命周期的某一段、且较少受到婚姻与抚养孩子的影响)不同,职业流动在成年人生命周期的大部分中均可发生。因为女子要抚养孩子,且可能与丈夫争夺地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请参阅 Oppenheimer, 1977)。我们对职业地位的分析仅限于男性。职业流动不仅发生在生命周期内,并且反映了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因此,探讨 50 年期间不同年龄组的职业变化,可反映出社会中的代内、代际及职业分布的整体流动状况。

不同族群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不同,职业倾斜与变化的特征各异,这些都导致了分析难度的增加。这里用了两种职业地位的测量方法,以期克服一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或使其标准化。对每一民族群体,我们将测量其目前职业和 25 岁时的职业(初始职业,initial occupation)。显然,对于高年龄组的目前职业的考察方法存在一定问题,而年轻组 25 岁时的职业与目前职业在检验方法上没有很大不同。这里使用两种测量方法,是为了检验族群职业地位模式的相对一致性(the relative consistency of the patterns of ethnic occupational status)。按丹肯标量(the Duncan Scale),我们将目前职业和 25 岁时的职业划分为四个声望等级(Reiss, 1961 年)。因这种标量有所限制,因此它在获得声望的测度上比一般的职业分类更可信。

必须强调的是,在这四种职业等级和其他更标准的职业分类间,存在着很高的相关关系。例如,从事最高等级职业的 84% 为高级白领阶层,而从事最低等职业的 88% 为低级蓝领阶层。90% 以上的低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属于两个较高的等级,87% 的高级蓝领阶层的职业属于中间两个等级。因此,这四个职业等级与高、低级及白领、蓝领阶层的划分密切相关。职业分布的总体是所有白人人口,他们被分为规模大致相等的四个等级。

比较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目前职业地位的分布发现,二者没有明显差别(表 4),与新教徒相比,天主教徒的职业等级稍低。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职业相似性形成对照的是,犹太教徒的职业集中于较高的等级上,处于较下等级的比例极低。

表4 按宗教和年龄分类的男子目前职业和25岁时的职业等级¹

年龄和 职业等级	新教徒		犹太教徒		天主教徒	
	目前	25岁	目前	25岁	目前	25岁
所有年龄组						
I	21.0	18.9	67.2	52.3	21.2	14.2
II	23.5	29.0	25.0	36.4	25.7	24.8
III	27.2	23.1	6.3	6.8	27.8	26.7
IV	18.3	29.0	1.6	4.5	25.3	34.3
65岁及以上组						
I	22.9	15.7	—	—	8.9	4.1
II	23.7	32.5	—	—	19.3	17.6
III	32.2	19.3	—	—	27.7	22.3
IV	21.2	32.5	—	—	44.1	56.1
45—64岁组						
I	32.1	16.0	58.1	40.9	16.7	9.4
II	23.2	30.8	29.0	45.5	26.7	25.2
III	26.6	23.6	9.7	9.1	28.8	26.9
IV	18.1	28.6	3.2	4.5	27.8	38.5
35—44岁组						
I	39.2	23.2	84.6	—	25.5	14.8
II	20.8	24.4	15.4	—	26.5	25.8
III	24.6	23.2	0.0	—	27.0	31.7
IV	15.4	29.3	0.0	—	20.9	27.7
25—34岁组						
I	27.6	22.2	66.7	—	31.7	30.6
II	26.8	25.9	25.0	—	26.9	27.7
III	26.8	25.9	8.3	—	26.9	22.8
IV	18.9	25.9	0.0	—	14.5	18.9

¹ 丹肯标量数值 I = 59—97; II = 34—58; III = 18—33; IV = 1—17。

新教与天主教徒的职业结构在总体上是相似的,但在年龄组中却有所偏差。^①实际上,比较新教徒与天主教徒职业的分配可以发现,不仅二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缩小,就年轻组而言,天主教徒的职业等级比新教徒要高。例如,在老年组中,天主教徒最低职业的比例是新教徒的2倍,而新教徒中最高级

^① 教育分布可按两个年龄组划分而不致受到歪曲。职业分布与此不同。它往往由于各年龄组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必须对年龄进行四级分类。

职业的比例为天主教徒的 2 倍。而年轻组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年轻组中, 天主教徒在最高等级职业的比例比新教徒高, 而最低等级的新教徒比例比天主教徒高。同样, 在 45—64 岁及 25—34 岁两个年龄组中, 新教居于最高两个职业等级的比例为 55%, 而天主教的这一比例从 43% 上升到近 60%。因此, 新教徒的起始职业优势已明显削弱。实际上, 年轻组中已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相同的特点在比较 25 岁时的职业地位上也有体现。从总体上看, 用起始职业 (initial occupation) 作为测量手段使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 但差异的方向未变。在最年轻组中, 58% 的天主教徒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前两个高级职业 (25 岁时), 而新教徒的比例为 48%。天主教徒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 这明显是新近才有的现象。比较年龄较大组可明显看出, 在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 与新教徒相比,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天主教徒 (60 年代后期这批人的年龄在 35—44 岁之间) 的起始职业等级较低。20 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些天主教徒也有类似特征, 他们当时 25 岁, 后来又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 60 年代后期其年龄在 45 岁以上。

在某种程度上说, 如果这些修正的 (即后来调查时申报的) 25 岁时的职业资料是可信的, 它们则明确显示出: 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职业差距是 50 年代后期以前所独有的特征。从 60 年代开始, 平均而言,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天主教男子的职业地位等级与新教徒相同, 或者稍好。因此, 就教育资料而言, 它们显示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育水平差距正在缩小, 但尚未完全接近。职业地位资料显示, 在最年轻的年龄组中, 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差距已经消失, 且天主教徒的职业等级比新教徒的改善更多。这种聚合模式说明, 对天主教徒而言, 教育不像新教徒那样, 在获得职业地位上具有重要性。特别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社区中, 家庭一族群纽带在职业成就 (至少在决定起始职业水平) 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比教育更大。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 相对于新教徒而言, 天主教徒职业等级与教育的直接相关性较小, 而且获得职业地位的途径也与新教徒与犹太教徒有所不同。

为试图阐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育与职业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准备了一些资料, 以说明那些处于目前和起始职业最高等级者的教育起点, 以及那些至少受到大学教育者的起始与目前职业成就。这些新教、天主教徒教育与职业的相关资料列于表 5 中, 它分为 25—34 岁和 45—64 岁两个年龄组。这些资料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族群因素在职业成就中所起的强有力的作用。

表5 按宗教和年龄分类:因教育而进入最高职业等级
[当前和起始]及通过最高教育水平所进入的职业等级(当前和起始)数据表

	新教		天主教	
	25—34	45—64	25—34	45—64
教育	目前职业等级最高			
高	60	65	60	47
中	41	25	32	29
低	0	10	8	4
教育	起始职业等级最高			
高	53	79	53	44
中	47	17	39	21
低	0	4	9	35
目前职业等级	来自最高教育水平			
I	59	65	77	69
II	19	17	21	24
III和IV	22	10	3	7
起始职业等级	来自最高教育水平			
I	42	63	77	39
II	32	30	18	50
III和IV	26	7	5	11

* 丹肯标量数值 I = 59—97; II = 34—58; III = 18—33; IV = 1—17。

各宗教人口群体获得职业成就的途径不同。对此的第一个说明是对不同教育水平者进到最高职业等级的分析。处于最高职业等级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在 45—64 岁年龄组中,那些起始职业(25 岁时)即处于最高等级的新教徒有近十分之八受过高等教育,而天主教徒只有 44%。那些职业等级(包括目前或起始职业)高的较年轻的新教徒没有一人的教育水平低于中学教育,而天主教徒则有 8%—10% 的人没有完成中学教育。此外,年龄分类显示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这种相关关系,随着时间而有不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而处于最高职业等级的天主教徒比例上升(当前职业从 47% 上升到 60%,起始职业从 44% 上升到 53%),新教徒则与此相反,当前职业等级从 65% 降到 60%,起始职业从 79% 降到 53%。因此,教育作为获取较高职业成就的途径,在天主教徒中显得没有新教徒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这种变化趋势明显地趋向集中。

就高年龄组新教徒而言,位于最高的起始职业和目前职业等级的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比例大体相同。而天主教徒的教育在目前职业等级中的作用比

在起始职业等级中更大。因此,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高教育对高职业等级的重要性的差异,在起始职业中比目前职业要大;高年龄组比年轻组要大,且主要表现在老年组的起始职业等级上。

天主教徒通过较高教育达到较高职业等级比新教徒的这种联系要少,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受过较高教育的天主教徒未能得到高等级的职业。恰恰相反,至少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徒比受到同等教育的新教徒在起始和目前职业上更有可能达到较高等级。四分之三的受到大学教育的年轻天主教徒,其起始和当前职业均处于最高等级,而受过较好教育的新教徒的这一比例在起始职业中为42%,在目前职业中为59%。从纵的方向看,受过较好教育的天主教徒,其起始与当前的职业等级属最高的比例在增加(起始职业等级比当前职业等级上升得还快),而新教徒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高年龄组新教徒而言,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或正处于高等级职业的比例更小。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年龄天主教徒中,只有39%拥有最高等级的起始职业,而当前职业居于最高等级的比例则为69%。因而,高等教育对上一代天主教徒并不一定意味着取得最好的起始职业,也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缺乏会构成年轻天主教徒追求起始及随后高等级职业的障碍。

因此,这些资料有力地论证了以上资料所反映的论点,即教育在职业成就上的作用,对天主教徒而言比新教徒更小。这一发现同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过较好教育的天主教徒进入并居于最高职业等级(比新教徒高得多)的事实相结合,说明特定的族群因素在天主教徒的职业成就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天主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地方以及当资源的控制由新教徒转移到天主教徒之手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这些族群因素不仅使受较少教育的人进入最高职业等级,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受过较好教育者进入最高职业等级中。

通过对天主教内部族群差异的检验,可以阐明年轻的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部分原因。由于已发生的变化不同,还由于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法裔加拿大人和葡萄牙裔天主教徒二者间增长的二极趋向,所以天主教族群内部的职业差异模式显得更有意义。

检验四个天主教民族群体职业分布的总体模式,可以发现一个明确无误的目前职业、起始职业的四重等级结构(表6)。两个高等职业等级的比例分别为:爱尔兰裔(61%),意大利裔(48%)、法裔加拿大人(37%)、葡萄牙裔(31%)。当只考虑25岁时的职业,并单独检验高等职业水平时,同样的天主教族群模式依然存在。

表 6 按天主教族群和年龄划分的男性目前和 25 岁时的职业等级¹

年龄和 职业等级	法裔加拿大人		爱尔兰裔		意大利裔		葡萄牙裔	
	目前	25岁	目前	25岁	目前	25岁	目前	25岁
所有年龄								
I	16.4	9.0	30.0	22.2	21.7	12.5	13.4	6.3
II	21.0	19.5	30.8	40.9	26.8	23.3	17.6	12.5
III	35.3	34.1	23.3	19.9	24.8	24.4	27.5	25.0
IV	27.3	37.5	15.8	17.0	26.8	39.7	41.5	56.3
65 岁及以上组								
I	10.1	4.0	15.2	8.0	6.0	2.9	0.0	0.0
II	14.5	20.0	36.4	36.0	18.0	8.6	5.6	0.0
III	31.9	34.0	30.3	20.0	38.0	20.0	22.2	14.3
IV	43.5	42.0	18.2	36.0	48.0	68.6	72.2	85.7
45—64 岁组								
I	16.2	6.1	22.0	16.4	15.3	5.6	7.0	8.1
II	19.1	13.3	29.0	43.3	29.0	26.3	19.3	10.8
III	36.8	30.6	28.0	22.4	25.7	23.4	26.3	21.6
IV	27.9	50.0	21.0	17.9	30.1	44.4	47.4	59.5
35—44 岁组								
I	15.8	6.9	43.9	32.6	27.9	11.7	16.7	0.0
II	24.2	23.6	31.6	41.9	25.4	20.8	13.3	10.0
III	35.8	44.4	14.0	16.3	24.6	33.8	33.3	25.0
IV	24.2	25.0	10.5	9.3	22.1	33.8	36.7	65.0
25—34 岁组								
I	23.4	23.4	40.0	30.6	34.4	37.3	27.0	12.0
II	26.0	25.5	30.0	38.9	29.0	29.4	24.3	24.0
III	35.1	25.5	20.0	19.4	21.5	15.7	27.0	36.0
IV	15.6	25.5	10.0	11.1	15.1	17.6	21.6	28.0

¹ 丹肯标量数值 I = 59—97; II = 34—58; III = 18—33; IV = 1—17。

但是,天主教族群人口的年龄差异,以及天主教族群内部的年龄代际(通过年龄划分)与职业地位间的不同相关性,明显地扭曲了这些模式。在天主教族群中,爱尔兰裔在最高职业等级的比例一直领先,就年龄最大组而言,有一半人在地位等级中居于最高的两个层次,这是任何其他天主教族群比例的 2 倍多。在 65 岁及以上和 45—64 岁两个年龄组中,爱尔兰裔的这一职业等级的比例并无多大变化。从第二个等级进入最高等级以及从第三、四两个等级进入上面两个等级的极有意义的转移,发生在 35—44 岁年龄组,而且这种转移在最年轻年

龄组中还在继续。因此,25—34岁年龄组中,有整整70%的爱尔兰裔处于最高两个等级中,只有10%的人处在余下的两个等级。

意大利裔天主教徒通常占据职业的第二个等级。但其职业分布的变化与爱尔兰裔有着不同的特点。从65岁及以上组到45—64岁组里,意大利裔位于最低职业等级的比例下降了,同时居于最高等级的人则增加了一倍多。这种向较高等级集中的重新分配过程,在35—44岁年龄组中还在继续。并且在四个职业等级中渐趋均衡,最高等级的比例从15%上升到28%。因此,从纵向来看,爱尔兰裔向最高职业等级转移的变化,比意大利裔更少突发性。

法裔加拿大人的职业从45—64岁组开始显示出非常缓慢地向上提升的特点。他们处于两个高等职业类别的比例,在三个年轻组中从35%上升到40%,再上升到50%。法裔加拿大人职业等级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最年轻组中,而意大利裔职业等级增长最迅速的则是在35—44岁组中。爱尔兰裔则发生在45—64岁组中。

葡萄牙裔开始时集中于最低职业类型(年龄最大组的葡萄牙裔当前职业有72%处于最低等级,起始职业则有85%处于最低等级)。其最有意义的变化是最低等级所占比例从年龄最大组的72%下降到最年轻组的22%。葡萄牙裔也存在向最高等级职业的流动(从45—64岁组的7%上升到25—34岁组的27%),但职业的重新分配主要趋向中间的两个等级。

各年龄组中,爱尔兰裔在所探讨的各个时期中,都居于天主教各族群的最高等级。意大利裔只在45岁以下各组中进入第二等级,最年轻组的意大利裔男子正迅速接近爱尔兰裔的职业水平。葡萄牙裔一直处于低层,但其与法裔加拿大人职业地位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25—34岁组的葡萄牙裔在四个等级中的分配近乎均匀,这与35—44岁组的意大利裔及45—64岁组的爱尔兰裔大致相当。从时间变化来看,这种职业特点清楚地反应了各天主教族群人口不同的社会经济正趋于整合。

因此,当总体上,天主教族群职业地位的等级显示出明显的四重结构时,年轻的天主教徒的职业等级则趋向二重: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模式和法裔加拿大人—葡萄牙裔模式。必须注意的是,法裔加拿大人的职业等级与那些受教育极少因而处于低等职业的葡萄牙裔形成对照。一般而言,天主教族群年轻人口职业等级两极分化与教育成就的四重等级再次表明:教育在天主教人口内部与在天主教徒、新教徒之间一样,具有不同作用。事实上,相对于早先所提到的新教徒而言,占优势的天主教徒的职业分布明显属于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模式,而与其他两个天主教族群不同。同新教徒相比,爱尔兰天主教徒从35—44岁组

开始,在目前和起始职业中更多地集中在较好的等级中,最年轻组意大利裔同样也有此特点。

由于存在着少量职业等级和教育水平均属最高的葡萄牙裔,影响了我们对天主教民族群体教育与职业相关性的探讨。然而,处于最高职业等级的法裔加拿大人、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教育起点揭示出极有意义的差异(表7)。年轻的处于最高职业等级的法裔、加拿大人,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的不足四分之一,而意大利裔则为62%,爱尔兰裔为90%。高年龄组的特点也相同。很明显,法裔加拿大人并非通过较高的教育水平取得较高的职业等级。对所有三个族群而言,在高年龄组和年轻组之间,随着职业等级的提高,教育水平皆有相应增长。

表7 按年龄分类的天主教族群通过教育^a
达到最高的目前职业等级^b和由最高的教育水平所达到的目前职业等级

群体和年龄	达到最高的目前职业等级			由最高的教育水平所达到的目前职业等级		
	教育			目前职业等级		
	高	中	低	I	II	III和IV
法裔加拿大人						
25—34岁	22.2	66.7	11.1	—	—	—
45—64岁	19.0	47.6	33.3	—	—	—
爱尔兰裔						
25—34岁	90.5	9.5	0.0	90.5	4.8	4.8
45—64岁	83.3	0.0	16.7	55.6	33.3	11.1
意大利裔						
25—34岁	62.1	27.6	10.3	66.7	29.6	3.7
45—64岁	50.0	19.2	30.8	76.5	23.5	0.0

^a 高 = 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中 = 完成中学教育;低 = 未完成中学教育。

^b ^c 丹肯标量数值 I = 59—97; II = 34—58; III = 18—33; IV = 1—17。

处于较高职业等级的爱尔兰裔,不仅教育起点很高,而且那些处于最高职业等级者中至少受过某种大学教育的比例也很高。进而言之,那些处于最高职业等级中的爱尔兰裔,其受过较好教育的比例急剧增加:从45—64岁组的56%上升到年轻组的90%。意大利裔则与此相反,与高年龄组相比,受教育少的年轻人进入最高职业等级者更少。

虽然最高等级职业的范围很广泛,且只有一些职业要求较高教育,但很明显,教育对一个天主教族群的职业成就具有十分不同的作用。此外,天主教人口教育与职业成就间的相关关系总体上与新教徒不同。

主观自我认定的社会阶级

除了用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的标准变量来客观测量不同的分层次外,个人对他们本身的社会阶级等级的主观感觉也被用来作为分析社会阶级的基础。毫无疑问,用主观的社会阶级认同(social class identification)作为分层的唯一或主要标准是不足与模糊的。但是,分层(客观的和主观的)的层次间缺乏一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某些测量指标比其他的“更好”,而只能说不同的测量指标着眼于复杂、多维的社会等级的不同方面(参见 Matras, 1975; Hodge and Treiman, 1968; Runciman, 1966)。

为试图广泛探讨分层内容的族群差别及其变化,本文收集了有关的社会阶级自我认同的资料。这种社会阶级的自我陈述(selfassignment of social class)为分析族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主观标准,因为它们可以显示出几种社会分层不一致的趋势。对所有被调查的族群和所有年龄群体,主观的社会阶级分析法倾向于把被调查者根据他们的回答明确分为两种类型:(1) 中产阶级;(2) 工人阶级。此外一些处于边缘上比例较少的人把自己要么看作更上层阶级,要么看作更下层阶级^①。因而本文将主要分析那些自认为至少是中产阶级者的比例(也包括自认为是上层阶级的比例很小的少数人)。这些按年龄和族群分类的资料列于表8。

表8 按族群和年龄分类的自认为是上层或中层阶级的人的比例

	全部 年龄组	60岁及 以上组	45—64 岁组	35—44 岁组	25—34 岁组
总体	54.7	55.1	53.0	54.5	57.8
新教徒	63.0	69.6	57.5	66.3	61.4
犹太教徒	87.8	85.7	86.2	94.1	85.7
天主教徒	49.5	45.1	48.6	48.6	55.0
法裔加拿大人	43.0	36.1	40.8	47.2	50.5
爱尔兰裔	62.3	71.0	56.2	59.7	66.7
意大利裔	50.6	41.3	50.7	46.6	64.0
葡萄牙裔	37.2	41.2	27.3	40.5	45.5

① 美国国家调查局(National American Surveys)曾有同样的发现,请参阅赫德和特勒曼的文章(Hodge and Treiman, 1968)。

一般而言,主观的社会阶级特征所揭示的每一个不同族群人口的年龄组之间的相对差异很小。因此,用年龄作为代际的一个指标,特别的是把年龄作为一个同一个时间上横向比较的资料来揭示纵向变化特征,在主观社会阶级测量上的适当性,就比用在教育测量的要小得多,因为在25岁以后教育水平相对很少变化。

尽管族群人口内部年龄组间的主观社会阶级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族群之间(控制年龄因素)还是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第一,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者的比例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宗教差异。有近十分之九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层或中等阶级,新教徒的这一比例为十分之六,而天主教徒为十分之五。各年龄段中均存在这一主观社会阶级认同上的宗教差别(犹太教、新教、天主教)。宗教人口之间自我社会阶级认同的相对差异,在最年轻组中最小,但是这种差异仍十分显著:在25—34岁组中,有86%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中产或上等阶级,新教徒的比例为61%,天主教徒为55%。由于天主教徒自认为是上层或中等阶级者的比例明显上升,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差距得以缩小一部分。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新教徒比例的下降并不十分显著:从年龄较大组的70%下降到25—34岁组的61%。

第二,自认为是上层或中等阶级的天主教人口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差异。自认为是上层或中等阶级的爱尔兰裔比例与新教徒相同;在最年轻组中,爱尔兰裔的比例则大于新教徒。比爱尔兰裔比例稍低的是意大利裔,随后是法裔加拿大人和葡萄牙裔。除一些差别外,天主教人口内部的这种主观的社会阶级等级,在各年龄组比例一样。最后,在四个天主教族群人口中,自认为是中上阶级的比例有明显的集中趋势。天主教族群人口内部差异不断缩小的原因,是法裔加拿大和葡萄牙裔缓慢但却稳定的增长,而意大利裔改变较大,爱尔兰裔改变较小。

因而,天主教族群内部,最年轻组的增长出现两极分化特征。这与先前所提到的职业地位特征相一致。自认为是中上阶级的年轻的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比例差异较小,年轻的葡萄牙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主观社会阶级认同差异也不大,但稍逊于爱尔兰—意大利裔。事实上,对较年轻组而言,天主教族群内部主观社会阶级地位的差距,要比新教与天主教的差距大。

族群分层中几个层次的分析清楚地说明:考察的人口群不同,其变化的方向与差异也不同。虽然不平等有缩小的趋势,但是族群在教育成就模式、职业地位模式和社会阶级的自我认同上仍存在巨大的差异。因为社会阶级是社会过程的一个主要分化指数,因而在考察社会过程中的族群变化及其差异时,必

须把阶级因素作为核心变量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用各族群人口的社会阶级组成的不同,来解释族群间婚姻和社会流动变化的不同。如果族群差异是社会阶级集中分布状况(social class concentration)的唯一函数,那么我们分析的问题,应能理解族群内部不同分层及不平等的发展。如果社会过程中的族群差异在社会阶级类别结构中体现出来,则我们分析的重点将转移到其他方面,即更为特定的族群要素——文化要素或结构要素。这些要素有可能阐明族群间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阶级因素都必须作为族群分析的主要焦点。

参 考 文 献

Glazer N. and P. Moynihan.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2nd ed. Cambridge, Mass. : The M. I. T. Press.

Goldstein, Sidney. 1969.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Among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May) : 612—631.

Goldstein, S. and C. Goldscheider. 1968. *Jewish Americans: Three Generations in a Jewish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Gordon, Milton.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ley, Andrew. 1974.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reliminary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Wiley.

Hodge, R. W. and D. Treiman, 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 535—542.

Matras, Judah. 1975.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Inc.

Oppenheimer, V. 1977. "Women's Economic Role in the Fami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 (June) : 387—405.

Reiss, Ira. 1961.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Runciman, W. G. 196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纪秋发 译, 俞家栋 校)

劳动力参与中的种族—族群差异： 一个族群分层的透视

特里塞·A. 苏利万 (Teresa A. Sullivan)

用统计文献形式体现“劳动力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LFPRs)的种族和族群差异是容易做到的,但要对此类差异做出解释则不然。这里的困难部分归因于我们采用的测度方式,部分归因于少数族群人口统计机构。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指标,它的升降并不能直接地反映被测群体的成功或失败。由于工作收入和职业身份通常只与劳动力结合起来探讨,因此劳动力参与是与社会分层体系(包括种族和族群的社会分层)相联系的。然而,在少数群体人口统计(minority demography)的文献中,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已经成为淡化了的主题。在少数群体人口统计研究中,一直存在着重描述、轻分析的倾向,仅仅致力于用数据表现少数族群之间差异的大小和范围而不是去解释它们的原因。

本章要讨论的是:少数群体人口统计研究需要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概念来定义“少数群体”(minority groups)。我将提出通过分析社会资源的取得情况(access to resources)这样一个强调族群分层的视角来定义“少数群体”。这一视角同时也强调少数群体人口与占统治地位族群人口以及其他少数族群人口之间的互动。从这种视角考虑,人口学家应该研究劳动力参与的类型(type),而不是仅仅考虑参与率(rate)的大小。劳动力参与类型隐示着资源控制(re-

* 本文选自 F. Dean 和 W. Friable 主编的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Academic Press, 1978) 的第七章。翻译并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Academic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source control)的策略,这些策略也会带来其他人口特点方面的结果。

劳动力参与率的种族和民族差异

劳动力参与率,也称经济活动率(economic activity rate)或净活动率(refined activity rate),是人口学家用以测度经济活动状况的最常用的指标。劳动力参与率是指在参照周(reference week)期间劳动力人口总数与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所有非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ized)人数的比率。劳动力包括所有在一周内工作至少一小时以取得工薪或利润的人,也包括不获取报酬但至少工作15小时的家务劳动者以及那些积极寻找工作机会的人。换句话说,劳动力既包括已就业者也包括非自愿失业者。尽管这一劳动力定义已经受到了批评,但是劳动力参与率还是具有容易理解、可有效地用于时间序列研究、在世界上被广泛应用等长处。它也在许多划时代的研究中被当作因变量加以使用(Bowen and Finegan, 1969; Durand, 1975)^①。

遗憾的是,劳动力参与率并不能直接解释什么。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并不必然意味着被测群体的经济景况更佳。例如,一个新近移民群体的劳动力参与率可能会较高,因为他们有很大比例的人口处在基本的劳动年龄层。一个更早来的移民群体由于很多退休者的存在,劳动力参与率可能比较低,但在经济上可能更有保障一些。然而,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也不必然是富有的体现。较低的劳动参与率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群体有能力使青年人延长学校教育而且让老年人退休。但是它也可能意味着一部分群体成员因经济活动中的挫折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确定什么水平是“高”的,什么水平是“低”的。人口学家或许能同意40%的粗生育率为高,而10%的粗生育率为低。而关于劳动力参与率几乎没有一个公认的尺度,在没有控制年龄、婚姻状况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表1显示了1970年美国不同的种族族群分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美国印第安人男女的劳动力参与率都是最低的。其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比最高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古巴裔)低20个百分点,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比最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菲律宾裔)低23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每五个美国印第安人中就得有一个加入劳动力行列才能与最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持平。表1给了我们几种

^① 我在此区分了用劳动力参与率时以群体为研究单位和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请看后面斯威特(Sweet, 1973)的研究实例。

函数关系。第一,它显示出把“西班牙语裔”或“亚洲人”,更不必说把“非白人”作为整体来进行劳动力研究的危险性(Lyman, 1974: 26; Roberts and Lee, 1974: 505)。第二,它表明了因性别不同而呈现出的劳动力参与的明显差异。墨西哥裔的男性劳动参与率比女性有相对高得多的水平^①。按照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华裔和菲律宾裔女性在所有女性中与其男性在所有男性中相比较列于更高的位置。然而,关于古巴裔与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多黎各裔与墨西哥裔相比,根据该表就难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

表 1 10 个族群按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1970 年)

族群	男	女
古巴裔	83.7	51.0
日本裔	79.3	49.4
菲律宾裔	79.0	55.2
夏威夷人	77.9	48.5
墨西哥裔	77.4	36.4
朝鲜裔	75.5	41.5
波多黎各裔	75.5	35.3
华裔	73.2	49.5
黑人	69.8	47.5
美国印第安人	63.4	31.6
所有白人 ¹	73.8	38.9

资料来源:本文表 3。

¹ 包括西班牙语裔群体(即包括古巴裔、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

表 2 提出了长时段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因为根据表 1 黑人男性在人口普查报告中劳动力参与率是最低的。而黑人占非白人的 90%。因此,尽管把非白人归为同一类做研究有缺陷,但表 2 仍然代表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性。从表 2 发现非白人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有长期降低的趋势,而白人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趋势较缓。虽然 1960 到 1970 年的十年间两类群体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最大幅度的下降,但在 1950 年非白人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就已滑落到白人男性以下,并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这项研究中,古巴裔、日本裔和菲律宾裔在 1970 年的高参与率应视为仅适于当时的,而不是真正代表持续的高水平。

① 这里是指那些人口普查中主动申报“墨西哥原籍”(Mexican origin)的人。

表 2 1890—1970 年期间人口普查中不同种族的劳动力参与率

	总计		男		女	
	白人	黑人及其他	白人	黑人及其他	白人	黑人及其他
1890	51.0	62.4	84.0	86.6	15.8	37.7
1900	52.4	65.0	84.4	88.5	17.3	41.2
1920	53.2	64.2	84.1	87.5	20.7	40.6
1930	52.1	63.2	81.7	86.1	21.8	40.5
1940	52.1	58.1	79.7	80.0	24.5	37.3
1950	53.1	56.1	79.2	76.6	28.1	37.1
1960	55.2	56.3	78.0	72.1	33.6	41.8
1970 ^a	55.7	54.2	73.8	65.4	38.9	44.4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报告，(1976)，表 BB-3；

^a 1970 年资料不包括 14 至 15 岁的就业者。

白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1890 年以来一直稳定地上升，而且自 1940 年开始加速。比较而言，非白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本世纪的头五十年持续降低，向白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水平靠拢但仍然总是超过它。在 1950 年至 1970 年期间，非白人女性的参与率有所增长。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非白人女性比白人女性的景况更好吗？尽管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Farley, 1977; Freeman, 1976: 179)。非白人男性 1970 年与 1890 年比较，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白人男性相比情况更糟了吗？似乎也并非如此。我们能说低参与率是男性的好兆头，而高参与率是女性的好兆头吗 (Long, 1958)？非白人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曾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这里通常有一个共识：即它体现了经济的衰退 (Farley, 1977; Levitan, Johnston and Taggart, 1975: 69ff.)。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问题在于，只要是孤立地研究劳动力参与率，就必然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非白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这里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不可知论的说法是：在对经济状况研究出更深入的结论以前，一定要对许多变量加以控制。正像上面提到的，年龄就影响到了参与率的比较（表 3 也给出了年龄在 35—44 岁之间的男性参与率。在此年龄组中，各族群之间参与率的差异就比全部男性相比较时的差异要小得多）。对妇女来讲，孩子数目、孩子年龄以及获得家庭帮助的状况都对她们的劳动参与有影响。在西班牙语裔群中，以上因素会影响古巴人和墨西哥人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差别 (U. S President, 1974: 96)。黑人男性参与率下降的特殊问题已经找到了中性的解释因素，比如婚姻状况 (King and White, 1977) 和人口普查时的遗漏 (Rives, 1976) 等。

表3 美国10个族群劳动力状况和已出生孩子情况(1970年)

指标	墨西哥裔	古巴裔	夏威夷人	朝鲜裔	波多黎各裔	印第安人	非裔美裔	黑人	日本裔	华裔
男性劳动力参与率	77.4	83.7	77.9	75.5	75.5	63.4	79.0	69.8	79.3	73.2
35—44岁参与率	92.7	95.4	92.1	91.3	88.2	80.6	94.9	88.1	96.9	95.5
失业率	6.1	4.3	5.1	3.6	6.2	11.6	4.7	6.3	2.0	3.0
部分时间劳动者(%)	NA	NA	5.3	5.9	NA	6.4	12.7	12.2	6.5	5.3
全天劳动报酬收入者(%)	NA	NA	15.8	11.8	NA	10.9	5.5	12.3	4.6	2.6
不匹配率(%)	NA	NA	10.5	11.8	NA	7.3	10.9	6.2	19.0	18.4
1969年收入中位数	\$4735	\$5532	\$6485	\$6635	\$5105	\$3509	\$5019	\$4158	\$7574	\$5223
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36.4	51.0	48.5	41.5	31.6	35.3	55.2	47.5	49.4	49.5
35—44岁参与率	41.4	64.1	59.4	51.7	36.4	43.4	62.3	60.4	52.7	59.1
失业率	8.9	7.3	5.6	5.4	8.3	10.2	4.7	7.7	3.0	3.7
1969年收入中位数	\$1892	\$2825	\$2931	\$2741	\$2938	\$1697	\$3515	\$2041	\$3236	\$2686
自主经营者(%)	4.1	4.5	2.9	5.0	2.6	5.1	3.4	3.3	10.1	9.7
无收入家务劳动者(%)	0.4	0.3	0.3	0.4	0.2	0.5	0.2	0.2	1.0	1.5
35—44岁妇女生育子女总数(万人)	4530	2064	4181	2287	3503	4554	3300	3817	2301	3005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年人口普查主要报告》，出身西班牙的人，《最终报告》PC(2)；1G；在美国的日本人、华人、菲律宾人，《最终报告》PC(2)－1G；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最终报告》PC(2)－1E；美国印第安人，《最终报告》PC(2)－1F；黑人，《最终报告》PC(2)－1B，和1970年公众抽样调查资料。

NA = 无数据。

乐观主义的解释指出：男性劳动参与率的普遍下降，不一定要被当作一个危险的信号。男性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可以归因于那些福利制度的发展完善，如提前退休、教育延长，以及为残疾人提供帮助等(Siskind, 1975; U. S. President, 1973: 23)。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如此降低是起因于生活的富足，而且对于非白人来说，和白人一样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度降低，应该是社会平等和经济进步的象征。1975年，杜兰特(Durand)做了一项大型的全国性研究，以发展水平对劳动参与率进行了交叉分类。尽管从横向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分析中得出关于长时段纵向过程的结论可能会有问题，杜兰特仍下结论说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与经济发展是相关联的。假如非白人男性被视为经济上正在改善的群体的话，杜兰特的分析提出了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的极富乐观性的解释。至少在一些方面，乐观主义者的解释确实符合黑人男性的现状，特别是那些有关教育延长或残疾人福利等方面。遗憾的是，尚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同样说：非白人男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速度超过白人男性，是因为非白人经济改善的速度要超过白人。

悲观主义的解释则指出：高失业导致挫折感，而挫折感造成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争论的变种就是，男人虽退出“合法的”劳动力市场却可能从事秘密的或非法的活动。所以，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不仅困扰着社会科学家们，而且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

表4给出从1968到1975年间不同性别的黑人参与率。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度降低发生于失业率大量上升的年代。比如在1970到1971年期间当劳动参与率下降最严重时，失业率在上升。而1974到1975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伴随着后两年的失业增加。女性的参与率情况有所不同。尽管黑人女性的失业率远比黑人男性失业率要高，但黑人女性失业率的轻微降低引发的劳动力参与率的升高，比其男性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导致的参与率的升高还要大。总的来看，失业率是一个应与劳动力参与率放一块儿考虑的重要指标。因为失业率是劳动力参与率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栏和第六栏的经调整的失业率代表了年满16岁及其以上的成年人每百人的失业数。因为失业率并不表示劳动力参与的百分比，这种处理使黑人女性失业率有所降低。但是，经过调整仍显示出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并不能抵消失业率升高的趋势。

既然失业问题如此严重，所以发现了黑人因经济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较白人高一些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黑人与白人的这一比例与失业率关系并不很大。1973年，尽管男女就业都改善了并且劳动力参与率也升高了，而离开劳动力市场者的黑人与白人的比率仍在继续爬升。这些资料提醒人们，对悲观论者对劳动力参与率的解释也不能置之不理。

表 4 黑人分性别的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调整失业率*
以及因经济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黑人对白人的比率

	黑人男性			黑人女性			因经济原因离开 劳动力市场的黑人 对白人的比率 (7)
	劳动 参与率 (1)	失业 率 (2)	调整失 业率** (3)	劳动 参与率 (4)	失业 率 (5)	调整失 业率** (6)	
1968	77.6	5.6	4.4	49.3	8.3	4.1	1.2
1969	76.9	5.3	4.1	49.8	7.8	3.9	1.2
1970	76.5	7.3	5.6	49.5	9.3	4.6	1.3
1971	74.9	9.1	6.8	49.2	10.8	5.3	1.3
1972	73.7	8.9	6.6	48.7	11.3	5.5	1.2
1973	73.8	7.6	5.6	49.1	10.5	5.2	1.3
1974	73.3	9.1	6.7	49.1	10.7	5.3	1.4
1975	71.5	13.7	9.8	49.2	14.0	6.9	1.5

资料来源：1,2,4,5栏取自《1976年总统报告》，表A-3,A-7,A-13,A-18。

*西班牙裔1974年劳动力参与率为61.0,失业率为8.1%;1975年劳动力参与率为60.7,失业率为12.2%。

**指每100个16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的失业人数。

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的讨论强调哪怕对一个群体,如美国黑人的劳动参与率进行解释都会存在疑问,那么我们又怎样解释黑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在参与率上的差别呢?

下面几部分将对各少数族群经济活动做一些尝试性研究。在重新开始关于经济活动指标的讨论之前,做一点儿深入的理论探求会是必要的。

族群分层与少数族群人口研究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973: 457)使用过“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这一术语来指出资源的控制导致更进一步的资源控制这一人们熟悉的发现:即富人更富。这一章我采用了一个社会分层方法以进行少数民族群体的人口研究,从而在资源控制的条件意义上定义和分析少数族群,并从人口学的“富人更富裕,穷人孩子多”的俗语中前进一步。我们习惯于谈论富裕的个体,而不是富裕群体,可是在这里,我们分析的单位必须是群体。虽然这里不言自明的共识认为个人和群体都可以应用分层来分析,但人口学对于分层的分析通常强调的是离散的个人,而不是群体。一个有关族群社会分层的研究有助于对

少数族群下定义,还能为各个少数族群经济活动的比较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尽管这些思想仍是探索性的,它们毕竟提供了少数族群人口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基础,我们还会继续犯把少数族群的个体研究当作群体研究的错误。

任何地方如果存在一个分层体系,我们都期望它能够反映到人口统计的结果中。族群分层因其在揭示人口差异方面的作用,受到特别的关注。任何分层体系不管基于阶级、种姓,或者是基于族群,都表示了生活机遇的分布。生活机遇包括死亡率(mortality)和发病率(morbidity),穷人更易受疾病和早亡的威胁。生活机遇也包括人们共享的婚姻(nuptiality)和生育(fertility)模式。生活机遇是与劳动力的文化分异(cultural division)相联系的,因此关于经济活动(economic activity)的人口统计指标应当能够反映社会分层的状况。但是,族群分层体系也一样重视指标的差异。在城市社会中,族群分层体系必然使那些共享同一生活空间的族群享有不同的生活机遇。结果,人口差异可能被用于构造一个证明起始性社会分层合理性的思想。族群分层会产生人口统计结果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统计差异会影响以后的族群间的关系。这样的差异使那些统治族群更有理由认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①。

一个族群分层的目标在于为少数族群人口统计认定一个主题(subject matter)和研究方法。依据这一思路,少数族群是指高度内婚(endogamous)的人口群体,他们有独特的文化,宣称拥有共同的祖先,与那些生活在同一空间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相比,控制着很少的资源和收入的群体。相比较而言,统治群体控制着与他们创造的资源和收入不相称的大份额。这些定义提供了一个基础,用以理解富人何以变得更有钱,但是关于这些定义的更进一步的意义也十分有限。

首先,“少数族群”不仅仅是通过种族、出生地或一些其他变量交叉分析所得到的分类结果。这一定义要求我们考查美国的在人口统计中的多数族群的经济地位是否与人口统计中的少数族群的经济地位相似。例如,我们或许期望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与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有同样的相对人口特征,尽管南非人口统计中黑人是多数族群而美国印第安人不是。

其次,资源交换成了两族群人口间最重要的联系。资源控制越是不均衡,

^① 事实上,族群分层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族群间人口指标的差异,尽管族群内部的差异可能很大,统治族群的下等阶级成员生育率可能与少数族群同样高甚至更高。基于阶级的社会分层强调人们重视族群内各阶级不同的人口特征,而族群分层则强调人们重视各族群在人口特征方面的差异。当族群分层体系在社会中更为突出时,族群间人口统计方面的差异比阶级间的更加尖锐。

这种交换就变得越发重要。有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区,潜在的交换当然也就是多重性的,而且分析起来问题就更大。下述的多数分析就是依据资源交换展开的。

第一,统治群体内部可能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在关于美国的研究中,把所有白人都归入统治群体,理由可能并不很充分。但以收入或资源来界定统治族群,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白人。统治族群当然包括那些占有财富最多的人口。根据197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这1%的人口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14%,公司股票的大约50%,53%的债券和14%的现金(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6: 表694)。

这些定义并不排除个人的社会流动,因此少数民族成员是可能进入统治群体的。个体的社会流动也可以在少数民族阶级结构内部发生。但是社会分层的研究方法认为,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流动是那些整个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流动。例如,像华人1940年以来在美国所经历的那类社会流动。

族群分层方法避免了现在文献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研究对象群体选择的主观性和对人口统计特征的局部分析。首先,族群分层方法要求找到一个反映少数民族人口构成和少数民族与多数族群互动状况的一般原则。相比之下,那些主观确定的政策性研究,更多的关注于每一个新群体,因为这些新群体努力获得了足够的宣传效果和政治支持,并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专门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群体选择也要受人口普查规程(*census code*)有效性的影响,这些规程反映了政治的动向和对这一群体的公众注意力(Shryock et al., 1973, I: 252—263)。人口普查资料指标的运用能够产生有用且有趣的结果,并能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Kritz and Gurak, 1976)。不过,这不是系统的研究,因为对所研究的群体的认定具有偶然性。特别是,一个弱小而政治上不具魅力的群体,不管其在民族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危机,仍有可能会遭到忽视。强调资源的控制不仅可建立起界定少数民族的方法,而且可以建立起一种方法来界定那些(理论上)最有趣的少数民族。

其二,分层方法确定了一个研究程式(*agenda*):什么是社会地位在人口统计中的后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被刻上了不同专业的印痕。例如,劳动力人口学家考察劳动力参与模式、职业继承和流动(富人变得更富裕吗?)。生育专家检视不同的生育率水平及当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结构中上移时从追求子女数量到质量的转变(穷人的孩子更多吗?)。很难找到一个更为全面的处理方法^①。

^① 例如,伊斯特林(Easterlin, 1968)仅在一个高度聚类的水平上,找出了相关关系。

在有关不同生育率的文献中也有对这种一般化倾向的例外情况。这里有两种相对的假说：即少数群体地位理论 (minority status thesis) 和社会特征理论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sis) (Bean and Wood, 1974; 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1969; Ritchey, 1975)。这两个假说的不同处在于是把阶级还是族群作为分层的基础。社会特性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穷人孩子多”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族群不成比例地贫穷，同时他们的孩子较多。不妨推定，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将导致生育率降低。社会分层的隐含模式是，社会阶层由高到低排列，其中少数族群与白人立足点相同。少数群体地位假说认为少数族群成员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归属与其行为有关。例如，政治意识觉醒导致出生率升高 (Kennedy, 1973)，或者，向上流动的群体因其更看重生活质量，有意地降低生育率 (其他的假说将在后面提出)。这里隐含的模式是一种以群体为单位的分层。更进一步的分层方法可能在“社会特征”和“少数群体地位”研究之间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族群分层既是族群特征又是族群地位的缘由。这场讨论成了光是粒子还是波的翻版。

分层方法指出，除生育率外，社会地位在人口统计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其影响。研究这些影响可能产生更为成熟的少数族群人口学，而不是像目前那样把从不同的有关社会特征研究文献中抽出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把群体作为群体来研究可能导致有关不同生育率以及群体关系的更为丰富更为有效的理论。

分层方法当然不是少数族群人口研究的唯一方法。它的作用在于确定了一个研究程式：它提出什么群体应该研究，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由于所有分层体系都是与经济体系紧密相连的，因此经济活动研究应该是人口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虽然社会分层与其人口统计方面的后果并不像经济活动研究的结果那样明显，分层与人口统计的结果的研究正在日益成熟。这同时使得经济活动成为少数族群人口学家研究的关键，但是也易于导致同义反复的论证。

经济活动和少数族群人口研究

前一部分论证了少数族群可以根据其控制资源的程度，从最高到最低来排列。这一序列暗示了在经济活动和其他人口统计指标方面的差异。拥有大量资源的群体和几乎没有资源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同义反复 (tautological) 论证的危险在于资源控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以致人们用相同的指标给二者下定义就可能有这种危险。



上图简要表示两者的关系。分层方式(资源控制)影响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也同样对分层有影响。运用同一变量——如职业或收入——去测度二者是不妥当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那就是:定义资源控制为自变量,而确定经济活动指标为因变量。作为一个不特别有效的测度方法,男性收入的中位数被用作衡量 10 个文化各异的、内婚制的族群资源控制的指标^①。收入数据列在表 3 中。现在我转向资源控制的定义问题。

资源的类型

为操作方便,资源控制已经定义以收入的中位数 (median income) 为指标。类似地,资源类型也应能以收入的类型加以定义。劳动力是每个族群都拥有的重要资源,作为资源,它是可以通过教育、经验、训练和迁移加以改进提高的。劳动力是可以换取薪金的,薪金占全美个人收入的 63%—65%。长期积蓄可能转化为其他收入类型。比如占有房产能获得租金,拥有企业可得到利润,提供服务可以收费,提供资金作为各种投资可获得利息。一个族群可以通过积累大量同一类的收入(如高额工资)或把收入投入到各种获利的事业中来提高它的地位(资源控制权)^②。例如,群体第一代的工资存款可能在第二代就能买到小百货店,到第三代就能获得专业性工作的机会。

这里四种收入——工资、租金、利润和利息——的交换,皆可完全发生于族群内部。族群可作为零售商业和饭店的顾客范围,在这些饭店里专门提供祖籍国度的饭菜。历史上,黑人社区中专门的和私人性的服务都是由黑人自己提供的,贷款者和借款还息都可以在族群内部进行 (Light, 1972: 19—44; Lyman, 1974: 120)。一些人担任群体内其他成员的雇主或地主是很平常的,例如,二战以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原则上族群的地位依赖于他们和其他族群交换资源的数量和类型。由于经济增长,资源控制不必遵守一种一方得益必然使另一方受损的规律 (a

① 10 个族群中男女收入中位数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是 0.60。

② 我没包括因一些人从政治团体中获得报酬而发生收入转移的例子。当然,政治权力是值得注意的几种非货币资源之一。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zero-sum game)。供求规律与质量或物质的守恒定律是不宜加以类比的。理论上,每个群体资源的增加并不一定减少其他群体的资源。但在实际上,“马太效应”在起作用。资源控制趋于集中,而资源的缺乏则趋于扩散。经济的集中化就是统治族群资源控制增加的一个例子。集中化(ghettoization)的特征就是,当仅有某种形式的收入流入某个族群的同时,其他类型的收入则以等额或更大的流量进入别的群体中。租佃耕作(sharecropping)即为实际例子。佃农(sharecropper)以劳动力换取收入(或份额),却要为充抵粮食的贷款利息付钱,给出收获的一部分作为谷物贮备,而且还要付租金给地主。集中化通常表现为利息、利润和租金进入统治群体的腰包,而少数族群只获得工资。

资源倾向于集中在统治群体,是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未必是唯一的模式。资源控制的模式确实在改变,并且随着模式的改变,族群分层体系可能变得流动性更大。当群体获得更多资源时,流入统治群体的部分资源将停止或趋于减少。就业机会、雇佣关系、投资行为和经营利润都可以在群体内产生,这是分离主义者的观点。当向另一个极端情况发展时,会出现比较均等的资源控制,收入流向可能逆转过来或者变为互惠的模式。少数族群可能开始给那些先前的统治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投资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

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一个导向指标,不过如果收入是平等的,对收入互惠流动的考查有助于确定少数族群与统治群体之间存在的“距离”^①。另一方面,假如收入是不平等的,收入的互惠流动越少,少数族群控制的资源就越少。特别是当假如少数族群从统治群体得到的只是工资,失业的可能性就决定了它控制资源的权力有多大。

资源控制的这一概括有助于我们理解分层的产生以及变化趋势。它也便于人们既能理解一个社会中有两个群体的情形又能理解多群体的情形。另外,我还将做三点讨论。

第一,并非只有群体内部发展工业和勤俭节约能使存款变为企业产权及其他收入资源。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往往也由少数族群提供并以少数族群为顾客。少数族群越多,越可能使处境最差的群体成为其他少数族群(被称为中间群体)的赚钱对象(Bonacich, 1973; Loewen, 1971)。少数族群也可能向统治族群提供一些低级的服务以获取工资或利润。例如,家务服务是由黑人和墨西哥人为挣工资而提供的,而在许多地区洗衣服务由私营的华人提供。在欧洲,借贷是

^① 有关互惠流动的统计资料很难找到。通常能够得到一些有关黑人的资料。奥克奈尔(O'Connell, 1976)的文章涉及黑人拥有的小部分商业活动所得。

犹太人的行业。一个中间群体可能付租金给统治群体,同时也可以从统治群体和其他少数族群两个方面接受利润。一定程度上,这些商品和服务被统治群体认为是不名誉(肮脏和卑贱的),作为顾客也是有失身份的,因此对少数族群成员来说,除了作工薪劳动者外,这里就有了一个有利可图并成为一种资源的“生态位置”(ecological niche)。

第二,资源控制状况随群体控制资源的种类而变化,而不仅仅是资源数量的问题。提供商品和服务以获取利润或利息显然要优于仅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工人不得不依赖于一个雇主,而同时有利润、利息或租金收入的人却可能是许多人的委托者。这样,企业家能够保护自己,而工薪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难以做到这一点。

第三,资源能够增值变成更多的资源,而资源控制的缺少只能产生更进一步的缺乏。一个只能从统治群体中得到工资的群体,只能给统治群体提供更多的劳动者,而统治群体是可以拒绝雇佣他们的。

资源交换可以认为是族群分层的动态层面。这一方法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少数族群间经济活动的差异呢?全面分析所需的资料虽然是难以获得的,但仅是这种分析即会胜过仅考虑劳动力参与率的方法。

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再检视

经济活动的指标也可以当作资源的指标。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或许期望拥有最少资源控制权的群体应该有最高的失业率。这可能显示工资是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他们并不像其他群体那样保持稳定的就业水平(其原因可能是有关资源的缺乏,如人力资本的缺乏,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一个仅仅依赖劳动力的群体也可能有高的劳动力参与率,但它只能向市场输出更多的劳动者,扩散它资源控制的缺乏。然而,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是负相关的(Spearman rank-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对于男性是-0.56,对女性是-0.43)。因此,假如我们考查的是失业率高的那些群体,其中景况最糟的群体劳动力参与率将最低,而那些景况较好的群体劳动力参与率将会较高^①。就男性来讲,这就把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归入最低的群体,波多黎各裔、墨西哥裔和菲律宾裔被归入次低群体。

^① 失业率是劳动力参与率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可能存在的原因是高失业率迫使一部分劳动者离开劳动力市场,结果使劳动力参与率降低。

其余的群体失业率要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工薪劳动者,其劳动参与率应当高一些,但我们估计他们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他们另外的参与方式,如较高比例的私营者和不取报酬的家务劳动者,这些指标已在表3中给出,而且表5显示了各个族群的企业主状况。第一栏(表5)标出的是那些在1965年到1970年间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成为企业主的劳动者——即私营劳动者,其1969年的报告收入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商业、事务所或农场,或者是不取报酬的家务劳动。第二栏由那些1965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在1970年改换职业成为企业主的人组成。第三栏的组成是那些在1965和1970年都是企业主的人。第四栏是指1965年的私营劳动者但在1970年改为其他地位的劳动者。表中的大多数数据因其数字太小并不可依赖,但在一些数字较大的群体中,如华人和日本人,其最有可能成为企业主是明确无误的。黑人成为企业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并且他们的企业主地位与日裔、华裔比起来也要不稳定得多。从这些数据我们会看到,日裔、华裔、朝鲜裔和古巴裔在资源方面的地位要高一些。

表5 8个族群1970年企业主状况

	现在的企业主			前企业主	企业主总数	劳动力总数(%)
	1970年进入者	1970年改变者	1965—1970年企业主			
黑人	46 (17.3)	44 (16.5)	89 (33.5)	87 (32.7)	266 (100.0)	4343 (6.1)
美国印第安人	1	1	2	1	4	110 (3.6)
日本裔	4 (12.5)	5 (15.6)	22 (68.8)	1	32 (100.0)	153 (20.9)
华裔	2 (18.2)	4 (63.6)	14	2	22 (100.0)	144 (19.3)
菲律宾裔	1	1	3	3	7	110 (6.4)
夏威夷人	0	0	0	0	0	19 (0.0)
朝鲜裔	0	0	0	1	1	17 (5.9)
其他	1	2	0	3	6	52 (11.5)

资料来源:1970年公众抽样调查

* 表中的数字以1000为单位,括号内为百分数。

这些分类结果可以从表 3 的一些其他统计数字中找到印证。教育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精英群体的“额外”资源，尽管它或许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高一级的职业。也就是说，教育可能是使雇佣关系控制权受到限制的一类资源。这可由称作“不匹配率”(mismatch)的指标加以测定，其所指为在群体中从事全天工作并在一个具体的工作职业里教育水平明显较其他人为高的劳动者所占的百分比^①。我们期望的是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有最低的不匹配率，日裔和华裔最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表 3 中两个另外的变量与失业也有确定的正相关关系，因它们代表了就业控制权的缺乏程度，而不表示像不匹配值所指的那些附加性资源。这两个变量是部分时间劳动者的百分比和全天工作但收入在贫困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百分比。这些指标肯定是交互正相关并分别与失业状况正相关的。低收入与劳动力参与之间有着强度的负相关。这从另一角度肯定了以上的分类。这些结果引导我们进入表 6 的分析。通过对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和劳动者阶层作为资源控制指标的操作，我们得出了用收入比单独运用劳动力参与率确立族群分层体系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表 6 收入、劳动力参与率确立分层体系的比较以及依据资源指标的分类结果

独立性排序 (按 1969 年男性收入中位数)	仅用劳动力 参与率的分层	按资源控制指标排序
日裔	79.3	高层群体：日裔、华裔、朝鲜裔、古巴裔
夏威夷人	77.9	
朝鲜裔	75.5	
古巴裔	83.7	中层群体：波多黎各裔、墨西哥裔、菲律宾裔
华裔	73.2	
菲律宾裔	75.5	
波多黎各裔	79.0	
墨西哥裔	77.4	低层群体：黑人、美国印第安人
黑人	69.8	
美国印第安人	63.4	

* 夏威夷人没有明显落在按资源指标分类的序列中

① 这一指标在 Sullivan 于 1978 年所做的研究中有详细解释。

讨 论

表 6 使我们看到由收入中位数确定的“客观”的族群分层和基于资源控制的经济活动状态的分层结果之间高度一致。在一定水平上,这可以因为仅仅表示一些劳动力的参数而遭到非议。确定如此,但分层方法的优点在于使人明白这些变量是如何关联起来的。例如,不是仅仅迷惑于黑人参与率降低是好的还是坏的预示,而是把黑人的参与活动放在和其他指标的联系中,或放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叉关系中加以考虑,许多隐含的推论都可以从这一分析方法中获得。例如,不仅仅从文化背景或先天素质来解释美国亚裔人口企业主状况,他们的“生态区位”是可以预知的。同样,人们也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大多数黑人企业主仍旧是为黑人服务的,而不是向其他群体出售商品或服务。(实际情况是:1972年,黑人拥有的企业所有权 35% 以上是在服务行业中,只有 1.7% 在制造业中,9.8% 在建筑业中,0.8% 在批发业中。)

进一步讲,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了解释参与率未来变化的方法。对日裔、朝鲜裔劳动力参与率降低既不应奇怪也不必惊慌。具有较高水平企业主状况的较富裕民族群体表现出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合理的。另一方面,黑人、美国印第安人男性参与率的进一步降低,特别是假定他们失业仍旧升高的情况下,则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进一步的观点

前面关于族群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说的相对较少。表 7 给出了男女两性劳动力参与和失业指标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包括与年龄在 35—44 岁的妇女曾经生育子女数目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相同变量的指标中,男女两性客观上存在着强度正相关。男性的失业状况与女性的参与率和收入有负的相关关系,并且女性的失业状况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也有负的相关关系。这些等级相关系数指出,民族群体的等级水平不论性别是男是女都是大致相似的。

表 7 1970 年 10 个群体的男女两性劳动力指标以及 35—44 岁
妇女已生子女数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女性劳动 参与率	35—44 岁女性 劳动参与率	女性 失业率	女性收入 中位数	妇女已生 子女数
男性劳动参与率	0.60 [*]	0.43	-0.44	0.69 [*]	0.53 [*]
35—44 岁参与率	0.73	0.36	-0.76 ^{**}	0.48	-0.60 [*]
失业人数	-0.62 [*]	-0.27	0.89 ^{**}	-0.48	0.79 ^{**}
失业率(%)	0.31	0.36	-0.37	0.18	NA
低收入比率(%)	0.02	0.26	-0.13	-0.07	NA
不匹配率(%)	0.41	0.14	-0.82 ^{**}	0.30	NA
收入中位数	0.37	0.17	-0.71 [*]	0.60 [*]	-0.64 [*]
已生子女数	-0.56 [*]	-0.42	0.67 [*]	-0.49	—

资料来源:见表 4。

* $P < 0.05$

** $P < 0.01$

社会分层方法暗含着其他除经济活动状况以外的人口特征后果。大多数劳动力指标与已生子女数的强度负相关,以及失业状况与已生子女数的强度正相关,证明了“穷人孩子多”的说法。同样有趣的是男性收入中位数与 35—44 岁妇女已生子女数之间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69)。向上流动的群体对孩子数的限制可以认为是渴望同化或自我意识的结果。但是它也反映出艰苦创业取得资源后对其集中控制的渴望,而不希望在家族中加以分散。向上流动的群体是指那些能积累财富的群体。而另一方面,在一个只有劳动力资源的群体中,任何家庭没有限制生育(潜在劳动力)的愿望,甚至在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每个孩子都可能被看做获得就业机会的彩票。这种分析可能过于理性化,但与那些形式精美而结构混乱的假说比较起来,这倒更值得讨论。

最后,这些数据表明了不同的少数族群或多或少地、自觉遵从着不同的资源控制策略。在一个大的范围内讲,这些策略的实施绝不是自愿的。民族分层体系迫使他们要做出可能范围内的选择。日裔和华裔倾向于成为小型商业和企业所有者,至少在目前这一代是这样的;未来一代或许更多地集中于专业化的行业。黑人已倾向于作雇员,且政府现行政策在刺激黑人发展资本主义的令人失望的尝试后,似乎又重新强调公平就业。“肯定行动”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强调的是就业,而且政府也要求那些有百名以上职工的公司做出“肯定行动”报告。从有较大职业保障来看,这些都是较大的公司。表 8 显示了少数民族群体被这些公司雇佣的变化进展。当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以就业作为

资源控制的策略,稳定的职业保障看起来就不得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重要目标了。

表 8 1966 年以及 1969—1974 年百名职员以上公司中少数族群就业状况^{*}

年代	黑人	西班牙语裔	亚裔	印第安人
1966 年总数	8.2	2.5	0.5	0.2
白人公司	2.5	1.2	0.7	0.1
黑人公司	10.8	3.4	0.3	0.3
1969 年总数	9.5	3.2	0.6	0.3
白人公司	4.1	1.7	0.8	0.2
黑人公司	12.6	4.4	0.4	0.4
1970 年总数	10.3	3.6	0.6	0.3
白人公司	4.8	1.9	0.8	0.2
黑人公司	13.2	4.9	0.3	0.4
1971 年总数	9.5	3.5	0.6	0.3
白人公司	4.6	2.0	0.8	0.2
黑人公司	12.7	4.9	0.3	0.4
1972 年总数	10.2	3.8	0.7	0.3
白人公司	5.2	2.1	1.0	0.2
黑人公司	13.3	5.3	0.3	0.4
1973 年总数	10.8	4.1	0.8	0.4
白人公司	5.6	2.3	1.1	0.3
黑人公司	13.9	5.7	0.4	0.5
1974 年总数	11.0	4.3	0.8	0.4
白人公司	5.9	2.4	1.1	0.3
黑人公司	14.1	5.8	0.4	0.4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报告》(1976),表 6-10;《总统人权报告》(1973),表 6-7;(1974),表 6-10。

* 表中数据为全体职工的百分比。

结 论

如果单独采用劳动力参与率这一指标来进行分析,甚至对单一群体的解释都是困难的,更不必说对数个群体进行解释了。通过建立一个概念性的研究框架,用获得资源方式和资源产生的收入的类型来定义少数族群,劳动力参与率就成了一整套用以描述族群分层体系及其变化趋势的变量系列的组成部分。

失业率作为参与率的组成要素成了一个重要指标以及测定企业家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的途径。

族群社会分层方法有助于界定少数族群,以及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主要问题,并且区分出少数族群中兴旺的“生态区位”。经济活动方式随着在分层体系结构中的地位而变化,正像其随生育行为的测定结果而变化一样。其他人口统计结果也是可以想见的。

参 考 文 献

Bean, Frank D., and Charles H. Wood, 1974, "Ethnic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Fertility." *Demography* 11(November): 629—640.

Bonacich, Edna, 1973,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October): 583—594.

Bowen, William G., and T. Aldrich Finegan, 1969, *The Economic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rand, John, 1975, *The Labor For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in, Richard A., 1968,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

Farley, Reynolds, 1977, "Trends in Racial Inequalities: Have the Gains in the 1960s Disappeared in the 197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2)(April): 189—208.

Freeman, Richard B., 1976,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oldscheider, Calvin, and Peter R. Uhlenberg, 1969, "Minority Status and Fert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January): 361—372.

Kennedy, Robert E., Jr. 1973,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The Iris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February): 85—96.

King, A. G., and R. White, 1976 "Demographic Influences on labor Force Rates of Black Males." *Monthly Labor Review* 99(November): 42—43.

Kritz, Mary M., and Douglas Gurak, 1976, "Ethnicity and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1970 Public Use Sample Data." *Review of Public Data Use* 4(May): 12—23.

Levitin, Sar A., William B. Johnston, and Robert B. Taggart, 1975, *Still a Dream: The Changing Status of Blacks since 19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ght, Ivan H., 1972,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ewen, James W., 1971,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g, Clarence, 1958, *The Labor Force under Changing Income and Employmen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yman, Stanford M. 1974,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Merton, Robert K.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Norman W. Storer, (ed.).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Connell, John H. Jr. 1976, "Black capitalism."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7 (Fall): 67—84.

Ritchey, P. Neil, 1975, "The Effects of Minority Group Status on Fertility: A Re-examination of Concepts." *Population Studies* 29 (July): 249—257.

Rives, Norfleet, 1976, "Effects of Census Errors on Labor Force Estimates." *Industrial Relations* 15 (May): 252—256.

Roberts, Robert E., and Eun Sul Lee, 1974,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September): 503—523.

Shryock, Henry S., and Jacob S. Siegel and Associates., 1973,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Demography*.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skind, Frederic B., 1975,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en, 25—54, by Race." *Monthly Labor Review* 98 (July): 40—42.

Sullivan, Teresa A., 1978, *Marginal Workers, Marginal Jobs*.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weet, James A., 1973,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6,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 97th ed.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President, 1973, *Manpower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President, 1974, *Manpower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President, 1976,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President, 1977,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傅喜国 译, 张永校)

美国华人：一百年来的职业变迁

H. 金 (Haitung King)

F. B. 洛克 (France B. Locke)

本文根据历史派生物假设 (the hypothesis of historic natification)，考察过去一百年中在美华人职业模式的变化。这一假设认为，自很早以来连续制定的反对华人的法律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约束，在塑造这一少数族群的职业结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的内容包括：历史背景，过去和现在的职业适应，出生国比较，华人的创业精神，唐人街亚经济以及有工作经历的华人的健康状况。作为宏观的考察，本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只限于作出一般性的推断，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展详尽的实地研究。

在 1850—1880 年边疆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数以千计的华人以契约制度的方式来到美国，他们充当矿工、筑路工、垦荒工人和农业工人，遍布美国西部。尽管华人最初受到欢迎，其后因为劳动力短缺的缘故依然能够被接受，然而某种针对他们的敌对情绪还是产生了。起初这种情绪是加利福尼亚的劳工与政党政治之间互动的结果，由于那时加利福尼亚混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进一步复杂化了^①，其结果是反华运动发展成了骚乱、肉体上的迫害、精神上的胁迫的形式，最终表现为州和国家两个层次所通过的控制华人移民的“阶

• 本文原载于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杂志 1980 年第 14 卷第 1 期，第 15—42 页。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纽约迁移研究中心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Inc.) 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据 Thomas 和 Znaniecki 的有关态度和价值观的理论，劳工与政治的互动结果可视为主观因素，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则是客观因素。

级”(class)和“种族”(race)立法。阶级方面的立法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名目繁多的税收及对政治、经济乃至教育权利的剥夺;而种族方面的立法则以一系列限制性、排外性法规为特征(参见1882、1892、1902年的排华法案)。其结果是华人劳工被拒绝进入美国,已在美国的华人居民则失去了公民资格。根据1924年的有关移民的“出生国配额法”(National Origins Quota Act)的条文,甚至美国公民的华裔妻子也在受排除之列。这些关于移民年龄、性别、出生国分布的种种法规所造成的影响,自然给华人群体的职业结构带来了许多不利后果。

对华人的禁令一直持续到1943年,该年度有100个名额分配给希望进入美国的华人。出生国配额制最终为1965年法案(1965 Act)取代,后者是依照两大半球而规定年度配额,结果使得被许可进入美国的华人的数量猛增,自1965年起年均约18 000人。一切正在意料之中,近期的华人大批进入,造成了这一少数群体的职业结构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显著变化。

本文将在上文述及的立法及社会经济限制等这样的历史脉络大背景中,考察华人在过去一百年中的职业模式变迁情况。其内容包括:历史背景、过去和现在的职业适应^①、出生国比较、华人的创业精神、唐人街亚经济以及有工作经历的华人的健康状况^②。作为宏观的考察,本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限于作出一般性推断。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作详尽的实地研究。

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出版物,文献中的其他结果则作为辅助资料。考虑到不同时期华人所有的个体服务业(personal services)和(或)贸易类行业(trade industry)的实际数量,以及华人的合营(multi-partnerships)的传统做法(如合伙人兼有经理和服务人员两个角色),对变迁趋势的考察是依“行业”(industry)类型及有关职业的统计而进行的,同时应当注意到,按性别划分的行业的近期统计资料不是难以取得(1960年)就是不充分(1970年)。由于从业的华人妇女数量相当有限(移民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因此,将两性作综合分析时精确性不足的问题并不严重。

行业和职业的变迁是以其在各个时期的比例分布及百分比变化来表示的。尽管这些指标比其他测量方式更好,但在这种计算是基于很小的频次分布和(或)很小的绝对数的情况下,解释时必须谨慎小心。工人总数都在文内表格中列出,分布比例正是由这些数字计算而来。

^① 这里的“适应”(accommodation)与“适应—同化”(accommodation-assimilation)、理想类型(Park, 1950)中的“适应—同化”并非同义;

^② 将最后三个方面包括在内,原因是大批华人在贸易业和服务业中工作,这是早期反华政策的结果;其中某些职业对身体健康有不利影响。

为了便于讨论,“idai”和“erdai”两词(“一代”与“二代”的谐音)分别指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出生的华人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King 1973, 1975)。“sandai”一词将在对第二代、第三代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两者作特定的比较时使用。

职业的适应(Occupation Accommodation)总体趋势考察

华人第一次大规模涌入美国是在1849年的淘金潮时代,几乎所有这些早期移民都在采矿业工作。随着对华人怨恨的增长,相当一部分移民开始转而另寻就业门路,结果使得华人不得不将自己的经济活动限制在非竞争性的、不甚热门的领域,如“个体服务业”(personal services)及“批发零售业”(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他们开始向那些远离太平洋沿岸(Pacific Coast)的更富于宽容性和都市化的地区扩散。华人人口的这一都市化过程随时间流逝速度加快了。

除其他几种资料上的缺陷外,由于缺乏过去几年的可比较的统计资料,以及“行业”和“职业”群体人口普查统计所用分类标准不一致,使我们无法对变迁趋势作详尽的考察。然而分析表1(表1被重构了,以使行业间可做不严格的比较)中的概括性资料时便可发现,可将过去一百年中的变迁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大致起于1870年的初始适应时期(the period of initial accommodation)(再往前的人口普查资料无从查找);以及1930年以来的新适应时期(the period of new accommodation)。在第一个时期,大量的华人集中于矿工职业,随后华人中从事农业和贸易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从事个体服务业者则占了支配性多数。如表1所示,这一时期华人矿工数量锐减,几乎降到零个百分点,与之相比,47%的人集中于个体服务业,其中有50%是洗衣工人;至于从事贸易工人者,则其比例引人注目地从2%上升到30%,其中有一半在餐饮业工作。所以,洗衣工人、餐馆工人成了华人的职业形象。

随着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华人入美限制的缓和,从1930年开始,华人移民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如,1970年从事个体服务业的华人下降到了7%,虽然已是相当低的比例,然而与更低的相应的白人从事这类职业的比例(2.3%)相比,情况并不令人悲观(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a;文中及表中有关白人的数据均是作者自己计算出的)。此外,该年度属于此类的白人工人较十年前减少了47%,华人则只减少了35%。

表1 以主要行业划分的在业美国华人男性及女性的百分比分布,1870—1970*

行业	1870	1900	1920	1930	1960	1970	百分比变化		
							1870—1930	1930—1970	1970—1970
总数	46,274	105,480 ^b	45,614	47,106	98,784	185,031			
个体服务业	4b.9 ^a	51.2	58.0	47.0	10.9	7.1	+14.9		-84.9
洗衣业	7.9	24.6	27.5	24.0	—	—	+203.8		—
采矿业	36.9	3.1	0.3	<0.5	0.1	0.2	-99.9	+240.9	—
制造业	8.2	10.1	9.3	7.6	14.0	17.3	-7.3	+127.6	—
农业、渔业、林业	8.0	23.7	11.1	7.4	1.2	0.9	-7.5	-87.8	—
运输业、通讯业	3.6	1.2	1.8	2.2	3.5	4.2	-38.9	+90.9	—
批发零售业	1.7	10.0	16.4	30.8	38.1	34.6	+1711.8	+12.3	—
餐饮业	0.4	0.9	10.1	13.7	—	—	+3325.0	—	—
专业服务业	0.7	0.7	0.9	2.2	13.2	21.2	+214.3	+863.6	—
公共行政事业	<0.5	—	0.4	0.2	6.9	6.3	—	+3050.6	—
金融、保险、房地产	—	—	—	—	3.7	5.2	—	—	—
建筑业	—	—	—	—	1.9	2.3	—	—	—
其他及未分类者	—	—	1.8	2.6	6.5	0.7	—	—	—

资料来源:U.S. Census Office, 1872, 表29; U.S. Bureau of Census, 1904, 表3; 1933, 表6; 1963, 表40; 1973b, 表22。

注:“10岁和10岁以上,1870—1930; 14岁和14岁以上,1960,1970; 矿区中的服务业;

*这个数字与1900年人口普查(U.S. Bureau of Census, 1901, Vol. II, 人口, 第二部分, 表4)报告中的华人总数(89836)有偏差, 应注意。

更为显著的是,华人中的专业人员增长比例可观,1970年占华人总数21%,较白人高出4%,后者1960—1970年期间也有微小的增长(50%增到60%)。另一个已然发生的令人振奋的趋势是,1960年以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类华人职工增长显著,其次是“制造业”及“通讯和其他公用事业”类职工的增长。所有这几类的上升幅度均远高于美国白人的相应比例(金融:40.5%对16.6%;制造业:23.6%对-7.1%)。

同前一时期一样,从事贸易的职工在1930年后继续增加,但速度大大下降了,1960年比例高达38%,随后经过连续十年的下降后降为34.6%,白人的相应比例是:1970年为21%,比1960年增加了10%,相反,华人比例相对下降了9%。

表2显示了一个同时并存的趋势,它是以“职业”群体分类的,无论“职业”和“行业”在人口普查中的分类标准如何各自不同,存在于两个群体中的变化却可以看出极为相似的特征,例如,在所有男性中,专业人员所占数量在1940年至1970年增长显著,而其他职业群体则下降很多,最明显的情况是服务业。可以认为,1960年到1970年期间男性华人经理的明显下降(这与全国的趋势相反),其原因在于从事洗衣这种传统职业的华人减少了。

女性的情况:服务业人员下降了49%,相形之下,华人女性专业人员比例却令人瞠目地上升了154%。但是,若考察范围是从1940—1970年期间的变化来分析1970年的频次分布情况,则华人女性专业人员的情形不如相应的华人男性的比例令人满意。

在看到了1930年以来令人振奋的总体变迁趋势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对那些不甚显著的趋势的考察。例如华人男性专业人员内部之不对称的业群体分布(表3)^①。高达25%的专业人员进入工程专业,这门学科(它同物理、数学组成了大学中最主要的三门科目)构成了第二大专业人员群体,其次是物理学家、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等,以及“生命与生理学”。图1(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 表22,40; 1963b, 表18,22; 1973d, 表199,266)是华人知识分子就业机会有限的又一证据,它提供了1960—1970年间男性华人专业人员百分比变化情况,可与完成了四年或更长的大学教育的华人男性之情况作比较。很显然,1970年与1960年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成为专业人员的机会更少了。就全体美国男性来说,1970年的教育—职业偏离却不是这样突出。

^① 日本裔和华裔之间的可比较的职业分布情况参见附表。

表2 以职业群体、性别、出生国家划分的14岁以上(含14岁)的在业美国华人的频次分布(1940, 1960, 1970)

职业	1940			1960			1970		
	总数	Er dai	Idai	总数	Er dai	Idai	总数	Er dai	Idai
男性									
总数	34 081	11 039	23 042	71 435	28 732	42 703	115 396	52 787	62 609
专业人员	2.4	3.0	1.9	18.4	21.2	16.5	28.7	26.5	30.6
其他白领 ^a	31.3	32.4	30.8	29.1	31.7	27.4	25.3	29.3	22.0
经理等	21.3	20.8	21.5	15.5	13.1	17.1	11.3	11.2	11.4
服务业 ^b	36.6	36.9	36.4	23.6	9.4	33.1	24.1	16.6	30.4
其他蓝领 ^c	25.0	23.2	26.0	21.2	24.8	18.7	21.2	26.7	16.5
工匠	1.3	2.2	0.9	6.8	11.9	3.5	7.3	10.7	4.3
农场 ^d	4.1	3.4	4.4	1.2	1.3	1.1	0.7	1.0	0.5
不明职业	0.6	1.1	0.5	6.6	11.7	3.2	—	—	—
女性									
总数	2 911	1 894	1 017	27 349	15 060	12 289	69 635	33 575	36 060
专业人员	7.6	7.5	7.3	16.8	17.6	15.7	19.3	20.0	18.6
其他白领 ^a	34.5	39.0	26.0	43.6	55.8	28.6	40.7	54.4	27.9
经理等	8.7	6.9	12.0	5.4	5.2	5.7	3.8	3.8	3.8
服务业 ^b	29.2	32.2	23.6	10.2	9.1	11.6	14.9	14.4	15.5
其他蓝领 ^c	27.0	19.5	40.8	22.5	9.1	38.8	24.5	10.5	37.5
工匠	0.3	0.4	0.2	0.8	0.8	0.8	0.8	1.2	1.2
农场 ^d	0.8	0.7	0.1	0.7	0.3	1.1	0.6	0.6	0.5
不明职业	0.9	1.1	2.1	6.3	8.0	4.2	—	—	—

资料来源: U.S. Bureau of Census, 1943, 表 8; 1967 表 40, 1973b, 表 22; 1973c, 表 13。

注释: ^a除农场主以外的经理、官员和业主; ^b办事员与售货员; ^c私人劳务和其他服务业工人。

^d技工、领班、机械工人和类似工人(不含农场工人)。

^e农场主与经理人员、农场工人与工头。

^aEr dai 的人口数 - 华人总数 - Idai, 华人总数来自两份人口普查特别报告 (U.S. Bureau of Census), 这些数字与 1973c 报告中的数字有差异, 因为后者系指“父母均为美籍或一方非美籍的在美出生者”(不包括父母均为美籍的在美出生者)。在美国以外出生者或父母双方(或一方)非美籍的在美出生者, 在人口统计中列为“外国血统”, 在做出生国作比较时对这一情况应认真考虑。

表 3 16岁(含16岁)以上有工作经历的男性华人及白人的分布(百分比):以特定的类别为标准。(美国,1970)

职业	华 人	白 人
所有职业	100.0	100.0
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等	30.0	25.7
工程师	11.6	100.0
教师、教育的教育		
工程学		
物理学		
数学		
化学		
内科医生、牙医等		
生命与生物科学等		
经理、管理人员、农场主		
餐馆、快餐店、酒吧老板		
受雇的经理及管理人员(n.e.c)		
自营的经理与管理人员(n.e.c)		
零售		
食品		
工匠及相关人员		
技工(不含运输)		
洗衣工、干洗工(n.e.c)		
屠宰工		
服务工人(不含私人事务)		
食品		
厨师		
侍者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Census, 1973a, 表 2

注释:所有职业和大群体及亚群体为100;售货员及办事员未列出。

n.e.c,指其他地方无此种分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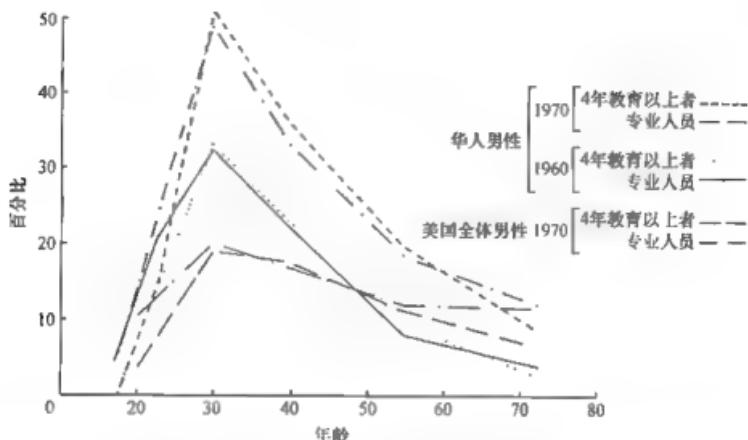


图1 专业人员和完成4年大学教育以上者的百分比分布
分类标准:年龄、华人及美国全体男性(1960,1970)

个体服务业人员的分布也表现出在相当有限的几个群体中高度集中的特征。如此类人员中 83% 的男性华人是从事饮食业,这些人中 51% 是厨师,28% 是侍者;相应的男性白人数字分别是 24%, 33%, 12%。在男性技工中,华人的形象亦不如白人。高达 20% 的华人是洗衣工,另有 16% 是屠宰场工人,白人的相应比例分别 0.8% 和 3.1%。

如果强调的重点不同,便会注意到在某些职业中华人数量相当之少。拿工薪(而非自己开企业的)的华人经理人员和管理人员(salaried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极少,白人中此类人员占 60%,华人大大少于这个比例。此外,自营的华人有 54% 是零售商,其中 80% 是食品商,白人的相应比例为 45% 和 23%。另一个明显反映出华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均衡的属类是技工(craftsman),其比例为 1:3。

对研究结果的解释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猜测,长期直接针对华人的限制性的法律及社会经济条件在华人职业结构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自最初移民美国时起,华人在这种或那种行业中人数的急剧起落,实际上只是对于强加给他们的各种

限制的一种调适与再调适。更重要的是,由此而生的各种后果趋向于形成一个循环的模式,即是说一种后果将导致另一种后果。例如,华人技工的低比例可以追溯到美国劳工早期的排华运动及他们阻止华人升迁的行为。里(Li, 1978)将多位学者的假说(Duncan, 1968; Lyman, 1971; Nam, 1959)做了演绎性综合,按他提出的假设,华人专业人员的缓慢增长可以作相同的解释,即这一现象是男性比例过高以及在美出生华人比例相对较少(迄今依然如此)的连锁反应的结果,而这两者又主要地根源于早期限制性政策,包括禁止通婚。同样,华人专业人员集中于有限的技术领域和拿工薪华人经理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过低,似乎都反映了过去长期以来的歧视的结果。

而从有利的角度看,华人知识分子集中于有限的领域又可以视作这个少数族群的一种新的职业适应形式。这与下述情形是一致的。在1970年,美国北部中央地区和南部的男性华人户主有很大比例的人为专业和技术人员(全美:31.3;北部中央地区:50.6;南部:46.0;东北部:23.6;西部:27.6, Bureau of Census, 1973b, 表23),其原因是,在东北部和西部,与同等学历的人相比,华人的地位相对不利。南部存在的经理及业主居于支配地位,以及近年来华人经营的餐馆业发展较快,均可视作同样的情形。而华人洗农业的衰败则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适应,它是对在这一领域发生的技术变迁及对手工洗衣需求接近消失的反应。

除上述影响华人职业模式的历史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补充因素也应予考虑。如华人最初集中在贸易及个体服务业是由那些具有社会经济便利性的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小本买卖对资本的要求不多,也无须付给雇员很多工资;缺乏营销技巧;语言不便;与所有权相联系的声望地位可使华人在自己的家乡受人尊重(Lee, 1949a)。而华人连绵不断地从事这一行业,其中部分的原因可归为亲属的帮助,近来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题研究(Li, 1978)。近年来华人专业人员的引人注目的增长,有许多因素在其中发生了重要作用,如对非白人的歧视的减少;二战后较好的就业机会也向华人开放;在美出生的华人的比例上升;1949年中国体制的变革,使许多已完成较高教育的学生滞留美国;特别是对包括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在内的入境控制的放松。这最后一项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过去十年中存在于华人知识分子中的不断增长的教育—职业偏离(这一偏离在前文已述及);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时间入境的华人包括了很大数量的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他们多来自香港,关于这一情况在某些职业中对出生国分布的影响,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出生国比较

对于华人在经济活动中不同出生国这一因素的影响，有人根据 1960 年的资料作了分析 (Yuan, 1969)，他认为这是在美国出生和美国以外出生的华人之间所存在的教育水平不同的反映。他的文章评论了下述情况，即认为文盲和初等文化水平适于从事洗衣业，中学文化水平适于餐饮业，而大学文化水平则胜任专业性工作。然而，当我们依据“idai”(一代)和“erdai”(二代)的年龄差异对资料予以修正后，会发现由出生国决定的劳动分工上的偏离不显著了。图 2 表现的是以年龄修正的全体华人男性，即使将数量很少的华人女性就业者合并计算，也只有极小的差异 (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 表 22, 30)。图 3 反映的是以年龄修正的男性和女性就业者，按性别计算的分组数据无法获得 (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 表 40, 48)。虽然“idai”(一代)仅有小部分人完成了 1—3 年高中教育 (达到 4 年者微乎其微)，但他们从事中等层次的贸易行业的比例却高于受教育比例；相反，“idai”(一代)在专业领域中的分布比例却远低于他们中受过大学教育者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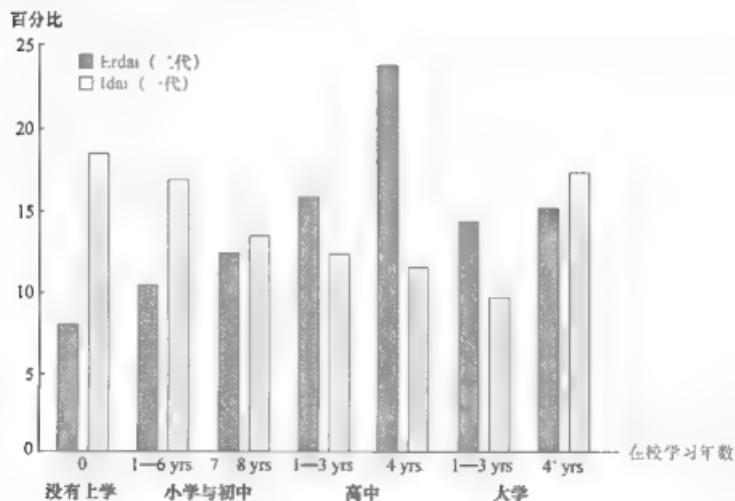


图 2 按在校学习年数出生国分类的 14 岁及以上华人男性分布 (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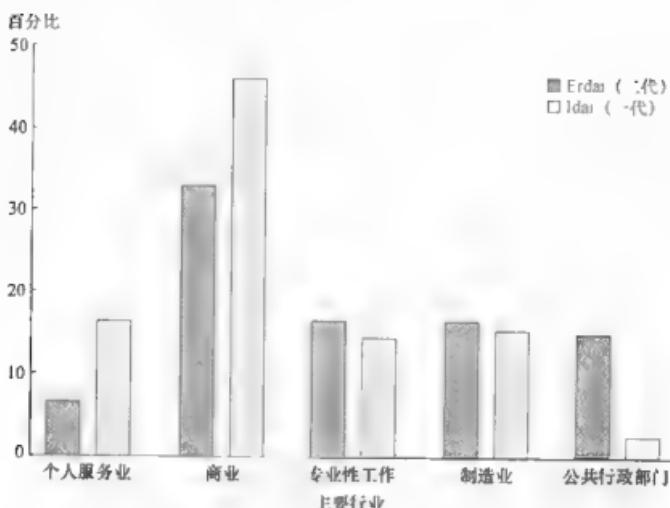


图3 按出生国分类的14岁及以上在业华人在各主要行业的分布(1960)

1970年的普查资料只提供了依出生国不同作出的华人的教育—职业(不是行业)之比较。图4是以年龄修正的全体男性华人的教育状况与华人男性就业者的就业状况;即使将人数很少的女性就业者合并计算时,差异也很小(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b, 表 18, 22; 1973c, 表 12, 13)。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idai”(一代)中,在专业领域就业比例略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受过较好教育的“erdai”(二代)中“其他白领工人”比例同样很低。所以,在受过较好教育的“erdai”(二代)中所存在的教育—职业偏离很清楚地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即华人担任领工薪的经理或管理工作的机会很少。同样,“idai”(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比例低,也表明他们所拥有的机会有限,而“idai”(一代)在贸易业中的教育—职业的偏离似乎印证了李(Li, 1976)的假设,即“亲属支持是移民过程中对教育程度不足的一种弥补性资源”。

最后,对于造成1930年以来两个出生国不同的群体在职业结构方面的显著变化的主导因素,作一简要的讨论(表2)。我们已经分析了影响近年来“idai”(一代)男性专业人员剧增的促进性因素。新近的华人入美浪潮的不利后果反映为1970年“idai”(一代)中的服务业人员大幅度增长,其显著的原因是大批文化程度较低的香港华人的涌入。更重要的是,1960年和1970年“erdai”(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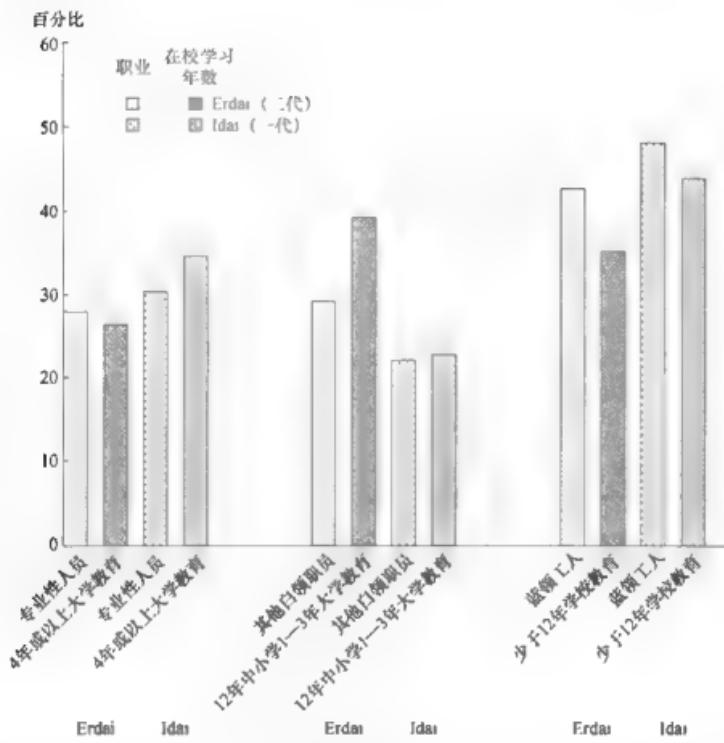


图4 按出生国、职业类别、上学年数分类的16岁及以上华人男性的分布(1970)

代)与“idai”(-代)相比,男性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明显的低,同时,前者的“其他白领和蓝领”人员比例高于后者,这似乎说明了尽管在他们内部存在教育—职业上的偏离,“erdai”(二代)仍拥有较多的和较好的工作机会。在女性“idai”(-代)中,1940年以来,“其他蓝领”人员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她们大多是制衣工。

华人的创业精神

有人称:“在商业领域中,出生国不是美国的人一直占大多数,并不能够证明他们具有创业冲动……”(Light, 1972)。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是,华人在经济

活动中最初是根据社会经济便利性而非“创业精神”来从事商业的。这一点在来自传统的“宗族制度”(caste system)盛行的华南的华人中尤为显著。他们不是与另一个居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族群的人相竞争,而是选择那些可能使他们成为所有者、经营者的活动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196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男性华人业主和经营者(不含农场主)的频次分布,南部约为西部和北部的2或3倍(全美:15.5;南部:29.3;西部:15.2,北部中央地区:13.6,东北部:12.9),南部的“idai”(一代)尤其如此(“idai”为32.4;“erdai”为22.1;全国范围内二者之比为17.1比13.2;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表40,44)。密西西比研究(Loewen, 1971)证实了这一点,该项研究表明,1960年Delta地区14个县的华人中,97%的人正在或曾在杂货店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华商的“自我认定的成就”(alleged success)陈述,他们的利润取向似乎极为微弱(Weber, 1947)。由于华人有关资料的不足,我们只能依据1972年对属于亚洲人拥有的商业的普查研究,做一些粗略的推测(表4)。在所有的行业及零售业中,亚裔人的企业,尤其是食品店及其分店、杂货店,与同样受到调查的所有其他少数族群相比,前者平均毛收入较后者高出许多。此外,将所有相关行业合并计算,华人商业又比其他亚洲人商业的毛收入要高许多。在解释这些调查结果时要谨慎,因为以毛收入为基础的比较可能会造成不正确的结论。

表4 平均每个商行的毛收入(单位:千美元)
指亚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群的零售业和个体服务业商行

行业	亚裔美国人	所有其他少数族群
所有行业	76.5*	40.2
零售业	125.3	54.7
食品店	220.3	66.1
杂货店	240.7	71.9
饮食店	98.5	45.1
个体服务业	17.3	10.9
洗衣、干洗店	19.0	19.5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Census, 1972, MB72-3;表A,表1;MB72-4,表1。

注:“华人每个商行的毛收入为90.8。

关于华人拥有的杂货店的两项研究,对华人商业的经营动机进行了讨论(Loewen, 1971; Wong, 1977)。研究认为,华人商业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应当指出的是礼貌待客、经商经验丰富,以及团结有力的扩大家庭单位。

关于华人创业精神的神话尚需做更为系统的研究。

唐人街亚经济

前文中我们描述了近年来令人鼓舞的、华人人口总体的宏观职业结构状况，这不应使我们忽视日益恶化的唐人街亚经济。为此做一个详尽的考察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作为华人的贫民窟，唐人街是“……一个位于非华人社区内的社区，它仅只是与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有依附、共生的关系，并无自己独立的经济结构”(Lee, 1949a)。不仅唐人街的兴衰与主流社会的兴衰同步，由于某些自设的障碍，唐人街亚经济因高度依赖于一两种行业而备受坎坷。下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大都市中心的唐人街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适应机制而兴起的，是对所在国的针对华人的偏见与歧视的反应。很快，这些社区便成功地满足了居民的一些基本需求，如互助、公民保护及民族消费品的供应。有报告称，过去几年里，这种小世界的内部的各种组织和机构有所增加，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文化自豪感及“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这类因素。这些组织，通常称作“内部政府”(inner governments)，有些这类组织具有特殊的权威及影响力，在控制个体成员及处理社区事务中发挥着有效的影响，著名者如“六公司”(Six Companies) (Nee, 1972)。人们常常会举出都市改建、争取充分就业、工人福利及建立工会等例子，以说明这类非正式政府在这些事务决定过程中的阻碍性地位(obstructive position)特征。

较大的唐人街中的华人职业结构与全美华人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例如，纽约唐人街(1969)除了不足3%的白领工人外，其他人可以分作彼此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即服务业人员(46.1%)和其他蓝领工人(51.2%) (后一群体包括50%有大学学历的唐人街居民；Chinatown Study Group, 1970)。然而1970年的全美华人的情形是，50%为白领工人。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便能够考察唐人街两大行业——旅游餐饮业和制衣业——的现状。旅游餐饮业这一复合体包括占董与纪念品商店、餐馆、熟食店、杂货店和经营范围广泛的批发零售店，它们对外人颇有魅力，构成了华人主要的就业渠道。据称纽约唐人街有200多家饮食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新移民经营的。男性华人中从事餐饮业的比例据说高达53% (Chinatown Study Group, 1970)。在热闹非凡的旧金山唐人街中心地带，每个街区便有5家餐馆(Leary, 1970)。在其繁荣的表象下，是众多的需加认真考察的阻暗面，如低于标准的工

资、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近来，主要的几个唐人街又一次被淹没在汹涌而入的移民潮中（上一次是1960年），这些移民的主体来自香港，据估计仅1967年一年便有约3000华人移民定居旧金山（Lee, 1969）。由于没有更好的去处，他们大多滞留于唐人街。这不仅加剧了唐人街亚经济的恶化，甚至引发了社区内犯罪现象的史无前例的增长，后者最终会威胁旅游业的生存。

关于制衣业的统计资料相当有限。大多数工人，主要是女性和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集中于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这几个主要的唐人街。据报告称，仅旧金山一处，1967年便有约3500名女性华人在150多个“血汗工厂”（sweatshops）里工作，旧金山生产的大约50%的服装是在这些工厂中缝制的（Lee, 1969）。这样称谓这些工厂，是由于其中的女工据说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方面都受到严重剥削和压榨（Nee, 1972；Lan, 1971）。

唐人街亚经济的恶化被归因于其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灵活性。从经济方面看，唐人街完全依赖于旅游餐饮业和（或）制衣业；从社会方面看，非正式的华人组织总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和公共福利的发展。唐人街作为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尚需作更多的研究。最近由Light和Wong（1975）提出的关于文化和制度的综合假设（the hypothesi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ynthesis），就是这种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有工作经历的华人的健康状况

以职业为标准分类的关于华人和其他亚洲少数族群健康状况的全国性统计资料的出版物，相当不易取得。实际上，全美人口的分职业死亡资料的使用也是被限制的，最新的报告是在1950年统计数字的特别列联表基础上完成的（U. S. National Office of Vital Statistics, 1963）。表5提供了20—64岁有工作经历的华人和日本人的资料，此表依据有限的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制成。这里使用的测量指标是标准死亡率（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MR），指每个职业群体的实际死亡数与预期死亡数之比，预期死亡率以1950年全美20—64岁的有工作经历的男性人口的分年龄组死亡率为基础而建立，这些男性人口被当作“标准人口”（standard population）。标准人口的死亡率值定为100%，若某个职业群体实际观测到的低于预期死亡率，则其标准死亡率低于100%，反之，则标准死亡率高于100%。

表5表明，与日本裔或美国白人参照群体相比，在几乎所有的职业群体中，男性华人的健康状况都属于较差者。极高的死亡率出现于华人服务业人员和

“其他蓝领”工人中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属于工作环境危害健康严重群体(如侍者、厨师及其他许多餐饮业人员和相关种类工人;洗衣工)。我们对纽约和旧金山唐人街中15岁以上(含15岁)华人的死亡率情况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表6,未列出女性之SMR)。男性因肺结核病(tuberculosis)而造成的不断上升的死亡率,与1973年旧金山报告的每十万分之97.7的高发病率(指华人)是一致的(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1974)。食道癌及肝癌(cancers of esophagus and liver)是男性高死亡率的又一原因,实际上这一情况在全体华人中也不例外。唐人街华人研究的结果,即从事餐饮业的华人的死亡率不断上升,与相对应的白人群体的情形是一致的(U. S. National Office of Vital Statistics, 1963)。

表5 以职业群体划分的20—64岁有工作经历的男性华人、日本裔和白人因各种原因而死亡计算的标准死亡率*(1950)

职业	华人		日本裔		白人
	死亡数	SMR	死亡数	SMR	SMR
所有职业	482	165	204	74	92
专业人员	12	107	11	81	89
其他白领 ^b	91	94	30	64	94
服务人员	161	147	42	97	121
其他蓝领	196	320	57	70	108
农场工人	22	241	64	74	93

资料来源:U. S. National Office of Vital Statistics, 1963a, No. 2 表2; No. 3 表1; 未公开发表的关于华人及日本人的死亡率的数据; U. S. Bureau of Census, 1953, 表11, 12。

注: *以20—64岁有工作经历的所有男性为100, 参见文中关于SMR的定义, 所有SMR均为作者自己计算的结果;

^b参见表2中的定义。

唐人街男性华人自杀率尽管上升缓慢,却反映了“idai”(一代)(尤其是其中的老年人)的悲惨境遇,如孤独、寂寞、贫困、疾病、没有地位。关于旧金山的研究(Bourne, 1973)指出,在61名自杀的男性华人中,21人无业,另有21人是厨师或退休工人,5人是技术工人,7人是洗衣工或餐饮业人员。女性自杀者在“idai”(一代)中的制衣工群体中为数最多,其SMR高达202,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被剥削的妇女的生活悲惨情况。我们注意到,英国的女裁缝、制衣工等人群的自杀率也处于上升之中(Registrar General, 1961)。

表 6 15 岁以上(含 15 岁)有工作经历的男性华人按死亡原因计算的标准死亡率
(旧金山唐人街,1963—1973;纽约唐人街 1969—1972)

死亡原因	死亡数	SMR*
所有原因	1800	85
结核病	32	566
鼻癌	13	1645
食道癌	20	246
肝癌	36	1285
糖尿病	53	166
心脏病	610	72
脑血管病	168	81
肺炎	68	113
胃溃疡	18	391
肾炎	24	284
自杀	28	90
他杀	26	262

资料来源:根据旧金山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以及纽约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提供的死亡率资料和(或)人口估测计算。

注: *以 15 岁以上(含 15 岁)的男性美国白人为 100; 参见文中定义。

由杀人案而造成的男性高死亡率, 清楚地表明了近年里低教育水平的年轻移民在增加并集中于唐人街。近几年中旧金山和纽约的唐人街中违法犯罪与青少年犯罪事件不断增多, 这些年轻移民是主要的肇事者。

总 结

上述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历史派生物假设, 即自第一代移民起便出现的直接反对华人的法律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障碍, 在这一少数族群的职业结构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适应这些限制性措施, 华人在第一个 60 年(自 1870 年起)中不断调整自己, 他们步步后退, 先是从采矿业退到农业, 最后又退到像贸易(小买卖)和个体服务业这样竞争程度很低的经济领域。由于最近 40 年来(总体上)有利于这一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 尤其是对华人入境控制的放松, 华人的职业变迁出现了新的转机。从这个角度看, 适应行为也就呈现了新的特征。

的确, 自 1930 年来, 个体服务业中的华人数量明显减少了, 贸易业人员也先是缓增而后有所下降, 相应的, 华人专业人员有了相当的增加。但是, 这些总

体上有利的和积极的变迁应在历史派生物背景下予以评价,而且同时也要考虑到变迁中的不利的一面,后者(不利的一面)包括:专业人员增长缓慢且集中于有限的地区和领域;低比例的挣薪金的经理及技工;过高比例的华人从事零售业和餐饮业,以及“idai”(一代)只有极为有限的就业机会。

关于华人的企业精神,唐人街亚经济以及有工作经历的华人的健康状况,我们已作了粗略的考察。考察中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些情况:有大批华人始终从事贸易业和服务业,某些职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外,唐人街亚经济的恶化应引起特别的关注。

倘要更深入地考察华人的职业结构,必须做细致的实地研究,尤其要考察职业流动的各个层面。这一方面的较早的例子是上文提及的 Kwok 的研究(1947),他研究了在美出生的男性华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定位(location of employment)(在唐人街之内或之外),以及现在和最初身份的变动,并将之与他们的兄弟及父亲的就业状况进行了比较。Li(1978)关于职业流动和亲属支持方面的研究则代表了新近的努力。

附表:有工作经历的日本裔(男性)的分布
年龄等于或大于 16 岁,在不同职业中的频次分布(美国,1970)

所有职业	100.0		
专业技术性职业	21.4(30.0)	100.0	
工程师		20.0(25.7)	
教师、高等教育		5.4(11.6)	100.0
工程学			7.9(13.4)
生物学			8.7(2.4)
内科医生、牙医等		9.1(9.5)	
经理、管理人员(不含农场主)	11.7(11.4)	100.0	
银行高级职员		7.1(2.8)	
餐馆、快餐店、酒吧老板		3.9(24.5)	
受雇的经理、管理人员(n.e.c.)		38.4(25.1)	
自营的经理、管理人员(n.e.c.)		16.4(30.4)	100.0
零售商		51.7(53.8)	
食品商			24.7(83.7)
批发商			9.7(2.5)
工匠及相关人员	19.5(7.8)		

(续表)

技术工人(不含运输类)	7.4(8.7)	100.0
洗衣工、干洗工(n. e. c.)	2.9(20.1)	
熨衣工	2.9(13.8)	
屠宰工	4.8(15.6)	
制作匠	15.8(5.7)	
金匠或工匠	12.8(3.2)	
熟练工人(不含农场工人)	10.6(3.2)	
服务人员(不含私人家务)	6.6(23.7)	100.0
饮食业	36.1(82.8)	100.0
厨师等(不含私人家务)		54.9(50.8)
侍者		9.9(27.8)
农场主及农场工人	5.1(0.6)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a, 表2。

注释:所有的职业和大群体及亚群体均为100;售货员及办事员未列出;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的华人的情况。

n. e. c——他处未有此种分类方式。

参 考 文 献

Bourne, P. G., 1973 "Suicide Among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3(8):744—750.

Chinatown Study Group, 1970, *Chinatown Report*, 1969. New York

Duncan, O. D., 1968, "Inheritance of Poverty or Inheritance of Race", In *On Understanding Poverty* Edited by D. P. Moynihan.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109—131

King, H., Unpublished. *A Centu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50*.

King, H., 1975, "Selected Aspects of Major Diseases and Causes of Death Among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Edited by A. Kleinman et al.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NIH. DHEW Pub. No. (NIH)75—653.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487—550.

King, H. and W. Huenschel, 1973, "Cancer Mortality Among Foreign- and Native-born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 2b(10): 623—616.

Kwoh, B. O., 1947,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American-born Chinese Male College Gradu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3(3): 192—200.

Lan, D., 1971 "The Chinatown Sweat Shops: Oppression and Alternative". *Amerasia* 1(3): 40—57.

Leary, M. E., 1970,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Atlantic Monthly* 225: 40-44.

Lee, L. P. et al., 1969, *San Francisco Chinese Community Citizen's Survey and Fact Finding Committee Report*. Abr. ed. San Francisco: H. G. Gingle.

Lee, R. H., 1949a, "Occupational Invasion, Succession, and Accommodation of the Chinese of Butte, Monta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 50-58.

Lee, R. H., 1949b, "The Decline of Chinatow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422-432.

Li, P. S., 1978,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Kinship Assistance: A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Chicago*. San Francisco: R&E Research Associate.

Light, I. H., 1972,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ght, I. and C. C. Wong, 1975, "Protest or Work: Dilemmas of the Tourist Industry in American Chinatow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6): 1342-1368.

Loewen, J. W., 1971,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yman, S. M., 1971, *Chinese Amer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Nam, C. B., 1959, "Nationality Group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merica", *Social Forces* 37(4): 328-333.

Nee, V. and B. deBray Nee, 1972,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New York: Random House.

Park, R., 1950,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Registrar General, 1971, "Decennial Supplement, England and Wales, 1961". *Occupational Mortality Tabl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San Francisc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1974, *Statistical Report 1973*. Thomas, W. I. and F. Znaniecki, 1918, *The Polish Peasant*. Boston: The Gorham Press.

U. S. Bureau of Census, 1872, Ni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0,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01, 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opulation*. Vol. I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04, 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 *Population: Occupations*,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22, Fou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Population*. Vol. IV.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33, Fif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0. *Population*. Vol. V., *General Report on occupation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43,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 *Popula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Nonwhite Population by Race.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53, 195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Nonwhite Population by Race.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63, 196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Nonwhite Population by Race. Subject Repor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a, 197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bject Repor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b, 197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Japanese, Chinese, and Filipino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bject Repor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c, 1970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National Origin and Language. Subject Report.* U. S. Bureau of Censu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73d, 1970 Census of Population. *Detailed Characteristics, U. S. Summary, Part I, Section 2.*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Census, 1975, *Minority-Owned Businesses. Special Report, MB72-3, MB72-4*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Census Office, 1872, Ni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70.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廖荣天 译, 李平校)

生育率差别与少数群体地位假说： 回顾与评价

弗兰克·D.宾(Frank D. Bean)
约翰·P.马库姆(John P. Marcum)

最近的资料表明,美国许多种族—民族的平均家庭规模或大或小明显地偏离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家庭规模,而且这种差异已持续了一段时间。尽管关于此种差异的文献很多,但对形成种族—族群生育率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的,我们却知之甚少。本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种族—族群身份是如何与不同水平的生育率联系起来的一般性问题:(a)概述种族—族群的生育率差异;(b)试图运用“少数群体地位”假说来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异;和(c)为今后的研究指出可行的方向。

一、生育率水平和趋势

从对美国各个种族和族群生育率水平的简略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种族—民族之间存在着迥异的生育模式。表1给出了1970年美国主要的种族—民族中35—44岁年龄组妇女所生子女数的普查数据。虽然在美国任何群体的正常生育率水平的平均子女数都是2—4个(Griffith, 1973),但是不同群体

* 本文选自 F. Bean 和 W. Frasbie 主编的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第 189 至 211 页。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Academic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的平均家庭规模差异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些群体中,只有古巴裔低于2个子女的平均数(每1000名妇女中有1932个子女),同时只有墨西哥裔美国人(4222)和印第安人(4267)超过4个子女的平均数。在这三个个案中,生育率水平并未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极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群体间差异的重要性(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生育率是古巴裔的两倍)。相反,我们必须正确地把握这种差异。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有差异存在,但是大多数群体中每位妇女平均至少生育两个子女,同时都远未达到其生育能力的限度。

在比较种族—族群的生育率差异时,我们是将占人口多数的白人即出生于美国城市的白人作为基线的。正如表1所示,1970年35—44岁年龄组的在美国出生的城市白人妇女中,每1000名妇女生育2803个子女。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两个群体—古巴裔(1932)和日裔美国人(2149)—处于低生育率水平,所有其他群体都具有较高的生育率。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的差异可能是十分细微的,例如华裔美国人、菲律宾裔和朝鲜裔的生育率水平仅稍高于城市出生的白人的生育率水平。而生育率水平较高的群体依次为:波多黎各裔(3240)、黑人(3489)、夏威夷人(3940)、墨西哥裔美国人(4222)、美洲印第安人(4267),其中,最后三个群体的妇女比占人口多数的白人妇女大约多生一个女子。

表1 1970年不同种族—族群的35—44岁年龄组妇女曾经生育的子女数

群体	每1000名妇女曾经生育的子女数
总体	2958
白人*	2891
美国出生	2913
城市	2783
城市美国出生	2803
乡村	3179
西班牙语国家原籍(Spanish origin)	3443
墨西哥裔	4222
波多黎各裔	3240
古巴裔	1932
其他西班牙裔人	3041
黑人	3489
美洲印第安人	4267
日裔美国人	2149

(续表)

群体	每 1000 名妇女曾经生育的子女数
华裔美国人	2833
菲律宾裔	2981
夏威夷人	3940
朝鲜裔	2891
其他	3222

资料来源: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Subject Reports, Final Report. PC(2)-3A, Women by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Tables 8 and 13.

* 包括西班牙语国家原籍(Spanish Origin)的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暂时性的模式。首先,少数种族一族群的生育率水平几乎一律处于相当或高于白人的生育率水平。在仅有的两个例外中,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古巴人代表新移民中的选择性群体(a rather select group of recent immigrants)。在散居美国的群体中,只有日裔美国人的生育率水平明显低于白人的生育率水平(大多数其他东方血统的民族的生育率接近白人的生育率);其次,在美国居住时间最久的群体生育率最高——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夏威夷人、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上,这些群体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而且一直是受歧视的对象(Ryder, 1973);再者,该表也说明将某些种群划分为亚群体的重要性。例如,在西班牙裔种群中生育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如果将美洲印第安人划分为不同的部落群体,也会存在相同情况的生育率差异。

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全部族群生育率的历史数据,但从那些幸存记录的群体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差异并非源自近来。例如,自上一个半世纪以来,除去大萧条时期外,黑人的总和生育率几乎一直都高于白人的生育率(Farley, 1972)。而且在这段时期,黑人的生育率波动程度近似于白人的生育率波动。显然,黑人和白人的生育率都同样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只不过是黑人的生育率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一些粗略的证据(Bradshaw 和 Bean, 1972)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盎格鲁人的生育率差异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林德福斯和斯威特(Rindfuss and Sweet, 1977:第五章)试图综合地描绘美国种族一族群的近期生育率趋势。他们分析了城市白人妇女和其他五个种族一民族的妇女包括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所生子女数的数据,比较结果见图 1。对大多数群体来说,与白人生育率变化曲线相比较,它们的生育率曲线都呈现某种波动,但是总体说来,则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高生育率群体在 1955-1969 年间仍保持较高生育率,虽然

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互换了最高生育率位置。黑人生育率水平有接近白人生育率的趋势。两个生育率水平最低的群体在次序上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华裔美国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在1969年达到最低值。后一结论与表1的结果是不同的(表中日裔美国人的生育率最低),说明这两个东方族群目前的生育率处于变动之中,不同于1970年左右的生育率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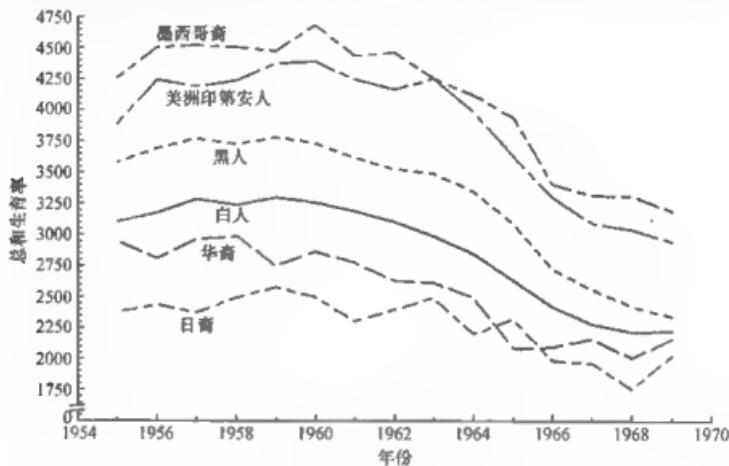


图1 1955—1969年间六个种族或民族的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Rindfuss and Sweet, 1977年:90。

二、对生育率差别的解释

关于种族—族群的生育率差异的幅度及其持续状况,有很多种解释。但是现存文献中最基本的解释有两种,即所谓的“社会特征假说”(social characteristics hypotheses)和“少数群体地位假说”(minority group status hypotheses)。社会特征假说将生育率模式的种族—族群差异归因于少数族群人口和主体人口(majority populations)之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例如,有些研究指出,当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变量分布差异(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oeconomic variables)消失后,黑人和白人的生育率就呈现趋同现象。李和李(Lee and Lee, 1959: 231)断言道,“黑人的高生育率可以用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当黑人和白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当时,黑人的生育率很少高

于白人, 而且是相对低于白人的生育率。”彼得森 (Petersen, 1961: 226) 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黑人不存在独立于职业、教育之外影响生育率的文化特质。种族不是家庭规模的原因而是社会阶级的指标”。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包括汤姆林森 (Thomlinson, 1965: 178)、法雷 (Farley, 1966)、鲍格 (Bogue, 1969: 696) 和普雷彻 (Presser, 1971)。其他人则强调黑人的都市化对于黑人和白人生育率趋同的重要性 (Huyck, 1966)。史密斯 (Smith, 1960: 322) 在谈及 20 世纪 50 年代黑人生育率时特别提到, “因为黑人仍是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居民 (如南方), 可能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居住在乡村地区, 因而生育率稍高于白人”。还有一些相似的研究强调社会的、经济的以及人口特征因素在形成美国犹太人的低生育率方面的重要性 (Freedman 等, 1961: 608; Thomlinson, 1965: 179)。

总之, 社会特征假说认为, 主体人口与少數种族和族群人口之间的生育率差异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布差异是紧密相关的。因之可以断言, 作为亚群体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主要行为表现方式的生育率, 将完全随少數种族和族群在社会经济方面同化于主体人口的程度而变动。随着社会经济特征的分布趋于平等, 生育率差异很可能趋于消失。

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 (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1969: 361) 用四个少數族群——黑人 (非白人)、犹太人、日裔美国人和天主教徒的资料对社会特征假说进行了一次检验。借助于那些并非专门用以阐述这一问题的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 (Westoff 等, 1961; 1966) 和那些忽略收入和职业等主要社会经济变量的不完全描述的综合普查数据 (incomplete descriptive presentations of aggregate census data),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以期更有效地解释生育率的差异。除了考虑社会经济差异之外, 这一替代性假说同时承认“少數群体地位角色的独立作用” (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1969: 369)。简单地说,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控制了社会经济特征分布这一变量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之后, 生育率的差异并未消失。相反, 与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相比, 天主教徒的生育率居高不下, 而犹太人、地位较高的黑人、城市日裔美国人、西部地区以外的日裔美国人的生育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为了解释这些群体的不因社会经济地位而影响的生育率差异, 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 (Goldscheider, Uhlenberg) 提出, 形成少數群体生育率模式的因素除社会经济地位之外, 还包括少數群体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种宏观性的解释也就是前述的少數群体地位假说。

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谨慎而又雄辩地指出, “无论在哪些方面和何种情况, 少數群体地位都是作为影响生育率的自变量而独立存在的 (1969: 361—

362)”。他们认为,天主教徒的生育率反映了天主教鼓励生育的价值规范,这是一个例外的个案。这种解释的普遍性也被应用于分析犹太人、部分黑人和日裔美国人的低生育率现实。为了解释这种低生育率,他们提出了一个社会心理学命题,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与少数群体地位相连的不安全感”(1969: 370)。首先,他们假定少数群体已经进入了一种行为同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主流社会(the larger society)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包括关于社会经济成就的观念在内。但是,完全达到这一目标或者说实现彻底同化,通常却并没有发生。因此,一些少数群体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已被同化(如教育和职业),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尚未被同化(如对初级群体^①的依赖和族际通婚)。这样,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在不同同化类型方面的程度差别就会使他们处于一种边缘位置,从而在与已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相比时,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为了抵消这种感觉、巩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少数群体就设法限制子女数目。这种效应尤其发生在那些社会经济方面已被充分同化了的具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少数群体夫妇们之中(如,那些地位较高的夫妇们中)。

根据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的假说,斯莱(Sly, 1970)开始试图调查少数群体的生育率。借助于35—44岁年龄组每1000名妇女所生子女数的全美普查数据,斯莱(Sly)用地区和社会经济指标对白人妇女和非白人妇女的生育率进行了初步的交互分类,然后再用三元方差分析(a thre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design)来确定各因素的影响效果。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斯莱否定了社会特征假说对于群体间生育率差异的解释,同样也否定了全美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但是,斯莱后来将南部地区的数据除掉后重新计算,他所得到的结果又近似地支持了社会特征假说。

为了验证该假说,罗伯特和李(Robert and Lee, 1974)所做的研究发现,研究结果不仅受研究区域的影响,而且也取决于对所研究的少数群体的界定(the definition of minority group)。利用1960年15—49岁年龄组居于西南五州之一的妇女的数据来分析,这些数据取自于全美普查中的“1%公共使用样本”(1% Public Use Sample)。他们将主体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划分为三组进行比较:白人—非白人、主体人口—少数群体(近似于白人—非白人的分类,但将西班牙语裔划归非白人)、西班牙语裔—其他白人—黑人(其中其他非白人完全除外),然后进行分组分析。当使用后两种分类方法时,各种群体之间的生育率差异十分

^① “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在这里系指与居住、工作场所、学校、私下社交活动相联系的社会单位,不是指种族、族群。

明显。当用主体人口—少数群体代替白人—非白人的划分和用西班牙人—其他白人—黑人代替其他两种中的任何一种时,自变量(民族、教育、收入、职业、城乡居住方式)就可以解释大部分累积或目前的生育率差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白人—非白人的分组方法比西班牙人—其他白人—黑人的分组方法对社会特征假说更具有支持力,说明对主体人口和少数群体地位的操作化内容不同时,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不是去肯定与各种社会、经济和人口学因素相比较,少数群体地位对生育率差异具有独立的解释力,而认为应该分别地分析少数群体和主体人口内部社会经济因素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正如布朗宁(Browning, 1975: 311)所指出的,这种方法与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的观点一致,即对少数群体生育率的分析必须首先从少数群体内部的亚群体的各种生育模式的平均值中概括出一般的生育率趋势。这是因为,不同的模式反映了在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其他少数群体成员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其他少数群体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格德沙尔德(1971: 297)写道:

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实质表现在群体间的社会联系特别是初级群体关系的形成。事实上,少数群体的凝聚和整合的特质是影响少数群体内生育率差异(异质性)的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对亚群体内部的生育率差异做出解释。如果我们把所有其他该考虑的内容都考虑进去,那么与主流社会(majority community)相比,决定少数群体成员行为模式的因素就不仅包括少数群体的整合程度,也包括值得特别强调的文化同化和结构隔离之间的边缘位置。

其他研究者如宾和伍德(Bean and Wood, 1974)、鲍尔曼和瓦尔希(Pohlmann and Walsh, 1975)要么关注群体内差异,要么关注群体间的差异。他们的方法是引入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不同的概念化过程。与以前的研究中对少数群体和主体人口的生育率进行简单比较所不同,他们是通过对每个群体的单独计算来分析各群体的生育率和其他变量间的关系模式。这样,通过对各群体关系模式的比较就可以发现群体间的差异,而且通过对各群体独立模式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各群体内的差异。宾和伍德应用这种方法研究了收入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根据1960年、1970年全美普查中的公共使用样本数据,通过对结婚时不到30岁、年龄在40—49岁之间、居住在西南五州之一的已婚的盎格鲁女性、墨西哥裔美国女性、黑人妇女的研究,在控制了妻子的受教育程度、结婚年

龄和城乡居住方式三个变量之后,他们分析了实际收入与相对收入、对所生子女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族—民族群体内部收入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模式呈现显著性差异。例如,在盎格鲁人中,实际收入与相对收入的水平对生育率均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实际收入对生育率产生消极影响,而相对收入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黑人的实际收入、相对收入均对生育率产生消极抑制作用。显然,群体间的差异是十分清晰的。可惜的是,作者没有根据社会特征假说和少数群体地位假说对这些模式的本质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鲍尔曼和瓦尔希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他们引入了较多的自变量,而研究对象仅仅涉及一个少数群体——黑人。运用1970年全美普查5%的1%公共使用样本(the 5% 1/1000 Public Use Sample)数据,他们分析了15—49岁年龄组内所有妇女(西班牙人后代除外)的生育率。根据妇女的初婚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首要收入虚拟变量(a dummy variable)、住房富裕程度、家庭收入、种族地位、乡村居住、租房居住或非租房居住变量、妇女就业地位变量,他们按五岁一组把所生子女数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分别对黑人和白人亚样本进行分别的逐步回归分析(separate stepwise regression)。结果发现,尽管种族间生育率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但是群体内分析并未显示出每个群体模式内自变量和生育率的关系类型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研究结果也表明,除去那些已被考虑的变量外,还有一些变量在起作用,从而造成了生育率的差异。

另外一种研究少数群体生育率差异的方法则强调生育行为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或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过去,至少有两项研究(Kennedy, 1973; Ritchey, 1975)指出,上文所指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会对生育率产生独立的影响。在一项有关美国之外的生育率研究中,肯尼迪(Kennedy, 1973年)分析了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生育率。这两个社会的社会人文环境迥异。虽然两地拥有相略的人口,但在这两个地区的主体人口和少数群体的社会地位却刚好相反。在爱尔兰共和国,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而在北爱尔兰,新教徒人数多于天主教徒,二者之比为2比1。运用1861年以来主要是1937—1961年间的总体普查数据,肯尼迪分析了这两个社会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粗出生率和子女/妇女比率。在相关资料具备的任何一个时期内,他发现这两个社会中天主教徒的生育率都高于新教徒,而新教徒的生育率在这两个社会中却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对于天主教徒的生育率来说,北爱尔兰一般高于爱尔兰共和国。1961年如下4个子群体的子女/妇女比率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爱尔兰共和国的天主教徒(4.25),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4.76),爱尔兰共和国的新教徒(2.47),北爱尔兰的新教徒(2.45)。

显然,生育率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生育率比爱尔兰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多0.5个子女。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结婚年龄较低。剩下的原因,肯尼迪认为可归因于社会环境的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作为少数群体面对的社会环境刺激他们提高生育率水平,而爱尔兰共和国的新教徒作为少数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则不具有这种效应。特别是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社会流动渠道更受限制,且作为少数群体的相对规模较大,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高生育率的形成。

里奇(Ritchey, 1975)也用上文所引的方法研究了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生育率。除了分析像种族和教育等个体层次的变量的影响外,他试图研究影响生育行为的居住各州的种族不平等程度。借助于1970年1/1000公共使用样本(5%问卷)的个人数据,他建立了一个所有已婚并与丈夫在一起、年龄在15—44岁妇女的子样本。每个妇女居住州的种族不平等程度取决于选自多种渠道的10个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这样不仅可以测出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程度,而且可以度量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根据居住州的得分指标,里奇把研究对象分为三组(高度不平等、中度不平等和低度不平等),然后对这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种族和教育(自变量)、年龄和劳动力地位(Labor force status)(控制变量)以及用3个一次交互相乘(firstorder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所得到的:种族×教育、种族×劳动力地位、劳动力地位×年龄的数值。依此,里奇对每一子样本的生育子女数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所有三个子样本来说,种族、种族×教育这两个指标与生育率显著相关。结果表明,黑人生育率总体上高于白人,但教育和生育率之间呈现负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种族不平等程度减轻后,这些影响的重要性下降。非常明显,少数群体地位不仅独立地影响生育率,也同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和社会环境一起协同影响着生育率。

还有一项关于同化的研究(Beaujot等,1977)值得注意。这一研究没有使用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方法,而是依据测量同化的其他方法——在加拿大居住的代际期限、语言倾向以及族际通婚情况——对加拿大各族群间的生育率水平进行比较。一般地说,他们的样本显示的生育子女数差异很小(家庭规模的变动范围从英国裔的1.41人到法国裔的2.08人)。但群体内的比较结果却令人感兴趣:对大多数群体而言,特别是当用族际通婚情况来测量民族同化时,同化程度低的亚群体明显地偏向于它所属群体的传统特征,也就是说,当这些同化程度低的亚群体属于高生育率传统的民族时,他们的生育率更高;而当这些亚群

体属于低生育率传统的民族时,生育率更低。该模式也说明,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强化了每个群体的特定生育规范。同时也说明,少数群体地位因素与同化程度共同影响着生育率。

上述讨论并未穷尽近年来关于种族—族群生育模式的所有研究。但到本文发表为止,就我们所知这些研究包括了试图验证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他大部分研究要么是纯描述性的(例如 Bradshaw and Bean, 1972; Farley, 1972),要么是与用少数群体地位假说解释种族—族群生育率差异这一思路的研究关系不大(Anderson and Smith, 1975; Baumann and Udry, 1973; Cain and Weininger, 1973; Detray, 1973; Gardner, 1972; Gregory 等, 1972; Ryder and Westoff, 1971; Westoff and Ryder, 1977)。

三、对前述研究的评价

根据少数群体地位假说来解释种族和族群间生育率差异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对少数群体进行定义。许多针对亚人口群体的研究都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它们视为少数群体。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于用“非白人”代表黑人,用“白人—非白人”的二分法代替主体人口—少数群体的分类(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1969; Sly, 1970)。这种分类法忽视了不同种族—族群间文化、外貌和其他特质的差异。例如,白人—非白人的区分将墨西哥裔美国人、古巴裔和波多黎各人放在白人之中(Ritchey, 1975),而将黑人、土著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其他东方血统的民族划为非白人。特别是当删去南方时,研究就更为麻烦,因为生活在南方以外的不是黑人的非白人占有很大比重。这正如将西班牙裔人归为白人一样麻烦丛生。很明显,任何可视为少数群体的人口亚群体所反映的都不仅是一个统计上的集合体。

那么,少数群体又该如何界定呢?罗伯特和李(Roberts and Lee, 1974)通过研究发现,研究结果具体地随着研究时所采用的族群定义而变化,因而,所谓的少数群体除了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之外,作为群体成员的被研究个体还应具有某些特征。下列的标准一直是形成少数群体地位的最基本条件。“少数群体”指的是任何具有下述特征的种族、族群(民族起源)或者宗教的人口群体:(a)与主体人口比较起来规模较小(Blalock, 1967: 46; Browning, 1975, 299);(b)具有相对清晰内涵的亚文化和独特的社会互动模式(Petersen, 1964: 237);(c)历史上受统治人口的压迫和歧视(Browning, 1975: 229; Petersen, 1964: 237);以及(d)通过社会约定的“继嗣规则”(“a socially invented rule of descent”)来确

定成员身份(Wagley and Harris, 1959: 7)。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三条。所有这些定义都排除对统计聚合体(statistical aggregates)(例如,非白人)的分析和对广义上的异质性群体的分析(如天主教徒实际上是由两个或多个比较小的民族群体组成的。特别是按照第二条标准来看时,有些已不再属于少数群体)。但墨西哥裔美国人和黑人却依然是少数群体。

此外,前述研究也存在着方法论问题。以前的研究(例如,Rindfuss, 1975; Ritchey, 1975; Sly, 1970)通常没有或没能考虑收入、教育和职业对生育率的共同影响或者说超越于所有这两个社会经济变量之外的少数群体地位的影响(Bean and Wood, 1974)。一些复杂的变量如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参与程度和结婚年龄常常没有得到控制(Sly, 1970)。有时通过对样本的轮廓改变来控制变量,如斯莱(Sly, 1970)删去了南部地区,罗伯特和李(Roberts and Lee, 1974)则去掉了25岁以后结婚的和没有工作的妇女。这样不仅产生某些变量方差缩小的影响,而且也会排除了与少数群体地位假说特征相关的妇女(例如,南部的穷人妇女和受雇佣的上层妇女^①)。虽然对上述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效果的分析是理解少数群体地位效应作用机制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前述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本质属性。宏观研究单位如社会(Kennedy, 1973)和州(Ritchey, 1975)也许是不太适宜的。例如,里奇(Ritchey, 1975)基于被调查者所居住州的总体的族群不平等程度对个人进行分类,就忽视了一个这样的事实:在每一个州内,不平等程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根据种族的不平等指标将得克萨斯州的全部居民赋予一个“高”值、堪萨斯州的全部居民都赋予一个“低”值,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堪萨斯州的部分居民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居民。因此,以州(或任何大的聚合体)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会掩盖许多业已存在的差异。

另一个问题在于,究竟哪些研究结果支持少数群体地位假说而反对社会特征假说,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完全清楚的。例如,如果在控制社会经济变量后,种族一族群间的生育率差异消失,社会特征假说即可成立。而且事实上,前面一系列的研究都是运用此种方法进行的。但是,在某些社会经济特征分布中,对人口差异的调整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在任何种族一族群内部,社会经济变量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相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影响生育率时,种族一族群成员的成员身份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互动关系(Kerlinger and Pedhazur, 1973)。

^① 这些受雇的较高地位的上层妇女往往因受教育的原因在25岁以后结婚。

然而,当考虑这种互动关系的可能性时,研究结果中的不同模式显然是支持少数群体地位假说的。一方面,社会特征和生育率之间关系中的种族—族群差异形成少数群体地位效应(a minority status effect)。事实上,当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提及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黑人的生育率低于同类白人,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黑人的生育率高于同类白人时,他们所指的就是这种效应;另一方面,如果假定社会经济变量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在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存在差异,那么就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分布差异的控制来证明,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生育率差异是否仍然存在。如果这些差异确实存在,那么此时所支持的少数—多数群体生育率差异就不能用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来解释。但是,用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的话来说,这并不是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于这一点,我们分别用“效应差异”(effect difference)和“水平差异”(levels difference)来表示(把相似的关系模式但不同的生育率水平归结为社会经济分布的差异,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生育率差异)。这几种模式可以用图2来描绘。

重要的是,我们应区分出哪一种模式所包含的证据支持少数群体地位假说。实际上,这些模式指的是不同的社会过程导致了种族—族群生育率的差异。“效应差异”同时也暗指了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1969)所提及的这种过程。他们认为,文化同化先于社会经济同化,因之,为了克服少数群体地位的不安全感和巩固在同化过程中业已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较高地位的少数群体成员就会大大降低其生育率(相对于主体人口的标准)。而“水平差异”则并不蕴含文化同化先于社会经济同化这种过程的假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模式更倾向于赞同社会经济同化先于文化同化的可能性之说。因为即使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种族—族群间的生育率差异依然存在(在所有社会经济水平上)。

图2中的(c)图提供了一个满足社会特征假说必要条件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差异足以解释种族—族群间的生育率差异。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所有研究的种族—族群内部不存在社会经济特征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差异这一前提成立时,这个结论才是有保证的。另外,值得重申的是,少数群体—主体人口在社会经济特征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差异本身并不足以推论出少数群体地位效应的存在。也就是说,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互动效应并不等同于支持少数群体地位假说。同时,也应该说明的是,这也导致少数群体中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低于主体人口中同样社会经济地位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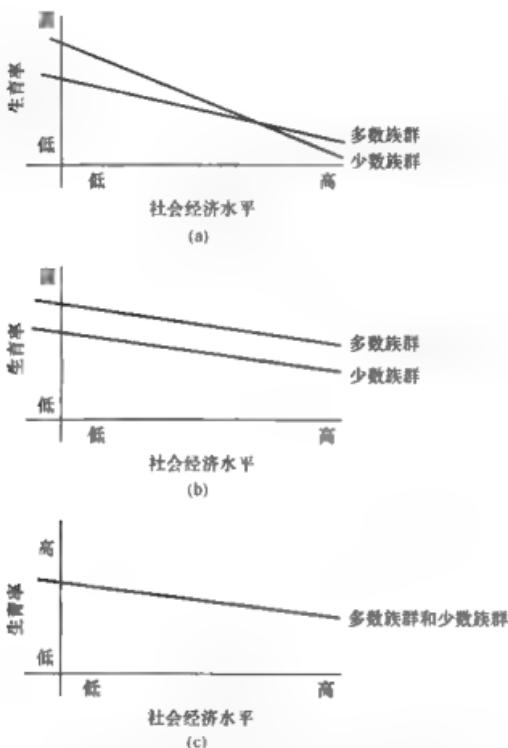


图2 正如文中对这三种假说的概括一样,本图联系社会经济变量揭示了少數群体和主体人口生育率方面的差异

四、今后研究的可行方向

少數群体地位假说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在对生育率的影响方面,种族和族群成员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互动模式。特别是在那些已取得很高的社会经济成就但却被拒绝完全整合到主体人口中的少數群体成员之间,少數群体地位效应最为明显(例如,由于持久的歧视和偏见,他们发现族际通婚和其他形式的初级群体关系常受到限制)。总之,这种效应来源于各类不同的同化进行速度的差异(不一致性)。随着社会经济成就的提高(如

社会经济同化程度的提高),至少只要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少数群体的不安全感就会增加。

进一步分析这个原因,我们会发现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在某些方面比另外一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在少数群体和主体人口的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强烈。在下述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与缩小少数族群和主体人口之间社会经济差距有关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可能是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的条件。它们是:(a)城市和乡村居住的比较(*residence in a urban versus a rural place*);(b)居住聚合与分离程度的比较(*residence in an integrated as opposed to a segregated area*)和(c)后代群体成员与某一祖籍地的大约距离(*membership in a generational group that is distant from, rather than proximate to, some place of origin*)。我们之所以考虑这三个因素是因为它们有可能影响黑人、甚至某些方面包括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生育模式。

(一) 城市与乡村居住的比较

城市居民的职业成就一般高于乡村(Blau and Duncan, 1967: 248—249)。在美国人口普查所有4个地区(中北部、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城市黑人(男性,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乡村农业黑人和乡村非农业黑人。另外,在每个地区内,城市黑人的收入高于乡村黑人(农业或非农业)(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3)。因而可以假定,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城市高于乡村。施莱辛格(Slesinger, 1974)的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间接的证明。他指出,依不同教育水平而论所生子女数目,居住在大都市的黑人男性的平均差异程度大于居住在小城镇或乡村的黑人男性的差异程度。然而,由于该研究的目的不是分析少数群体—主体人口的生育率差异,施氏也就没有对少数群体地位效应进行检验。

除了少数群体地位外,其他因素如种族—族群成员身份、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市或乡村居住地点也有助于说明高度互动(higer-order interaction)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例如,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一般会导致城市妇女的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差异增加(Duncan, 1965; Freedman and Slesinger, 1961; Goldberg, 1959)。而且,具有农业背景的城市男性大多数为黑人(Blau and Duncan, 1967)。因而,如果城市居住、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族群的成员身份等因素协同作用影响着生育率的话,那么,也同样并不足以支持少数群体地位假说。也就是说,在做结论时必须考虑到较高地位的黑人妇女的生育率比她们

的白人同伴要低些。

(二) 居处的聚合与隔离

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在某些城区比另外一些城区更为显著。有关种族一族群的许多参考文献都表明,居住的隔离会加强亚文化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一种局限于族群内部互动的社会环境。这包括许多少数群体,如华人(Fong, 1965)、俄罗斯人(Simirenko, 1964)、意大利人(Myers, 1950)、黑人(Blalock, 1967)、各欧洲移民群体(Lieberson, 1963); Beshers, 1962; Park, 1952: 20; Timms, 1971)。不仅同一个民族成员集中居住的街区会强化少数群体行为的独特性,而且存在一个互补的过程——有人称为“迁移模仿”(migratory emulation)——那些渴望同化到主体人口中去的个人从族群街区迁出,进入主体人口居住区,而对本族传统满意的则会留下来。梯姆斯(Timms, 1971: 98)认为,“居住地的选择和再选择可以看做是缩短个人与他所渴望模仿的族群间距离和扩大他与所渴望离开的群体间距离的一种策略。”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单向的过程,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的摆动平衡反映了一种追求居住地与价值观更为和谐一致的努力。虽然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Wilensky, 1965: 136),与旧时代的决裂可能是不完全的,因而拜访以前街区的频率不像实际居住本身一样是同化可能性的一个关键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假定,与生活在非混合居住区社会经济同化程度一样的个人相比,生活在混合居住区的少数群体成员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同化程度越高,越感到不安全。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程度,在混合居住区比非混合居住区要深刻。或者说,在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况的效果更强。

在非城市地区,居住的隔离对少数群体生育率模式的间接影响比较难以预知。一方面,不论是居住在乡村还是城市,只要白人占多数,就会增加较高地位的少数群体成员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选择居住乡村地区并不反映城市地区同化论者的偏爱和在城市地区那样的结果。

(三) 代际距离与代际接近的比较

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少数群体地位效应的因变量是与祖籍地的代际距离(generational distance from region of origin)。许多有关黑人的研究文献表明,南方的黑人、出生在南方的北方黑人以及出生在北方的北方黑人的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相当的差异(Lieberson and Wilkinson, 1976; Long and Hansen, 1977;

Long and Heltman, 1975)。前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成就高于出生在北方的北方黑人。这种较高的同化程度(即与其他群体的黑人相比较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成就),使我们有理由假定,在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方面,出生于南方的北方黑人强于其他两个群体,而出生于北方的北方黑人强于南方黑人。然而,我们却不能假定可以比较出生在北方的第一代北方黑人和以后的黑人的生育率差异。这是因为就其他变量来说,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并未发现差异的存在(Lieberson and Wilkinson, 1976)。

墨西哥裔美国人所构成的群体可能是少数群体地位假说的例外。从现象上看,墨西哥裔美国人不仅鼓励生育(Bradshaw and Bean, 1972),而且他们主要是由天主教徒构成(Grebler 等,1970: 487),尽管至今人们一直在辩论说宗教并不是促成多育的因素(Alvirez, 1973; Browning, 1975)。不管怎样,近来的研究表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同化过程,深受墨西哥是这些少数群体成员最接近的社会经济参照系这一事实的影响(Bean and Wood, 1974; Dworkin, 1970; Marcum and Bean, 1976)。特别地,马库姆和宾(Marcum and Bean)的研究发现,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这种代际职业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直到第二代之后才出现。而这时它对无论是上向流动(较明显的)还是下向流动的夫妇的生育率都有抑制作用。这也表明,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后代比早期的夫妇更加从经验数据方面支持了少数群体地位假说。

五、结 论

在本章中我们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a) 描述了美国种族一族群生育率差异的某些方面;(b) 对解释这些差异的研究做了回顾与评价;(c) 为“少数群体地位假说”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策略。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如果按照格德沙尔德和乌伦伯格(1969 年)所认为的少数群体地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方式,那么我们可以说,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少数群体夫妇的生育率要比居于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主体人口夫妇的生育率要低一些。我们还认为,当少数群体与主体人口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较小时,少数群体地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容易看到。当然,这些可能性的推论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却仍然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的经验性问题。

参 考 文 献

Alvirez, David, 1973, "The Effects of Formal Church Affiliation and Religiosity on the Fertility

Patterns of Mexican-American Catholics." *Demography* 10 (February): 19-36.

Anderson, John, and Jack Smith, 1975, "Planned and Unplanned Fertility in a Metropolitan Area; Black and White Difference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7: 281-285.

Bauman, Karl E., and J. Richard Udry, 1973, "The Differences in Unwanted Births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Demography* 10 (August): 315-328.

Bean, Frank D., and Charles H. Wood, 1974, "Ethnic Vari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Fertility." *Demography* 11 (November): 629-640.

Beaujot, Roderic P., Karol J. Krotki, and P. Krishnan, 1977, "The Effects of Assimilation on Ethnic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St. Louis, Missouri, April.

Besbers, James M., 1962 *Urban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Blalock, Hubert M. Jr.,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 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Bogue, Donald J., 1969,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Bradshaw, Benjamin S., and Frank D. Bean, 1972, "Some Aspects of the Fertility of Mexican-Americans." in Charles F. Westhoff and Robert Parke, Jr. (eds.), *Demograph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Population Growth*, Research Reports, Volume 1,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40-164.

Browning, Harley L., 1975,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Minority Groups in the U. S. A." in William Montagna and William A. Sadler (eds.), *Reproductive Behavior*. New York: Plenum Publishing.

Cain, G., and A. Weininger, 1973,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esults from Cross-sectional Aggregate Data." *Demography* 10 (May): 205-233.

Detray, D., 1973, "Child Quality and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no. 2 supplement): 580-590.

Duncan, Otis Dudley, 1965, "Gradients of Urban Influence on the Rural Population." *Midwest Sociologist* 18 (Winter): 27-30.

Dworkin, A. G., 1970, "Stereotypes and Self-images Held by Native-born and Foreign-born Mexican Americans." In John H. Burma (ed.), *Mexic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Farley, Reynolds, 1966, "Recent Changes in Negro Fertility." *Demography* 5 (February): 188-203.

Farley, Reynolds, 1972,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Trends among Bl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11—138, in Charles F. Westoff and Robert Parke, Jr. (eds.), *Demograph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Population Growth*, Research Reports, Volume 1, U. S.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ng, Stanley L. M., 1965, "Assimilation of Chinese in America: Changes in Orientation and Accult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1 (November): 265—273.

Freedman, Ronald, and Doris P. Slesinger, 1961,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for the Indigenous Non-farm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Studies* 15 (2): 161—173.

Freedman, Ronald, Pascal K. Whelpton, and John W. Smit, 1961,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Religious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August): 608—614.

Gardner, B., 1972,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Fertility of Rural-farm and Urban Wome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8: 518—924.

Goldberg, David, 1959, "The Fertility of Two-generation Urbanites." *Population Studies* 12 (3): 214—222.

Goldscheider, Calvin, 1971,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Boston, Massachusett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Goldscheider, Calvin, and Peter R. Uhlenberg, 1969,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January): 361—372.

Grebler, Leo, Joan W. Moore, and Ralph C. Guzman, 1970, *The Mexican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Gregory, P. R., V. M. Campbell, and B. S. Cheng, 1972,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Birth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4: 374—380.

Griffith, Janet, 1973, "Social Pressure on Family Size Intentions."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5: 237—242.

Huyck, Earl E., 1966, "White-nonwhite Differentials: Overview and Implications." *Demography* 3 (2): 548—565.

Kennedy, Robert E. Jr., 1973,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The Iris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February): 85—96.

Kerlinger, Fred N., and Elazar J. Pedhazur, 1973, *Multiple Regression in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Lee, Everett S., and Anne S. Lee, 1959, "The Future Fertility of the American Negro." *Social Forces* 37 (March): 228—231.

Lieberson, Stanley, 1963, *Ethnic Patterns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Lieberson, Stanley, and Christy A. Wilkinson, 1976, "A Comparison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Blacks Residing in the North." *Demography* 13: 199—224.

Long, Larry H. and Kristin A. Hansen, 1977, "Selectivity of Black Return Migration to the

South." *Rural Sociology* 42: 317-331.

Long, Larry H. , and Lynne R. Heltman, 1975, "Migration and Income Difference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Men in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May) : 1391-1409.

Marcum, John P. , and Frank D. Bean, 1976, "Minority Group Status as a Fac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and Fertility: The Mexican American Case." *Social Forces* 55 (September) : 135-148.

Myers, Jerome K. , 1950, "Assimilation to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of a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 (June) : 367-372. Reprinted in George A. Theodorson (ed.), *Studies in Human Ec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1: 273-279.

Park, Robert Ezra, 1952, *Human Communities*.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Petersen, William, 1961, *Popul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Petersen, William, 1964, *The Politics of Popula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Pohlmann, Vernon C. , and Robert H. Walsh, 1975, "Black Minority Racial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 *Sociological Focus* 8 (April) : 97-108.

Presser, Harriet, 1971, "The Timing of the First Birth, Female Roles and Black Fertility." *Mid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49: 329-361.

Rindfuss, Ronald R. , 1975, "Minority Status and Recent Fertility Trends."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Working Paper 75-21, July.

Rindfuss, Ronald R. , and James A. Sweet, 1977, *Postwar Fertility Trends and Different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itchey, P. Neal, 1975, "The Effect of Minority Group Status on Fertility: A Re-examination of Concepts." *Population Studies* 29 (July) : 249-257.

Roberts, Robert E. , and Eun Sui Lee, 1974,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 (September) : 503-523.

Ryder, Norman B. , 1973, "Recent Trends and Group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In Charles F. Westoff (ed.), *Toward the End of Growth*.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Ryder, Norman B. , and Charles F. Westoff, 1971, *Re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irenko, Alex, 1964 *Pilgrims, Colonists, and Frontiersme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Slesinger, Doris P. , 1974, "The Relationship of Fertility to Measures of Metropolitan Dominance: A New Look." *Rural Sociology* 39 (Fall) : 350-361.

Sly, David F. , 1970, "Minority-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An Extension of 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November) : 443-459.

Smith, T. Lynn, 1960, *Fundamentals of Population Study*. Chicago, Illinois: J. B. Lippincott.

Thomlinson, Ralph, 1965, *Population Dynam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Timms, Duncan, 1971, *The Urban Mosai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3,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Subject Reports, Final Report PC (2)-1B, Negro Population*.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gley, C. , and M. Harris, 1959, *Minorities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stoff, Charles F. , Robert Potter, Philip Sagi, and Elliott Mishler, 1961, *Family Growth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stoff, Charles F. , and Norman B. Ryder, 1977, *The Contraceptive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elpton, Pascal K. , Arthur Campbell, and John Patterson, 1966,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ensky, Harold L. , 1965, "A Second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Urbanism." pp. 135—147, in Roland L. Warren (ed.),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Community*. Chicago, Illinois: Rand McNally and Company.

(李建东 译, 王荣武 校)

死亡率的种族和性别差异 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G. F. 萨顿 (Gordon F. Sutton)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人类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为人们提供了其赖以生存的适应机制。组织的设置是在人类群体的生物和社会特征(包括死亡率)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直保存至今的家庭这一社会组织是建立在性别与年龄等特征之上的,而且与食物的生产过程息息相关。这样,家庭成员的死亡就会强烈地影响家庭生活的运行并波及其配偶及子女后代的生活机会。正如高死亡率往往与高出生率相连一样,也正像某种婚姻形式和选择性溺爱常常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一样,我们很有必要去研究不同群体的死亡率差异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本章主要研究美国的白人和非白人间的死亡率差异。已婚男性的死亡率是我最为感兴趣的问题。由于这部分人的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受性别死亡率差异的影响,故而有必要介绍性别死亡率差异。我设计了一套评价程序用以测量不同种族已婚男性的死亡对其家庭所造成的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同于且大于非白人和白人男性之死亡率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所赖以计算的基础可以用来协助测量经济影响力大小,这点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可能需要考虑。

* 本文选自 F. Bean 和 W. Freebie 主编的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第 301 至 314 页。翻译及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Academic Press 的同意, 谨此致谢。

种族间死亡率差异的测量

测量死亡率差异有一个困难。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不仅美国的性别死亡率差异受死亡率差异的测量方式的影响,而且存活率的差异包括了一套并不是从死亡率引申出来的不同价值(Keifitz and Golini, 1975; Sheps, 1958, 1959)。

谢普斯(Sheps)用一个例子比较了死亡率和存活率,对于她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数据,她写道:“有95.1%的新生女孩可以预期活到40岁而男孩的比例则为92.1%,所以有3%的女孩多于男孩预计能活到40岁。人们也可以说因为4.9%的女孩和7.9%的男孩将在40岁以前死亡,所以男性的死亡率要比女性死亡率高61%。这两种说法都对。”(Sheps, 1958: 1-2)(见表1)

近些年来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死亡率下降到很低水平的这一趋势,促使许多研究者去研究社会中人们的各种不健康状况的情况并把它作为现代人幸福、健康水平的指标。富克斯(Fuchs)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计算出随时间累积起来的经济作用对死亡率的变迁有多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人们的工作年龄时期的死亡率很低,因此越来越难显示出经济影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死亡率”(Fuchs, 1965: 11)。

表1 白人男性、女性从出生到40岁的生存率、死亡率(%)

	男性 (1)	女性 (2)	差别 (2)-(1) (3)	存活者比率 (2)÷(1) (4)	死亡者比率 (1)÷(2) (5)
存活者	92.1	95.1	3.0	1.03	\
死亡者	7.9	4.9	3.0	\	1.61

资料来源:本表引自 Sheps, 1958: 1210—1214。

有两种方法计算死亡给社会造成的损失:(a)计算总体的社会损失,(b)根据其家庭成员所提出的补偿性要求(抚恤金)来计算单个家庭的损失。有关后者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以宏观的方式对死者家庭所属阶级因其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研究尚不多见(Weisbrod and Hansen 1968年的研究是例外)。在他们的研究中,死亡率确实很低,以它作为分析工具是不敏感的,但一个社会中死亡率的群体差异一直受到关注(Kitagawa and Hauser, 1973)。就像 Fuchs 这样的人似乎在他的新著《谁将生存》(Who shall Live? 1974)一书中也改变了看法。

当我们观察不同种族、不同肤色死亡率的群体差异时,能得出什么呢?可

以通过计算种族间死亡率比率来估计出死亡率的影响力(见表2)。当除掉年龄的影响后,我们发现非白人与白人的死亡比率是从1960年的1.06下降到1969年的1.01。如果我们不纠缠于一些社会政策问题而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从纯粹学术角度来说,对于分析死亡率变化的比率这个结果是充分的(Sutton, 1971)。

表2 美国1969年和1960年非白人对白人的死亡率之比

岁数	年	
	1969	1960
全部年龄*	1.01	1.06
15—19	1.54	1.40
20—24	1.96	1.79
25—29	2.62	2.44
30—34	3.05	2.70
35—39	2.86	2.61
40—44	2.50	2.34
45—49	2.14	2.00
50—54	1.90	1.92
55—59	1.73	1.72
60—64	1.62	1.74

*包括1—85岁及85岁以上的全部人口。

资料来源:U. 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73, 表3。

此外,正如Keyfitz和Golini(1975)指出的那样,年龄整合后的死亡率之比可以敏感地反映不同群体中生命丧失的状况,但往往不能有效地反映这些死亡所发生的年龄的状况。考虑到性别死亡率的差异,他们提出了下面的公式:

$$I'_e = \frac{\sum P'_x e'_x U'_x}{\sum P'_x e'_x U'_x}$$

I'_e = 妇女预期生存年数丧失指数,

P'_x = 年龄 x 的女性数目,

e'_x = 女性在年龄 x 的预期寿命,

$U'^{(n)}$ = 女性(男性)特定年龄的死亡率。

这个公式尚留下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它衡量不同年龄的死亡差别,更侧重那些青壮年的死亡情况。这样,通过计算各个年龄群体的人将继续存活的时间来衡量死亡率的方法,可以显现出各个年龄群体与总人口的死亡状况不同,

这种方法计算结果之间的比较又与通过死亡率进行比较的结果不同。

我们需要确定我们究竟要测量些什么。在本章中我们采用富克斯(Fuchs)的前提,即认为不同肤色的人的死亡率差异程度是:(a) 多年来在公共健康统计中是一个人们很熟悉的数字;(b) 不受外部运动或财产的影响。后者可能不包括最近关于不同死亡原因的确认与解释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Preston et al. 1972)。这样通过对家庭存活者情况的测度可以发现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社会与经济损失的差异。这回到了达布林和洛特卡(Dublin and Lotka, 1930)的“男人具有的金钱价值”的理论上。这种方法并不准备测量感情的紧张痛苦,而是关注收入、生活水平和其他家庭生活中更复杂的因家庭成员死亡所带来的变化。

当焦点被集中到人口中的存活者上时,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学指标,凯菲茨和戈利尼(Keyfitz and Golini, 1975)的预期生存年数丧失指数在大方向上是对的,需加以采用,但仅有它还不够。这个公式更侧重于衡量人口的预期存活时间中的死亡状况而不是衡量实质上无差别的生命本身。虽然这种方法更关注存活者而不是死者,但它并不包括那些家庭中的非独立成员的状况,这些人的生活当家庭某些成员(如男性户主)去世时大为改变。

显然,种族死亡率差异可以被认为反映了种族间在死亡情况上对家庭存活者影响方面的差异。但也有一些具有重要后果的差异。一种测量方法结果中的变化并不一定注定与另外一种测量方法结果中的变化相伴随,死亡率的肤色差异对相比较的人群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直接分析。

如果非白人妇女中的守寡人数多于白人妇女的守寡人数,这种差别不仅是由于两个群体间的死亡率和结婚率差别,也可能是不同肤色间的性别死亡率差异所致。与白人妇女相比,非白人妇女在65岁以前即她们的工作期间更容易成为寡妇并多年不再嫁,这可能使人得出结论:妇女与男人相比在寿命上的性别优势在非白人群体中更明显。也可以说,非白人男性与他们妻子比较而言的劣势要大于白人男性对他们妻子的劣势。本章所做比较中的死亡率分析情况显示相反的结论。当非白人妇女在她们的工作年龄时期:(a) 比白人妇女不容易结婚;(b) 与非白人男性有着更接近的年龄别死亡率,而同时白人女性与男性的分年龄死亡率差别则大一些;(c) 在14—65岁期间,与白人妇女相比更容易成为寡妇。在上述这些情况下,非白人妇女怎么会在她们的工作年龄内具有更大的性别死亡率差异呢?我只想指出一点,性别差异可以有一定作用,但是种族的死亡率差异特别是妇女间的差异似乎在相反的方向上起更大的作用。

工作年龄内的死亡率

丧失生命时的年龄对于存活者及人口成员的幸福有十分重要的结果。如果每个生下来的人都正好在刚够退休的年龄时死去,那么在社会生物进程中这个社会的人口的生产创造能力最大。新生儿必须用一段时间来接受社会化,这使社会付出了社会的和经济的花销,起码从经济角度看家庭也付出了代价。如果这个“投资阶段”之后能伴随一段生产工作阶段,个体在成长之后对社会进行了创造贡献,起码补足了他过去的花费,如果他正好在生产年龄结束时死亡,社会则收回了它对新生儿的投资。

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新生儿都只存活到他刚好要为经济作贡献的年龄(或者他正要很大地延长他的工作年龄时),那么社会对这些生命的投资便受到了损失。当然,这个假定的社会注定会衰落下去并消失。如果期望寿命不能与人口要求的创造能力相一致或者对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人来说是如此(这表现在负担率:dependency ratio),我们可以设想这将增加人口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重负也将落到家庭及一些社会组织身上,那些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在于维持社会,这样的结果使社会成员们或部分成员的发展前景受到了消极影响。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将已婚男子种族死亡率差异的测量和由此引发的对存活者的影响的测量做一区分。研究死亡率差异的有关文献已有不少,而测量死亡率差异对存活者的影响则需一些解释。这个过程描述如下(读者如有进一步兴趣可参见其他文献,特别是 Sutton, 1977)。

由于美国生命统计系统的特点,我们不能直接研究寡居的状况,因为有些信息没有收集,至少没有直接去收集有关寡居的数据。我的资料来源是 1971 年 6 月的最新人口调查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 宏观数据文件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1)。那次调查包括了妇女结婚和生育的历史,我通过这些资料制作了一段“经验时期”——从 1961 年 7 月至 1971 年 6 月,我观察这段时间的人口变动情况。婚姻生活状况表 (Marital life status table)——是由 Schoen 和 Nelson 设计的一种多元的增加—减少表,非常适合于解决问题 (Schoen, 1975; Schoen and Nelson, 1974)。我把 Schoen 和 Nelson 的表略做改

动以适于对 CPS 6 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复合表中的妇女死亡率,我制作了一套 1970 年的妇女死亡率表,它根据 1960 年以来的婚姻状况分组死亡率和 1970 年的人口情况进行了修正。

经过一定程度的简化,CPS 的调查可被用来提供年龄、肤色、婚姻状况的变化。假如我们为各种肤色的年龄正好在 14 岁的妇女选择一个共同的基数 100 000,立刻就能算出下面的分年龄组的概率:(a) 结婚的概率,(b) 死亡的概率。针对那些活过第一年的,我们可以再推第二年及以后的情况。结婚的妇女被列入“已婚”表中,那里可以推算出她们的下述概率:(a) 离婚;(b) 寡居,(c) 死亡。如果一名妇女成为寡妇,她又进入另一张表,从中可以看出她再婚及死亡的概率。

这一过程有两处“吸收状态”(absorption states),只有其中之一的“死亡”是常在的。另一个是 65 岁生日,达到这一年龄的妇女活过了“工作寿命”。这一过程分析起来似乎很复杂。但是通过栏 L_x 、 T_x 和 I_x ,人们可以读出这一过程结果——表中 51 年里不同婚姻状况所经历的人年数(person-years)以及婚姻状况变化的数字来分析每种婚姻状况的变化概率。作为补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是如何与特定年龄相联系的。

丧父孤儿的情况与寡妇包含同样的数据麻烦。我回溯 CPS 资料中的生育数字,为计算妇女有孩子时的年龄提供了基础,由于一直记录妇女的生育状况,故孩子的年龄和母亲的年龄在 51 年的生命过程(lifetimes)中皆可作为妇女的特征。实际上在分析中孩子是妇女的特征;在妇女婚姻状况的生活中,她逐步积累孩子生命年数(child-years of life)直到三个“吸收状态”:(a) 母亲的死亡,(b) 母亲到 65 岁时从表中退出,(c) 孩子到 18 岁时退出。作为输入的一个补充,我引进孩子的年龄别死亡率应用于孩子生命年数,于是又有了第四个吸收状态(孩子的死亡),虽然它在过程中并不直接显示。

通过上述分析出生的方法,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数据:一是孩子生命年数,从妇女婚姻状况表(女性作为母亲)中可以得出,一是丧父孤儿的年数,这可以与整个儿童的情况相联系并可用于作肤色差异的比较研究。在本研究的估算中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特别是有关孤儿的。由于在这种历史的考察中没有考虑到具体家庭生活的运行,而寡妇的生活负担(因男人的死所引起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孤儿的情况更是如此,这些方面都是需要考虑的。

死亡率及其对存活家庭成员影响的肤色差异

表2包括了按年龄组划分的非白人对白人的死亡率比率。我们可以看到年龄整合后全部人口的比率在1969年是1.04而在1960年则是1.06,明显低于15—64岁中每个年龄组的比率。在图1中这两个群体有很明显的年龄分布上的死亡率差别。不仅两个群体间在年龄分布上有很大差异,而且由于老年人的死亡率很高,因此,当考虑肤色因素时,年龄整合后的总体图景会掩盖工作年龄内死亡率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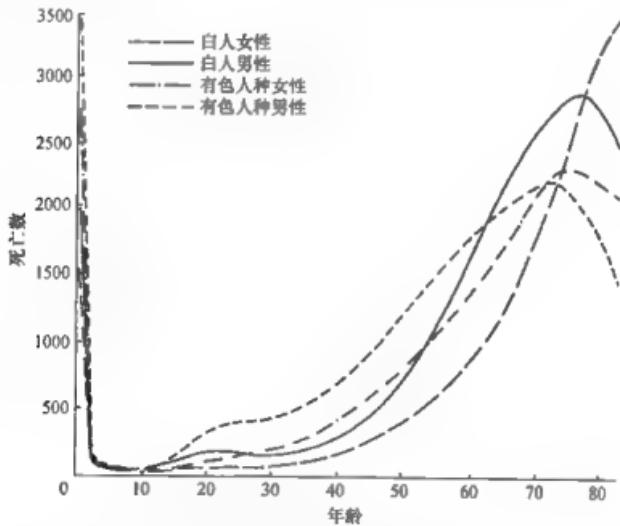


图1 按年龄划分的每年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U. 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70。

表3的对比更显著,大多数的非白人男性对白人男性的死亡率比率在每个年龄组内都要低于前一表中两性别结合考虑时的相应的比率,但是年龄在调整后,15—64岁内的比率要大于前表中的数字。这张表似乎说明在工作年龄内,非白人已婚男性对白人已婚男性的相对处境要好于整个非白人对白人的相对处境。

表4显示了白人与非白人在寡居方面的比较。此表是从Schoen-Nelson

(1974)对于1961—1971年期间数据的历史调查所得出的婚姻状况表中提取编写的。因这些估算基本上来源于调查数据,因此婚姻生活建构的过程对于结果只有很小的影响。

表3 不同肤色已婚男性的死亡率差异:1970^a

年龄	白人	非白人	$(2) \div (1)$
	(1)	(2)	
15—64(全部)	6.15	8.91	1.45
15—19	1.44	2.73	1.90
20—24	1.36	2.90	2.13
25—29	1.36	3.21	2.35
30—34	1.33	3.25	2.44
35—39	2.72	5.36	1.97
40—44	2.69	5.50	2.04
45—49	7.38	11.45	1.55
50—54	7.21	11.03	1.53
55—59	15.04	18.80	1.25
60—64	23.48	25.92	1.10

资料来源:通过 Sutton 1977 的生命统计调查资料计算。

^a对普查漏计进行比率修正。

^b通过未加权的、平均的、1970 年白人与非白人男性各年龄组死亡率分布而进行了年龄修正。

表4 不同肤色的妇女在其 1000 个结婚年中的寡居数:1961—1971

寡居开始年龄	白人	非白人	$(2) \div (1)$	配偶死亡的大致年龄
	(1)	(2)	(3)	(4)
(所有年龄)14—64	9.04	14.87	1.64	20—69
14	0.00	0.00	—	—
15—19	2.84	3.88	1.37	20—24
20—24	1.12	4.09	3.65	25—29
25—29	1.31	3.41	2.60	30—34
30—34	1.83	4.24	2.32	35—39
35—39	3.35	6.38	1.90	40—44
40—44	5.55	6.82	1.23	45—49
45—49	8.50	17.68	2.08	50—54
50—54	13.36	24.71	1.85	55—59
55—59	22.40	29.02	1.30	60—64
60—64	32.13	53.80	1.67	65—69

资料来源:Sutton(1977)和 CPS(1971)的表格。

注意表 4 最右 -栏配偶的去世年龄仅是从前面各表中推算出来的一个大概的估计数。以 5 年划为 -组,假设男性比他们的妻子大 5 岁左右,这 -设想估计问题不大。这张表与前两个表相比显示了在寡居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肤色差异。还应注意的是,为了比较已婚男性的死亡率,我们可以直接比较每 1000 个已婚妇女中的寡妇数,但我却用 L_x 值的方法来测量寡居的比率,即考察每一年龄组内的人口中一定个人结婚年数中的寡居数。我在表 4 中计算出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比每 1000 个已婚妇女的寡居数大。

将这种种族差异的观点应用到婚姻的持久性上,我在表 5 中显示了与婚姻相联系的寡居的持久性,又一次显示出更大的差别。这些结果或许部分是由于前面表中的条件所致;如果婚姻状况持久性上的种族差异致使每 1000 个结婚年的寡居数在不同肤色的群体之间的差别增大,那么寡居的持久性本身可以部分地解释非婚状况的具体特征(是寡居呢还是其他情形)。

表 5 每 1000 结婚年中的个人寡居年数:美国妇女
1961—1971 年间的婚姻生活状况表

妇女的年龄	白人	非白人	$(2) \div (1)$
	(1)	(2)	
(全部年龄) 14—64	70	133	1.90
14—19	1	2	2.00
20—24	1	4	4.00
25—29	2	7	3.50
30—34	4	15	3.75
35—39	7	24	3.43
40—44	13	36	2.77
45—49	27	64	2.37
50—54	50	120	2.40
55—59	94	186	1.98
60—64	172	320	1.86

资料来源:参见表 4。

当考虑到死亡对遗属的影响时,我们通过表 6 看到,非白人成年男性的死亡与白人成年男性相比对他们的下一代造成影响的程度。通过对孩子生活期内孤儿持久性的估测,我们发现:丧父的孤儿比寡居妇女在各种人口比率方面存在着更大的肤色差异。

近年来,起码 -直到 1975 年,一些事实迫使我们认真地考虑死亡率对于遗属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种族与肤色的差异。事实之一就是:死亡率

的女性低男性高的不对称的状况在继续扩大。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男性死亡率没有变化,而女性的则在降低。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男性与女性的死亡率虽都显著下降,但女性的幅度更大 (Metropolitan Life, 1977a)。到 1975 年,男性预期寿命为 68.5 岁,女性为 76.4 岁。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是增加了女性在其一生中成为寡妇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孩子在 18 岁成年以前成为丧父孤儿的可能性。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妇女有一个比她年轻 20 岁的儿子,那么她有 25% 的概率比她的儿子活得更长 (Metropolitan Life, 1977a)。

表 6 每 1000 个未成年 (18 岁以下) 的儿童年中丧父孤儿童数^{*}

	全部	在婚姻的结合中	非白人对白人的比率	
			全部	在婚姻结合中
低于 18 岁的儿童				
白人	16.09	17.12	3.05	3.34
非白人	49.13	57.15		
低于 12 岁的儿童				
白人	8.93	9.41		
非白人	34.14	39.12	3.82	4.16
低于 6 岁的儿童				
白人	5.15	5.39		
非白人	22.10	24.98	4.29	4.63

资料来源:参见表 4。

*根据儿童死亡率进行了调整。

预期寿命的肤色差别怎样呢? 在 1969—1971 到 1975 年期间, 非白人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增加了 3 岁。这个快速的增长和过去几十年中的缓慢增长以及 1960—1970 年期间非白人男性预期寿命的微弱下降形成对比。无论是 1960—1970 年期间, 还是目前非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提高的阶段, 性别的差异一样存在, 而且总是有利于妇女。无论是白人还是非白人群体, 妇女寡居率和丧父儿童的数量都在增加。

结 论

死亡率肤色差异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人口的健康条件及“幸福感” (Well-being) 的群体差异上, 本文另辟蹊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死亡率的肤色差异, 把注意力集中于成年男性的早亡对其家庭成员 (遗孀及孤儿) 所造成之后果的研究上。对妇女孀居期及丧父孤儿期的统计测量表明: 这些方面不利于非白人

的肤色差异超过了男性死亡率的肤色差异值。种族死亡率的差异受到性别死亡率差异的影响,但并不显著。这些人口学的测量只是显示出了现在研究的一些状况,为了进一步研究男性死亡率对其家庭所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计算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及这种损失的种族差异,这些研究将能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Dublin, Louis L., and Alfred J. Lotka, 1930, *The Money Value of a Man*.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Fuchs, Victor, 1965. "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imeographed)

Fuchs, Victor, 1974. *Who Shall L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Keyfitz, Nathan, and Antonio Golini, 1975, "Mortality Comparisons: The Male-female Ratio." *Genus* 31 (1-4): 1-34.

Kitagawa, Evelyn M., and Philip M. Hauser, 1973, *Differential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1977a, "Current Patterns of Dependency." *Statistical Bulletin* (January): 10-11.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1977b, "Expectation of Life Among Non-whites." *Statistical Bulletin* (March): 5-7.

Preston, Samuel H., Nathan Keyfitz, and Robert Schoen, 1972, *Causes of Death*. New York: Seminar Press.

Schoen, Robert, 1975, "Constructing Increment-decrement Life Tables." *Demography* 12: 313-324.

Schoen, Robert, and Verne E. Nelson 1974, "Marriage, Divorce, and Mortality: A Life Table Analysis". *Demography* 11: 267-290

Sheps Mindel C. 1958 "Shall We Count the Living or the Dea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59: 1210-1214

Sheps, Mindel C. 1959, "An Examination of Some Methods of Comparing Several Rates or Proportions." *Biometrics* 15: 87-89.

Sutton, Gordon F., 1971, "Assessing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Disadvantages of the Black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Biology* 18: 369-383.

Sutton, Gordon F. 1977,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Race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Upon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Demography* 14: 419-430.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1, June, 1971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Microdata file copy at

Madison, Wisconsin: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 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 D.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 No 5. Rockville, Maryl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U. 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73, "Mortality Trends: Age, Color, and Sex; United States, 1950—1969." *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Series 20*, No. 15.

Weisbrod, Burton A., and W. Lee Hansen, 1968, "An Income-net Worth Approach to Measuring Economic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315—1329.

(刘京雷译, 王勇校)

加拿大的族群与迁移

弗兰克·托维托(Frank Trovato)

S. S. 哈里(S. S. Halli)

大量事实表明,迁移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人口、经济因素的函数(Thomas, 1938; Ravenstein, 1885; Bogue, 1959; Lee, 1966; Shaw, 1975; Ritchey, 1976; Petersen, 1975);但是,关于北美社会中文化因素与地理流动的关系则很少得到系统研究,特别是在考虑到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和多元化时,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长期以来社会人口学主要关注于影响族群间的生育率差异的文化研究(如 Kiser et al., 1968; Burch, 1966; Balakrishnan et al., 1980),对死亡率的文化差异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 Kitagawa and Hauser, 1923)。这说明人口行为中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普遍的(Bean and Frisbie, 1978)。本文揭示了加拿大族群间的迁移差异,以期提供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文章首先进行了文献综述,指出关于加拿大的族群与地理流动间的解释存在几个主要假说。这里介绍三个假说:社会特征假说(social characteristics hypothesis)认为,迁移差异是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职业和其他综合变量的差异的函数;族群影响假说(ethnic effect hypothesis)则指出,族群之间的地理移动的差异的原因不在于以上因素,而在于族群本身;而结构一保障假说(structural-insecurities hypothesis)则认为,除了以上两者之外,族群与社会特征的共同作用对

* 本文译自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杂志 1983 年第 17 卷第 2 期,第 245—267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纽约迁移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Inc.)的同意,谨此致谢。

各族群的迁移差异也具有重要影响。显然,这三个假设来自社会人口学中关于种族、族群和少数群体各个方面研究文献。

一、假说的发展

1. 社会特征假说

在大部分人口学著作里都多多少少提到这个假说,标准的程序是根据年龄、性别、城乡居住方式、宗教、收入等,对人口现象如生育率、死亡率或迁移的差异做出分析,这暗含着一个前提:因变量的差异是社会人口特征的函数。

例如,在各个人口中都发现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迁移倾向:年轻人的流动性大于老年人,29岁左右是迁移的顶峰年龄(Stone, 1978; Ritchey, 1976)。教育、收入、职业与迁移也密切相关,在流动者、非流动者和经常迁移者中,这些因素存在重大差异(Shaw, 1975; Bogue, 1959; Ritchey, 1976; McInnis, 1971; Wolpert, 1965; Thomas, 1938; Lee, 1966)。针对这一点,里奇(Ritchey, 1976)评论说,“一般来说,迁移率与社会经济地位有直接关系。”处于有利的社会位置的个人对于在其他地区存在的社会经济机会有较高的洞察力,他们对于迁移的心理与物质成本的承受能力也高于社会阶级等级中的其他人,这一事实说明了综合因素(如教育、收入、职业)的重要性(Lee, 1966; Burch, 1978)。这仅是经验层次上的解释,需要根据社会人口特征来分析这种差异性,这些社会人口特征如年龄、收入、教育、职业往往强烈地影响着迁移倾向。

2. 族群影响假说

族群可以看做是社会人口特征中的一个方面,它反映了文化、社会、心理和结构诸多因素。族群影响假说是与社会特征假说相竞争的学说。在分析加拿大的迁移差异时,斯通(Stone, 1969: 83)将族群影响假说的实质阐述为:

族群身份和迁移率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也许这种关系是附属性的,反映的是迁移和社会特征与另外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加拿大亚文化的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特征与迁移倾向有直接的关系。

因而,可以说除了社会人口特征之外,族群也是一个重要的自变量,具有独立的影响。如果这是真实的,关于族群因素影响的效度只有通过多变量统计模

型才能得到检验。

族群因素可能会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对迁移产生影响。它可能反映在鼓励或反对特定群体迁移的亚文化规范。例如,里奇(Ritchey, 1976: 33)指出,在美国,黑人的迁移率通常是较低的,而一旦发生大规模迁移时,存在一种方向性的倾向,即涌向其他黑人已经定居的大城市中心地区。兰森和缪勒(Lansing and Mueller, 1973)发现,家庭和朋友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某一群体的家庭价值取向越强,个人做出赞成独立于所居住社区的决定的可能性越大(Ritchey, 1973)。

与社区内亲戚朋友的社会纽带和亲和性也十分重要。乌伦伯格(Uhlenberg, 1973)发现,在1860—1920年间从美国南部迁出的黑人数量很少,尽管受到了当时所居住社区很多“推力”因素以及北方工业中心的“拉力”因素的共同作用。日裔美国人和阿拉契亚地区的居民中间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对此,乌伦伯格(Uhlenberg, 1973: 304)解释道:

与当地社区的整合和依赖程度是迁移的一个社会限制因素,同化于新社区的可能性是另一个因素。这导致一个假设,即个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越强,他与家庭网络的纽带越密切,则对他进行迁移的潜在限制程度也越大。

除了社会关系、社区联系和家庭主义所反映出来的行为规范性的影响之外,由于各族群具有的接受同化和整合于原居住地之外的其他社区的能力不同,各族群的国内迁移比例是不同的(Breton, 1971)。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因素——如有效地用英语交谈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加拿大的族群都乐于使用英语(Pannu and Young, 1977),有些则干脆拒绝使用(如法裔加拿大人)。

另外一种途径是从历史角度分析对于迁移的独立的族群因素的影响。一些移民族群集团最初定居在大城市中心,由于可以得到一系列资源,如工作、事业、住房、教育、与本族其他成员易于接近,他们就定居下来(Kobrin and Goldseheder, 1978)。例如,在加拿大,意大利裔占总人口的3%,而其中的几乎60%居住在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由于这些城市的居住条件较好,意大利裔的地理流动率是较低的。又例如,作为少数族群的法裔加拿大人,其90%以上居住在魁北克省。像这些群体在加拿大的流动水平受它们的历史经历和居住地区的影响。

3. 结构—保障假说

宾和弗里斯比(Bean and Frisbie, 1978: 3—5)在他们关于研究种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学的文献回顾中,将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定义为:

这种方法是企图在亚文化群体人口进入并同化于主流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的程度方面,寻求一种解释。……基本的假设……在于,亚文化群体人口形成少数民族,就是说其成员受到一系列歧视行为的群体在社会等级中常常处于较低位置,这说明了一种可能性,即群体成员的身分及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相互作用,影响着人口行为。

这种解释认为少数群体的个人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压力。例如,关于少数群体地位和生育率的文献表明,与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相关联的不安全感导致少数民族夫妇们有意识地将家庭规模限制到平均规模以下,以便巩固已取得的社会成就。这就是所谓的“结构—保障”效应(Goldscheider and Uhlenberg, 1969; Bean and Frisbie, 1978; jibou and Marshall, 1977; Lopez and Sabagh, 1978)。李在他的理论争论文章(Lee, 1966: 53)中认为,如同其他人口行为一样,将迁移与“结构效应”相联系是可行的。李将族群差异与歧视、迁移这样联系起来:

人口的多样性暗示着某些群体的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高于其他群体,种族和民族间的歧视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当然每个地方的歧视程度是不一样的。虽然歧视会导致贫民区的建立,但也会导致人们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的大规模迁移。

二、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评价以上描述的几个假设,数据来自加拿大人口普查的1971年人口抽样样本,样本是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包含着百分之一人口的个人信息,如年龄、性别、教育、职业和族群,根据族群成分对20—70岁之间的人进行了选择与划分。族群的定义根据人口普查所列的一项问题:“在来新大陆时,你或你的祖先(男系)属于哪个民族?”样本容量最初定为181000人,后缩减到98198人,删去了在1966—1971年间迁入加拿大的人数。这有助于避免迁移倾向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因为新移民不可能在刚移居加拿大后就立即变动居住地。样本包括六个族

群：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乌克兰人，除了犹太人之外，都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族群，他们代表了加拿大的文化主体，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创建国家的族群（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其他几个族群被认为在文化上和制度上是高度组织化的（Reitz, 1980；Breton, 1971；Richmond, 1969）。

因变量是1966—1971年期间流动类型，共有四种：（1）不流动（NM）；（2）在同省、同县范围内迁往他市（MDMSCSP）；（3）迁往同省其他县（MDCSP）；（4）迁往他省（MDP）。在分析的时候因变量泛指迁移。大致来说，这些可以代表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流动类型。^① 遗憾的是，关于迁移前居住的城市和省的数据得不到，否则这些资料可能会更有助于对流动的深入研究。

数据分析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交叉表分析（crosstabulations），检查不同民族地理流动的差异；第二步，建立包括迁移、族群、教育等诸因素的对数一线性模型（log-linear models）。对数一线性分析采用迭代过程（iterative procedure）以得出对特定假设的最大可能性估计，数据用多维列联表排列（multi-way contingency table）（Feinberg, 1977）。这里不能采用回归方法和变量分析方法，因为标准变量是定类的。

在研究过程中，年龄是条件变量，样本分为两个年龄组：20—29岁和30岁以上，这样划分的原因在于加拿大人迁移的高峰年龄是29岁（Stone, 1978）。进一步从实际运算角度的考虑也会将年龄分为两组：对最初的数据分类发现，如对两个以上年龄组进行分析时会有许多局限，因为有的组格中频数太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为零。

三、交叉表分析

表1说明族群和迁移间存在双重关系。犹太人和意大利裔中不流动者比例最高；英国裔和德国裔不流动者比例最低；同一县范围的流动者，法国裔、德国裔、英国裔最活跃；犹太裔和意大利裔在1960—1971年间很少迁到同一省内的其他县；迁到省外的大多为德国裔和英国裔。意大利裔、法国裔、犹太人中迁移的倾向依次最低，乌克兰裔居于中间。

^① 这种表示距离的方式在迁移研究也是有一定问题的。例如，有时从一省流向另一省距离很短，特别是当流动发生在邻省时；但是不论地理距离多近，省际流动往往伴随着更大程度上的心理的调适。因而，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不一定完全一致。

表 1 加拿大族群流动类型, 1966—1971^a

流动类型 ^b	族群						总计
	其他	美国裔	法国裔	德国裔	意大利裔	犹太人	
不流动 (NM)	N 79.2	38413 77.6	26121 79.6	5460 76.5	3153 90.2	1581 90.5	2849 81.2
流往同县内其他市 (MDMSCP)	N 4.8	2355 4.8	1964 6.0	403 5.6	121 3.5	52 3.0	147 4.2
流往省内其他县 (MDCSP)	N 10.5	5690 11.5	3851 11.7	812 11.4	160 4.61	51 2.9	312 8.9
流往其他省 (MDP)	N 5.5	724 6.1	3042 2.7	875 6.5	462 1.8	63 3.6	199 5.7
总计	N 13191	49500 100.0	32811 100.0	7137 100.0	3497 100.0	1746 100.0	3507 100.0

^a 1103.0912^b 本表及以下各表的数据来自 1971 年加拿大人口普查的 1/100 抽样调查材料。^b 本表及以下各表不包括那些 1966—1971 年间迁入加拿大的移民。

表2 出生于加拿大的人口的族群流动类型,1966—1971

流动类型	N	族 群						总计
		其他	美属裔	法国裔	德国裔	意大利裔	犹太人	
不流动 (NM)	N	5675	33238	25668	3610	793	915	2195
	%	77.2	77.4	79.6	74.7	85.0	89.0	79.0
流向同县内其他市 (MDMISCSP)	N	376	2049	1915	278	30	31	119
	%	5.2	4.8	6.0	5.7	3.2	3.0	4.3
流向省内其他县 (MDCSP)	N	855	4993	3777	593	84	35	282
	%	11.6	11.6	11.7	12.3	9.0	3.4	10.2
流向其他省 (MDP)	N	142	2651	848	352	27	47	180
	%	6.0	6.2	2.7	7.3	3.0	4.6	6.5
总计	N	7348	42931	32208	4833	934	1028	2776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 759.61499$

表3 出生于国外的加拿大人的族群流动差异,1960—1971

流动类型	族群						总计
	其他	英国裔	法国裔	德国裔	意大利裔	犹太人	
不流动 (NM)	N 4768	5175	433	1850	2360	666	654 15925
	% 81.6	78.8	75.0	80.3	92.1	93.0	89.5 82.4
流向同县内其他市 (MDMSCSP)	N 263	306	49	125	91	21	28 883
	% 4.5	4.7	9.8	5.4	3.6	3.0	3.8 4.6
流向省内其他县 (MDCSP)	N 530	697	74	219	76	16	— 30 1642
	% 9.1	10.6	12.3	9.5	3.0	2.2	4.1 8.5
流向其他省 (MDP)	N 282	391	27	110	36	15	19 880
	% 4.8	6.0	4.5	4.8	1.4	2.1	2.6 4.6
总计	N 5843	6569	603	2304	2563	718	731 19331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hi^2 = 383.2791$

出生地是影响人口地理流动的重要因素(Stone, 1978; Long and Boerstein, 1976)。例如,《加拿大统计》(Statistics Canada, 1977: 20)指出:“在加拿大,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是城市间流动最活跃的。”斯通(Stone, 1974)认为,一般而言,本土出生的人比在国外出生的人的流动率会更高些。在对几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朗和布尔斯特林(Long and Boerstein, 1976)发现,加拿大、美国的城市间的流动率高些,因为移民大部分来自世界上其他地方,这意味着在加拿大,出生于国外的人比出生于本土的人更富有地域流动性。

我们的分析不同意朗和布尔斯特林对加拿大流动情况的结论。将表1、2、3的所有栏目做一对比,可以发现本土出生的和国外出生的加拿大人之间的流动率不存在明显差别。虽然国内出生的加拿大人更具有流动性,但不足以明显区别于国外出生的人。而且,除了不流动类型(NM)外,出生地所造成的每一类流动的差异性一般很小,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没有给出显著性检验),因而进一步的分析应将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层的本土出生的人和国外出生的人结合起来。

表4为一个与三维六序列表相关联的卡方值(χ^2)。全部数值都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说明流动形式确实与民族有关。迁移、民族和以后谈到的第三个变量间关系的实质,在后面一系列三维交叉表分析中可以看到(表中未显示)。一般地说,结果证实了表1、表2、表3所揭示的模式。

表4 控制第三个变量后反映1966—1971年间流动类型和族群的关系的 χ^2 值

复合分组		χ^2	自由度	显著水平
1. 族群流动种类	年龄			
	20—29	662.17	15	0.001
	30+	534.00	15	0.001
2. 族群流动类型	性别			
	男	576.45	15	0.001
	女	531.39	15	0.001
3. 族群流动类型	婚姻状况			
	单身	256.22	15	0.001
	已婚	842.64	15	0.001
4. 族群流动类型	其他	71.10	15	0.001
	职业			
	没有工作	342.03	15	0.001
	专业人员	203.50	15	0.001
	其他	552.26	15	0.001

(续表)

复合分组		χ^2	自由度	显著水平
5. 族群流动类型	收入			
	0—9999	501.83	15	0.001
	10000—19999	363.06	15	0.001
6. 族群流动类型	20000 +	269.81	15	0.001
	教育			
	初等	236.73	15	0.001
	中等	467.60	15	0.001
	高等	249.84	15	0.001

四、对数一线性分析

表 5 和表 6 给出了个人年龄在 20—29,30 岁以上的对数一线性分析结果, 这里最大相似性统计值 (maximum likelihood statistics) G^2 用来检测表中每个模型变量的统计独立性, 显著性值用来解释与有关变量的假设。

下面是将被检验的假设模型和相应的描述。各变量定义如下:

1 = 1966—1971 年间流动类型;

2 = 特征变量 (如教育);

3 = 族群。

模 型	研究假设
1. (1)(2)(3)	测量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2. (13)(23)	特征: 族群变量既定情况下, 流动类型和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
3. (12)(23)	族群效应: 特征变量既定情况下, 流动方式和族群之间的关系
4. (12)(13)(23)	结构影响: 流动方式既定情况下, 族群和特征变量之间的互动。

在表 5 中, 模型 1 是测量三个变量间的独立性。 G^2 数值显著, 这说明这两个年龄组的所有变量是相互关联的。模型 2 是验证特征假设, 用古德曼 (Goodman, 1970: 234) 的话来说, 该模型的零假设 (null hypothesis) 可以表述为: “在变量 3 (民族) 既定的情况下, 变量 1 (流动) 和变量 2 (教育) 有条件地独立。”因此, 特定类别的族群的迁移和教育之间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 5 中的模型 3 是测定族群效应假说, 洗明在教育水平既定的情况下, 族群与迁移显著相关, 结论同样适用于这两个年龄组。最后一个模型是测验族群与教育的相互作用, 是对结构效应的测量——族群与教育的共同作用对迁移的影响程度。假说的检验支持对这两个年龄组的分析。

表 5 关于加拿大的迁移^a、族群^b、教育^c之间关系

的对数一线性模型的分析

模型	自由度	年龄			
		20—29		30 ^d	
		χ^2	G^2	χ^2	G^2
1. (1)(2)(3)	61	2629.60	2370.02 ^d	8295.07	8013.21 ^d
2. (13)(23)	36	387.521	397.91 ^d	1175.54	1110.10 ^d
3. (12)(23)	45	491.83	547.60 ^d	551.73	620.95 ^d
4. (12)(13)(23)	30	24.65	26.82 ^d	44.36	44.02 ^d

三个变量的划分如下:

^a 迁移 1966—1971 年期间;

^b (NM) 小流动

(MDMSCSP) 在同省同县的城市间流动

(MDCSP) 在同省的不同县间流动

(MDP) 省际流动

^c 族群的定义是根据调查对象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来新大陆时, 你或你的祖先(男系)属于哪个民族?”这六个民族是: 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

^d 教育(在正规学校受教育的年数)分 3 组:

1) 初等(0—8 年); 2) 中等(9—13 年); 3) 高等(14 年以上)。

^e 显著性水平 $p < 0.001$

以上结果表明, 这三种效应——特征、族群、结构——对加拿大的流动形式有很大影响。因而, 流动、教育、种族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关系, 这种关系同时包含着这三种假说。现在通过分析一个假说的对数一线性模型的 U 值来研究这三个变量间的关系的性质, 因为如果列出所有这三个模型的 U 值, 则要占据过多的空间^①。表 6 和表 7 给出了结构—保障模型 (12)(13)(23) 的相应系数。

从表 6(A 组) 中 U 值的符号判断, 20—29 岁年龄组的族群与迁移的关系与表 1 中所提到的模式相当一致。例如, 在不流动(NM)类型中, 表 1 和表 2 中意

① 如果需要可列出全部表格, 其他表的分析结果与表 6 和表 7 没有明显差异, u 值虽有细微的不同, 但关系的模型和方向大体上一致。

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比例最高,仔细分析这两个表就会发现其他相似性。表 6 (A) 中,法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 U 系数为正值,这说明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更可能流向同县的其他城市 (MDMSCSP)。除犹太人外的所有少数族群,倾向于流向同省的其他县 (MDCSP);但是意大利人的倾向最小 (+0.006)。乌克兰人、犹太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 1966—1971 年间依次序倾向于流往他省 (MDP)。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省际流动倾向显著偏离于这种趋势。

表 6 与表 5 中 20—29 岁年龄组对数—线性模型

(12) (13) (14) 相对应的 U 值

		L 值			
(A)	族群	迁移 (20—29 岁年龄组)			
		(NM)	(MDMSCSP)	(MDCSP)	(MDP)
	英国人	-0.292	-0.020	+0.114	+0.198
	法国人	-0.112	+0.220	+0.295	-0.403
	德国人	-0.403	+0.092	+0.089	+0.222
	意大利人	+0.683	-0.107	+0.006	-0.583
	犹太人	+0.415	+0.069	-0.724	+0.241
	乌克兰人	-0.291	-0.254	+0.220	+0.323
(B)	教育	迁移 (20—29 岁年龄组)			
		(NM)	(MDMSCSP)	(MDCSP)	(MDP)
	初等	+0.238	+0.265	-0.252	-0.251
	中等	-0.037	+0.046	+0.031	-0.0389
	高等	-0.201	-0.311	+0.222	+0.291
(C)	教育	民族 (20—29 岁年龄组)			
		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初等	-0.039	+0.666	+0.083	+0.838
	中等	+0.117	-0.084	+0.098	-0.309
	高等	-0.079	-0.582	-0.181	-0.531
				犹太人	乌克兰人
				-10.253	-0.296
				-0.083	+0.261
				+10.336	+0.036

从表 6(A)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乌克兰人、犹太人、德国人、英国人迁往它省的倾向最强;(2) 法国人、乌克兰人、英国人易于流向同省的其他县;(3) 法国人、德国人、犹太人(后两者相对来讲程度较低)最倾向于在同省同县内的城市间流动;(4) 在不流动的类型中,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集中程度是最高的。

表 6 的其余两部分说明教育水平越高,流动倾向越大(见 B 部分);从族群和教育两方面说,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教育程度最高,而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所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最低(见 C 部分)。令人感兴趣的是,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不

流动性十分接近,但是他们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状况显著不同。也许这两个族群被同一个因素所影响,所以地域流动性低。为今后研究提出的一个可能性是他们都与原居住地社区存在着很强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另外也有可能存在一种历史因素。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最初移居加拿大时,他们建立了高度整合、具有强烈内聚力的城市社区,这使得他们正式地和非正式地依赖于他们在加拿大已接受下来的居住地。

表7(A)给出了30岁以上年龄组流动类型与民族的关系模式。从表中可以看出,与前面所讨论的20—29岁年龄组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24个系数中,只有5个偏离表6中U值的方向。事实上,不流动类型组(NM)的U值符号完全一致,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更倾向于不流动;法国人更倾向于在同省内流动;英国人和德国人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省之间的流动大于原居住地区内部的流动;乌克兰人除了省际流动倾向外,其他流动倾向都是消极的。

表7 以表5中30岁以上年龄组对数—线性模型
(12)(13)(15)相对应的U值

			U值			
	族群	迁移(30岁以上年龄组)				
		(NM)	(MDMSCSP)	(MDCSP)	(MDP)	
(A)	英国人	-0.225	-0.189	+0.233	+0.181	
	法国人	-0.145	+0.179	+0.434	-0.469	
	德国人	-0.348	-0.083	+0.185	+0.246	
	意大利人	+0.159	+0.105	-0.121	-0.143	
	犹太人	+0.654	+0.067	-0.646	-0.075	
	乌克兰人	-0.095	-0.078	-0.085	-0.258	
(B)	教育	迁移(30岁以上年龄组)				
		(NM)	(MDMSCSP)	(MDCSP)	(MDP)	
	初等	+0.381	+0.168	-0.130	-0.419	
	中等	+0.000	-0.028	+0.011	+0.016	
	高等	-0.381	-0.140	+0.119	+0.403	
(C)	教育	民族(30岁以上年龄组)				
		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	意大利人	犹太人
	初等	-0.460	+0.333	-0.058	+0.787	-0.702
	中等	+0.275	-0.131	+0.143	-0.255	-0.022
	高等	+0.185	-0.202	-0.085	-0.531	+0.724
						乌克兰人

五、讨 论

从上面可以看出,对数一线性分析的结果支持上面所讨论的全部假说。在排除教育因素后,民族对迁移方式有影响,这一事实说明非经济因素是决定迁移差异的重要因素^①。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流动模式说明,对地方社区的依赖性、低同化倾向、强烈的亲属关系是他们低流动倾向的重要决定因素(Kobrin and Goldscheider, 1978; Berardo, 1967; Uhlenberg, 1973; Toney, 1976; Breton, 1971; Choldin, 1973; Lee, 1966; Duncan and Lieberson, 1959; MacDonald and MacDonald, 1964)。法国人主要有两种流动方式——同县内城市间流动和同省的县际间流动,毫无疑问这是他们主要集中在魁北克省的反映,该省聚集了加拿大的大部分法国人,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民族纽带根植于这个地区。对于英国人来说,省际流动是一般倾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在加拿大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使得他们在适应新的环境时压力较小,与其他族群相比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而也更强。德国人比其他族群更富有流动性,这可能反映出文化因素加强了流动倾向。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结构原因——在面对主流社会时该群体的反应。德国人同化于盎格鲁文化的倾向十分强烈,这是他们迁移过程的重要原因(Pannu and Young, 1977),因为他们很快就同化了,于是对流向新的环境的不安全感就不是那么强烈(Uhlenberg, 1973)。乌克兰人的流动方式非常接近于英国人(特别是20—29岁年龄组),从地理上讲,乌克兰人主要集中在三个相邻的省份——萨斯喀彻温省、艾尔博塔省、马尼托巴省——加拿大大草原地区,乌克兰人的流动方式部分地受这些省份之间相邻性的影响,不过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可能也是很重要的。

^① 对流动种类、族群、职业的单独的对数一线性分析结果没有偏离于将教育作为第三个变量而作的分析结果。下面给出了包含职业的模型分析的 G^2 和 χ^2 值,由于篇幅所限, u 值没有给出。

表 8 迁移、族群^a 和职业间关系的对数一线性分析模型

模型	自由度	年 龄			
		20—29		30 ^c	
		χ^2	G^2	χ^2	G^2
1. (1)(2)(3)	61	4944.10	44103.00 ^b	2368.47	2373.74 ^b
2. (13)(23)	36	6338.75	4586.78 ^b	510.44	462.87 ^b
3. (12)(23)	45	5146.17	4588.42 ^b	679.17	762.90 ^b
4. (12)(13)(23)	30	1652.66	1639.97 ^b	44.06	43.89 ^b

^a 变量叙述见表 5;职业分为三类:1) 无业;2) 专业人员;3) 其他职业。

^b 显著水平 $p < 0.01$

六、结 论

迁移差异不仅可以从社会、人口或综合因素的差异角度解释,也可以从民族影响角度来解释。然而已有的数据仍不能让我们说明民族因素对人口迁移究竟有哪一种具体的独立的影响。但注意到有一些可能性解释它的影响,相关的鼓励或限制迁移的因素很多,如亲属关系、社区资源、适应新环境的不安全感、群体亲和力、文化规范等,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需要由未来的研究来证实。

本文中所描述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采用了三个解释模型:社会特征假说、民族影响假说、结构—保障假说,这三个假说已证明是相互关联的,下一步的研究应将这三个假说的各个因素进行分解。例如,对社会特征假说,我们应该具体检验各个变量,比如年龄,应问道:年龄是如何影响迁移的?至于族群影响假说,则有两种途径:(1) 进行专题调查。将族群因素分离出来;(2) 利用现有的二手资料,尽可能多地利用“族群的”因素,建立一个多变量分析框架,以使文化规范、与社区的社会联系、历史影响以及家庭和亲属关系等对迁移的影响可以得到评估。从结构—保障假说的观点来看,将不断恶化的社会的、心理的不安全感以及这些不安全感又是如何影响各少数民族迁移倾向的社会结构当中的原动力(如歧视)区别出来是十分必要的。

上面的这些目标可以借助于民族—少数民族迁移差异的一般理论解释。曼哥拉姆和斯瓦兹韦尔(Mangalam and Schwarweller, 1970)对此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认为,正如帕森斯和希尔斯(Parsons and Shils, 1951)所宣称的,人类行为可划分为三个系统:文化系统、结构系统和人格系统,前面所讨论的三个假说

可以看作分别与帕森斯和希尔斯的观点相对应。图1对这些对应关系做了总结,是对行为理论系统和民族—少数族群迁移差异的原因之间的关系的图解,通过对该图表的仔细分析,可以确认,本文前面所表述的主要思想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行为理论系统	族群迁移差异的原因
I. 文化系统(价值系统、思想系统、行为规范系统)	1. 亚文化影响(鼓励或阻止迁移的规范,家庭价值取向、亲属关系、社区纽带)
II. 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制度结构,报酬和资源分配系统)	2. 历史影响(第一代移民或上代移民的居住格局) 3. 冲突和歧视(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导致民族和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不安全感的社会位置安排)
III. 人格系统(个人行动取决于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系统,资源的个人评估及资源最优化)	4. 成就与社会流动期望(在获取预期的目标中对流动的作用进行得与失的理性评估)

图1 行为理论系统和族群迁移差异原因

参 考 文 献

Balakrishnan, T. R. et al., 1980, *Trends and Factors of Fertility in Canada*.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Bean, F. D., and W. P. Frisbie, 1978, *The Dem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erardo, F. M., 1967, "Kinship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Space-Age Migra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9(3): 541—553.

Bogue, D. J., 1959, "Internal Migratio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Edited by P. M. Hauser and O. D. Dunc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eton, R., 1971, "Institutional Completeness of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Immigration." Edited by B. R. Blishen, F. E. Jones, K. D. Naegele and J. Porter. *Canadian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MacMillan of Canada; Toronto.

Burch, T. K., 1978,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London, Canada.

Burch, T. K., 1966, "The Fertility of North American Catholics: A Comparative Overview." *Demography*, 3: 174—186.

Choldin, H. M., 1973, "Kinship Network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

view, 7(2): 163—175.

Duncan, O. D., and S. Lieberson, 1959, "Ethnic Segregation and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304—374.

Feinberg, S. E., 1977,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Categorical Data*. Cambridge: MIT Press.

Goldscheider, C. and P. H. Uhlenberg, 1969,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ert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361—372.

Goodman, L. A., 1970,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Classific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65(329): 226—256.

Jiobu, R., and H. Marshall, 1977, "Minority Group Status and Family Size: A Comparison of Explanations", *Population Studies*, 31: 509—517.

Kiser, C. V. et al., 1968, *Trends and Variations in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tagawa, E. M., and P. M. Hauser, 1973, *Differential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obrin, F. E., and C. Goldscheider 1978, *The Ethnic Facto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Lansing, J. B., and E. Mueller, 1973,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Labo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1): 47—57.

Long, I., and C. Boerstein, 1976,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America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pecial Studies*, Series P-23. No. 64.

Lopez, D. E., and G. Sabagh, 1978, "Untangling the Structural and Normative Aspects of the Minority-Status Fertility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6): 1491—1497.

MacDonald, J. S. and L. D. MacDonald, 1964, "Chain Migration, Ethnic Neighborhood 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42: 82—97.

Mangalam, J. J., and H. K. Schwarzweller, 1970, "Some Theoretical Guidelin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2): 5—20.

McInnis, M., 1971, "Age,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Differentials in Interregionals Migration: Some Evidence for Canada", *Demography*, 8(2): 195—204.

Pannu, R. S., and J. R. Young, 1977, "Patterns of Language Loss/Retention Among Selected Ethnic Groups in Cana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Meetings,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June 1977.

Parsons, T., and E. H. Shils (eds.), 195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Harper.

Peterson, W., 1975, *Popu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avenstein, E. 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XLV III (Part 2): 167—227.

Ritchey, P. N. , 1976, "Explanations of 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 363—404.

Shaw, P. B. , 1975, *Migration: Theory and Fact*. Philadelphia: Reg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Statistics Canada, 1977, *Migration in Canada. Profile Studies of the 1971 Census*.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Stone, L. O. 1978, *The Frequency of Geographic Mobility in the Population of Canada*.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Stone, L. O. , 1974 "What We know About Migration Within Canada—A Selective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8(2): 267—281.

Stone, L. O. , 1969, *Migration in Canada: Regional Aspects*. Ottawa: Dominion Bureau of Statistics.

Thomas, D. S. , 1938, *Research Memorandum on Migration Differential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oney, M. B. , 1976, "Length of Residence, Social Ti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Demography*. 13(3): 297—309.

Uhlenberg, P. , 1913,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Nonmigration: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for Migration Theory". *Rural Sociology*. 38(3): 296—311.

Wolpert, J. , 1967, "Behavioral Aspects of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5: 159—169.

(李建东 译, 李 勇 校)

一个关于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社会理论

S. 雷伯森 (Stanley Lieberson)

“在种族关系中，有一种事件的循环 (cycle)，它趋向于在每一个地方都重复自身”。帕克 (Park)^①这句话可作为现在族群交往中竞争、冲突、适应、同化这些循环的经典序言。其他研究者则努力去明确阐述种族和族群间的最初接触所产生的阶段或步骤。^②然而，巴西和夏威夷的比较和谐的种族关系与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不断发生的种族骚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以说明描述——不是解释——种族和族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的困难。

许多早期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的循环实际上被狭义地定义为一个很具体的群体系列或接触情境。如波加德斯 (Bogardus) 把他的分析明确限定在针对美国西海岸的墨西哥裔和东方移民群体上，并指出这只是多种不同的关于移民和美

* 本文发表于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1, 第 26 卷第 6 号, 第 902—910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了美国版权所有者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Robert E. Park,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0, p. 150.

② 例如, Emory S. Bogardus, "A Race-Relations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January, 1930), pp. 612—617; W. O. Brown, "Culture Contact and Race Conflict" in E. B. Ritter, editor, *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pp. 34—47; E. Franklin Frazier, *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pp. 32 ff; Clarence E. Glick, "Social Roles and Types in Race Relations" in Andrew W. Lind, editor, *Race Relations in World Perspectiv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55, pp. 243—262; Edward Nelson Palmer, "Culture Contacts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Joseph J. Spengler and Ous Dudley Duncan, editors, *Population Theory and Polic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6, pp. 410—415; A. Grenfell Price, *White Settlers and Native Peoples*, Melbourne: Georgian House, 1950. 关于这些循环的各种观点的总结, 请看 Brewton Berry,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Chapter 6.

国本地人的关系循环中的一种。^① 与此相似,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普赖斯(Price)提出了三个阶段用之来说明讲英语的白种移民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②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关于种族和族群关系发展的基本理论,以系统说明不同社会中的族群间的交往在结果上是不同的,有种族主义战争、同化和融合以及种族灭绝等。本文还要指出种族和族群在社会层次上交往的关键问题是:最初每一个群体都维持和发展一种与自己在与其他族群交往之前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社会秩序。因此,任何交往过程中循环的症结必然会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强调这些地区早期循环过程中由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并不奇怪。^③

虽然我接受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本文提供的也是一个群体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统治另一个群体的实质的知识,但这对预测或解释种族和族群交往的最后和中间步骤只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先决条件。说得准确一点,制度因素被用来区分两种主要冲突情境:第一种交往使本地人服从于移民群体的控制,如南非的黑人—白人关系;或者另一种交往为移民群体屈从于本地种族和族群的影响,如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

在考虑了潜在于种族和族群交往的社会后果以后,就可以用移民优势地位和本地人优势地位形成的区别来检验下面种族关系的每一个方面:政治和经济控制、多重种族交往、冲突和同化。在下面的讨论中,“种族”和“民族”两个词将被交替使用。

交往的内在差别

大多数种族交往的情境至少包括一个本地群体和至少一个迁到这个地区的移民群体,在最初的接触时,唯一的例外是两个或多个群体移居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讲“本地的”(indigenous)并不必然意味着土著居民(aborigenes),而是指一个群体通过代代相传在一个地区“充分”定居下来,以至于占有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形式的制度和人口容量。所以,一旦给定一个地理空间,在不同时间跨度内就可能有不同的本地居民,如澳大利亚现在的本地

① Bogardus, *op. cit.*, p. 612.

② Price, *op. cit.*

③ 这里不包括城市内部的交往阶段。

人,大多数是白种人和源于英国的早期移民,尽管塔斯马尼亚人(Tasmanoids)和澳大利亚人(Australoids)曾经一度占领过这个地区。^①美国社会中本地居民中也可看到相似的种族移动。

在此,我们的讨论限制在最简单的接触情境,包括一个移民群体和一个已经定居的群体。我们一般可以看到在开始交往时,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本地人在移民到达之前已经拥有一套建立起来的、大约比较稳定的组织,如政府、适应环境的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资源的生存技术、亲属关系、社会分层和宗教系统等。^② 在一系列移民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理由确信,移民群体的原有社会秩序并不会全部完整地随他们移植到新的定居地。^③ 考虑到本地人的存在,以及迁移活动的人口选择性和习惯的不同,移民们需要至少做出一些制度方面的适应和革新。

例如,最近来自意大利和荷兰的战后移民显示了与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相比,移民在年龄和性别的很可观的选择性。1955年离开荷兰的30000名男性中间将近一半人的年龄在20—39岁之间,而荷兰只有四分之一的男性人口属于这个年龄段。^④ 与此相似,处于同一年龄段的40000多名意大利男性移民占1951年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在意大利全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约为30%。^⑤ 在这两个国家中,男性移民的绝对数超过女性移民,这种情况与其本国人口总的性别比是一致的。但这些例子远不如东方移民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极端。如1920年,在美国有38000名境外出生的华人成年男性,但同时只有2000名华人成年女性。^⑥

除了这些人口方面的变化因素,移民要想生存下去并要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居住国家的社会秩序,新的物质和生物的生存环境要求他们去修改和创建社会制度。本世纪初,东欧和南欧的农民迁移到美国城市工业中心,他们为研究职业追求中的剧变提供了一个有很好纪录的个案,并建立了与新的城市生活条件相适应的许多组织,如互助团体、民族性教堂及金融机构。

简而言之,当两个群体开始享有相同的习惯,而不共享同一的社会秩序时,每个群体都努力维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那些条件至少适合接触前在他们

① Price, op. cit., Chapters 6 and 7.

② Click, op. cit., p. 244.

③ 参见 Brinley Thom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Philip M. Haus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editor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 523—526.

④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57, pp. 147, 645.

⑤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54, pp. 131, 669.

⑥ R. D. McKenzie, *Oriental Exclu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p. 83.

内部存在的社会制度。两个相互交往的群体,他们维持制度的条件可以不同,而且经常是相互冲突的。例如,欧洲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交往导致了后者用于维持生存的资源被掠夺,部落和宗教式的组织被瓦解。对于一个群体维持社会制度的努力,我可以假设另一个民族群体的出现是其社会环境的重要部分。更进一步,如果处于交往中的群体影响并使得其他群体变化的能量是不同的,我们可望发现一个群体在维持或发展一个合适的环境时更具优势,而另一个群体处于劣势。

在这里,在一个单一的种族和族群关系循环过程中去维持或发展适宜环境的努力必然要失败,因为在试图预测群体交往会形成冲突还是较和谐的同化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区别族群之间相互从属的性质或形式。我们将扼要指出,在移民群体占优势、本地群体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种族关系循环(*race relations cycle*),明显不同于由占据优势地位的本地群体和处于从属地位的移民群体所构成的社会进程的阶段。^①

政治和经济控制

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经济和政治控制上,是因为假设对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控制有助于(至少是为了群体自己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环境,如对教育、宗教、亲属关系以及对语言这种主要的人类文化成果的控制。

1. 移民占优势(*Migrant Superordination*)。如果移到新的交往环境的群体在技术(尤其是武器)方面是先进的,而且组织得比本地群体更紧密,那么维持移民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便经常强加到本地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在两个群体的早期接触过程当中,当移民群体开始干涉本地人既定的秩序时,往往会发生战争,即使最初的接触是友好的,仍然会频繁地发生冲突。正如普赖斯(Price, 1950)注意到的以下事实那样,白人入侵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这些国家的结果是使本地人处于从属地位:

在殖民先驱者四处侵略的开放时期,白人让本地人染病而死,通过掠夺或不公平买卖占领他们的土地,杀死那些抵抗者,通过提供白人武器使当地部落间战争频繁发生,愚弄并破坏本地的宗教、社会和文化,常常把那些不幸的人压制到这样一种沮丧的状态,使他们既不想活,也不想生孩子,

^① 参见 Reuter 对两种直接交往形式的区分, E. B. Reuter, editor, op. cit., pp. 4-7

以避免孩子也遭受同样的厄运。^①

当本地人最终屈从于一个移民群体以后,他们的人数开始大量减少,这既可能是由于战争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性病和其他疾病的传播,或是由于生存条件遭到了破坏。除了普赖斯的这些讨论以外,大量的交往情境已载入了文献之中。^②

除了导致人口和经济的剧变,占优势的移民群体通常能形成政治统一体,它与交往之前本地人占优势时存在的边界线很不一致,如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建成的政治国家,包括先前那些各自独立的、经常相互发生战争的族群们所统治的地区。^③实际上,欧洲人和那些长期不和的部落间的联盟通常被当成白人在南部非洲进行领土扩张的一个支点。^④一个部落被分割到两个国家里,移民群体遍布于新建成国家的疆域,这两个方面都是移民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政治共同体一定程度的武断做法的结果。^⑤在移民群体的支配下,把多种多样的本地人合并为一个单一的领土单位,对以后这种类型的种族和族群交往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2. 本地人占优势(*Indigenous Superordination*)。当移民群体处于劣势地位时,在交往早期阶段很少发生冲突。很多欧洲人和东方人迁移到美国而处于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从属地位,并不导致战争、民族主义和长期的冲突。很显然,在美国移民史上偶然发生的、留下明显痕迹的劳工和种族冲突,与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和废除并非同一回事。长期处于最低层的美国黑人移民群体,从没有为此而大量移民到利比里亚;唯一比较重要的大规模的民族运动,是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环球黑人促进联盟,这一运动实际上也从未导致大量黑人迁出美国。^⑥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则长期艰苦地抗争以保持对其居住地的控制。

在解释移民和本地人都处于从属地位时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时,应当把移民作为一个群体,对可供他们选择的环境加以考虑。如1840年至1950年移居到

① Price, *op. cit.*, p. 1.

② Stephen Roberts,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27

③ John A. Barnes, "Race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 in Lind, editor, *op. cit.*

④ *Ibid.*

⑤ 新建的刚果共和国各部落间的争斗以及居住在苏丹共和国边境的部落名单可以佐证,参见 Karol Jozef Krotki, "Demographic Survey of Sudan" in *The Population of Sudan*,第六届年会的报告, Khartoum: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Sudan, 1958, p. 35。

⑥ John Hope Frankli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6, pp. 234-238, 481-483

美国的爱尔兰人,虽然明显从属于起源于其他国家的本地白人,但他们的经济生活比在自己原居住国要好得多。^① 此外,回国的选择常存在于居于从属地位的移民群体之中。据杰罗密(Jerome)报导,1907—1923年留在美国的移民数大约相当于移民总数的65%。^② 由此可见,一些移民对处于从属地位或其他交往条件的不满常常通过离开此地而得到解决,比较之下,只是近期才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群体,则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的住地。

最后,当种族和族群的交往处于本地人支配之下时,由于优势群体能够限制移入的人群及其数量,人口和制度不平衡的威胁就会减少。例如,当东方人移到美国对白人构成威胁时,他们便严厉地削减移民配额。^③ 同样的情形可以从东欧和南欧这两个被称为新的移民来源的移民数量减少中看到。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群体在实际上受到威胁之前很早即对移民实行控制,这种限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能防止潜在冲突的机制。

总之,各群体维持其各自的社会秩序所需的条件不同。在移民群体占统治地位的地区,通常本地人数量会急剧减少,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严重削弱,冲突往往与移民优势地位的建立相伴发生。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人一般没有选择余地,他们也不能控制被允许进入他们地区的新的种族群体的人数。相反,当本地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时,移民群体便被纳入到本地人的经济生活中,尽管他们在新的住处处于从属地位,但可能比在自己的原居住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的从属地位并不导致大的冲突。除此以外,移民经常可以有返回母国的选择,同时本地人控制着这个地区新的移民数量。

多重民族交往

尽管第三个主要的族群或种族群体的加入经常发生在上面分析的两类社会形式中,但本地人统治的地区和移民群体占优势的地区中,他们所面临的条件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例如,在那些大量本地人受到压制的殖民地,中国和印度的移民经常受到白人的欢迎,而这些移民在白人的祖国却受到限制。因

^①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pter 2.

^② Harry Jerome, *Mi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6, pp. 43—44.

^③ 参见 George Eaton Simpson and J. Milton Yinger,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8, pp. 126—132.

此,考察多重民族交往的原因和结果仍需在两种种族和族群的交往类型中进行。

1. 移民占优势。在移民群体占优势的地区,通常有必要在本地改造过的经济中让新的移民去填充一些位置。在加入移民引进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从属的本地人在起初往往失败。如,由于斐济人和白人接触以后他们的人口大量减少以及他们对工作习惯不满,在1879年至1916年期间,大约60 000人通过合同从印度迁移到斐济的蔗糖种植区。^① 由于相似的理由,如同奴隶制的转让一般,大量印度人进入像毛里求斯、英属圭那亚、特立尼达和那塔罗这些本地人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② 在这样的几个地区里,这些移民的后代形成最大的唯一的族群。

麦肯齐(McKenzie)考察了阿拉斯加、夏威夷和马来亚这几个区域,注意到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人对当地社会的参与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在把大量的华人、印度人和其他东方移民分别与这三个地区的本地人加以比较以后,他给出了下面的解释:

很多处于现代化工业社会边缘地带的本地人,局限于自己原有的文化网络和经济结构。结果是他们作为非熟练工人缓慢加入到新的经济之中。而在这样的地区,正是那些与其居住地相隔万里的个人最能适应资本主义营造的条件。作为进口的劳工,当条件不能令人满意时,他们也不会像本地人那样轻易地逃回自己的村庄。^③

与此相似,美洲印第安人在由白人操纵的新的经济活动中起的作用很小,但也没有成功地被当成奴隶使用。^④ 弗雷齐乐(Frazier)报导说:在奴役本地印第安人的努力失败以后^⑤,黑人奴隶便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被利用。大量的亚洲印度人作为契约劳动者被运到南非,在由白人引进的铁路、矿山和种植园工作。^⑥

^① K. L. Gillon, "The Sources of Indian Emigration to Fiji," *Population Studies*, 10 (November, 1956), p. 139; L. M. Cumpston, "A Survey of Indian Immigration to British Tropical Colonies to 1910," *ibid.*, pp. 158-159.

^② Cumpston, *op. cit.*, pp. 158-165.

^③ R. D. McKenzie, "Cultural and Racial Differences as Bases of Human Symbiosis" in Kimball Young, editor, *Social Attitudes*, New York: Henry Holt, 1931, p. 157.

^④ Franklin, *op. cit.*, p. 47.

^⑤ Frazier, *op. cit.*, pp. 107-108.

^⑥ Leo Kuper, Hilstan Watts, and Ronald Davies, *Durban: A Study in Racial Ec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 p. 25.

在那些本地人既没有能力、也无法充分满足在新经济活动中工作需求的地区，引进的移民工人也有一个明显标志，即大量流回本国。如 1903 年至 1912 年期间，近 350 万印度人离开马达拉斯的管辖区 (Madras Presidency)，漂洋过海，但同期有近 300 万人返回。^① 然而，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大量移民留在海外，形成一些国家中的主要族群。1000 万东南亚华人当前的困难，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大量定居在本地人曾一度处于从属地位的地区。

2. 本地人占优势。我们注意到，在本地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会采用一定方式对来自其他种族和族群的移民加以限制，以避免本地人失去政治和经济控制。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哪个其他种族和族群在数量或实力上能单独强大得足以向本地人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

白人在夏威夷获得统治权以后，在新开发的和扩大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大量移民的时代，那个地方提供了一个族群取代另一个族群的经典案例。照林德 (Lind) 所说，把移民作为种植业劳动力的来源，之所以从中国人变成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以后又变成波多黎各人、朝鲜人、西班牙人、俄国人和菲律宾人，是由于有意识地想防止任何一个群体掌握太大的势力。^② 同样，在美国土地上排斥中国人刺激了日本人的移民增加，随后对日本人的排斥又导致了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的增长。^③

简单地说，进入多重民族交往环境的移民群体在前述两种形式的交往情境中，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然而，在白人占优势但不是作为本地人定居的社会，其他种族和族群的相当数量的移民是得到许可的，这一许可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定居地被改造过的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相对照，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移民群体后来成为本地群体——就是说该群体通过代代相传而使这个地区变成自己的永久居住地的情况下，来自新的种族和族群的移民在数量和来源上就会受到限制。

冲突和同化

从种族和民族主义浪潮与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公开战争、或与来自以前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在过去占优势移民族群的退出相比较中可以看

① Giltinan, *op. cit.*, p. 149.

② Andrew W. Lind, *An Island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p. 218—229

③ McKenzie, *Oriental Exclusion*, *op. cit.*, p. 181.

出, -方面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很多西欧国家的族群的融合或美国和瑞士的“文化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应该说不管是冲突还是同化。都不能说是种族和族群接触的必然结果。不过,对种族和族群关系的分类直接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不同交往群体的考虑有关。在最初接触时本地人即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在以后的关系循环中,战争和民族主义常常——尽管并不总是——发生;反之,若移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从属和主导的关系,则一般不会有长期的冲突。

1. 移民占优势。经过一段时间,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人开始加入到由移民引进的经济之中,他们原来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常常随之瓦解,反过来,这对民族主义和种族统一意识也有明显影响。在很多非洲国家,黑人在与白人接触之前一度分成许多族群,而非洲种族共同体意识乃是由于白人侵略者对他们居住地的占领而产生。^① 非洲人从种族上即从属于白人,与先前部落和民族形式组织的瓦解和分化一样,是与本地人种族意识的产生相呼应的。^② 当本地群体日益被纳入更大的社会系统,他们的从属地位的显著性和重要性都随之增加。大多数本地人别无选择,只有毁掉或重建政治、经济和社会从属的制度。

进而言之,很多冲突发生在那些移民不仅是简单地居于优势地位而且已经通过代代相传来维持一个既定人口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他们已经成为本地人。例如,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白人在阿尔及利亚和南非联邦的出生百分比明显不同于9个其他非洲国家中的白人,这两个国家在种族骚乱和白人高出生率两个方面都是突出的。可以确信,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种族和族群关系的性质,但11个非洲国家所提供的数据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关于本地人和移民交往形式的不同具有特殊意义的观点^③。待到移民群体在一个新的地方完全固定下来,本地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要改变社会秩序就更加困难了。

表1 一些非洲国家中白人的出生率(1950)

国家	白人出生的百分率
阿尔及利亚	79.8
巴苏陀兰(现:莱索托)	37.4
贝专纳(现:博茨瓦纳)	39.5
摩洛哥 ^a	37.1 ^b

^① 关于地区和种族运动的讨论,参见 James S. Coleman, "Current Political Movements in Af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98 (March, 1955), pp. 95-108。

^② 关于民族主义的更广泛的讨论,参见 Thomas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 Everett C. Hughes, "New Peoples" in Land, editor, op. cit., pp. 95-115。

^③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56, Table 5.

(续表)

国家	白人出生的百分率
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	17.7
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	31.5
西南非洲 ^a (现:纳米比亚)	45.1
斯威士兰	41.2
坦噶尼喀	47.6
乌干达	43.8
南非联邦	89.7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年鉴》,1956,表5。

^a 前法国所属地区。

^b 不包括瓦尔维斯(Walvis)海湾。

^c 出生在前西班牙所属地区或本地所属的丹吉尔的,被作为本地人而包括在内。

注:当必要的按种族分类的数据缺乏时,本表包括了其他非本地人群体的数字。

此外,在那些先前处于从属地位的本地人通过驱逐曾居优势地位的移民群体而取得统治权的地区,那些在早期移民占据优势地位的条件下进入这个地区的其他民族所面对的情形变化很快。例如,就像我们曾经注意到的那样,华人在东南亚很多地区一度是受欢迎的,那时沦入从属地位的本地人不能或不愿去补充由白人侵略者建造的经济格局。但在白人被驱逐以后,本地人获得政治主权,华人进一步移民的大门随之被关闭,而且居住在那里的华人日益受到干涉。在印度尼西亚,在荷兰统治时期华人是受到鼓励的,而新近成立的本地政府仅允许象征性的移民,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措施,用以限制和削弱华人的商业活动。^① 汤普逊(Thompson)和阿德洛夫(Adloff)发现:

自从战争以来,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遭受到日益增加的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的严重性和有效性在程度上是随本国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控制程度和感受到他们民族的生存受到华人的威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②

2. 本地人占优势。与上述情况相比,居于从属地位的移民族群和已占统治地位的本地族群之间的困难,在于建立一个双方满意的政府、经济和社会制度形式。不管同化这个概念及其在操作上的运用是多么的模糊和混乱,^③注意到

① B. H. Vlekke, *Indonesia in 1956*,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7, p. 88.

② Virginia Thompson and Richard Adloff, *Minority Problems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

③ 参见 IUSSP, "Cultural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Population Studies*, Supplement, March, 1950.

在本文所区分的两种社会里同化是一个很不相同的现象仍是重要的。

在移居于从属地位的地方,问题一般是与移民的能力及他们是否愿意成为正在运行的社会秩序的一个融合的部分有关。例如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新”与“老”移民群体的问题在于确认前者是处于劣势的,^①在这种交往形式下,偶然的暴力通常被占统治地位的本地群体首先采用,而且与在西海岸亚洲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有关。^②这种冲突还产生于19世纪本土主义者担心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波士顿的政治控制^③,或洛杉矶穿“佐特装”(zoot-suiters)的墨西哥人对神圣教条的亵渎。^④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白人本地社会建成以后,居于从属地位的移民所面对的条件与美国情况相似,即存在有限的、零量的冲突,但特别强调的是移民的同化。与这些社会居于从属地位的移民同化的一般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澳大利亚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之间同化的差别,东部加拿大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地位也是如此。

法裔加拿大人保持了他们的语言及其他主要文化和社会特征,在他们之后于19世纪和20世纪迁去的移民却处在一种融合进说英语占统治地位的加拿大社会的过程中。尽管显而易见的领土边界问题仍然纠缠不清,^⑤法裔加拿大人和后来的移民群体还是存在重要差别,即在英国征服加拿大以前,法裔族群就已在新居住地有一个建造好的社会,这样,即使来自法国的移民没有明显增加,他们也能维持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统一体。^⑥

与此相似,20世纪从意大利去澳大利亚的移民比19世纪德国到这个国家的移民更趋于文化同化。波日尔(Borrie)强调意大利移民到澳大利亚以前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事实,而德国人则定居在一个尚未建立起一致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的早期殖民地;因而,意大利小孩被要求进入澳大利亚学校学英语,而上个世纪的德国移民却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的教育体系。^⑦

① Oscar Handlin,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American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7, Chapter 5.

② Simpson and Yinger, *op. cit.*

③ Oscar Handlin, *Boston's Immigrants*, *op. cit.*, Chapter 7.

④ Ralph Turner and Samuel J. Surace, "Zoot Suiters and Mexicans: Symbols in Crowd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July, 1956), pp. 14-20.

⑤ 建议考虑在边疆地区的条件下,在一个地区是否可以由于种族、宗教或族群不同而实行隔离居住,如考虑摩门教信徒(Mormons)到达犹他州(Utah)之前所面临的困难。

⑥ 参见 Everett C. Hughes, *French Canada in Tran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⑦ W. D. Borne assisted by D. R. G. Packer, *Italians and Germans in Australia*, Melbourne: F. W. Cheshire, 1954, *passim*.

因此,种族和民族交往的结果也可以按优势—劣势交往情境的两种形式来检验。就大部分情况而言,处于劣势地位的移民比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本地人更快被同化,至少在语言同化的总体意义上讲,前者比后者感受到的压力更大。除此以外,战争或种族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发生,则趋向于发生在本地人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如果本土化运动成功了,那么在移民统治下进入到这个地区的种族和民族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就可能变得十分脆弱。

结 束 语

本文建议重新关注对种族和族群之间交往过程的不同社会条件的研究,一个建立在上文所作的移民—本地人和优势—劣势划分基础之上的种族关系的社会理论,可以对上述交往场景中种族民族关系的不同性质提供一个有条理的解释。然而不管怎样,系统的经验调查要对理论的优点及其局限性进行更为严格检验,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开展跨社会的比较研究。

(汪 曼 谱, 王俊敏 校)

居住中的族群隔离：变迁的模式^①

阿维利·M. 盖斯特 (Avery M. Guest)

詹姆斯·A. 卫德 (James A. Weed)

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家大抵接受了“芝加哥学派”或人类生态学 (human ecology) 关于族群居住隔离的观点：即族群居住隔离是群体间社会地位差异的一个方面，它将随着社会流动而趋于消失。罗伯特·E. 帕克 (Robert E. Park, 1967) 注意到“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趋向于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 (第 60 页)，并有力地提出了上述论点。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厄尼斯特·W. 伯吉斯 (Ernest W. Burgess) 在他的文章“城市增长”中表述了同样观点，伯吉斯证明，当移民群体抵达一个美国城市后，他们倾向于集中居住在中心商业区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 外面的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流逝，移民社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无疑，时间对于移民群体适应美国行为模式和争取社会较高地位方面很重要。

近来关于多伦多 (Darroch Marston, 1971) 和纽约 (Kantrowitz, 1973) 的族群隔离研究向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对 1930—1970 年期间克利夫兰“标准都市统计地区” (SMSA)^②，1960—1970 年期间波士顿、克利夫兰和西雅图三个“标准都市统计地区”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 本文原载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杂志 1976 年第 81 卷第五号第 1088—1111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了美国版权所有者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感谢 Shun Erh Huang 和 Mary Leong 在编码和制表上给予本文的有力帮助。这个研究得到了 NIMH 的 STOMHI 1673 培训奖学金的支持。由于克利夫兰 Plain Dealer 出版公司的许可，我们才可能利用 1930 年克利夫兰普查区的资料。

② 译注：SMSA 为美国政府进行人口普查和有关统计而对城镇进行的地理区域划分。

SMSA)居住中族群隔离变迁的研究,来分析一些有关的问题。我们对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予以支持,但对之进行了某些修正,我们的观点是,族群居住隔离方面的变化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但同时,在美国城市中族群隔离仍然很严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地位无关。

争 论

生态学家所进行的族群隔离研究,一直受到大城市区域或更小的街区单元普查资料的性质的限制。有关美国各族群的资料通常每隔十年收集一次,但有关其所来自国家的资料却极大地局限在具有外国血统的人的范围内——包括两部分:外国出生的人(第一代移民)和双亲中至少有一个出生在国外的本国人(第二代)。因此,尽管具有外国血统的人口可以和各类“基准人口”(baseline population)对比,但要验证移民第三代或其后代是否已经同化入整体人口仍然极其困难。

在运用芝加哥学派研究思路最彻底的经验分析中,雷伯森(Liberson, 1961, 1963)研究了在1910—1920年以及1930—1950年的人口普查时间段内在国外出生的群体在居住隔离方面的横向的相关性和政治选区内的国外出生群体居住隔离的变化程度。他选择了北部10个有大量的外国出生人口的中心城市来进行分析。

他的分析完全依赖“新”、“老”移民群体的划分,即大部分北欧移民(老)相对于中欧、南欧和东欧移民(新)。移民群体以他们到达美国的时间早晚以及社会地位加以区分,“老”群体通常具有较高的地位。雷伯森发现:在一个横向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上,“老”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白人(三代或以后各代)的隔离程度通常较低,而“新”移民群体隔离程度较高。随着时间的变化,“新”“老”外国出生的群体与美国本地人之间的平均隔离程度均有所降低。他也发现:在横向分析上,不同族群与当地白人隔离的程度差异,与这些外国出生的群体在社会地位、进入美国的时间、英语水平和同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明显相关。最后,他认为:较之社会地位较低的族群,较高地位的族群一般居住更为分散(decentralization),随着时间推移,所有族群的分散倾向均有所增加。

与雷伯森的结果一致,两位泰伯尔(Taeuber and Taeuber, 1961)的研究揭示了在1930—1960年间芝加哥具有外国血统的族群与在本地三代(或以后各代)的白人之间的隔离程度明显下降,新移民群体尤其如此。

坎特威兹(Kantrowitz, 1973)在1960年对纽约标准联合地区(SCA)族群隔

离所作的横向比较研究中,从经验研究和方法论的基础两个方面批驳了雷伯森和泰伯尔的研究,他的研究认为:在欧洲移民大潮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族群居住隔离程度依然很高。在方法论上,他的批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他指出,1963年雷伯森研究中所报告的大部分族群居住隔离降低的幅度并不可观。例如,1930年10城市中外国出生的白人民族群体与本国白人人口平均分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为43.9,而1950年为38.6(Liberson, 1963: 66—67)。第二,他批评了把非外国血统人口作为衡量族群隔离程度的基础人口(base group)的做法,指出基础人口的构成可能一直随着时间而变动。由于新移民群体的子孙辈增加了很多,基础人口就更多地包括了这些移民的后代。这样,像归因于隔离程度的真实变化一样,族群隔离程度的降低也可归因为基础人口性质的变化。坎特威兹建议通过比较一个时间跨度内各种外国血统人口(foreign-stock population)之间的隔离程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们部分赞同他的这个观点,但具有外国血统的人口不包括第三代,并且由于许多在20世纪初期来美的移民及他们的子女的老化及死亡,外国血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降低,这同样是事实。对外国血统人口进行的研究,不管是横向的(cross-sectional)还是纵贯的(longitudinal)研究,都只能是美国社会中族群居住隔离一般程度的粗略的指标。^①

道里奇和马斯顿(Darroch and Marston, 1971)在1961年对多伦多人口的横向研究中,主要集中于社会地位模型对解释族群隔离差异的重要作用。幸运的是,加拿大的人口普查收集的是其所有居民所属族群的资料而不管其所属代次。这样全部多伦多居民的族群隔离情况得以被研究。在其研究最有说服力的部分中,道里奇和马斯顿(第505页)比较了处于不同族群但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个体的居住隔离状况。他们发现,属于不同族群但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个体仍然彼此高度隔离。这种发现,连同其他的资料分析,导致他们大体拒绝了种族隔离的社会地位模型。但是他们没有对另一个发现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以收入、教育和职业来衡量的族群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与群体间的族群隔离差异紧密相关。事实上,在族群居住隔离中的群际差异中,一半以上可由社会地位的群

^① 对外国血统者的长期的分析可能低估族群中隔离程度的降低。由于移民大潮业已结束,欧洲血统群体日趋老化。Speare 1970年在城市的空间流动方面的研究调查指出老年人很少改变其居所;因此,可以预期到,外国血统人口的居住位置是相当稳定的。居住隔离的降低在移民的第三代中将是更频繁的,因为作为其年龄的结果,第二代一般流动更多。克利夫兰SMSA 1970年的资料(美国人口统计局,1973,表15)暗示了许多外国血统群体的高龄化。超过65岁有本国生父母的,在本国白人群体中只占5.2%。而下列被挑选出的群体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分别是:德国人,33.3%;爱尔兰人,28.7%;瑞典人,33.3%;英国人,25.3%。

际差异来解释。我们相信,道里奇和马斯顿的这种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或许可以通过对族群居住隔离的个体和群体模型进行区分而得到解决。

居住隔离的个体模型(individual model)把一个族群中的每个成员描绘为根据在有关街区(neighborhood)的其他人的实际社会地位来决定于何处定居。任何一个族群的成员(比如德国人),观察他可能的未来的邻居,判断他们的个人社会特征——例如他们的收入,如果他自己的收入与所有这些邻居的收入相等,并且居民的族群成分不是一个衡量标准,那么这个德国人将感到可以自由地搬进那个街区。按这种观念,我们应该能看到,高收入的德国人愿意和其他群体的成员——比如波兰人——毗邻,只要这些波兰人都拥有高收入。根据这种个体模型,如果居民的民族成分是一个人们确定居所的标准。那么只要潜在的邻居属于另一个族群,德国人就不会居住在这个街区,而不管该街区的居民个人是否有高收入。这个模型与道里奇和马斯顿的发现——在多伦多拥有相似收入但属于不同族群的人并不都住在相邻的街区——是一致的。这个模型也可以通过人口学的间接标准化技术来检验。道里奇与马斯顿(1971)、雷伯森(1963: 88—89)和两位泰伯尔(The Taeubers, 1969: 81—86)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这样做过。^①通过运用这种技术检验,发现这三个研究都不能证明族群隔离的大部分差异可以由个体间社会地位的差异来解释。

居住隔离的群体模型(group model)——我们相信这种模型更具有社会学的取向——把一个族群成员的选择居所的决定看做是建立在对他觉察到的潜在的邻居们平均的社会地位的了解上,这种了解最终受所理解的有关该族群特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地位的德国人看待他潜在的邻居们的地位,不是基于他们的个体收入,而是根据他对邻居所属的族群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理解。假如他感觉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波兰族群与他所属的民族具有较相似的地位,他会乐意与波兰人毗邻,而不考虑这些波兰人个人的收入水平。该模型也可以说明,只要德国人这种居住位置的选择是建立在他们所认为的“波兰群体的社会地位较低”的总体评价上,会导致高地位的个体德国人与高地位的个体波兰人在居住上相互隔离。根据这个模型,一旦各个族群间社会地位的平均差异变小了,那么在德国人与其他族群——比如波兰人——之间就几乎不会有什么隔离。这个研究与道里奇和马斯顿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即群际间社会地位的差

^① 当没有每个普查区域的真正的社会地位的族群统计,但确实知道每个区域中个人的族群成分与社会地位分布,再加上整个城市或大城市地区人口的社会地位的族群分布时,采用间接标准化技术是有用的。运用大城市地区族群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可产生一个每个普查区域中社会地位的个人期望分布,然后把它与实际分布相对照。

异与居住隔离的群际差异明显相关。我们将检验这个受到较少注意的模型。

概言之,以前研究的结果是引出了三个值得更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第一,在美国都市地区,族群隔离在居住中的表现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第二,它与族群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是否相关?第三,族群的空间分布是否按照一个与伯吉斯的假设一致的模式而环绕中心商业区(CBD)?下文我们将简略地探讨这几个问题。

标准都市地区(SMSA)的选择

我们选择波士顿、克利夫兰和西雅图三个城市的标准都市地区(SMSA)来做调查有多种理由。克利夫兰是唯一在其中心城市和郊区都有关于1930年外国血统者的民族隔离状况资料的地区。尽管郊区仅限于东克里夫兰以内地区、克利夫兰高地、湖泊区和显克高地(都在凯霍加县)。由于1930年,1960年和1970年的普查都报告了关于每个普查区域(Census tract)整个外国血统人口的资料,因此使研究其族群隔离的变迁成为可能。而波士顿可能是一个与克利夫兰相关联的颇为有趣的调查地区。因为尽管早在一战结束后移民大潮时期,这两个地区都已基本发展起来了,但这两个地区都拥有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族群结构;波士顿的外国血统人口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苏联(大部分是犹太人)的移民群体;而在克利夫兰则主要是来自南欧与东欧的斯拉夫地区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移民群体。由于西雅图通常只有较低比例的外国血统人口,并且它基本上是在向美国的移民大潮结束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西雅图也是一个值得调查的地区。大多数到西雅图来的欧洲移民是从美国的其他地方再迁过来的。因此新近从国外来的移民没有机会像在波士顿或克利夫兰那样发展起分割的社区(enclaves)。

我们对克利夫兰在三个时点的分析包括了在城市中心及4个近郊区的232个可比的普查区域(census tract)。而波士顿和西雅图的分析分别由396个和218个可比的普查区域构成,它们都被划入了1970年城市化地区的界线。由于存在大量的制度化人口(institutionalized population),在每一处都有一些普查区域被剔除;并且为了使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可以相互比较,不得不把一些普查区域合并起来。和有关这个主题的其他研究一样,我们用分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来衡量居住隔离程度。分离指数的数值在0到100之间变动,表明某个群体为了使各普查区域本族群的比例与整体人口比例相同而不得不在普查区域间迁移的百分数。对于该指数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两个泰伯尔的著作

(1969: 195—245)。

隔 离 模 式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美国城市居住形式中民族隔离变迁的本质,然而即使不考虑时间因素,理解这种性质仍然不能不依赖基本的隔离模式。我们的基本策略是分析 1930 年克利夫兰及 1960 年波士顿、克利夫兰和西雅图的族群隔离模式。然后我们在模式中分析这种变迁。

在表 1 和表 2 中,我们给出了表明 1930 年与 1960 年两个基点 (baseline point) 上各类族群和种族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的矩阵 (matrix)。在每一个基线指数 (baseline index) 之下,我们显示了在该期间——或者是 1930—1960 年,或是 1960—1970 年——的净变动 (absolute change)。在表 3 中,我们概括了在不同时间的居住隔离水平。

选择进入研究的族群,取决于能否获得出版的有关时期被调查普查区域的资料。除了黑人和包含所有各代的非白人^①以及从出生来看是美国人但出生在波多黎各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出生在波多黎各的人之外,所有被研究的群体都由外国血统人口构成。根据以前研究的惯例,我们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群体(或类别):“老”移民群体(来自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瑞典、英国),“新”移民群体(来自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苏联)以及非欧洲人(黑人,墨西哥裔,波多黎各人及其他非白人——主要是亚洲人)。“新”“老”的区别是指该群体到达美国的大体时间。

一般来说,1930 年克利夫兰和 1960 年三个城市地区的基线数据 (baseline data) 提出了一个与坎特威兹在其对纽约标准联合地区 (SCA) 的研究中发现的相类似的模式。“老”移民群体——祖先主要是北欧人,包括加拿大人——倾向于彼此间很少隔离,而欧洲其他部分来的“新”移民群体比较倾向于彼此之间并与其它群体都相对隔离。波多黎各人、黑人、墨西哥人和其他非白人群体在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群体之间都形成了很强的隔离。事实上,这些数据暗示了后四种群体在城市中形成了相对隔离的社区,而相比之下欧洲人都比较分散,遍及整个城市地区。

^① 1930 年,除黑人外的其他非白人或其他种族类别包括墨西哥人的后裔。由此这个类别的群体与 1960 年和 1970 年的非白人类别不是准确可比的。1930 年在所有考虑到的地区,凯霍加县的 47.8% 的其他种族人口的血统是墨西哥人(美国人口统计局,1932, pp. 480—499)。

表1 克利夫兰SMSA的族群居住分离指数^a

群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老移民:																
1. 加拿大		26.7	26.4	26.5	11.9	41.7	65.0	59.3	65.2	70.6	57.5	...	86.6	63.0
	+0.4	+5.7	+7.6	+8.5	-8.5	-19.8	-19.2	-22.0	-20.0	-8.4	...	+0.1	-10.1
2. 德国	27.1	30.7	36.2	25.3	32.5	52.9	53.5	63.6	63.5	56.5	...	87.6	66.6
	+7.2	-0.3	+3.5	-1.9	-7.7	-18.0	-16.2	-21.5	-20.6	-7.4	...	+1.3	-12.9
3. 爱尔兰	32.1	30.4	37.3	24.0	43.7	64.5	59.1	65.7	69.0	60.2	...	87.0	60.9
	+7.1	+6.5	+0.4	+3.1	-1.2	-13.2	-14.1	-16.2	-9.6	+1.4	...	+2.3	-5.5
4. 瑞典	34.1	39.7	37.7	24.9	44.8	70.0	65.0	68.6	72.0	54.7	...	88.0	68.2
	+10.1	+7.7	+15.0	+5.4	+4.1	-10.8	-9.9	-16.0	-9.0	+2.6	...	+3.1	-6.0
5. 英国	20.4	23.4	27.1	30.3	39.4	62.8	59.1	64.8	68.4	56.0	...	86.9	64.2
	+8.6	+4.5	+7.4	+12.2	-6.5	-18.4	-18.1	-23.5	-18.1	-5.1	...	+1.1	-12.3
新移民:																
6 奥地利	33.2	24.8	42.5	48.9	32.9	49.5	48.4	58.0	58.7	44.5	...	83.1	68.7
	+5.2	+0.6	+1.5	+1.7	+1.3	-16.2	-12.5	-18.4	-18.5	+1.2	...	+5.6	-11.6
7. 捷克斯洛伐克	45.2	34.9	51.3	59.2	44.4	33.3	52.7	63.2	59.5	70.6	...	88.1	74.2
	+1.4	-3.0	-1.5	-0.8	-2.3	-2.2	-14.6	-18.8	-17.9	-14.8	...	+0.9	-8.9
8. 匈牙利	40.1	37.3	45.0	55.1	41.0	35.9	38.1	68.2	70.3	66.4	...	85.2	76.3
	+0.8	+2.6	+4.0	+0.6	-1.0	+0.7	+2.7	-22.5	-18.5	-14.1	...	+3.0	-16.0
9 意大利	43.2	42.1	49.5	52.6	41.3	39.6	44.4	45.7	74.0	60.2	...	76.6	70.8
	+3.4	-1.5	+1.6	+2.9	+0.2	+3.6	+2.9	+0.9	-21.4	-6.0	...	+10.5	-30.7
10. 波兰	50.6	42.9	59.4	63.0	50.3	40.2	41.6	51.8	52.6	62.7	...	87.9	76.2
	+7.2	+1.1	+3.8	+3.5	+3.1	+3.6	-0.3	+2.7	+0.7	-13.5	...	+0.6	-13.9

(续表)

群 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1. 苏联	47.1	49.1	61.6	57.3	50.9	45.7	55.8	52.3	54.2	49.2	...	85.7	76.4
	+3.2	+1.1	+3.3	+5.3	+2.7	+3.7	+0.8	-0.2	+2.2	+2.2	...	+3.1	-13.9
其他：															
12. 墨西哥人	69.2	67.7	65.8	74.3	69.8	67.6	68.5	68.3	72.9	68.9	71.8
	+0.8	+0.3	+7.7	+0.4	-0.2	+4.7	+3.2	+5.6	+0.8	+8.3	+8.7
13. 黑人	86.7	88.9	89.3	91.1	88.0	88.7	89.0	88.2	87.1	88.5	88.8	86.9	72.9
	-4.0	-3.2	+1.9	-5.7	-1.3	-3.6	-5.9	-3.0	+1.5	-3.8	+0.4	+4.8	-9.7
14. 其他非白人	52.9	53.7	55.4	62.2	51.9	57.1	65.3	60.3	60.1	62.3	62.5	68.8	63.2
	-6.1	-7.7	+0.8	-1.4	-2.6	-7.4	-10.5	-9.9	-7.6	-7.4	-6.5	+5.7	+3.3
15. 混多聚各人	79.9	77.0	80.9	85.2	80.9	77.3	76.7	78.9	80.5	74.0	77.7	57.8	79.4	68.9	...
	-0.6	-2.6	-1.2	-1.6	-1.6	-2.1	+0.4	+0.1	-1.3	+1.4	-1.0	+14.8	+11.7	-1.1	...

资料来源：Green 1931年，表2.3；美国人口统计局1962年，表P-1；1972年表P-1, P-2。

注意：资料根据229个统计区域得列。
* 对角线之上，1930年的估值及1930—1960期间的变动；对角线之下，1960年的估值以及1960—70期间的变动。

表 2 1960—1970 年族群居住分离指数^a

群 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老移民：															
1. 加拿大	14.2	27.6	16.2	13.7	25.1	29.4	35.9	38.6	28.1	26.1	52.0	85.2	59.2	77.1	
	+2.5	-0.1	+3.2	+3.0	+2.0	+5.2	+7.0	-3.2	+3.4	+0.4	-11.0	-7.2	-13.6	+3.8	
2. 德国	32.2	22.6	16.0	14.0	24.4	27.7	34.4	36.0	25.6	23.5	52.1	82.9	55.9	78.1	
	+0.6	+3.3	+5.7	+3.4	+1.7	+7.6	+9.1	-1.2	+5.7	+1.0	-8.8	-6.8	-12.7	+2.3	
3. 爱尔兰	28.0	34.3	27.3	25.2	29.0	35.9	39.8	40.8	29.8	29.3	50.5	80.2	55.1	78.2	
	+2.1	+1.3	-0.8	+2.3	+6.5	+4.1	+4.4	-0.2	+8.1	+2.2	-1.8	-6.4	-7.7	+4.8	
4. 瑞典	27.8	34.1	40.3	17.4	26.8	30.6	39.1	41.5	32.2	29.3	55.0	86.2	60.9	77.4	
	+3.2	+1.5	-1.6	+5.0	+4.2	+7.2	+5.0	-3.1	+2.8	+2.0	-10.2	-7.6	-13.8	+3.4	
5. 英国	18.0	26.6	30.2	24.3	24.2	28.3	37.5	37.0	27.7	24.2	51.8	84.2	58.1	78.0	
	+2.6	+0.5	-0.2	+1.9	+4.2	+7.3	+5.5	-3.0	+3.6	+1.8	-8.2	-6.3	-12.1	+3.4	
新移民：															
6. 奥地利	38.8	35.5	49.0	47.0	38.8	35.9	41.7	34.6	32.0	29.1	52.4	83.3	56.9	76.9	
	+3.4	+4.5	-0.9	+0.9	+3.4	+6.0	+0.6	+3.2	+3.8	+2.1	-6.3	-6.4	-10.8	+4.1	
7. 捷克斯洛伐克	45.7	47.8	55.3	50.9	45.7	50.4	44.7	44.3	34.6	36.1	55.3	86.6	59.5	75.7	
	+12.5	+6.9	+10.5	+10.4	+12.5	+6.2	+10.0	+0.8	+7.4	+3.4	-0.4	-9.3	-7.5	+2.0	
8. 匈牙利	55.6	44.1	57.9	57.2	52.1	39.7	56.2	48.5	38.9	37.8	60.1	81.4	58.0	80.1	
	+0.7	+7.4	+5.1	-0.5	+2.0	+9.1	+8.6	-1.4	+8.0	+3.0	-6.0	3.7	4.9	+3.7	
9. 意大利	36.8	46.9	40.1	46.0	40.0	55.3	60.9	65.3	34.6	38.3	52.8	77.7	46.3	81.1	
	-1.0	-0.4	-1.1	-0.9	-2.0	-0.4	+12.0	+1.2	+1.7	-3.1	-0.8	-10.6	-11.9	-1.3	
10. 澳大利亚	42.5	41.7	47.0	53.4	43.1	37.8	55.1	51.7	53.2	25.4	54.4	78.7	52.6	75.9	
	-2.8	-1.3	-3.9	-4.6	-4.5	+2.8	+8.0	+7.7	-2.3	+9.0	-8.2	-6.6	-9.5	+6.7	

(续表)

群 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1. 苏联	58.6	50.6	61.4	63.4	55.7	33.9	65.0	48.9	65.1	40.2	54.6	78.4	52.2	73.3	
	-5.0	-1.7	-6.5	-6.0	-6.7	+1.9	-2.9	+5.7	-6.0	-2.0	-7.0	-2.5	-6.8	+7.0	
其他：															
12. 墨西哥人	79.0	78.0	83.9	79.6	78.2	81.8	77.8	80.6	85.4	86.0	86.1	78.3	59.2	73.0	
	-3.3	-6.7	-5.4	-3.9	-3.3	-7.0	-6.1	-2.2	-3.4	-6.3	-6.4	-2.7	-4.8	+11.4	
13. 黑人	81.0	81.9	81.7	85.5	82.6	83.5	85.3	85.1	84.8	81.7	82.7	89.7	55.8	86.0	
	-1.3	-1.8	-2.1	-1.2	-2.9	-0.3	+4.8	+4.4	-0.4	-1.9	-0.7	+3.0	-2.2	+2.6	
14. 其他非白人	56.4	53.9	57.8	64.0	55.9	57.8	64.3	61.2	65.8	60.8	66.3	82.4	67.8	79.5	
	-5.7	-6.8	-7.1	-4.7	-7.5	-4.4	+1.9	+3.0	-6.5	-9.4	-10.1	-5.2	+3.0	+3.9	
15. 波多黎各人	73.9	75.8	77.7	74.9	75.0	78.4	77.4	81.4	79.9	78.9	84.8	87.2	79.0	75.9	
	+1.7	+1.5	-0.8	+5.1	+2.0	+1.5	+8.1	+4.7	+1.0	-4.4	-4.8	+0.6	-16.2	-13.2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统计局，1962 年表 P-1；1972 年表 P-1, P-2。

注意：资料根据的是西雅图 193 个普查区域和波士顿的 396 个区域。

* 对角线以上，是西雅图 1960-1970 年间的估值和变动，对角线以下，是波士顿的。

正如坎特威兹指出的那样,族群隔离的水平一般高于或等于在职业领域中所发现的隔离水平(Duncan and Duncan, 1955; Guest, 1970: 195—196)。族群隔离水平也比通过家庭或生命周期地位(life-cycle status)所发现的隔离水平高得多(Guest, 1970: 193—194; 1972a)。

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是:1960年在西雅图与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的隔离水平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在欧洲人群体中,西雅图的一般隔离水平看起来至少比克利夫兰与波士顿低10分(分离指数值),这暗示着西雅图发展比较迟这一情况可能对其族群社区的发展机会造成了影响。

概言之,表3中概括的资料暗含着从1930—1960年克利夫兰隔离模式的一些清楚的变迁。然而从1960年到1970年这三个地区的隔离状况都反常地稳定。

正如表1所显示的1930年到1960年间的情况一样,一些群体与其他群体的隔离程度增加而另一些群体则显著下降,总的说来,可以辨别出有四种形式。首先,在1930年与1960年,黑人人口与所有其他群体都高度隔离,在总的模式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其他非白人(通常是亚裔美国人)与其他的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大幅度降低。第三,一般而言,“老”群体(英国人、加拿大人、爱尔兰人、瑞典人和德国人)之间的隔离有所增加——尽管其程度无论如何未达到“新”群体的那种隔离水平。即是说,在1930年最少隔离的群体通常显示出其隔离水平在1960年有最大的增加。第四,新的欧洲移民群体彼此间的隔离及它们与老的北欧移民群体的隔离程度通常均有所下降;其中一些下降相当可观;例如,英国人同捷克人的分离指数从1930年的62.8降至1960年的44.4,而捷克人同波兰人的隔离从59.5降至44.6。在新的欧洲移民群体中,隔离程度降低最少的,甚至略有增加的是犹太血统的俄国人。尽管两位泰伯尔关于1930—1960年间芝加哥的研究集中在拥有美国国籍父母的美国白人与其他族群之间,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新、老群体的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相似。

1960—1970年间这三个城市地区民族隔离变迁的结果较不明显。事实上,对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很难断定其隔离程度是增加或减少。在克利夫兰和西雅图,平均的隔离水平略有上升,在波士顿,指数有极微弱的下降。1930—1960年的趋势在1960—1970年间只有老群体的资料能与之匹配,这些老群体的平均隔离程度持续增高。然而其他的可能的关系异常稳定,表明新群体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老群体之间隔离的降低到1960年时已基本结束。

表 3 族群的平均居住分离指数

群 体	克利夫兰 ^{**}			波士顿			西雅图	
	1930	1960 [*]	1970 [*]	1960	1970	1960	1970	1970
老移民：								
1. 加拿大	50.5	42.9	46.4	47.3	50.5	48.2	48.7	37.8
2. 德国	49.6	41.2	42.5	45.6	46.5	48.8	49.2	36.2
3. 爱尔兰	52.4	48.4	52.8	52.0	56.1	53.2	52.4	40.8
4. 瑞典	54.7	52.6	56.9	56.5	60.1	53.5	53.5	39.7
5. 英国	49.0	41.8	44.6	46.6	48.8	47.6	47.4	37.2
新移民：								
6. 奥地利	51.1	43.6	44.3	47.7	48.5	52.0	53.5	40.8
7. 捷克斯洛伐克	64.4	50.2	48.6	53.4	52.3	59.8	66.5	44.6
8. 匈牙利	63.6	49.2	49.3	52.7	53.2	59.8	63.8	48.4
9. 意大利	66.6	51.0	52.0	54.7	55.4	59.0	58.2	46.6
10. 波兰	69.4	54.4	55.7	56.8	58.7	55.2	53.4	40.8
11. 苏联	62.6	56.4	57.7	58.9	60.6	61.6	58.0	39.8
其他：								
12. 墨西哥人								57.3
13. 黑人	84.6	86.5	84.5	69.9	74.6	82.6	78.6	52.6
14. 其他非白人	69.9	58.9	53.7	86.0	85.5	82.3	81.3	74.9
15. 波多黎各人				60.3	56.1	63.6	58.4	57.8
平均：								
老群体对老群体	27.0	30.2	38.8	30.2	38.8	29.6	30.8	19.4
老群体对新群体	59.0	46.5	48.3	46.5	48.3	48.3	49.3	31.3
老群体对其他	75.9	72.0	69.1	73.5	72.1	73.8	71.1	67.9
新群体对新群体	60.5	45.4	47.0	45.4	47.0	51.9	55.2	37.1
新群体对其他	79.1	74.8	69.5	74.2	72.7	77.4	75.5	66.8
其他对其他	72.9	63.2	66.5	70.8	77.4	80.3	75.7	72.0

* 与 1930 年报告中相同群体的平均指数。

在欧洲人群体中最强的平均隔离程度发生在波士顿的捷克人和波士顿与西雅图的匈牙利人身上。1960 年在这两个地方曾很少的该族群人口都有了一个极为可观的增长率^①，因此，隔离的增加可归因于新的族群社区的建立。大部分匈牙利人和捷克人的增加毫无疑问是由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本国的政治骚乱中迁出的难民。

在这三个标准都市统计地区的非欧洲人群体中，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的高隔离水平都有略微的降低的趋势。这种趋势尤其适用于非白人，尽管如此，在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后，这些群体的隔离程度仍然比欧洲人群体高得多，并且隔离程度降低决不是所有族群中的普遍趋势。西班牙血统的群体（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隔离模式都没有显示出有值得注意的一般性趋势，并且有趣的是，墨西哥人与波多黎各人之间的隔离还在增加。

归结到一点，研究结果指出了在长时间内族群隔离在美国社会持久明显的重要性：这种现象看起来相当顽固，并且在最近的 1960—1970 年期间，通常只有很小的变动。然而，当观察 1930—1960 这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时，在克利夫兰有一些明显的证据表明某些东欧和南欧人群体与总体人口的隔离显著降低，但他们的隔离仍维持在一个可观的水平上，居住格局中的族群社区也远未消失。

社会地位和隔离

根据芝加哥学派对族群隔离的传统解释，族群居住隔离程度应该与族群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紧密相连。我们已经承认个体模型在研究解释这种联系方面可能不是很令人满意的，但我们尚没有对群体模型是否有效做结论。不幸的是，有关 1930—1970 年和 1960—1970 年期间都市地区族群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的可完全相互比较的资料无法找到，因此要直接判断变化着的社会地位与变化着的居住隔离如何相关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确实进行了两种类型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有助于阐明族群隔离的“群体”现象。首先，我们测定这三个城市地区 1970 年的社会地位及其他变量的群体差异与居住隔离的群体差异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测定 1970 年克利夫兰的社会地位的群体差异是如何与 1930—1970 年间居住隔离指数的变化相联系的。

^① 自一战以来，作为许多群体老化和到美国的外国移民普遍减少的结果，许多特定的外国血统人口一直在减少。然而，在波士顿的捷克人的数量从 1960 年的 1969 增至 1970 年的 2495。在波士顿和西雅图的匈牙利人，引人注目地在同一期间内从 2943 增至 3429 和从 1684 到 2184（美国人口统计局，1973，表 15；1963，表 99）。

运用 1970 年的资料时, 我们想测定在地位分布中的差异与在居住分布中的差异是怎样相联系的, 观察单位是所有可能成对进行比较的有外国血统的民族群体。由于不能找到所有必需的资料, 在这部分中没有分析黑人、其他非白人和波多黎各人。

除了在 1970 年的职业、教育和收入分布中的差异外, 用测量群体差异的其他标准——人口的年龄分布、儿童初期的母语和在美国的代次(第一代或第二代)——来测量有外国血统的群体中的差异也是可能的。这些因素在决定不同居住位置时的潜在重要性比社会地位的差异看起来还要明显。例如: 有充分的证据(Guest, 1972a)表明家庭因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把它们自己和邻里隔离开来。这样, 也许年龄的差异是民族居住隔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分析的类别是由 1970 年族群出身与语言的普查特别报告(美国人口普查局, 1973, 表 15、16)中关于每一个标准都市统计区域(SMSA)的报告来决定的。所有可能类别的分离指数都被计算了。在“职业”项, 只研究了男性; 在“母语”(mother tongue)项, 我们排除了无回答者并把“其他”语言(通常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

我们首先利用在收入、教育和职业分布中的分离指数来检验 1970 年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地位模型。正如表 4 显示的, 在分离指数分值差异上的 59%—79% 可以由这三个社会地位指标来解释; 这样, 大部分居住隔离的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地位的群体差异。在任何两个群体之间, 社会地位差异越大, 在居住隔离格局中的差异也越大。在三个度量社会地位的变量中, 仅仅收入一项是在零序(zero order)或净水平上(partial level)都产生普遍较强的并有统计意义的影响。在收入分布上小的差异——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能导致在居住分布中相对很大的差异。例如, 在克利夫兰的“1.20”这个收入的偏回归系数(the 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暗示着在收入差异指数上每增加“1”将会导致居住隔离差异指数上有“1.20”的增加。教育和职业的影响比较不一致——在克利夫兰教育产生负向影响, 而在波士顿, 职业的影响是负向的。考虑到在用以度量社会地位的变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因果关系, 偏回归系数的意义尚难以确定, 所有 0.05 显著水平上(单边 F 检验)有统计意义的偏回归系数都在表 4 中有一个星标注明。

考虑到方程式中收入的影响, 可能有人会问在分离指数分值中有多少差异可以单独由收入来解释。如表 4 所示, 在各个标准都市统计区(SMSA)中居住隔离差异的一半以上可以单独由收入差异来解释, 并且在波士顿差不多整个族群隔离差异中的 70% 可归因于收入差异。收入的很强的解释能力是很受欢迎

的,因为我们一般都同意人类生态学家哈雷(Hawley, 1950)的观点,即“在经济收入影响下起作用的房租因素是在家庭单位的分布和隔离中最重要的因素”(第282页)。

表4 1970年外国血统群体中族群特质与居住分离的关系

	克利夫兰	波士顿	西雅图
居住分离:			
收入			
r	0.72	0.84	0.75
\bar{X}	9.6	12.7	10.4
SD	4.7	6.7	4.9
职业			
r	0.61	0.66	0.61
\bar{X}	15.8	21.6	12.8
SD	6.9	9.7	5.9
教育			
r	0.10	0.71	0.11
\bar{X}	14.0	19.2	10.1
SD	5.7	9.4	3.2
年龄结构			
r	0.66	0.66	0.33
\bar{X}	20.5	20.9	21.1
SD	13.9	11.8	14.2
母语			
r	0.43	0.50	0.49
\bar{X}	71.7	64.8	64.5
SD	16.2	15.6	17.5
在美的代次			
r	-0.01	0.66	0.21
\bar{X}	5.4	8.0	7.1
SD	3.6	6.1	5.2
居住位置			
\bar{X}	50.7	52.5	36.3
SD	13.4	15.4	9.3

(续表)

	克利夫兰	波士顿	西雅图
地位模型中的回归影响			
收入			
B	0.42	0.81	0.68
b	1.20 [*]	1.88 [*]	1.29 [*]
SE	0.34	0.30	0.23
职业			
B	0.55	-0.09	0.11
b	1.07 [*]	-0.15	0.17
SE	0.30	0.22	0.19
教育			
B	-0.34	0.12	0.14
b	-0.81 [*]	0.20	0.41
SE	0.27	0.24	0.25
常数	33.62	27.96	16.39
R ²	0.60	0.70	0.59
df = 62			
六变量模型中的回归影响			
收入			
B	0.21	0.69	0.73
b	0.60	1.59 [*]	1.38 [*]
SE	0.34	0.27	0.21
职业			
B	0.54	-0.07	0.09
b	1.06 [*]	-0.11	0.14
SE	0.24	0.20	0.19
教育			
B	-0.35	-0.07	0.02
b	-0.82 [*]	-0.12	0.05
SE	0.22	0.23	0.27
年龄结构			
B	0.28	0.06	-0.25
b	0.27 [*]	0.0	-0.16 [*]
SE	0.09	0.20	0.06



(续表)

	克利夫兰	波士顿	西雅图
母语			
B	0.31	0.22	0.29
b	0.25*	0.21*	0.15*
SE	0.06	0.08	0.05
在美国的代次			
B	0.03	0.24	0.20
b	0.10	0.62	0.35*
SE	0.25	0.40	0.14
常数	15.53	16.59	10.63
R ²	0.76	0.78	0.70
df = 59			

注: r = 居住隔离指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bar{X} = 分离的平均程度;

SD = 平均值的标准误差;

B = 标准化后的净回归影响;

b = 非标准化的净回归影响;

SE = b 的标准误差;

* 显著水平为 0.05 水平, 单侧 F 检验。

尽管如此, 居住隔离的差异也可以用非社会地位变量中的差异来解释。一旦非地位变量被包括进伴有地位变量(表 4)的回归方程式中, 那么在所有三个城市地区三个非地位变量加在一起解释相对较大的差异(8%—16%)。由于样本较小, 并且在一个指标上的差异可能与另一个指标上的差异紧密相连, 因此解释方程式中六个变量中的每一个变量的净影响时必须小心谨慎。例如, 收入的差异与年龄差异相关, 因为年轻人很可能获得比年纪大的人要低的收入。

在三个非社会地位变量中, 只有母语产生具有统计一致性的影响(母语相似的群体居住隔离程度低)。当在克利夫兰和西雅图年龄差异都对隔离造成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的同时, 年龄分布上较大的差异在西雅图却与较小的隔离相联系。居住于美国的代际差异只有在西雅图才对居住位置造成具有统计意义的影响。由于资料涉及的是特殊的具有外国血统的群体成员, 但又没有表明该族群在美国生存过多少代次, 这个变量的预测力低应该不会太令人惊奇。

幸运的是, 常数项在回归方程式中有独立的解释。它们表明即便在社会地位或其他变量中的差异都不存在时, 在任何两个群体间仍将存在的平均居住隔离程度。即是说, 如果两个群体间所有其他变量的分离指数为 0, 族群的居住隔

离是否还会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存在。例如，在克利夫兰，若仅仅分析社会地位模型时，那么即便两个族群在收入、职业和教育各变量上毫无差异。他们仍将有一个 33.6 的居住隔离指数。尽管在波士顿和西雅图的分离指数可能要低一些，但即便群体间地位差异不存在时，其族群居住隔离仍将明显存在。

当控制社会地位差异，并且在分析中包括年龄结构、代次和母语等变量时，一些看起来较高的平均居住隔离程度进一步降低，特别是在克利夫兰和波士顿。如表 4 所示，如果所有族群在所有这六个变量上都没有差别的话，波士顿最高的平均分离指数为 16.59。我们认为，相对来说，这个指数是较低的。特别是由于人们可以预期到一些族群间的隔离纯粹只是根源于“偶然因素”。遗憾的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最小的居住隔离指数尚难搞清楚。在每一个案例中，解释我们的资料是为了说明，如果社会地位（尤其重要）、年龄分布和母语方面的差异被排除，那么在美国城市中大多数族群间的隔离将只是轻微程度的，或至多不过是中等程度而已。

其他变量在解释居住隔离差异上的潜在作用常常可以通过检查剩余量 (residuals)（根据回归方程变量所能解释的隔离程度与实际的各族群的隔离程度之间的差异）来确定。我们在表 5 中显示了仅根据地位模型而获得的这三个大城市地区的平均剩余。六变量模型的剩余通常彼此相似。通过检查剩余量，我们确信在解释族群居住隔离模式上其他变量不能产生较大影响。遍及大城市地区的绝大多数分析中的剩余量看起来是以相当随机的方式分布的。最明显的偏向是，无论是根据社会地位模型，还是根据六变量模型进行分析，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人、德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以及少部分瑞典人）的实际彼此隔离水平都低于人们所预期的水平。上述这些群体都具有那种与人们经常能感觉到的典型北欧人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紧密相连的体质和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较老的美国血统群体中得到很充分的体现。由于其他群体拥有被认为是更为不同或可能是较不能被接受的社会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受上述分析中各变量的影响，因此其他群体之间并与当地人之间可能保持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较高的隔离程度。他们的隔离可能是自我选择与较大社区对他们的歧视相结合的产物。

现在我们转向验证 1930—1970 年间克利夫兰标准都市统计区 (SMSA) 内的民族隔离变迁模式。我们试图用四个变量——即 1930 年的民族隔离与 1970 年的收入、职业和教育的分离指数——来预测 1970 年的民族隔离水平。人们自然希望通过 1930 年的隔离水平来预测 1970 年的水平，因为 1930 年的隔离对 1970 年的隔离会有一个强烈的偏回归影响。余下的不能被解释的 1970 年的变

表 5 根据 1970 年社会地位回归计算的三个城市 SMSA 中居住隔离的平均剩余程度

群体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各群体的平均值
老:													
1. 加拿大	***	-13.5	-4.3	-7.0	-16.0	-8.7	-3.0	-3.1	+1.3	+0.3	-2.4	-4.1	-5.5
2. 德国	***	***	-6.3	-3.2	-12.0	-11.8	-4.9	+1.2	-1.2	-1.7	-3.2	+2.8	-4.9
3. 爱尔兰	***	***	***	+0.1	-4.0	-1.8	+6.5	+2.6	+5.9	+7.6	+5.3	-1.3	+0.9
4. 瑞典	***	***	***	***	-8.2	-4.0	+2.1	-1.3	+2.1	+3.5	+5.0	-3.2	-1.3
5. 英国	***	***	***	***	***	-5.8	+1.6	+0.4	+0.3	+2.1	+0.6	-1.6	-3.9
新:													
6. 奥地利	***	***	***	***	***	***	+3.6	+0.1	-0.4	+0.4	-2.4	+2.3	-2.6
7. 捷克斯洛伐克	***	***	***	***	***	***	***	+10.2	+5.3	+6.1	+9.4	+5.5	+3.9
8. 匈牙利	***	***	***	***	***	***	***	***	+5.1	+11.9	+3.8	+11.5	+3.9
9. 意大利	***	***	***	***	***	***	***	***	***	-0.1	-0.3	+3.3	+1.9
10. 波兰	***	***	***	***	***	***	***	***	***	***	-6.0	+8.0	+2.9
11. 苏联	***	***	***	***	***	***	***	***	***	***	***	+2.4	+1.1
其他:													
12. 墨西哥人	***	***	***	***	***	***	***	***	***	***	***	***	+2.3

注:负数表明比预期的隔离低;正数表明高于预期的隔离程度。

异可被认为归因于某些群体居住隔离的增加和其他群体居住隔离的减少。如果社会地位能解释在隔离上的变化,我们应该预期1970年的社会地位指标有强烈的净影响(partial effects),并且不受1930年的隔离水平的影响。即是说,社会地位分离最大的群体,其隔离程度也会有最大的增加。

在表6中,我们显示了在1970年隔离指标上的四个变量的标准的和非标准的回归方程。由于无法得到1930年墨西哥裔的隔离情况的资料,该分析不包括墨西哥裔。

1930年的分离指数解释了1970年分离指数变化的42%,表明在这段时间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变动。由于历时的稳定性(cross-time stability)看起来是社会体系的许多方面的特征,有人或许期望一个更高程度的相关。除由1930年分离指数解释的42%外,一个地位变量又解释了1970年分离指数的22%,表明在1930—1970年期间居住隔离的大部分变动与群体间地位差异有关。在1970年社会地位差异很小的各群体,其隔离程度也相对降低;同时,那些彼此间社会地位差异很大的群体,其隔离也显著增加。

教育差异的影响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尽管如此,收入和职业的影响仍与我们所预期的一致,并且重要的是,职业被标准化后的净影响比1930年隔离指数的净影响大。概言之,1930—1970年间民族居住隔离的变动至少与群体地位水平差异有中等相关。至少,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70年的隔离水平更多的是与1970年社会地位水平的差异而不是与1930年的隔离水平相联系。

地位和距离

在用社会地位来解释族群隔离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那种认为高地位群体居住得与城市的中心商业区(CBD)最为分离的观念。这与一般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无论什么族群,较高地位的人都比较低地位的人更倾向于在远离中心商业区的地段定居。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将发现一种模式——随着时间的增加,当族群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并同化于美国社会地位结构中时,族群的居住也愈趋分散(Creesey 1938; Ford, 1950)。

各种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伴随居住地点与商业中心距离的扩大而上升的趋势,在大多数城市并不强烈;在部分城市实际上还伴随距商业中心距离的扩大有轻微下降(Guest, 1971, 1972b)。因此可以看到,在那些存在着地位上升与距中心商业区距离变远的明显相关倾向的标准都市统计区域内,也存在着距商业中心距离与通过地位决定的种族群体的空间位置之间的强烈关系。幸运的

表 6 1930—1970 克利夫兰 SMSA 居住隔离的变迁的回归模型

分离	1	2	3	4	5	平均值	SD	B	b	b 的标准误差
1. 收入	...	0.63	0.57	0.08	0.40	8.11	3.30	0.19	0.56	0.33
2. 职业	0.82	0.37	0.61	14.72	6.63	0.60	0.16	0.24
3. 教育	0.34	0.40	14.51	6.07	-0.38	-0.60	0.24
4. 居住, 1930	0.65	53.57	15.57	0.54	0.33	0.06
5. 居住, 1970	46.21	9.54

注: 常数 = 19.99, $R^2 = 0.64$; $df = 50$; B = 标准化净回归系数; b = 未标准化净回归系数。

是,根据以前的研究(Guest, 1971),被调查的三个城市地区都可列入这一距离与社会地位有总体关系的行列。在克利夫兰,距离与社会地位间关系相对较强;波士顿处于中等;而西雅图略微呈负向的关系。

在表7中,我们显示了在三个标准统计区域中,每一个外国血统群体的集中指数(index of centralization)与由教育、收入和职业所度量的每个群体的平均地位之间的零序(zero-order)相关系数。集中指数——在其他地方(Redick 1936)有详尽的讨论——测量按距中心商业区的距离得出的每个族群的居住分布与用同一尺度得出的总人口的分布相对比的差异。该指数可以在+1.00与-1.00之间变动,或说是在与总人口的对比中,在极端集中与极端分离之间的变动。指数为“0”表明由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计算得出的分布与总人口的分布相同。利用普查地区地图,距离由距中心商业区的直线距离(英里)来计算。我们用距每个中心商业区相距一英里的区域来检查族群的分布,但却没有发现不能由集中指数充分度量的模式。

如表7所示,总体上,在这三个城市地区的大多数族群与总人口相比只显示了很少程度的集中或分散。我们也显示了非外国血统的族群的集中指数;这些指数一般比外国血统的族群高。当把后者的集中指数与他们1970年的社会地位水平相关联时,我们仅仅在克利夫兰发现居住分散与社会地位之间有明确的相关,这与那种关于地位变化多数情况下常伴随着与这个城市的中心商业区居住距离变化的知识相符。在集中指数与地位之间的负向关系表明集中于中心区程度最高的群体其社会地位最低。收入是预测族群位置的最佳因素。在波士顿,高地位群体较少普遍分散的情况显示出在实质上1970年在居住分散与群体地位之间没有联系。最后,在西雅图,较高的收入实际上与族群在城市中心区居住的集中有关,但与此同时职业和教育与居住位置只有很弱的联系。

由于统计各个时点上的社会地位的数据不具备,因此不可能确定在三个标准都市统计区中各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居住位置的变化是如何相联系的。克利夫兰的资料(特别是从1930年到1960年的)表明了相对于总人口来说,所有的族群在居住距离上趋向于轻微分散,尽管当考虑到这段时期的长度时,这种变化事实上是微小的。这些结果与我们的发现(即在克利夫兰,较高地位的个人和族群居住较分散)是相符的。这些结果与一些最近的研究(Guest, 1974)所得出的在克利夫兰在1940—1970年期间较高地位者至少存在着居住距离轻度分散化的结论也是相符的。当社会地位提高后,较之总人口,该民族群体稍微有些向城市的外层移动。回过来讨论1960—1970年间西雅图、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的变迁的问题上,由于时间跨距较短,我们难于得出清晰的结论;但总

表 7 克利夫兰、波士顿和西雅图 SMSA 中族群的空间位置

	克利夫兰			波士顿			西雅图	
	1930	1960	1970	1960	1970	1960	1970	
民族群体集中化：								
美国	-0.15	-0.25	-0.25	-0.06	-0.06	+0.07	+0.06	
加拿大	-0.13	-0.24	-0.23	-0.11	-0.06	+0.01	+0.01	
爱尔兰	+0.02	-0.21	-0.27	+0.13	+0.12	+0.23	+0.16	
瑞典	-0.20	-0.32	-0.20	-0.15	-0.14	+0.03	+0.08	
德国	-0.05	-0.13	-0.10	-0.00	-0.02	+0.06	+0.05	
奥地利	-0.06	-0.13	-0.12	+0.01	-0.02	+0.13	+0.16	
苏联	-0.16	-0.23	-0.22	+0.13	+0.08	+0.21	+0.15	
波兰	+0.10	-0.00	+0.06	+0.04	+0.03	+0.20	+0.17	
捷克斯洛伐克	+0.06	-0.06	-0.04	-0.01	-0.02	+0.03	+0.13	
匈牙利	+0.04	-0.07	-0.12	+0.11	-0.07	+0.12	+0.17	
意大利	-0.04	-0.17	-0.13	+0.18	+0.16	+0.20	+0.22	
墨西哥	***	+0.22	+0.19	-0.11	+0.13	+0.23	+0.08	
波多黎各	***	+0.56	+0.63	+0.64	+0.55	+0.19	-0.02	
黑人	+0.61	+0.34	+0.15	+0.46	+0.56	+0.75	+0.72	
其他非白人	+0.39	+0.17	+0.13	+0.49	+0.38	+0.51	+0.38	
外国血统群体的集中化与社会地位的相关：								
收入	***	***	-0.81	***	-0.06	***	+0.38	
职业	***	***	-0.19	***	-0.07	***	+0.14	
教育	***	***	-0.46	***	-0.04	***	-0.05	

注：收入：在外国血统群体中，年收入等于或超过 15 000 美元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

职业：在专业和管理职业中，男性的百分比。

教育：等于或大于 25 岁人口中，曾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比例。

体上来说似乎很清楚：对族群来说，很少有特别的居住距离集中或分散模式。在与总人口的对比中，大多数群体似乎都有相对稳定的位置，这个结论与在同期内三个地区的族群隔离程度相对稳定的事实在。

总结和讨论

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美国城市中族群隔离的持续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最近的将来族群隔离会消失。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族群隔离的稳定，以及一些群体中隔离程度的略微增加等，都支持了美国城市中族群问题仍持续存在的观点。对照过去几年中众人皆知的族群和种族意识的增加 (Marden and Meyer, 1973: 1—4; Segal, 1972: 91)，这个发现肯定不会令人惊讶。

在移民大潮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间，城市中民族社区可能一直服务于两个基本功能。首先，在城市地区，由于美国社会中严格意义上的阶级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族群可以作为政治利益群体。一个极好的例子 (Glazer 和 Manihan, 1970) 是近来纽约公立学校系统中的骚乱，那儿犹太人占主导的教师工会与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占主导的学生家长群体之间的政治冲突加剧。在《城市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一文中，路易斯·威尔斯 (Louis Wirth, 1938) 的理论暗示了族群的第二个功能。大都市地区的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如果并非事实上也是常常潜在地使社会疏离和混乱。而建立在族群基础上的社会的和居住的纽带联成的组织有可能平衡一些都市生活中不太合意的方面。格雷纳 (Greeley 1969) 已经提供了一个有关这方面和其他一些族群问题的很好的一般性讨论。

尽管如此，我们不想过分强调在居住隔离中独立于群体社会结构特征的族群关系的角色。族群隔离的降低一直在发生着（尤其是对在美国的“新”欧洲移民群体来说），在 1930—1960 年期间的克利夫兰，某些特定的群体的隔离水平的下降是相当大的。进一步说，我们的结论看起来也与那种观点是相符的，即：大多数居住方面的族群隔离的存在是群体社会地区差异的函数，并且暗示着将来族群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动将影响它们之间的族群隔离程度。当社会地位差异与年龄、母语以及在美国的代次方面的差异相关联时，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族群关系中的居住隔离差异中的绝大部分可以得到统计计算的解释。我们也在美国城市中距中心商业区的距离与族群的地位之间的联系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若不考虑族群关系，这三个城市地区的小样本却暗示了距离和地

位之间的联系,表示那种地位上升与离中心商业区的距离增加的倾向是紧密相连的。

不幸的是,我们尚不能提供一个有关1960—1970年期间这三个城市地区居住隔离程度变迁的统计解释。这种分析应该是重要的,因为与1930—1960年间克利夫兰所发现的一些模式相对比,隔离倾向于保持稳定或在一些个案中有所增加。由于无法得到作这种分析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提供关于该期间的圆满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社会中,族群社区开始变得稳定化了。即是说:从外国移民大潮结束到现在,几代人已经过去了,族群显然已完成了与美国社会的最初的调适。1960年和1970年的资料可能或多或少地暗示了美国城市中族群隔离的最低限度,这种程度可能还要持续许多世代。我们1970年的资料表明在欧洲族群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远未消失。与在城市社区中族群所具有的持续的社会功能合在一起,这些社会地位的差异可能成为一个大约会持续一段时间并稳定在1960年和1970年水平上的族群居住隔离模式的基础。

当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相信为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作一个略有修正的辩护是合理的。对于理解居住隔离的本质来说,帕克和伯吉斯在1920年所发展的观点至今仍是重要的。尽管,与绝大多数的伟大思想一样,当资料被仔细分析时,这种本来简明清晰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会显得有些混乱。

参 考 文 献

Burgess, Ernest. 1923.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pp. 57—85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vol. 1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essey, Paul F. 1938. "Population Succession in Chicago: 1898—193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ly): 56—68.

Darroch, A. Gordon, and Wilfred G. Marston. 1971. "The Social Class Basis of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he Canadian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November): 491—510.

Duncan, Otis Dudley, and Beverly Duncan. 1955.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March): 493—503.

Ford, Richard G. 1950. "Population Succession in 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September): 156—160.

Glazer, Nathan and Daniel P. Moynihan.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2nd ed.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Greeley, Andrew M. 1969. *Why Can't They Be Like Us?* New Yor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Green, Howard W. 1931.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by Census Tracts: Cleveland, Ohio*, 1930. Cleveland: Plain Dealer Publishing.

Guest, Avery M. 1970. "Families and Housing in Citi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Guest, Avery M. 1971. "Retesting the Burgess Zonal Hypothesis: The Loc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6 (May): 1094—1108.

Guest, Avery M. 1972a. "Patterns of Family Segregation." *Demography* 9 (February): 159—171.

Guest, Avery M. 1972b. "Urban History, Population Densities, and Higher Status Residential Loc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48 (October): 375—387.

Guest, Avery M. 1974. "Neighborhood Life Cycles and Social Status." *Economic Geography* 50 (July): 228—243.

Hawley, Amos. 1950.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Ronald.

Kantrowitz, Nathan. 1973. *Ethnic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s*. New York: Praeger.

Lieberson, Stanley. 1961.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n Ethnic Assimilation." *Social Forces* 40 (October): 52—57.

Lieberson, Stanley. 1963. *Ethnic Patterns in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Marden, Charles F., and Gladys Meyer. 1973. *Minorities in American Society*. 4th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Park, Robert E. 1967.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dick, Richard W. 1956. "Popula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Central Cities, 1840—195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February): 38—43.

Segal, Bernard E. 1972.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Crowell.

Speare, Alden, Jr. 1970. "Home Ownership, Life Cycle Stage,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Demography* 7 (November): 449—458.

Taeuber, Karl E., and Alma F. Taeuber. 1964. "The Negro as an Immigrant Group: Recent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in 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January): 347—382.

Taeuber, Karl E. and Alma F. Taeuber 1969. *Negroes in Cities*. New York: Atheneum.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32. *Fif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0*. Vol 3, Pt. 2, Populatio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62. *U. S. Censuse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1960*. Census Tracts Final Reports PHC(1)-18, 28, 142.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63. *U. 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60*. Vol.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Parts for Massachusetts and Washington.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2. *U. S. Censuse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1970. Census Tracts Final Reports PHC(1)-20, 45, 155.*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3. *Census of Population: 1970. Subject Reports Final Report PC (2)-1A, National Origin and Language.*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ly) : 1—24.

(张弘平 译, 薄伟康 校)

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阶级基础

——加拿大之例*

A. 达洛奇 (A. Gordon Darroch)

W. G. 马斯顿 (Wilfred G. Marston)

族群人口社会分化中的两种形式一直是研究的主题。其一是关于不同族群及种族集团的社会经济差别——如美国的黑人及白人 (Blau and Duncan 1967; Lieberson and Fuguit 1967; Farley 1970), 美国及加拿大的移民与其他少数民族集团 (Duncan and Duncan 1968; Porter 1965), 以及美国的不同宗教集团 (Lenski 1963, Gockel 1969; Goldstein 1969; Jackson, Fox, and Crockett 1970; Rhodes and Nam 1970)。第二种分析形式关注的是确定不同国家中城市中心的各族群集团居住分离的程度及模式 (Duncan 1959, Lieberson 1963, Taeuber and Taeuber 1965, Jones 1967; Mehta 1969; Darroch and Marston 1969)①。

此两种研究的大部分是独立进行的, 不过, 我们可以归纳出两个相互对照的模型, 对族群分化的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一方面, 人们强烈主张, 对于民族起源集团 (National origin) 和宗教群体而言,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在很

* 本文原载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杂志 1971 年第 77 卷第 3 号, 第 491—510 页。翻译并存本书中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的同意, 谨此致谢。

本篇文章的初稿曾在加拿大社会学及人类学会 1970 年年会中宣读。我们要感谢 G. Sabir Shakeel 及 Nilly Akerman 的协助, 以及评论者们有益的评注。这项研究受到由加拿大国务院及加拿大中央抵押和房产公司共同的资助及支持。

① 族群 (ethnicity) 在此特指人口的这样一些特征, 如国别背景、出生地及母语, 也指诸如种族及宗教之类特质 (对族群的多维度的进一步考察可见 Darroch and Marston 1969)。族群的社会经济差异只是简单地指民族群体在收入、职业及教育地位上的分布的相对差异。

大程度上决定居住分布的情况确实存在。这种对决定族群居住隔离因素的特定解释可被称为“社会经济模型”或“社会阶级模型”。

另一方面,当族群身份(ethnic status)与社会经济地位区分开来,并考虑到族群身份对居住模式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假定另一种模型。事实上,作为对于美国城市中黑人高度的持久的居住隔离的一种解释,社会经济的解释的可靠性已受到怀疑,Taeuber(1965,1968)和其他人曾数次指出,把任何显著程度的黑人居住隔离都归因于黑人和白人间的经济地位差距显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居住隔离的解释应更直接地考虑种族集团之间的非社会经济的差异。此种对影响族群居住隔离因素的解释可以被称之为“族群身份”的模型。

以上两种关于族群隔离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的模型(或解释)可简要概述如下:“总的看来,移民集团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历史趋势与居住隔离的减弱相伴发生。与此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了,而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却稳步提高。在全国的城市中,这种隔离已普遍达到高水平。”(Taeuber and Taeuber 1964:378)。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基于如下认识:“族群身份”模型除了黑人中应用过外,还很少在其他族群人口中使用过^①。这个不足与其说是因为疏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假定,即黑人与移民及其他族群集团,不论就居住隔离的程度还是其原因均有很大不同。这一区别在研究美国城市时被不断重申(Taeuber and Taeuber 1964; Farley 1970)。另外,有些人认为在某些国家中持久的族群居住隔离实际上可以归因于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社会阶级的差异,如澳大利亚(Jones 1967)及加拿大(Richmond 1967b)城市中的情况。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社会经济模型在解释加拿大民族居住隔离时的经验可靠性。它也隐含了对于族群身份模型的经验可靠性的初步及间接的评价。细致的分析只限于多伦多,但也给出了对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的比较分析的结果。

资料与方法

多伦多是个大都市区(1961年的人口超过180万),因此我们有可能获得

^① 作者只知道两例,即 Lieberson 对 1930 年的 Cleveland 的研究(1963)以及 Metha 对印度的 Poona 的研究(1969)。在这两个研究以及本研究中,只限于分析某一时点上的数据。而且不直接涉及社会经济地位变化与族群居住分布变化之间的联系。

符合本研究目的的独特资料。首先,加拿大人口普查报告提供了比一般国家普查资料详尽得多的有关民族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信息。在考察族群时,我们首先用已出版的区域普查资料来分析选定的族群,这些资料可以说明本地的以及国外出生的人口的族群背景^①。作为普查地区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我们能够对三个主要标准——教育、职业和收入——进行相对细致的分类^②。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对于族群隔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评价是有限的,因为美国的普查资料只提供第一、二代移民的族群类别,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普查报告只提供出生地资料。

在区域普查资料之外,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都市区,我们还需要未出版的、按照三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确定的族群的交叉表。这些数据在应用中使用了一种标准化技术,该技术的作用是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隔离水平之间的关系。

对于族群隔离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言,另一个更直接的考察是通过运用相同母语及出生地群体的特殊区域普查资料来进行的。这些变量统统按白领及蓝领的职业分类来进行交叉列表,还分别按不同的收入——1960 年挣 6 000 加元以上和以下者——来进行交叉列表。这些数据使得我们更便于进行一般社会阶级集团内部或集团之间的族群隔离的实际水平及模式的比较。

整个研究中所使用的族群居住隔离的基本指标是“分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作为对任意两个人口集团的空间隔离的衡量,此指数是这两个人口集团之间的比例分布的正的或负的差值之和(在此,就是多伦多 1961 年的 301 个区域普查资料的差值之和)。这一指数值的范围是 0 到 100,前者表示在空间分布上没有分离,后者表示两个群体之间的完全的分离或隔离。为了方便起见,不管是“隔离指数”还是“分离指数”,在此通通是指对于两个民族人口的居住分布的比较。分离指数数值的意思是其中一个人口集团为达到与另一人口集团相同的居住分布格局而需要迁移的人口百分数。这一指数在其他地方有集中的讨论(Duncan and Duncan 1955, Taeuber and Taeuber 1965)。^③

① 族群起源(族源)(ethnic origin)是指回答者或其父系祖先在到达北美时所属的民族或文化的群体。

② 收入分类涉及的是挣工资和薪水的人们。我们使用七个类别:1 000 加元以下;1 000—1 999;2 000—2 999;3 000—3 999;4 000—4 999;5 000—9 999;10 000 及 10 000 加元以上。职业群体是指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专业人员、办事人员、销售人员、服务及娱乐、运输及通讯、手工业者以及工人。教育分类适用于目前不在上学的人们,它被分为如下几类:没有上过学和小学;中学 1—2 年;中学 3—5 年;以及大学或大学以上。

③ 这一指数只衡量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隔离”的其他方面,如族群的集中或位置,也可以被考察——考虑它们与族群社会经济分化的关系,或者更简单的是,考虑社会经济群体的位置,如同最近所报告的社会区域分析那样(Jones 1968; Abu Lughod 1969)。

分 析

描述族群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分离水平之间关系的最典型的程序是计算这两个变量的某种形式的零序相关(zero-order correlation)。事实上,这种相对较强的相关关系已有所报导,这支持了社会地位距离与居住隔离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论证。Lieberson 对于美国城市中族群隔离的综合性分析经常被人们所注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在长时期中移民集团的居住混合与其日益增强的与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相似性存在着联系。他还揭示出在移民集团的居住隔离的水平与其在社会地位的几个指标方面的相对位置之间有着一般强度的横相相关关系(Lieberson 1963)。

实际上,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经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类证据的,而且,人们经常引用这些证据来肯定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族群居住隔离的直接影响(Taeuber and Taeuber 1964; Powers 1968; Kantrowitz 1969; Farley 1970)。^①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在更为细致的调查中必须对社会经济变量的直接因果作用予以谨慎对待(Lieberson 1963; Taeuber and Taeuber 1965)。我们这个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因为相关关系本身并不是评价“社会阶级”或者“族群身份”模型的坚实基础。

我们从入选的多伦多地区的族群集团两两之间的居住分离指数开始。见表 1,不同的集团依其与英国人集团的居住隔离的程度从小到大地排列,英人集团在此被作为标准,因为它有数量上的主导地位(占 1961 年全地区人口中的 60.7%),以及作为“创始”集团(charter group)的历史地位。隔离的总体模式似乎是证实了那个广为人知的关于加拿大族群集团间地位等级的论点(Porter 1968)。五个源自北欧及西欧的集团,其两两之间的隔离均是低水平的。源自南欧及东欧的集团不仅与前者有较大隔离,彼此之间也是如此。“亚洲人”、“其他”以及“其他欧洲人”集团与北欧、西欧人集团的隔离要小于与南欧、东欧人的隔离(“其他欧洲人”这一类别包括了全地区的列于表格上的 60% 以上的犹太人口。犹太人占“其他欧洲人”总人数的 39%)。

^① 非美国城市的证据被相似地局限于移民群体间经济及居住分化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且对于经济因素的作用的推论仍旧如此(Collison 1967; Jones 1967)。另一种方法依赖于相关关系的因素分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关系是指城市的亚区域的社会经济与族群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Sweetser 1965; Jones 1968, Abu Lughod 1969)。

表1 多伦多地区族群群体居住分布的分离指数(1961)*

族群群体	族群之间的分离指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英国人	15	16	20	20	27	35	41	42	46	52	55
2. 斯堪的那维亚人		17	23	19	28	37	39	43	45	50	56
3. 德国人			18	23	30	32	33	33	36	47	51
4. 法国人				28	29	30	38	37	42	50	53
5. 荷兰人					29	43	46	46	49	54	58
6. 其他						40	46	47	51	56	57
7. 亚洲人							36	43	46	53	52
8. 其他欧洲人**								38	30	35	48
9. 乌克兰人									23	52	45
10. 波兰人										35	50
11. 俄罗斯人											59
12. 意大利人											

* 这些指数见于这一项目的一个早些时候的研究报告中(Darroch and Marston 1969)，此处所作为的一些计算上的变动是为了便丁本次研究，这在以后会有说明。

** 犹太人群体包括在“其他欧洲人”类别。

在说明这种空间距离的一贯模式时，社会经济模式的解释坚持认为族群的社会经济的整合过程包含了——作为一个必然的伴随物——居住融合的平行过程。这样，族群集团在某一时间点的空间距离上的排序，如表1所示，如果不足以反映它们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话，至少直接反映了它们的相对经济地位。^①表2给出了1960年各族群集团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的三种指标，即，完成五年以上教育者的百分比，年薪6000加元以上者的百分比，以及男性白领职业者的百分比。尽管这些未发表的数据并没有对年龄或居住时间长短进行标准化以更准确地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它们与先前用来考察社会经济模型的数据并没有什么不同。

① 社会经济以及居住的整合过程经常被看作主要是一种代际的变迁。不过，族群群体数据既反映这些变迁也反映第一代移民作出的成绩。

表 2 多伦多地区族群群体的社会地位指标(1961)

族群群体	总人口 (%)	中学毕业或 以上 [*] (%)	年薪 6 000 加元 以上 [#] (%)	白领职业 [†] (%)
英国人	60.7	18.0	15.8	65.1
斯堪的那维亚人	0.9	21.9	13.9	53.3
德国人	4.4	18.1	9.8	48.5
法国人	3.4	11.2	8.1	52.8
荷兰人	1.8	18.2	12.1	57.0
X	...	17.5	12.0	55.3
其他 [‡]	3.1	14.3	11.7	56.6
亚洲人	1.1	17.0	7.3	70.6
其他欧洲人 [*]	10.4	18.5	6.8	57.7
X	...	16.6	8.6	61.6
乌克兰人	2.6	13.1	4.8	48.3
波兰人	3.2	15.1	7.2	50.2
俄罗斯人	0.8	27.0	16.1	74.4
意大利人	7.7	2.7	1.8	27.8
X	...	14.5	7.5	50.2

资料来源：未出版的国家统计局(D. B. S.)资料。

* 只适用于 1961 年不上学的人们；† 只指劳动力成员；‡ 只指男性劳动力；X 未加权的平均数；‡ 指其他非欧洲人及未提及者；# 包括犹太人群体。

如表 1 所示，族群被按其与主导群体的居住隔离程度逐个排列。除俄罗斯人群体之外，有证据表明这样一种普遍印象，即与英国人群体的分离程度确实反映出每个族群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例如，这可以从三类族群的非加权平均数的排序中看出来，这三类群体是北欧及西欧人（“老”移民），“亚洲及其他”族群群体（Origin group），以及南欧与东欧人（“新”移民）^①。不过，请注意，对于白领职业者的平均百分比而言，一般说来与英国人分离程度最低的“老移民”群体比“亚洲及其他”族群群体更低（55.3% 和 61.6%）。

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阶级模型认为族群集团的分离水平与其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们用表 2 中的数据计算出十一个群体依其与英国人群体的隔离程度而逐个排列的等级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以三种地位指标（依绝对地位差异值从小到大排序）衡量的百分比差异（绝对值）的可比

① 关于“新”与“旧”移民的术语的一般用途及含义可见 Lieberson (1963)，应该注意这一区分并不是完全与到达加拿大的时间的差异相一致，而在美国则是一致的。

等级之间的相关系数。居住隔离与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差异之间的 Kendall 相关系数是 0.42、0.46 和 0.13。

当然,这些联系只是涉及与主导群体的居住隔离和地位差异,但是,人们认为有与此水平相似的联系存在于所有族群中居住以及地位的分离程度之间。这样,对于所有 66 对用于比较的族群而言,表 1 所示的居住分离指数与以同样的方式计算出来的群体的教育、职业及收入分布的分离指数可以有相关关系。其简单积矩相关系数 (the simple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是,教育差异 0.566; 收入差异 0.601; 职业差异是 0.417^①。为了强调这一点,0.535 这个平方复相关系数 (the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明这三个地位指数的线性综合单独即可说明所有族群群体两两之间的居住分离总差异的一半以上。

实际上,这一初步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提出证据以支持解释多伦多的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阶级模型。不过,我们认为,需要用来检查这一模型的各个重要方面的数据并不是上面这一种。就是说,作为一种解释性的说明,族群分离的阶级模型所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简单的或大或小的民族群体地位因素与族群居住隔离模式之间的零序相关。事实上,它表达了那种认为族群的“同化”或整合是主流过程的流行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就平均而言,任何族群在教育或职业地位上的改善必将反映于收入的改善,并从而提高对城市房屋的购买力,并由此转化成与主导群体的更高程度的居住融合。

这样,社会经济模型认为,一方面,任何时点上的族群的居住隔离都可归因于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差异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阶级群体本身是不均匀地分布于不同的城市居住区的。另外,如果购买力水平或地位水平相当的族群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居住隔离,那么族群居住隔离可以完全由社会经济分化来说明。^②

为了详细地考察这一论点的实证内容(参照多伦多的情况),我们采用一项技术——基于间接标准化之一般过程——这一技术可以产生每个族群的居住分布,而且这样产生的居住分布可被“预期”为这些社会经济条件独立作用的结果。这种程序在其他地方以及在相似的研究中已有透彻的讨论 (Duncan 1959; Lieberson 1963, Chap. 3; Taeuber and Taeuber 1965, Chap. 4)。一个运用多伦多资料的简要的例子将用于说明这一程序在此处的应用。在收入差异这一情况中,

① 在这些计算中运用了前述的社会经济变量。

② 此处表述的假设与 Taeuber(1965)在其所作的关于“贫穷”对解释美国城市中种族居住隔离的重要性分析是一致的。

把多伦多地区的人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知道给定族群的详尽分类中的每一个收入类别所占之比例。如果这些比例被应用到收入群体在城市各区域中的实际分布,它们就产生完全基于收入分化的预期居住于每一区域中的族群的数量。

为了与实际隔离水平相比较,我们可以计算出预期的族群的居住分布之间的分离指数。表3给出了不仅基于收入而且还基于教育和职业分布的预期的族群居住隔离的情况。竖栏1给出了英国族源群体——作为一个标准群体——与每一个其他族源群体之间的实际隔离指数。这种指数因为轻微的计算差异而与表1的第一行有所不同。有了未发表的数据后,在此我们可以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单独的族群来分析^①。在英国族源群体与每一个其他族源群体之间的“预期的”居住分布的隔离指数外,该表以百分比显示了预期指数与实际指数之间的比率。预期指数和预期与实际指数之间比率均据社会经济地位的三个指标来独立计算。

这一证据说明了先前的数据只提示了一点线索的论点,即三个社会经济标准中的每一个只能解释居住隔离的很小一部分(主导地位的英国人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居住隔离)。而且这一结论能应用于任何一对族源群体的居住隔离,尽管为了简洁起见这些数据没有包括在此^②。

收入方面的族群差异可以解释群体之间总体隔离程度的最大一块,平均可达其总量的19%。群体在职业与教育方面的差异,其预期指数占实际指数的百分比分别为16%和10%。基于收入的预期指数可近似地说明四个族源群体——“其他欧洲人”,“德国人”,“法国人”及“意大利人”——的30%的实际居住隔离,还可以说明“亚洲人”及“乌克兰人”群体的实际隔离的约20%。相反,只有两个群体(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职业构成差异可说明其居住隔离的20%以上,而在教育水平方面只有意大利人群体可说明其实际隔离的20%以上^③。一般地说,而且也许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犹太人群体的分离受社会经济分化的影响最小。最后,应该注意到在三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因素基础上所预期的居住分布不能被认为是附加的,因为这三个地位指标在每一种情况中以及在大

① 包括犹太人群体的地段分布的计算是基于小型调查区域的数据。调查区域数据被积累到地段水平,与原先的地段数据有些微差异。把犹太人群体特意包括进来是为更细致地评价多伦多族群隔离的经济基础。主要的差异在于这一群体已从“其他欧洲人”类别中转出。

② 实际的与期望的分离指数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分解其相关关系而进行深入考察(Duncan 1959),不过我们认为这对于分析的直接解释无甚助益。

③ 多伦多的意大利人群体比其他族源群体具有更大比例的移民(1960年为58.9%)。

多数情况下肯定具有某种或很高程度的相互联系的。可能除法国人与意大利人群体之外,教育、职业及收入差异的多重影响可以解释不到一半的族源群体之间的实际居住隔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远少于一半(见表3)。

表3 多伦多地区基于对教育、职业和收入间接标准化的英国人群体
与每一个其他族源群体的实际及预期的居住分离指数;
预期的与实际的指数之间的比率(% E/A)(1961)

族源群体	实际 指数	预期指数					
		教育	% E/A	职业	% E/A	收入	% E/A
斯堪的那维亚人	14.40	0.87	6.0	1.85	12.8	1.24	8.6
德国人	17.13	0.67	3.9	4.07	23.8	5.25	30.6
法国人	22.19	3.72	16.7	6.17	27.8	6.62	29.8
荷兰人	17.21	1.30	7.6	2.04	11.9	3.18	18.5
其他	26.16	1.81	6.9	2.59	9.9	3.71	14.2
亚洲人	34.93	2.62	7.5	3.57	10.2	8.05	23.0
其他欧洲人	32.27	3.73	11.6	4.97	15.4	10.25	31.8
乌克兰人	44.05	5.47	12.4	7.15	16.2	9.77	22.2
波兰人	48.09	4.30	8.9	3.13	6.5	7.73	16.1
俄罗斯人	53.61	2.84	5.3	8.07	15.1	2.89	5.4
意大利人	56.20	12.30	21.9	14.08	25.1	15.72	28.0
犹太人	78.87	1.40	1.8	10.01	12.7	2.95	3.8

资料来源:未出版的D.B.S.数据。

已讨论过的数据的内含意义尽管看似已经一目了然,但它们仍不能回答一些基本问题。首先,不管族源分类是多么独特,多么有用,其文化及行为的含义仍是一个未知数。这些数据无疑受到一定程度的人为设定变化的影响(Ryder, 1955)。而且,族源分类并不把本地出生的与移民人口区分开来,而对于后者而言,居住分离的横向分析的社会经济模型也许是更为适用的。更进一步,从描述的观点看,上述数据中没有一个可以提供对于实际上享有相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族群体在居住方面的隔离程度的直接评价。

出生地及母语群体的特殊期普查资料(special-run census data)允许我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此处考虑的母语及出生地群体仅限于被认为是1961年多伦多地区的最重要的民族“社区”。依民族特性的这两个维度而区分的群体之间的实际居住分离已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但是,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数值规模要高一些,它们在模式上与族源群体的既定数据十分相似(Darroch and Marston 1969)。我们还是只给出主导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依每一族群特征指

标而区分的居住分布的分离指数。讲英语的以及加拿大出生的群体被充作标准群体。特殊期数据可被用于以一种更为有限的方式复制族源群体的预期案例分析。在此,只有关于职业与收入分布的差异的数据是可获得的,而且这些数据仅限于白领——蓝领的区分,以及1960年年薪6 000加元以上者与6 000加元以下者的区分^①。不过,它可以表明,对于一个两分的社会经济变量而言:(1)两个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布之间的差异的百分比,以及(2)从社会经济群体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可以计算出与先前从族源群体用间接标准化方法算得的数据相当的预期族群隔离指数(Taeuber and Taeuber 1965, Chap. 4)。表4给出了这些预期的指数(与母语及出生地组的实际指数一起),还给出了基于职业及收入地位差异的两种指数之间的百分数比率。

表4 多伦多地区基于职业与收入变量的、英语组与其他母语组之间以及
加拿大出生者与其他出生地组之间的实际的及预期的居住分离指数;
实际的与预期的指数的比率(%E/A), (1961)

组别	实际 指数	预期指数			
		职业	% E/A	收入	% E/A
母语					
德语	26.67	6.08	22.8	4.72	17.7
其他语言	35.11	3.97	11.3	4.28	12.2
乌克兰语	50.41	5.90	11.7	5.72	11.4
波兰语	50.85	5.48	10.8	4.96	9.8
意大利语	61.95	10.34	16.7	8.28	13.4
出生地					
联合王国	13.88	0.50	3.6	1.92	13.8
美国	24.95	3.95	15.8	8.32	33.4
其他	29.08	1.15	4.0	4.12	14.2
德国	30.30	5.85	19.3	5.28	17.4
其他欧洲国家	30.26	5.22	17.3	5.36	17.7
俄罗斯	49.19	3.97	8.1	5.32	10.8
波兰	54.06	3.93	7.3	3.48	6.4
意大利	62.54	10.48	16.8	8.64	13.8

资料来源:特殊期 D.B.S 数据。

注:收入组之间的居住分离指数是 40;职业组之间是 26。

① 白领职业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及销售人员,再加上一个选出的本属于运输及交通类别的职业(如飞机驾驶员和操作员)。蓝领工人包括运输及通讯类别中的剩余者,加上服务及娱乐人员、手工业者以及工人。职业及收入变量均只涉及劳动力成员。

此处似乎又一次可以肯定,源于收入或职业地位差异的居住隔离只能解释很小比重的讲英语与其他母语组之间或加拿大出生者与其他出生地组之间的实际隔离。尽管语言组之间的实际居住隔离水平比族源群体之间的隔离水平要高一些,但看起来只有在德语及英语组中,职业或收入差异能够说明族群居住隔离的20%多一点。简要地说,对母语组的分析可以比对族源群体的分析证实更多的东西。

而且,上面已经说明过,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经济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移民人口在城市中心的经历这一思路的。就是说,移民最初聚集于已中心化的民族社区,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归因于其低水平的技能及教育,再加上在市中心能更容易找到低工资的工作以及廉价的住房等因素(McEntire 1960)。根据这一解释,多伦多地区的第一代移民与本地出生者之间的居住隔离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当考虑到源于社会经济因素的民族居住隔离时,对于解释较小部分的族群居住隔离差异方面,出生地组的数据也许是令人信服的。只是在很罕见的出生于美国的人与土生加拿大人之间的比较中,收入差异可以解释居住隔离的30%。在一般情况下,对于所有群体来说,收入差异只能解释移民与本地出生人口之间的不到16%的实际隔离,而职业差异只能解释不到12%。

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可发现它们的普遍含义。我们赋予那些来自联合王国的移民以“创始者”(charter)地位以及在研究中予以优先的选择(Porter 1965; Richmond 1967a),并不太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与加拿大出生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完全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居住隔离。另一方面,出生于意大利的人们既与加拿大出生者有高度的隔离,而且被认为是属于那些到达时只有最低水平正式教育和职业地位的战后移民(Richmond 1967a)。这样,关于移民这个问题,对于上面所说明的社会经济模型而言,如下两点是极为重要的:收入因素对于意裔加拿大人的居住隔离的影响并不比对于来自联合王国的移民的影响更大,而且职业差异也只是稍许显得重要一些而已。总之,把社会阶级构成考虑进去时,不同国家起源群体在居住分布方面就会几乎没有差异,这个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总的说来,上述案例表明,只有很小比例的族群人口之间的实际居住隔离可被归因于社会经济的差异。换言之,即使是具有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族群,它们之间在居住分布方面也必定有着显著的隔离。因此,直接比较具有相似社

会经济地位的各个族群之间居住隔离的程度及模式是很有启发性的。而且，直接分析可以察觉到族群隔离的一般模式中的显著性差异，因为一般关系中的例外情况或许会因特定社会阶级水平及特定族群而存在。例如，当社会经济地位只能说明英国人、意大利人之间的高度的实际居住分离中之一小部分时，高地位的英国人与高地位的意大利人之间的比较却可揭示出相对较低的居住分离。这种英、意人之间一般关系中的特定类型的变异（在此只适用于社会经济模型）在预期案例分析中是不会被察觉或被测量到的。

对族群性的两个方面（即母语和出生地）与低收入和职业之间建立交叉表使得这些特殊的比较成为可能。表5给出了社会阶级类别中母语组与英国人群体之间以及出生地组与加拿大出生者群体之间的分离指数。如果职业或收入差异是族群隔离的重要因素，那么，社会阶级类别之内的族群隔离水平应比作为整体的族群中的隔离水平要低一些。可是，表中指数表明，当以这种方式把社会阶级差异考虑进去时，所测得的标准群体（讲英语者及加拿大出生者）与其他入选的语言组及出生地组之间的隔离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尤其是，白领职业中的那些族群之间的居住隔离水平与相应的总的族群之间的隔离水平始终是近似的。对于不同族群的蓝领工人的居住隔离而言，这一说法同样是正确的。说明族群分离广泛存在的更令人惊讶的证据，也许是收入类别中的发现。表5显示，族群总体的隔离水平与那些年薪6 000加元以上或以下者组成的亚群体的隔离水平几乎没有差别，尽管这种划分收入组的标准（为了计算的便利起见）是为了区别出高收入群体而特别确定的（在这一时期，多伦多地区的所有男性的平均收入是5 000加元多一些）。

表5 入选的族群（母语及出生地群体）之间在
社会阶级类别之内的居住分离指数（职业与收入）

母语组	与英语组的 分离 (总劳动力)	社会阶级类别之内的与英语组的分离			
		白领	蓝领	年薪6 000 加元以上者	年薪6 000 加元以下者
德语	27	28	27	35	26
其他语言	35	37	34	38	34
乌克兰语	50	53	50	52	51
波兰语	51	51	52	53	51
意大利语	62	59	60	58	60

(续表)

出生地组	与加拿大出生者群体的分离 (总劳动力)	社会阶级类别之内的与加拿大出生者群体的分离			
		白领	蓝领	年薪 6 000 加元以上者	年薪 6 000 加元以下者
联合王国	14	16	15	17	14
美国	25	27	35	28	26
其他	29	29	38	32	30
德国	30	34	30	44	30
其他欧洲国家	30	30	31	31	29
俄罗斯	49	48	48	50	48
波兰	54	57	53	61	53
意大利	63	60	60	64	60

这些在社会阶级类别内的族群隔离程度的直接比较,已进一步证实了在详细的预期案例分析中所证明的东西——即,社会阶级因素本身显然不足以说明多伦多的民族隔离的原因。

除了社会阶级类别之内的族群亚群体之间的隔离与各族群总体人口的隔离程度的比较之外,这些数据也使我们得以对每一族群之内各个社会阶级类别之间的隔离水平作出评价。如同在其他地方已详细讨论过的那样(Marston 1969),如表6显示,事实上在每一族群人口或“社区”之内,不同社会阶级类别之间也存在着实质性的隔离。

表6 母语及出生地组在社会经济类别之间的居住分离指数(职业与收入)

分组	白领与蓝领之比	年薪 6 000 加元	
		以上者及以下者之比	
母语			
英语	24	36	
德语	27	46	
其他语言	27	44	
乌克兰语	25	54	
波兰语	30	53	
意大利语	22	54	
出生地			
加拿大	26	37	
联合王国	19	35	
美国	51	44	

(续表)

分组	白领与蓝领之比	年薪 6 000 加元以上者及以下者之比
其他	35	58
德国	27	51
其他欧洲国家	26	44
俄罗斯	30	49
波兰	35	51
意大利	22	53

不同收入组之间的隔离大大高于白领、蓝领工人之间的隔离。并不太令人惊奇,因为收入分类更具选择性。关键在于,假如本研究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经济差别资料,那么,表 5 和表 6 所显示的证据看来可以证实这样一种论点,即在多伦多地区,源于族群身份的居住隔离至少与源自社会阶级因素的隔离具有同样的显著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南欧、东欧人群体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社会阶级和族群因素两者均影响居住分离模式这一事实,可以通过考察阶级类别与族群人口的不同组合之间的指数来得到旁证。举例而言:讲英语的白领工人与讲乌克兰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的蓝领工人之间的分离指数分别是 57, 58 和 68, 这些指数中的每一个都高于各社会阶级分组内相应的族群之间的分离指数(见表 5)^①。

对于出生地而言,加拿大出生的白领工人与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出生的蓝领工人之间的分离指数分别是 53, 57 和 68。这里又是如此,阶级和族群因素的综合产生了比只有阶级或族群因素起作用(控制另一个的影响)时更高的指数值。

这些由族群与职业类别的综合而产生的分析结果,被由族群与收入类别的综合完全重复。这种比较分析的最清楚的结果(不管使用收入还是职业),是某些群体之间的高度的居住隔离——这些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由于其在民族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上所处的两个相反方向的极端位置而被最大化了。

总之,尽管我们使用的社会经济类别变量并不足以精确地反映族群在社会经济的构成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全部影响,但对于居住隔离的阶级和族群来源的分析已显示了社会阶级模型的不足之处。

^① 获得在区域水平上的特殊期 D. B. S. 数据的成本与困难阻止了我们作更为详细的考察。

结 论

分析族群居住隔离的社会经济模型被公认为是启发式的理论假设。不过,我们相信它表达出了通常社会学描述的实质性成分——即对于少数族群在居住方面与主体社会(*host society*)的整合过程的描述。当然,这样一种初始模型在面对观察和分析全范围的社会模式时是不够充分的。特别应该注意到,族群之间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的相似性或许与它们之间的不断减弱的居住隔离相联系,这一过程并不能由我们的数据来直接检验。不过,横向截面分析(*cross-sectional analysis*)通常使用一个工作假设(*working assumption*),即,重要的社会过程的结果是表现于给定时点上的模式中的。在此,我们认为在族群中,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是相似还是不相似(比如,表5所显示的数据),居住分离的程度在某些群体中总是很高,以至人们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测,即,如果社会经济地位相似性的不断增长已然发生,那么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这些族群之间居住隔离程度的显著降低。就可能的数据而言,这些仍然只是推测。^①

研究表明,第一代移民与以后的各代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在说明居住分布差异时,其相对意义并不太显著(表4)。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直接估计民族群体到达加拿大的时间对于社会阶级模型应用方面的重要性。不过,其他地方的论述表明,多伦多地区的族源群体在“移民期”的分布本身并不能说明多少实际的族群隔离(Darroch and Marston 1969)^②。这就表示——尽管是非结论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族群隔离之间的关系并不受民族群体到达时间的显著影响。

尽管横向比较的数据有其局限之处,但下列的结论看来可以被先前的分析所证实:族群在社会经济构成方面的差异——无论是用收入、职业还是教育标准来表示——只能解释多伦多地区族群居住隔离的很小比例。这不仅适用于族源群体,也适用于不同的语言组群体之间以及移民与本地出生群体之间的居

^① 在其一先前时间里,隔离水平或许会比这里所报告的高得多。在本研究的十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在多伦多,1961年的族源群体的隔离指数与1951年的数据基本一致。而且,本次研究中所提出的指数与其他族群隔离的分析所提出的指数(Liebensohn 1963; Collison 1967; Kantrowitz 1969)之间的比较,进一步表明多伦多1961年的指数可能是与以前一模一样的。

^② 通过运用预期案例分析,我们知道,就平均而言,预期的隔离指数只能说明18%的实际隔离指数。

住隔离。尽管阶级和族群身份确实都影响着“居住模式”，但具有相似社会阶级地位（职业或收入）的母语组或出生地组之间所存在的居住隔离并不比其族群总体人口之间的隔离低。这更直接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因为我们的分析仅局限于一个加拿大城市地区，论点的普遍意义的问题就产生了。比如，考虑到其高比例的战后移民（Richmond 1967a），多伦多甚至对于加拿大各城市而言也有其特殊性。不过，此处所作的预期案例分析已被其他两个加拿大的大城市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所重复。虽然它们在城市规模及族群构成和移民率方面不尽相同，对这两个城市族群群体的居住隔离模式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在三个社会经济因素中没有一个可以说明很大比例的实际族群隔离^①。这样，对于现代加拿大社会而言，社会阶级模式解释的不充分性显然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有趣的是，这一分析加拿大城市的证据与1930年克里夫兰（Cleveland）（Lieberson 1963）及1937年印度的Poona（Metha 1969）的情况相一致。事实上，这些是关于族群居住隔离方面仅有的其他研究（除了种族隔离研究），它们的分析都是基于实际族群居住分布与预期隔离之间的比较（预期隔离程度的计算则是基于族群在社会经济分布方面的差异）。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加拿大以外城市中族群隔离的社会阶级基础的近期证据，比较一下美国与加拿大的情况无论如何是值得的（考虑到社会阶级与族群之间关系的相关方面）。对加拿大而言，族群身份与社会的或经济的机会之间存在总体联系这一点已被揭示（Porter 1965），而对美国而言，最近报告中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族群身份能单独说明极小部分的教育和职业成就，至少对美国出生者和非黑人男性而言是如此（Blau and Duncan 1967；Duncan and Duncan 1968）。据此，我们似可认为在加拿大，族群身份对于说明族群隔离方面比应用社会阶级因素更为有效，而在美国的那些相比较的城市中，情况正好相反。不过，对于上述克里夫兰市的案例而言，事实仍是我们对于与族群隔离有关的因素知之甚少，除非多伦多和美国城市及整个工业世界的其他主要大城市是完全相似的。而且还存在一些相反的例证（Schnore and Peterson, 1958；Guest, 1969）。此处表述的论点对于我们的假设——关于族群居住隔离的程度及持续性原因

① 对族群群体的预期案例分析被依照收入、职业及教育三变量而重复进行。收入变量在此是基于所有收入，不只是多伦多研究所报告的工资及薪水。对于11个族群群体与美国人群体的隔离而言，期望的与实际的指数的平均比率（百分比）在蒙特利尔是：基于收入，7%；职业，12%；教育，11%。在温哥华，则结果分别是9%，21%和6%。

的假设——的更普遍性的评价,具有直接的意义。^①

在目前的分析中,所有未被社会阶级因素的运作所解释的族群居住隔离的原因统统被归到族群身份因素的名下。必须认识到,在这广泛意义上提及族群身份并没有给出一个可决定族群居住隔离模式的特定变量构型。比如,人口因素(如族群在人口规模和年龄——性别结构方面的差异)和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的差异)对于族群的居住隔离肯定具有影响。关于这些变量的实质还没有充足的信息,同时更少知道的则是它们通过何种特定方式被转变成族群的地位等级以及最终被转换成对于自愿的和歧视性的居住隔离过程的影响。对这些过程的特定实质作进一步的推测将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在研究城市中的分化时,族群因素(种族是例外)一般地说来还没有像社会经济地位那样被充分地看作为一个中心变量。

参考文献

Abu Lughod, Janet L. 1969. "Test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Area Analysis: The Ecology of Cairo, Egyp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April): 198—212.

Blau, Peter M., and Otis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Collison, Peter. 1967. "Immigrants and Residence." *Sociology* 1 (September): 277—292.

Darroch, A. Gordon, and Wilfred G. Marston. 1969. "Ethnic Differentiation: Ecological Aspects of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 (Fall): 71—95.

Duncan, Beverly, and Otis D. Duncan. 1968. "Minor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June): 356—364.

Duncan, Otis D. 1959.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Vienna: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Duncan, Otis D., and Beverly Duncan. 1955.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Segregation Index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 (April): 210—217.

Farley, Reynolds. 1970.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Negro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The Emergence of Black Suburb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 (January): 512—529.

Gcockel, Galen L. 1969. "Income and Religious Affiliation: A Regression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May): 632—647.

Goldstein, Sidney. 1969.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among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May): 612—631.

Guest, Avery M. 1969.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Burgess Zonal Hypothesis to Urban Canada."

^① 比如 Kantrowitz (1969) 最近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有证据表明美国城市中的族群隔离并没有下降到一般文献所提出的那种程度。

Demography 6 (August) :271—277.

Jackson, Elton F., William S. Fox, and Harry J. Crockett, Jr. 1970. "Religion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February) :48—63.

Jones, F. Lancaster. 1967. "Ethnic Concentration and Assimilation: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Social Forces* 45 (March) :412—423.

Jones, F. Lancaster. 1968. "Social Area Analysis: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mments Illustrated with Australian Dat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ember) :424—444.

Kantrowitz, Nathan. 1969. "Ethnic and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s, 196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4 (May) :685—695.

Lenski, Gerhard. 1963. *The Religious Factor*. Rev. 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Lieberson, Stanley. 1963. *Ethnic Patterns in American Citi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ieberson, Stanley, and Glenn V. Fugitt. 1967. "Negro-White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bsence of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September) :188—200.

McEntire, Davis. 1960. *Residence and R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ston, Wilfred G. 1969. "Social Class Segregation within Ethnic Groups in Toronto."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6 (May) :65—79.

Metha, Surinder K. 1969. "Patterns of Residence in Poona, India, by Caste and Religion: 1822—1965." *Demography* 6 (November) :473—491.

Porter, John. 1965. *The Vertical Mosai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owers, Mary G. 1968. "Class, Ethnicity, and Residence in Metropolitan America." *Demography* 5 :443—448.

Richmond, Anthony H. 1967a. *Post-War Immigrant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ichmond, Anthony H. 1967b. *Immigrants and Ethnic Groups in Metropolitan Toronto*. Toronto: Institute for Behavioural Research, York University.

Rhodes, Lewis A., and Charles B. Nam. 1970. "The Religious Context of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 (April) :253—267.

Ryder, Norman. 1955.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igin Statistic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1 (November) :466—469.

Schnore, Leo F., and Gene B. Peterson. 1958. "Urban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16 :60—68.

Sweetser, Frank. 1965. "Factorial Ecology: Helsinki, 1960" *Demography* 2 :372—386.

Taeuber, Karl E. 1965.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13 (August) :12—19.

Taeuber, Karl E. 1968. "The Effec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n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4 (September) :5—14.

Taeuber Karl E. , and Alma F. Taeuber. 1964. "The Negro as an Immigrant Group: Recent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in Chicag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 (January) : 374—382.

Taeuber, Karl E. , and Alma F. Taeuber. 1965. *Negroes in Cities*. Chicago: Aldine.

(曹建春 译, 张绍校)

族际通婚

G. 辛普森 (George Easton Simpson)
J. 英格尔 (J. Milton Yinger)

不同群体间通婚 (intermarriage) 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布劳 (Blau)、布卢姆 (Blum) 和施瓦茨 (Schwartz) 在研究了美国 125 个最大城市的族际通婚问题后指出: 小群体内的成员更有可能与群体外的人通婚; 在具有异质性人口的地区, 存在着较高的通婚率, 这些异质性至少表现在民族起源、母语、诞生地、行业和职业等方面。但不包括种族的异质性, 因为“种族间的巨大社会经济差异强化了种族间的界限, 并由此抵制了通婚中异质性的影响。”^① 然而, 当控制了收入差异这个变量后, “种族异质性和种族通婚之间则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在本章中, 我们将探讨黑人和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非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和非波多黎各人以及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间的性关系和通婚状况。^②

* 本文原载 G. E. Simpson 和 J. M. Yinger 所著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第 5 版 (Plenum Press, 1985) 的第 296 页至 307 页。翻译并在本书内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Plenum Press 的同意, 谨此致谢。

① Blau, Blum and Schwartz, 1982, p. 45.

② 有关这些研究题目但涉及美国的欧洲裔族群、亚洲裔、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等群体的研究, 请参见 Gordon, M. 1964; Greeley, 1970; Mindel and Habenstein, 1976; Monahan, 1973; Peach, 1980; Rosenthal, 1978; Yinger, 1979。

一、族际通婚在美国的普遍性

(一) 黑人与白人通婚

表 1 美国 1960 年和 1970 年黑人与白人通婚状况

	1960	1970	1960—1970 变化率
全美国:总量	51 409	64 789	+ 26.0
黑人丈夫,白人妻子	25 496	41 223	+ 61.7
白人丈夫,黑人妻子	25 913	23 566	- 9.1
北方和西部:总量	30 977	51 420	+ 66.0
黑人丈夫,白人妻子	16 872	34 937	107.1
白人丈夫,黑人妻子	14 105	16 483	+ 16.9
南方:总量	20 432	13 369	- 34.6
黑人丈夫,白人妻子	8 624	6 286	- 27.1
白人丈夫,黑人妻子	11 808	7 083	- 40.0

表 1 是根据 1960 年和 1970 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制定的,它显示了美国黑人和白人通婚的数量。^① 从表中可以看出,10 年间,美国全国范围内黑人与白人通婚总量增长了 26%,大大超过了同期全美国婚姻总数的增长率(10.1%)。不过,结婚的模式却有着重大差别。在这些通婚夫妇中,丈夫是黑人、妻子是白人的婚姻增长了 61.7%,而丈夫是白人、妻子是黑人的婚姻却下降了 9.1%。另外,在北方和西部,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数量增长了 66.0%,而在南方却下降了 34.6%。黑尔(Heer)假定,这是因为直到 1967 年,最高法院才裁定以前南方各州所存在的有关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是违宪的,所以,1960 年和 1970 年的黑白婚姻中绝大部分只是一种事实婚姻。

表 2 显示,在 1970—1980 年期间的 10 年间,美国已婚夫妇总数从 44 597 000 增加到 48 765 000。但是族际通婚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从 310 000 增加到 613 000。黑白已婚夫妇总数增长了 100 000,从 65 000 增加到 166 000。其他种族间通婚数量增加了 200 000,从 245 000 增加到 447 000。尽管不同种族间通婚数量继续增长,但是相对而言,绝对数值仍然很少。在 1977 年,它仅占所有已婚夫妇总数的 1%。在 1980 年,也只占 1.3%。^②

① Heer, 1974, p. 247.

②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December 1978, p. 7.

表2 1970—1980年种族通婚夫妇状况

项目	数目		百分比	
	1970	1980	1970	1980
已婚夫妇总量	44 597 000	48 765 000	100.0	100.0
异族通婚夫妇	310 000	613 000	0.7	1.3
所有黑白夫妇	65 000	166 000	21.0	27.0
黑人丈夫,白人妻子	41 000	120 000	63.0	72.0
白人丈夫,黑人妻子	24 000	46 000	37.0	28.0
其他异族通婚夫妇	245 000	447 000	79.0	73.0
黑人丈夫	8 000	18 000	3.0	4.0
黑人妻子	4 000	14 000	2.0	3.0
白人丈夫	139 000	254 000	57.0	57.0
白人妻子	94 000	161 000	38.0	36.0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1981, p. 41.

人口普查的数字很可能低估了族际通婚的广度。统计员一直未能计算出黑人的精确数量,混血家庭的成员也总是很难准确地加以识别。早期人口普查中的数字大部分是基于结婚证书,这是不精确的。根据西格士(Sickels)的调查^①,在哥伦比亚特区,一些在结婚证上注明为种族通婚的夫妇,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有些浅肤色的黑人在申请表中的“肤色”(而非“种族”)一栏中写上了“白色”字样;在纽约市,一些申请者却详尽注明了“黄绿色”(chartreuse)、“红色”(red)、“肉色”(flesh)等等。1969年公布的有关族际通婚的人口普查报告缺少11个州的情况,因为它们没有一个有关结婚证书的全州性档案,而在报告所涉及的36个州中,有许多州不再要求申请人填写种族情况。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密执安都取消了结婚证书中的种族一栏。^②

在美国,有关白人和黑人通婚的统计很少涉及这两个种族群体成员间的性生活的范围。在奴隶制时期,有多少黑人妇女充当了白人男子的情妇还是一个未知数。除此以外,黑人与白人间的性关系还包括自由的黑人与非黑人结婚,男性黑奴与白人女仆间的私通,北方和南方城市中的婚外通奸以及卖淫行为。威廉姆森(Williamson)观察到^③,黑白混血儿并非总是被列入黑人阶层,1850年之前,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属于第三阶级。威廉姆森写道:他们和白人的关系“有一种明显的西部印第安人情调”,有些人与白人结婚,特别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和

① Sickels, 1972, p. 127.

② Day, 1977, pp. 200—201.

③ Williamson, 1980.

路易斯安那州更普遍。但是直到 1850 年种族通婚还受到白人的强烈反对。寻着同样的思路,波特菲尔德 (Porterfield) 认为^①,反对白人与非白人通婚的法律在殖民时代恰好被通过,是因为人们认为有太多的白人女仆嫁给了黑人男奴。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在美国,那些如今被看做是黑人中的许多人——或许是大多数——和那些自认为是黑人的人,既不单纯是非洲祖先的后代,也不单纯是欧洲先辈们的子孙,他们的祖先本身亦是混血儿,因此他们的通婚应该被看做是次级 (secondary) 而非最初的 (primary) 种族杂交。

斯图克尔 (Stuckert)^②在对美国社会中被划为白人而又有非洲血缘的人(部分基因来自于一位非洲祖先)的比例进行研究后发现,在 1790 年,只有 2% 的白人带有某种程度的非洲血统,而到 1970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 23.9%。斯图克尔估计,在同一时期,带有非非洲血统的黑人比率从 19% 增加到 80.5%。如果在 1970 年,有 42 368 000 名“白人”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洲血统的话,那么,大多数带有非洲血统的人被界定为了白人。根据上述数据,约 64 000 000 人 (42 000 000 白人和 22 000 000 黑人),或者说大约 29% 的美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非洲血统,这一切都表明,在白人中,种族的纯正性只是一个神话。

最近一本有关美国种族融合的著作指出,黑人与白人的婚配是极少的,并宣称自 1865 年以来就一直如此。黑奴解放以后,种族融合实际上停止了,但是黑人与混血儿的融合却出现了一个高峰期。威廉姆森引用的研究表明,^③绝大多数黑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白人血统,并且估计黑人的“基因库”(gene pool) 中,约有 1/5 来源于白人,而在白人“基因库”中,大约有 1% 来源于黑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期间,种族通婚有着某种程度的增长。不过,这些增长几乎全是由于与黑人男子结婚的白人妇女增多。不像早期大多数通婚那样,在这一时期跨种族通婚的人中,大多数属于中等和上等阶层。不过,跨种族通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是相当的小。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④,在 1965 年的全年中,在美国每千对夫妇中只有不到两对属于白人与黑人之间联姻。白人团体继续施压,反对与本种族外的人约会和结婚,黑人社区亦如此。许多黑人,特别是妇女,严厉谴责那些跨越种族界限约会和结婚的黑人,指责他们是机会主义者。

① Porterfield, 1978.

② Stuckert, 1976, pp. 135—139.

③ Williamson, 1980, pp. 113, 188—191.

④ Williamson, 1980, p. 189.

1977年,美国有125 000对黑白通婚夫妇,几乎是1970年65 000对的两倍,这个数字占所有黑人已婚夫妇总数的3.6%和所有白人已婚夫妇总数的1.3%。^①

(二) 墨西哥裔美国人的通婚

西班牙语裔与别的民族成员通婚的比例比跨种族通婚比例要高得多。^② 1977年,在美国48 000 000对夫妇中,就有762 000对夫妇有一方具有西班牙血统而另一方不是,而其中又几乎近一半是妻子带有西班牙血统。这762 000对夫妇虽然只占美国所有已婚夫妇总数的2%弱,但是,它却占所有西班牙语裔婚姻总数(24 000 000对,夫妻一方或双方具有西班牙血统)的31%。^③

由于墨西哥裔美国人获得了中产阶级地位,种族特征趋于淡化。中产阶级的地位使他们更多地参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活动,导致西班牙语的使用减少,与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接触也逐渐减少,同事中具有墨西哥血统的人也越来越少。向上流动经常意味着地理上的流动。由此而与英裔美国人有了更多的交往。对于从西南部迁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更是如此。^④

在可获得充分资料以兹比较的三个州中,墨西哥裔美国人外婚率最高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其次是新墨西哥州,最低的是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外婚率最高的是伯萨县(Bexar county, San Antonio),在1973年达到16%。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外婚率在1962年达到最高纪录,全州达到38%。在新墨西哥州,外婚率最高的是伯纳利欧县(Bernalillo county, Albuquerque),1967年达到31%。总之,在这三个州中,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外婚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在那些外婚相当普及的地区(Bernalillo county, New Mexico, and the State of California),外婚率看起来已经停止了有实质意义的增长。外婚比例中这种呈现明显稳定的状态,很可能是由于大量墨西哥新移民的迁入所致,并且强调民族意识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运动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⑤

穆尔吉亚(Murguia)发现,当考虑到多数族群中的个体与少数族群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时,只运用“同化”这个概念是不够的。^⑥ 他在对得克萨斯州的三个

① Glick, 1981, p. 119.

② Jaffe, Cullen and Boswell, 1980, pp. 63—68.

③ Bureau of the Census, December 1978, p. 7.

④ Murguia, 1982, pp. 14—25.

⑤ Murguia, 1982, p. 47.

⑥ Murguia, 1982, pp. 60, 80—110

县和新墨西哥州一个县的族际通婚的研究中,使用了“断绝联系”(breaking of ties)这个概念。无论是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的个体都被看作是受到其同质性子系统(即本族群)的约束。各个群体的成员是否选择外婚取决于个人性格特点是否鼓励他与群体外的人交往。

穆尔吉亚指出^①,墨西哥裔美国人境况有几个因素减小了其被完全吸纳进多数族群社会的可能性。首先,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体质特征使他们被界定为至少部分区别于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第二,美国西南部的历史使其在某些方面更注重墨西哥文化,比如在烹饪和建筑艺术方面。第三,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较大的人口规模减缓了它的文化适应和社会整合过程。第四,美国西南部城市和墨西哥的几个主要城市之间,相对来说距离比较近,这有助于维持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接触。第五,美国的经济机会将继续吸引墨西哥人的合法与非法迁入,这在无形中会增强墨西哥裔的群体文化。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墨西哥裔美国人生活中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化和结构同化。墨西哥裔美国人与英裔美国人的通婚率在最近几年一直呈稳定状态。穆尔吉亚预测,如果墨西哥裔美国人能普遍被盎格鲁人所接受,且存在着充分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的话,通婚率将会上升。反之,偏见和歧视的增加,墨西哥裔美国人聚居区与外界社区的隔离以及他们保持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将会导致通婚率的降低。

(三) 波多黎各人的族际通婚

80%以上的波多黎各移民和本族成员结婚,但是在他们的孩子中,即那些生于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各人中,这个比例仅为50%多一点。^② 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那些已婚且仍和配偶生活在一起的第二代妇女中,有34%的人是嫁给了非波多黎各人。纽约以外的地方的通婚率相对高些:在已婚且仍和配偶生活在一起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中,68%的男子和65%的妇女是与外族的人结婚。197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没有对他们的非波多黎各配偶是否是拉丁美洲人作出区分。^③

(四) 美国印第安人的族际通婚

罗伊(Roy)在对斯波坎印第安人保留地(Spokane reservation Indians)的小

① Murguia, 1982, pp. 112-113.

② Wagenheim 1975, p. 9

③ Fitzpatrick, 1976, pp. 214-215

样本(28对夫妇)进行调查后估计,^①保留地的80%—90%的人口呈现出某种形式的混血特征。部落的档案揭示出每个成员身上带有印第安血统的比例:平均每个男人有55%的印第安血统,妇女达到59%。在28对夫妇中,仅有8对是夫妇双方都是纯印第安人血统,其他已婚者要么是半印第安人与半印第安人,要么是半印第安人与白人或半印第安人与纯种印第安人。沃克(Walker)有关高原地带内珀西人(Nez Perce)隔离区人口减少的分析显示^②:他们与其他印第安群体及欧裔美国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通婚正在增加。普赖斯(Price)在研究了洛杉矶市的印第安移民后发现^③:在被调查者父母那一代,64%的夫妇来自于同一部落,而在被调查者这一代,只有39%的夫妇是出自同一个部落。在已婚的被调查者中,约1/3是与白人结婚。他们的后代,尽管有时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土著美国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在向白人同化。^④

二、影响种族通婚和不同种族成员间性行为的因素

自奴隶制时期起,在那些未制定反种族通婚法案的州中,一些杰出人士就与非本种族的人结了婚,他们中的一些人家喻户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南北战争后黑人的主要代言人,在1884年与一个白人女权运动者结婚。迪万神父,20世纪20—30年代的宗教领袖;沃尔特·S·怀特,长期担任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执行秘书长;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牧师兼国会议员;勒鲁瓦·琼斯,黑人诗人;理查德·赖特,小说家;爱德华·W·布莱克斯,马萨诸塞州前参议员;詹姆斯·法默,美国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前领导人,后来担任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助理;艺术家珀尔·贝利、哈利·贝拉丰特、小萨米·戴维斯、查比·切克、埃尔哈·基特、莱斯利·乌格姆和莉娜·霍因等等都和白人结了婚^⑤。根据西格士(Sickels)的看法,这些黑人的族际婚姻,主要是标志着黑人的社会解放。同时,前国务卿腊斯克(Rusk)的女儿玛格丽特·腊斯克与一个黑人的婚姻则标志着白人的解放。今天,旧的婚姻模式,即黑人政治领袖、表演家和其他黑人著名人士与白人结婚,可能正在衰落。一个黑人表演家通过与一个白人结婚而获得向上流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些黑人激进分子甚至把黑人与非

① Roy, 1972.

② Walker, 1967, pp. 155—156.

③ Price, 1972.

④ Wax, 1971, pp. 191—192.

⑤ Sickels, 1972, p. 124.

黑人的联姻视为一种退步。^①

纳珀(Napper)指出^②，在其他方面，黑人中讨论的最具破坏性的主题之一，就是黑人男子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敌对状况，这种观点自南部奴隶制时期起就在美国存在，其实正是奴隶制导致了它的产生，而种族偏见又使其继续。这些背景既使人们对黑人男性产生一种印象即他们生育力旺盛而又对配偶毫无责任感，这也使得黑人妇女更倾向于独立。

我们无法对黑人与白人的约会做出估计。^③现在大学里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住在校内，行政部门就此问题也没有记录。在北方、东部、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各个兼收白人与黑人学生的大学里，比如得克萨斯大学，黑白夫妇时常被师生员工津津乐道。^④

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约会比结婚要多得多。但是，也有一些新的趋向正被注意到。根据戴(Day)的观察^⑤，20年前，种族通婚的双方很可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并且两人都是低薪雇员——经常是做家庭服务工作。在大量个案中，夫妇中白人的那一方都是在国外出生的，而现在，在相互恋爱有时结了婚的年轻的一代黑人和白人中，双方大多都出生在美国，并且他们常常是在大学校园或求职时相识的。通常情况是：双方至少都受过高中教育，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在那些已婚的人中，结婚对方都趋向于比从自己本族内寻找的人要年龄稍大些，且经常是夫妇中有一方或双方属于第二次结婚。

为数众多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不同种族成员间的约会和婚姻。这些变量包括：性比例、群体规模、群体内生活条件、工作场所内的交往机会、居住地区、娱乐场所、教育设施、社会流动、社区对种族间交往的态度、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潜在的约会或通婚双方间的文化相似性。^⑥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在决定不同种族间约会或通婚方面，上述哪一种因素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前文就已指出，美国1960年和197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1960年，丈夫是黑人、妻子是白人的夫妇与丈夫是白人、妻子是黑人的夫妇数量几乎相等。而到1970年，前者却比后者多60%，这种趋势在1970—1980年间仍继续存在。

① Sickels, 1972, p. 125.

② Napper, 1973, pp. 82—83.

③ Staples, 1973/1978, pp. 265—269.

④ Day, 1972, p. 11.

⑤ Day, 1977, p. 205.

⑥ Blackwell, 1977, pp. 234—235.

1970 年黑白已婚夫妇中的 63% 属于丈夫是黑人、妻子是白人^①，与此相比，在 1977 年这一比例达到 74%。人们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假设来解释这种差异。其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黑人男子与地位较低的白人女子结婚，而导致了黑人男子较高社会地位与白人妇女较优越的肤色地位间的交换。第二个（接受性）假设是：黑人男子很难与白人妇女进行社会交往，他们之间合法的性关系主要是通过结婚，而白人男子与黑人妇女间却不然。波特菲尔德对混合婚姻的调查和其他研究显然支持第二种假设。^② 目前，跨种族通婚的个体倾向于在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职业特点上彼此类似。

众多的混血儿群体居住在东部各州，这些混血儿群体以杰克逊·怀特（纽约和新泽西）、摩尔上和南蒂科克（特拉华州）、韦斯特（马里兰）、盖尼斯（西弗吉尼亚）和马兰金斯（田纳西）等名字而闻名。在弗吉尼亚，有许多著名的团伙，如鲁蒙士、依林斯、卡宾斯和布朗人以及那些声称是印第安部落后代的人，包括 Chickahominy, Mattaponi, Pamunkey, Nansemond 和 Rappahannock。许多这种类型的团体居住在北加利福尼亚，在鲁宾逊县有 30 000 Lumbees, Haliwas 及葡萄牙人和 Smilings 人。在南加利福尼亚，这些人包括 Brass Ankles, Croatans, Redbones, Redlegs, Buckheads 和 Yellowhammers。路易斯安那州也有许多这类人，在该州的南部，有霍玛（Houma）印第安人，亦被称为 Sabines。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被称作 Redbones 的群体。阿拉巴马州有被称作 Creoles 和 Cajuns 的混血儿（欧洲与印第安人）。佛罗里达州有 Dominickers，俄亥俄州有一个 Carmelite 社区，罗得岛州有 Narragansetts，马萨诸塞州有 Gay Heads 和 Mashpees^③。许多混血儿自认为是白人，并且对任何认为他们不是白人的看法不满，与白人结婚得到普遍的赞同，而与黑人结婚却会招致排斥。还有许多混血儿选择与印第安人认同，其中包括那些对于曾期望被看作是白人但可能已感到绝望的人，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 Sabines 人坚持认为自己是 Houma 印第安人。一些混血儿社区逐渐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成员已经迁居到其他州或到一些像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和阿肯罗等这样的大城市去了。贝里认为^④，那些离开了团体的人，除了大多数可能已成为白人以外，一些人最终会通过婚姻进入或自我认同到黑人社区中去。

与所发现的黑人与白人通婚的特点不同，墨西哥裔美国人男子和妇女的外

① Glick, 1981, p. 119.

② Porterfield, 1978, pp. 96—97.

③ Berry, 1972, pp. 191—192.

④ Berry, 1972, p. 211.

婚率显示,妇女比男子更易外婚,其各自的比例是男 24% 和女 27%。^① 通婚中的性别差异在每一代中都存在,其中,外婚率最高的是第三代妇女(32%),最低的是第一代男子(13%)。在对两代波多黎各裔外婚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这两个案例都可以用社会阶层分析框架加以解释,即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更可能与群体外的人结婚。此外,在一个允许比较自由的社会互动的环境里,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族群及家庭在作为人们身份的主要来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趋于弱化。^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更可能与英裔美国人、而不是与从墨西哥来的移民成婚。对第三代墨西哥裔美国人男女来说,他们与英裔美国人结婚的机会比第一代或第二代人多得多。

拉鲁发(La Ruffa)在对波多黎各裔族际通婚的研究中断言^③,以波多黎各群体社会为对象,很难把它的种族通婚看成是像社会科学文献中对这一现象的一般性理解。波多黎各裔并不是由单一人口组成的,它在岛上和大陆上的人口由三部分组成:白人、黑白混血儿、黑人。种族通婚这个术语正如在美国一样,在波多黎各人中也使用得相当频繁。然而,通婚的普遍并不意味着在波多黎各人生活中,种族是不重要的因素。波多黎各人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有着相当强的种族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岛上人口中有着大量的黑白混血儿,这些人在皮肤颜色和发质方面差异很大。当中上阶层成员结婚时,种族意识突出表现在“白人意识”中。最近几年,伴随着岛上的工业化,中上层阶级不断扩大,种族影响也随之增长。白人意识对居住在纽约的波多黎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是重要的。和岛上一样,黑白混血儿占纽约波多黎各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倾向于与波多黎各白人而非黑人认同。^④

我们曾提到:研究表明,在美国印第安人中,种族通婚相当普遍并且呈增长趋势。沃克(Walker)关于高原地区内珀西人(Ne Z Perce)隔离区人口减少的分析显示^⑤:内珀西人和其他印第安群体及欧裔美国人社会中的少数族群的通婚正在增加,但是与白人的通婚仍然占优势,这部分是由于白人是内珀西人所接触过的最大的非内珀西人团体,部分也由于内珀西人本身不赞成与黑人、拉美人和在大盆地南部生活、使用肖拉尼人语言的印第安人通婚。沃克还发现,在

① Grebler et al., 1970, p. 408

② Grebler et al., 1970, pp. 581—582; Schoen and Cohen, 1980, pp. 359—366

③ La Ruffa, 1975, p. 220.

④ La Ruffa, 1975, pp. 224—225; See also Gurak and Fitzpatrick 1982, pp. 921—934 (参考书目中未提供)。

⑤ Walker, 1967, pp. 150—152.

内珀西人中的不同的群体,外婚的情况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保留地以外生活的群体所拥有的内珀西人基因比保留地内的少。同时在保留地的 Lapwai 人外婚比 Kamiah 人更多,这主要是由于后者几乎完全是长老制统治,他们特别偏爱部落内部通婚。

三、关于种族通婚的法律

美国有关种族通婚的法律演变史是十分有趣的。直到最近,密西西比州仍有一刑事法规,对一切印刷、出版、传播任何赞成或鼓动种族通婚或“社会平等”的文艺作品的人予以惩罚。

据说在路易斯安那州,由于混血儿数量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申请结婚证的人外表的混血特征很明显,他才可能会遭拒绝。一般来说,白人与一个带有少许非洲血统的人的婚姻只会受到那些对其财产继承感兴趣的人的询问,而法庭对混血的孩子很少过问。^①

在南方和西部各州,许多立法机关制定了若干法律,严惩不同种族的男女之间任何非法的性关系,包括以情(夫)妇形式同居或单纯的性行为(不论是私通——双方至少有一方是未婚,还是通奸——双方都是已婚)。通常情况下,禁止非法同居的法律,亦用于惩罚种族间违法的性关系。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处罚黑人与印第安人同居的法令。得克萨斯州则惩处那些已结婚的白人与黑人与非配偶的其他种族的人持续同居的行为,无论他们是在州内还是在州外结婚。但是看它是否违法,婚姻的存在是根本因素,并且必须有确凿证据证明它的存在。^②

当任何一个人被控告触犯了通婚法或被控告是同谋时,为了确定他的种族而提出的可被法庭接受的证据是相当有趣的。下面几种证据被裁定为可接受的,包括:把被告或他(她)的情妇(夫)带进法庭让陪审团的人查验,以便确定此人是否是黑人。考虑到“包括此人的直系或旁系亲属”,所以对其亲属,上述查验方法也同样适用。甚至如果“其不是很远的祖先的某一位有卷曲的头发和其他黑人的种族特征,不管有无照片,都可以作为有黑人血统的证据。”^③

差不多同时,41 个州通过了有关种族通婚法案,在 20 世纪 40 年代,30 个

① Barron, 1948, pp. 50—58; Johnson 1943, pp. 162—169; Klineberg, 1944, pp. 358—364; Mangum, 1940, Chapter 10

② Mangum, 1940, pp. 256—257.

③ Mangum, 1940, pp. 262—263.

州通过宪法或成文法或者双管齐下的办法禁止白人与具有各种不同方法定义的“黑人”结婚。到1963年,通过废除禁止种族通婚的法规或利用州法院的决议宣布其无效等方法,使这些明令禁止种族通婚的州的数量减少到21个^①。在20世纪40年代,还有15个州拥有或明或暗地禁止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和蒙古人种(Mongolian)通婚的法律,有10个州禁止白人与马来西亚人通婚,5个州禁止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路易斯安那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禁止黑人与印第安人联姻,北卡罗来纳州禁止罗宾逊县(Robeson)的柴罗基部落(Cherokee)的印第安人与三代以内有黑人血统的人通婚。马里兰州禁止马来人与黑人通婚。至于一个人要有多少黑人血统才无法和白人缔结有效婚姻,各州规定都不同。^②

1948年,最高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州的反通婚法是违宪的。在那以前,在全国各地,没有任何一个州和联邦法院在任何情况下裁决过反通婚法是违宪的。佩雷兹·V.利泊尔德(Perez V. Lippold)决议废除了州民法法典的一节,因为它宣称:“所有白人与黑人、蒙古人、马来亚人和混血儿的婚姻都是不合法的和无效的”,这违背了“法律保护人人平等”的保证。案中的原告,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提出:“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在宪法保证宗教自由的法律基础上,他们有权结婚,因此县公务员不应拒绝签发他们的结婚证书。”而公务员的律师则争辩说不存在着任何歧视,因为任何团体都一视同仁,即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必须服从有关法律的条款。法庭的回答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白人男子能与一个白人女子结婚,那么,一个黑人男子也应该可以。公务员的律师援引了一个古老的密苏里州的案例,在那个案例的判决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值得相当注意的事实应该提到:如果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妇女,或一个白人男子与一个黑人妇女结了婚,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后代,这个事实为那些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法律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使得它的颁布不再需要别的依据。”法庭反驳道:现代观点不同意这一所谓的“事实”,也不同意这位县律师所引用的1869年佐治亚州的意见:“种族通婚不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会产生悲剧性后果。我们日常的观察告诉我们,这种违反自然的结合所产生的后代在生理发育和力量上都不如双方具有纯正种族血统的人。”法院认为,密苏里州和佐治亚州的理论是否正确,与法律本身无关。对于公务员断言通婚的人都是“社会渣滓”

^① 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各州是:Alabama, Arkansas, Delaware, Florida, Georgia, Idaho, Indiana, Kentucky, Louisiana, Mississippi, Missouri, Nebraska, North Carolina,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nnessee, Texas, Utah, Virginia, West Virginia, Wyoming.

^② Mangum, 1940, Chapter 10.

(dregs of Society), 他们的后代日后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法院回答说: 并没有禁止社会渣滓们通婚的法律。^①

1964 年, 美联邦最高法院一致同意废除了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法律, 因为它规定不同种族的人同居是犯罪。^② 法院在 1967 年 7 月裁决洛温诉讼弗吉尼亚州一案中, 就此事做出了最后正式的答复。《美国法律周刊》写道:^③

“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反对禁止种族通婚的州法律时, 还有 17 个州仍保留着相似的条款。最高法院反对州法律的最终决议出现在对洛温夫妇控告弗吉尼亚州一案的判决中。理查德·特里·洛温和他的半黑人半印第安人血统的妻子米尔德丽德·杰特·洛温于 1958 年在华盛顿特区结婚, 因为他们在弗吉尼亚州无法申请到结婚证书。婚后他们返回弗吉尼亚州, 却被指控违犯了反通婚法而宣判有罪, 被判处一年监禁, 但如果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州, 并且在 25 年内不一块儿回来, 监禁可缓期执行。法官在宣布缓期执行时声称: ‘全能的上帝创造了白人、黑人、黄种人、马来人和红种人, 并把他们放在各自分开的大陆上。种族通婚的唯一原因就是要抵制上帝的这种安排。上帝既然把各个种族隔离开来, 那就表明他不愿看到种族的混合。’洛温夫妇离开了家乡一段时间, 但是 1963 年, 他们又回到家乡, 向不公正的判决挑战。1966 年 3 月, 弗吉尼亚州最高上诉法庭裁决道, 15 年来, 联邦法院的决议从来没有侵犯过‘各州在婚姻制度方面拥有的绝对权益’, 有权推翻法院所执行的法律的机构, 从法律最根本意义上来说, 只能是司法立法机关。上诉法院认为, 法律的任何修改都应来自立法机关。这项裁决维持了对洛温夫妇最初的判决, 但法院又补充说, 他们可以同时回弗吉尼亚, 只要他们不同居。”

1967 年 7 月, 美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弗吉尼亚州的这项法律“仅以种族类别为依据而阻碍两个人结婚, 违背了第十四次修正案所规定的法律保护人人平等的根本原则及正当程序条款。”

当各州反种族通婚法案被废除后, 横亘在种族通婚面前的唯一障碍就是社会和心理因素。与那些百年来一直支持反通婚法案的人的预言正好相反, 反种族通婚法的废除并未导致黑人纷纷寻找白人伴侣。^④

① Sickels, 1972, pp. 98—99.

②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66, p. E12.

③ June 13, 1967, pp. 4679—4682; See also Sickels 1972, pp. 104—122.

④ B. Day, 1972, p. 14

四、对种族通婚的态度

最近几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提问的方式不同,所得到的回答的差别也就相当大。例如,1965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近半数的回答者赞同将种族通婚定为犯罪。六年以后,哈里斯(Harris)民意测验发现,人们对不同种族的约会和通婚普遍都能接受,但对这种关系成功的可能性却表示出一定的关注和怀疑^①。1972年,全国民意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在它的综合社会调查中,询问了一组经过仔细挑选的成人样本:“您认为应该有一项法案来阻止黑人与白人结婚吗?”3%的人回答“不知道”,39%的人说“应该”,61%的人回答说“不应该”。当同一问题在1982年被问及时,30%的人说应该,70%的人说不应该。

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应答与实际行为之间经常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对于自己关系很近的亲人要与别的种族的人通婚,和对于笼统意义上所说的种族通婚,人们通常也采取不同的态度。至少在口头上,有更多的白人变得越来越能接受或能容忍种族通婚。

对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两个小城镇及克利夫兰和堪萨斯市的30户黑人家庭的研究显示,回答者中很少有人赞同他们大家庭的成员与白人结婚,不赞同看来主要是基于对白人普遍的不信任,反对通婚的其他原因包括:这种婚姻表示缺乏种族自豪感;通婚者的家庭成员易受白人羞辱和黑人的排斥;偶尔来自配偶的种族偏见;以及黑人妇女对于不得不与白人妇女争夺黑人男子的怨恨。有少数人对种族通婚采取宽容态度,他们认为,结婚是个人私事,仅与结婚的双方有关。^②

布莱克威尔(Blackwell)提到^③:对于黑人男子和白人妇女的结合,不管是约会还是结婚,都存在着极为反对的制裁措施。涉及这种关系的黑人男子有时被看做是损害了其他黑人的尊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社会的孤立、侮辱,并且在住房、工作机会等方面受到歧视。布莱克威尔指出,黑人男女性比例失衡使得在约会和婚姻方面,缺乏足够的黑人男子,再加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男子比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妇女少得多,以及进监狱的黑人男子过多,这些事实

① B. Day, 1972, pp. 16-17.

② Martin and Martin, 1978, p. 67.

③ Blackwell, 1977, pp. 236-237

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原因经常促使黑人妇女强烈反对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

五、跨种族约会与婚姻的一些影响

在法律被修改、公众态度正在改变但反对声依然络绎不绝的情况下,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约会和婚姻面临着各种特殊的环境和问题。^①

(一) 黑—白婚姻中的家庭关系

黑—白婚姻中的一方或双方通常都属于第二次结婚,且配偶的年龄常常比从自己本种族内寻找到的要大一些。^② 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黑人和白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及角色整合^③。在变化较大的方面,即男子开始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方面,黑人家庭的变化比白人家庭的变化小。尽管有些黑人男子,当他们感到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后,他们回家就不愿做家务活,但大多数黑人男子和他们的家庭已经参与到角色分工和角色转换中去了。^④

戴(Day)发现,她所访问过的所有恋人(双方来自不同种族),要么已经有、要么倾向于组建一个家庭,而十年前所做的此类研究却未发现这种情况。戴后来写道,^⑤在上一代通婚的夫妻中,不要孩子的夫妻占很高比率,与此相反,现在结婚的夫妻很可能都会要孩子。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足够的避孕用具,以及堕胎法的放松,这些都影响了黑人、白人和黑—白家庭的平均规模。1970年,丈夫是黑人、妻子是白人和丈夫是白人、妻子是黑人的家庭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比夫妇全是黑人的家庭要少,而与夫妇全是白人的家庭类似。在上述种族通婚的两类家庭中,45岁以下各个年龄段的无孩妇女的比率比纯白人或纯黑人家庭中的妇女高些。关于种族通婚家庭所生育子女的精确数字未能得到,因为不清楚在1970年出生于一个种族混合家庭的孩子,是否就是他母亲当时的婚姻所生。在大量种族通婚家庭中,配偶中的一方已经结过不止一次婚,一些妇女在1970年已生育子女中,有

① See Blumberg and Roye, 1979; Tseng, McDermott, and Maretzki, 1977.

② B. Day, 1972, p. 16.

③ 关于黑白夫妇日常生活一些有趣方面(娱乐、开销、非语言交流、感情表示、夫妇角色等)的讨论,请参见戴的论述(B. Day, 1972, pp. 233—250)。

④ B. Day, 1972, p. 297.

⑤ Day, 1977

几个甚至全部都是她们上一次的族内婚姻的结果。黑尔总结道：^①黑一白家庭的生育率比纯黑人家庭要低。

有关黑一白家庭中孩子的最有趣的研究之一发现^②：比起黑人夫妇所生的孩子，这些混血儿要遇到更严重的认同问题。泰撒尔（Teicher）发现，这些孩子中许多人感到，黑人在这个社会中地位低下，因此，他们怨恨父母，也无法与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认同。具有不同种族特征的兄弟姐妹之间也会诱发不满的产生。对那些生活在父母都是黑人的家庭而其生理特征又明显不同的孩子来说，进一步的研究会对那些影响到他们的问题提出更深入的看法。

这些混血儿的父母经常试图帮助他们的孩子对一些可能遭遇遇到的问题做好准备。戴访问过的几对夫妇声称^③：他们已找过其他有孩子的黑一白夫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感到有一个黑人父（母）是奇怪的或不正常的，并且他们相信，孩子们都愿意知道还有别的孩子具有和他们同样的肤色。

一名起初嫁给了一个黑人艺术家，后来又和一个白人结婚的犹太妇女说，她的十几岁的混血女儿，尽管与其继父相处很好，却好像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姑娘和她的亲生父亲之间没有什么来往。对她来说，接受两个白人作为父母似乎非常困难^④。戴补充说，犹太人—黑人混血的孩子必须确定，他是愿意做犹太社区的一员呢，还是黑人社区的一员。戴认为，^⑤对于犹太人—黑人婚姻所产生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父母中的黑人一方转信犹太教，或者不反对孩子受犹太教育的话，社会对这些孩子会表现出更多的认可。

像黑人孩子一样，混血的孩子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所碰到的社会问题也逐步增加，特别是当他们十几岁开始约会时。即使儿时在一起游戏的伙伴到了青春期也趋向于分离。^⑥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其他一切都相同的状况下，父亲是白人、母亲为黑人的家庭是否能够比父亲为黑人、母亲为白人的家庭提供一个更好的向上流动的起点。黑尔认为，^⑦如果假设，在通过家庭的交往而能比较容易地获取工作方面，父亲比母亲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或进一步假设，与白人父亲相比，如果白人母亲无法提供更多的与白人社会特性相关的继承权或教育的话，那么答案就

① Heer, 1974, pp. 251, 256—257.

② Teicher, 1968, pp. 146, 249—256. (参考书中未提供)

③ B. Day, 1972, p. 303

④ B. Day, 1972, p. 308.

⑤ B. Day, 1972, pp. 309—310.

⑥ B. Day, 1972, p. 306.

⑦ Heer, 1974, p. 257.

是肯定的。然而,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妇女的婚姻经常只是双方同意但未经法律认可的同居关系,这种关系中的白人丈夫相对来说可能不大关心孩子。

(二) 跨种族的收养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收养别的种族的孩子。^① 1970年,有2200个非白人婴儿被白人收养,是1968年的一倍,并且1/4以上发生在俄勒冈、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州。根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的统计,主要由白人领养的亚洲孩子的数目从1971年的1672人增加到1976年的5044人。对跨种族收养反对最强烈的是孩子的亲属(特别是祖父母)、邻居和一些反对白人家庭抚养黑人儿童的黑人代言人。收养机构从孩子方面来考虑问题,他们认为:提供给孩子一个家庭和父母,与为了让孩子保持种族或文化的特征而呆在收养院里变得毫无活力相比,前者要重要得多。^②

(三) 不同种族约会和通婚所带来的问题

跨种族的约会和婚姻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在各个地方差异很大。那些考虑到与外种族的人约会的黑人或白人妇女必须意识到对她们的名声可能造成的伤害。许多地方的人们都认为:跨种族约会的双方一定发生了性关系,所以与别的种族的人约会的女孩可能被看做是乱交。^③

除了靠近美国一些最大的大学的街区和纽约及别的大城市中一些倾向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地区外,黑—白家庭夫妇都碰到过黑人家庭所碰到过的问题:在租房过程中遭房东的拒绝。中产阶级经常靠更换街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搬到正在经历着由白到黑或由黑到白变化之中的街区,并且试图与那些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群体认同,但这一直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④ 根据波特菲尔德的看法,^⑤如果妻子是黑人,问题似乎会少些。黑人和白人社区对于这种混合家庭都存在一些敌意,但是在公共公寓楼中,这种敌意是最少的。

关于对种族通婚的人进行经济制裁的可信资料还很缺乏。但是这些制裁可能正在减少。波特菲尔德对伊利诺伊、坎布里奇、俄亥俄、伯明翰、阿拉巴马、

① See, e. g. Blumberg and Royle, 1979; Ladner, 1977; Simon and Altstein, 1977.

② B. Day, 1972, pp. 310, 312.

③ Blackwell, 1977, p. 237.

④ B. Day, 1972, p. 244.

⑤ PorterGeld, 1978, p. 149.

杰克逊、密西西比等地 40 对族际通婚夫妇的研究表明：^①他们大多数在就业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但是，有少数人报告说，他们因为婚姻而失去了工作。

种族通婚的夫妇发现他们因为婚姻而失去了一些朋友，但是，最亲密的朋友却依然保持了友谊关系。对于那些从事人权工作、戏剧、教学或社会工作来挣取工资的家庭来说，他们在友谊方面因通婚所受到的影响可能较小些。B. 戴发现，^②种族通婚夫妇的生活方式部分受其所居住的城市的影响。在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他们在社交生活中很愿意与同类族际通婚的人聚会，而在费城，却不是这样。

对种族通婚的夫妇来说，结婚以后长期受到他人的羞辱是很正常的经历。白人一方的父母和亲戚倾向于不改变他们的否定态度，而黑人一方的男性亲属对这种婚姻却相对趋向于接受。^③

1960—1970 年的十年间，族外婚夫妇间的摩擦率比族内婚夫妇要高。在 1960 年人口普查时已经结婚了的丈夫是黑人、妻子是白人的家庭，到 1970 年有 63% 依然存在，而丈夫是白人、妻子是黑人的家庭中只有 47% 幸存下来。^④ 当婚姻出现危机时，很难发现种族因素是否在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少对影响家庭稳定性的其他变量——阶级、教育、居住等等进行控制，因此，也就很难计算种族因素对族际婚姻中夫妇关系的可能影响力。尽管异族通婚夫妇的离婚率比同族通婚夫妇要高，但是人们必须考虑到相当多的异族通婚者是再婚的。对犹太人—非犹太人结婚和离婚的研究表明，再婚没有初婚持久，离婚的可能性也随着再婚而上升。^⑤ 黑人与白人的再婚都表现出类似的趋势。

异族通婚除了要进行族内婚姻中配偶双方所必须进行的调适外，还要求对伴侣的角色本身进行调整。社会压力、价值观差异以及一般的性格差异，都会产生令其中一些人不能忍受的压力。认识到这种压力以及相互间差别的重要性可能会有助于预防冲突的发展，或当它升级时能够理解并有效地处理。^⑥

① Porterfield, 1978, pp. 149—150.

② B. Day, 1972, pp. 227—228.

③ Porterfield, 1978, p. 123.

④ Heer, 1974, p. 256.

⑤ Rosenthal, 1967, p. 262.

⑥ Kiev, 1973.

六、摘要和结论

1. 尽管每年黑人与白人结婚的数目都不大,但是这一数字正在增加。目前,可能不到 5% 的黑人属于异族通婚,^①同时每年有不到 1% 的黑人与异族通婚。
2. 在 1970 年,丈夫是白人而妻子是黑人的夫妇是丈夫是黑人而妻子是白人夫妇数量的两倍。198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前者超过了后者的 2.5 倍。
3. 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低估了黑一白通婚的普遍性。
4. 美国黑一白通婚的统计数字很少关注这些种族集团成员间的性生活。
5. 在 1970 年,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中,几乎 1/4 的人和非西班牙裔的人结了婚。
6. 生活在美国本土的第二代波多黎各人移民中,只有一半与波多黎各人结婚。
7. 就所有美国印第安人来看,与外族通婚的数字很难得到,但这种婚姻正在不断增加。洛杉矶的一项研究表明,已婚的回答者中,近 1/3 是和白人结婚。
8. 在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发生的各种性关系不应归因为任何一种主要因素,而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9. 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中,妇女比男子更倾向于外婚。
10. 婚姻中的“白人意识”对岛上和美国大陆的波多黎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1. 族际通婚的合法性是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1967 年,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仍存在于 17 个州的禁止种族通婚的有关法案。
12. 在过去 15 年间的民意测验表明,白人对种族通婚越来越宽容。在黑人社区,许多人不赞同这类婚姻,但是基于婚姻是个人私事的缘由,一些人持宽容态度。
13. 黑人与白人通婚的配偶一方或双方很可能是第二次结婚,且配偶年龄要比在本民族内部寻找的要大一些。
14. 黑一白通婚所生的孩子比纯黑人夫妇所生子女遇到更大的认同问题。
15. 早年黑一白夫妇所遇到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找到满意的住房、获取工

^① Staples, 1976, p. 235.

作机会、保持婚前的友情以及面对父母和亲戚们的否定态度，特别是来自白人方面的否定态度。

16. 长期来看，最近十年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各种类型的族际通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参 考 文 献

Barron, Milton L. 1948. *People Who Intermarr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Berry, Brewton. 1972. "America's Mestizos." In Noel P. Gist and A. G. Dworkin, eds. *The Blending of Races: Marginality and Identity in World Perspective*. New York: Wiley, pp. 191--212.

Blackwell, James E. 1977. "Social and Legal Dimensions of Interracial Liaisons." in D. Y. Wilkinson and R. L. Taylor, eds. *The Black Male in America*. Chicago: Nelson-Hall

Blau, Peter M., Blum, Terry C. and Schwartz, Joseph E. 1982. "Heterogeneity and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February;45—62.

Blumberg, Rhoda G. and Roye, Wendell, James, eds. 1979. *Interracial Bonds*. Bayside, NY: General Hall.

Day, Beth. 1972. *Sexual Life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Mountain View, CA: World

Day, Beth. 1977. "The Hidden Fear." in D. Y. Wilkinson and R. L. Taylor, eds. *The Black Male in America*. Chicago: Nelson-Hall.

Fitzpatrick, Joseph P. 1976. "The Puerto Rican Family." in C. H. Mindel and R. W. Habenstein, eds. *Ethnic Families in America*. New York: Elsevier.

Glick, Paul C., 1981. "A Demographic Picture of Black Families" In Harriette Pipes McAdoo, *Black Famil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06—126.

Grebler, Leo, Moore, Joan W., and Guzman, Ralph C. 1970. *The Mexican-American People: The Nation's Second Largest Mino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Heer, David M. 1974. "The Prevalence of Black-White Marri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 and 197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6:246—258.

Jaffe, A. J., Cullen, Ruth A., and Boswell, Thomas D. 1980. *The Changing Demography of Spanish America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Johnson, Charles S. 1943. *Patterns of Negro Segreg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Kiev, Ari. 1973. "The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Irving R. Stuart and L. E. Abt, eds., *Interracial Marriage*. New York: Grossman.

Klineberg, Otto, ed 194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erican Negro*. New York: Harper & Row.

Ladner, Joyce A. 1977. *Adopting Across Racial Boundaries*. New York: Anchor Press.

La Ruffa, Anthony. 1975. "Interracial Marriage Among Puerto Ricans." In. L. R. Stuart and L. E. Abt. eds., *Interracial Marriage*. New York: Grossman.

Mangum, C. S. Jr., 1940.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Negr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rtin, Elmer P., and Martin, Joanne M. 1978. *The Black Extended Fami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rguia, Edward. 1982. *Chicano Intermarriag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San Antonio, TX: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Napper, George. 1973. *Blacker Than Thou: The Struggle for Campus Unity*.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orterfield, Ernest. 1978. *Black and White Mixes Marriages*. Chicago: Nelson-Hall.

Prince, John A. 1972. "The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 in Los Angeles." In H. M. Bahr, B. A. Chadwick, and R. C. Day, eds., *Native Americans Toda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Rosenthal, Erich. 1967. "Jewish Intermarriage in Indiana." *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68): 262ff.

Roy, Prodipio. 1972. "The Measurement of Assimilation: The Spokane Indians." In H. M. Bahr, B. A. Chadwick, and R. C. Day, eds., *Native Americans Toda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Sickels, R. J. 1972. *Race, Marriage, and The Law*.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Simon Rita J., and Altaein, Howard. 1977. *Transracial Adoption*. New York: Wiley.

Staples, Robert. 1973/1978. *The Black Woman in America*. Chicago: Nelson-Hall.

Staples, Robert. 1976. "The Black American Family." In C. H. Mindel and R. W. Habenstein, eds. *Ethnic Families in America*. New York: Elsevier, pp. 221-247.

Stuckert, Robert P. 1976. "'Race' Mixture: The Black Ancestry of White Americans." in Peter B. Hammo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pp. 135-139.

Tseng, Wen-Shing, McDermott, John F., Jr., and Maretzki, Thomas W., eds. 1977. *Adjustment in Intercultural Marria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agenheim, Kal. 1975. *A Survey of Puerto Ricans o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in the 1970s*. New York: Praeger.

Walker, Deward E., Jr. 1967. "Measures of Nez Perce Outbreeding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Change"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Summer (1967): 155ff.

Wax, Murray L. 1971. *Indian Americans: Unity and Diversity*. New York: Prentice-Hall.

Williamson, Joel. 1980. *New People: Miscegenation and Mulatt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ree Press.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8.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Husbands and Wive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23*, NO. 77 (1978 December).

(张时飞 译, 谢桂华 校)

同化

G. 辛普森 (George Eaton Simpson)

所谓同化 (Assimilation)，是指具有不同种族和族群背景的人，在一个更大的社区生活中，摆脱原有背景和文化的束缚而相互交往的过程。不管在哪里，只要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处于次要地位的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不论他们是否构成数量上的少数)就会被同化。完全同化，意味着人群中已不再有基于种族或族群观念而相互隔离的社会结构。

同化既不同于通过克制达到相互妥协的消极适应 (accommodation) 过程；也不同于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或文化变迁，这种文化变迁是由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体系相互接触、或者具有某一社会文化背景的成员转而适应另一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引发的。同化与血统混合 (amalgamation) 或生物融合 (biological fusion) 也有区别。

如果将群体的互动结果视为一条连续的直线，完全隔离与完全同化可视为处于这条直线的两端，在这两端之间还存在着下列情况：程度不同的非完全隔离状态；美国、加拿大、瑞士诸国随处可见的多种文化共存现象；表面提倡机会均等，但实际上不同族群间仍存在着文化与社会结构差别的虚假整合；部分同化(例如小城镇中趋向于身负两种文化而避免处于边际地位的犹太人，见 Williams 1964, pp. 303—304)；个体同化和群体同化。

观念的演变 早在 1782 年，J. H. 圣约翰·克雷夫科尔 (J. Hector St. John Grevelcoeur) 就在《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一书中提出了“熔炉”理论 (“melting

• 本文为 Still 等主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ume I) 的词条 “Assimilation”，纽约：The Macmillan Company & The Free Press, 1968, 438—444。

pot" theory); 其后, F. J.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其 1893 年发表的文章中, 论述了各种移民如何在美国西部的熔炉中融合成一个美利坚民族(American people)的问题; 以色列人詹威尔(Zangwill)于 1909 年出版了名为《熔炉》的著作; 最后 R. J. 里沃斯·肯尼迪(Ruby Jo Reeves Kennedy)经过 1944 年至 1952 年期间的潜心研究, 提出“一元或三元熔炉”理论(见 Gordon 1964, 第 5 章)。

同化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概念, 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H. P. 费尔柴尔德(Henry Pratt Fairchild)(1913;396, 1925 年版)将同化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对于某些学者来说, 同化和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是同义词(Berry 1951, p. 217; Bierstedt, 1957, 1963, p. 176)。但更多的人认为, 同化涵盖了文化同化。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观点认为: “所谓同化, 是指不同的人和群体, 通过分享彼此的经验和历史, 使自己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和态度, 并以此和他们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联结起来的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过程。”(Park & Burgess 1921, p. 735) 但是帕克(Park, 1926)的“种族关系循环”论(接触、竞争、消极适应, 最后同化), 因其关于同化过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的假设, 招致了人们的批评。范德尔·赞登(Vander Zanden 1963, p. 269)区分了单向同化(unilateral assimilation)和相互融合(reciprocal fusion)。他认为, 单向同化是指一个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方式而接受另一个群体的文化的过程, 而相互融合是指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动、交融, 产生一种不同于任何一原有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过程, 这种新文化可在同化过程中的不同水平上生长出来。

戈登(Gordon 1964, p. 71)说明了整个同化过程和它的不同阶段, 主要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他认为完全同化应包含下述七个方面的变化: 文化模式朝着东道主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 在基层群体层次上, 外族成员大量加入东道主社会的各种协会、社团和俱乐部等制度组织; 大规模通婚; 作为东道主社会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的发展; 偏见的消失; 歧视的消失; 权力冲突和价值观念冲突的消失。这个概念性框架, 不仅对衡量同化本身, 而且对确认同化进展到何种程度, 都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判别标准。

影响同化的因素

同化过程受到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因素是: 人口、生态、种族、结构、心理和文化。目前, 人们还未找到能适用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场合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有效模型。

关于人口即群体相对规模因素在同化中的重要作用,夏威夷作为案例可给予充分说明。在那里,规模较小的族群相对于规模较大的族群,有一种更强的族外通婚趋势,而且,单就女性而言,性别比愈均衡的群体,这种趋势也愈强(Cheng 和 Yamamura, 1957, p. 81)。生态因素在美国各民族的同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有许多由不同移民群体建成的“文化岛”(cultural islands),这些“文化岛”虽给移民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但同时也把新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生活隔离开来,在老美国人看来,它们拉开了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距离。同样,人口因素和生态因素也明显影响着英国黑人的同化过程。科林斯(Collins, 1955, p. 99)认为,伦敦东北码头地带的黑人与白人的互动之所以比西部和西北部码头地带黑人与白人的互动更为融洽,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黑人的群体规模和居住形式的差异。

种族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帕克(1930, p. 281)坚持认为,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来说,同化是人类体貌差异的函数。他将美国黑人历时300年还难以被同化的现象,归因于他们在体貌特征上而非在文化上与白人的差异。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已被一种强调种族的、生态的、历史的、结构的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理论所取代。体质特征是影响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决非唯一的因素。例如,在1861—1960年期间,有67万多黑人因肤色浅,自我认定是白人,从而由黑人群体“转入”白人群体(Stuckert 1958)。但是,在这种“转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还有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而言,年纪较大或在黑人社区中具有较高地位的黑人,很难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完全转变。不过,直到今日肤色差别仍对同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有关芝加哥黑人社区的研究结果表明,肤色影响人们婚姻配偶的选择和职业的选择,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的其他方面(Wilson 1960, p. 171)。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单用肤色和社会阶级两个变量,不足以充分解释黑人间程度不一的同化现象。在对新奥尔良黑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关于自己在四个“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包括中产阶层、母权制家族、男性街头团伙、与外界隔离的家庭或处于文化边际地位的残余群体四种)的一个中由于某种偶然性而获得的基本角色的认同,比身为黑人这一事实本身,对他们的自身经历和自我意识的形成起着意义更为深远的影响(Rohrer & Edmonson 1960, pp. 51—55, 71—74, 80—83)。

对伦敦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寻找住处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肤色。大约70%的房东不愿将住房出租给有色人种学生,对非洲黑人和西印度群岛的人来说,这个比例上升到85%(Senior 1957, p. 306)。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居住形式的限

制,共同用餐,以及提供更多的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有色人种学生在牛津和剑桥的社会生活比在伦敦要丰富得多(Coloured Immigrants……1960,pp. 79—80)。

拉丁美洲的同化 随着19世纪末农奴制的废除,巴西的人口数量增加,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100多万意大利人,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和德国人,以及大量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叙利亚人移居到这个国家。这些民族的人口在20世纪仍持续不断地涌进巴西,其间有20万日本人也来到这里,目前日本人已达50万。虽然进入经济上中产阶级的人大多都具有欧洲人血统,但是,数目大的欧—印混血后裔、白—黑混血后裔和黑人,仍有机会改善他们自身的处境,黑皮肤并未将他们阻隔于同化为一个国家社会的进程之外。然而,普雷托(Preto)致力于国家进步的计划还是遇到极大阻碍,因为他缺少一种对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浅肤色。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侨居于巴西的人中,有一部分并未被同化到卢索—巴西人(Luso-Brazilian)的生活之内。这部分是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和他们同巴西人外貌特征上的差别(见Smith[1946]1963,p.62;James[1942]1959,p.522;Johnson 1958,p.4)。在考察“可辨认的印第安人”是否融入拉丁美洲主体社会的条件时,可以发现文化因素和生态因素在同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这些条件有:学会流利地讲国家通用语言(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像欧洲人一样着装,从印第安人社区移居到被认为具有主流文化特色的城镇(Gil-lin 1960,pp.19—20)。

意识形态和文化 心理因素在同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班顿特别强调指出,英国人对有色人种和犹太人的行为方式,是一种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模式,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社会都可以发现。此外,如果某些群体是受人尊敬的,那么,这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必定带有排外的特点(Banton 1959,pp.112—113,181—182)。就英国的新移民而言,不同族群的人在选择居住方式上是极不相同的。亚洲人常常结群而居,有自己的社区生活,而西非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力求贴近英国本土社区的生活方式(Banton 1959,pp.182—183)。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态度因素会阻延同化的进程,特别是当各族群的信仰不同时,尤其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族群天生低人一等,他们是不可能被同化的。在此观念支配下,种族隔离、种族驱逐甚至种族灭绝政策和实践都曾因认定一些群体不能同化而被认为是理性的。例如,纳粹的种族政策就是建立在犹太人不可同化的信条上的。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源于这样一种信念,欧洲人与非洲人天生不同,为了使两者各自获得充分发展,就必须将他们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诸方面隔离开来。在美国,黑人天生不如白人这一观念的重新兴起,必然导致双方的对立,二者逐步结合在一起构成60年

代初期“种族与理智”运动的特征(Comas 1961)。在20世纪前半期,犹如葡萄牙殖民政策的延续,法国所奉行的“同化主义”殖民政策得到支持(Herskovits 1962, pp. 288—289),因为人们坚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少数非西方民族能够被吸收进城市工业文明体系。

与这种强制的族群隔离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少数族群的反感导致一些国家推行强制的同化政策。1917年,共产主义者许下诺言,俄国数目众多的各类少数民族享有维持自身传统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自由。斯大林在制定把行政边界与民族分开的政策方面起过促进作用,以不违背苏维埃的政治经济结构为前提,允许实行文化自治。然而,1940年后,沙皇主义的俄罗斯化民族政策死灰复燃,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从1957年开始,历来有“世界主义者”之称的犹太人,遭到了一场反对他们享有自身传统特色的社区生活的运动的冲击,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完全同化”犹太人(Goldhagen 1960, pp. 42—43)。

有一些小规模群体,其成员表现出拒绝同化的态度。在美国,老式阿米什族群(the Old Order Amish)和其他一些宗教文化群体就一直竭力保持自身与主体社会的分离与差别(Williams 1964, pp. 302—303)。美国黑人中一个人数不多但极为顽强的被称为黑色穆斯林的组织独自拒绝被完全同化。黑人民族主义者意识到,白人社会就是在排斥黑人成为真正公民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于是,这种寄人篱下没有权利的感受促使他们起来反对美国社会和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力图在城市黑人民众中培养一种民族意识(Essien-Udom 1962, pp. 54—59; 325—329; Lincoln 1961, 第2章)。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黑人家园(homeland)并建立一个后启示录的黑人民族国家(a postapocalyptic Black Nation)。另一个发生在北美的民族运动,要求改变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的关系。一些法裔加拿大人甚至提出这样的设想:“魁北克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加拿大的一个省;即使不能独立,也要重新制定一部赋予魁北克以特殊地位的宪法。”(Hughes 1963, p. 884)瓦格雷和哈里斯(Wagley 和 Harris 1958, pp. 285—286)讨论了上述的以及新大陆其他一些少数族群的历史,并针对各种以阻止同化和多元文化共存为目标的策略进行了分析。

以色列移民的同化 在移居以色列的移民的同化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结构、文化、心理诸因素的相互作用(Eisenstadt 1954)。在1920—1948年“委托管理”(mandatory)期间,移民者最基本的动机根植于传统的犹太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日趋衰微的感受,他们迁徙的目的是为了使犹太人团结一致,以复兴犹太文化,而不是调适性和辅助性的。与1948年后大移民时期的移民不同,这些早

期移民对外界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应付能力,对原居住国的社会模式也缺乏依附性。

新移民主要来自四类主要地区。来自传统区域(*traditional sector*,由也门犹太人和部分北非犹太人构成)的犹太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自治能力和犹太人特殊的传统和价值取向,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消极的看法。与此相对照,不稳定的过渡型区域(*insecure transitional sector*)大体由北非城市中犹太人社区和绝大多数中欧、东欧犹太人社区构成,来自这一区域的犹太人则显示出很低的社会自治能力,并具有强烈的进入非犹太社会的欲望。相对稳定的过渡型区域(*secure transitional sector*)由获得非犹太社会认可并坐落在这些社会之中的犹太人社区构成(在Eisenstadt的研究样本中,特指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犹太人居住区);来自该区域的犹太人的社会自治程度较低,并对非犹太社区具有较强的基本认同倾向。在这一区域,在一般的社会结构意义上,非犹太社会将犹太人群体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子系统接受下来。犹太人的迁出是因为这一地区处于混乱状态,不存在被驱逐的问题。在由难民营的逃亡者构成的区域中(*sector consisting of exinmates of DP camps*),犹太人在难民营的悲惨遭遇使得他们的犹太传统所剩无几。总之,就新犹太移民而言,来自传统区域和稳定过渡区域的人,大都能主动应付环境的变化,而来自其他两类区域的人则显得很被动。

在新移民适应以色列生活的过程中,结构因素对这种转变起着不可低估的接续作用。首先,各类官方机构为移民确定了最初的生活环境;随后,军队和教育系统在他们接受新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上,开始发挥其导向作用;最后,通过群体或个体在范围更广的社会中的流动以及政治选举与社会发展,移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得以完成。

美国的华人和日本侨民 生态的、种族的、文化的和结构的因素,也影响着美国社会中华人的固化。在早期,种族文化障碍使得年轻华人只能在自己的族群内生活。然而,战争和经济萧条逐渐削弱了唐人街的经济社会结构,华人人口开始重新分布。随着文化适应过程的延续,华人流向社会上层的趋势逐步增强。此外,当华裔后代变得与美国文化更为适应时,通婚也将增多。现在,人们对白人与黄种人的通婚现象,已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事实上,娶日本女子和韩国女子为妻的军人数量正在逐步上升(Lee 1960, p. 251)。

尽管日本侨民在经济活动方面日益融入美国社会,但是,除了那些居住在较大社区内的日本侨民,他们在教育及一些利益重大的事情上有可能和美国社会文化联结起来外,其他方面的同化进展缓慢。对居住在芝加哥的日本侨民的研究,揭示了心理的、文化的、结构的诸因素在同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价值

体系和个性结构方面,中产阶级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会使得日本人的文化适应以最终同化变得更加容易(Caudill 1952, p. 29)。

通婚的研究

有关美国天主教徒婚姻状况的研究,揭示了生态、人口、种族和文化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种族间的通婚比率,在中上阶层居住区和市郊居住区比下层居住区或中下阶层混合居住区要高得多。一般情况下,在不考虑肤色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同化速度与群体规模成反比。

30年代的社会调查表明,美国犹太人家庭总数的6%存在族外通婚现象。1957年由联邦政府主持的有关宗教构成状况的调查显示,在7.2%的犹太人家庭中,其配偶是非犹太人。人们发现,在1953年衣阿华州犹太人的婚姻中,有31%是由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合而成。1960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调查表明,犹太人的族外通婚比率是12.2%,1959年旧金山犹太人的族外通婚比率是17.2%。按照罗森塔尔的说法(Rosenthal 1960, p. 288),如果承认1957年犹太人的通婚比率是7.2%,而且假定衣阿华和旧金山的数据只含有区域意义,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有关犹太人是现代“幸存者”的传统观念(适度的犹太式教育,自愿与其他民族隔离,定居于高社会阶层区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它对犹太群体的自我维持可以给出适当的解释。肯尼迪(Kennedy, 1963)将犹太人很少与外族人通婚的现象称为“有选择的同化”。他特别强调指出,重要之处不在于犹太人与外族人通婚比率正在上升这一事实,而是通婚比率的上升仅在极轻微的程度。

应该指出,目前所收集到的有关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数据,仅是实际通婚数量的最低下限值,因为这些数据不包括那些婚前就已改信其他宗教的夫妇。进而言之,现代生活方式在某些区域获得的进步,为犹太人个体的进一步同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年龄为18—25岁的犹太人青年中,有62%受过大学或研究生教育,而他们的父辈达到这个层次的人只有22%(Fishman 1963, p. 147)。而且,三分之二的美籍犹太人居住在大都市四周的郊区,这种由市内集中居住到郊外分散居住的人口分布变化,对犹太保守主义也产生了明显影响。正如科曼(Cahnman, 1963, pp. 179—180)指出的那样,在上等居住区居住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与外族通婚的趋势更为明显。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黑人愿意与白人通婚。但是,芝加哥的调查(Bogue & Dizard 1964, p. 7)表明几乎没有被调查者,包括居住的混合住宅区的黑人中产

阶级,说他们将会鼓励自己的孩子与白人结婚。但不管通婚的愿望多么缺乏,随着种族隔离现象的衰减和整合趋势的增强,白人与黑人通婚的比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南亚,社会结构方面的隔离和文化的异质性,阻碍着各民族间的通婚和进一步的群体同化。在印度尼西亚,嫁给华人的土著妇女总是在华人亚社会抚养自己的孩子,但她们并未成为沟通各种亚社会的桥梁。同样,在泰国和印度支那,尽管通婚造就了一种中间形态的社会文化模式,但华人亚社会依然完整如初(Freedman 1955, p. 411)。

美国黑人的同化

虽然少数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漫长过程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机械式混合的画面,但是,一般性趋势的确是朝向这些群体的更深层次的整合和同化。在这里,我们引用黑人的情况(详见 Simpson & Yinger 1965)来说明这个问题。二战后,美国黑人在就业机会上得到某些改善,但是,这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与白人相比的高失业率所抵消。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如按占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百分比来估算,其数值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一直上下波动;如按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则从 1935 年的不足 1% 增加到现在的 5%。在南方和边疆的 17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孩子在无种族限制的学校就读的数量,已从 1960 年 5 月的 6%,上升到 1964 年秋季的 10.8%。1964 年,尽管在南方 11 个州中,和白人孩子一起在公立学校读书的黑人孩子只占全体黑人学生的 2%,但到同年秋季,这个数值便翻了一番。同时,在那里的 513 所大学中,已有过半数的学校招收黑人学生。60 年代初期,关于限制黑人青年进入医学院的歧视性入学政策已经大大削弱,黑人医学实习生在医院实习的条件和待遇得到明显改善,在白人医院里,更是如此。

南方黑人登记投票选举的数量,从 20 年代的 7 万人增加到 1964 年的 150 万人。在 1943 年至 1958 年间,美国军队中不再有任何意义的肤色之分。三分之一的黑人天主教徒去无种族限制的教堂做弥撒。但是,新教教堂在这方面变化缓慢,在美国西部和北部,只有 10%—15% 的“白人”新教教堂在某种程度上接纳其他种族的教徒,到这类教堂做弥撒的黑人教徒还不到黑人教徒总数的 2%。居住方面广泛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在所有牵涉到白人与黑人双方的场合,仍然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当它与孩子入学的学校隔离问题交织在一起时,便愈发引人注目。在有些地区,由于政府支持的城市更新项目带来的未预料到的

后果,居住隔离程度反而有所上升。在1945年至1965年期间,抵制白人与黑人通婚的情绪仍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而对其他类型的通婚(不同信仰者、不同国籍及其他种族间的通婚)的抵制却弱化了。

另外,立法、诉讼和教育措施也以增进整合为目标。60年代发展起来的“黑人暴乱”(Negro revolt)(Simpson & Yinger 1965, pp. 533—535)实际上包括各种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它是美国民族整合进程中一个富有意义的阶段。组织起来的群体和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的出现,对打破种族隔离,加速同化进程,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未来展望 在美国经济生活中,一旦实现更高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将表现为:那些在种族隔离状态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有可能迫于压力转而更积极地反对种族歧视。美国医学会决定让年轻黑人内科医生负责门诊工作,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使愈来愈多的黑人去医院和卫生所就诊成为可能,而这些医院和卫生所又拒绝安置黑人医生(Hughes 1968, p. 886)。用降低歧视程度来取代在公共福利事业中对黑人的歧视,会削弱那些原来享有特权的黑人中等阶层的经济地位。在下一代或更快一些时候,随着族际通婚和个人同化比例的上升,那些建立在各自族群基础之上的组织会被迫考虑成员资格、资金和组织纲领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完全同化的最终检验标准为是否存在大规模的种族通婚,那么,美国不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这种意义的同化。但人们确信,隶属于不同种族文化群体的成员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学校和公共住宅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加速消失,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上的机会日趋均等。当然,整合的速度在各个区域和各种社会制度中不可能相等,而且它还会受到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影响。但是,随着隔离现象的衰减和整合程度的提高,更深层的同化是毫无疑问的。

参 考 文 献

Banton, Michael (1959). 1960. *White and Coloured: The Behaviour of British People Toward Coloured Immigrants*.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 Press.

Berry, Brewton (1951). 1965.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First published as *Race Rela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Bierstedt Robert (1957). 1963. *The Social Order*. 2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Bogue, Donald J. ; and Dizard, Jan E. 1964. "Race, Ethnic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s Viewed

by Subordinate and Superordinate Group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 of Chicago, Community and Family Study Center.

Broom, Leonard; and Glenn, Norval D. 196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gro American*. New York: Harper.

Cahnman, Werner J. 1963. "Interrac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merican Democracy". Pages 173—195 in Werner J. Cahnman (editor), *Interracism and Jewish Life: A Symposium*. Conference on Intercultural and Jewish Life, New York, 1960. New York: Herzl Press.

Caudill, William. 1952. *Japanese-American Personality and Acculturation*.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45, 1st half. Provincetown, Mass.: Journal Press.

Cheng, C. K.; and Yamamura, Douglass S. 1957. "Interracial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Hawaii". *Social Forces* 36:77—84.

Clark, Kenneth B. 1965. *Dark Ghetto: Dilemmas of Social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Collins, Sydney. 1955. "The British-born Coloured". *Sociological Review* New Series 3:77—92.

Comas, Juan. 1961. "Scientific Racism Again?" *Current Anthropology* 2:303—304. A review of recent instances of "scientific" racism, with critical comment.

Crisis. Published since 1910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Eisenstadt, Shmuel N. (1954) 1955. *The Absorption of Immigrant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Essien-Udom, E. U. 1962. *Black Nationalism: A Search for an Identity in America*. Univ. of Chicago Pres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lack Muslim movement.

Fairchild Henry P. (1913) 1933. *Immigration: A World Movement and Its American Significance*. Rev. ed. New York: Macmillan.

Fishman, Joshua A. 1963. "Moving to the Suburbs: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Role of the Jewish Minority in American Community Life." *Phylon* 24:146—153.

Freedman, Maurice. 195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ages 388—411 in Andrew W. Lind (editor), *Race Relations in World Perspective*.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Gillin, John P. 1960. "Some Signposts for Policy." Pages 14—62 in Richard N. Adams et al.,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Harper.

Goldhagen, Erich. 1960. "Communism and Anti-Semit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9:35—43.

Gordon, Milt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Griffith J. A. G. et al. 1960. *Coloured Immigrants in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Herskovits, Melville J. 1962. *The Human Factor in Changing Africa*. New York: Knopf.

Hughes, Everett C. 1963. "Race Relation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879—890.

James, Preston E. (1942) 1959. *Latin America*. 3d ed. New York: Odyssey.

Johnson, John J. 1958.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Sectors*. Stanford (Calif). Univ. Press.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Published since 1932 by Howard university, Bureau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Kennedy, Ruby J. R. 1963. "What Has Social Science to Say About Intermarriage?" Pages 19-37 in Werner J. Cahnman (editor), *Intercultural and Jewish Life: A Symposium Conference on Intercultural and Jewish Life*, New York, 1960. New York: Herzel Press.

Lee, Rose Hum. 1960.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ng Kong Univ.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Lincoln, Charles Eric. 1961. *The Black Muslims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A paperback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62 by Beacon Press.

Park, Robert E. 1926. "Our Racial Frontier on the Pacific". *Survey* 66:192-196.

Park, Robert E. 1930. "Assimilation, social." Volume 2, pages 281-283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Park, Robert E. and Burgess, Ernest W. (1921) 1929.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2d ed. univ. of Chicago Press.

Pettigrew, Thomas F. 1964. *A Profile of the Negro American*. Princeton, N. J. : Van Nostrand.

Phylon. Published since 1940 by Atlanta University.

Rohrer, John H. ; and Edmonson, Munro S (editors) 1960. *The Eighth Generation: Cultures and Personalities of New Orleans Negroes*. New York: Harper.

Rosenthal, Erich. 1960. "Acculturation Without Assimilatio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Chicago, Illino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6:275-288.

Rosenthal, Erich 1963 "Studies of Jewish Inter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64, pages 3-53 in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New York: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Senior, Clarence. 1957. "Race Relations and Labor Supply in Great Britain". *Social Problems*. 4: 302-312

Simpson, George E. ; and Yinger, J. Milton. 196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3d ed. , rev. New York: Harper.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53

Smith, T. Lynn (1946) 1963 *Brazil: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 Press

Statistical Summary Issued annually by the Southern Educational Reporting Service, Nashville, Tennessee. The best source on educational desegregation.

Stuckert, Robert P. 1958 "The African Ancestry of the White American Population." *Ohio Journal of Science* 58:155-160.

Vander Zanden, James W. 1963. *American Minority Relations: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

Groups. New York: Ronald Press.

Wagley, Charles; and Harris, Marvin. 1958. *Minorities in the New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x minority groups.

Williams, Robin M. Jr. 1964. *Strangers Next Door: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Wilson, James Q. 1960.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Yinger, J. Milton; and Simpson, George E. 1956. "The Integration of Americans of Mexican, Puerto Rican, and Oriental Descent".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nnals* 304: 124—131.

(梁雷峰 译, 王俊敏 校)

减少族群冲突的优待政策¹

D. 霍洛维茨 (Donald. L. Horowitz)

确定选举政策从采纳到发生作用只需一段很短的时间,而实施优待政策却不是这样。一个新的选举规则或选民的界定办法在下一两次选举中就能产生(或未能如预期那样产生)一定的政治反应,从而显示出这一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在政治家们看来,冲突行为的相应减少应当在政策实施后很快显现出来。但是,旨在减小民族差异的优待政策却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如力图增加特定群体在诸如现代产业部门的就业或高等教育中的成员比例的政策。测量族群成员比例的变化比计算选举结果要困难得多;而且,族群比例的变化并不必然预示族群冲突行为的变化。同时,处理族群关系的优待政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内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更增加了评估的难度。

所有这些可能仅仅意味着,选举政策和领土的改变并不会真正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它们只能影响投票人和政治家的某些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群体的优待政策而言,所要实行该政策的目的非常广泛,要达到既定目标也相当困难。选举政策和优待政策之间的差异类似于马丁·夏皮罗 (Martin Shapiro) 和詹姆斯·Q. 威尔逊 (James Q. Wilson) 所提出的点决策 (point decisions) 和线决策 (line decisions) 的区分。点决策是在几个不同的候选方案中选择其一,它具有自我完成的功能;线决策是一种需要许多人按计划协调行动的方案,它往往持

¹ 本文为 D. L. Horowitz 1985 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族群冲突》(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一书的第十六章,第 653 -681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的同意,谨此致谢。

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点决策的效果是能迅速、连续地感觉到的。”^①而线决策的效果只能在较长时间中反映出来，并且容易产生偏差。显而易见，采用优待政策属于线决策。

优待计划项目的范围

在多族群社会里实行优待政策是很普遍的。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正式陈述与否和内容清晰与否往往并不相同。有些政策局限于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有些政策则扩展到私营部门；有些政策还延伸到商业活动和教育体系中，而不仅仅涉及就业方面；有些政策的实行只在特定的范围内，如高等教育和政府行政部门；有些政策是正式颁布并公开执行的，而有些政策的实行则是静悄悄的。

总的说来，一项政策越是正式颁布的，它所包括的内容就越广泛。马来西亚的政策内容比其他国家的政策内容要广泛得多。它的政策大多可以从马来西亚宪法中找到依据。宪法确认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它保证马来人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享受一定比例的奖学金和教育机会，拥有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程度的商业参与。^②为了达到通过重组社会结构以“减少乃至消除由经济差异带来的族群差异”的目的，马来西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仅涉及中学和大学的升学，而且还包括就业、股份的持有、执照的发放和合同的签订等内容。印度的宪法为特定的种姓和部落规定了他们在教育、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职位数目^③。各邦也可以（一些邦已实施）为“落后”种姓制定特别政策，此外，在印度已有越来越多的邦制定了优待政策，以便保护上著人免受外来移民的竞争。^④

内容广泛的优待政策并非都来源于宪法，也不是所有的宪法规定都赋予这些政策以权威。在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时期，前北方区政府采取了一种“北方化”政策，这种政策影响到政府行政部门的就业和合同的招标。其结果是富有

^① James Q. Wilson, "What Can be Done", 为1980年在第四届"Public Policy Week"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未公开发表，参看第23页。

^② 《马来西亚宪法》第89,153条。

^③ 马来西亚政府，《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1971—1975》(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71) 对于马来西亚项目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Robert Klugard 和 Ruth Katz 的文章“Overcoming Ethnic Inequalities: Lessons From Malaysia”，*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Spring 1983): 333—349。

^④ 《印度宪法》第341—342款。见 Marc Galanter, *Competing Equalities: Law and the Backward Classes in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⑤ Myron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Univ. Princeton Press, 1978)。

戏剧性的。在1959年，在8个地区的高级公务员当中只有一个北方人，但到1965年，高级公务员中的北方人超过了国外移居者和南方人的总和^①。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军队军官的招募，高等教育奖学金的分配都实行地区配额^②。比夫拉战争(Biafran War)改变了尼日利亚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总的说来，政府加强了反对地区歧视的力量。在政权转到文官统治之前，军事当局废除了允许土著居民优先就业的政策。第二共和国宪法规定，政府机构的就业安排应该“大体上反映这个国家的联邦性质”，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不应该让少数几个邦、少数几个族群或群体的成员占有绝对优势”^③。在这一基础上，就需要有一个政策以对尼日利亚政府部门的人员构成比例倾斜的现象进行修正^④。

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在银行贷款、奖学金、政府部门就业、大学入学等方面都享受广泛的优待权。这种政策虽很少得到正式宣布，但却发展起来。从原则上讲，这种工作是应该让政府官员去执行，但南方的许多私人雇主在他们的业务中也参与了执行这种原则。^⑤作为这种非正式政策的典型例子是，菲律宾各个机构对穆斯林申请者免除一些正式的要求，例如不要求提供贷款的信誉保证或不必参加政府机构部门职员录取考试。

许多国家实行的优势政策都指向特定的群体。在斐济(Fiji)，几乎所有的可耕地长期以来是留给斐济人耕种的。在斯里兰卡，“标准分”政策给在僧伽罗人(Sinhala)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增加额外的附加分，结果僧伽罗人的考生比泰米尔(Tamils)考生在录取时更有优势。在印度尼西亚，新成立的公司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为土著居民所拥有；非华人在政府签订合同的商业贷款中可享受相对的优待。^⑥尽管在1980年和1984年，这些要求得以修改，用“经济上弱小的群体”(主要是土著人)来代替有明显族群标志的提法。在印度的安得哈·普拉得什(Andhra Pradesh)，泰兰嘎纳人(Telangana)拥有政府部门固定比例的职位。土地、教育、商业和就业——通常是这些优待计划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不同的优待政策其实行的深度和专一性也有所不同。某一群体的就业优

^① C S Whitaker, Jr., *The Politics of Tradi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orthern Nigeria 1946-196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p. 390.

^② W. F. Guttridge, *Military Regimes in Africa* (London, Methuen, 1975), p. 117. Omolade Adejuwogbe, "The Size of States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Nigeri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6 (Sept 1973): 157-182

^③ 《尼日利亚宪法》，14(3), 157(5)。

^④ *Daily Times* (Lagos) Jan. 18, 1980

^⑤ 这些观察材料是我1980年在菲律宾南部进行的访谈中获得的。

^⑥ 见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n Policies Toward the Chinese Minority Under the New Order" *Asian Survey* 16 (Aug. 1976): 770-787.

待并不意味着在晋升方面也能优先,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方面的优待总是同步的。对某一群体在政府一般公职中就业采取优待政策,并不意味着在专业和技术职位方面也享受优先。优待政策可能在某个特定薪金水平以下的职位中实行,而在这一水平之上的职位中并不一定都是这样。

最后,如何采用族群标准来界定优待政策的实行范围,对于不同的政策来说,其界定办法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将享受优待政策的族群限于土著居民;尼日利亚的“北方化”政策也是如此,尽管采用的是区域性字眼。印度的安得哈·普拉得什人用 *mulkis*(其大致含义是“住所的”)来界定,即给从泰兰嘎纳地区以外来的、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居民留下了申请优待的余地。斯里兰卡用语言测验来确定民族归属。扎伊尔按地区配额进行大学招生,使路拉(Lulua)人在教育中享有优于巴卢巴(Baluba)人的地位^①。坦桑尼亚在中学教育中实行的地区平等政策也运用地区性作为民族性的替代品:“如果你谈到莫斯区(Moshi),你无疑在谈论一些部落;如果你谈论迪多马区(Didoma),你无疑也在谈论另外一些部落。”^②不管规则是如何的不同,政策的目的都是在各个族群中间调整报酬和机会。

在执行过程中,优待政策的各项规定的准确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涵盖范围很宽的规定使得最不需要优待政策的群体也可能被包含在优待范围内。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包含了所有的土著人,这使得已经很成功的群体如米朗卡布(Minangkabau)人也能享受到馈赠与信贷的优惠条件,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第二,采用非族群的界定办法会导致优待政策产生漏洞。在安得哈,由于采用住处而非族群的界定标准,优待政策的实行却造成假的“土著证明”交易的猖獗,大量的非泰兰嘎纳人持这种证明也有资格享受就业优待。第三,范围较广的政策增加了其在执行中的灵活性,以便使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如提高生产率、调和政治对立),都能够予以考虑。第四,被优待群体的界定方式决定了优待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像在印度一些邦中,应用“落后阶级”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使得人们纷纷宣称自己是“落后的”。在印度的卡拉塔卡邦(Karnataka),这种现象就十分突出,以至除了婆罗门外的所有种姓,包括一些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被正式定为“落后群体”而享受优待。后来,印度最高法院不得不取消了那种界定方式,并将这一问题交给“落后鉴别委员会”(Backward Classes

^① Michael G. Schatzberg, "Ethnicity and Class at the Local Level: Bars and Bureaucrats in Lissala, Zaire," *Comparative Politics* (July, 1981), 461—478, at 470.

^② 这里我引用了一个坦桑尼亚计划的观察者的话(Dar es Salaam, 1980)。

Commission)去鉴别。另一方面,更为具体的规定会导致受优待群体之间为利益分配而互相争斗。在比哈尔邦(Bihar),以部落为界限的优待政策导致非基督教部落要求将基督教部落排除在优待范围之外,因为受到良好教育的基督教徒会在保留下的位置中获得超比例的高份额。^①简单地说,涵盖范围标准的确定影响到民族群体内部政治发展的方向。

优待政策的实行

实际上,无论在哪儿,族群优待政策总被看作是例外,是权宜之计,它经常被规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度内。在许多国家,政府给特定的族群一些特别的优待,以便使他们能“赶上”先进的民族群体。这样的措施具有明显的不合法的假定。人人平等是众所周知的准则。背离这一准则的优待政策通常被解释为:承认被优待群体没有能力与非优待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

既然有这样的矛盾存在,为什么这些政策还被如此广泛地采纳?下面的两种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和中肯的。

首先是存在着有政治影响的选民群体,在采取优待政策时,他们可以获得利益。优待政策的实行,部分地依赖于这些群体组织得怎样、影响力如何,他们在哪些部门中积极活动也影响着优待政策的范围。

其次,优待政策似乎花钱很少。最初它们用不着开支,不需要启动资金。在教育方面,即使有了可行的技术条件,要调整各地区、各族群之间考试结果的差距,可能需要在设备和人员上进行相当的投资。但是根据族群对教育机构的位置进行重新分配则不需要增加支出。在就业方面也同样如此:劳动力必须配置,其次要考虑的就是族群构成状况。

在私营部门,为了赢得政府的好感也是导致私营机构实施相应优待政策的一个刺激因素。容易招致损害的外国公司在这种政策中看到了特殊利益。如果他们对东道国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们便会相信这种观点:在自己公司雇员的招收中实行当地政府倡导的族群配额会减少他们经营中的政治危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采取政府的就业优待政策;作为交换,他们从政府那儿得到某些让步,如训练项目的帮助,对工会施加压力,迫使工会调整或降低要求。有时,实施其优待政策是政府税利让步的条件,这种让步通常是吸引国外投资的手段。但是,即使这种优待政策没有清楚地加以表述,外国公司常常不得不承受

^①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184—186

各种非正式的压力,使其与政府的做法相一致。^①

政府采用正式的优待政策通常还涉及其他事情: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信实行族群优待政策或配额政策能达到一些重要的目标。这种确信的认识要么是他们在国家独立时思想观念的一部分(比如在印度有必要为特定种姓和部落提供更多的机会),要么是近期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产物。

在1969年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之后,马来西亚精英人物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②他们普遍感到原来的社会发展政策使马来人处于不利地位;族群间敌对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平衡,而且没有时间逐渐调整,保证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对马来人广泛的优待政策,使马来人在各种层次的经济部门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马来人官员和政治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劝说保守的马来政治领导人做出他们以前避免做出的决定。两位副总理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一旦他们被说服,要实行雄心勃勃的新经济政策就有把握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参加暴乱的马来人描述暴乱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他们使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暴乱也对华人的观点产生影响。尽管华人领袖们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分歧,但暴乱使他们确信:必须走新的道路。某一政策的拥护者常常利用这类暴乱来消除反对力量,使得该政策得以排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③。1969年的暴乱在马来西亚就有着这种作用,他们使得从前加以回避的政策有了实行的可能,因为这种政策看起来带有族群偏见,不合利益标准。

以下几个信念的合力促进了优待政策的实行:(1)优待政策花费不多,是一个应付民族冲突而代价较低的策略;(2)为了这些群体最终能够进行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这种政策;(3)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族群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加以消除。在优待政策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假设:族群冲突是族群间经济差距的产物,而族群和解是各族群按一定比例分配占据各级部门中的职位,并活动于社会的各种职能的结果。

^① 参见 Leonard Plotnicov, *Strangers to the City: Urban Man in Jos, Nigeria* (Pittsburgh: Univ of Pittsburgh Press, 1967), 60。

^② 下面描述的是我1975年在马来西亚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参见 Karl Vovorys, *Democracy Without Consensus: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alay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5), 398—412; R. S. Milne, "The Politics of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Pacific Affairs* 49 (Summer, 1976): 235—262。

^③ Jack L. Walker, "Setting the Agenda in the US Senate: A Theory of Problem Sele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 (Oct 1977): 423—445.

优待政策的短期效果

华莱士·塞耶(Wallace Sayre)曾经说过,改革的收益是迅速的,但其代价却是巨大的。对于优待政策,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代价高于收益。竞争能力的获得,冲突的减少,这些效果即使出现也会相当迟。可以肯定在长时期内,优待政策有可能增加受过训练的劳动力的数量,产生新的资金库。即使因被优待而出现的新一代企业家、专业人员、官员们的效率不高,但以后的几代人将会享受到第一代人带来的利益。然而,优待政策通常并不总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不能使得到长期性效益的机会达到最大化。这些政策的最基本考虑是要缩小眼前的差距,但正是在目前,政策的代价也显现出来了。

这些优待政策的具体影响随它们发生作用的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分别研究在教育、商业和就业中的优待政策是必要的。

1. 教育中的优待政策

在各类学校(包括大学)招生方面的族群优待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因为在短时间内,他们能导致学生构成的巨大变化。在1969年的暴乱后,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密切注意大学学生的族群构成,并通过修订宪法给予政府控制族群比例的权利,以便让更多的马来学生进入大学。从1970年到1973年,在授予学位的课程中,马来人所占的比例从39.7%上升到52.7%。^①在斯里兰卡,1969—1970年在医学和工程专业里,泰米尔学生占了将近一半,僧伽罗人只占了一半多一点。到实行优待政策后的1974年,泰米尔人在工程类的学生中只占16%,在医学类的学生中占26%。^②如果改变学生的族群比例是优待政策的目标,通过制定这一政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这比让某个族群在商业中保持一定的比例直接得多。

但招生比例的变化并不是优待政策的全部后果。在招生中实行的优待政策对教育和政治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一个最主要的影响是将由于政府部门的优待政策而不能入学的学生转入私立学校中,或者促使没有私立学校的地方建立私立学校。坦桑尼亚的地区平

^① Bee-luu Chan Wang,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Ethnic Stratification-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Among Fields of Study,"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1 (Feb, 1977): 110—123, at 111.

^② C R de Silva,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Standardization and District Quotas in Sri Lanka," *Modern Ceylon Studies* 5 (July 1974): 151—178, at 178.

等政策就有这种效果,^①该国的优待政策只限于中等学校的招生。在实行地区平等政策之前,先进群体如恰伽人(Chagga)和瓦哈伽人(Wahage)在公立中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地区平等政策则根据各个地区小学毕业生中符合升学条件的总人数来分配每个地区中学的招生名额,至十在每个地区内部,能否升入中学是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确定的。由于恰伽和瓦哈伽学生学习成绩好,他们所在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也就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为了满足那些本来能够升学而又被拒之门外的学生享受中等教育的要求,私立中学教育网就建立起来了。

在克利曼加罗(Kilimanjaro)地区(恰伽人聚居区),兴建了许多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是通过咖啡生产合作公司提供经济支持的。在坦桑尼亚人口中,恰伽人仅占很小的比例(大约3%),然而它的中学数占全国总数的28%,为了使私立学校不至于破坏政府的地区平等政策,1979年政府要求他们将该地区学校中25%的学生名额计给从其他地区来的学生。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发现地区平等政策刺激了私立教育的发展,从而采取措施对之加以控制。

马来西亚的优待政策在大学教育上曾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许多能干的华人学生被马来西亚的大学拒之门外,只得到西方去就学,1983年马来西亚在外国读大学的留学生约有35 000人,其中60%是华人。此外,当马来西亚大学的录取人数增加时,在国外就学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在马来西亚就读的每个读学位的大学生在国外至少有一个与之对应。就大学生总体而言,马来西亚政府的优待政策只是改变了国内公立学校中各族学生的比例程度。与坦桑尼亚一样,当学生在政府力量不及的地方寻找教育机会时,马来西亚的族群优待政策也给了私人教育一个刺激。

在坦桑尼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公共教育机构中,学生族群比例的变化无疑是无可否认的。然而通过学生考试成绩的测定结果看,这一政策的代价也是很明显的。在坦桑尼亚,尽管没有反映这个结果的可靠数据,但据估计,克利曼加罗地区的学生要升入中学需要180分,而其他地区的学生只需要140分即可。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我们可以找到较多精确的数据。

在马来西亚技术中学的一个抽样调查中,不同族群的学生在初级教育证书考试中的成绩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学生中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数目相等,大致对应于人口中各族群所占的比例。在数学考试中,91.7%的非马来人学生得了3.4分(或更高,最高分为1.0),在历史、地理、数学等一般综

^① 下面的材料来自1980年我和坦桑尼亚政府教育官员和学者的谈话。

合考试中成绩同样好,而只有 37.1% 的马来学生能得这么高的分,一般综合成绩得同样高分数的马来人只有 34.3%^①。优待政策使得分数明显偏低的乌来人得以升入高中。

不仅如此,由于上大学对非马来人来说变得很困难,这就削弱了华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调查资料显示,马来学生为了接受第六级训练(大学前)比华人学生更愿意推迟工作,测验成绩与愿意推迟参加工作而接受第六级训练的相关度在华人中比在马来人中要高得多。在马来人中不存在这种相关,主要是因为在样本中几乎所有的马来人学生都希望能进入大学学习。——这就是优待政策在学习热情与学习成绩关系上的影响。

在斯里兰卡,由于泰米尔学生在科学、医学和工程学专业上能较成功地取得入学资格,对僧伽罗学生的优待政策正是对他们的这种成功的一种反应。曾有传闻说泰米尔阅卷人对泰米尔学生的中期考试的分数不适当当地予以照顾,针对这种情形,政府在 1971 年在特别的基数上调整了每个族群升学人数。随后一年,政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实行一套调整了的或“标准化”的分数。这一计划反映了这种观点:“在教育部里僧伽罗人处于支配地位,他们坚决认为有必要调整政策以便给僧伽罗学生更多的机会参加大学里偏重科学的课程的竞争。”^②其结果是把以下三种语言的中期考试——英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的水平降低到一个普通的水平,以便使各个族群的学生在考试中合格升大学的人数与其参加考试的人数所占比例相适应。

这是 1973 年政府采用的制度。在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这两个领域,这种政策的影响最大。在这两个领域中泰米尔学生比僧伽罗学生成绩要好得多。例如在 1972 年,理论数学考试中泰米尔学生只占参加考试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然而他们中的 54% 通过了考试,僧伽罗学生只有 40% 通过了考试。结果在通过考试的学生总数中泰米尔人占 39% (其中 54% 的学生得了 A)。实行标准化分数的第二年,泰米尔人参加考试的人数与取得成功的人数的悬殊比例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泰米尔人入学人数的下降。^③

随后一年,地区配额政策代替了上述政策。中期考试的标准化政策只是稍

^① Wang,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Ethnic Stratification," 113 Beelan Chan Wang, "Sex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in Malaysia: The Effect of Reward Structur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4 (June 1980); 5 140-159.

^② C. R.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Sri Lan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 (June 1979) ·85-123, at 89-90.

^③ Computed from de Silva,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160, 162.

稍减少了泰米尔人入学人数,因为实行“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根据参加考试的各族学生的比例来确定的,而泰米尔人参加考试的比例远高出其在人口中的比重。但是现在实行地区配额政策,这对泰米尔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泰米尔人集中居住在几个地区,最大集中区在贾夫拉(Jaffna),1974年这个地区有资格进入医学与生物学专业学习的学生为398名,有资格读工程与物理学的有575人,但根据地区配额制,这两个领域分别只有34和37个名额。^①

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戏剧性地改变了入学学生的原始分数。即使是在1971年第一次对原始分数进行调整时,泰米尔学生拥有工程学名额的40%以上,僧伽罗学生的录取最低原始分数仅是泰米尔学生最低分数的90%。后来政策不再实行分数调整政策,但民族之间录取最低原始分数的差距一定越来越大。因为泰米尔人升入工程学的比例明显下降,由1970—1971年的40.8%下降为1971—1972年的34.7%,1973年的24.4%,最后降到1974年的16.3%,正是在这年(1974年)实行地区配额政策。^②显然,大量成绩不合格的僧伽罗学生被录取入学。

斯里兰卡的优待政策没有导致私立学校的出现,然而相当多的马来西亚华人则有能力送他们的子女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却很少能这样做,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妙。因为相比之下在70年代开始实行族群优待政策时,马来西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大大增加,而斯里兰卡的招生人数很长时期都没有增加。

70年代早期和中期,如果说在马来西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共产主义游击队,这与政府在教育中实行的优待政策有联系,同样在斯里兰卡也兴起了新一轮泰米尔人分离主义暴力运动(包括暗杀警察和士兵)。非常清楚,这种运动起因于标准分和地区配额政策的实行。这种招生制度“使许多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认识到:期望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僧伽罗人享受平等地位是徒劳的。这就极大地加强了泰米尔人联合阵线内的分离主义力量,导致1975年初‘建立独立国家’运动为泰米尔人所接受。”^③它也迫使政府在泰米尔人居住的中心地带贾夫拉建立一所新的大学。结果,斯里兰卡实行的优待政策间接地也同样扩大了大学学生的总人数。

无论是马来西亚还是斯里兰卡,优待政策都有这样的效果,受优待群体以

① Computed from de Silva,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164.

② 同上,156,和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105—106.

③ De Silva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166.

前在大学学生人数只占一小部分比例,低于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但后来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大超出了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这两个国家,强烈的政治反应促成了对优待政策的某些调整,但并没有导致优待政策的中止。

1978年,马来西亚华人提出建立一所华人大学的要求以抵消优待政策的影响。作为统治集团一部分的华人联合会一方面坚决反对上述要求,一方面也不停地威胁政府,如果不对优待政策作出修改,他们就退出政府。政府最终同意在马来西亚大学中,华人占有的比例将逐渐上升,直至达到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样,优待政策并没有采用单纯根据考试分数来招生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按比例录取的方式。^①

斯里兰卡的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75—1976年,大学招生名额中70%根据中期考试的标准分计算结果,30%根据地区配额进行。但是对贾夫拉和科伦坡都增加了配额。1977年新当选的联合党政府曾宣布放弃大学招生中的优待政策,但当分数结果公布时,泰米尔学生在医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人数超过了僧伽罗人。僧伽罗学生发动了暴乱,结果所有在标准分基础上能被录取的学生都被录取了(注意!优待成分扩大了)。第二阶段的方案,30%学生根据原始分数录取,55%学生根据地区配额录取,15%的名额留给落后地区。泰米尔人被录取人数比在实行标准分政策时高,如1983—1984年^②他们占有工程学28%的比例,但被录取人数当然要比自由竞争条件下低。最终政策如何调整还不知道,因为教育落后的穆斯林和“泰米尔—不可接触者”少数族群也提出了得到与其人口比例相应的名额的要求。优待政策是难以废除的,但它们也趋向于采取根据人口比例实行配额的方式。

这些数据也许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充分。但它们确实显示出实行教育优待政策的后果的某些规律性。在各族群教育水平相差悬殊的地方,就会有在中学和大学中对特定族群实行优待政策的要求。优待政策会导致学校降低录取分数。被优待政策排斥在外的申请者可能会降低了他们求学的抱负,但许多人将努力在优待政策不起作用的机构如私立学校和国外的学校中寻找就学机会。尽管优待政策力图规定的是各族学生比例而不是绝对人数的多少,其最终结果都导致学生总数的增加。这也减弱了优待政策的作用,也减少它的爆炸性。因为优待政策导致的不满似乎很容易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别

① 这里我引用的材料来源于1980年和1984年我和马来西亚政治家的谈话;关于华人的不满,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Apr 10, 1981, p. 75。

②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A Brief Analysis," *Ethnic Studies Report* (Kandy, Sri Lanka) 2, (Jan, 1984): 11—20, at 15.

是在没有可替代的教育机会的时候。

2. 商业中的优待政策

判断在商业执照、合同和所有权等方面中实行的优待政策的影响是困难的。短期的代价很明显，尽管它的程度不易测量，而长期利益却很难估计。

商业中的优待政策导致被优待群体大量充当挂名人物。执照是以他们的名义领取的；土地所有权是以他们的名义持有的；股份是挂在他们名下的；合同也是由他们签订的，但是，他们除了为允许使用他们的名义收取费用外并不在企业里担任任何角色。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安排被称为“阿里—巴巴联合”(Ali-Baba)，阿里是土著挂名人，巴巴是华裔企业家。

当商人们通过支付金钱来确保免除族群优待政策执行中的压力时，优待政策就大大增加了官员腐败的机会。例如在马来西亚，运输业长期以来只允许马来人领取执照，到70年代中期，华人取得执照十分困难。为了得到出租车甚至大卡车的执照，华人不得不付出大笔贿金。不管招用挂名人物对相应政策实行名义上的遵从，还是用腐蚀官员的办法来避免实际中的限制，优待政策都增加了做生意的额外负担。^① 优待政策压抑投资、刺激资本输出这种后果的可能性增加了，而被优待群体的商业力量却并不一定有所增强。

新的商业阶级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马来西亚政府认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70年代初他们开始实行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拟定马来人在20年内将占有股票的份额从当时的不到2%增加到30%。马来西亚没有放弃优待政策，而是倾向于把目标固定到30%的份额，并在其执行中更为强硬，同时依照马来企业家们和官员们的影响力将它扩展到新的经济部门和领域中去。但是人们都知道，采取剥夺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只能通过政策影响来取得新的机会。

为了实行这一计划，马来西亚建立了几个政府机构。珀纳斯(Pernas)即“全国公司”开始以托管的方式购买财产以便最终分配给马来人。最初，它主要作为以马来人为对象的一个批发组织，但它现在已经开始获取财产，开办商业。UDA即城市发展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新的马来商人提供资金，给马来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机会。各州建立了州的经济发展公司，他们在各类商业中进行投资。MARA，一个土著人托拉斯，甚至早于新经济政策实行就开始训练马来人，以优惠的利率向他们提供信贷。邦米普特拉(Bumiputera)银行也在新经济政策之前

^① 在斐济，只有斐济人能拥有土地，土地以高昂的租金租给缺乏土地的印度人，以至土地过度耕种并负债累累。Adrian C. Mayer, *Indians in Fiji*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3), 62.

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实行新政策之后它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了。1971年后,所有这些组织都迅速转移到帮助马来人从事商业活动方面来。

最后的定论决不会取决于这些组织的活动,但以下几个趋势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中,这些扶持马来人企业的特殊努力基本上没有侵害到华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利益。在教育招生和就业中的优待政策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但华商大体适应了新的要求,把它们当作做生意的一种代价,有时还可以从中获利。许多华人公司被迫重新调整他们的资本份额,非常廉价地转给马来人,以便使得马来人持有其中的30%。但有些公司设法吸引有政治影响的马来人,借助他们的关系来增加公司的利润。华人公司从与UDA和帕拉斯所开办的公司的联合中也获得了利益。通过这样的伙伴关系,有些过去也许不会很快批准的计划现在可以很快得到批准了。华人的专长对许多新的投资项目来说是基本的条件,特别是在70年代。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提到。

至少在一些方面,扶持马来人企业的努力增加了马来人—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新增加的机会主要是面向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政治就变得复杂起来。马来人内部的竞争也激烈起来。马来商人的不同群体都追求他们的最大机会。为了实现他们的雄心,他们有时会和执政的马来政客联合起来。例如1975年,马来人商业议院(Malay Chambers of Commerce)的一位代表严厉地批评UDA没能有效地帮助马来人。UDA是由一个当政的马来政治家的兄弟领导的,他曾公开地批评马来商人阶级中的自私性。马来议院的主席是另一个马来政治领袖,他们两人是执政党内的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巨大利益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斗争。

如果从族群冲突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组织似乎还没有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的活动已十分困难。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马来人进行商业活动,这使得对马来人按商业规则办事在政治上变得十分困难。许多MARA的贷款被骗走;许多UDA的租金被拖欠;许多州的发展公司做出了不是根据商业标准做出的决策。

到1983年,政府为马来人托管的投资占了公司资金总额的11.1%,马来人个人另外拥有7.6%的份额。^①许多年来,关于怎样将托管的股份转让给马来人个人所有,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第一,许多马来人缺乏资金购买股票,财产的分配将严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第二,特别地,这些财产如以低于市场价卖出,它们很快会为获取利益而被再次卖出,而肯定会落

^① 马来西亚政府, *Mid-Term Review of the Fourth Malaysia Plan, 1981—1985* (Kuala Lumpur: Jabatan Persekitaran Negara, 1984), 101.

到非马来人手中。如果后者发生了,整个政策将遭到挫败。一些州的企业把他们的财产卖给全国股份公司,后者把股份再卖给在一个严格控制的国家信托公司中的马来人。然而直到现在,已经购买的股份还没能自由交易。

正如财产分配中的争论所表明的,关于是否能长时期将财产保持在马来人手中仍是一个问题。在某种情形中,对股份再售出的限制将不得不增强。考验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否在于长时期内——也许是几代人——始终保持住资产。

3. 就业中的优待政策

在某些方面,就业中的族群优待政策的后果是教育和经济中优待政策后果的混合。优待政策增加了企业家和商人做生意的代价,这种代价商人也许能够承受得起,但是它引发了竞争中的愤恨情绪,而且这种愤恨会表现到政治层面上来。就业中的优待政策所引起的愤恨比在教育中引起的愤恨要更强烈,因为在就业中被排挤在外的申请者不像在教育中能在优待政策不起作用的地方找到替代的其他机会。结果,在就业中实行优待政策的政治代价是相当昂贵的。

就业中优待政策的代表性的影响有时很难测量。在对印度的优待政策的研究中,麦伦·维纳(Myron Weiner)和玛丽·范瑟德·卡兹斯坦(Mary Fainsod Katzenstein)发现,对优待政策的需求常常伴随着受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例如孟买的玛哈拉什特拉人(Maharashtrians)的就业状况在优待政策实行前就有好转,他们在就业之后的改善是否源于优待政策还不太清楚。^①然而,这种政策的严格实行,产生了没有优待政策就不会产生的效果,其直接效果是明显的。一般地,优待政策的目标是让各个群体所占的就业人数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称。通常这是一个很不现实的目标。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各族群的人口结构是十分不同的。^②一个年龄结构偏年轻、受教育少、乡村色彩浓的族群很难向现代生产部门提供与其人口比例相当的就业申请者。毫不奇怪,受优待群体中合格的职员人数供小于求。为了满足统计比例上的要求,生产效率不高的雇员可能不得不被雇佣。与在商业领域中一样,由于官员腐败,这种政策往往难以推行。

有关就业优待政策的最详细的资料出自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都实

^① Myron Weiner and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Migrants, the Middle Classes and Ethnic Equalit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1), 120—135; Katzenstein,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Ethnic Conflict in Bombay," *Public Policy*, 25 (Summer 1977), 313—332.

^② 例如在黎巴嫩的什叶派,他们长期抱怨他们在公共服务部门所占的比例不够,与其他人口的比例相比他们所占的比例低,但他们在大学毕业生中所占的份额与他们人口的比例是相称的。

行了广泛的优待政策。马来西亚的证据对研究优待政策的短期影响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不像资产所有权方面的规定,马来西亚的就业目标从来就没被准确地加以陈述或宣传。总的说来,其目标是让马来人在现代私人企业中拥有与其人口相应比例的职位。其结果是企业被迫给予马来人各种层次 50% 的工作位置。劳动部联合其他政府部门共同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对不执行政策的企业实行惩罚,这就延缓了商业活动的扩展和开业执照的更换。^①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非马来人为保住自己的位置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占的比例日益下降。非马来人中产阶级在就业中面临的不利局面是长期的、严重的。这不仅表现在就业中,也体现在晋升上。在教育中的优待政策和在就业中的优待政策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教育中,华人感到为了在日益缩小的教育市场上和日后就业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他们必须加倍努力。由于觉得自己的前途有了保障,马来学生就没有努力学习的压力。然而在工作中,这种政策也许泯灭了华人努力工作的热情,因为他们看到年轻的马来人有更美好的前途。^②

马来西亚的决策者意识到各种压力,他们使得政策的灵活性变得更大。在最近几年中,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马来人的财产所有份额和生意机会上的同时,也开始对商人和企业家无法找到合格的马来雇员的抱怨有所反应。有些决策者认识到,他们对马来人的行政能力期望过高,他们流动性大,在一个职位上待的时间短,难以积累有用的经验。结果,优待政策以一种宽松的方式加以执行。一个公司只要能对马来职员少的原因作出适当的解释,一般不会招致惩罚。这种灵活性虽然没有完全消除非马来职业申请者的怨恨,却大大减小了更严格的优待马来人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在有限的程度上,商业界和劳动者对就业优待政策的反应类似于对教育优待政策的反应。招生中优待政策导致部分教育需求转向私立教育,从而扩大了学生的总人数。雇佣中的优待政策可能促使劳动力总量的扩大。它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当雇主认识到他必须雇佣不合格的受优待民族群体成员时,他可能只把他们当作额外负担,而不对他们抱什么期望。另外,有些失望的寻职者通过转移到国外劳动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在印度,受到了相当高教育的克拉

① 关于马来西亚的政策及其影响,见 Ozay Mehmet, "Malaysian 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Policies Effectiveness and Prospects Under the Fourth Malaysian Plan", *Asian Survey* 22 (Oct 1982): 978—987。

② 见 Sham Sunder Gupta,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Public Employment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Lucknow India: Eastern Book Co. 1979).

里特(Keralites)人,由于被更喜欢“土地之子”(指本州土著居民)的那些州排挤在就业之外,他们就在一些海湾国家中寻找就业机会。^①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适应办法似乎不像被排挤的学生寻找私人教育那样普遍。毕竟移民的机会并不总是存在着。雇主们扩大职工队伍以使一些人增加就业机会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在实行就业优待政策的地方引起被这些政策所歧视的族群的愤怒反应是不足为怪的。^② 维纳和卡兹斯坦明确指出,在孟买、安得哈和阿萨姆州(Assam),就业优待政策激起的族群冲突超过了它所能缓解的族群冲突。因为“政客们提议实行优待政策并不是出于对公众要求的反应,而仅仅是他们作为动员政治支持的一种手段。”^③当群体按地域分化时,往往会产生分离主义,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当他们感觉到优待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发起了分离运动。

在前一章我注意到,对于像印度的拉加斯(Nagas)或巴基斯坦的泊森斯(Pathans)这样的落后群体,保证他们不分离的有效政策可能包括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在中心地带给他们提供机会。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有时采用优待政策是必要的。在对拉加斯和泊森斯人的优待中,受惠于优待政策的竞争者数目不大,不至于构成大的威胁。

优待政策和分离主义的关系很复杂。这种政策也许促成边疆地区的落后群体相信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统一是相关联的。但如果边疆地区先进群体成员希望迁进中心地区而优待政策限制了他们这样做时,优待政策也会导致分离主义。如果先进群体感到优待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落后群体却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优待政策的维持密不可分时,两难困境就出现了。因为优待政策带有“零和游戏”的性质。政策制定者既不能严格实行它们也不能废除它们。

也许最好地解释这一两难困境的办法是仔细考察一个极端糟糕的案例。在这一案例中,优待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但同时政策的摇摆导致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相互补充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个案例发生在60和70年代印度的安得哈·普拉得什邦,这一由几个地区合并而成的单一说泰鲁古(Telugu)语的邦,成立仅仅十年就被泰兰嘎纳分裂主义运动瓦解了。针对泰兰嘎纳

① Weiner and Katz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134.

② 同上,147。

③ 同上。

(Telangana)分裂主义实行的政策又直接导致了沿海的安得哈人(Andhras)的分裂主义反应,而他们曾经是早期统一邦的主要组成部分。^①

泰兰嘎纳人是典型的落后地区的落后群体,识字率仅为该州其他民族的一半,并且土地贫瘠,发展缓慢。泰兰嘎纳人勉强加入了安得哈·普拉得什邦,受一系列被称为“君子协定”的保护。这些协定规定,只有土著居民(泰兰嘎纳人或在那里居住十五年以上的居民)才能获得在泰兰嘎纳区域的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资格(只能有极少的例外)。非土著人进入泰兰嘎纳教育机构受到严格限制。这些协定还规定了泰兰嘎纳人在邦内阁中的比例以及将财政收入优先分配给泰兰嘎纳人。这样,泰兰嘎纳人和土著人的地位被一套精心设计的优待政策和配额措施保持下来。

邦的统一会产生它自己的活动机制。邦首府设在泰兰嘎纳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受过良好教育的滨海安得哈人迁移到那儿。由于合格的职员难以找到,邦政府在土著规则之外作了几个例外规定。假的“土著证明”很容易获得,据说安得哈人加薪和提升都很快,而泰兰嘎纳人要求的比例却得不到满足。^②土地价格的悬殊差距使得许多精明的滨海安得哈农民卖掉在家乡的土地,而用同样的钱可以在泰兰嘎纳买到较多的土地。泰兰嘎纳过去曾经担心的“被滨海地区先进群体所淹没和剥削”^③现在似乎成为现实。

结果在1969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泰兰嘎纳人暴乱。1971年当暴乱达到顶点时,议会中泰兰嘎纳人的14个议席就有10个被主要的分离组织所占有。教师、公务员和学生是这次暴乱最热心的参与者。引发这次运动的原因有许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用来保护泰兰嘎纳人不受“聪明狡猾”^④的滨海安得哈人侵害的优待政策的失败,这激起了泰兰嘎纳人的愤怒。

泰兰嘎纳人运动得以平息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与印度的联邦主义有关。在运动中,其领导人继续和国大党保持联系;其目标是将邦议会议长赶下台以取得实际利益。当这个目标实现后,他们就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重入议会,而不再让运动继续下去。

^① 关于Prudesh分离主义的材料来自我1975年在Hyderabad的谈话及下列来源Duncan B. Forrestier, "Subregionalism in India: The Case of Telangana," *Pacific Affairs* 43(Spring 1970); 5—21; Hugh Gray, "The Demand for a Separate Telangana State in India," *Asian Survey* 11(May 1971); 463—474; Rehseeduddin Kh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ndhra Pradesh(India)"等。

^② 见Myron Weiner, *The Telangana Movement: An Investigative Focus* (Hyderabad, Anand Rao Thota, 1969)。

^③ 同上,43。

^④ Reddy, "Uni-Party Dominance in Centre-State Relations-Andhra Pradesh Experience," 15.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这次运动是由当时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引发的。这项裁决判定：“申请工作的人必须拥有当地的居住权”这一规定是违宪的。作为对这次运动的反应，政府对泰兰嘎纳人作了许多让步。一个泰兰嘎纳区委员会建立起来，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增加土著人的就业机会。^① 1972年，印度最高法院又裁定土著规则仍然有效。以后，有些学生仍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兰嘎纳邦，但政府支持优待政策的重大让步，平息了这次运动。泰兰嘎纳人最重要的不满，源自就业中的优待政策。

然而这些平息泰兰嘎纳人分离主义运动的措施却在滨海安得哈人中激起了新的分离主义运动。泰兰嘎纳人的运动迫使一些安得哈移民返回家乡，并“诉说他们在土著人中受到的苦难、侮辱和身体侵害的故事。”^② 当最高法院裁定原来的土著规则仍然有效时，这就点燃了安得哈人的怒火。为此，甘地(Gandhi)夫人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以限制土著规则的运用，但是限制的程度非常有限。于是这一妥协更加重了安得哈人的愤怒，安得哈籍的州内阁部长们纷纷辞职，政府职员开始罢工，法律的秩序遭到破坏。土著规则和它带来的歧视导致了分裂主义运动的产生。

对一个独立的国家来说，任何一次这样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武装的分裂主义战争。只是由于安得哈·普拉得什邦是联邦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才阻止了这一后果的发生，因为双方基本的要求是极端地不可调和。最后，中央政府通过一项政策控制住了安得哈人的愤怒，这一政策通过宣称实行区域优待政策来掩盖对居住地的要求，并使得土著观念变得模糊起来。中央政府最后不得不应付的安得哈人的愤怒，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样，安得哈·普拉得什邦或多或少作为一个统一的邦存在下来。^③

当安得哈人运动达到顶点时，很有可能导致泰兰嘎纳人运动的复活。那么，这个邦就能产生分裂，如同1966年印度的旁遮普邦的情形。为什么没有出现像旁遮普邦那样的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相互补充的分裂运动：它们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并由对立方的愤怒行为所导致。优待政策的实行使先进的、迁出居民的群体产生分裂倾向，取消这些政策意味着落后群体发起分裂运动。安得哈·普拉得什邦经历两种类型的分裂运动，一个紧接着另一个，因为它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

^① Ramashray Roy, "India 1972: Fissures in the Fortress," *Asian Survey* 13 (Feb. 1973): 231—245, at 237.

^② Gray, "The Failure of the Demand for a Separate Andhra State," 339.

^③ 同上, 348—349。

也有这样的例子：决策者坚决地实行优待政策，与此同时种下了愤怒的种子，而且他们也剥夺了自己灵活处理随后发生的冲突的权力。另一些采取同样政策的决策者似乎也重蹈覆辙。最有名的是在斯里兰卡，1977年上台的杰叶瓦登（Jayewardene）政府开始努力改变或修正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对僧伽罗人的优待政策。在政府职员招收中，对语言的要求也放松了。政府还制定了让泰米尔人进入军队和担任警官的计划。^①政府把泰米尔人恐怖主义活动归因于优待政策的实施。这种联系并不是虚假的，但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迟了。到政府实行新政策时，许多泰米尔青年早就已经认定政府与他们是对立的。发起恐怖活动的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就是在这些修正了的措施实行时产生的。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是对早期优待政策的间接反应，恐怖活动也导致了1983年反泰米尔人的暴力活动。

优待政策的得与失

现在对优待政策做决定性评价还为时尚早，但目前我们可以用怀疑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些影响。证据还不够充分，可获得的证据中关于直接后果的比关于长期影响的要多。也正是这种不平衡使人颇感犹豫。

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就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在坦桑尼亚和马来西亚，对教育中实行的优待政策的反应比较温和，这主要归因于存在着替代的办法（如建立私立学校和就学于国外）和实施时的灵活性。在斯里兰卡，这种反应要强烈得多，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可替代的途径。与印度的某些邦相比较，对马来西亚就业优待政策的温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行这些政策时的政治灵活性。马来西亚实行的商业优待政策的经验表明，这些政策较少挑衅性。也许是马来西亚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新政府所提供的商业机会的增多改变了可能的敌意。这些优待政策未能在短时期内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这一经验表明：对于这些政策的灵活实施、对政策产生的利益予以调整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执行机构的温和方式与政策本身同样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教育和就业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优待政策在短时期内会加剧冲突。

在中期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看到优待政策会增加民族冲突。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根据民族群体产生的职业分工的普遍模式引导着人们进入已

^① 见 *Ceylon Observer* (Colombo), Apr. 6, 1980.

经建立起来的族群职业的就业期望。因此族群之间劳动分工加强了族群内部而不是族群之间的竞争。对优待政策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某些机会是为某个族群据有的，对这些机会的竞争就会在族群内部进行。但当优待政策打破了族群之间的劳动分工时，族群之间的职业竞争就产生了，过去隔离的劳动市场曾避免了这种竞争。^①

当然，如果今后产生的利益十分巨大，目前看来需要付出的较高的短期和中期的代价似乎是可以承受的。如果最终所有的群体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在各个层次上都占有适当的份额，族群冲突就会减少。很少有社会接近这种描述，这是上述主张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以控制经济的方式实行严格的优待政策能否使一个社会接近那种状态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还不是结论的全部。在亚洲和非洲，中短期政策特别容易受到族群之间的平静、民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获得长远的巨大利益而实行的政策，如果短期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它应该经受严格的审查——特别当它的利益只是想象的利益的时候。对于族群政策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策制定者死了的时候，仍然看不到其长远利益的实现。

人们需要的是眼前的利益。组织技术能够产生短期效果，因此就显得更有优势。

优待政策的目标是改变群体之间深层的敌意。但它们在两个关键方面没有达到目的。第一，它们对社会阶级产生的影响通常会产生偏差；第二，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群体之间的敌意仅仅起因于群体间在社会结构中的悬殊差异。

优待政策倾向于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它们没有想办法消除那些并不想升入中学或大学，不想在现代私营部门或官僚机构中就职，或不想做商人的人的不满。尽管下层阶级的不满是深沉的——参加民族暴力行动的通常是下层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他们的不满与职业流动无关，而且优待政策也没有针对他们的情况。实行缩小族群之间差异的优待政策可能增加族群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再次分配的结果，而人们对此几乎没有注意到。^② 在一个已经以族群分割的社会中，社会阶级的分裂并不一定有助于缓和群体之间的

①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352.

② See Jacob Meerman, *Public Expenditure in Malaysia: Who Benefits and Why*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9), 37; C. F.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362.

分裂。而且恰恰相反,它可能会促使下层阶级将侵犯行为转嫁到其他族群身上。^①

优待政策只是力图缩小各族群之间比例的差异,它们忽略了伴随这些差异的政治和心理状况。优待政策如果同时能解决落后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就会大大减少族群冲突。但是,这里优待政策的优势只是一个有限的条件。优待政策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它不需要公共费用开支,但它只起了一个看门人的作用,它们只是打开了通常情况下关着的门而使一个族群得到单凭能力得不到的机会,但并不能保证他们在争取到这些机会后总能获得成功。有时政府采取措施以补救这种不足,有时公司设法使政府在扮演看门人的角色之外还帮助他们进行通常情况所没有的就业训练等。经常地,贷款中的欺诈行为,无力偿还债务,学业成绩糟糕,所有这些表明,只是充当看门人角色的优待政策可能会增加落后族群成员由于实际竞争失败所产生的对于竞争的恐惧。

如果优待政策没能减少受优待群体的恐惧,他们甚至能患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说的“补偿性精神病”,它是一种精神失调,“它不自觉地延续着以便寻求财政帮助”。^②维纳和卡兹斯坦发现,优待政策在印度(以及马来西亚和其他地方)本来应该是短期的,现在却变得越来越永久化^③。从坚持优待政策的种种措施得出结论说人们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和竞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通常存在于被优待群体领导人的思想中,他们不断地劝诫自己的成员努力工作,通过实际的成果来证明实行优待政策是正确的;要充分利用这一特殊机会,因为优待政策不会永远实行下去。^④没有人仔细地去研究这种压力对受优待群体参与竞争的影响,也没有人研究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的影响。这种带有爆炸性的混合如不加剧族群间紧张关系倒反而令人奇怪了。这一状态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优待政策的制定可能源于一个有缺陷的冲突理论,但它一旦实行就难以收回,即使决策者相信收回它是有正当理由的(正如斯里兰卡的大学招生)。实行优待政策的压力是广泛的虽然不是全体一致的。有些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东

^① 见 Donald Horowitz “Direct, Displaced, and Cumulative Ethnic Aggress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6 (Oct. 1973): 1—16.

^② *Childhood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44.

^③ Weiner and Katzenstein, *India's Preferential Policies*, 18.

^④ 见 Mayer, *Indians in Exile*, 82; Weiner, *Sons of the Soil*, 354; *New Straits Times* (Kuala Lumpur), Mar. 29, 1980.

西,应加以强调——不同的政策(即使属于同一性质的政策)也含有不同的得失率。实行了优待政策的社会仍有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选择余地。如就业优待政策应该与职业训练相配合;招生中的优待政策在实行时应该为被排除在外的学生找到替代的出路,以免完全没有出路的学生自行其是或转向暴力反抗。由于优待政策并不是必然的,因此,任何一种特殊形式的优待政策也不一定是非实行不可的。

在实行优待政策的要求不能忽视的地方,一个可采用的办法就是用地域代替族群特性作为确定受优待范围的根据。在联邦体制中,这很容易实行,但所有的国家也都有符合这一目标的地区或省的行政区划。我们看到不同的优待涵盖标准在实行中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一样。地区标准具有比族群标准较少严格性和不易引起太多反抗的优点,即使当按地区划界和按族群划界有很大重合时也是如此。通过地区单位划分的比例或对落后地区的优待政策,没有预先确定在某个单位内谁将受益。在联邦体制中,这种事可以留给每个邦自己去解决,从而潜在地和有效地降低冲突和其他各种如在生产效率方面的代价^①。在中央集权体制中,中央政府也可采取地区优待政策以平衡各族群之间的比例,从而达到减少冲突、提高生产率的目标。但是过于严格的地区配额政策的确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②许多落后地区不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合格人才,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是一种反对严格配额制的观点,反对采用较小的可能不包括城市中心的区域来划定合适地区单位的观点。^③如果用地区作为划界标准,只有当地区单位较大时,政策的实行才能获得灵活性,生产性代价才能降至最小。

最后,决策者应记住,除了优待政策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选择,这些选择在实行中可能起初代价大一些,而在实行一段时期后代价会减小,而且还会带来较大的生产上升和族群和谐方面的利益。正如在第四章所说的,许多族群间当前存在的经济差异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那些靠近港口、教会学校、殖民者首府或商业中心的群体取得了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一般来说,地区发展政策(Location policy)和投资政策也许比优待政策更为有效地减少族群冲突。此外,这一政策还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即它广泛而公正地将缩小族群差距的

① 见 Chapter 15.

②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92—94.

③ 斯里兰卡的地区标准化政策包括高等教育的地区限额,在落后地区一些这样的限额是隐蔽的。

巨大代价分散开来，而不是将代价转嫁到个体竞争者身上——正是他们的不满形成了严重政治冲突的基础。

(马朝东 译，王宗凡 校)

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的族群关系

斯蒂凡·苏利万(Stefan Sullivan)**

引 论

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对主权的寻求一方面显示了一个自然的自决过程,而另一方面,看来也已经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民族紧张关系。这种紧张的根源在于少数派俄罗斯人(minority Russian population)的权利同在一个独特的非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之上建立的共和制主权国家这一基础之间的冲突。对于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派俄罗斯人的权利,特别是关于语言、投票权和公民权的法律,已经有了很多著述。然而,尽管西伯利亚地区各自治共和国中的民族和经济分化,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当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显著,它们仍然很少受到外界的注意。这种忽略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资料的短缺和收集资料的具体困难。本文接下来试图通过对图瓦,俄罗斯联邦在南西伯利亚边陲地区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的考察,来部分地改变这种研究中的区域不平衡状况。

图瓦(Tuva)是前苏联最年轻的自治共和国,坐落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两大山脉——北面是萨彦斯克山,南面是唐努乌拉山——之间,正好是亚洲大陆版图的地理中心。这个偏远的共和国很少有人造访;公路条件很差,没有铁路交通线,连前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去年也取消了直飞莫斯科的航班。然而,

* 本文原载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杂志 1995 年, 总第 18 卷第 1 期, 第 64—88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了美国版权所有者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Services 的同意, 谨此致谢。

** 斯蒂夫·沙利文,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俄国和西伯利亚事务研究员。

仍然有来往于图瓦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其他西伯利亚城市的地区性航班。图瓦共和国南面和蒙古国接壤,北面是哈卡斯(Khakass)自治省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区,西接戈尔诺—阿尔泰(Gorno-Altai)自治省,东联布里亚特(Buryat)自治共和国,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和希腊相差无几,全部人口中的大多数集中居住在首都,即位于共和国中部的克孜勒(Kyzyl)市。

图瓦人通常被看做是西伯利亚突厥人(Siberia Turkic)的一部分,然而,和外蒙古广泛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搞混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有些分析家认为,俄国和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记载故意地忽略图瓦和蒙古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作为俄国对这一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根据(鲁本1975,153—154页;阿拉塔卢1992,第882页),而事实上,上叶尼塞盆地的居民们在历史上受到了包括突厥—吉尔吉斯人(Turkic Kirgiz),蒙古—卫拉特人(Mongol Oirat)以及俄罗斯人——大多是哥萨克雇佣兵和沙皇的行政官员——在内的多重影响。作为16世纪以来各方竞相争逐的领土上的居民,图瓦人,又被称作“乌梁海”(Uryankhai)(在蒙语中,意为“土著居民”),同时从突厥—吉尔吉斯人和蒙古—卫拉特人那里获取了文化的和遗传基因的特征。一般说来,“突厥”的特征包括语言学和基因的相似性,相应地,也包括突厥形式的萨满教(Shamanism)的信仰。来自蒙古的传承(heritage)则表现为相同的游牧生活方式,同西部蒙古人、卫拉特人的种族联系,以及喇嘛教的盛行。喇嘛教从南部(蒙古)传入,并且和早已存在的萨满教实践活动互相融合在一起。更为突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图瓦名义上的短暂独立时期的一段时间里,蒙古语是政府、媒体和精英人物最喜欢用的语言(Maenchens-Helfen 1931,第126页)。

图瓦共分为15个行政区,其中的6个(乌杜格—凯姆斯基,塔丁斯基,皮—凯姆斯基,托津斯基,卡阿—凯姆斯基,克孜勒斯基即首都地区)是图瓦人和俄罗斯人杂居的地区。图瓦的总人口,根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30.9万人。据官方统计,图瓦境内总共有13个族群,其中大约10万人(约占32%)为俄罗斯人,其余人口的64%为图瓦人,另外4%为其他族群。根据俄国国家统计委员会1990年编集的数据,在俄联邦所有的自治共和国中,主导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titular population),图瓦排在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亚(Cherkessiya)自治共和国之后列第二位。1989年普查之后,图瓦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67%,总人口也增至35万。相应的,图瓦主导民族的比重也升至所有自治共和国的首位。在过去十年里,官方记录显示了23%的人口增长,主要归功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和定居条件的改善。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在自治共和国政府寻

求针对俄罗斯的独立进程中所具有的政治意义,这些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并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况且,在裁定历史争端中俄国向中国提出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时,人口政治学早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一开始图瓦是中国(清)的领土上,俄罗斯人,以及后来的苏联人,都通过让人们注意到图瓦境内大量的俄罗斯人口这一事实来作为他们把这个地区合并入自己版图的有力证据。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直到苏维埃时期,才有不到2.7万名俄罗斯人居住在图瓦,其中的大部分是1944年以后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工到达的。

关于人口的城乡分布划分如下(1989年人口普查;Anaidan,1992):(1)总人口:47%为农村人口;53%为城市人口。(2)其中图瓦人:30%居住在城市70%居住在农村。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聚居在首都克孜勒,最新数据显示它共有8万人口,按官方的统计,其中70%为俄罗斯人,30%为图瓦人——但是这些数据容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每到入夏时节,整个首都就随处可见来自农村的短期移民,其中许多都是孩童,给人一种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图瓦人的错觉。此外,从1989年以后,原先的图瓦人和俄罗斯人2:1的比率随着近年来俄罗斯人持续外迁而逐渐向有利于图瓦人的方向逐年增高。然而,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自从1990年民族紧张关系到达最高点之后,俄罗斯人外迁的趋势开始缓减下来。1990—1992年成年俄罗斯人(16岁及以上)迁入图瓦的各项数据如下表所示:

年份	到达	离开	净迁入
1990	1 850	8 456	- 6 423
1991	1 631	3 669	- 2 338
1992(1—6月)	577	1 285	- 708

历史概要

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上叶尼塞河盆地处在突厥—吉尔吉斯人和蒙古—卫拉特部族的轮流统治之下。他们向当地居民,或“乌梁海人”(Urianchai)征收贡赋。后来直到18世纪,这块土地才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相互竞争的帝国式领土要求的争夺对象。然而,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农业殖民者、冒险家和矿工的持续稳定的流入,已经为沙皇统治创下了初步的基础。那个时候,图瓦正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遥远的省份,后者从1757年开始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由于清政府颁布禁止在这一地区进行永久性定居拓荒活

动,并且由于戈壁沙漠(Gobi desert)造成的地理上的分隔,这一地区从未成为中国拓荒者的理想目的地。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很早就认识到图瓦可开采的自然资源的价值:1830年代建立了金矿,1890年代开发了石棉矿。到1910年共有大约2000多名俄罗斯人生活在这块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却不见有永久性的中国移民点(鲁本1975,第158页)。总而言之,沙皇政府通过其在俄罗斯移民当中的代表直接执行它的政策这一办法、在确定对图瓦的控制方面,比试图通过图瓦本地和蒙古的代理人来管理图瓦的中国政府更为有效。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在俄罗斯人不建立定居点的前提条件下赋予俄罗斯商人在乌梁海(图瓦)当地居民当中从事贸易的权利。在1881年的新订条约中,清政府又被迫允许俄罗斯人在图瓦建立永久性定居点。此外,当时的一些报告认为,当时清政府对图瓦地区的重要性得到的是错误的汇报,只把它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穷乡僻壤。

在1911年外蒙古试图从中国分离之后不久,图瓦就试图寻求独立,此时俄国革命尚未开始。由于担心蒙古把图瓦并入它刚刚建立的国家之中,或担心这块土地自己单独寻求独立,沙皇政府很快就在1914年宣布图瓦为它的保护国。这种保护国地位一直持续到1918年图瓦宣布独立为止。把图瓦并入俄国势力圈是对蒙古施加相当外交压力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并不对萨彦斯克山脉以东以南的土地拥有主权,而图瓦正好坐落在萨彦斯克山南麓。因此,沙皇政府的部长会议拟定了一个“和平渗透”的政策,主要内容是谋求俄罗斯人对图瓦地区的逐步移民(佛莱特斯,1951,第102—106页)。内战之后,图瓦发现自己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一方面,受布尔什维主义激励的当地俄罗斯人改变了自己的立法策略(constitutional coup),组成了一个自治的劳动殖民地(labour colony),即 Russkaya Samoupravlyayushchaysya Trudovaya Koloniya (RSTK)。它声称自己对俄罗斯联邦(RSFSR)的忠诚,并授权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另一方面,图瓦的政治精英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唐努和图瓦人民共和国(Tan-nu-Tuva People's Republic)。1924年7月,俄国、蒙古和图瓦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谈,在保证当地俄罗斯人经济利益的条件下,最后达成承认这个年轻国家的协议。独立之后,图瓦就开始把握机会,以使自己从文化上和政治上脱离俄国,转向蒙古。字母表由俄文改为拉丁文的;取名也蒙古化了;蒙语成了政府的官方用语,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被催促着撤离。此外,佛教的扩散也得到政府的赞许。

然而到了1929年,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出台了。这是一个剧烈的苏维埃化的时期,同其他非俄罗斯共和国一样,是由当地共产党和那些改变信仰的当地

领导人来执行的。在图瓦,当地领导人是索尔恰克·图加(Solchak Toka),他于1929年上台,带头推进苏维埃化运动。随之而来的对佛教的残暴压制,造成了随后三年内这个国家的宗教传统的彻底毁灭。喇嘛的数目从1928年的4813名减少到1932年的15名,28座开展活动的寺院中的27座化为一片废墟。为了管理好这个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当多的俄国活动家和技术专家来到图瓦,他们的不断涌入影响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人口平衡,而从前莫斯科正是靠了它来作为自己对图瓦地区拥有主权的理由。

30年代初期和中期,图瓦经历了快速斯大林化的一系列过程与相关的反应,这种斯大林化已经破坏了传统的图瓦社会的主要支柱:即部落领主制,游牧式的畜牧业生活和喇嘛教。阿拉塔卢写道:“1932—1938年在图瓦发生的一切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看做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Alatalu,1992,第885—886页)首先,1932年5月俄罗斯人的自治劳动殖民地(RSTK)被取消了,随后把当地的俄国人,尽管他们没有公民权,并入到图瓦的合法体系中。当然,他们可以通过公民委员会来代表他们,并被允许在苏维埃式教学大纲基础上继续他们的教育体系。这些看起来不会引起太多问题,而实际上,特别是从当时剧烈的集体化观点来看,仍然存在着不少来自俄国的对建立更大的当地自治机构的支持。当时苏维埃俄国的许多其他部分都受到集体化的影响。

其次,图瓦人民革命党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转变,开始把图瓦看做是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要求共产党服从政府而不是相反。第三,在1933—1934年间,图瓦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阿克莎(the aksha),并和俄国货币一起流通使用。第四,政府于1935年从俄国人手里收回了当地的金矿。最后,政府开始提倡文化复兴。导致一些寺庙的重新开放和对喇嘛的培养。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图瓦国家剧院。

但是无论图瓦在30年代初、中期取得了多少政治上的胜利,到了1937年,一切重又退回原处。苏联秘密警察对人民革命党进行反击。到1944年10月11日,图瓦正式成为苏联的一员。如同在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一样,合并是以最高苏维埃对加盟申请的批准这样一个形式出现的。因此,“批准”文件,即《关于接受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的法律文本,声称这一合并是图瓦人民依照自己的权利在自决基础上做出的:

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考虑到图瓦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小呼拉尔加入苏联的请求,决定如下:为满足图瓦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小呼拉尔的请求,兹接受图瓦人民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员(引自鲁本1975,第

146 页)。

到此为止,上述的总体性追溯主要介绍涉及近期族群紧张关系的背景知识,而二战以后的图瓦共和国历史则可用“俄国移民涌入图瓦”来作为概括。总的来说,共出现了三次大的移民高潮。战前的那一次主要包括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国际主义者。而战后的第一次移民高潮带来的却是劳动力大队(*komsomolski stroiki*)、罪犯、教师和技术工人。最后一次移民潮主要由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为推进地区发展计划而到来的技术工人组成。然而,除了在农业和采掘业方面的一些初步发展以及在教育基本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之外,图瓦仍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大规模建设西伯利亚的投资规划中的一个边缘目标。路途遥远,人口稀少,缺乏战略性矿产资源且交通不畅,这些,使得图瓦对增强苏维埃的经济实力所作的贡献甚少。

Perestroika 和后苏维埃时期的发展

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一样,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动荡的重建时期,图瓦经历了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以及目的在于排斥居住在领土内的俄罗斯人的犯罪和暴力的增加。如果说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居民在苏维埃统治时期所受压抑的挫折感的反应,那么对于能否把在 1990 年夏季达到高峰的年轻团伙反俄罗斯人的暴力行为归于民族主义的复兴,则不是十分清楚。

事实在于,民族意识的复兴和族群对抗的升级首先是在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发展起来的。由于苏维埃时期这一地区的俄罗斯化来得很迟,而且从来就不很深入,因此在向莫斯科争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时,俄罗斯居民和图瓦本地人的利益很少能够统一在一起。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在族群关系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首先,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大多是战后迁来的,因此并未很深入地扎根于当地文化之中,他们即使再迁走,也不会失去多少。其次,考虑到民族主义的进程主要由非俄罗斯的民族阵营所领导,因此,很少有俄罗斯人愿意赞成成立独立的图瓦共和国。与鞑靼斯坦共和国——它要求经济上更大自主权的呼声得到了部分俄罗斯裔居民的支持,并希望借此担负较低的联邦税并分享更大份额的当地财富——不同,图瓦境内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派饱尝被排挤之苦,很少能对争取自治权的辩论过程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考虑到俄罗斯文化对这一地区相对较弱的影响,可以说民族主义的复兴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人所主导的苏

维埃化(sovietization)的反抗而不是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本身。在居民几乎清一色全是图瓦农民的共和国西部地区,图瓦语一直是母语,而俄语的使用远远落在其后。不像其他自治共和国,比如鞑靼斯坦(它在1552年遭伊凡雷帝入侵)或萨哈-雅库特地区(它在1632年成为俄国的殖民地)那样,图瓦从来没有过与俄国合并或遭俄国统治几个世纪的经历。由于历史上长期以来从未受东正教、沙皇官僚体制以及俄罗斯语言、文化和革命理想的深远影响,从而使得图瓦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关注苏维埃时期的经济方面的不公平,也就是说,着眼于当时的农牧业的集体化进程,以及政治上、文化上的压制所造成的对民族传统的破坏。

族群关系的当前状况

苏维埃时期遗留下来的使目前族群关系日益恶化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俄罗斯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不断增多的特权,而开发自然资源得到的财富,图瓦人却只能分配到其中较小的份额。其他问题仅仅是由于不发达和农村青年的异化所带来的。最后,农村人口中较高的生育率——主要归功于医疗保健的提高——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失业问题,同时也增加了向城市的移民,从而造成社会紧张的加剧和首都克孜勒地区的住房紧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近年来相当程度的犯罪、青年帮伙、酗酒以及吸毒现象的增多。

媒体

上述所列现象本身都很成问题,然而合在一起它们却促成了一些人所谓的反俄罗斯情绪的高涨。然而,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和我本人的观察,新闻媒体应对造成这种趋势负相当的责任。因此,在使用“反俄罗斯”这个术语时需要小心谨慎。它已经成为莫斯科媒体和其他保守的俄罗斯势力所最喜欢用的术语。他们把任何一个非俄罗斯的(non-Russian)民族主义复兴都看成是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威胁。当地人和俄罗斯人在浴池里的一次争吵这样一个孤立的事件,可以很容易地被夸张成为民族冲突,或反俄罗斯情绪,或者是狂热的以驱逐俄罗斯人为目标的民族复兴势力之威胁的征兆。这种媒介导向的歪曲很显然忽略了数目众多的发生在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年轻图瓦人之间的争斗,以及图瓦人和俄罗斯人和平相处的事实。这样说并不是要低估图瓦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确实是遵纪守法的)的不满情绪,但是媒介所散布的恐怖言论确实营造了一种不安全的气氛,并鼓动了俄罗斯人的外迁。

大约 4 年前引起图瓦全国上下注意的一个突发事件就是直接由这样的争吵引发的。1990 年 5 月中旬在一个名叫柯乌—阿克西 (Khovu-Aksy) 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俄罗斯人“公众秩序自愿者”组织和图瓦青年们之间的那场冲突引发了大帮图瓦青年的一次小规模闹事，他们破坏财物，威吓当地居民，并同警察发生纠纷。冲突很快蔓延到其他俄罗斯人和图瓦人混住的小镇，如伊林卡 (Il'yinka) 和埃勒盖斯特 (Elegest)。不少俄罗斯人的房子被烧，孤身俄罗斯人被打伤。来自俄国内务部的特种部队开始派驻图瓦，从而使全国的媒体把相当的注意力转向这场冲突。这些冲突以及其他看得到的威胁和紧张气氛的后果，造成了 1990 年头六个月内大约 3000 名俄罗斯裔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工程师、教师和医生——的离去，而且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这种外流现象愈加明显。尽管大多数的莫斯科媒体和那些西方观察家们倾向于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反俄罗斯情绪的高涨 (萨基娜 1990；希希 1990)，阿拉塔卢却指出对事件的报道存在严重的失实。他引取俄国最主要的日报《消息报》(Izvestia) 1990 年 7 月 4 日的一则报道来作为例子。该报导报道说近几个月来有 88 名俄罗斯人在图瓦被害。然而到 9 月份，另一份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ya Rossiya) 却证实，在所有 88 人的数字中，60 个被害者是遭图瓦人杀害的图瓦人，而其中只有 7 人是俄罗斯人 (阿拉塔卢 1990，第 890 页)。这些歪曲，无论是否有意，很显然已经给族群关系营造了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并促使许多俄罗斯人逃离图瓦。

总而言之，媒体在 1990 年春夏时节对这场突发事件的报道提醒我们，改善族群紧张关系的努力不仅要关注那些作为讨论框架的实质性的法律和政治问题，而且也要关注该地区内外民众对冲突的普遍看法。各主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对冲突本身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比如，媒体对当地政府对冲突所持的过分消极的反应的指责 (萨基娜 1990) 可能促使政府当局承诺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尽管自闹事发生之时和后来，当局一直坚持认为紧张的真实根源不是来自民族间的对抗关系，而是由于青少年越轨和失业的缘故，图瓦总统谢里希—奥拉·奥尔扎克 (Sherig-oola Oorzhak) 还是在 1992 年 6 月任命了一个族群关系和国内事务顾问，来制订一个缓和俄罗斯人与图瓦人关系的方案。

政府的民族政策

由于图瓦政府坚信族群关系的紧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外界媒体的煽风点火，因此他们在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政策上面临重重困难。他们感到，

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依赖于其他因素,比如农村地区的不发达,糟糕的教育体系,酗酒,以及社会不发达所带来的其他副产品。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承认,问题部分地与图瓦民族主义者有关,他们在这个时候不切实际地要求独立,加剧了族群关系的紧张。

考虑到潜在的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可能增加族群摩擦,就像1992年3月在鞑靼斯坦所发生的那样,一些人开始关心设立负责民族事务的总统顾问机构,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巴拉迪诺维奇·巴嘎依—包尔(Vladimir Baradinovich Bagai-ool)和他的工作小组。然而,尽管这个办公室以严正的态度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们仍远未能制定出一个处理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关于稳固族群关系的建议往往十分笼统。在巴嘎依—乌尔的办公室为奥尔扎克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莫雷洛夫1992),他们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1. 增加总统族群关系和国内事务顾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2. 制订加强族群关系的实质性框架。
3. 准备以调查为基础的各类报告,宣扬人道主义价值观保卫民族利益这样一种观点。
4. 寻求关于政治斗争不脱离人权和宪法、法律规范的框架的保证。
5. 邀请包括联合国及俄国组织的代表在内的观察员来监督图瓦境内的自治进程。

很显然,第一项建议是最为关键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政府关于民族关系的政策最近掌握在巴嘎依—乌尔先生——一个从前在首都的克孜勒教育学院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教师——的手上。他起先是市议会的议员,1992年夏初受命担任现职。现年四十五六岁的巴嘎依—乌尔在莫斯科接受他的教育,能够读、说德文。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关于民族传统和青年教育方面的。最近,他增添了一名助手,N.莫雷洛夫(N. Mollerov),一个在伊尔库茨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俄罗斯裔历史学家。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办公室提供研究报告和撰写政策文件。要增加总统顾问办公室除人力资源之外的其他可动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易事。由于在前苏联体制内从来就没有关于族群关系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因为隐含的假设认为不存在民族矛盾——因此,在克孜勒找不到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在当地科学院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内,目前仅有-名社会学家在用较基础的分析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唯一令人振奋的可能会带来更多好处的一个办法,就是与被同样问题困扰的相邻的自治共和国交换各自的看法和解决方案。图瓦已经和邻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一起加入了-项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总统顾问和有关部长之间的互访,共同讨论解决他们一致

面临的民族问题的各项提案。就在作者离开图瓦之前,巴嘎依一乌尔前往乌兰—乌德(Ulan-Ude),作了一次类似的访问。

然而,对图瓦政府来说,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关于宪法的争论,和它在联邦内部与俄罗斯的关系相比,族群关系问题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此外,图瓦政府还试图重新划分政区,来重建自己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因为在1992年9月,地方政府的令人困惑的平行的双重结构导致了决策过程和改革计划实施的复杂性。问题出在选举产生的当地官员和总统任命的官员共同享有地区和村级市政委员会的权力。这个问题,在奥尔扎克总统仿效叶利钦任命一套由忠诚的、具有改革意识的行政官员组成的行政网络来制衡阴魂不散的党的机器时,显得更为突出。在我访问的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村子里,一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担任当地共产党委员会领导职务的老年妇女仍然掌握权力。地区市政会(*regional council-Raisoviet*),也是在一个前共产党员色雷达尔(Seredar)领导之下。弗拉基米尔村就是在这个设立于Sarykhsen的市议会的管辖之内。色雷达尔在1989—1990年的变动迫使他下台之前是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一年后,人民要他重返政坛。这就是他所讲述的故事。

无论对外界还是对莫斯科来说,前共产党官员在行政机构中依然存在这一事实,被看做是政治倒退的标志。实际上,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中,这些领导人受到人民的合法支持和拥戴。同样,在农村地区很少发生把共产党员列入黑名单这样的事,或发生针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当地共产党领导者依旧掌权,只因为他们是当地人民最信赖的人。但是这些保守的领导人对改革和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急剧变化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尽管这种变革现在已经席卷了俄国其他各地,并以较温和的规模向克孜勒市袭来。同样很清楚的是,在两个平行的决策体制得到统一控制之前,不能指望发起什么有效的改革行动。

由于关于独立的争论已经减少,而且这种争论也比其他自治共和国如鞑靼斯坦、萨哈—雅库特、切克尼亞或阿巴哈茲亞来得温和并不彻底。可想而知,图瓦的族群紧张关系将一直存在下去。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因素对潜在的族群冲突以及人们对它的看法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解为如下几类:和蒙古的关系、佛教(复兴)、酒类消费和青年问题,以及经济和民族主义运动。

来自蒙古的影响

当我和克孜勒的一些知识分子交谈时,在图瓦与蒙古的共同文化特征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反映出图瓦人对他们的民族背景所持的复

杂态度。除了共同的脸部特征和共享的历史,以及相似的传统式游牧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西部)之外,对图瓦的民族精英来说,蒙古还为他们提供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德国旅行家奥托·马恩黑·海尔文(Otto Maenchen-Helfen)在他的《图瓦行记》(Reise in Asiatische Tuva)一书中也提到了图瓦和蒙古共同的文化传承(heritage):

人们会说,图瓦人向他们的邻居蒙古人表达友谊是十分自然的,两者在文化上是紧密相连的。几个世纪以来,图瓦就是蒙古的领土;图瓦人从未想过从蒙古分离出来。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宗教,相同类型的经济。图瓦的官方语言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蒙古语。因此,当外国的统治(一开始是中国,然后是沙皇俄国)崩溃之后,图瓦人把自己看作蒙古的一部分以及蒙古人把图瓦当作他们的一个省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931,第18页)。

蒙古所提供的共同的文化遗产以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替代物,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中具有隐含的政治意味。1920年代中期,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唐代(Donduk)就用如下谦卑的话语表达了这种关系:“图瓦人民在文化方面是弱小的、不发达的和落后的。这就是它为什么必须和蒙古联合起来的原因。”(引自 Kolarz, 1954, 第164页)图瓦在独立后迅速倒向蒙古这一事实曾引起了俄国国内极大的关注,并施加外交压力来阻挠这一靠拢。然而七十年以后,图瓦对它的南部邻国变得越来越势利。由于图瓦所经历的现代化程度(尽管既粗糙规模又小)要比蒙古(尤其是在两国接壤的西部蒙古)高,因此,一些图瓦人开始更倾向于和他们的发展程度较高并同是突厥后裔的中亚同族结盟。他们认为蒙古是一个比他们还穷得多的国家,因此,应该是蒙古向他们学习而不是相反。此外,两国在南部边境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图瓦人同时还指责蒙古人越过边境购物,把村庄商店里的稀缺商品抢购一空,并且偷走牛群、干草和劈柴。

尽管存在这些矛盾,蒙古仍然是图瓦在寻求独立的进程中可以借用的、用以抵制俄国影响的力量来源。在给俄国政府民族委员会主席瓦雷里·铁斯科夫(Valerii Tishkov)的一份正式照会中,图瓦副总统梅尔尼科夫(Meil'nikov)强调,在蒙古境内设立一个领事馆这一事宜,需要俄国外交部的合作和支持。尽管莫斯科对类似迹象并不看重,图瓦仍然继续发展和蒙古的关系。高级代表团被派往乌兰巴托,正式协议接连不断地签署,小规模的经济合作也开始启动。尽管相对于俄国,蒙古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哥”,但种族—文化的相似性不容忽视,因此,图瓦将会进一步发展同蒙古的联系,虽然只是保持在一种谨慎和适中

的程度上。

对蒙古来说,它并不特别愿意在图瓦独立问题上和俄国发生摩擦。蒙古外交家建议图瓦不要将他们的外交政策放在非常优先的地位上。由于蒙古既贫穷又孤立,而且在历史上一直夹在中国和俄国之间,因此他们甚至并不热衷于对图瓦的独立地位作出象征性的认同姿态。它承认图瓦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因而无意涉足。然而,蒙古却追求同相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保持更为积极的关系,因为它比图瓦具有更多的蒙古血统,且和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有着更好的交通和通讯联系。

佛教的复兴

尽管对俄国经济依赖的现实使图瓦的完全独立只能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前景,然而国家支持的佛教的复兴仍然可被视作新的国家意识的一种清晰表示。

然而看起来,尽管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宗教意识的苏醒至今仍然还停留在无足轻重的文化生活的领域。事实上,在苏维埃时期多年来无神论统治和宗教压制下,大众关于佛教的记忆变得如此微弱,以至于它的复兴不得不先由科学院和佛教协会来发动一场跳跃式的提高。当地佛教协会从1990年开始出版喇嘛教文献,1991年出版了自己的宗教杂志《埃勒格》(Erege,意为《玫瑰经》)。当公众的兴趣看来更多地受时尚(fasion)而不是信仰(faith)的影响时,政府对佛教复兴就持有一种很实际的兴趣,即希望佛教所信奉的纪律和禁欲主义能够帮助共和国的年轻人从犯罪、酗酒和吸毒的泥潭中拔出来。

与那些被认为是由中亚伊斯兰复兴主义所引起的族群紧张关系不同,图瓦的佛教复兴并没有发展到排斥当地俄罗斯人那样的程度。这一方面归因于佛教复兴的温和与适度,另一方面在于佛教的宗教本质,它缺乏类似伊斯兰教的那种福音式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莫斯科人发现伊斯兰教是如此地咄咄逼人。事实上,与其他非俄罗斯共和国——在那里,传统宗教的复兴至少在莫斯科眼里是被视作对当地俄罗斯人的威胁,比如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不同,大多数在图瓦的俄罗斯人不是对佛教漠不关心,就是对它的复兴只表示轻微的不安。

酗酒、青少年越轨和犯罪

酗酒和吸毒与种族暴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直接相关但却十分重要。尽

管对不同种族的酒精消费量以及酗酒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笼统一些,酗酒和社会分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许多的研究文献,却很少有什么研究来深入地测定群体性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行为在挑起针对特定族群的歧视性暴力活动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喝着香蕉啤酒的卢旺达胡图族人挥舞宽刃刀的狂热以及嚼卡特(qat,一种致幻毒品)的索马里民兵的尚武倾向可以作为例证。在这两个例子中,毒品成了把对特定族群的怨恨转化成暴力行为甚至大屠杀的中介。在图瓦青年——他们一般被看做是由种族原因引发的暴力行为和大肆破坏公物行为的肇事者——并非如此极端的例子中,谷物制成的高度烧酒的随处可获和父母管教的缺乏,使他们敢于把目标对准那些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他们痛苦的人,在这个例子中,即俄罗斯人。对壮胆或其他心理学因素的过分强调,仅仅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它们只不过是其他更为根本的深刻原因的表面现象而已。无聊、低的受教育水平和琐屑的工作驱使他们酗酒并继而威吓俄罗斯人,但是这些动因只不过是贫困,或照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经济恶果所引致的表面症状而已。

图瓦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国内酗酒问题的严重性。克孜勒市市长,医生佐亚·撒特(Zoya Sut)认为由于酗酒,图瓦民族的基因密码已经无可挽救地被破坏掉了。奥尔扎克总统更进一步大声疾呼,认为如果不能在接下来的三十至四十年里找到根治这一社会灾难的良药,图瓦作为一个民族将面临灭亡的境地(Autufyeva and Moskalenko, 1992)。虽说很难判断上述言论准确与否,常规的酒精消费量确实对图瓦的低社会(人文)发展水平和高居俄联邦首位的婴儿死亡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Demin, 1992)。事实上,简陋荒凉的自然条件、酷寒、陈旧的家居,以及酒吧、咖啡厅或任何一种有意义的闲暇设施的缺乏,共同形成了一种环境氛围,这种氛围驱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饮酒过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必须放在整个俄罗斯社会走势的背景中来看。自从苏联解体以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反酗酒运动的积极成果再也没能持续下去。到1992年,俄境内的人均酒精消费量达到并且超过了1984年的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醉态下的犯案率从1986年的24.3%增至1992年的39.9%(Nemtsov 1993)。此外,青少年死亡率以极快的速度递增,这直接导源于酗酒和吸毒。不但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整个俄罗斯的酒类消费模式是不正常的,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高消费量和低质量酒类与营养不良的同时并存,这种并存使俄国比那些仅有高酒精消费量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存在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种情况在图瓦和其他西伯利亚的共和国如雅库特共和国尤其严重,它们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喝酒者不但年

轻,而且酒量极大。

至于大帮醉醺醺的年轻地痞流氓的出现,可用许多因素来解释。但最主要的,它是那种旨在在设施极差的寄宿学校里重新安置和抚养牧区牧民们的孩子这样一种国家政策的副产品。那些孩子,从小就离开家庭和传统的社区来到职业学校,以后又逐步被吸引到首都克孜勒这个人满为患的几乎没有正常娱乐活动的城市。这帮成天喝醉了的、既缺乏教养又目无法纪的年轻人在克孜勒市内到处惹是生非。他们平日聚集在城里可数的几家饭店的餐厅里,这些地方由于他们惹事的缘故已经很少有人光顾了。经常有警察和穿黑制服的 OMON (内务部军队)在这些饭店巡逻。这些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军人在受到挑逗时会变得很好斗,这反过来又只能给这帮年轻人中的反俄情绪升温。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图瓦居民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些青年人的威胁。尽管这些年轻人更喜欢把俄罗斯人当作虐待对象,但是在挑选侵害目标方面,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偏好。正因为如此,关于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痛揍当地俄罗斯居民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误导的。这些青年人并无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图瓦人和俄罗斯人都一样地要威胁挑衅。正如跟我谈话的一个当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所有那些认为俄罗斯人是由于好斗的激进分子的缘故而离开的说法都不符合事实。许多图瓦人也一样愿意离开,但他们并没有机缘。俄罗斯人可以去投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图瓦北面的一个俄国城市)或其他地方的亲戚,但我们却无处可去。

从首都普通商店的货架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且极易获取的酒类是“斯伯尔特”(spirit,意思是“喷涌而出”)或者叫玉米酒。要么,人们还可发现伏特加和干邑白兰地(cognac),但是其他种类的酒就很少见了。因此,几乎不可能有适度的社会性饮酒的存在。斯伯尔特酒烈性极强,饮后容易产生幻觉,并导致发生无责任的行为。图瓦人喝这种酒跟喝伏特加一样,喝的量又多,又往往不要下酒菜,尽管在家里喝时有时会吃点东西。斯伯尔特酒的大量供应和其他低度酒如啤酒、红酒的稀缺合在一起成为青少年酗酒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看来把反酗酒运动的中心放在法律强化上而不是放在减少酒的消费量或者引入一个购酒的年龄限制上。在形成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供应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酒类只能由有执照的分销商经销,而不是在报亭里,或从市场的卡车后座上就可以买到)之前,这一类的细致的政策很难得到执行。尽管“烈性酒”的非法供应是整个俄罗斯都面临的问题,但在图瓦,它更是加剧

了早已很深的社会和经济病态，并使暴力、犯罪、精神折磨、高婴儿死亡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的恶性循环持续不断地运行下去。而这一切恰恰是图瓦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所无法承担的。

最终看来，我们很难判断图瓦境内的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是否对族群紧张关系产生作用。但十分清楚的是，这个问题在十分广泛的范围内严重影响了图瓦人的生活。更何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重又提出了那些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论断，即酒是俄国殖民统治者为了征服当地人民而引入的。对于这个论断的支持者——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人——来说，这产生了对当地俄罗斯居民的厌恶。然而，无论这个论断在过去的岁月里可能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是在图瓦人自我统治的时代里它很难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很显然，共和国仍然大大地依赖俄国的援助，并且有理由认为这些援助——包括对开采矿产资源的投资和制成消费品的供应——的结构是受俄国人的利益来支配的，但是把(酗酒的)责任推在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长期后果上显然是对问题的回避。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所遇到的挫折，可能最清楚地反映在它转而对用佛教来复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并约束这个国家的青年所抱有的这一含糊不清的期望中。

经济和族群关系

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和民族团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传统思路所特别关注的课题。一般所称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ies*)，大多数都关心援助国的经济兴趣和接受国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所作出的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很少有什么能被应用于非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中的俄罗斯居民这种情况。这部分是由于传统的殖民地中仅有一小撮宗主国出身的领导精英，他们在殖民地的管理体系崩溃之后，可以从容地返回他们的祖国。

对在图瓦的俄罗斯人来说，许多人是在18、19世纪以商人、农民和遭迫害的“信者”(*Old Believers*)信徒的身份，以及在赫鲁晓夫时期为开发西伯利亚而发起的“东进运动”(*eastwardho*)中作为矿工和建筑工人迁来图瓦的，因此图瓦是他们的第二家园。尽管有人会把他们叫做殖民者，但这些俄罗斯人实际上是为了寻求新的经济机遇而离乡背井的中下阶级的移民。图瓦对俄国的经济依赖如何影响图瓦人对当地俄罗斯人的态度，很难用科学的确定性来估算。然而，至少可以作如下的两个总结。

首先,在图瓦对俄国的财政依赖和它在民族主义政治原则上寻求更大的独立权的努力之间,看来存在一种动态的关系(dynamic link)。停止援助或能源和日用消费品的运送这一类经济讹诈的威胁,成了莫斯科在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用来确保各地区俄罗斯少数派利益的杀手锏。这种制约手段——它建立在俄罗斯为图瓦提供93%财政预算的资助这一简单事实之上——由此便对图瓦政府近期来在民族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要求面前采取一种温和立场的态度起着重要作用。结果,在类似语言法、公民权和根据不同民族背景制定的财产权这些事项上,没有引起像在波罗的海国家所发生的那种矛盾和冲突。政府没有颁布反俄罗斯人的歧视性立法这样一种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使它有权选择这样做。因此,尽管一些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立场感到不耐烦,这种做法仍然是近期条件下最审慎和实用的选择。

的确,政府希望大幅度削减令它极不舒服的对俄罗斯的严重的财政依赖,但却不能仅靠拒绝援助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这样将给共和国的经济造成灾难。事实上,他们更愿意劝说俄国逐步地重构援助的结构以增强当地的工业基础。本地工业主要是指对图瓦多年来一直以粗加工形式提供的皮革和羊毛产品进行精炼加工并缝制成品。规模最大的钴矿,也是图瓦少有的几个工矿企业之一,图瓦钴业公司(Tuvakobalt)仍旧控制在俄国人手中,但是早在1990年就由于俄罗斯技术工人的大批离去而使产量逐步下降。这种情况再加上来自环境方面的考虑,同样影响了位于阿克—德乌拉(Ak-Dovurak)的石棉选炼厂的产量。尽管图瓦政府提供了一些合作意向来鼓励俄国投资,总统也为减轻对俄国的财政依赖设定了即使不是不现实的也是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大多数分析家仍然对图瓦为走自己的路而愿意做出必要牺牲这样一种政治愿望持怀疑态度。正如安图夫耶娃和莫斯卡连科(Antufyeva and Moskalenko, 1992)用稍带讥讽的口吻写道:

尽管俄国希望通过准许图瓦拥有自己的出口权来削减(对图瓦的)援助,每一个图瓦人,无论他是俄联邦的忠实公民,还是独立的热情拥护者,都喜欢这种由俄国负担的生活(life at Russia's expense)。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围绕图瓦独立问题的讨论都仅仅是空谈的原因所在。

经济和族群关系之间的第二种联系是俄罗斯裔技术工人的外迁,这在前面已经提及了。就像在波罗的海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俄罗斯人的离去,再没有比“真是一大解脱”(good riddance)这种心态更能描述图瓦人的感受。但是尽管暗地里存在不少对俄罗斯人的流行的怨恨,政府还是承认俄罗斯人的离去

已经对采掘业、社会服务业如医疗和教育,以及其他大量雇佣俄罗斯人的行业造成了不利影响。正如巴嘎依—乌尔(Bagai-Ool,1992)在议会报纸《Sodeistvie》采访他时所表露的:

族群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将强化俄罗斯人从共和国外流的趋势,而这是我们的经济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因此,总统和他的顾问班子将以不在(族群关系)这个问题上挑起争端这种原则来展开工作。

如上所提到的,巴嘎依—乌尔和其他政府官员感到俄罗斯的大众媒介应对鼓动俄罗斯人的离去负一部分责任。他们认为,报纸仅仅强调了族群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尤其对激进派图瓦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估计过高。然而,尽管政府希望留住俄罗斯人,它同时也希望能发展用于训练自己当地的专家骨干所需的各类设施。除了努力争取重构经济援助的结构之外,图瓦政府最近还向莫斯科请求帮助,以支持他们关于建立新的科学中心和其他培训设施的项目。

俄罗斯人外迁对图瓦经济中的城市就业部分造成的冲击最为明显。在我对卡—凯米斯基(Kaa-Khemiskii)农业区俄图杂居的村庄的访问中发现,尽管俄罗斯人的离开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但它只对主要由畜牧业、渔业、小农场构成并由克孜勒提供制成品的当地经济产生极微小的影响。然而,当地的某位村长仍然认为俄罗斯人的离去是很不幸的事,因为它使得本来就由于年轻人都去了城市而劳动力不足的村子人口更加稀少了。村长还否认俄罗斯人的离开和民族关系紧张有关,她认为迁出的主要是一些夫妇,在他们的孩子离家去工作之后,或去北方(指俄国其他地区)的大学上学之后,他们才迁走的。据作者自己的观察,俄罗斯人和图瓦人在杂居的农村地区看来一起生活、相处得十分和谐。这并不是把艰苦的条件理想化,而只不过是强调这两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贫穷而又偏远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大多数的公路路面没有铺上石子,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稀少,只能见到很少的几辆汽车,甚至也看不到什么20世纪后期生活的标志。图瓦人和俄罗斯人的生活相差无几。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俄罗斯人还可有机会在位于北方的经济稍微景气一点的俄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找到工作。正如一位名叫阿采—乌尔(Achai-Ool)的村长所说:“如果不是由于存在语言困难,许多图瓦人也会离开家乡。人们开始变得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引自Bogdanovsky 1990)

尽管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普通图瓦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准和当地俄罗斯居民相比相差无几,政府仍旧不愿意过快地对农业和不动产业实行私有化,主

要是害怕境外的俄罗斯人前来大批量地购置各种财产。到目前为止,国会和总统对是否引入那种现在在俄国欧洲部分已经很普遍的改革方案十分谨慎。比如,到1992年秋天,政府正在讨论的唯一真正的私有化进程,是允许出售用于建dachas(夏天用的小棚屋)的小块地皮。在国有农场,已经成立了由每两、三个村子组成的私营分场(private sub-units),允许拥有牲畜和农机具,只是土地仍然算是从国家租用的。相应的,私营农民比他们的集体农庄的同行们日子要好过一些。他们的主要不满集中在牲口数量的不足和得不到良好的用于放牧的草场上,而不是土地的归属权。然而,政府官员对于(老百姓加在他们头上的)办事拖沓和抗拒变革的指责还是很在乎。

实际上,有些人(比如巴嘎依-乌尔)试图推翻这种看法,认为必须坚持渐进的民族主义策略。这种方案坚决反对私人拥有土地,或在拥有土地之后进行交换这样一种违反图瓦的当地传统的做法。这种公共的、古老的传统现在可能已经削弱了,但仍旧为不赞同私有化的官员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亲民族主义的论据。由于俄罗斯人没有图瓦人的这种顾虑,他们自然更赞成土地和房产的私有化。

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离主义者

1992年夏天在当地进行的一次关于族群问题的调查中,55%的俄罗斯被访者把民族关系中最近出现的紧张归罪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national egoism),其余的俄罗斯人则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领导层的不负责任”和“人们的社会性不满”(阿那农丹1992)。在俄罗斯居民和较温和的政府官员眼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和“自由图瓦”党(Khostug Tuva)。“人民阵线”成立于1990年2月一次由258个图瓦人、31个俄罗斯人和6个布里亚特人参加的大会,其政治原则是实行文化革新和发动一场把图瓦由自治共和国(autonomous republic)提升到完整的加盟共和国(full-union republic)的战役。同雅库特和鞑靼斯坦这些自治共和国一样,图瓦试图获取它的新地位并能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获得分离权和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努力来得太迟了。当俄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几个加盟共和国从由它占主导地位的苏联中分离出去这个事实之后,它对剩下的自治共和国的控制,已经不出所料地加强了,以反对任何企图分裂的要求。尽管在所有自治共和国当中,图瓦拥有最高比率的本地人口,大多数国内外的分析家们还是认为图瓦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超出了它为分离而持的人口学理由。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图瓦”

也看到了这种困难。

“自由图瓦”成立于1992年4月，并于同年6月在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注册，成为正式的政党。它目前由斯拉瓦·索尔查克(Slava Solchak)领导，他同时还拥有半官方的职位，负责监督对新闻出版的审查。他的办公室位于中央报业大厦(Central Dom Pressy)。这个政党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捐款和基层的农村支持者(他们在农忙时不得不暂停活动)所交纳的党费。他们还得到了当地知识界成员的支持。尽管最初成立之时，“自由图瓦”的政治议程主要以使图瓦重返战前地位，参加国际社会，并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和国为重心目标，现在它已经修改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换之以更切实际的目标。它对举行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的企盼，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府的打击，因为政府不愿意支持这种在他们看来会激起民族关系紧张的行为。此外，索尔查克也被迫承认，即使全民公决投票通过赞成独立，图瓦也没有能力去实行决议(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由此，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把更大程度的经济自主当作政治独立的先决条件。政府认为这是“自由图瓦”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仍然不够。正如巴嘎依—乌尔(Bagai-Ool)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

起先他们想要政治独立，然后才是经济独立。现在他们把它调了个位置，这就对了。我们也认为必须先从经济独立开始。问题在于，“自由图瓦”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经济纲领。

在我对索尔查克的采访中，他承认他的党没有经济纲领，但他却更愿意列举“自由图瓦”的其他目标。在意识到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之后，索尔查克指出，目前的首要工作是提高图瓦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加强他们的政治意识。此外，必须发动一场针对腐败、新闻检查、犯罪和酗酒的积极的运动。他同意推迟讨论全民公决的问题，直到政治形势明朗为止。然而，他更坦率地认为需要一种更保守的改革政策，并且附和政府关于公开发售土地将导致俄罗斯人的进一步剥削这样一种担忧。

民族主义政党领导层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他们聪颖、目标明确，但在如何看待图瓦目前所处的经济现实上有点幼稚。他们显然希望，一旦图瓦把它对俄国的财政依赖削减到一半，则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将得到加强并广泛流传开来。然而，到目前为止，民族主义政党的主要角色是批评政府在莫斯科面前所持的温和顺从的立场，并把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复兴政治化。他们的政治基础并非十分广阔，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有可能已被外界分析家们夸大了(例如，希希1990)。

结 论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以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还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分离”看来并非是图瓦可以选择的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即使单方面宣布独立,正如在北高加索的车臣(Chechniya)共和国所发生的那样,不但不会有什实质效果,还会招来俄罗斯保守主义者的大怒。结果将是俄罗斯大幅度削减它的早已大大超支的财政援助。图瓦既没有石油资源和丰富的农产品,也没有那些到目前为止尽力使杜达耶夫(Dudaev)和车臣免于负债的有美元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在财政上支持杜达耶夫)。此外,图瓦还既没有稀有金属,也没有萨哈—雅库特地区和鞑靼斯坦那样的工业基础。相对来说,图瓦并不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什么,并且,由于它和蒙古如此相似的自然条件,使许多外国投资者宁愿看重一个独立国家所带来的安全感,也不愿冒风险在一个连合法的司法权都尚不清楚的自治共和国里投资。最后,即使有人提出发展上叶尼塞河盆地生态旅游的可能性,也由于目前饭店宾馆和交通设施的严重缺乏,而使旅游项目仅仅局限在低花销的远足和假日的骑马郊游上。在这种不如意的条件下,对分离主义者来说,要想消除掉政府目前所持的实用主义政策的影响,并且还要努力证明更激进地追求完全独立和国家主权是有理由的,将是一场相当艰巨的挑战。

同时,很显然图瓦将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且将特别向鞑靼斯坦和萨哈—雅库特寻求各种发展模式和如何与俄国进行权力转让;磋商的讨价还价战略。1994年2月俄国和鞑靼斯坦签署的双边条约被看做是(俄罗斯)和其他自治共和国协商达成一个合适的联邦协议的有用先例而受到了双方温和派的欢迎。车臣将很有可能是第二个这样做的自治共和国。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巴什柯图斯坦(Bashkortostan)、图瓦、萨哈—雅库特,可能还有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尽管对这些协议是否符合宪法仍然有争议——最为根本的就是,如果俄罗斯不承认这些自治共和国的独立,它为什么还要同它们签订双边协议呢——这些协议在处理核心的经济问题,比如矿产资源的出口配额、税收的提留以及联邦援助的分配方面却十分有用。另一方面,各自治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分子距离他们的最终目标,即完全独立和得到国际法的认可,还存在很长一段距离。尤其对于像萨哈—雅库特和鞑靼斯坦那样并没有广阔领土的共和国来说,这种雄心壮志看来日益不现实了。更何况,各自治共和国内要求独立的呼声的垄断地位已经受到了俄联邦内部各地区明确要求更大程度的“非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等各种附加的呼声的冲击。这种争论,现在已经扩大

并包容了更大范围内的关于俄联邦构架内各地区的问题,有发展到淹没或淡化各自治共和国更受民族主义引导的独立要求的势头。

在这一阶段,图瓦有实力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首先是在地理和人口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在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几乎清一色的图瓦居民和新型民族自我意识的存在,使它具有一个闹分离的共和国所应该具有的某些特征。然而,既没有大批散居国外的侨民提供财政援助,也没有一个地区性资助国提供资金——比如,芬兰资助爱沙尼亚,土耳其资助中亚国家即为两个例子——在最近几年里,图瓦不可能过于咄咄逼人地强调它的独立要求。此外,叶利钦总统于1994年5月任命尼古拉·叶果洛夫(Nikolai Yegorov),一个哥萨克人,接替民主派改革人士塞尔格·萨哈拉(Sergei Shakhrai)出任关键的民族部长一职,预示了俄政府对基于民族主义的分裂活动不再容忍。总体来说,苏联解体后不久出现的那种流行认为新的国徽、国歌和货币将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创造出独立气氛的说法,已经在经济现实面前失去了它的诱惑力。这并不是暗示说,新的以联邦协议为基础的统一阶段仅仅是莫斯科重建统治并恢复中央控制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同样重要的是各自治共和国在发展为保持民族—文化特色而进行的长期游说,以及在联邦框架内争取对自然资源的公正管辖权这样一些事情上进行合作。然而,如果各自治共和国在它们艰难地追求扎根在神话般的单一种族的过去之中的争取独立的道路上发生分裂的话,这一切将不可能实现。

参 考 文 献

ALATALU, TOOMAS 1992 "Tuva: a State Reawakens",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5, pp. 881—895.

ANAIDAN, ZOE 1992 Unpublished surveys on ethnic attitudes, Kyzyl: Kyzyl Institute for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TUFYEEVA, N. and MOSKALENKO, N. 1992 "The Tuva Republic: Political Calm", *Eurasian Conflict Monitor* (pilot study 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Alert, London by Panorama Information Group, Moscow).

BAGAI-OOL, V. B. 1992 "Situatsiya Trevogi ne Vyzyvaet", *Sodeistvie*, no. 13 (23) 1992, Kyzyl — Interview, 1 September 1992.

BOGDANOVSKIY, A. "Trevogi Tuvyi", *Izvestiya*, 3 July 1990.

DANILENKO, V. "Obostrilas' obstanovka v Tuve", *Izvestiya*, 3 August 1993, p. 2.

DEMIN, A. "Mladencheskaya smertnost' v Rossiskoi Federatsii za 10 mesiatsev 1992 goda", *Izvestiya*, 11 January 1992, p. 2.

"Ethnic data for Russia's autonomous units (from 1989 Census)",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26 June 1991.

FRITERS, GEORGE 1951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KOLARZ, WALTER 1954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Far East*, London: George Philip and Son.

MAENCHEN-HELPEN, OTTO 1931 *Reise ins asiatischen Tuva*, Berlin: Verlag der Bücher Kreis.

MOLLEROV, N. 1992 "Vyborochnye svedeniia kharakterizuiushchie vnutrpoliticheskuiu situatsiuiu v respublike Tuva", Internal document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sident's adviser for Interethnic and Domestic Affairs, August 1992.

NEMPTSOV, ALEXANDR "Piut mnogie v Rossii"? *Izvestiya*, 4 September 1993, p. 15.

RUPEN, ROBERT 1975 "The Absorption of Tuva", in *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T. T. Hammon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AKINA MARINA 1990 "Violence in Tuva", *New Times*, vol. 35, pp. 30—32.

SHEEHY, ANNE 1990 "Russians the Target of Interethnic Violence", *Radio Liberty Reports*, 14 September 1992.

(刘能译, 马或校)

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德国与荷兰 的制度化：一项比较研究^①

J. 多米尼克 (Jeroen Doomenrik)

引　　言

20世纪60年代早期，西欧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经济膨胀，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对劳工的需求。国家的劳工市场几乎全部就业，对于日益增长的对劳工需求，内部供给已难于满足。而招收外国劳工就成为应付此一问题的一条途径。因此与地中海沿岸的不发达国家便有了接触，并且数目迅速增长的劳工们（客居打工仔们）向北迁移。他们的居住曾被设想是暂时的：这段时间足够让移民积攒下返家后进行投资的费用，而且这段时间又足够让移民所工作的企业确保有经济利润并有所发展。

地中海沿岸与这一劳工潮相关联的国家中，主要的一个是土耳其共和国。数以千计的土耳其男人们来到西北欧，先落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61年开始），稍后几年（从1963年开始）又去了荷兰。1973年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是这两个国家终止劳工移民涌人的原因。

虽说许多的土耳其人确实筹划着要积攒足够的钱回老家去，但另外有许多

• 本文原载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杂志 1995 年，总第 18 卷第 1 期，第 46—63 页。翻译并在本书中出版得到美国版权所有者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Services 的同意，谨此致谢。

① 本文是依据我以前所发表的博士论文 (Doomenrik, 1991) 而写作的。这里未再增加其他的参考文献，数据资料最初是在博士论文中发表的。经验材料主要是在阿姆斯特丹和西柏林的田野工作期间（1986—1990）的访谈和通过个人观察收集而得。有一小部分新增的材料是从荷兰的鹿特丹和乌得勒支两市以及德国的杜伊斯堡和科伦格奈两市收集而得。

人并不是这样。当越来越多的钱被返回的人投到家乡的小型企业,像商店、出租汽车或农场之后,其他的人再做同样的行当就几乎是无利可图了。土耳其国内的严重通货膨胀、失业以及政治上的不安定致使移民回国以后不可能再保有在海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准。要想风光地回到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就需要有多于一般人的资本积累,而这又使较长时间的海外打工和居留成为必须。同时,与石油危机相伴而出现的客居国日益增加的失业使身处异乡的打工仔倍感艰辛。这大大地削弱了存钱的梦想而增加了他们对客居的福利国家提供的利益的依赖。

对于许多土耳其男子来说,长期地离家在外,这处境足以成为他们把家眷接来团聚的理由(Van Amersfoort,1986)。家庭重新团圆这一过程进一步受到鼓励,还因为自1973年以后,家庭团聚实际上是少数几种合法移民到德国和荷兰的途径之一。事实上,还有德国政府决定缓解人们对于仍留在土耳其生活的移民劳工的孩子们的利益问题的抱怨,也导致家庭团聚的暂时增加(Herbert,1986,第230页)。这些孩子们进入到学校,进而成为东道国社会的一员,这也使得返家变得越发的复杂。现在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是,正是由于这一过程,许许多多暂住人口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永久性的移民(Muus和Penninx,1991)。

1992年在德国的土耳其公民的人数接近1780000人(占总人口的2.3%)^①,在荷兰的人数是214000人(占1.4%)^②。虽然说数量上的差别是显著的,但是土耳其人在荷兰和德国的移民及其转化过程颇为相似。在这两个国家中,土耳其移民都主要集中在城市,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技术训练,且身处社会的底层,他们都共同信奉同样的宗教即伊斯兰教。

所有的移民社区都希望让他们的共同文化能够制度化。制度的类型特别是它们所执行的功能,表示着移民、他们的祖国以及与现在的东道国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德国与在荷兰的土耳其社区有着许多的相似性,所以比较这些移民保存其文化并使之制度化的方式,是颇有意思的事。由于伊斯兰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文化共同特征,因而集中讨论伊斯兰教制度这一点就似乎是合情合

① 本文的数据是在德国分裂时期收集的。联邦共和国的新增加部分的土耳其人可忽略不计。

② 荷兰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劳工移民群体是摩洛哥人(大约有164000人或占1.1%)和一个很大的来自先前苏里南殖民地的社区(244000人或占1.6%)。在德国,外籍人口主要是土耳其人。第二大社区是由前南斯拉夫的劳工移民组成(近775000人)。

理的了^①。很显然,这里特别值得看一看这些制度化过程的差异在哪里^②。

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不能把在欧洲的土耳其伊斯兰人口看做是同质的,不同的宗教取向和政治取向赋予他们以不同的特点,而这又影响着伊斯兰机构所要满足的功能。

我们还会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文化上,他们的政治文化对移民、移民的机构及其信仰的政策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十分有趣的差异。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态度、期望和需求发生了改变。一般来说,发生了如下的改变:移民们渐渐失去了对于返回土耳其的未来生活的最初设想,转而寻求在新的环境中实现他们的期望。

一个高度动态的制度化过程便由以上这三个因素组成。

第一代移民和最初的制度

当对许多土耳其移民来说,不能回归故里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之后,他们的暂住变成了无限期的居留,这使他们不得不以此地为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虽说祈祷活动在一开始就对其制度化有一点促进作用(主要是在这些打工人居住的宿舍区),但是家庭团聚仍是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步骤。随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到来,修习宗教传统以及将其传给下一代人的需求便油然而生了。由于对大多数的土耳其劳工移民来说,伊斯兰教是传统的规范,是这些漂泊在外之人的习俗中的核心内容,因而最初的可兰经学校,很快就应运而生。这出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通常这些学校只有一个教室。然而,它们的存在对于潜在的要求进一步制度化的兴趣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最初的清真寺随之产生。它们通常是极为素朴的,辟一屋以作星期五的礼拜,冲清茶一杯以为娱乐尔我。这两种机构类型都要继续满足一个更大的欲求,且仅仅用了几年的工夫就把它们变成一个在荷兰和德国较大城市中许多老城区的共同特征。可兰经学校和清真寺常常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也有茶馆、图书馆和杂货店,它还开设课程、

^①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是逊尼教派的穆斯林,但到目前为止,逊尼派伊斯兰教却是在国外的土耳其人之间最共同的组织原则。我自己的统计结果(Doomernik, 1991, 第 116 页)显示,可以肯定地说,在荷兰至少有 50% 的土耳其男人定期地要去清真寺礼拜。德国这方面的资料还不清楚,但 Blaschke(1985, 第 295 页)引述柏林市区的一份调查表明,有 84% 的土耳其父母愿意他们的孩子接受伊斯兰教的教育。

^② “制度”(institution)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描述个体行动者的具有一定的持久和独立性的文化组织。制度化的过程就是这些组织开始存在的方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它们的特点发生改变的方式。

举办讲座以及组织节日庆祝等活动。

虽说,最初的伊斯兰的机构开始全都是由当地的土耳其伊斯兰社区所支持的,但好景不长,在制度化过程中,土耳其穆斯林中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初见端倪^①。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来自土耳其国内,这刺激了清真寺社区的瓦解分化,从而又导致清真寺的迅速增加。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在当地已明朗化,甚至,整个欧洲城市中的清真寺组织发现自己都是站在了这些对抗的某一端。十几年之后,这些联合的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强有力的联盟。它们反过来支持甚至开始了进一步创造各地的当地机构,以便保持或是扩展它们的影响(Van Amersfoort, Doornenik 和: De Klerk, 1989)。

土耳其的背景

伊斯兰教组织

为了领会这些伊斯兰教机构在土耳其移民社区中以及对土耳其政府的政治重要性,讨论一下现代土耳其的历史是有必要的。出于简便的目的,叙述中省去了大量的细节(要见详尽的历史,可参见 Toprak, 1981; 1989)。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兰教与这个国家完全是交织在一起的。雅塔图尔克(Atatürk)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一些小的中间步骤之后,到了1928年,伊斯兰教不再作为国教存在。自那时起,土耳其变成了一个现代的、世俗的国家。为着使伊斯兰教远离政治领域,雅塔图尔克建立了一个宗教事务委员会(现在的名称叫 Diyanet Isleri Baskanligi, 简称 Diyanet[迪雅尼特])。这一委员会过去和现在的任务都是要控制和垄断所有国内的宗教活动,自发的宗教社团受到禁止。

对这个世俗国家来说,政治与宗教上的对立依然保持着,但其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却是有限的。这种公众生活所采取的是一种多元的伊斯兰教形式(Landman, 1992, 第83页)。当大量的土耳其人去了西欧以后,这些组织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在西欧的国家里,国家对宗教的控制已不存在。在这儿,反“迪雅尼特”的教派就组织了起来,而且并不会受到来自土耳其政府那边的干预。

^① 我把“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这个词定义为那种返回到宗教渊源的原始意含的意愿。这是指未受到土耳其国家意识形态“污染”的那种伊斯兰教。

可以分辨出两种反对“迪雅尼特”霸权主义及土耳其国家的世俗原则的伊斯兰教派。它们是纯粹宗教(神秘的)组织和在政党意义上的反对派。以宗教为宗旨的组织对于国家政治无任何积极的兴趣。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与土耳其的世俗政治相容,但是他们主要是想做他们自己的事,布施宗教的仪式,而不受外界的干扰。在欧洲,“舒勒玛泽拉派”(Süleymançilar)就是这一类型反对派中最为著名的代表。

虽然,不允许伊斯兰教进入党派政治领域,但是众所周知,像米丽、塞拉门特(Milli Selamet)这样的政党[MSP](1980年军事政变之前)就是宗教取向的政党,它追求的目标是依据伊斯兰的法典萨伊拉(Sharia)来建立一个土耳其国家。它是众所周知的米丽格吕丝(Milli-Görüs)运动的政治武器。伊朗的伊斯兰教政变为这一政党的支持者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榜样,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好战的且更加具有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的组织:İslami Cemaatler ve Cemiyeller Birliği[ICCB]。与追求民主变革的MSP党相反,ICCB组织追求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家。有趣的是,这一政党是在德国的科伦格奈(Cologne),由一个先前的“迪雅尼特”官员组建起来的。所有其他形式反对“迪雅尼特”和世俗国家的派别都早已偷偷地在土耳其存在了,而ICCB组织则需要德国的安全氛围才能得以建立起来。这一组织寻求从德国把它的意识形态输入到土耳其去(Özcan,1989,第206页)。

政治性的制度化

由于运动支持者代表的是原教旨主义者或神秘性的伊斯兰教,他们具有强烈的宗教献身精神,因而在德国和荷兰出现那么多倾向于这些意识形态(至少是在领导层上^①)的伊斯兰教机构就不足为怪了。特别是在德国,舒勒玛泽拉派和米丽格吕丝的支配力是极强的。在荷兰,许多清真寺组织依随着迪雅尼特的某一支而建立。它们的领导者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世俗类型的伊斯兰教。在德国,这种伊斯兰教机构的类型从资料上看是不多见的,但我自己在荷兰的研究表明,这些机构是由已经决定要在荷兰无限期居住下去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使伊斯兰教成为一种能够增进他们自己的认同而又不减少他们在像荷兰这样的世俗社会的机遇的宗教。他们试图从土耳其国内的迪雅尼特那里获得支持。最开始,这个委员会对此表现得兴趣索然。仅在斋月

^① 对于一般的清真寺朝拜者的宗教政治意愿至今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的兴趣可能更多的是局限在他们的宗教义务上。

时有些联系,在斋月期间,派一些阿訇到德国和荷兰,为的是支持当地的组织。后来迪雅尼特介入得就更多了。

其他土耳其伊斯兰教组织认识到德国的土耳其社区代表的是一个能够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的极大资源。从支持者那儿能够募集到大量的钱,相对来说这又进一步助长了这些运动对它们的兴趣,这不仅在西欧是这样,土耳其也一样(Özcan, 1989, 第 197 页)。它们不仅想要提高它们在迪雅尼特面前的地位,而且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因此,清真寺的建立和维持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荷兰的情况也很有趣,但它的土耳其移民的数目仅是德国的十分之一。这可以由所有伊斯兰教组织在德国都有它们的总部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几乎所有组织都可以在科伦格奈找到),而在荷兰多少有点像一个省,很像德国一个州的大小。只有迪雅尼特有一个相对松散的网络。它在科隆有其西德的总部,另一个办公机构在西柏林而其荷兰的总部是在海牙。

仅仅是在最近,迪雅尼特委员会才似乎认识到对它的意志并不赞成的伊斯兰教机构的无限度地扩大,会对土耳其国家的稳定造成威胁。虽然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但直到 1985 年前后才开始对德国的宗教“市场”采取严厉的行动(它的科隆总部是在 1985 年 5 月建立的)(Özcan, 1989, 第 208 页)。而清真寺的发展早在此 5 到 10 年之前就已经兴旺起来了。

在荷兰,自从第一个清真寺在 1975 年建立以来,迪雅尼特组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要归诸于先前所提到的那些男人们的热情参与。在几年之后的 1979 年,他们先建立了一个联盟,后来在这个联盟中,许多具有迪雅尼特取向的清真寺就结合在一起了。从那时起,不同的伊斯兰教组织开始成形,迪雅尼特的意旨得到维护。

迪雅尼特进入到荷兰的“市场”也是较为容易的,因为其他位于德国那边的伊斯兰教组织对这里并无兴趣。考虑到迪雅尼特作为一个国家委员会所拥有的经济实力与组织实力,那些组织在荷兰发展的可能性便不存在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迪雅尼特并没有什么要对付反对派元老们的政治意图而是想让当地的元老们自己来掌管自己。

到 80 年代中期,迪雅尼特委员会在德国和荷兰都建起了“姐妹”式组织。在荷兰,这一机构甚至有非常正式的地位,迪雅尼特在此一机构中(通过它的“姐妹”组织 Hollanda Diyanet Vakfil Islamitische Stichting Nederland [ISN])已经获得 60 个清真寺以上的所有权(舒勒玛泽拉控制 25 个清真寺,米丽格吕丝控制 14 个和 ICCB 控制 7 个)。每一个成为德国或荷兰的迪雅尼特委员会成员的清真寺组织,可以申请要一名阿訇来服务。这名阿訇由迪雅尼特委员会来委

派,任期三年,这中间的费用由委员会来负担。由于清真寺组织的经费预算很紧而受雇人员的费用很高,这样一来,很显然地看出来迪雅尼特委员会这张王牌有多强了。

迪雅尼特委员会最终决定变得主动一些之后所发生事情的范例可在西柏林看到。1983年时有18个清真寺归属“伊斯兰教联盟”(the Islamische Föderation),这是一个当地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伊斯兰教联合组织,这中间米丽格吕斯是主导的因素。迪雅尼特委员会1982年开始在柏林存在(Blaschke,1989,第333页;Özcan,1989,第208页),但并不支配清真寺。而到1987年,它便加紧活动,就在那一年至少有6个清真寺发生转向。自那时起,又另建了6个清真寺,还有一个以前不结盟的清真寺也加入了进来^①。

在制度化过程之初,伊斯兰教组织间的竞争有时是见诸暴力的,而这又常常是由于那些日子里土耳其国家的政治独裁统治的一种直接后果。每个组织都试图动员尽可能多的资源,正如已经指出的,也存在着清真寺之间的竞争。1980年的土耳其军事政变最终导致战斗结束。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西北欧的原先以竞争相处的伊斯兰教组织之间可见到一种平息化的过程。在这一平息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组织中的关键位置逐渐被下一代的人所取代。这一代人并不一定有与他们父辈同样的兴趣。

新一代,新的旨趣

第一代清真寺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土耳其的文化和伊斯兰教直到他们及他们的家庭能够重返家园为止。与当地社会之间微乎其微的交流或文化对话,其目的也并不是要为将来打算。一段时间后,许多领导位置转交给了年轻一点的人。从列有这个城市所有伊斯兰教组织的阿姆斯特丹商会的自愿组织注册簿中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土耳其伊斯兰教组织中的49个官员中有15人是在1957年或在此之后出生的。还有在这些官员中,处在外部交往职能(主席与秘书)的官员为18人,其中8个是在1957年或之后出生的^②。

这新一代领导人的旨趣只有一部分是在土耳其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在西欧长久地乃至永久地居住下来。他们的生活不再为如积蓄财产以图将来在土耳其有所发展这样的问题所左右,而是受到如何在德国或在荷兰获得成功这样

① 遗憾的是,还不能得到最近的和全国范围的有关德国伊斯兰教组织的力量的数据资料。

② 1957年这一年选择得有些武断,但资料表明先逝的官员确实是非常的年迈,他们多出生在30年代和40年代。确定这一年的第二点是因为1957年以后出生的人不大再可能是来打工的人了。在征募劳工停止了(1973)的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大。

的问题所支配。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消失了，而只是说变得不太突出了。

随着第二代^①领导的出现，清真寺组织扩展了它们的功能范围。伊斯兰教的功能（祈祷和教育）和社会的功能显然仍是它们所主要关心的，另外又加上了有助于进入所在国社会的功能。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阿姆斯特丹在迪雅尼特领导下的一个清真寺组织为妇女开办了骑自行车的课程。像满足这种搭桥功能的更平常的例子就是计算机和语言课程。它们是荷兰迪雅尼特和米丽格吕丝所辖清真寺的一个共同特点。对许多土耳其人来说，到劳工市场去找活干，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而他们希望这些课程的开设会增加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

在同一清真寺组织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像足球和武术等的体育活动。他们的运动队常常与当地的运动俱乐部一起参加国家的运动比赛。这些活动在德国的这些组织的清真寺中是少见的。

想表现整合性功能的组织，主要是限于迪雅尼特联盟和米丽格吕丝所辖清真寺的范围内。其他的组织，要么就主要是关心土耳其社会（像 ICCB），要么就主要想保持独立（如舒勒玛泽拉）。迪雅尼特取向的清真寺一般是努力使它们的成员完全参与到所客居的社会中去。伊斯兰教被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诠释，并且不妨碍他们与西欧社会的接触乃至融入于其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那种希望，即最终荷兰的穆斯林会像荷兰的犹太教徒、罗马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一样受到公正的对待并为社会所接纳。

米丽格吕丝的第二代支持者们对平等的社会参与问题另寻他途。他们试图追求的是对伊斯兰教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解释与一种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生活实际要求这两者的共存。

在其所客居的社会中，伊斯兰教组织也可以寻求对地方的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起作用。而它们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大小就要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国家的政治文化决定着这一关注的程度。针对这方面而言，就要看一看德国与荷兰之间的令人感兴趣的差异之所在。

^① 这里，这二代的成员被看做是那些通常是生在土耳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欧的社会长大的移民。他们通晓语言且又熟悉公共生活的正式的与民间的交往方式。

德国与荷兰的政治文化

正如所期望的,移民文化的制度化与客居国的法律体系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在荷兰,甚至当宗教活动远远超出了一个教徒日常的程序,或实际上已进入到政治领域时,对这种活动也没有什么限制。这是渊源于赋予荷兰以“分隔化的”(Compartmentalized)或是“支撑起来的”(pillarized)[verzuilde]社会之特征的那个年代(Lijphart,1968)。

从19世纪末前后到20世纪50年代,荷兰社会被分割成许多或多或少在意识形态上是独立的分隔体(compartments)。天主教、新教、自由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都有他们自己的机构。这些“支柱”只在最高层的国家政治决策时才相互接触。这种分隔化的实质就是承认所包括的意识形态中,没有哪一个是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支配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因而就需要一种调和的策略。结果,所有这些群体都有它们自己的报纸、广播公司、学校、政党、贸易联合会、教堂及其他组织。有些机构,比如学校和广播电台,国家从经济上支持它们。虽然这些“支柱”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了,但是仍然存在并且活动着。依照这些原则来进行组织的权力以及国家对某些类型的机构的支持,已经深植于荷兰的法律体制中。

这种多元化的原则,在引导归化(naturalization)的荷兰政策中也是明显的。对一个移民来说,在荷兰连续居住五年以后,转入荷兰国籍相对还是容易的。移民父母的一个孩子有权选择荷兰国籍而父母不必放弃他们自己的国籍(Wetenschappelijke Raad voor het Regeringsbeleid,1989,第96页)。

荷兰社会是依照“既分又合”(living-apart-together)的生活原则得以发展的,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差异性与共同性在构成国家认同(the national identity)这一点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与荷兰相比较,德国的政治文化是受统一的原则支配的:所有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国家既有权力也有义务。这一国家是依据德意志文化(Deutschum)这一概念而把它的国民统摄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对生活在国界以外的德国人(Deutschstämmige)(通常已居住了数代人)也可以申请并得到批准而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民。同时,由土耳其父母在德国出生的孩子仅仅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有权成为德国公民(Hermann,1992第28页)。原则上是不允许双重国籍。

在特定的方面,德国有着制度化了的宗教多元性。新教教会(福音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是两个主要的基督教会,建设得颇好而且有着法律上给予保证的

收益。国家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以确保高度的自治。在国立学校中,国家还为宗教教育提供经费(Jacobs, 1992)。

在德国的公众广播系统里,是没有以意识形态追求为目的的独立的广播公司的位置。要求公众体系中的广播组织播放的是通俗的、没有意识形态取向的节目。可能会谈及伊斯兰教的主题,但仅仅是泛泛的谈论,以便所有的观众和听众都能接受^①。在这些公众广播公司的管理中,允许教会发表意见。

德国国家给予教会最明显的特权就是“教会税收”(church taxation)。此税款作为公民收入税(8%—9%)之一部分由德国税收的权威机构征收并交给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因“教会税收”的缘故,国家的税收权威机构与注册机构保存了教会成员的档案。一个不想交这份税款的德国公民则要放弃教会成员的资格,并向国家的权威机构登记注册(同上,第132到133页)。由于没有什么伊斯兰教组织能够声称自己代表伊斯兰教的“教会”,所以这种形式征收的专款,在德国的穆斯林组织是得不到的。

教会税征缴上来相当多的钱,这些钱由教会自由支配,其中大部分都用在教会日常的开销上了。另外,还有一部分用在虽属于教会管辖但一般更具社会属性的事务和部分基金会上,即医院、福利组织、护士学校以及老年人的住房上(同上,第141页到142页)。

除了通过税收获得资金外,所建起的教堂还为它们的社会性组织接受物质性的资助,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这些附属社会性组织的主要工作范围。这些经济关系反映了一个受传统文化与政治制约的利益平衡体,而在这个平衡体中,伊斯兰教仍没有自明的(self-evident)的地位。制约教会与国家(Staats-Kirchenrecht)间关系的法律允许把这些特权扩展到其他的宗教派别上去,但其在政治上的解释却是趋于保守的。这种国家支持(state sponsorship)地位的缺乏就意味着伊斯兰教社会组织中任何较大一点的基层机构都很难得到发展。

在荷兰,宗教组织需要从所属的成员中征集收入,国家是不管的。然而,这样的一种组织如果要创办公益性的活动(如学校、广播台等),国家就要承担费用。像在清真寺这样的伊斯兰教机构场所中举办活动,也会有国家的补贴,但这些活动与宗教无直接关系^②。这主要涉及对土耳其或其他国家移民的自由发

^① 多元主义效应(Binnenpluralismus)也可以从大多数的商业卫星和电缆媒体中看到。在后一种情况下,多元主义由频道的联合而不是由单一个广播电台组织(Aussenpluralismus)来提供(Ellwein和Hesse, 1987, 第151页)。

^② 在荷兰,对清真寺有些补贴,这主要是在1976和1983年之间这段时期内。这是象征性的,在任何实际的意义上并不重要(Landman, 1992, 第285页)。

展过程来说有益处的那些活动。

随着第二代土耳其穆斯林时代的到来,要求在更平等的层次上参与东道国社会事务的呼声随之出现。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某些方面的调适是必需的。伊斯兰教机构要能够在旧的、携带来的文化与新的环境之间搭桥铺路,以这种方式来寻求保持土耳其人的价值观、伊斯兰文化,同时它们不会妨碍反而确实会增加穆斯林们完全参与到德国或荷兰社会中去的可能。为了达到此一目的,需要重新改造现存的机构,同时还要考虑建立新型的机构。而后者一种机构应当是当地机构的伊斯兰教翻版。在制度化过程的这一阶段,国家的政治文化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荷兰的制度化

在荷兰,土耳其伊斯兰教的领导者把荷兰宪法中所赋予的建立宗教学校的权力看做是筹建伊斯兰教学校的一次机会。特别是米丽格吕丝的支持者把这看作是一种把对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的理想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的一种可能性。在1988年,最初的两个荷兰伊斯兰小学校开始上课。其中一所是由住在鹿特丹的第二代土耳其父母们开办的,他们声称其目的是要培养他们的子女(第三代)在荷兰世俗的社会中过一种伊斯兰教的生活。这是第二代土耳其穆斯林成员中间取向转变的明显标志。第二所学校主要是由摩洛哥的移民发起并在恩德豪夫(Eindhoven)建立起来的。

这些初建的学校带来荷兰城市中伊斯兰教学校的某种繁荣。一方面,注意力放在给予子女这种宗教教育形式的可能性上。另一方面,它引发了伊斯兰教反对派与迪雅尼特组织之间一轮新的、激烈的竞争。第一所伊斯兰学校的筹建者是米丽格吕丝运动的杰出人物。然而,他们最初的动机还是缘起于父母们想为子女寻求适当的学校教育这样的切身体验而已。所以就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当时当地的需求。迪雅尼特委员会为了对抗这种情形,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支组织来从上面和国家层面建立和控制伊斯兰的学校(Islamitische Stichting Nederland Opvoeding & Onderwijs[ISNO])。最初,荷兰的迪雅尼特联盟一直寻求在国立学校中开设伊斯兰宗教教学课程(Landman, 1992, 第263到264页)。然而,后来它发现国立学校对此设想的反应十分冷淡。鹿特丹成功的初创迫使迪雅尼特委员会又不想把伊斯兰教学学校的控制权交给米丽格吕丝成员的手中。从那时起,最初是因当地需要而产生的而且一般是米丽格吕丝教派取向的学校,现在就有了由ISNO组织所建的迪雅尼特委员会取向的学校追随其后。到了1990年8月,荷

兰的伊斯兰学校的数目总共有 13 所。

在荷兰,其他试图起到一种发挥使土耳其穆斯林融合进荷兰社会功用的伊斯兰机构就是伊斯兰广播公司 (Islamitische Omroep Stichting [IOS])。它于 1986 年开播(每周 15 分钟的电视节目和一个小时的无线电广播)。虽然荷兰政府原则上期望一个伊斯兰教的广播公司能代表所有荷兰穆斯林,但这个公司却是由具有迪雅尼特倾向的土耳其穆斯林建立与操纵的。早先想要实现在 IOS 公司董事会中各方代表的平衡,但由于荷兰穆斯林内部不同民族间沟通上的问题而致失败。所以后来正式考虑开播许可的问题时就转向了迪雅尼特联盟。直到 1990 年,一个更为多元的伊斯兰教组织才得以成立。

每一个宗教组织,或者其他适合于此种支撑式结构的意识形态组织,只要能够证明其在荷兰社会中有足够的支持者(包括外国居民),就可以申请开播许可。当获批准之后,国家将提供开办一个广播公司所必要的资金。荷兰的广播体系中包括有许多像 IOS 这样一些小的公司。

在荷兰和德国,伊斯兰教组织,特别是全国联盟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都试图想影响与移民和伊斯兰教有关的政治事务。他们自发地寻求获得公众和政治家们的注意。在荷兰他们做了许多努力,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个面向荷兰政府并能够代表伊斯兰教旨趣的全国性伊斯兰教组织。由于前面所述及的竞争和沟通的问题(已提到过土耳其与其他种族群体,主要是摩洛哥人与苏里南人之间的问题),所以直到最近,这些努力仍未获得成功。

另外,可以让穆斯林积极地表达他们的观点。由于发起并支持了一个参政委员会 (Inspraak Orgaan Turken),荷兰政府已创立了一个正式的渠道,通过此渠道,土耳其组织能够将它们的意见传递给权威部门。伊斯兰教和左翼组织都参加了这一委员会。鹿特丹市发起创办了一个伊斯兰教咨询委员会 (Stichting Platform Islamitische Organisaties Rotterdam),这一城市的几乎所有伊斯兰教组织都参加了这一委员会。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还有为一些种族群体设立的咨询委员会。土耳其咨询委员会代表了某些伊斯兰教团体。但不可高估这些咨询委员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个人层次上,外国人也有许多参政的机会。自 1985 年以来(对 1983 年的法律做了必要的修改),在荷兰居住五年以上的外国人可以参加当地的选举。

在此部新法实施之前,在鹿特丹的 1984 年市区 (stadsdeelraad) 选举中,一个土耳其伊斯兰教派就已经能够参加了。虽然它获得了 43% 的土耳其人的选票,但是并没有权力在某个市区的理事会中占据任何位置。然而,相对于已有

的组织,这确实提升了这一教派的地位,这导致了它与荷兰基督教民主党打得火热。不仅是在基督教民主党内土耳其穆斯林找到一席发言之地,而且还在劳工党内积极活动。

这些政治上积极的穆斯林成员虽说人数不多,但有些人的名字还是会在市政理事会的名单上找到,但一般都是在区一级上。虽然他们并不表现为以宣讲伊斯兰教的事务为主,但是在当地的政治领域里,我们能听到土耳其伊斯兰教徒的声音。

在德国的制度化

在德国也可以看到一样广泛的初创的制度化。但却是生长在一片毫无生机的土壤上。在德国,教育都是由国立学校提供的,虽说德国法律允许依据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宗教或教育原则来建立学校。一般来说,建这样一个有宗教背景的机构,其申请是要经由一个官方认可的教会来批准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德国,伊斯兰教并无这种地位。在柏林这种状况已不复存在,所以在1989年,这座城市建了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德国伊斯兰教学校。这是由当地的米丽格吕丝组织组建的。与荷兰的情形相反,这所学校大部分是要自我供给。学校在证明自己有生存能力之前,国家不会提供任何资金上的帮助。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运作已经六年而无资助的那种事例。

紧跟这第一所伊斯兰小学之后的,很可能是由迪雅尼特委员会创办的一所学校。在对这一项目询问时,迪雅尼特委员会在柏林办公室的负责人声明在不久的将来计划办一所新的学校。由迪雅尼特来办学校,资金就不成问题了。

与荷兰的情形相反,从官方和机构上来看,伊斯兰教组织并没有受到过德国政府的垂询。获得正式政治影响的唯一途径是在地方那一级上。某些大城市有一个委员会(Ausländerbeirat),在这个委员会中,所有外国居民通过按比例派代表来行使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力。但通常认为,这些委员会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

荷兰与德国在这一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对谁可以参加选举的解释上。在荷兰,鼓励外国人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在德国,此一问题还在争论中,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大可能实现。在1990年秋季,德国最高联邦法庭宣布宪法只允许德国公民有选举权^①。

^① 这一决定是依据德国宪法的第二十条。(2) Alle Staatsgewalt geht vom Volke aus"从法律的观点看这不包括非德国人。在那时,为边缘市民(Ec-eizuens)提供当地投票权的Maastricht条约还未通过。

虽然这一法庭是与日常的政治相分离的,但是,它的决策强烈地反映德国主要政治党派所主张的信条,那就是德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荷兰政府却无不勉强地承认了事实的必然性,而且自八十年代前期以来,政策上是朝着有助于少数民族融合的目标迈进的(Penninx, 1988, 第 164 页)。

在对德国的世俗的与宗教的两种土耳其组织的研究中,Özcan(1989, 第 313 到 316 页)发现在这中间有着与在荷兰所见到的一样的取向上的改变,即指从土耳其社会转到适应西欧的生活方式上。Schwarz(1992)在柏林对土耳其青年组织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些组织中,越来越多的活动重点都是放在促进进一步的融合上,特别是看准了最年轻的一代。柏林市政当局为这类活动提供必要的补贴,而且 Schwarz 的研究显示了有多少政治组织(从左翼组织到保守派)改变了他们的形象而成为社会工作机构(同上,第 184 页)以适应这一政策。然而,伊斯兰教的组织并没有领取这一财政资助的资格。市外事专员办公室证实柏林的清真寺组织并未得到权威机关的任何实质性的资助。它还证实,在清真寺的活动中旨在增进其成员参与德国社会的机会的活动是少而又少的。我们所给出的假定是:一个清真寺组织的资金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宗教活动,有了剩余才会搞其他的活动,这个结论应当是很正常的。

结 论

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德国和荷兰的制度化,最初的特点都是由于移民们在客居国想要过一种像在“家”里那样的生活。在领导层,这种愿望使得在土耳其属于非法的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里有了组织起来的可能。德国的土耳其人因其人口规模创造了比在荷兰发展快得多的初始条件。他们的机构与那些倾向于土耳其政府的机构争夺资源和支持。土耳其内部的政治事务在西欧找到了一个舞台。

随着第二代土耳其人时期的到来,新的领导开始显示其影响力。这一代领导者想着的是在德国或是荷兰生存的可能性问题,而不是想着回土耳其以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土耳其的政治问题就变得越发的不重要了,一些机构的功能得以扩展,并起到了在新的环境下其支持者得以自由发展并融合进当地社会的作用。这些功能和角色不仅仅是由土耳其穆斯林的愿望和需求来形成的,而且也是由它们在其中得以发展的东道国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

非常制度化的宗教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是荷兰的悠久传统。这样的传统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允许甚至鼓励宗教组织开展超出宗教范

围的活动,而且给予相应的合法机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小学和伊斯兰公共广播公司的建立。

在德国,此种制度多元化的文化未能形成且也无活力,因而,对土耳其伊斯兰教移民组织而言,要发挥同等的作用就显得更为困难。这些机构得不到征集教会税收的利益,对于它们的宗教或文化活动,国家也不给任何形式的补贴。在荷兰的伊斯兰教组织所开展的许多活动很少能够在德国的相应组织中找到。

在荷兰,伊斯兰教机构中所开办的非宗教性的活动,主要的意义在于促进融合。且不论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如何,单这些活动本身就使伊斯兰教成为许多在荷兰的土耳其移民的生活中心——一个为移民们进入荷兰社会铺路搭桥而不是设置屏障的中心。对于这种制度化,德国的政策目标是要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它们鼓励在一种非宗教气氛的环境下举办日常性的以及那些意在融合的活动。许多荷兰的清真寺组织了远远超出宗教范围之外的活动。它们是清真寺作为土耳其移民们的主要机构的重要基础,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清真寺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从而间接推动其他的伊斯兰教活动。

德国现代的情形表明(像柏林的例子),虽然可看到有进入德国社会这种取向上的改变,但这对当地伊斯兰教机构所开展的活动和功能来说影响甚微。它们不像荷兰的机构那样起着桥梁一般的功能。由于有许多的土耳其移民,在伊斯兰教的氛围中感觉到特别舒服,这便可能意味着促进融合的活动的实质作用要比它们作的公开宣传要小。需要提醒的是,结论可能就是,在德国的移民要么是同化到他们的东道国社会中去,要么就是与这一社会相互隔离而很少参与到其中去。在荷兰容易发现的是一个位于两者中间的情况,在此背景上,土耳其的穆斯林处在这样的位置,即他们甚至是以超出自己的愿望的程度去参与到他们的东道国的社会中去。

参 考 文 献

AMERSFOORT, J. M. M. VAN. 1986. 'Nederland als immigratieland' in L. van den Berg-Eldering (ed.), *Van gastar beider tot immigrant. Marokkanen en Turken in Nederland*, Alphen a/d Rijn: Samsom, pp. 15—46

AMERSFOORT, J. M. M. VAN, DOOMERNIK, J. and DE KLERK, L. 1989. 'Turkse Moskeeën Woonpatroon in Amsterdam', in F. M. Dieleman, R. van Kempen and J. van Weesep (eds), *Met Nieuw Elan. De herontdekking van het stedelijk wonen*, Delft: Delftse Universitaire Pers, pp. 129—144

BLASCHKE, JOCHEN. 1985. 'Islam und Politik unter türkischen Arbeitsmigranten,' in J. Blaschke and M. van Bruinessen (eds), *Islam und Politik in der Türkei*, Berlin; Edition Parabolis, pp. 295-366

DOOMERNIK, JEROEN. 1991. *Turkse moskeeën en maatschappelijke participatie. De institutionalisering van de Turkse islam in Nederland en de Duitse Bondsrepubliek*, Amsterdam: Koninklijk Nederlands Aardrijkskundig Genootschap

ELIWEIN, THOMAS and HESSE, JOACHIM JENS. 1987. *Das Regierungs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6th ed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HERBERT, ULRICH. 1986. *Geschichte der Ausländerbeschäftigung in Deutschland 1880 bis 1980*, Berlin/Bonn: Dietz

HERMANN, HELGA. 1992. 'Ausländerpolitik,' *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no. 237, 4-1992, pp. 27-30

JACOBS, UWE KAI. 1992. 'Kirche und Religion' in Sven Hartung and Stefan Kadelbach (eds), *Bürger, Recht, Staat. Handbuch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LANDMAYER, NICO. 1992. *Van Mat tot Minaret. De institutionalisering van de islam in Nederland*,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LIJPHART, AREND. 1968.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LUS, PH. J. and PENNINX, R. 1991. *Immigratie van Turken en Marokkanen in Nederland. Een analyse van de ontwikkelingen tussen 1970-1990, een vooruitblik op te verwachten immigratie en de consequenties voor beleid*, Amsterdam: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ografie, Centrum Migratie Onderzoek,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ÖZCAN, ERTEKIN. 1989. *Türkische Immigrantenorganisation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ie Entwicklung politischer Organisationen und politischer Orientierung unter türkischen Arbeitsmigran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Berlin West*, Berlin: Hittit-Verlag

PENNINX, RINUS. 1988. *Minderheidsvorming en emancipatie; balans van kennisverwerving ten aanzien van immigranten en woonwagenbewoners*, Alphen a/d Rijn/Brussel: Samson

RATH, JAN. 1985. *Migranten, de Centrumpartij en de deelraadsverkiezingen van 16 mei 1984 te Rotterdam*, Leiden: COMT

SCHWARZ, THOMAS. 1992. *Zuwanderer im Netz des Wohlfahrtsstaats. Türkische Jugendliche und die Berliner Kommunalpolitik* Berlin: Edition Parabolis

TOPRAK, BINAZ. 1981.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Teiden: E. J. Brill

TOPPAK, BINAZ. 1989.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aizismus in der türkischen Republik' in J. Blaschke and M. van Bruinessen (eds), *Islam und Politik in der Türkei*, Berlin: Edition Parabolis, pp. 95-107

WETENSCHAPPELIJKE RAAD VOOR HET REGERINGSBELEID. 1989. *Allochtonenbeleid*, 's-Gravenhage: SDU Uitgeverij.

(赵旭东 译, 罗 劲 校)

附录

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 (民族)的论述^①

马 戎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而且经常引发社会冲突的焦点问题，而对“什么是民族”(即“民族”定义)的认识则是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和分析民族问题的基础。关于这个方面，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曾经有过许多争论(马戎，1999:35—47)。争论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在20世纪初期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在汉语中出现并至今广泛应用的“民族”一词(韩锦春、李毅夫，1985)。以英文为例，“nation”、“ethnic”和“nationality”似乎都与汉语的“民族”一词有密切关系，通常也都被译作“民族”，但这三个相互区别的英文词汇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

“民族”(或者依中国传统称呼为“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不同，人类群体在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所逐步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与内涵不同，用以表现这些社会组织、文化现象的词汇也必然不同，各地域相邻居住的人类群体在彼此相互接触当中，出于群体界定的客观需求而自发产生了当地的“群体称谓”与相应的族群观念，并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和专用词汇来加以表述。

在这个世界上的各个人群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客观差异(体现在体

^① 本文原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后收入马戎著《民族与社会发展》(2001年民族出版社)第141—160页。

质、语言、宗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经济活动、社会组织等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差异看作是一个多维度(每个方面作为一个维度)的立体“连续统”(continuum),每个维度从一端(没有差别)到另一端(存在巨大差异),中间有无数的过渡阶段,“量变”逐渐累积而出现“质变”。当我们试图对这些人群用“群体”概念在这个多维度立体的“连续统”上进行划界时,就是在每个维度的“连续统”上寻找和确定“质变”的点,并把每个维度上的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在空间上多维度的立体“边界”。在具体的点的确定与界限的划分和表述过程中,无疑带有体现个体或群体意识的人为的主观因素,提出“群体”概念的主体不同,群体边界划分的结果也有可能不同,而且“群体”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所以,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划分类别之一的“民族”,其定义与分界也必然是多元和动态的。中国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族群”观,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民族”观。为了理解国外“民族”观产生的历史和实质性内容,我们需要对国外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思考,把它们与我国的传统观念、当前流行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这样既可以推动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也可以为社会上混杂流行的各种观念提供必要的规范。

“nation”是我们在翻译和理解西方文献时最容易引起混乱的一个词汇,有时译成“民族”(如“nation-state”通常被译成“民族国家”),有时译成“国家”(如“the United Nations”译成“联合国”)。在字典中对“nation”的主要解释有:(1)民族,(2)国家,(3)国民,(4)部落等等^①。国内许多有关的翻译文献对于“nation”一词,时常根据译者的理解从以上译法中选择一个。同时,其他一些英文词汇如“ethnicity”和“nationality”也经常被译为“民族”,中英文词汇之间的这种交错译法,导致了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应用中的混乱现象。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是任教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社会学家,他发表了许多有关“nation”的研究著作,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在1991年出版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书里集中讨论了我们所关心的“民族”(nation)概念在西方的产生与当前应用中出现的问题。

本文主要介绍他在该书第一章中针对“nation”这个概念所提出的观点,并结合自己在学习与研究工作中的体会给予评论,希望这些介绍和讨论能够引起

^① 参见中文的《新英汉词典》第857页,《英汉大词典》第1199页,英文的《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第874页以及《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等(参见翟胜德,1999:68)。

大家的兴趣。我们在本文中一律把“nation”译成“民族”，把“ethnic group”和“ethnic”译成“族群”，在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都标出原文中使用的英文词汇，以便对照理解。只有准确的理解，才能有准确的表达，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再对这些词汇的含义进行总结。

一、“nation”(民族)只是人们身份认同多种类别之一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人们的“identity”(身份认同)包含了多重身份与角色：家庭(familial)、领土(territorial)、阶级(class)、宗教(religious)、族群(ethnic)和性别(gender)，这些身份的基础是社会分类(social classification)，而这些具体分类方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可能发生变化甚至被废弃(Smith, 1991: 4)。这是对如何认识“民族群体”划分的一个基本观点。人类社会中“群组”的划分，在社会活动实践当中根据具体实用性目的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如划分为种族群体、民族群体、种姓群体、阶级、社会阶层、性别群体、年龄群体、行业群体、职业群体、政治团体以及各类自发或非自发形成的组织群体，“民族”群体不过是分类方法之一(马戎, 1999: 57)^①。

在各种分类当中，史密斯认为最明显和最基础的集体性身份认同是性别差异，其次是空间(或地域)，第三个是社会阶级。他认为把社会阶级作为集体性身份的基础是有一定困难的，原因是阶级在感情方面的吸引力有限，同时缺乏文化深度，“阶级群体与性别群体一样，通常(内部)被领土边界分隔开来，它们主要属于经济利益群体，而且可以根据收入水平和技能高低进一步分为许多小群体。由于经济生活每时每刻在迅速波动，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区里维持各个经济小群体的稳定，其机会是很有限的，人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自我考虑通常使阶级难以成为稳定的集体性身份认同”，所以他認為阶级群体是不稳定和多变的。

对于“阶级”的认同，史密斯承认，“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在一个社会里总会有两个以上的阶级处于相互冲突之中，正如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所

^①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这种划分是“实用性”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应具体的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中，这种“群组”的划分(标准、边界、内涵)可能会不一样；第二，社会场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群组”的划分标准也会随之演变而不是固定不变，“群组”之间的边界也在变动之中，这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现象中十分常见，甚至在同一个时空里也会出现位于“边界”地带的重合部分，如族际通婚的夫妇会对双方族群都具有一定的认同感；第三，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不同划分方法确定的不同范畴的“群组”可能会出现部分重合交叉的现象，如一个人可能既属于一定的年龄群体，同时又属于一定的职业群体和一定的民族群体。

发现的,这些冲突会使阶级差别和身份差异变得显著起来”(Smith,1991:5)^①。换言之,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阶级身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认同身份。

史密斯认为,假如在一块领土内出现了一个涵盖性更广的、包括了整个人口的集体性分类如宗教和族群(ethnic group),它将会包含来自许多不同阶级的成员,(其界定)肯定会与基于阶级和经济利益的群体分类结果很不相同。阶级身份来自于生产与交换领域,宗教身份来自于交流和社会化领域。宗教和民族基于文化因素如价值、象征、神话和传统(体现于习俗与仪式),宗教身份时常与族群(ethnic)身份密切相关,大多数宗教社区都与族群社区相互重合。

他同时认为这两类文化的集体性身份必须有所区分,一个以族群—语言为基础的人口可能会划分成不同的宗教社团;而当人们信奉了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之后,宗教的影响也可能销蚀和减弱信仰同一宗教的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但是—旦“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潮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把各族群统一起来,就会出现强烈的民族意识(Smith,1991:6—8)。所以史密斯倾向于认为,“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认同比阶级认同更为基础和稳定。

一位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曾经把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资本主义强调民族和国家界限,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超过各阶级的利益,各国资本家和工人会各自携起手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战;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界限,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会联合携手去与各国资本家的联盟作战(Connor,1984:5)。是民族、国家利益优先还是阶级利益优先,这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在实际社会进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许许多多分别表现两个方面的例子。在抗日战争期间,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联合统一战线”,认为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利益高于中国内部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利益,实行联蒋抗日;到了世纪之交,企盼两岸统一的民族感情又使许多昔日内战的敌手走到一起。解放初期,在各个少数族群被压迫的奴隶和农奴获得解放、得到土地的年代,他们在“异族”阶级弟兄的支持下与本族的压迫者进行斗争,拥护共产党解放军,那是他们阶级意识最强烈、族群意识淡化的年代。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则由于缺乏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在新的社会氛围中具有较强的族群意识。

^① 但他强调说,“在一个固定领土范围内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被包括在阶级分类中”(Smith,1991:5),他认为阶级划分的人口涵盖面是不普遍的。但是他对这一观点未做进一步说明。因为这涉及另一个复杂的概念定义问题即“什么是阶级”,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

也许我们可以说,阶级结构和阶级利益源自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阶级结构的稳定性和各阶级成员个人身份的稳定性都在降低,所以阶级认同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相比之下,族群和它所承继的文化传统可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凝聚了更强的感情色彩,在时间上延续得更长久^①。所以,史密斯肯定族群和宗教群体认同的重要意义和持久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关于“nation”群体的认同

对于“nation”,史密斯认为是除了性别、空间和阶级之外的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具体情况而出现的新一类群体和身份认同。由于“nationalism”的兴起,人类群体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所以出现了一个“nation”(“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国对于“nation”概念的运用有着重要的、实际上是主导性的影响。这个新观念(理性国家, the rational state)和新共同体(领土民族, the territorial nation)是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现的,而且两者之间密切相关(Smith, 1991:9)。

在前面谈到族群(ethnic)和宗教群体的划分与内涵时已经说明,与文化因素(价值观、象征、神话、传统习俗与仪式)相关联的“族群”是历史上即存在的,所以史密斯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族”观念有相似之处。而史密斯讨论的“nation”(民族)概念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范畴,这与列宁关于“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 1914:413)的观点是一致的。

史密斯认为存在着一个西方的或者称之为“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它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或领土的概念,一个“nation”(民族)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人群与其传统居住的土地(也许并不是其最初的发源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个因素是“民族”是“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laws and of institutions with a single political will);第三个因素是共同体成员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如公共事务和法律权利、政治权利与义务、社会经济权利等各种各样的“公民权”(citizen-

^①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更是把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参见马寅,1995:100—101)。

ship);第四个因素是“民族”(nation)必须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和公民的意识形态(civil ideology)。综上所述,(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4条就是确定西方模式“民族”(nation)标准的组成部分(Smith,1991:11)^①。

史密斯认为,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它强调的是人们出生的共同体和本土文化,是具有相同血统的共同体。在这个模式的标准中,(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popular mobilization);(3)对本土的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这些方面在亚洲和东欧地区一些“民族”(nation)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Smith,1991:11)。可见,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社会与国情,群体认同在内涵与形式上可能会出现变化,从而体现出人类社会在这个方面的多样性。

史密斯认为,在今天世界上的每个民族主义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某种“双元”现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包括了“市民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两方面的要素。他以法国为例,说明在同一个民族(nation)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有时强调的是“公民的”和“领土的”因素,有时强调的是“族群的”和“文化的”因素(Smith,1991:13)。从他所举出的这些例证可以看出,我们需要用一种辩证的和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和理解这两种“民族模式”(models of nation)之间的关系。

这里,史密斯承认世界上“民族”现象的“多元性”并提出了两个具体模式,可见不同地区自发产生的对于“民族”(nation)、族群“ethnic”的认识与定义可能是不相同的、带有地域性文化历史特点的。实际社会当中,可能还存在史密斯提出的西欧模式、亚洲与东亚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如存在于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模式)。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民族”定义根据其产生的不同场景、不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理解其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总结出若干有代表性的区域性模式,从而有助于我们真正从实际社会生活中理解人类社会中最复杂的民族现象。

史密斯最后总结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特征有:(1)历史形成的领土,(2)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3)共同的大众文化,(4)所有

^① 就“nation”的这4方面内涵而言,在中文里译为“国民”(参见朱伦,2000b)也是可以的,但需要对其他相关概念进行系统整理与说明。我们在翻译西方学术和政治术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系统地理解其实质性内涵,同时对有关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涵盖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5)共同的经济(Smith,1991:14)。他在文章中又简略总结说,“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民族”(nation)是复杂的建构,包含一些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包括了“族群”(ethnic)、文化(cultural)、领土(territorial)、经济(economic)和法律 政治诸方面。我们比较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到在他的表述中,“族群”与“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是相互对应的,体现的都是族群的感情心理因素。

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从根本上讲是多维度的,决不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在不同的个案中这些特征各有不同的侧重。这是理解“nation”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史密斯在承认“民族”现象的多元性并对两种区域性“民族模式”作出很有创见的论述之后,仍在试图总结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民族”(nation)定义,他把两种实质上很不相同的两种“民族模式”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归纳出5条“普遍性”特征,这里多少带有几分牵强,也缺乏必要的论证。但是他还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坚持这些标准“缺一不可”,而是在实际应用中为研究者在这些标准或特征中的取舍留下余地。

我们可以把史密斯关于组成“民族”(nation)成分的5个特征与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4个特征进行比较。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1913:294)。用史密斯的模式分类法,斯大林所表述的观点倾向于“族群的‘民族’模式”,除了领土和经济因素外,强调了文化、语言和心理素质。而史密斯在前面具体的(而非总结归纳部分的)论述中,强调的是“民族”(nation)“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个具有政治、法律和行政组织含义的特征,而把“族群”(ethnicity)只作为“nation”诸特征之一,实际上体现了西欧社会的特点,即“市民的‘民族’模式”。

我们可以参照史密斯的两种“民族”模式的思路,把斯大林具有4条标准的“民族”定义也纳入世界上多元化的“民族”现象与模式体系之中。斯大林提出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他主要根据俄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并借鉴其他国家国情而作出的理论总结,可以看做是区域性“民族模式”之一。这个模式用于其他地区就可能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当他坚持这些标准对于“民族”的确认来说“缺一不可”时,更是如此(马戎,1999:37)。

二、“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区别

西方文献中常用的一个词汇是“nation-state”(国内通常译为“民族—国

家”),这个词汇中的两个部分显然各有不同的含义。按照史密斯的说明,西欧模式的“民族”(nation)包含有法律权利和义务并具有政治、法律和行政组织含义的特征,而人们通常把这些也理解为“国家”的特征,那么,“nation”(民族)和“state”(国家)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史密斯认为,“state”(国家)指的是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在一块既定领土上垄断性地实施强迫和压制的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而“nation”(民族)指的是凭借文化和政治契约而统一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其历史文化和领土。“民族”(nation)的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与国家(state)公民们之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制联系纽带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重合的部分,如都强调领土,在民主国家中也都强调人们的权力。尽管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同时使用“民族”和其他大众化术语(如民族一国家, the states of particular nations),但是其内涵和着重点是很不相同的(Smith, 1991:14—15)。

“国家”主要指一整套具有公共认可的权威性社会行政管理组织体系,这套国家机器由于受执政集团控制,所以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可能通过选举而执政,同时基本保留原有国家机器,即使是通过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建立起一套新的国家组织,但其机构(尽管名称和形式可能有所改变)的内涵与功能基本上仍会相似,而这是由社会行政管理行为功能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民族”(nation),但不一定忠于现在执政的“国家”政权(state),如维克多·雨果热爱“法兰西”,但因为痛恨执政的政府而长期流亡在外。

史密斯认为,“民族”(nation)在概念上包含了两组特征,一组是“公民的”(civil)和领土的(territorial),另一组是“族群的”(ethnic)和血缘家系的(genealogical),而在实际社会的各个个案当中,这两组维度是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有的情况是第一组比重大,有的是第二组比重大。这种各维度不同比重的存在,反映在西欧和东欧、亚洲“民族”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上^①。史密斯认为,这种多维度现象使得“民族认同”成为现代生活和政治中既灵活又顽固的力量,而且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强有力的理念和运动相结合,同时并不失去自身的特征(Smith, 1991:15)。他观察各地区“民族”现象的这种视角,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

^① 有的学者认为“西欧人追求以独立的国家形式来保证族群利益,由此形成国民一国家(nation-state)的理念”(朱伦,2000b:3),主要参照的是西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有关思想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nation)这个范畴可以涵盖“族群”(ethnicity)。各地的“族群”(ethnic groups)由于都比较偏重于它们的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所以在“族群”定义的内容和词汇翻译方面比较容易相通。而“民族”(nation)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可能有十分不同的侧重而体现为十分不同的模式,因此在翻译和理解上对“nation”(民族)这个词汇需要特别仔细和小心。

四、“民族”(nation)的功能

考虑到“民族”(nation)所具有的这些维度,史密斯认为可以依据其客观效果把它们的功能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外部”功能包括领土、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功能。“民族”(nation)“首先是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其成员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空间里,而且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这个共同体有一个明确的领土范围”,“民族”(nation)在经济上要求控制领土内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并且时常倾向于本民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Smith,1991:16)。

在政治上,“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加强了国家(state)及其机构的社会基础,政治代表人物和政府官员的选举也是基于“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标准。但是“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赋予法制机构制定的有关法律的权利和义务以合法性,它确定了一个“民族”(nation)特定的价值和特征,反映人们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Smith,1991:16)。

史密斯认为,“内部”功能中最明显的是其成员作为“国民”(national)和“公民”(citizen)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①,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通过义务的、标准化的公共教育系统来实现的。国家权威希望通过反复灌输来培养对民族的忠诚和有特点的具有内部同一性的文化,在“民族主义有关文化真实性和统一性观念”(nationalist ideals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unity)影响下,所有的政权都在努力实施这样的教育(Smith,1991:16)。“民族”(nation)也被认为通过其所提供给成员们共享的价值观、象征和传统而发挥了个人之间、阶级之间的社会聚合力的作用,通过使用一些象征性符号(旗帜、国歌、制服、纪念碑、庆典)使成员们记得他们具有共同遗产和文化,使他们由于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从属而感到强壮和骄傲,“民族”(nation)成为一个“信仰追求”的团体,通过共同努力去克服排除面前的困难险阻(Smith,1991:17)。史密斯在这里强调的,无论是

^① 一般来说,前者指的是“民族”(nation)的成员,后者指的是“国家”(state)在法律上的成员并可持有该国政府颁发的有关证明(身份证或护照)。

“外部的”还是“内部的”功能，实质上都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意义的“民族认同”（或“国民认同”）^①。

“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还使得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通过集体性的特征把自己清楚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通过一种内部相互共享但与其他人群相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人们能够知道在世界上“我们是什么人”，通过对文化的“再发现”，我们“再发现”我们自身——“具有可靠依据”的自身。所以“自我定义”和“定位”的过程既是理解“民族认同”的关键，也是造成大多数疑惑萌生和提出质疑的原因。

史密斯认为，当我们认识到世界上各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别之后，我们对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认同”标准和定位持有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这些怀疑既是哲学上的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各地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他们的具体活动中提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民族自身”（national self）的定义，所以人们批评民族主义的教义（doctrine），说这些教义和观点在具体应用时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或支离破碎的，而且在政治上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族群冲突。史密斯的结论是，当前流行的各种关于“民族”（nation）的观念，从最好的方面说也是粗略和难以捉摸的，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荒谬和矛盾的（Smith, 1991: 17）。

史密斯指出，在知识界对“民族”定义提出怀疑的同时，还带有伦理意义上的谴责。在“民族认同”名义下，人们被说成自愿放弃他们自己的自由并有权力去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去践踏本“民族”（nation）里没有被吸收进主流的那些族群的（ethnic）、种族的（racial）、宗教的少数群体的公民和宗教权利（Smith, 1991: 17）。来自西方国家的“民族观念”（ideal of the nation）散布到全球后，引起困惑、不稳定、冲突和恐怖，在那些族群和宗教混杂的地区尤为如此（Smith, 1991: 18）。民族主义的教义使得“民族”（nation）成为每个政治运动的目标，并使得“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成为衡量全部人类价值的尺度。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nation）观念对单一的人性（a single humanity）、对一个世界共同体和它的伦理统一性的整个思想提出了挑战。用以取代的是，民族主义提出一

^① 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把“nation”译为“国民”（朱伦, 2000a）或“国族”（宁骥, 1995: 5）。对于中文“国民”一词在翻译中的应用，应当十分慎重。如“建有现代主权国家的族体称为国民，没有建立国家的族体称为民族”（朱伦, 2000b: 4）这样的观点，是否过于强调政治层面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的观点被译为“一个人民（people）、一个国民（nation）、一个国家（state）”，“people（人民）主要是指语言—文化同质的族体，而nation（国民）则是指以独立国家形式实现政治统一的people”（朱伦, 2000b, 7）。这里“人民”的含义似乎与通常理解的“族群”相近，而与中文里对“人民”一词通常的理解有距离。不同的外国学者可能使用不同的外文词汇来表达相近的概念，这使得翻译工作格外困难。

个有关政治共同体的褊狭和充满冲突的体系即“nation”，使它具有合法性，它将不可避免地使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相互冲突，在已知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文化差异的情况下，这只能把人类引向一个政治上的“斯库拉”(Charybdis即Scylla，希腊神话中栖居在墨西拿海峡岩石上攫取船上水手的六头女妖)(Smith, 1991:18)^①。

“民族主义”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发挥着作用，“民族”(nation)的观念和认同也因此具有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功能，并将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我们应当对于民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方面给予重视：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对正在消失的历史和文化的抢救、复兴文化的热情、对“认同危机”的化解、努力推动社区和社会团结的合法性、反抗专制的精神、关于民众主权和集体动员的主张、甚至经济增长方面的自给自足，等等，同时必须注意警惕和克服“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消极方面(Smith, 1991:18)。

从上面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密斯一方面试图根据各个地区的社会实践来总结归纳“民族”(nation)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同时他也承认“民族”观念在实际应用中的混乱与模糊，承认“民族主义”在实际社会运动中具有两面性，当强调“nationalism”的政治和领土这个方面时可能对部分民众造成偏差与伤害，而强调其文化传统和血缘这个方面时，少数民族的“认同”则可能对该族群的传统文化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中，占主导的实际上应当被称作“族群主义”(ethnicism)，而不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

五、讨 论

以上这些论述，反映出史密斯主要基于西欧模式(“市民的‘民族’模式”)而归纳出来的“民族”(nation)观念。他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族”的内涵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功能，认为“民族”(nation)这个概念总的来说是模糊不清和矛盾的，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群体划分是多元和多变的，此地与彼地不同，此时与彼时不同。作为学术界一家之见，他所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思考是会有所启发的。

国内其他研究也借助英文词典分析了“nation”的定义，说明以“nation”为词根的词汇都与“国家”、“国民”有关(瞿胜德, 1999:69)。应当说，英文中的“na-

^① 国内有些学者近期也指出，我们应当对源自西方关于“民族—国家”这一所谓“经典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以认识其负面作用(朱伦, 2000b:4)。

tion”所表达出来的多重社会、政治与文化含义,是中文词汇“民族”(在使用这个词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实质指的是“族群”即 *ethnic groups*)和“国家”之外的另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范畴。“nation”既不是以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为代表的“国家”,也不是主要反映血缘与文化传统的“族群”,而是兼有“国家”内涵的领土、法制因素和“族群”内涵的文化、血缘因素的一个共同体^①。

在我国传统思想范畴中,可能“中国”或“中原”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在应用中与史密斯的“民族”(nation)比较接近。我们传统中讲的“中国”或“中原”,包括了史密斯和多数英文词典中概括的“nation”的含义:(1)历史形成的领土(“神州”), (2)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三皇五帝), (3)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教化”), (4)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5)共同的经济生活(“土农工商”结构)。无论哪个族群“人主中原”,这些要素大多被仔细地保留下来。而对于“神州”各族群在文化、宗教各方面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也作为“中华”的文化传统之一,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族群”观念和历朝政策之中。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反映本土国情和有特色的群体和相应观念。在世界各地复杂变幻的人类社会和反映各地观念的人文、社会范畴当中,要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出完全对应的词汇是不容易的,而东亚与西欧相距太远,差别太大,沟通太晚,人文词汇的对译也就更难。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要想对“民族”这个词汇确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定义是不可能的,需要做的是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定义根据其产生的不同场景、不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理解其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找出基本含义相通、具有基本共性、可以在学术交流中达到沟通目的的若干基本词汇,同时在学术交流中注意各自词汇内涵的界定并在相互理解中不致出现重大歧义,能够达到这一点,就可以满足我们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的基本要求。

在目前的具体应用方面,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宁骚,1995:13—14;翟胜德,1999:69),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

^① “在汉语里即找不到一个与 nation 对应的同时具有‘国家’与‘民族’以及‘国际主义’与‘族群主义’等双重含义的词”(潘志平,1999:156)。

的“族群”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①，而对 56 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 56 个族群”^②。这与中国几千年来族群关系史中产生的传统的族群观(如把各族群称为汉人、蒙古人、藏人等，一方面强调的是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同时也强调几千年来相互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相一致，而用西方的“民族”(nation)、“民族—国家”和“民族(政治)独立”思想套用到中国社会中的各个族群，其实是很生硬的。此外，对于英文中的“state”，我们仍译为“国家”。

阮西湖先生认为“族群”一词容易引起学术上的混乱，认为“人们共同体”的演进必然遵循“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路线，“族群”“显然指那些尚未发展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阮西湖, 1998: 80)。上述的“民族演进路线”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演进路线”在逻辑和思维方法上多少相近，实际人类社会的社会发展形态与各个形态之间的变化关系，也许要比这些公式化的概念和单线演变过程复杂得多。以此来否认“族群”一词的使用，根据尚不够充分^③。总之，在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理解分析社会现象本身，词汇和翻译不过是用以表述和交流的工具。

从上面提出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也可以称作是一个“民族国家”(a nation-state)，而且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a multi-ethnic nation-state)。当然，如果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理解像一些人(如康纳，Walker Connor)那样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界限与一个民族的界限是完全重合的，而且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族群文化(a single ethnic culture)”(参见 Smith, 1991: 15)，我们就不能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因为中国各族群不属于同一

① 在这一点上，我赞成石奕龙先生的观点，认为可以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参见石奕龙, 1999: 79)。同时，有的学者认为，把我国的少数民族译成“ethnic groups”多少带有歧视性，违反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朱伦, 1997: 3)。我认为，学术术语定义和译法的探讨不会危及民族平等这个受到宪法保障和政府实行的基本政策。

② 宁骚教授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宁骚, 1995: 13—14)。朱伦则明确主张把“nation”译成“国民”(朱伦, 2000b)。把“nation”译成“国族”、“国民”或“现代民族”，同时把“ethnic groups”译成“民族”或“传统民族”，是对于这些词汇的译法进行调整的可供讨论的另外两个思路。但是总而言之，把“nation”和“ethnic groups”统译作“民族”确实造成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乱。

③ 阮西湖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的是“race”和“ethnic group”，但在该组织的文件中未出现“族群”一词。这只能说明译者没有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而译为“民族”，仍然是个翻译问题，恐怕不能作为反对使用“族群”一词的根据。

个族群文化^①。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理论已经过时,将被“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理论所替代(阮西湖,1999:80),这一点作为结论尚有待分析和讨论,但是我们可以说,由于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所谓的“单一(族群)的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色彩的,所以凡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运动,都可称为“民族主义运动”。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不再把各少数族群的“族群意识”冠之以“民族主义”,也不再把我国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称之为“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而称为“族群问题”、“族群关系”、“族群矛盾”或“族群冲突”。

当我们这样把中国各少数族群不再定位为“民族”(nation)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跳出斯大林设定的有关“民族”定义的4条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框架,也跳出了西方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和“一个民族(在理解上可以实际应用于各个族群),一个国家”方面的理论误区,更加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分析我国的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我国的“族群识别”问题和其他涉及族群的各类问题也就会不像过去的“民族识别”工作那样带有政治色彩,而是更多地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而长期强调的“民族平等”这个政治问题也将从“各少数族群成员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予以充分保障。

也许以上的思路调整可以多少解决在中文、英文专门词汇互译中出现的概念混乱的问题。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在“ethnic”、“nation”等词汇的内涵上和其与汉语词汇的对应上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统一认识并达到用词规范化还需要一个过程(参见周旭芳,1999:78—80)^②。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益于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社会中的“实”而不是字面上的“名”。我们不应当拘泥于现有名词概念和定义的束缚,而要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群出发,从多元、演变、互动和辩证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客观事物,包括“族群”和“民族”现

^① 我认为康纳把“nation”和“ethnic groups”也混淆在一起了,不利于我们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另外,对于“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汇“the state of nationalities”(参见郑凡等,1997:46),这里引入一个如何理解“nationality”这个词汇的问题,我们将在其他文章中进行讨论。

^② 朱伦先生主张把“nation”译为“国民”,把“nation-state”译为“国民—国家”(朱伦,2000a:15)。虽然使用的中文词汇不同,但他讨论“nation”时的含义与本文前面的讨论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他对于“国民”(nation)的定义“由具有共同命运意识的人们形成的、以现代主权国家为依托的利益共同体”(朱伦,2000a:13),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史密斯所说的“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

象。以词汇表达的各种概念和定义,不过是我们人类群体从各自面对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客观世界的符号工具。在面对世界各地纷杂变化的各类族群形态时,应当承认世界上族群现象的多元性,从而承认由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族群”、“民族”观念的多元性以及相应的定义的多元性。同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学者在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成果,找出基本概念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差异,使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范畴能够找到大致相通的对应词汇,努力建立沟通中外学术界之间的桥梁。

参考书目(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Connor, Walker.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nthony. 1991,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韩锦春、李毅夫,1985,《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

列宁,1914,《卡尔·马克思》,《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马戎,1999,《民族与民族意识》,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67页。

马寅,1995,《马寅民族工作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宁骚,1995,《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志平,1999,《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阮西湖,1998,《关于术语“族群”》,《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阮西湖,1999,《关于术语“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石奕龙,1999,《Ethnic Group 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

斯大林,1919,《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瞿胜德,1999,《“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郑凡等,1997,《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周旭芳,1999,《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朱伦,1997,论《“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世界民族》1997年第3期。

朱伦,2000a,《人们共同体的多阳性和其认识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

朱伦,2000b,《走出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的误区》,《世界民族》2000年第2期。